# 红色中国

# 文集

红 色 中 国 网

·二零二二年·

# 红色中国

# 文集

红色中国网二零二二年文选

本文集收入了红色中国网二零二二年期间各版块正式发布的、包括红色中国网编缉部、编缉部成员及红色中国网网友发布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红色中国网主张的、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的、具有一定价值的共八十七篇文章。其中，署名或联名为“红色中国网工作组”“远航一号”“井冈山卫士”“蒸馏水”“草庐棋士”的文章代表红色中国网官方公开声明的立场、观点、主张。

# 目　录

## 理　论

二十一世纪的“帝国主义”问题 ……（14）
《对“中华帝国主义论”的批判》跋 ……（28）
对“中华帝国主义论”的批判……（30）
就帝国主义、战争、阶级斗争等问题给部分青年同志的答复 …（83）
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讨论……（94）
《共产党宣言》讨论 ……（113）
妇女解放斗争应该在反抗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两个战场”上作战（118）
对女性受压迫讨论的补充和回复 ……（131）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学习笔记……（137）
野草学社的帝国主义还是列宁同志的帝国主义？ ……（150）
列宁主义的叛徒、当代考茨基——兔梓的冰烙饼——对《赛里斯与全球化经济》的批判 ……（157）
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兼谈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问题 ……（171）
“只要有人民就行”—— 兼谈老田同志的学风问题 ……（188）
西方的改良，东方的血泪 ……（196）
革命何以——纪念十月革命105周年 ……（204）
阳和平先生的群众观还是毛主席的群众观？ ……（218）
与蒸馏水编辑和其他网友讨论女性受压迫问题……（226）

美国堕胎权之争中的法律问题和阶级斗争问题——几点感想 … （229）
与Rick Sanchez先生商榷 …… （233）
工资上升、实际工资上升、工资份额上升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概念（252）
如果无论革命还是改良，都要杀头坐牢 —— 那还不如搞革命…（254）
革命不是假设，而是现实的唯物主义 …… （257）
意识形态能长久地迷惑劳动人民吗？ …… （263）
无产阶级应该怎样对待小资产阶级自由派？ …… （272）
马克思主义，还是自由主义——评阳和平请资本家“帮忙”的反动言论 …… （276）
如果“消费不足”真是资本主义的“最终陷阱”，社会革命就遥遥无期了 …… （281）

## 政　治

西安疫情说明未来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是可能的……（288）
中国资产阶级的内斗——一场打扮成路线斗争的派系斗争……（291）
中特的“清零政策”与“新冠疫情速胜论” ……（306）
入关人对“国家”是既爱又恨的……（308）
谈谈加拿大卡车司机抗议对全球阶级斗争的意义……（312）
从所谓“半数加拿大人反对司机抗议“看观察者网的立场……（315）
美国才是乌克兰事件的赢家吗？ ……（320）
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怎样看待“国家主权”问题？ ……（324）
崛起的津巴布韦帝国主义 ……（327）
简单答复激流网知凡同志的回复 ……（332）
礼崩乐坏——乌克兰与现存世界体系的总危机 …… （334）
从索罗斯演讲看当前全球资产阶级的三大集团 …… （339）

大规模人口贩卖是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缩影 ……（342）
驳陈平“盎格鲁撒克逊匪帮必须被消灭”的狂妄谬论 ……（347）
俄乌战争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亲帝“左派”的反动本质 ……（349）
今天的革命青年有今天的问题，但有一点是幸运的 ……（351）
《要善于想象革命 —— 红色中国网文选》导言 ……（355）
疫情正在大大加强无产阶级的力量……（358）
关于佩洛西访台后公开宣传方针的建议 ……（367）
亲新自由主义“左派”是传统自由派的政治继承者……（370）
弗拉基米尔·普京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终结 ……（374）
教条主义者天天空喊革命，天下一乱又怕得要死……（388）
没落小资产阶级“中帝论”的三个阶段 —— 从小列宁、红色瓜伊多到“润” ……（397）
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文字直播的预告 ……（399）
关于马列毛积极分子在当前群众斗争中态度和立场的初步建议 （401）
阶级斗争是靠力量打赢的，不是靠演戏演赢的 ……（404）
新冠疫情以来中国阶级斗争形势与防疫路线变化 ……（406）
红色中国网不是小资的避难所，而是未来革命的铺路石 ……（414）
看不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对国家机器就只能恐惧 ……（417）
希望激流网同志以大局为重，劝劝刘海庆同志——放弃对未明子的起诉……（425）
是“为了生意而主义”，还是“为了主义而生意”？ 的编者注……（427）
阳和平及其追随者们想的还是“打江山坐江山” ……（429）

## 军　事

乌克兰军事形势快评 ……（434）

俄罗斯在战争初期为何进展缓慢 ……（454）
从撤退到溃退？乌克兰危机和美国霸权的未来 ……（457）
安生真懂现代战争吗？——唯武器论，还唯了错误的武器……（464）
所谓的“基辅反击战”会成为俄乌战争的转折点吗？ ……（467）
俄罗斯开辟了打击美欧帝国主义的第二条战线……（471）
俄乌战争长期化以后的发展态势 —— 胜利的天平向哪边倾斜？（474）
乌克兰纳粹分子的手上沾满了乌克兰人民的鲜血！—— 评激流网的某些错误观点……（483）
俄乌战争三个月的军事总结……（493）
俄罗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是俄军在战场上暂时受挫的政治原因……（517）
乌克兰在赫尔松和伊久姆反攻的军事与政治意义 ……（520）
俄罗斯资产阶级与西方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529）
为什么俄罗斯必将取得反美帝、解放乌克兰东南部战争的最后胜利？……（536）
简评俄军撤离赫尔松及俄乌战争的胜败 ……（542）

## 经　济

中国经济何时将被美国反超？ ……（548）
怎样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中国经济问题……（568）
有关当今气候变化与农业的随笔……（575）
美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和财政危机 ……（578）
中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和财政危机 ……（586）
美国工人工资高——是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工人斗争强还是不平等交换？……（593）

## 文　艺

评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我们需要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 …… （602）
老佛爷的大智慧 …… （612）
电子游戏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危机浅谈 …… （614）

## 心　理

将心理学改造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 …… （620）
小资产阶级为什么会有性压抑问题？ …… （622）
如果感情破裂，就要“为爱冲锋”吗？ …… （624）

## 社　会

只要阶级社会还存在，就不能急于否定专偶制家庭背景下的社会习俗 …… （630）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两性关系——“男权”还是“交换” …… （634）
“青岛小伙为爱冲锋事件”属于无产阶级的内部矛盾——与井冈山卫士再商榷 …… （638）

# 理　　论

# 二十一世纪的“帝国主义”问题

远 航 一 号

随着俄罗斯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世界形势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怎样看待当前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俄乌战争是否属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势力范围的侵略战争？中国是不是或者即将成为一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将怎样影响中国未来社会变革的前途？这些问题尖锐地摆在中国的马列主义者们面前。

在过去十年左右时间中，在一部分青年左派同志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他们认为，中国已经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尤其表现为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命脉的垄断），这种垄断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必然也是现代帝国主义，必然要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势力范围和资本输出场所。

类似的，在这次俄乌战争中，许多同志认为，这次战争是俄罗斯帝国主义与美、欧帝国主义争夺霸权以及势力范围的战争。比如，一位署名文焕的作者在知乎上撰文认为：“欧美帝国主义和俄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冲突是这场战争的根源，这场战争是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与乌克兰买办资产阶级政府维护自身统治、争夺剥削乌克兰人民的权力（权利）的争霸战争。”[1]一个署名知凡的作者在激流网上发表文章，声称“泽连斯基的做法符合乌克兰人民的利益”，“俄罗斯的工人阶级也应该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支持乌克兰人民的反帝斗争。”[2]

1. https://zhuanlan.zhihu.com/p/480125365

2.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742991154905387

在过去几年中，红色中国网的同志与激流网、红旗网等方面的同志曾经就中国是否帝国主义国家的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辩论。现在，随着俄乌战争对世界历史发展方向产生着急剧的、重大的影响，怎样看待二十一世纪的“帝国主义”问题、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怎样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如何正确理解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等问题，又摆上了政治日程。

在这篇文章中，笔者打算在过去几年“中帝论”辩论（即关于当前的资本主义中国是否帝国主义国家问题的辩论）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世界的发展形势，就“帝国主义”问题补充一些看法。

## 列宁给帝国主义下的“另外一个定义”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的第七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中指出：**“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然后，列宁进一步说：**“如果不忘记所有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一切方面的联系，就应当给帝国主义下这样一个定义，其中要包括帝国主义的如下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

凡是持“中帝论”观点（即认为当前的资本主义中国也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同志都是从上述列宁给出的对帝国主义的“尽量简短的定义”出发，再结合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进而论证，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垄断阶段（尤其表现为国有资本垄断），从而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国有“垄断”银行就是今天中国的“金融寡头”；资本输出对于中国资产阶级越来越重要；未来中国的大资本家也必然要追求建立自己可以控制的国际垄断同盟，并在世界上争夺资本输出场所和势力范围等。

然而，如果我们认真阅读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那么，就会注意到，列宁在给出了上述的帝国主义“五个基本特征”之后，马上又说：**“如果不仅注意到基本的、纯粹经济的概念（上述定义就只限于这些概念），而且注意到现阶段的资本主义同一般资本主义相比所占的历史地位，或者注意到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两个主要派别的关系，那就可以而且应当给帝国主义另外下一个定义。”**在关于“中帝论”问题的辩论中，可以说，所有持“中帝论”观点的同志都有意无意地、差不多无一例外地忽略了列宁所说的关于帝国主义的“另外一个定义”。

那么，列宁给帝国主义所下的“另外一个定义”到底是什么呢？在《帝国主义论》的剩余篇幅中，列宁并没有很明确地用一句话或一段话来概括这个“另外一个定义”。但是，在第八章“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中，列宁说：**“现在我们还要来研究一下帝国主义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大多数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对这个方面往往认识不足。……我们说的就是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

可见，仅仅根据列宁对帝国主义下的“尽量简短的定义”以及“五个基本特征”来认识帝国主义，而不注意列宁在这里所说的“帝国主义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最低限度，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仍然是“不足”的。

那么，什么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呢？列宁在大量引用了霍布森提供的资料后解释说：**“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资本输出，更加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整个国家打上了寄生性的烙印”；“帝国主义意味着瓜分世界而不只是剥削中国一个国家，意味着极少数最富的国家享有垄断高额利润”。就是说，帝国主义国家通过资本输出剥削殖民地和另外一些海外国家，可以获得“垄断高额利润”**，使得帝国主义国家的“食利者阶层”可以完全“寄生”在对海外国家和殖民地剥削的基础上。

列宁随后就指出了这种“寄生性”对于国际工人运动的重大影响：**“所以，它们在经济上就有可能去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从而培植、形成和巩固机会主义。”**

在第八章的结尾部分，列宁又转述了1858年10月7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以及1882年9月12日恩格斯致考茨基的信中的一些观点，然后总结说，英国作为最早的和最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有这样一些特点：**“(1)这个国家剥削全世界；(2)它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垄断地位；(3)它拥有殖民地垄断权。”**英国“剥削全世界”以及对世界市场的垄断的后果就是：**“(1)英国一部分无产阶级已经资产阶级化了；(2)英国一部分无产阶级受那些被资产阶级收买或至少是领取资产阶级报酬的人领导。”**

综合列宁在《帝国主义论》第八章中的论述，那么可以看出，列宁所说的“可以而且应当”给帝国主义下的“另外一个定义”，就是指的“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就是指的“极少数最富的国家”通过“剥削全世界”来攫取“垄断高额利润”；这种“垄断高额利润”使得帝国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就有可能去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从而培植、形成和巩固机会主义。”

如果说，在1916年撰写的《帝国主义论》中，列宁还只是初步提出了帝国主义就意味着“剥削全世界”和赚取“垄断高额利润”，在1920年为《帝国主义论》的法文版和德文版撰写序言时，列宁又用了相当的篇幅来特别说明“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和腐朽：**“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其人口不**

**到世界人口的1/10，即使按最‘慷慨’和最夸大的计算，也不到1/5)，它们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很明显，这种大量的超额利润（因为它是在资本家从‘自己’国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之外得来的）可以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那些‘先进’国家的资本家也确实在收买他们，用直接的和间接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办法千方百计地收买他们。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小市民化的工人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如果不懂得这个现象的经济根源，如果不充分认识这个现象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那么，在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实践任务方面，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

在上面的论述中，列宁对“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或者说帝国主义的“另外一个定义”做了更加详细的说明。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虽然这里列宁说的是“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因为列宁是在论述“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和腐朽时提及的并且列宁在《帝国主义论》第八章中曾经说帝国主义**“意味着极少数最富的国家享有垄断高额利润”**，所以，列宁在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所说的“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指的就是“帝国主义国家”。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国家“掠夺全世界”并榨取“大量的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可以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为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提供了社会基础；“如果不懂得这个现象的经济根源”，共产主义运动“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

列宁还估计了帝国主义国家总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1/10，即使按最‘慷慨’和最夸大的计算，也不到1/5”**。这就是说，世界范围的帝国主义制度必然是一个世界总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占世界总人口约十分之一、至多不超过五分之一）剥削绝大多数的制度，而决不可能是一个绝大多数人口剥削一小部分人口的制度，也不大可能是一个世界总人口中一个比较大的少数（比如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二）剥削其他部分的制度。

## 现代帝国主义：垄断还是“剥削全世界”？

从上一节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根据当时的对世界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实际上提出了对帝国主义的两种定义。第一种定义，是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垄断组织在资本主义的国内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融合导致金融寡头的形成。第二种定义，是

认为帝国主义意味着“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剥削全世界、掠夺全世界，榨取“超额利润”或“垄断高额利润”。

应当说，在列宁的时代，上述两种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是大致吻合、基本一致的。因为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亚洲和非洲的绝大部分地方不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就是半殖民地，拉丁美洲则属于美、欧帝国主义的附属国，这些地方的“民族资产阶级”自然不会有属于“本民族”的垄断资本。这样，国内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基本上也就是能在世界市场上占垄断地位并攫取“超额利润”的国家。

但是，正如列宁所说，**“所有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一切方面的联系”**。再好的定义也难以照顾到现实历史发展中一切复杂的方面，难以做到绝对的面面俱到，因而一切理论概念在现实中都难免遇到一些不典型的“例外”。

后来，到了斯大林领导下的联共（布）总结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时，就已经意识到，沙皇俄国在许多方面并非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历史根源时，就有这样一段话：“在1914年以前，俄国各个最重要的工业部门都掌握在外国资本手里，主要是英法比三国即协约国资本手里。俄国最重要的冶金工厂由法国资本家把持着。整个说来，冶金业差不多有四分之三（百分之七十二）依赖于外国资本。煤炭工业的情形，顿巴斯的情形，也是如此。石油开采约有一半是在英法资本手里。很大一部分俄国工业利润流进了外国银行，主要是英法两国银行。所有这些情况，再加上沙皇向英法两国借的几十亿债款，使沙皇政府紧紧依附于英法帝国主义，把俄国变成了这些国家的纳贡国，变成了它们的半殖民地。”[3]

如果说，在二十世纪初，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第一种定义和第二种定义之间还仅有着少量的不一致，那么，到了二十世纪中期以后，两种定义之间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和非洲的广大地区纷纷取得了民族独立，拉丁美洲的本地资本主义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差不多所有的外围、半外围国家，都不难找到某些行业高度集中并且被若干个本国企业高度垄断的情况。[4]

比如，在“再谈怎样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斗争的结局归根结底取决于世界的东方”[5]一文中，就引用了如下资料：“在林毅夫、章奇、刘明兴合著的‘银

3. 1975年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180页。

4. 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核心、外围、半外围地区的划分，参见：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41187

5. 远航一号，红色中国网，2018年7月22日，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36136

行业结构的国际比较与实证分析’一文中（发表于《世界经济》杂志2003年第1期，第3-21页），表2.1列举了四十多个资本主义国家1989-1996年银行业资本集中的情况。按照各个国家5家最大银行占银行全部资产比例来计算，埃及的5家最大银行占该国银行总资产的比例为73%，希腊的5家最大银行占91%，印度的5家最大银行占51%，肯尼亚的5家最大银行占72%，巴基斯坦的5家最大银行占90%，秘鲁的5家最大银行占76%，菲律宾的5家最大银行占56%，津巴布韦的5家最大银行占97%。相比之下，德国的5家最大银行不过占有该国银行总资产的39%，美国的5家最大银行不过占有该国银行总资产的20%。如果不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而简单的根据银行业集中度来认为埃及、印度、巴基斯坦、肯尼亚、津巴布韦、菲律宾、秘鲁等国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或者认为德国、美国反而不是帝国主义国家，那岂不是十分荒唐？”

正如列宁所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如果不考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一味地套用“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这一已经严重脱离实际情况的公式，不仅在理论上严重错误、无法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国内外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从而使得“帝国主义”这一列宁主义的核心理论概念失去任何鲜活的意义，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也必然要迷失方向、误入歧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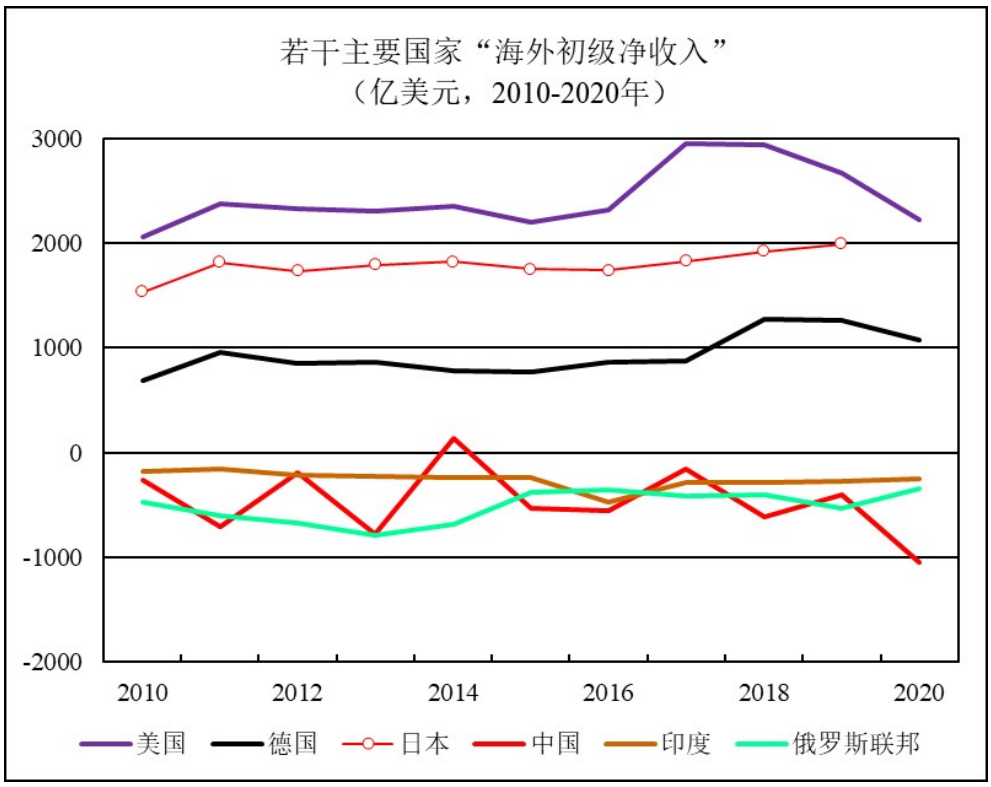
## 二十一世纪的帝国主义：超额利润

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两种定义中，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符合世界资本主义长期发展实际并且在今天仍然对世界阶级斗争有着重大指导意义的，是列宁给帝国主义下的第二种定义或“另外一个定义”，即帝国主义意味着“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剥削全世界，榨取“超额利润”或“垄断高额利润”。

列宁对于“超额利润”或“垄断高额利润”两个词有时是交替使用的。严格来说，“垄断高额利润”应当指超出平均利润率的利润；而“超额利润”，按照列宁在《帝国主义论》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所给出的定义，指的是“资本家从‘自己’国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之外得来的”利润。

在这一节中，我们先用“超额利润”的概念来分析若干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

下面第一个图，比较了若干主要国家（美国、德国、日本、中国、印度、俄罗斯联邦）在2010年至2020年期间“海外初级净收入”的情况：




图一 若干主要国家“海外初级净收入”（亿美元，2010-2020年）

图一的六个国家中，美国、德国、日本在历史上以及现在都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和印度分别是历史上的半殖民地或殖民地，俄罗斯联邦在苏联解体以后就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处于被屈辱、被剥削的地位。所谓“海外初级净收入”指的是一个国家的海外初级收入（通过提供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所获得的收入）减去一个国家支付给外国人的初级收入，其中绝大部分是“海外投资净收入”（即一个国家通过海外投资所获得的利润和利息等财产收入减去一个国家支付给外国人的财产收入）。所以，一个国家的“海外初级净收入”可以大致反映一个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所获得的“超额利润”的情况。

从图一中可以看出，美国、德国、日本等国近年来都通过海外投资获得了大量“超额利润”。2017年和2018年，美国所获得的超额利润接近每年3000亿美元；2018年和2019年，日本所获得的超额利润接近每年2000亿美元，德国所获得的超额利润达到每年1000多亿美元。

相比之下，除了个别年份（2014年）以外，自2010年以来中国每年的“海外初级净收入”都是负值，近年来负值还有扩大的趋势。2020年，中国的“海外初级净收入”为负1044亿美元。印度近年来每年给外国资本家支付“超额利润”200多亿美元。2013年时，俄罗斯联邦向外国资本家支付的“超额利润”一度达到约800亿美元。2020年，俄罗斯联邦仍然向外国资本家支付“超额利润”350亿美元。

所以，从“超额利润”的角度来看，二十一世纪的帝国主义国家基本上仍然是二十世纪初期的经典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印度、俄罗斯联邦等国虽然近年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比较快，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仍然处于被剥削而不是剥削的地位，所以不属于列宁“另外一个定义”所规定的帝国主义国家。

## 二十一世纪的帝国主义：“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

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认为，**“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剥削全世界所凭借的主要手段。比如，据《英国历史统计》，1913年时，英国的“海外财产净收入”达到两亿英镑，相当于当时英国国民收入的9%、英国国内资本家总利润的60%[6]。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资本输出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对于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意义实际上是有所下降的。比如2017年和2018年，虽然美国从“海外初级净收入”中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在绝对量上达到近3000亿美元，但仅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5%、美国“净营业盈余”（大致相当于美国资本家阶级的国内总收入）的6%。德国近年来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大约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日本的“超额利润”大约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

相比之下，近年来的统计研究表明，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所攫取的超额剩余价值其相对规模要远远大于通过资本输出所获得的“超额利润”。所谓，不平等交换，指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外围、半外围国家在向核心国家出口和进口商品的过程中，其出口商品所包含的劳动往往要大大超出其进口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通过这种方式，外围、半外围国家所生产的大量剩余价值实际上转移到了核心国家。比如，2017年时，美国通过不平等交换所获取的超额剩余价值高达6400万人年、大约相当于美国劳动力队伍总数的40%[7]。如果按照2017年美国生产性工人的平均工资粗估（按照每周工资740美元、每年工作50个星期计算），美国资本家阶级通过对外不平等交换所节约的劳动力成本高达2.4万亿美元，相当于2017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美国“净营业盈余”的50%。

那么，当今世界上哪些国家属于不平等交换的受益者，哪些国家属于不平等交换的受害者呢？根据红色中国网理论编写组的研究，2017年，中国在对外贸易中由于不平等交换所损失的劳动人年数达到4700万劳动人年，东欧和中亚（大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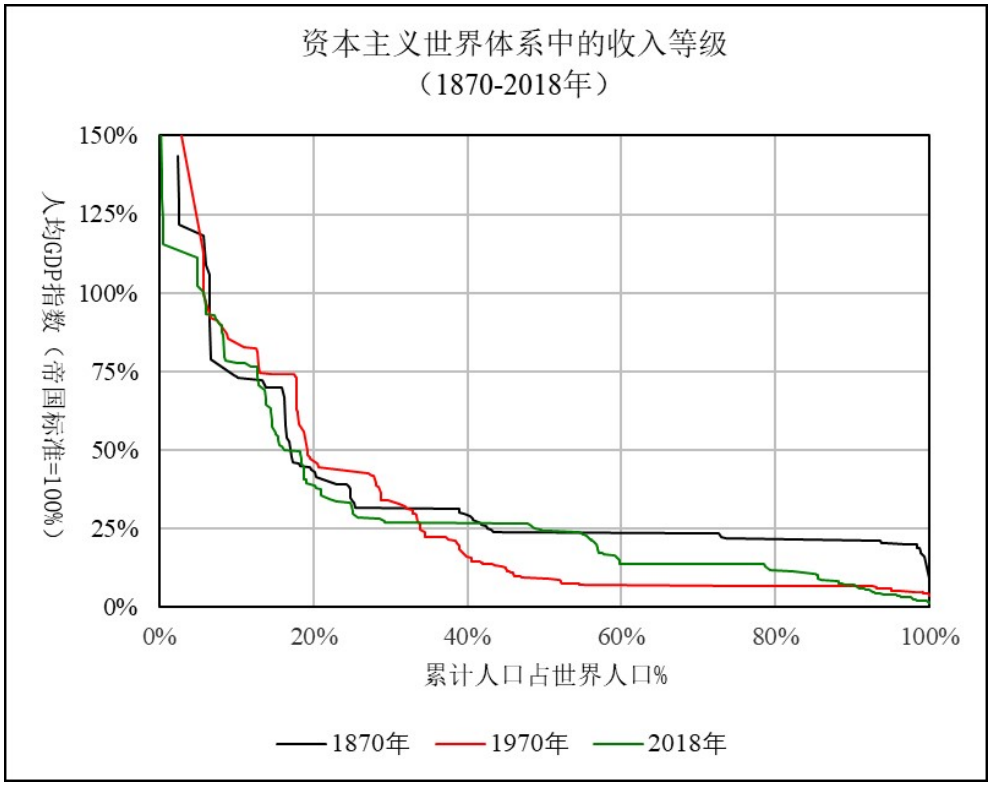
6. B.R.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829

7. 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41621

可以反映俄罗斯联邦的情况）所损失的劳动人年数达到1200万劳动人年，南亚（大致可以反映印度的情况）所损失的劳动人年数达到6500万劳动人年。

对不平等交换的计算需要准备大量统计材料、过程复杂繁琐。不过，一个国家在国际不平等交换中受益或受损的情况，往往与该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按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所计算的等级地位高度相关。通过对以往资本主义国家的统计资料的研究，我们发现，如果对美、英、法、德四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按照人口加权的平均值，将由此计算出来的加权平均值称之为“帝国标准”，那么，传统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通常在“帝国标准”的75%以上。

下面第二个图，比较了1870年、1970年、2018年世界上有数据的所有国家按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序以后在世界总人口中分布的情况。




图二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收入等级（1870-2018年）

图二中，纵轴显示的是各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以“帝国标准”为100%）；横轴显示的是，将各国按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高到低排序后，在一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以上的国家的所有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比。以2018年为例，在“帝国标准”100%以上的国家的总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6%，在“帝国标准”75%以上的国家的总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13%，在“帝国标准”50%以上的国家

的总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16%，在“帝国标准”25%以上的国家的总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48%，以此类推。

如果我们以“帝国标准”的75%（上下再略作调整）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帝国主义国家阵营的下限，那么，1870年时，在“帝国标准”75%以上的国家的总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7%；不过，法国、奥地利、德国在这一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都只是略低于75%，意大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约为70%。如果把1870年帝国主义阵营的标准“放宽”到“帝国标准”的70%以上，那么这一年全部帝国主义国家的总人口约为世界总人口的16%。

1970年，在“帝国标准”75%以上的国家的总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13%；不过，奥地利、意大利、日本在这一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只是略低于75%。如果把1970年帝国主义阵营的标准“放宽”到“帝国标准”的74%以上，那么这一年全部帝国主义国家的总人口约为世界总人口的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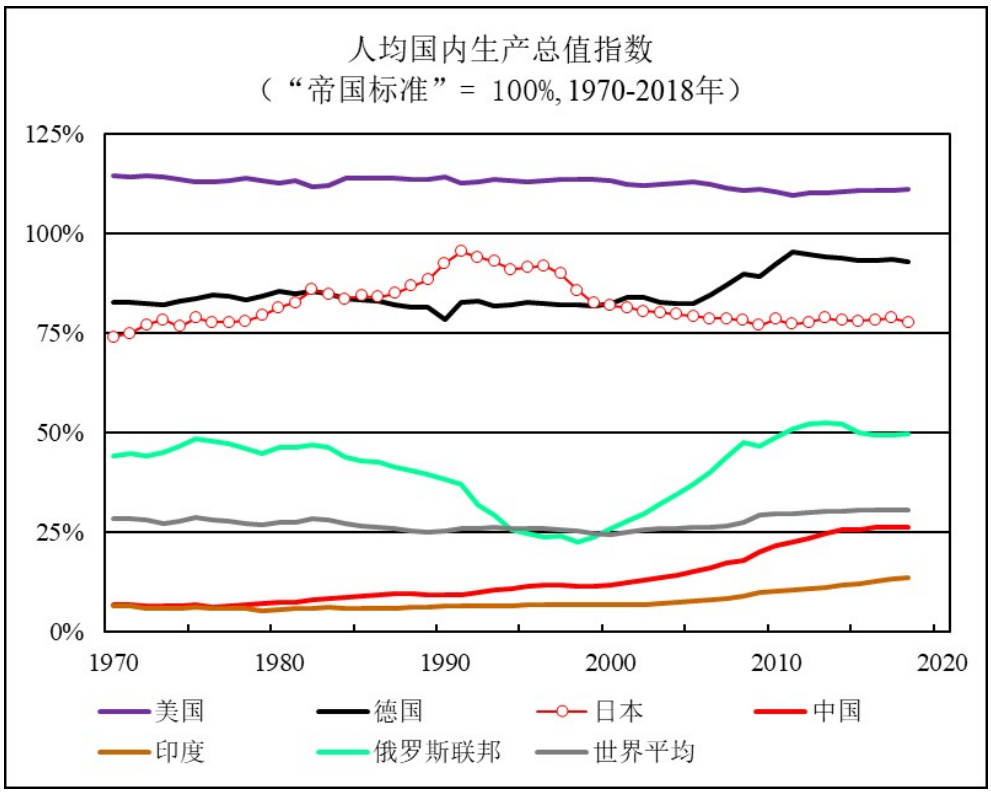
2018年，在“帝国标准”75%以上的国家的总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13%。此外，在“帝国标准”70%以上但不到“帝国标准”75%的国家有：阿曼、新西兰和波多黎各。阿曼和波多黎各显然都不属于帝国主义国家。新西兰属于“富而不强”；即使将新西兰包括在帝国主义国家阵营中，对于帝国主义国家阵营总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综上所述，从统计资料上看，历史上帝国主义国家总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大致在七分之一至六分之一之间，这恰好符合列宁所估计的帝国主义阵营的人口规模 ——**“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1/10，即使按最‘慷慨’和最夸大的计算，也不到1/5）”**。

这里要说明的是，以“帝国标准”的75%（左右）以上作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标准只是一个粗略的统计标准。有些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帝国标准”75%以上的国家是中东地区的高收入石油出口国，还有一些是卢森堡、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或城市国家。这些国家都不能说是帝国主义国家。如果把这些“水分”挤掉，那么严格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总人口会更接近列宁所做出的大约占世界人口十分之一的估计。

## 中国和俄罗斯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

下面的第三个图比较了若干主要国家在1970年至2018年期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变化的情况，同时与世界平均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作比较。




图三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帝国标准”= 100%，1970-2018年）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世界平均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保持在略高于“帝国标准”25%的水平；就是说，美、英、法、德四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加权平均值，大约相当于世界平均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倍。

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国家，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直稳定在“帝国标准”的1.1倍左右。日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91年达到“帝国标准”的95%以后，就一直处于相对衰落的状态；近年来，日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勉强维持在“帝国标准”的75%以上。在苏联解体以前，德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致保持在“帝国标准”的80%以上。近年来，通过所谓“欧洲经济一体化”并加强对南欧、东欧国家的剥削，德帝国主义的相对地位有所加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维持在“帝国标准”的90%以上。

在社会主义苏联的鼎盛时期，俄罗斯联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帝国标准”的50%。资本主义复辟后，俄罗斯联邦经济崩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度下跌到世界平均水平以下。在普京统治时期，俄罗斯联邦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有所恢复，在新冠疫情危机之前，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处于“帝国标准”的50%，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半外围的上层。

在新冠疫情危机之前，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帝国标准”的25%，勉强超过了半外围的下限，但是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大约相当于俄罗

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至于印度，虽然其资本主义经济在近年来发展较快，但在新冠疫情危机之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达到“帝国标准”的14%，大约相当于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仍然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外围。

俄罗斯联邦、中国、印度都不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

## 二十一世纪的帝国主义和阶级斗争

今天，我们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并应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分析世界形势，其目的不是为了背诵经典、重复教条，也不是单纯为了在世界重大政治事件发生时站队表态、“刷存在感”，而是要努力解决中国与世界阶级斗争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

在列宁时代，研究“帝国主义”问题的现实意义，除了努力认识空前帝国主义大战的历史根源并制定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以外，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就是怎样认识和分析当时国际工人运动中发生的分裂。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论》第七章中所说：**“（如果）注意到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两个主要派别的关系，那就可以而且应当给帝国主义另外下一个定义。”**

正如列宁后来所总结的，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剥削，攫取了大量“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使得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阶级可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种“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也是国际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的社会基础。列宁说：**“如果不充分认识这个现象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那么，在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实践任务方面，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

应当说，在《帝国主义论》以及后来的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列宁仅仅指出了“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上层）是改良主义的社会基础。从列宁当时的主观愿望来说，还没有完全放弃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希望。

然而，世界历史的实际发展要曲折得多、复杂得多。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斗争的发展都有着其自身的客观规律，这些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包括不以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不仅继续通过资本输出获得“超额利润”，而且通过不平等交换从外围和半外围国家攫取了大量超额剩余价值。这就使得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阶级可以将通过“剥削全世界”所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拿出一部分来，与国内的小资产阶级乃至工人阶级的一大部分分享，这就大大

扩大了帝国主义国家内部阶级妥协的社会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实际上没有再发生新的无产阶级革命。[8]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并没有停止发展。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趋势决定了，凡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充分发展的地区，必然发生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必然发生整个社会的无产阶级化，无产阶级的队伍必然发展壮大，而且无产阶级必然逐步地组织起来、与进步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要求更加广泛的经济和政治权利。正是因为这个根本原因，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无论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国家（北美和西欧）还是在传统的半外围国家（前苏联、东欧和拉丁美洲）都发生了工人运动的高潮。

但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国际工人运动高潮最终并没有发展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相反，斗争最后以国际资产阶级的反扑和胜利而告一段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国际阶级斗争的大决战中，国际资产阶级能够侥幸胜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整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尚有着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储备没有动员。由于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这就使得中国的数量庞大并且“优质”的廉价劳动力能够为全球资本主义充当产业后备军，为随后几十年全球资本主义的大扩张准备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发展以后，以往曾经在核心国家和半外围国家发生过的历史进程现在正在中国重演着。随着中国资本主义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半外围，中国社会的无产阶级化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未来的一、二十年就将全面完成（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面枯竭为标志）。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无产阶级必然联合进步小资产阶级开展广泛的经济和政治斗争。然而，与历史上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不同，中国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并不具有垄断地位，因而也就无法攫取到足够的“超额利润”或超额剩余价值来收买本国的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恰恰相反，在中国资本主义的整个生命周期里，它都将不得不依靠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劳动强度的非人剥削体制，这就与中国广大劳动群众在历史的一定发展阶段必然普遍产生的要求、与起码的和有人的尊严的生活条件发生了尖锐不可调和的冲突。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口和劳动力的巨大规模，也由于世界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限制，使得在中国以外，很难找到一大块与中国在规模上相当的、又具备必要的资本积累条件的地理区域。这样，随着中国内部剩余劳动力的枯竭，阶级斗争的力量对比必然发生对无产阶级有利的变化。到那时，由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既没

8. 关于中国革命、古巴革命的历史性质，可以参考：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41681&page=1

有能力也没有愿望以阶级妥协或社会改良的方式来解决中国资本主义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便只能以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根本变革的方式来解决。[9]

在国际上，由于世界资本主义资源和环境矛盾的发展，造成了能源和原材料成本的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俄罗斯、巴西、中东诸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由于出口能源和原材料的半外围大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上升，也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在中低端乃至部分高端制造业领域对传统核心国家的竞争，导致传统帝国主义国家从世界市场上剥削“超额利润”和超额剩余价值的能力开始出现萎缩的趋势。这次俄乌战争，尤其是在俄罗斯最终取得军事胜利的条件下，估计将大大地加快这一趋势。[10]

自列宁时代以来，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剥削全世界”攫取“超额利润”和超额剩余价值就一直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内部维持“社会和平”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政治稳定所仰赖的先决条件。随着这一先决条件的土崩瓦解，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才真正来临了！

9.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9640

10.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9961)

# 《对“中华帝国主义论”的批判》跋

苍 星 石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决定在顿巴斯地区进行特别军事行动，俄乌战争正式开打。在这次战争中，远离战火的中国人对俄乌战争双方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分歧，以至于成为新的“割席断交”话题。当然，左派同志也不可能免俗。怎样看待当前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俄乌战争是否属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势力范围的侵略战争？中国是不是或者即将成为一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些都是马列主义者急需解决的问题。

许多学院派以及其他的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提出中国已经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尤其表现为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命脉的垄断），必然也是帝国主义，必然要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势力范围和资本输出场所；类似的，在这次俄乌战争中，他们认为，这次战争是俄罗斯帝国主义与美、欧帝国主义争夺霸权以及势力范围的战争。

不久之后，远航一号同志发表了一篇名为《二十一世纪的“帝国主义”问题》的文章，提出：根据列宁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符合世界资本主义长期发展实际并且在今天仍然对世界阶级斗争有着重大指导意义的帝国主义，针对的是能够剥削全世界，榨取“超额利润（资本家从非其祖国的国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或“垄断高额利润（超出平均利润率的利润）”的“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由此正式开启了“帝国主义标准问题大讨论”。笔者也借这个“东风”，系统性整理过去几年对“中帝论”辩论（即关于当前的资本主义中国是否帝国主义国家问题的辩论）， 结合当前世界的发展形势以及最新的经济数据，完成这篇对“中华帝国主义论”的批判，兼谈小资产阶级学院派左翼的反动本质。

对于海外初级净收入的研究，文章中虽然只列出了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南非、俄罗斯、印度、墨西哥、中国这九个国家在 2012 年至 2020 年期间的数据，但是由于现实经济的复杂性，我们不可能只研究了这九个国家这几个年份的数据。在此，笔者认为其中一部分有趣的细节要分享给大家：

一是近年来国内的“神友”们都想“润（run）”北欧，于是笔者便研究近几年北欧国家的海外初级净收入，发现北欧国家近年来都通过海外投资获得了大量“超额利润”，是北欧高福利的物质基础，原来如此！

二是英国这几年的“海外初级收入”全为负值，昔日“大英帝国”如今落得这副田地，“令人感慨”，至于英国为什么是负的（英国历史上的海外净收入一直是正的，到了本世纪初才变成负的），可能是因为英国经济金融化以后，伦敦城实际上成了美国等外国资本攫取金融利润的中转基地（或者说美国等外国资本与英国资本共同分享英国的金融利润）。但这又需要回答这些金融利润是从哪里来的问题；当然也可“窥一斑而知全豹”，整个西欧有向半外围国家跌落的趋势，这次俄乌战争加剧了这一趋势。

三是对于俄乌战争另外一个主角——乌克兰，其2015年到2020年的“海外初级收入”居然是正值，不过这一正值主要是由乌克兰人对外资提供劳动所获得的收入所贡献。

以上都能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电子图书馆数据库的“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数据”11中查询到。可见，现实经济是复杂的，这些问题，如果不实际动手研究，都不会发现。

最后希望笔者的文章能为其他马列主义积极分子破除思想的迷雾，指出正确的方向，坚定革命的信心。

11. https://data.imf.org/?sk=7A51304B-6426-40C0-83DD-CA473CA1FD52&sId=1390030341854

# 对“中华帝国主义论”的批判
## ——兼谈小资产阶级学院派左翼的反动本质

苍星石、艾AA、飞机会不会飞、
打野别送、爱丁堡上单等

### 前言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许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却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条，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

学院派左翼常常说中国是帝国主义，但问他为啥是，他就迷迷糊糊的开始说起什么一带一路，什么国企垄断，这还算好的了，至少拿出了具体的例子去论证，有些就更为教条了，直接将印共（毛）的东西复制粘贴拿过来进行复读，你若对此感到疑惑，拿出论据质疑他们的观点，他们便开始大扣帽子，似乎不承认中国是帝国主义就是替帝国主义张目的反革命考茨基分子、十恶不赦的保皇派、民族布尔什维克之类了，这就很像街上无所事事的混混，挨了打，打不过，就骂骂咧咧的爬回去找老大，要求老大出面撑腰。

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学院派左翼已经脱离实际到得靠看外国同志评述中国问题的洋文章来指导中国学院派左翼的中国工作了，学院派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斗争”的情况下是必然无法正确理解、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

命导师的光辉著作、科学论断无不是建立在“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地分析和综合的研究”之上。

学院派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国有垄断资本，认为中国的一些企业在世界上已经达到了很大的规模，从而中国已经成为垄断资本主义，而垄断资本主义必然就是帝国主义，所以中国必然就是帝国主义国家。

过去几年的理论斗争以及阶级斗争的实践证明，这样一种从概念到概念的工作方法，不是马克思主义认识问题的方法，而是小资产阶级卖弄教条的繁琐哲学，在现实斗争中百无一用。

正如列宁指出的，“所有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一切方面的联系”。脱离了一定的定义所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脱离了对“充分发展的现象一切方面的联系”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样的定义，不仅不能起到科学分析以及指导现实阶级斗争的作用，反而不可避免地要将许多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和积极分子引入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不归路。

在这种情况下，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种种歪曲空前流行的时候，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真正的列宁同志的帝国主义学说。为此，必须大段大段地引证列宁本人的著作。当然，大段的引证会使文章冗长，并且丝毫无助于通俗化。但是没有这样的引证是绝对不行的。列宁同志的著作中所有谈到帝国主义问题的地方，至少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一定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证，使读者能够独立地了解列宁同志在帝国主义问题上的全部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确凿地证明并清楚地揭示目前在现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学院派左翼对这些观点的歪曲。

为此，我们将尝试根据列宁同志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冒着被教条主义者批判为教条主义者的“危险”，大段大段的引用列宁同志的教导，在充分引用材料的基础上对“中国是否为帝国主义”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星火1921

## 一、何为帝国主义：腐朽性、寄生性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里面提了两种定义，一种是为大部分左派所熟知的五大定义：

**1、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

**2、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

**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

**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

**另一种定义则是列宁在小册子后边提出的两个核心性质：腐朽性与寄生性。**

**现在我们还要来研究一下帝国主义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大多数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对这个方面往往认识不足。……我们说的就是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

帝国主义意味着瓜分世界而不只是剥削中国一个国家，意味着极少数最富的国家享有垄断高额利润。

本文将根据核心性质进行分析。

## 二、腐朽性：中国的垄断资本

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资本的垄断达到一定程度就会阻碍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我们已经看到，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的垄断，也就是说，这种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生长起来并且处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竞争的一般环境里，同这种一般环境始终有无法解决的矛盾。尽管如此，这种垄断还是同任何垄断一样，必然产生停滞和腐朽的趋向。

资本的垄断导致垄断资产阶级阻碍技术进步，以此维护其垄断地位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就比如美帝打压中国的极少数尖端产业）。列宁同志是这么说的：

例如，美国有个姓欧文斯的发明了一种能引起制瓶业革命的制瓶机。德国制瓶工厂主的卡特尔收买了欧文斯的发明专利权，可是却把这个发明束之高阁，阻

碍它的应用。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垄断决不能完全地、长久地排除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这也是超帝国主义论荒谬的原因之一）。

垄断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规模上的垄断：少量的企业占据行业内产值或利润的大部分，同时垄断企业构成诸如托拉斯等垄断同盟。

一个工业部门的生产总量，往往有十分之七八集中在卡特尔和托拉斯手中。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业辛迪加在1893年成立时，集中了该地区总采煤量的86.7%，到1910年则已经达到95.4%。这样造成的垄断，保证获得巨额的收入，并导致组成规模极大的技术生产单位。

另一个方面是行为上的垄断：这些企业中的巨头（垄断企业）结成垄断同盟，采取直接的价格、产量干预等行为获取垄断利润，共同瓜分垄断利润。

卡特尔彼此商定销售条件和支付期限等等。它们彼此划分销售地区。它们规定所生产的产品的数量。它们确定价格。它们在各个企业之间分配利润，等等。

所以，如果我们要说一个国家是帝国主义，是腐朽的，那么我们就要去考察这个国家的垄断程度，垄断资本家是否依靠其对市场价格的操纵（或者说是垄断）获得了超过一般利润率的超额利润，否则没有垄断行为和不获取垄断利润的企业在积累速度上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并无区别，自然不具备帝国主义性质。

可以肯定的是，今日的中国经济当然不是纯粹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但是，今日中国经济中，有哪些行业是确有少数企业垄断的，哪些行业即使不是“自由竞争”，但由于进入门槛低、企业数量巨大、规模接近等原因在实际上是高度竞争性的（比如纺织、煤炭、光伏等），仍需要具体研究。

这些若干资本家价格同盟是否得到有效执行，是否巩固，是得到长期维持还仅是昙花一现？价格同盟要维持，还必须伴随着划分市场份额和对整个市场的产量来加以计划。否则，垄断价格是维持不住的。所了解到的垄断企业，有没有这样的产量计划和市场瓜分？资本家之间尔虞我诈，是不可能相互信任的。又如何保证垄断同盟范围内的资本家能信守他们相互之间的协定？ 即使是确实已经形成垄断的产业，哪些是外资港资台资垄断，哪些是私资垄断，哪些是国资垄断？又需要具体分析。比如，外资垄断就不但不能视为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的证据，反而可以是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被剥削地位的结果。

### 1. 国有资本在工业的垄断

列宁同志在《帝国主义论》中指出：

**现在已经不是小企业同大企业、技术落后的企业同技术先进的企业进行竞争。现在已经是垄断者在扼杀那些不屈服于垄断、不屈服于垄断的压迫和摆布的企业了。**

垄断形成的一个后果，就是竞争性资本主义企业受到垄断资本主义企业的压迫和统治， 一个或几个行业的若干最大的资本家用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形式组成“资本家同盟”，对市场的容量进行大致的估计，并且根据协议来瓜分市场、规定产品产量、确定价格等。通过这些垄断行为，一个或几个行业的最大资本家可以大大压低原料的价格、提高售出产品的价格，从而获得高额垄断利润。

列宁同志引用了当时资产阶级商业资料来说明当时垄断资本主义企业所获得的高额利润:

这样造成的垄断，保证获得巨额的收入，并导致组成规模极大的技术生产单位。美国著名的煤油托拉斯（美孚油公司），是1900年成立的。“它的资本是15000万美元。当时发行了1亿美元的普通股票和10600万美元的优先股票。1900～1907年，每年支付的优先股票的股息分别为：48%、48%、45%、44%、36%、40%、40%、40%，共计36700万美元。1882～1907年的纯利为88900万美元，其中60600万付股息，其余的作为后备资本。”

我们就按照列宁同志的教诲，从中国工业部门的资本集中度与垄断企业的利润率入手展开分析。根据《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18》的数据。

| 2018 | 企业单位数 | 主营业务收入 | 所有者权益合 | 利润总额 | 平均用工人数 | 利润率 |
|---|---|---|---|---|---|---|
| 大型企 | 8448 | 464959.7 | 244442.3 | 33541.34 | 2800.57 | 13.72% |
| 中型企 | 42625 | 237449.4 | 111925.4 | 16829.34 | 2337.63 | 15.04% |
| 小型企 | 323891 | 354918.2 | 142975.2 | 21238.23 | 3218.23 | 14.85% |
| 总计 | 374964 | 1057327 | 499342.9 | 71608.91 | 8356.43 | 14.3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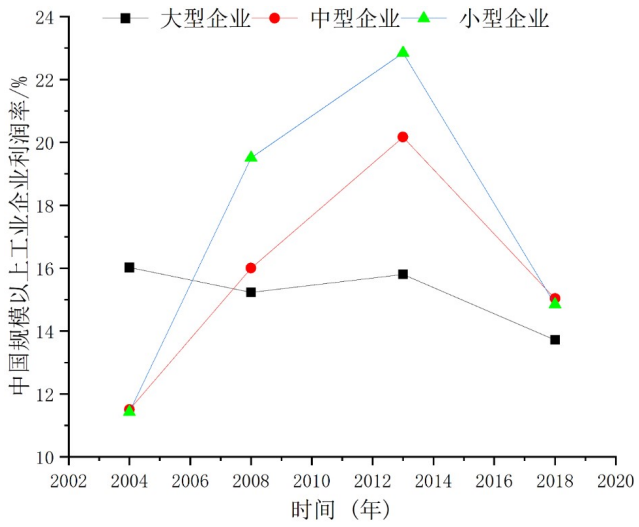
2018年，中国全部工业企业有3450649个，营业收入为11521.5亿元，规模以上大型工业企业以0.22%的企业数拥有了中国全部工业企业39.23%的年主营业务收入，这足以说明中国工业部门的规模以上大型企业的集中度是非常可观的。而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的企业单位数占比分别为：2.25%、11.37%、86.38%，净资产占比分别为：48.53%、22.61%、28.87%，按照净资产计算的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为14.34%。

但是我们发现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大型企业以2.25%的数量占据了48.53%的净资产，但其利润率（13.72%)却低于中型企业（15.04%），甚至低于小型企业（14.85%）。在大、中、小型企业中，大型企业的净资产利润率是最低的，小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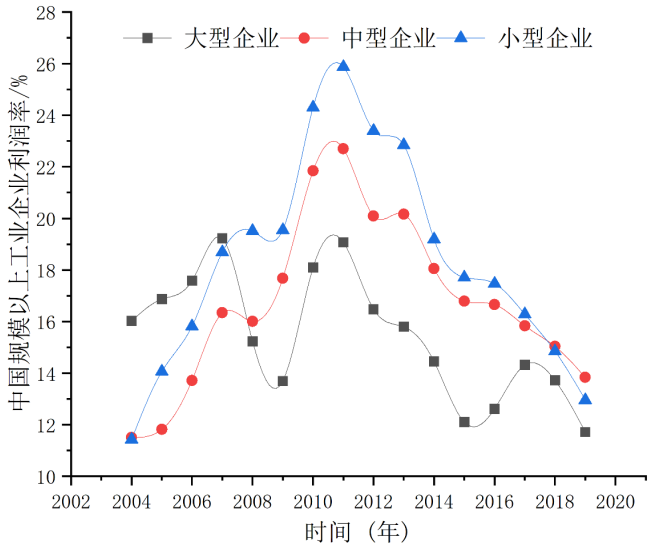
企业的净资产利润率是最高的。小型企业的净资产收入利润率虽然低于中型企业，却不低于大型企业。

请读者朋友注意，这里所讨论的是“规模以上”的企业，是全部3450649个工业企业中那374964个年主营业务收入在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是全部工业企业中10.87%的佼佼者，这些佼佼者中的8448个大型企业却“空有资本集中，而无垄断利润”。

下图为依据四年来《中国经济普查年鉴》的数据计算的，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按规模划分的利润率。




下图为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的，2004年到2019年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按规模划分的利润率。



我们可以明显看出，2004年到2007年之间大型企业的利润率是高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的，而在2007年后大型企业的利润率则在12年内长期低于中型企业与小型企业，甚至低于小型企业。

根据统计局的经济普查数据，我们可以认为，就中国工业部门的集中水平而言，中国显然不仅跨过了列宁时代帝国主义国家的门槛，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当时工业最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水平。因此，中国工业部门在行业集中度是上符合列宁同志对垄断的两个定义的其中一个——行业集中度。

但是在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定义——利润率上却是大型企业未能获得超过一般利润率的超额利润率，并且这些大型企业不符合列宁同志所说的垄断企业对中小型企业的压迫，也即：**“垄断者在扼杀那些不屈服于垄断、不屈服于垄断的压迫和摆布的企业了。”**

除非垄断的大企业只压迫“规模以下”企业，仅仅因为规模以上的中小型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在2000万元以上，或是因为其被纳入了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范围[19]就神奇般地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而不被垄断的大企业压迫。这就意味着凡是被国家统计局纳入统计范围的，无论大、中、小企业，都组成了一个无形的超资本家联盟，共同压迫规模以下的工业企业。

当然了，这种“除非”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列宁同志的教导以及数据资料认为中国的工业部门并未达到高度的垄断。

“你说中国工业是这样，那国企是啥样呢？”好问题！印共（毛）曾经说过：

总而言之，中国的垄断组织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列宁说过，“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中国不仅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而且还比欧美列强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根据《中国经济普查年鉴》，中国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全部主营业务收入中，国有企业占1.99%，国有控股企业占27.50%，私营企业占32.52%，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22.41%。

我们不难看出，私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比远超国有企业，私营企业是国有企业的16.34倍，也超过了国有控股企业，这与一些资产阶级自由派、学院派左翼鸣呼哀哉的“国企垄断”，“国进民退”相去甚远。同时由于“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现在的国有控股企业基本都是“规模以上”，如果我们把“规模以下”的企业也算进来，这个比例会更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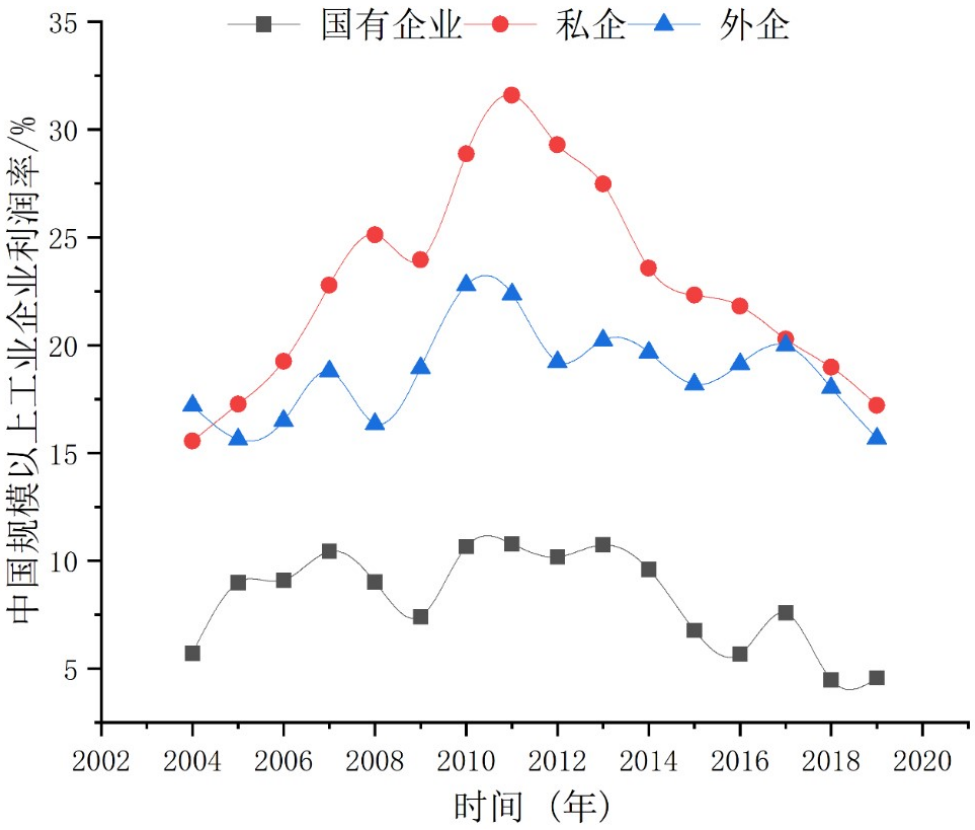
从统计指标上来说，今日中国的“国有控股”，不是国营企业，也不是国有企业，甚至不是国有资产占50%以上的企业，而是国有经济成分相对大于其他任何

一种经济成分的企业都算作“国有控股”，甚至还有国有成分不大于其他成分的“协议控股”[23]。这还仅仅是工业，还没考虑农业和服务业。

在新一轮国企改革来临之时，官方学者夏小林坦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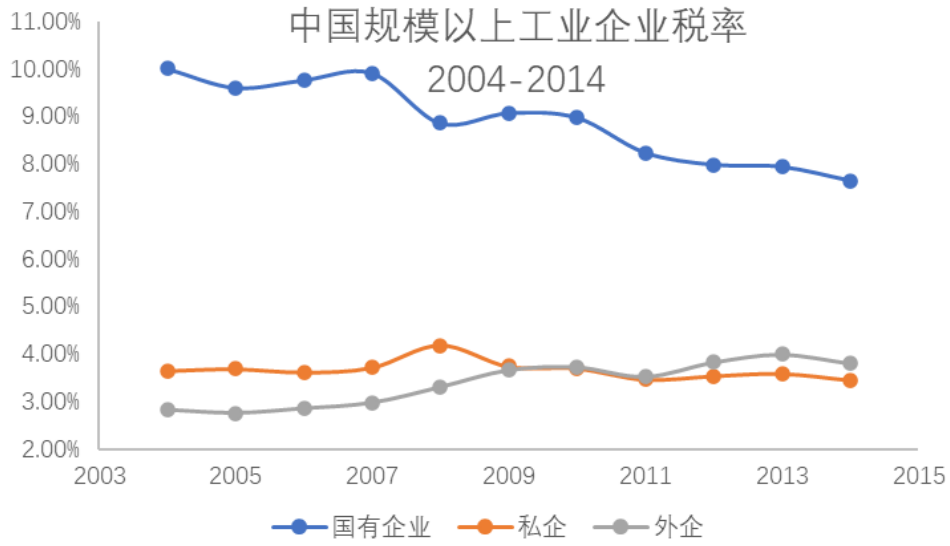
就全国而言，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已占GDP的3/4以上。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底，全国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实有2.8亿人。其是包括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6000万左右就业人员的约4.7倍，是国企就业人数的约9.3倍。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就业人数不足2000万。可见，在全国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的结构性改革中，把“产能过剩”全推到国有企业头上是不符合事实的。

从全局看，兑了好几次水的“国有控股”企业不过才占了中国国内工业经济总量的两成，看到这幅景象，任何关于国企垄断一统天下的神话故事也就不攻自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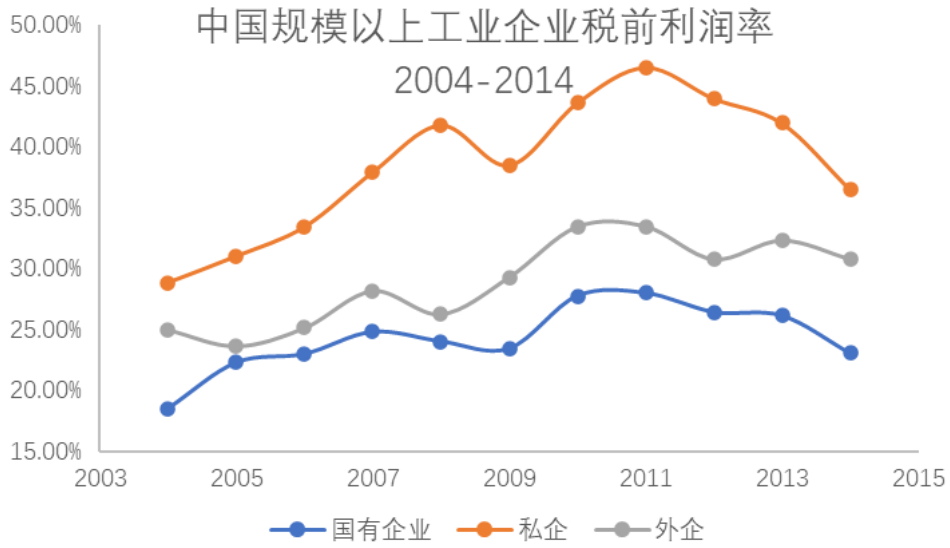



令人遗憾的是，国有资本作为印共（毛）文中“全世界最强的垄断组织”，不仅在规模上无法满足高集中度的要求，国有企业在利润率上也是低到“粉红看了怀疑人生、保皇听了掩面拭泪”的地步，堂堂“中华帝国主义”的国企利润率还没有外资企业的一半，实在是“爱丁堡特色”。

当然了，有学院派会说，“你国企每年上缴多少利润啊，你国企要缴税的，缴完了才这么低的。”好，那我们来算一算。




由于自2014年后中国官方统计机构不再发布以所有制为分类的本年应交增值税、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所以我们只能在2004至2014年间看到国企唯一高于私企、外企、港澳台企的指标——税率。




我们将本年应交增值税、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算入利润总额后，我们发现税前利润率仍然是私企最高，国有企业还是没有外企的高。厉害了，我的中华帝国争霸先锋。

## 2.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阶级斗争

当然了，有些学院派常说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使国有资本的垄断程度空前提高，“国有资本的一块钱就可以撬动私人资本的一万块”，尽管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经开展多年，国有企业的利润率也没见有多少提高，但我们还是得看看这混改究竟改出了个啥样的名堂。

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有两个目的：私有化、收拾烂摊子（纾困）。

所谓私有化，即人为的破除国有资本在一些行业的垄断，使私人资本得以进入能源、交通等自然垄断行业，从而以“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名义，实际上加速私有化进程。

我们以能源行业的混改为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赵昌文表示，应当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到能源行业，包括一些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环节。目前我国的能源产业除了石油和天然气外，煤炭、电力、新能源已经完全对民营资本放开。即使是石油和天然气，也在一些环节已经放开。

事实上，“新36条”（《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及其配套细则出台后，民营资本进入能源领域已无太多的政策障碍。民营资本进入到一些特定的能源领域，不仅存在行政准入许可，还存在经济上的门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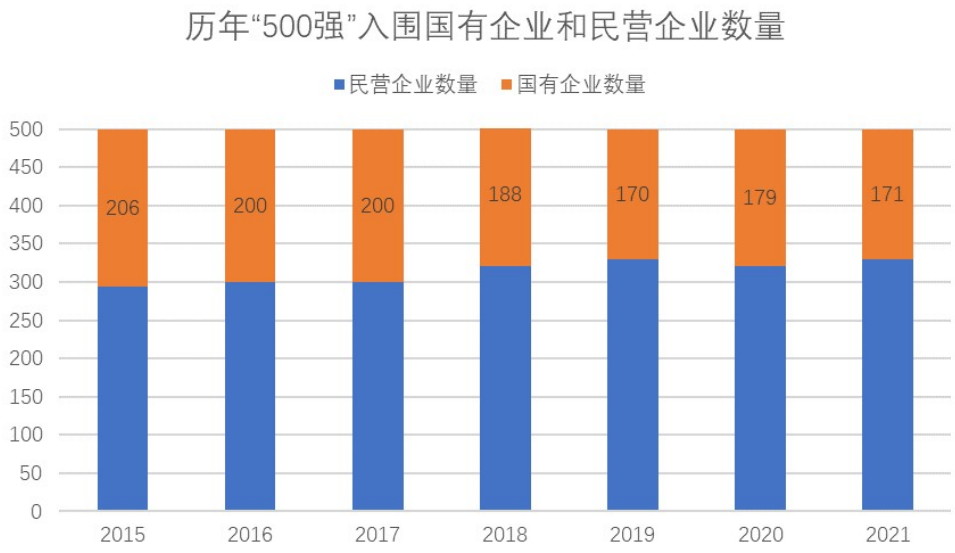
是什么样的经济上的门槛呢？

比如石油和天然气的输气管道，已经对民营资本开放，但由于资金规模大、回收期长，并不是所有民营资本都有兴趣或有能力去投资。在勘探开采领域，由于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加上勘探开采领域是高风险的，需要很强的技术经济能力，目前绝大多数的民营企业缺乏相应的技术能力，也可能不愿意承担勘探开采失败的风险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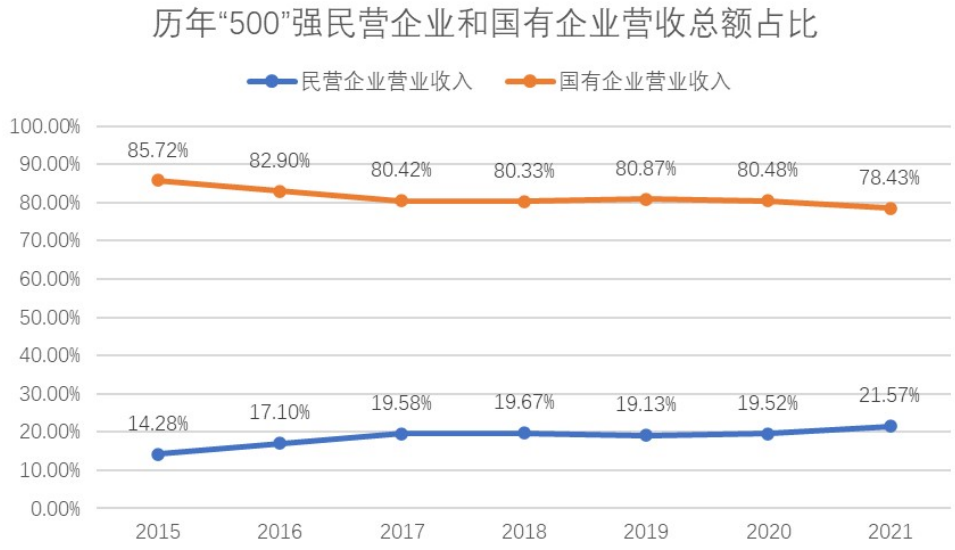
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今天，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也往往要由国家来承办，还有道路、机场、港口、通信、水利、电力事业等周期长、利润薄的公共部门也有赖于国家投资，这正是因为私人企业为了追求最大的私人利润，唯利是图的“短期行为”，不愿意投资于研究开发活动和无利可图、风险大、需要巨额投资的高技术产业。

对能源领域进行改革，一定要先对能源产业分类，像石油天然气行业、电力行业、煤炭行业、新能源行业，性质完全不一样，有些是完全竞争的行业，比如新能源的很多领域国有企业并不多，民营企业占主导地位。煤炭行业的国有企业数量虽然不少，但其竞争程度比石油、天然气行业高许多，现在市场不好不仅跟体制有关系，与市场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

以上是2015年发表在北京青年报上的文章——《能源国企“混改”将有哪些利好？》[25]，而我们现在是2022年，能源领域的国企“混改”被改成啥样呢？根据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发布的《2021中国能源（集团）500强榜单》[26]，2021年能源领域“500强”中,在入围企业数量上，民营企业入围329家，较上年增加8家；国有企业入围171家，较上年减少8家。




在营收总额占比上，民营企业营收总额占“500强”的比重由19.50%上升至21.57%，民营企业营收总额占比首超两成。国有企业营收总额占“500强”的比重则由80.50%下降至78.43%，这是自2016年以来，国有企业营收总额首次下跌，也是国有企业营收总额占“500强”比重首次低于80%。



在公众普遍认为国有资本占优势地位的能源领域，从2015年开始，私人资本在入围企业数量和营收总额上稳步增加，相反的是，国有企业对应的两个指标则全部下降，二者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

私有化改革除了放开各个行业的准入门槛，任由私人资本进入外，也包括将国有企业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转公为私”，在上一轮国企改制中经常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常见的手段就是低估资产、隐瞒债权、虚设债务、虚构产权交易，等等。

而这一轮国企混改不一样，虽然也涉及产权交易，但相较于上一论，这次建立、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从理论上讲，可以从制度层面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可以达到“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目标。

具体有哪些制度呢？第一是国有资产交易，不论是股权转让，还是增资扩股，都需要走审计、评估和交易所挂牌程序，通过“阳光操作”来防止贱卖国有资产；第二，在员工持股方面，规定了单个员工持股比例原则上不超过1%，混改后国有股比例不低于34%，防止出现管理层收购（MBO），防止把国有企业变成私人控股。

但是，制度是需要人去执行的。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披露的一则国有资产流失的典型案例[27]来看看这混合所有制改革实际上到底是增强了国企，还是削弱了国企?

A公司系某省国有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占股70%，B公司是A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20年1月，该省为深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以B公司为试点，拟将其混改为民营资本占股100%的民营企业。

A公司安排孙某担任B公司总经理牵头负责B公司混改工作，由C公司对B公司的国有资产进行评估。在混改过程中，孙某在明知B公司有100万元债权尚未收回，且该债权在B公司总账目没有体现的情况下，指使公司财务人员不向C公司提供与该债权有关的财务资料，因此该债权未被纳入B公司资产评估。

2020年4月，经C公司评估B公司国有资产数额为1000万元。与此同时，孙某暗中运作，与民营企业负责人赵某商定，由孙某出资500万元，赵某出资500万元，以赵某公司名义参与B公司混改，后成功签约。2020年10月，孙某见混改已完成，便以B公司名义将100万元债权收回，并以二人名义投入B公司生产经营。

在这个案例中，混改的主体——B公司是一家省属企业的三级公司。它不是100%的国有资本持股，因为二级公司只有70%的国有股份，因此，它是国有控股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而按照32号令的规定，国有控股企业的控股企业，仍然属于国有企业。所以它的股权是国有资产，其转让要走审计、评估和挂牌程序。

B公司的混改方就是卖掉全部的国有股权。卖给谁呢？在这一轮国企混改中，股权不能卖给高管。高管如果想持股，必须按照员工持股的政策来操作，比如，孙某受让的股权比例不能超过1%，不得参与转让方案的制定，不得组织实施各项工作。

这么规定，就是要求他们进行回避，防止出现利益冲突。如果孙某遵守这些规定，他就不会去瞒报那100万，因为他只能持股1%，冒贪污100万的风险去瞒报100万公司债权，混改后落到自己手里才1万，风险与收益不匹配。另外，即使他想瞒报，现实之中他也很难做到，因为他不能操作混改事项，所以没法决定资产评估和瞒报债权。

所以，从制度设计看，本来是可以防止出现案例中的问题的。但是，孙某钻了制度的漏洞，就是表面上他并没有受让公司的股份，这样他就可以负责评估与转让事项，但背地里却和民营股东勾结，实际上受让了公司50%的股份，这样隐瞒100万就能落到自己手里50万。所以那些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制度设计都落空了，国有企业跑到私人口袋里去了。

因此，自由派学者见到混改政策的出台，高兴的举起了双手对混改的到来而欢呼，要求加速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 按时间算，国企混改已启动两年，首批试点名单早已公布，但目前来看完全有必要提速加力。一方面，国企混改要与“去产能”紧密结合起来，引入民间资本前必须对一些垃圾资产进行彻底清理与有效剥离。相对于民营企业，尽管国有企业有较好的装备、技术、人才和品牌基础，但却存在一些管理机制僵化、所有者缺位、效率不高等致命软肋，因此，国企尤其是地方国企混改过程中剥离出来的优质资产应当尽可能地交给民营企业去经营，以导入全新的市场机制。

自由派学者在这里要求国企在混改前先“彻底清理”自身的“垃圾资产”后，将国有企业的优质资产交给民营企业去经营，这不经让人思索究竟谁才是混改的受益者，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资本?

另一方面，国企混改应当鼓励与允许民营企业在合格合规条件上成为大股东或者控股股东，混改方案也应由民企已经进入的董事会作出，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只负责监督与服务之责，以此推进民间资本投资的战略性介入。

自由派学者更是提出应当由私人资本主导对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到底是“国进民退”，还是变相私有化呢?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另一目的——收拾烂摊子（纾困），更是将“国退民进”展现的淋漓尽致，可以说是“我不演了！”

我们以在安徽省蚌埠市发生的一件令人很难绷得住的事为例。

多年蝉联“华为金牌供应商”称号的大富科技由于多元化转型发展战略失败，主营业务增长乏力，股价萎靡不振，大富投资的整体债务规模攀升至约90亿元，而资产仅有77.32亿元，大富投资陷入债务危机。

一家华为供应商——大富科技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为了避免触发要约收购进而影响控股股东控制人地位，以确保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不受影响，以及寻求对纾困基金的特殊出资方式予以理解和支持，蚌埠市委书记汪莹纯甚至亲赴证监会沟通。

作为蚌埠市重点企业，2018年配天投资债务危机爆发后，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对重组和帮扶方案进行反复论证，其间蚌埠市委书记汪莹纯多次带队赴深圳与配天投资和大富科技等配天投资旗下企业相关人员座谈，了解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对症下药，制定相应的帮扶政策。

在一番操作后，地方政府出面表态，为了给私人资本家营造良好的债务重组外部环境，蚌埠市政府以及蚌埠高投及时发声，表示将全力支持与配合大富投资的债务重组项目顺利推进，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2018年底，大富科技将其全资子公司安徽省大富重工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大富重工”）的全部股权，以0.58亿元价格转让给蚌埠高投。大富重工资产11.27亿元，负债12.14亿元，所有者权益-0.87亿元；2017~2018年9月，大富重工分别亏损0.78亿元、0.3亿元。对于这块盈利能力较差的资产，蚌埠高投以0.58亿元的价格进行收购，这笔交易为大富科技贡献了1.62亿元净利润。

蚌埠市不愧是资产阶级的父母官啊，慷国家之慨，纾资本之困，让蚌埠高投这家市属国企把大富科技的垃圾资产全买走了，还给资本家送去了1.62亿元的净利润。

除了支付现金收购股权之外，蚌埠高投对大富重工所欠大富科技4.43亿元往来款，也作出了非常详尽的偿还安排，既向大富重工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又直接提供偿债资金。这笔资金无疑也将有助于解决大富投资的债务问题。

近日，在安徽蚌埠市配天投资产业园董事长办公室，《国际金融报》记者再次见到了孙尚传，他身着藏青色外套，朴实儒雅，双鬓多了些银发，面色红润，他笑言“越忙身体越好”。

在近60亿元国资纾困的驰援下，孙尚传及大富科技（安徽）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大富科技”）在黑暗中迎来黎明。

为了让私人资本家不仅能活着度过“债务危机”，还要“身体越好”、“迎来黎明”，蚌埠市更是向大富提供了无限连带责任担保，“强大”的国有资本，不去吞并大富的优质资产，反而给资本家送钱，帮资本家还债，实在是，绷不住!

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质上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私有化进程的延续，同时，在经济下行阶段，国有资本集团会采取“慷国家之慨，纾资本之困”的办法，以维持资本积累秩序的稳定，这便是自由派学者欢呼混改的根本原因。

那么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工人阶级有怎样的影响呢?

2017年，自由派学者戚聿东撰文称:

应该打破员工就业的“终身制”，建立择优录取的选人机制，通过公开招聘等形式，向企业内外的人员公开宣布岗位空缺、报名条件和招聘计划，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择优录用合格的人员，杜绝量身定制的“萝卜招聘”。基于绩效考评结果，冗员、不胜任者要淘汰。按照劳动合同法将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向前推进，建立真正适应市场竞争要求的劳动合同制。

而在2021年4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有这样一篇文章，《盘活资产 促进循环》，文中提到:

主动对标市场、对标行业先进标准，集团以市场化为导向，搬走“铁交椅”，撤掉“铁饭碗”，打破“大锅饭”，把干部员工的劳动、人事、分配和企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着力打造员工能进能出、管理人员能上能下、收入能增能减的新机制。近年来，新员工社会化招聘形式占79%，497人因业绩不佳等原因被公司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

在国药集团三年混改后，“铁交椅”被撤走，“铁饭碗”被撤掉，“大锅饭”被打破，劳动者变得“能进能出”，工资收入变得“能增能减”。

面对新一轮的私有化改革，工人阶级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像四十年间无数次工人运动那样勇敢的进行斗争，下面我们以2019年某三线大型企业的工人运动为例[35]。

斗争发生在某个历史悠久、位置特殊、规模巨大的三线企业，大约有职工两万人，加上生活在单位的家属约有四到五万人，曾经辉煌一时，但近四五年来因多种原因亏损严重，职工待遇大幅下降，工资收入只能维持基本生活。

于是启动混改，经多轮谈判最后被一个规模小的很的企业混改。混改后绝大多数股权在银行，由于负债过高而实行债转股。新成立了两个平台，一个是股份平台，一个是运营平台，股份平台它投资很少几乎不占股份，运营平台是新成立的，它出资属于大头，各家银行出资占小头。运营平台的资金用于平息各种债

务，剩下一部分注入公司作为运营资金，在这个平台上该小企业占据60%股份，也就是说该小企业在经营方面有决策权，盈利后给银行分红。

2019年农历年后，该厂派驻的总经理及一部分高管到位。该总经理对企业的发展抱有极大热忱，提出了很多新政策，并落到实处，整个企业呈现了久未看到的勃勃生机。但不久后大概一个月左右，矛盾就开始显现。

根据该厂职工群众的描述，混改后的管理层企图加强劳动纪律，压低职工工资，以及清退部分职工，他们采取了以下措施:

1、无休止的加班，无任何说法，加班费和倒休不提。双休明面上不说改单休，但实际上每周都要加班。

2、管理粗暴，说一不二。可能对方有优越感，不屑于征求职工意见，说什么就是什么，而且考核严厉。说一不二。甚至在厂区内撤掉19大学习精神的宣传标语，换上企业文化，职工内心抵触，尤其是党员职工。

3、一再强调待遇不变。职工盼混改好多年为了什么？即使现在尚未扭亏，但扭亏后怎么办提也不提，职工多年只拿糊口的待遇，憋了很久了。

4、作为一家历史久，规模大的国企，必然存在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很多关系到职工的根本利益。新的管理者绝口不提，职工无处反映，工会不作为。

5、由于该厂位置特殊，很多社会机构如公安局，消防队，周边村民都有密切联系，新的管理者试图在短时间内彻底打断这些联系，引发众怒。

6、管理者承诺工厂对职工的欠款要清偿，这些欠款主要来自职工的内部工资卡，此工资卡与外面银行是无关的，取钱只能在工资科取，企业陷入困境后大额存款只能申请，混改后申请也不行了。管理者来了之后也是绝口不提，很多急等用钱的职工生活陷入困顿。这些职工也包括退休职工。

对于混改后管理层的所作所为，一位年轻职工反映称:

我作为普通一线设备维护员工，那段时间连点检设备都做不到，每天就是出去搞面子工程，做变形金刚，修剪树木，刷浆，画画等等，只有设备出了问题才急急忙忙回去工作，不能及时发现隐患。我们都调侃，设备就是副业，面子工程才是政治任务……好多对自己设备有责任心的职工都无比焦急，上面却不闻不问。

其在生产上的举措就是不顾设备情况盲目提产量，多处设备已经出现了重大问题，本来之前效益不好的时候好多设备都是带病运行，因为备件资金紧缺，我作为检修人员深有体会，盲目提高产量非出大问题不可，就在维权当天就出现了高炉烧穿等重大事故就是检修太少，而他们却拿资金购置豪车。

组织加班并非组织生产而是大搞形象，说白了，打扫卫生，刷浆，刷漆等等，连我们车间都到处涂刷上总经理家乡景色……真的搞生产未必有那么多职工参与维权，国企职工虽然懒惰但并非不明事理。而管理者先后购置多辆豪车，在企业困难时管理者先买豪车，逼职工无意义加班。老职工的车进出场都要检查以防偷盗，对方的车出入门岗却可以免检。

随着事情一步步发展，管理层逐渐暴露出的问题工人们看到对方完全就是想逼人辞职，而且贪图享乐，大搞面子工程，撤下十九大标语，展现出其对党委的无比蔑视。在生产方面没有拿出更好的节奏，反而为了邀功，不顾设备健康状况盲目提升产量，造成多起生产事故（万幸没有安全事故）。

2019年3月下旬，在多重矛盾下，以某件霸道管理的事情为导火索，该厂爆发了大规模的职工维权活动，上万职工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利用周末去总部维权，新总经理处置不当一名职工被打，群众情绪被点燃，但仍保持克制，没有发生打砸抢烧等事件。群情激愤下该总经理吓得跳墙逃跑。

当地政府处置失当，上报为暴乱。省内迅速调集省会特警加上周边警力大约四五千人，第二天就到达现场，并迅速封锁道路，屏蔽信号。由于职工群众保持了克制，没有发生更严重的事件。周日在继续游行维权一天后，上面派出巡视组进入该厂，开始收集职工诉求，并带走了部分人进行谈话。

周一上班后游行逐渐平息，但事件并未结束。上面派下了更多巡视组挨家挨户来收集职工诉求，并承诺驻厂半年解决职工问题，职工提出了34条问题要求解决或解答，目前部分历史遗留问题正在被解决或者已经有了说法。

最后总经理被调走更换。公司党委，工会在此事后被问责，并换血，换血后新党委的作用明显得到了增强，开始在各个场合发声，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吉祥物。

在斗争成功结束后，职工谈及管理层换血时说道：

目前新来的总经理收敛了很多，主抓生产，安全，环保，成本等等，对于厂区绿化刷漆等留给了外委单位。工人可以安心保生产保设备了。党委主要对职工所反映的问题进行一一解答和解决，同时不断的发声引导舆论和统一思想，教育职工。各司其职，我认为这才算走向正轨，如果之后私企老板没有反攻倒算，那其实这样也算可以的。其实现在也是很忙，但我们觉得是在忙正事儿，而且，也没人敢说加班白加没有说法了。

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官僚集团中的改革派幻想通过复制他们上世纪九十年代对工人阶级的进攻，通过进一步私有化来收获“改革红利”以

应对中国资本主义的积累危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工人阶级仍然集中在国营企业部门中。只要打垮了国营企业工人，资产阶级就能取得全面的优势，就能长期确立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体制。

但今时不同往日，中国工人阶级（尤其是国企职工）在同资产阶级、官僚集团的长期斗争中，已经大大增长了自己的斗争本领与阶级意识，不再如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样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了，中国的阶级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今天，中国的工人阶级主要是集中在出口制造业以及其它私人资本主义部门中。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改革派下决心对于剩余的国有企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全面地、迅速地完成私有化，即使达到了重创剩余的国有企业工人、迫使他们接受低工资低福利的目的，也并不能改变整个阶级斗争形势对于工人阶级越来越有利的基本趋势。

况且，由于剩余的国有企业集中在铁路、电信、电力、石油、金融等战略性部门，一旦国有企业工人起来斗争，对于资产阶级的"附带损害"也是巨大的。从九十年代以来原国营企业工人的反私有化斗争中，现在的国有企业工人或多或少吸取了经验教训。一旦私有化严重损害了国有企业工人的利益，国有企业工人在反击中同样可以严重威胁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由于这种顾虑，目前正在推行私有化的改革派官僚未尝没有"投鼠忌器"的顾虑。

中国的资本积累在客观上减少着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加速着城市化、提高着中国工人的阶级觉悟和组织能力。只要中国的资本积累不停止，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就不会停止，阶级力量对比客观上就会发生对工人阶级有利的变化。

### 3. 垄断=帝国主义?

在列宁看来，现代帝国主义（也就是资本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产物。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指出过，**"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

垄断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积聚和集中的产物，但积聚和集中本身并不等同于垄断。如果没有这种差别，就无法区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也无法区别马克思《资本论》时代的资本主义与列宁《帝国主义论》时代的资本主义。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对此有所说明：**"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因为几十个大型企业彼此之间容易达成协议；……企业的规模巨大造成了竞争的困难，产生了垄断的趋势。"**可见，在列宁看来，集中本身并不等同于垄断，而只是造成了垄断的条件。

那么，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算做帝国主义国家呢?

学院派在这个问题上常常引用列宁的著名语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但是，列宁是在什么样的情形和语境下做出这一论断的呢？在《帝国主义论》第七章的前几段，列宁是这样讲的:

**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样的定义能包括最主要之点……过于简短的定义虽然方便（因为它概括了主要之点），但是要从中分别推导出应当下定义的现象的那些最重要的特点，这样的定义毕竟是不够的。因此，如果不忘记所有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一切方面的联系，就应当给帝国主义下这样一个定义，其中要包括帝国主义的如下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一定义，虽然“能包括主要之点”，毕竟仅仅是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仅仅是为了“简短”和“方便”才可以这样讲。但是，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从中分别推导出应当下定义的现象的那些最重要的特点”，那么，列宁明确讲，“这样的定义毕竟是不够的”。

列宁还特别指出：**“所有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一切方面的联系”**。在我们看来，列宁的这一教导，对于批判当今中国左派中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者，是特别有意义的。

只是在做了上述说明以后，列宁才列举了一般人们所熟知的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但是，许多不细心的读者可能没有注意到，即使是这五个基本特征，在列宁看来，也仍然是不够完整、不够全面，尤其是不能够适应帝国主义时代阶级斗争需要的。因为，紧接着，列宁又进一步指出:

**下面我们还会看到，如果不仅注意到基本的、纯粹经济的概念（上述定义就只限于这些概念），而且注意到现阶段的资本主义同一般资本主义相比所占的历**

**史地位，或者注意到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两个主要派别的关系，那就可以而且应当给帝国主义另外下一个定义。**

所以，在列宁看来，为了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特别是为了说明“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两个主要派别的关系”，还必须给帝国主义再下一个定义，否则就仅仅是注意到了“基本的、纯粹经济的概念”。那么，列宁认为应当给帝国主义下的另外一个定义，是什么呢?

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列宁用相当的篇幅来批判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并没有明确地再提出帝国主义定义的问题。然后，在《帝国主义论》第八章的开始部分，列宁指出:

**现在我们还要来研究一下帝国主义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大多数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对这个方面往往认识不足。……我们说的就是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

在这一章的中间部分，列宁特别指出，正是这一“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与国际工人运动中两个主要派别（即革命马克思主义派别和修正主义派别）的存在有着直接的联系:**“食利国是寄生腐朽的资本主义的国家，这不能不影响到这种国家的一切社会政治条件，尤其是影响到工人运动的两个主要派别。”**

这种帝国主义“寄生性”的物质基础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从广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剥削来的“垄断高额利润”，从而使得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阶级可以用这些“垄断高额利润”来收买“工人贵族”:**“帝国主义意味着瓜分世界而不只是剥削中国一个国家，意味着极少数最富的国家享有垄断高额利润，所以，它们在经济上就有可能去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从而培植、形成和巩固机会主义。”**

可见，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必然意味着**“瓜分世界”**，就是将整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变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必然意味着**“极少数最富的国家享有高额垄断利润”**、**“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培植、形成和巩固机会主义”**。

在后来列宁亲自撰写的《帝国主义论》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的第五部分，列宁又特别强调了第八章的重要意义，并且着重指出:**“这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象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而这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历史阶段即帝国主义所特有的。”**

接下来，列宁再次强调了，帝国主义国家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剥削来的“大量的超额利润”可以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物质基础。列宁是如此重视这一问题，以至于他特别指出:**“如果不懂得这个现象的经济根**

**源，如果不充分认识这个现象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那么，在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实践任务方面，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

现在，我们应当更加重视列宁同志的上述教导。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够正确地认识和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不能够正确地认识和分析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的、具体的矛盾，正如列宁所说的，我们将会“一步也不能前进”。

在列宁逝世前一年所撰写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列宁事实上已经明确指出，未来世界革命的主要希望不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而在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的东方：

**现在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不过，这些国家完成这一发展过程，不会像我们从前所期待的那样。它们完成这一发展过程，不会是经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平衡“成熟”，而将是经过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进行剥削，经过对帝国主义战争中第一个战败国进行剥削，再加上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

在列宁看来，“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也包括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将“不会像我们从前所期待的那样”通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自身里的“成熟”来实现，而是通过“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就是说，只有世界广大东方的人民起来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剥削，那样，东方的革命才能为西方的革命展开道路。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

列宁接下来说：**“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 正是在世界东方被压迫人民占了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一意义上，“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才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今天的世界历史条件下，公开的殖民地已经很少了。我们判断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应该主要根据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的一般的、主要的特征，即其垄断性和寄生性，以及由垄断性和寄生性所决定的通过对世界资本主义

体系中的外围、半外围国家剥削所形成的“高额垄断利润”。在这几个帝国主义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考察某个帝国主义国家（或者疑似帝国主义国家）是否通过对外政治和军事干涉而控制其他国家的内政，从而剥削和压迫若干个附庸国，是否发动或参与过多起对外侵略战争等。

以非洲的埃及为例，在纳赛尔统治时期，实行所谓“阿拉伯社会主义”，“全面推行国有化政策，实行计划经济……到1963年，从国有部门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国家经济各部门中所占比例看，工业和电力部门达60%，交通部门达75%...国家已经控制82家私有公司将近一半的资产。”

与此同时，印度国内的75家垄断集团就已控制了总产的46.94%，净资产的44.1%，其国内资本集中程度更是高得离谱，我们这里以1964年以最高法院法官K.C.达斯古普塔为首的垄断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为例：

70家印度最大的垄断财团（其中包括16家外资控制的垄断财团）在工业垄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70家垄断财团共垄断588种产品，占调查的产品总数（1298种）的45.1%。...把其中总资产超过5000万卢比的75个集团列为印度最大的垄断财团。这75家财团总共控制了1536家公司，其全部资产为260.595亿卢比，全部实收资本约为64.632亿卢比。它们在印度25661家全部私营公司总产（555.15亿卢比）中占46.94%，在实收资本总额（146.54亿卢比）中占4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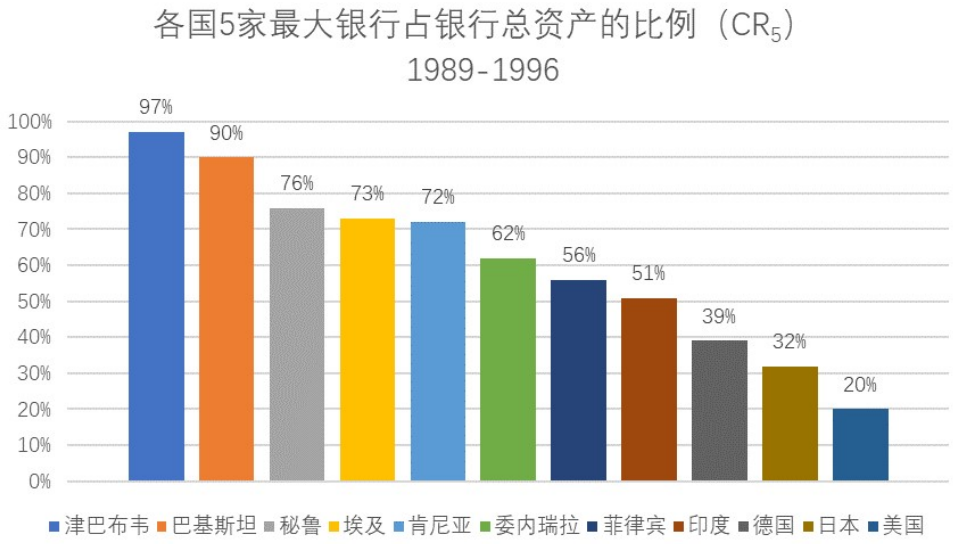
仅仅就集中来说，正如马克思、列宁都曾经论述的，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学院派们所列举的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工业部门的高度集中，更是适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外围、半外围国家的一般情况。

如果我们不是像列宁同志那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忘记所有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不经常考虑到“充分发展的现象一切方面的联系”，而是教条的照搬几条“基本特征”，那么就不仅会如学院派所愿，轻松论证中国是“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国家”，而且还会不可避免地得出纳赛尔领导下的埃及、尼赫鲁领导下的印度都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本国垄断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因而都是“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国家”那样荒谬的结论。就比如下面这位名叫“赤眉”的学院派理论家：

按照马列毛主义的观点，一个国家只要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只要本国垄断资本进行了重大的资本输出、对世界市场进行了争夺，这个国家就是帝国主义国家，就是压迫民族而不是被压迫民族。

在金融行业的集中上，根据《银行业结构的国际比较与实证分析》[50]中的表2.1所列举四十多个资本主义国家1989-1996年银行业资本集中的情况。按照各个国家5家最大银行占银行全部资产比例来计算集中度（CR5），津巴布韦为97%，巴基斯坦为90%，秘鲁为76%，埃及为73%，肯尼亚为72%，委内瑞拉为62%，菲律宾为56%，印度为51%。

相比之下，德国的5家最大银行不过占有该国银行总资产的39%，日本的5家最大银行不过占有该国银行总资产的32%，美国的5家最大银行甚至仅占有该国银行总资产的20%。




如果不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而是片面且教条的根据行业集中度来认为津巴布韦、巴基斯坦、秘鲁、埃及、肯尼亚、委内瑞拉、菲律宾等国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或者认为德国、日本、美国反而不是帝国主义国家，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不就成了一个多数人压迫少数人的体系而不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体系了吗?

当然了，在学院派眼中这些“被压迫民族”可不是应当团结的反帝力量，而是“黑社会小头目帝国主义”:

> 弱小帝国主义国家对强大帝国主义国家的依附，并不是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而是帝国主义之间又勾结又争夺的关系。他们之间是黑社会小头目和黑社会老大的关系——他们根本上都是黑社会——而不是普通群众和黑社会的关系。

归根结底，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今天的中国到底是属于世界的“东方”还是属于世界的“西方”？如果我们认为，今天的中国是属于世界的“西方”或者将要属于世界的“西方”（这是“中帝论”不可避免的推论），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不仅中国的工人运动必然要走上改良主义的道路，而且“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也将是没有保证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为，今天的中国归根结底是属于世界的“东方”，是属于世界上被剥削被压迫的那一部分，那么，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的论断仍将是完全正确的。

## 三、寄生性：中国的资本输出

由于垄断资本在本国投资已经无法获得足够利润，帝国主义国家的过剩资本**“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依靠对外资本输出而获得超额利润，由此资产阶级逐渐脱离生产，变成依靠“剪息票”为生的寄生阶层。

**于是，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参与任何企业经营、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确切些说，食利者阶层，就大大地增长起来。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资本输出，更加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整个国家打上了寄生性的烙印。**

因此，我们就需要分析一个国家在海外的帝国主义性质的资产同外国在该国帝国主义性质的资产。

**正如本书所证明的，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1/10，即使按最“慷慨”和最夸大的计算，也不到1/5)，它们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根据战前的价格和战前资产阶级的统计，资本输出的收入每年有80–100亿法郎。现在当然更多得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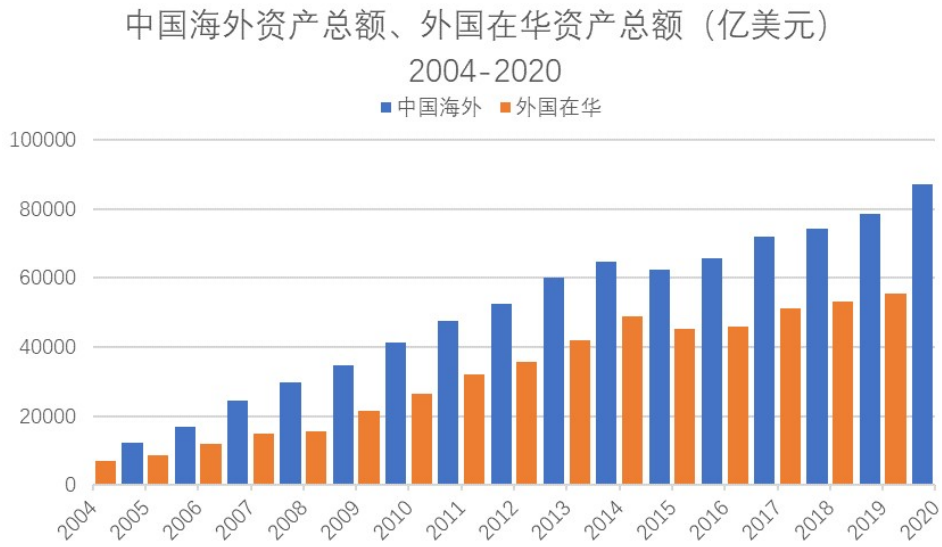
同时，也需要满足该国的海外资产要获得足够多的超额利润，这表现在资本收益率的高涨之上。

我们在本章首先分析中国所拥有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海外资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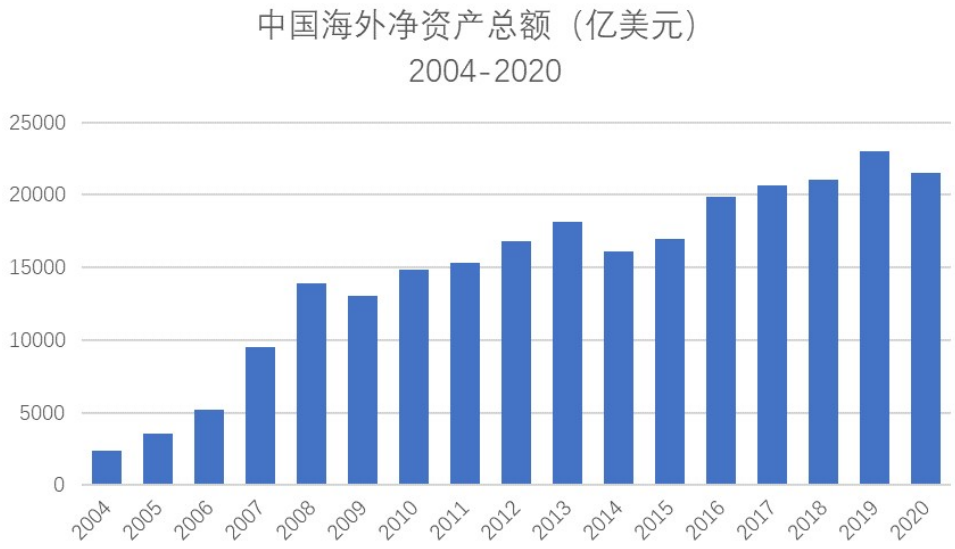
## 1.中国的海外资产

根据《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的数据，2020年中国海外资产总额为87039亿美元，同年外国在华的资产总额为65536亿美元。也就是说，2020年中国拥有国际净资产21503亿美元。

这是2004年到2020年的中国海外资总额、外国在华资产总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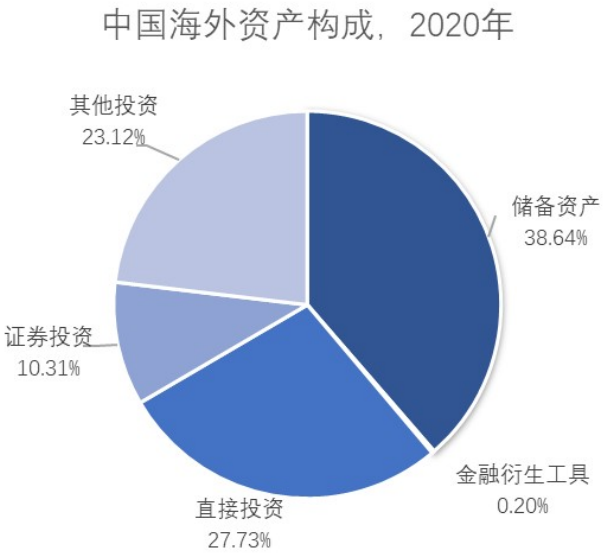

这是2004年到2020年的中国海外净资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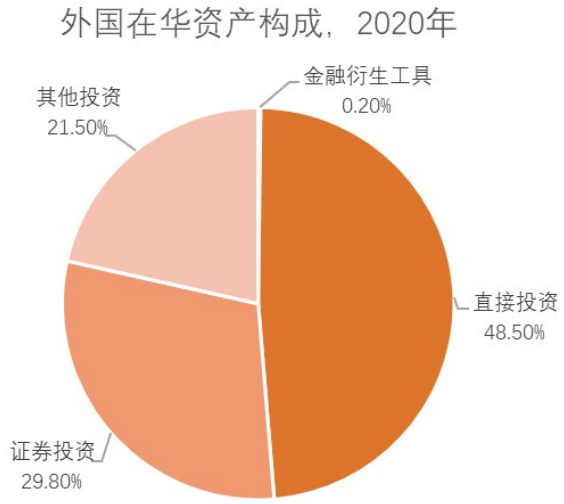

“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这两张图似乎证明了中国确实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之一，如此庞大的海外资产，是由什么构成的?

根据《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的数据，2020年中国海外资产总额为87038.73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为24134.11亿美元、证券投资为8998.516亿美元、外汇储备33565.29亿美元、其他投资为20149.41亿美元、金融衍生工具为191.41亿美元；同年外国在华资产总额为65536.22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为31792.92亿美元、证券投资为19545.12亿美元、其他投资为14075.77亿美元、金融衍生工具为122.41亿美元。

这是2020年中国海外资产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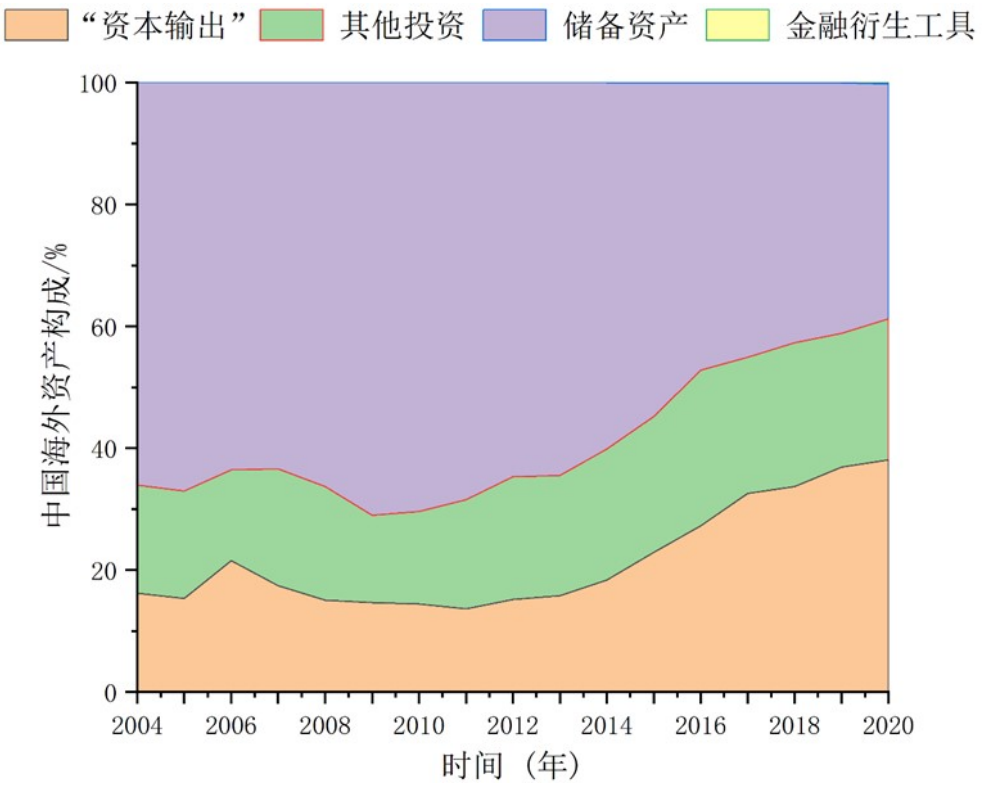



这是2020年外国在华资产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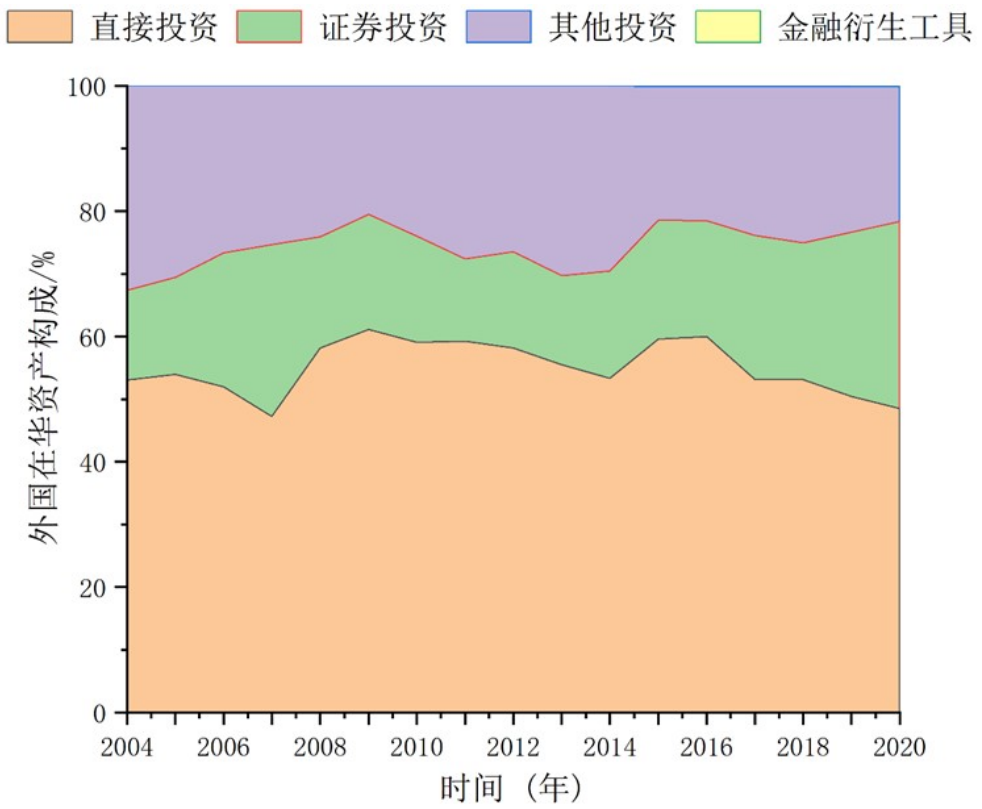



在中国海外资产中，只有海外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资本输出”，有可能（但不是必然）带来超额利润。因此，我们将中国海外资产中的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合起来视作“资本输出”。

这是2004年至2020年间中国海外资产构成。




这是2004年至2020年外国在华资产构成。




根据这两张资产构成图我们可以知道，在2004年至2020年间，中国庞大的海外资产中只有21.76%为“资本输出”，19.74%为其他投资，58.50%为外汇储备。反

观外国在华资产构成，在2004年至2020年间，外国在华资产中有55.03%为直接投资，19.39%为证券投资，25.54%为其他投资。

中国的海外资产中的绝大部分并非列宁所说的可以规避本国工人运动、获取超额利润的资本输出，而是很大一部分持有的是美元资产的巨量外汇储备。

被大多数学院派左翼奉为圭臬的印共（毛），他们在《中国：现代社会帝国主义》[61]中将中国海外资产中的巨量外汇储备称为：体现“中国作为资本输出国快速崛起”的两个层面之一：

> 中国作为资本输出国的快速崛起，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工业资本，另一个是金融资本。通过工业生产以极其迅速的方式进行原始积累，中国帝国主义积累了大量的金融资本。这体现在中国外汇储备异常快速的增长上。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000年的1650亿美元增长到2012 年 3 月的 3.35 万亿美元，相当于次于中国的其他六国外汇储备的总和。

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大部分是美元资产，这些外汇储备大量以美国国债等低回报率资产的形式存在，这部分资产的形成是用凝聚了中国工人大量劳动的商品来交换未必能兑现的对美国未来一部分商品生产的货币索取权，实际上带有一定的向美帝国主义缴租纳贡的性质，这导致中国海外资产中的大部分不能成为获利丰厚的帝国主义投资，反而成为了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为其国内经济政策乃至对外帝国主义政策提供低成本融资的大礼包。

然而印共（毛）将这些为核心国家输出了大量中国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外汇储备视作“资本投资”，真是非常荒唐。

为了对外汇资源拥有这项特别提款权，中国的外汇储备被以债券的形式充当金融资本，通过债券获取的剩余价值，其部分份额也被归为股东所有。事实上，中国的总资产中有3.3万亿美元是外汇储备，其中大部分以外国政府债券的形式作为资本投资。

同时，我们注意到中国海外资产中的“资本输出”在2014年后是上升的，这似乎印证了学院派的观点。那么，中国海外资产中为数不多具有“资本输出”性质的直接投资会是什么样呢?

## 2.直接投资：输出or外逃？

为了获得超额利润，为了满足帝国主义对利润的无限贪欲，极少数垄断资本家“奢侈无限，穷兵极武”，为了剥削殖民地人民、掠夺殖民地人民的矿产资源，百年间发动了一场场对第三世界人民的侵略战争。

列宁同志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说道：

**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

列宁同志举了1910年前后国外投资在世界各洲分布的例子[65]用于说明这一判断标准：

| | 英国 | 法国 | 德国 | 共计 |
|---|---|---|---|---|
| 欧洲 | 4 | 23 | 18 | 45 |
| 美洲 | 37 | 4 | 10 | 51 |
| 亚洲、非洲、澳 | 29 | 8 | 7 | 44 |
| 总计 | 70 | 35 | 35 | 140 |

在列宁同志的例子中，国外投资在各大洲的分布中核心地区占比（欧洲）为32.14%，落后地区占比为67.86%，说明帝国主义的最主要输出方向是落后国家地区。

因此，我们认为：通常情况下被输入到落后地区的投资是带有帝国主义性质的资本输出，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剥削落后地区的劳动人民以获得超额利润，我们需要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输出到落后地区的资本占比计算出来，对其进行分析，以此分析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帝国主义性质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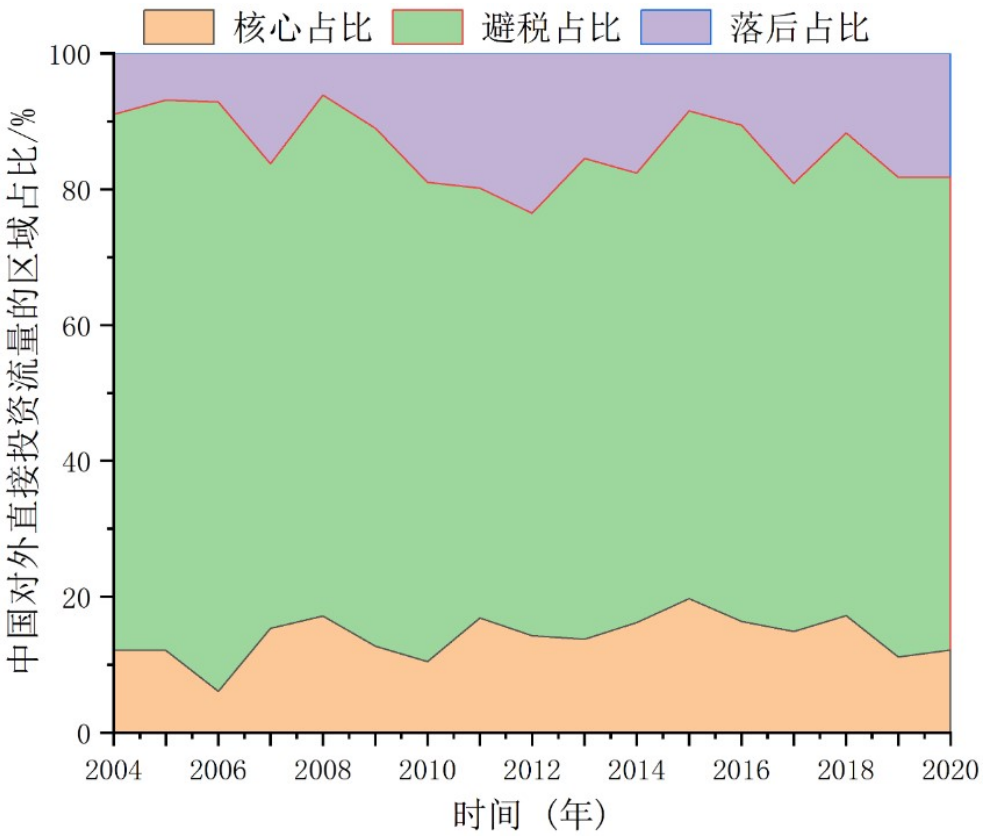
我们认为：欧洲、美国、加拿大、大洋洲、新加坡、日本、韩国为核心地区。中国港澳台地区、马来西亚、开曼群岛、英属维京群岛、百慕大群岛为避税地区。除核心地区、避税地区外的为落后地区。

所以，我们可以计算出核心地区、避税地区、落后地区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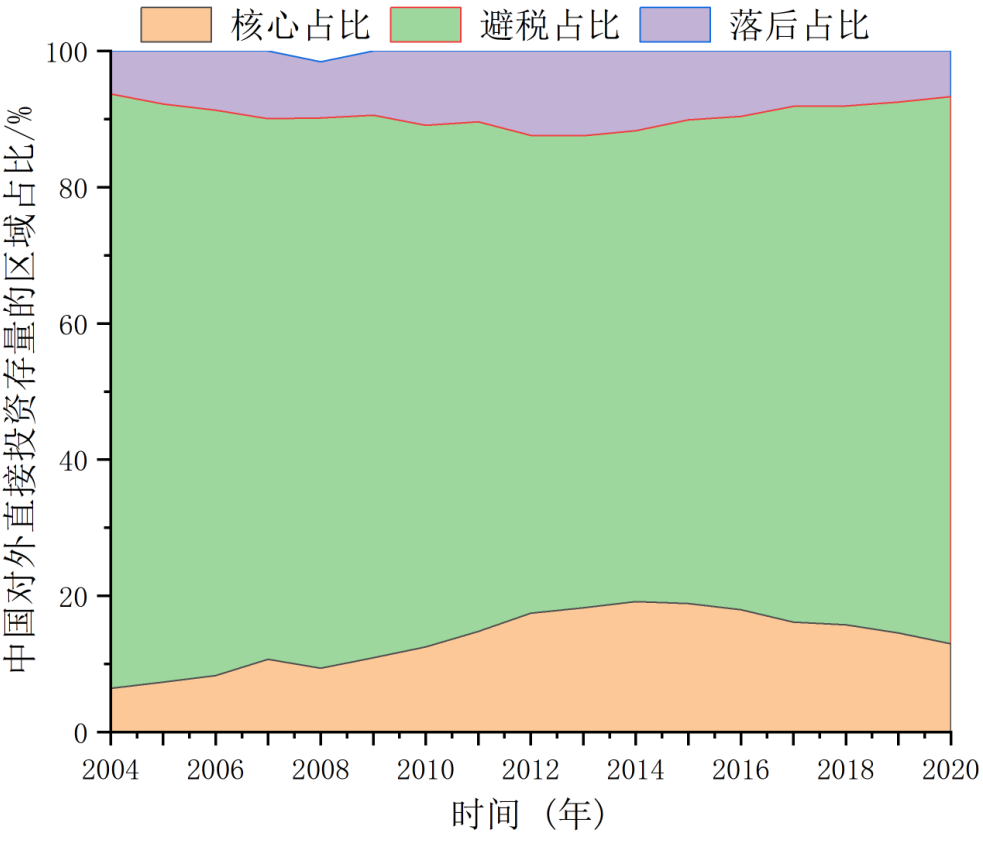
根据《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537.1亿美元，其中核心地区为186.7556亿美元、避税地区为1069.9938亿美元、落后地区为280.3532亿美元；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25806.5844亿美元，其中核心地区为3340.4451亿美元、避税地区为20730.9494亿美元、落后地区

为1735.1899亿美元。可以看出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不论是流量，还是存量，最主要输出方向为核心地区与避税地区，而非落后地区。

这是2004年至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按地区分）。




这是2004年至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按地区分）。



2004年至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有14.05%流向核心地区，有71.92%流向避税地区，有14.03%流向落后地区；存量中有13.62%流向核心地区，有76.95%流向避税地区，有9.329%流向落后地区。

列宁同志说过：

**垄断制，寡头制，代替了自由趋向的统治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这一切便产生了帝国主义的一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趋势之一，即形成为“食利国”、高利贷国的趋势愈来愈明显了，这种国家的资产阶级愈来愈依靠输出资本和“剪息票”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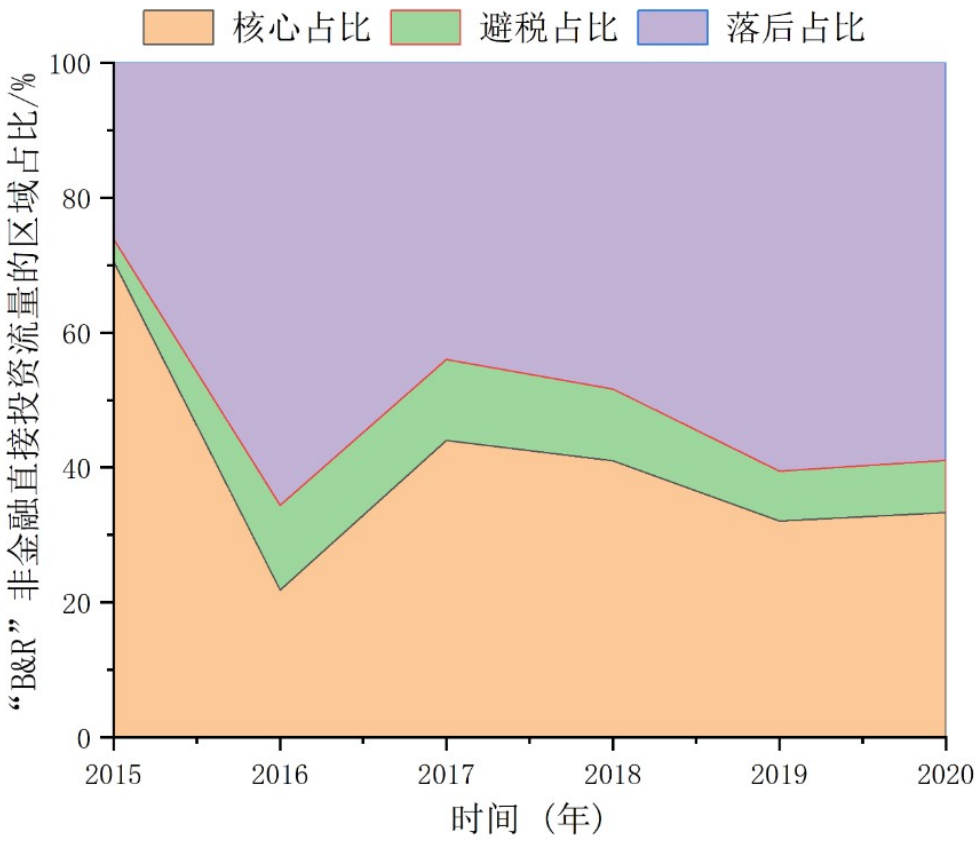
与学院派左翼鼓吹的完全相反，中国绝大部分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地实际上是“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核心地区）与避税地区，二者之和超过了80%，而对“弱小国家”（落后地区）的直接投资却不超过20%，这明显不符合列宁同志对帝国主义的定义。

学院派在谈及中国的资本输出时，常常举出“一带一路”的例子，甚至夸张的将其称为“中帝”取代美帝霸权的恢弘战略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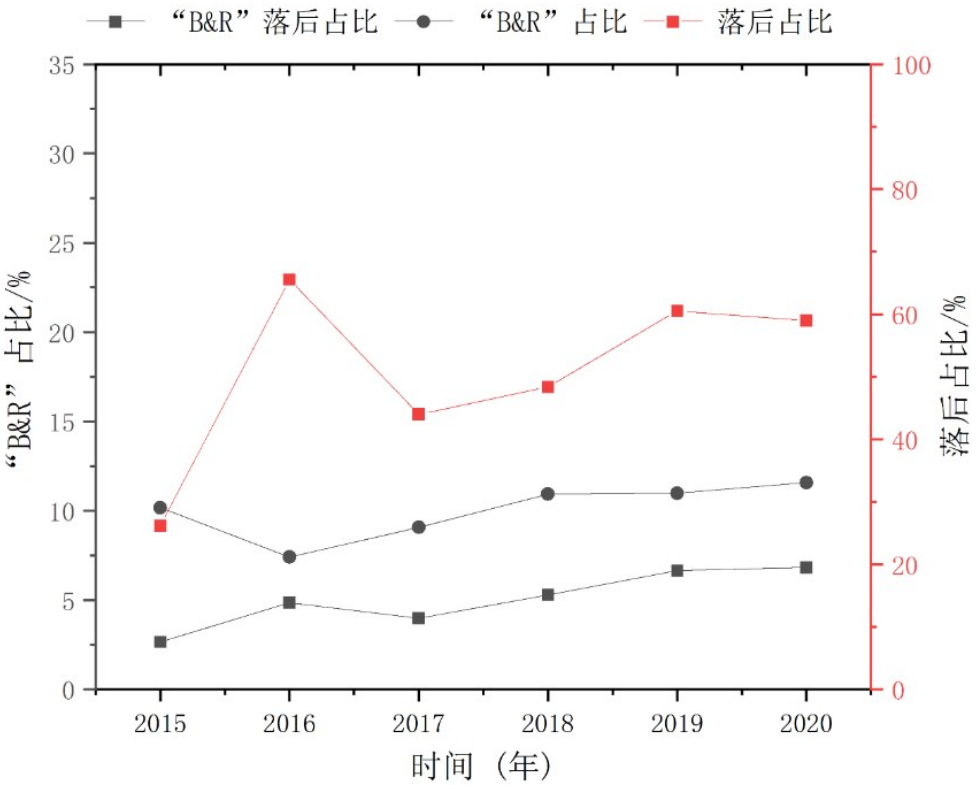
究其本质，一带一路项目是中国与俄罗斯及其伙伴国合作的战略计划，以取代美帝国主义在海陆运输线、国际市场和信贷准入的霸权。

2020年末中国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为2007.9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7.8%，存量位列前10的国家是：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俄罗斯联邦、马来西亚、老挝、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泰国、越南、柬埔寨、巴基斯坦。

截止至2020年末，“一带一路”沿线共有63个国家（地区），其中以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等亚洲为主，我们将新加坡认定为核心地区，将马来西亚认定为避税地区，剩下的即为落后地区，这样我们就可以尽可能的将真正的落后地区囊括在内。下图为2015年至202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投资的区域占比。




下图为2015年至2020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的占比（“B&R”占比）、对“一带一路”沿线落后地区的非金融直接投资流量占比（落后占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对“一带一路”沿线的落后地区的占比（“B&R”落后占比）。



根据计算，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一带一路”所占比例为11.57%，“一带一路”中落后地区占比为58.98%，因此“一带一路”中落后地区占比在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的占比为6.83%。

在2015年至2020年间，“一带一路”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中的占比从未超过12%，而在剔除资本外逃、逃避税收等非资本输出性质的投资后（这部分大约占40%~60%），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落后地区的投资在流量总额的占比不超过7%，并且在五年间“一带一路”的非金融类投资流量未出现学院派说的那般夸张的增长。

除了投资规模外，我们还需要分析资本输出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投资环境。要进行资本积累，维持对殖民地的资本输出，从而获得长期的超额利润，就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资本积累环境，尤其是现在中国并没有直接将军事基地驻扎到落后地区的情况下，中国对落后地区的资本输出也受到当地政治、经济、军事环境的制约。

那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资本积累环境是否有利于中国的投资呢？“一带一路”沿线63个国家中最主要的投资输入地区为东盟国家，受限于篇幅，所以我们就以东盟为例展开分析。

根据《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2021年版）》，中国资本在东盟国家的投资存在以下阻碍：

【政治环境】长期以来东南亚政局尚不稳定，2021年2月，缅甸政局变动，军方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为期一年。反军方势力有向暴恐方向发展趋势，局部不时有爆炸事件。近年来泰国政局斗争不断，政府高层变动频繁，政策连续性不强，执政集团施政受限。政策变动导致审批程序复杂且漫长，前期投入费用增高。

【法律法规】东盟各国法律体系比较完整，但也有一些法律规定模糊，可操作性不高，且不同的法律之间存在矛盾。比如，马来西亚法律体系受英国影响很深（马来西亚曾为英国殖民地），成文法与判例法在商业活动中都能起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资本的投资。

【投资程序】在东盟投资合作的起步阶段，投资者往往会在公司注册和申办各类执照遇到各类困难。这些执照的申请程序复杂，文件繁多，审批时间较长，

需要交涉的事务头绪纷繁。近年来，在柬埔寨中资企业遭遇投资、土地纠纷等呈上升趋势，建材、通信、经济特许地开发等领域均有企业遭受经济损失。

【行业限制】部分国家对外商投资某些特定行业有限制。比如，建筑业在泰国不属于政府鼓励投资的行业，因此在泰国承揽工程项目，尤其是对于外国公司来说，有不利因素。相对于东盟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和老挝等国而言，泰国承包工程市场规模较为有限，且属于高门槛进入的保护市场。

【汇率及汇兑风险】缅甸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较弱，缺乏成熟的调控机制，汇率和利率形成机制缺乏灵活性，对严重影响外商的投资收益有一定的不利影响。

【融资困难】缅甸、柬埔寨、老挝等国金融体制和服务相对落后，外商在缅甸当地银行融资相对困难。

【劳动力供应】东盟部分成员国发展水平不高，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低，高技术人才比较欠缺。这为中资企业投资合作项目本地化经营带来困难。

【商业欺诈】部分国家存在以虚假项目信息骗取中资企业赴该国考察、开展隐性投资的现象，一旦双方企业合作期间出现问题，将面临资产无法保全的风险。

【舆论环境】随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扩大，部分国家负面舆情随之增多。比如，缅甸开发程度提高，舆论环境日趋复杂，居民及劳工不理性诉求增多，对于涉及土地征用的投资项目，须充分做好调研准备工作，客观评估投资风险。

【安全隐患】在东盟部分国家，部族和政府之间存在矛盾，政府项目在某些地区受到当地部族的阻碍。比如，缅甸中央政府和部分少数民族组织之间长期以来关系微妙。中国投资者应尽可能避免擅自在少数民族控制区进行投资合作，此类合作一旦有意外事件发生，两国政府将难以及时有效介入。

【自然灾害】东盟地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每年5月至11月是雨季，容易发生山洪、泥石流等 自然灾害。

【新冠疫情】东盟成员国病例数字不断攀升，截至2021年6月23日，东盟地区已累计报告458 万例确诊和89028例死亡，分别占全球的2.6%和2.3%。随着印度Delta变异病毒向东南亚蔓延，马来 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等多国宣布重启或延长封锁，疫情对东盟地区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将继续持续。

【其他传染性疾病】缅甸肝炎病毒携带者较多，北部、南部和西部山区有蚊虫携带疟原虫。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编写的历年《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72]，《对外投资发展报告》认为“经济贸易的顺利发展，需要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包容开放的经济体制”。而中资企业在亚洲的投资存在的风险主要是：“亚洲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内生的结构性矛盾以及部分国家的政治社会环境动荡”。

对于阻碍中资在亚洲各国进行资本输出的不利条件，《对外投资发展报告》总结为：“中期因素主要源于亚洲各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效果递减。长期因素主要源于劳动生产率增长乏力。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意味着盈利率的长期预期不被看好，由此对投资需求产生抑制作用。”

总的来说，东南亚不利于进行长期稳定资本积累的因素有两个，长期动荡混乱的政治局面导致无法形成、保障相对稳定的资本积累环境，不具备可供剥削的规模庞大且拥有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能力的熟练劳动力队伍，这大大限制了中国从东南亚地区剥削获得大量超额利润的能力。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的落后国家（地区）进行的资本输出是客观存在的，但这一部分资本输出占比很小，对于中国整体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不足以为中国带来大量的超额利润。

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尽管中国对这些落后地区的资本输出所获的超额利润是很少的，我们也应坚决的反对诸如RECP等试图剥削第三世界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的行为，否定中帝论，不代表支持资本输出，不代表支持对第三世界劳动人民的剥削，这是我们必须要坚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 3. 避税天堂

如果按大洲来说，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中，有1.14万亿美元在亚洲，430亿美元在非洲，1110亿美元在欧洲，3870亿美元在拉丁美洲，870亿美元在北美洲，420亿美元在大洋洲。

所以，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大头是在亚洲和拉丁美洲。但是，中国在亚洲的投资中有1.04万亿美元集中在香港、澳门和新加坡几个华人集中的城市或城市国家。中国资本家在这些地方的投资显然不是为了掠夺那里的廉价劳动力或者自然资源。中国在这几个城市的投资，有的是国内公司设立的分公司，有的是国内大官僚、资本家购买的房地产，有的是为了取得外资优惠身份由国内资本家操作的“假投资”。

那么，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是不是就是为了掠夺那里的自然资源呢？在中国在拉丁美洲的3870亿美元投资中，竟有3720亿美元是投在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这两个众所周知的“避税天堂”，其中有不少是中国大官僚设立的各种“空壳公司”。中国在这些地方的投资，与其说是帝国主义性质的，倒更像是一般第三世界国家腐败政府的洗钱手段。其他诸如在北美洲、欧洲、大洋洲、日本的投资也是大同小异。

我们从《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2018》提供的发达国家十大外来直接投资来源国或地区（根据2016年投资存量排名）就可以看到，发达国家的主要外来直接投资都来自于发达国家本身，并且其存量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的外来直接投资存量。再看美、日这两个最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具体情况：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统计，2017年美国对欧盟、加拿大、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主要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66.5%；据《日本统计年鉴2019》数据，2015-2017年日本对欧洲、北美（美国和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流量分别占当年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67.3%、73.7%、68.5%。可见，美国、日本这两个最发达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对象也是以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为主，而对亚非拉等不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只占少部分（除了对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美、日对“境外金融和避税中心”的资本输出也占一定比例。比如美国2017年对香港、英属维尔京和开曼群岛、新加坡的直接投资存量占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11.4%）。

因此，我们发现帝国主义国家也有向避税地区投资以寻求更低的税率、更高的利润的需求，中国在这方面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外投资上具有相似的流向特征。那么，我们能够以此断定中国是帝国主义吗？

我们以香港为例。

来自离岸金融中心的直接投资资金最终来源地除了欧美日韩等发达经济体外，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中国本土的“返程投资”。

2017年中国大陆在香港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达9812.66亿美元，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54.2%；当年对香港投资流量为911.56亿美元，占比57.6%。但同时要看到，香港也是中国大陆外来投资的主要来源地：2017年，中国大陆吸收香港

直接投资945.10亿美元，占当年吸收外来直接投资的72.1%。这一进一出的数字，实际上表明：香港是中国资本的一个中转站。输出到香港的资本有相当比例又作为“外资”返回了中国大陆。这是中国资本为寻求“外资”政策优惠，为享受香港低税和自由港及国际金融中心的便利而搞的资本游戏。

同时，在考察世界资本输出情况时我们可以发现，在许多地区香港本身也是重要的外资来源，而这其中也肯定有相当比例是中国大陆资本的化身（中国大陆资本已是香港资本的最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境外金融、避税中心中转来实现对外投资，是中国资本的一种重要操作。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地方有着优惠的政策和比较自由的资本流动条件，另一方面是由于减轻税负、享受优惠的考虑，还能够在离岸金融中心设立特殊目的公司(SPE)，享受便于海外上市这一额外的红利。

除了香港，中国对其他“境外金融、避税中心”的资本输出情况也都类似——这些国家和地区成为了中国资本的中转站。一部分中国的资本输出又摇身一变为“外资”重新回到中国(比如2017年中国对外投资流量排名第二的英属维尔京群岛也是当年中国外来投资的第三大来源地），另一部分中国资本则通过中转来实现对其他国家的资本输出。所以在考察中国资本输出和吸收外资的现状时，必须考虑到“境外金融和避税中心”（特别是香港地区）作为中国资本中转站的情况。这绝不是单纯的“资本外逃”和“洗钱”，而是中国资产阶级为了更加便利和优惠地剥削中国无产阶级而搞的把戏。而学院派正是完全忽视了“境外金融和避税中心”作为装外资、骗政策的化妆间、镀金池作用，没有看到中国资本正是通过中转的手段来实现对内投资。

这恰恰说明中国资产阶级的荣华富贵是建立在对中国亿万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之上的，所谓的“大国崛起”、“取代美帝”不过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学院派左翼的幻想罢了。

## 四、中国在世界体系的地位

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两种定义中，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符合世界资本主义长期发展实际并且在今天仍然对世界阶级斗争有着重大指导意义的，是列宁给帝国主义下的第二种定义或“另外一个定义”，即帝国主义意味着“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剥削全世界，榨取超额利润或垄断高额利润。

在20世纪初，帝国主义完成了极少数国家对世界的瓜分，其中每个国家现在都剥削着（指榨取超额利润）“全世界”的一部分……每一个国家都由于托拉斯、卡特尔、金融资本以及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关系等等而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垄断地位；每个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拥有殖民地垄断权。

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认为，**“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剥削全世界所凭借的主要手段。比如，据《英国历史统计》，1913年时，英国的“海外财产净收入”达到两亿英镑，相当于当时英国国民收入的9%、英国国内资本家总利润的60%。

在大战前夜，3个主要国家的国外投资已经达到1750-2000亿法郎。按5%的低利率计算，这笔款额的收入一年可达80-100亿法郎。这就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这就是极少数最富国家的资本主义寄生性的坚实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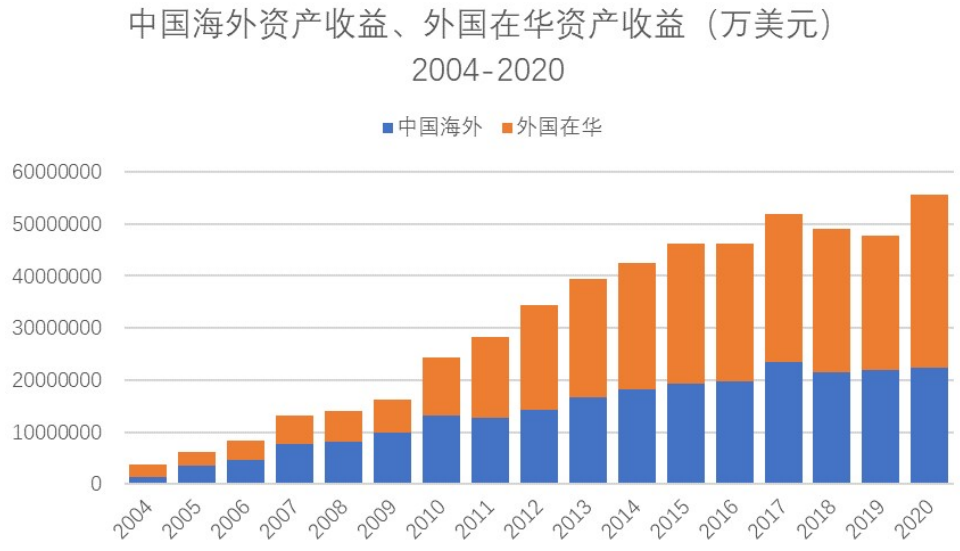
那么，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有没有通过资本输出来“掠夺全世界”并攫取“超额利润”呢？

### 1. 超额利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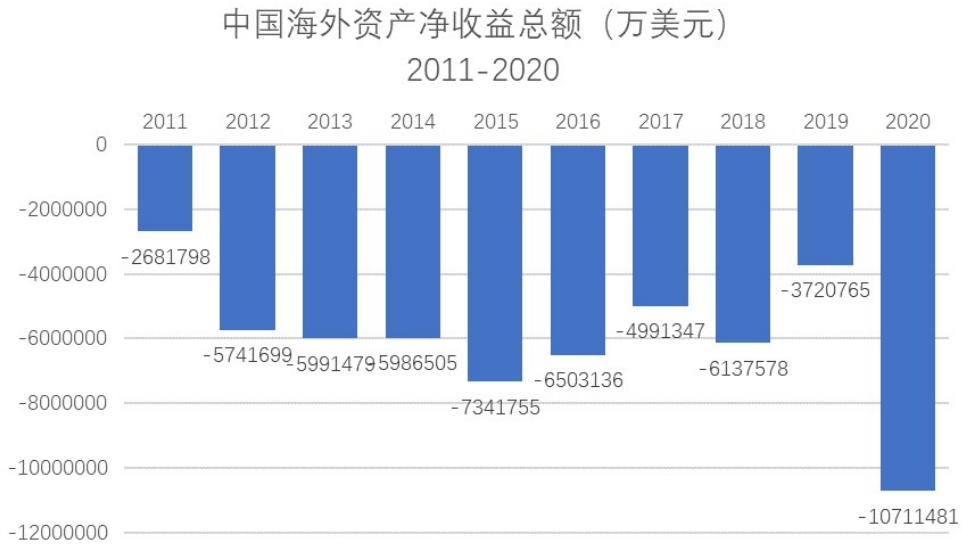
超额利润要怎么知道呢？那我们就得先算算中国在海外的投资能得到多少利润，如果说投资收益非常多，利润率很可观，那我们就能够说中国是获得了超额利润，这样就满足了帝国主义五大定义之一，反之则不符合列宁同志的定义。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78]中的数据，2020年中国海外资产的投资收益为22439297万美元，同年外国在华的投资收益为33150778万美元，2020年中国在海外的投资收益是小于外资在华的。

这是2004年到2020年的中国海外资产收益、外国在华资产收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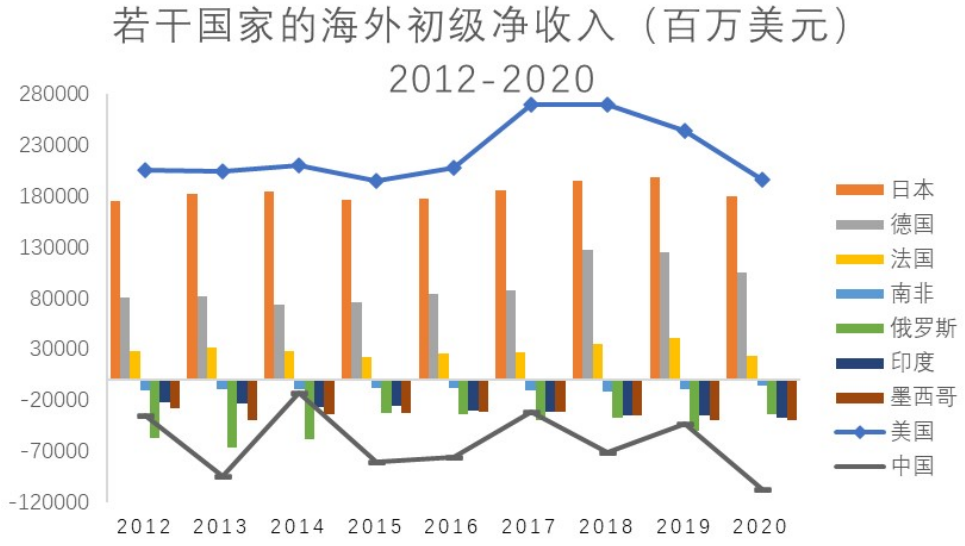
这是2011年到2020年的中国海外资产净收益。




在2011年至2020年间，中国海外资产的投资收益长期以来低于外国在华资产的投资收益，净收益长期为负数，十年间中国海外资产的净收益为-5980.75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平均每年要向外国资产阶级上贡将近600亿美元的超额利润。

列宁同志提出，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输出特别重要，并且认为帝国主义必然意味着“掠夺全世界”和攫取“超额利润”。相比之下，中国虽然表面上的海外资产十分庞大，但不仅没有攫取“超额利润”，在近十年内反而向外国输出了5980.75亿美元的投资收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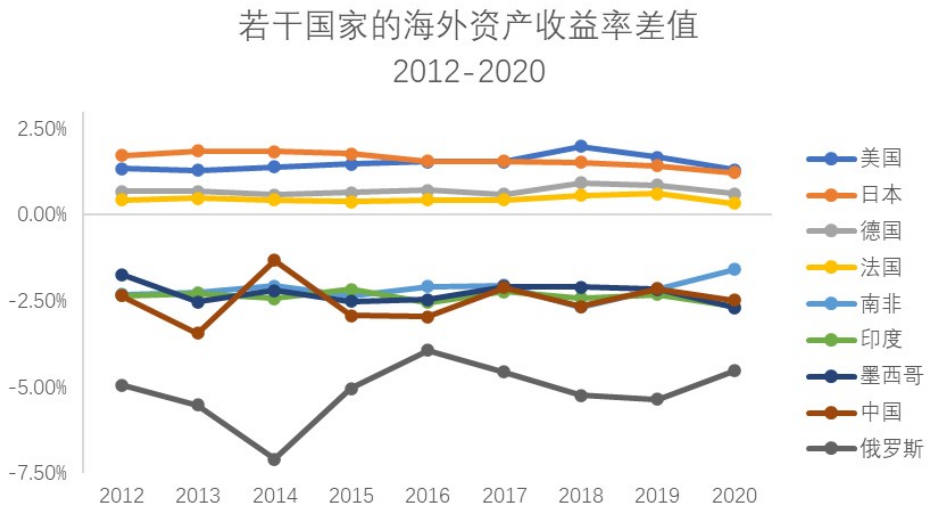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中的各国《国际收支平衡表》（BOP），我们将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南非、俄罗斯、印度、墨西哥、中国这九个国家在2012年至2020年期间的海外初级净收入[80]计算出来。下图为2021年至2020年若干国家海外初级净收入。



2012至2020年间，美帝国主义获得的超额利润高达20029.18亿美元，日本获得的超额利润为16547亿美元，德国获得的超额利润为8403.15亿美元，法国获得的超额利润为2621.8亿美元。相比之下，南非向外国资本支付的超额利润为-821.06亿美元，俄罗斯向外国资本支付的超额利润为-4088.28亿美元，印度向外国资本支付的超额利润为-2645.74亿美元，墨西哥向外国资本支付的超额利润为-3101.39亿美元。

而强大的“中华帝国主义”每年的海外初级净收入都是负值，近年来负值还有扩大的趋势，在2012至2020年内中国总共向外国资本支付了-24640.98亿美元的投资收益，这大致相当于1.2个美国、1.5个日本、2.9个德国、9.4个法国所获得的超额利润。

看完上述九个国家的超额利润得失情况后，我们接着看海外资产收益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中的各国《国际投资头寸表》（IIP）的数据,计算出本国海外资产收益率与外国在该国资产收益率的差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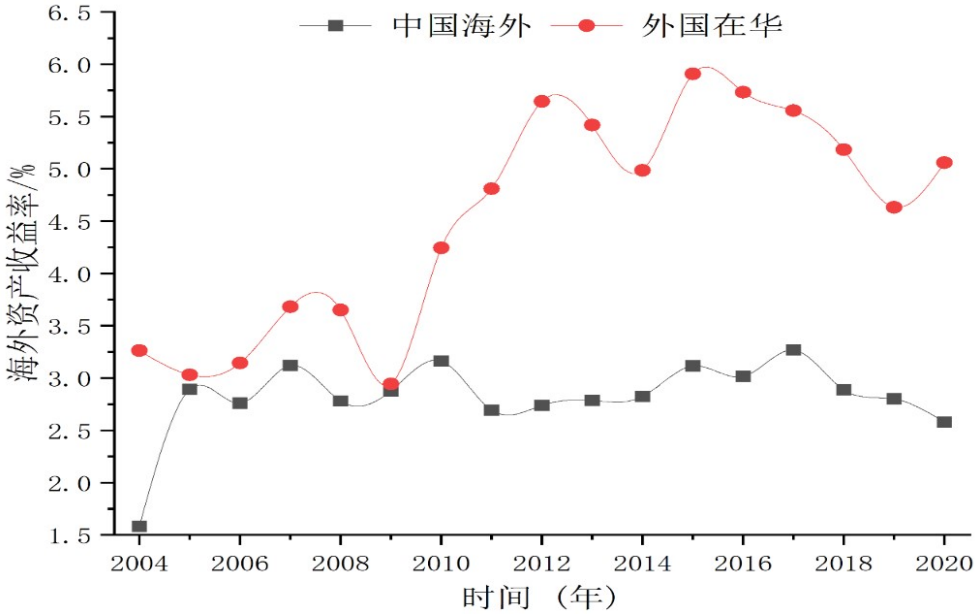



在横坐标轴上方，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在历史上以及现在都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横坐标轴下方，印度、南非、墨西哥分别是历史上的半殖民地或殖民地，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以后就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处于被屈辱、被剥削的地位。

因此，我们就可以给帝国主义国家订下性质上的量化门槛：该国的海外资产收益率要高于外国在该国资产收益率。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82]中的数据计算，2020年中国海外资产收益率为2.578%，同年外国在华资产收益率为5.058%，可以看出2020年中国的海外资产收益率是小于外国在华的。

我们将2004年到2020年的中国海外资产收益率、外国在华资产收益率都计算出来。




如图所示，在2010年到2020年间，中国海外资产的平均收益率在3%上下波动，而外国在华投资的平均收益率则在5-6%之间，几乎相当于中国海外投资收益率的两倍。

所以，从超额利润的角度来看，二十一世纪的帝国主义国家基本上仍然是二十世纪初期的经典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印度、俄罗斯联邦等国虽然近年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比较快，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仍然处于被剥削而不是剥削的地位，所以不属于列宁另外一个定义所规定的帝国主义国家。

而中国，更是在全世界233个国家与地区中向帝国主义国家上贡了最多超额利润的“中华帝国主义”。

### 2. 不平等交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资本输出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对于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意义实际上是有所下降的。比如2019年和2020年，虽然美国从“海外初级净收入”中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在绝对量上达到约4400.55亿美元，但仅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约2.1%、美国“净营业盈余”（大致相当于美国资本家阶级的国内总收入）的6%。德国近年来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大约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7%、日本的“超额利润”大约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6%。

相比之下，近年来的统计研究表明，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所攫取的超额剩余价值其相对规模要远远大于通过资本输出所获得的“超额利润”。所谓，不平等交换，指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外围、半外围国家在向核心国家

出口和进口商品的过程中，其出口商品所包含的劳动往往要大大超出其进口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通过这种方式，外围、半外围国家所生产的大量剩余价值实际上转移到了核心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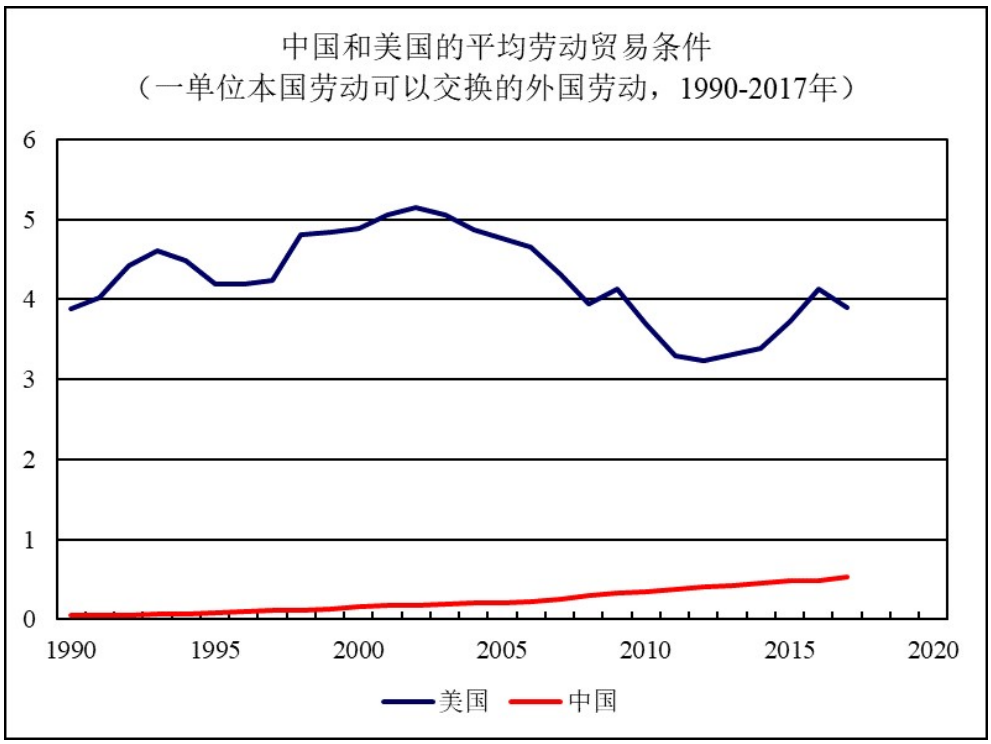
比如，2017年时，美国通过不平等交换所获取的超额剩余价值高达6400万人年、大约相当于美国劳动力队伍总数的40%。如果按照2017年美国生产性工人的平均工资粗估（按照每周工资740美元、每年工作50个星期计算），美国资本家阶级通过对外不平等交换所节约的劳动力成本高达2.4万亿美元，相当于2017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美国“净营业盈余”的50%。

那么，当今世界上哪些国家属于不平等交换的受益者，哪些国家属于不平等交换的受害者呢?

2017年，中国在对外贸易中由于不平等交换所损失的劳动人年数达到4700万劳动人年，东欧和中亚（大致可以反映俄罗斯联邦的情况）所损失的劳动人年数达到1200万劳动人年，南亚（大致可以反映印度的情况）所损失的劳动人年数达到6500万劳动人年。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外围国家用包含较多本国劳动的商品来交换核心国家同等市场价值但包含较少劳动的商品，从而使得外围国家所生产的很大一部分剩余价值（剩余劳动时间）转移到核心国家。这就是不平等交换。不平等交换除了在外围国家和核心国家之间发生以外，也在外围国家和半外围国家之间、半外围国家和核心国家之间发生。

下图比较了中国和美国的“劳动贸易条件”（一单位本国劳动平均可以交换的外国劳动单位）在1990年至2017年间的变化情况。




如图，美国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一单位美国劳动平均可以交换4-5单位的外国劳动。2008-2009年世界经济危机后，美国从不平等交换中获得的利益有所下降，但近年来又恢复到了一单位美国劳动交换大约4单位外国劳动的水平。

相比之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还是一个典型的外围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平均要用大约20个单位的中国劳动来交换一单位外国劳动。此后，中国的对外劳动贸易条件出现了大幅度的改善。现在，只要大约两单位的中国劳动就可以交换一单位的外国劳动。

如果分地区来说，在与美国和其他高收入国家的贸易中，中国仍然要用多个单位的本国劳动来交换一单位上述地区的外国劳动；在与南亚和非洲地区的贸易中，一单位中国劳动现在可以交换多个上述两个地区的外国劳动；在与其他东亚国家、中东、东欧、拉丁美洲的贸易中，一单位中国劳动大体可以交换一单位上述几个地区的外国劳动。平均来说，中国通过出口商品对外转移的本国劳动仍然大大超过中国通过进口商品获得的外国劳动，因而在整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仍然处于被剥削的地位。

下表说明了2017年世界各大地区出口和进口商品包含的劳动时间以及净转移或者净获得的情况

（单位：百万人年）：

| | 出口商品包含劳动 | 进口商品包含劳动 | 净劳动转移 | 净劳动获得 |
|---|---|---|---|---|
| 中国 | 91 | 44 | 47 | |

| | | | | |
|---|---|---|---|---|
| 东亚太平洋（不含中国 | 53 | 25 | 28 | |
| 东欧和中亚 | 36 | 24 | 12 | |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 38 | 26 | 12 | |
| 中东和北非 | 16 | 11 | 5 | |
| 南亚 | 88 | 23 | 65 | |
| 撒哈拉以南非洲 | 31 | 16 | 15 | |
| 高收入国家（不含美国 | 121 | 251 | | 130 |
| 美国 | 16 | 80 | | 64 |
| 统计误差 | | −10 | | −10 |
| 世界 | 490 | 490 | 184 | 184 |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除了美国和其他高收入国家以外的各个地区只包括这些地区的中低收入国家。

如上表所示，美国每年通过不平等交换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获得高达6000多万人年的劳动净转移。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劳动力队伍的40%。如果没有不平等交换，那么美国为了维持其现有的物质消费水平，就必须将6000多万劳动力从服务业转到物质生产部门，这意味着美国服务业部门的产值要减少一半。

相比之下，中国每年对外的劳动净转移有近5000万劳动人年，大约相当于中国工业劳动力总数的四分之一。如果不是因为不平等交换，这部分劳动力就可以节省下来，生产中国人民所需要的各种工业品，那么这意味着中国人民得到的工业品可以比原来增加三分之一。不过，近年来，南亚地区已经超过中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最大的对外劳动净转移的地区。

那么，中国有没有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个核心国家呢？成为一个核心国家，意味着用一单位本国劳动来交换多个单位的外国劳动。中国现在的出口商品包含了大约9000万人年的本国劳动。如果要像美国那样，用一单位本国劳动交换4单位外国劳动，那么中国进口的商品就必须包含3亿6000万人年的外国劳动；而全世界所有出口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量还不到5亿人年，根本不可能找到那样大的一个地区来向中国输入包含那么多劳动人年的出口商品。

即使是采用美国以外其他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劳动贸易条件，以一单位中国劳动来交换大约两单位外国劳动，中国要成为核心国家，中国进口商品所包含的外国劳动也必须增加到1亿8000万劳动人年，也就是说中国要从世界其他地区净获得大约9000万人年的转移劳动。现在，中国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每年净输出大约5000万劳动人年。成为核心国家以后，中国不但不再输出，还要每年攫取9000劳动人年。一进一出，世界剩余的外围地区必须在满足现有的核心国家对劳动净获得的要求之余，再向中国额外提供1亿4000万劳动人年（这大约相当于除中国以外所有中低收入国家现在对外的劳动净转移总量）。世界剩余的外围地区能够承受如此大量的额外剥削而不发生革命或崩溃吗？或者，核心国家就必须将它们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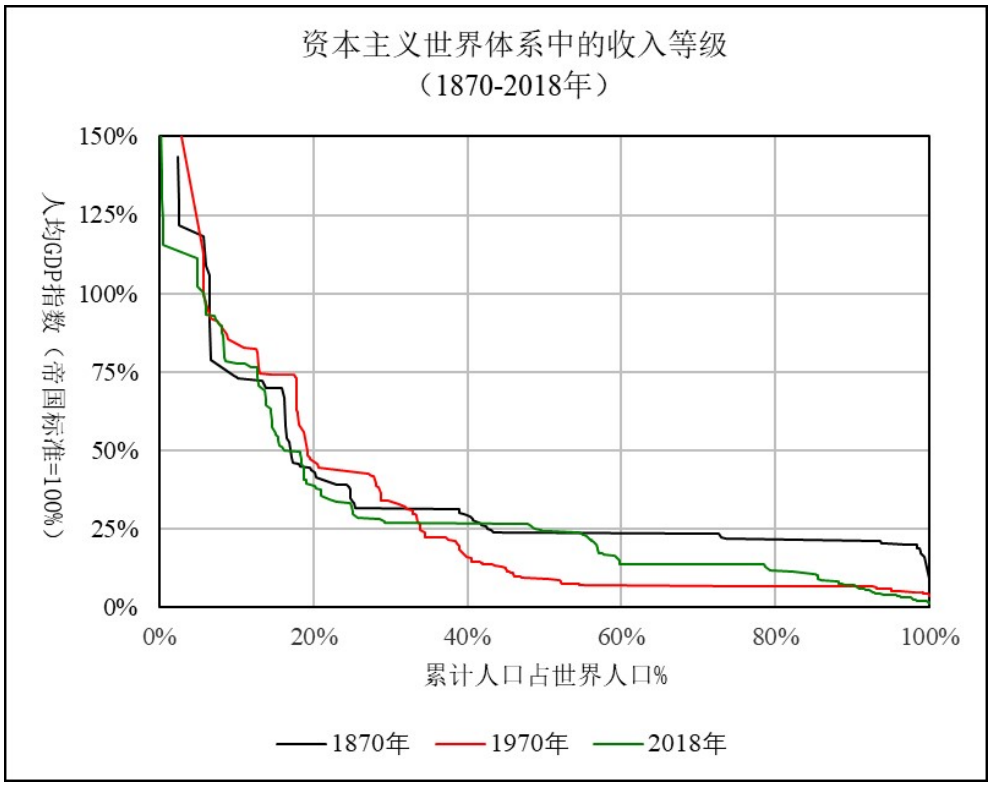
获得的劳动净转移总量（约1亿8000万劳动人年）的80%让渡给中国？那么现有的核心国家还能保持核心国家地位并维持内部稳定吗？

上述分析表明，由于中国的巨大人口规模，现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可能在容纳中国成为核心国家以后还保持自身稳定。除了世界其他地区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劳动净转移以满足中国上升为核心国家的需要以外，世界有限的资源和环境空间也决定了中国不可能上升为一个核心国家。中国已经是世界上许多能源、原材料商品的最大消费者，如果中国再进一步上升为核心国家，所需要的能源和其他资源将足以导致全球范围的环境崩溃。

### 3.半外围大国

对不平等交换的计算需要准备大量统计材料、过程复杂繁琐。不过，一个国家在国际不平等交换中受益或受损的情况，往往与该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按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所计算的等级地位高度相关。通过对以往资本主义国家的统计资料的研究，我们发现，如果对美、英、法、德四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按照人口加权的平均值，将由此计算出来的加权平均值称之为“帝国标准”，那么，传统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通常在“帝国标准”的75%以上。

下面的图，比较了1870年、1970年、2018年世界上有数据的所有国家按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序以后在世界总人口中分布的情况。



图中，纵轴显示的是各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以“帝国标准”为100%）；横轴显示的是，将各国按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高到低排序后，在一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以上的国家的所有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比。以2018年为例，在“帝国标准”100%以上的国家的总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6%，在“帝国标准”75%以上的国家的总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13%，在“帝国标准”50%以上的国家的总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16%，在“帝国标准”25%以上的国家的总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48%，以此类推。

如果我们以“帝国标准”的75%（上下再略作调整）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帝国主义国家阵营的下限，那么，1870年时，在“帝国标准”75%以上的国家的总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7%；不过，法国、奥地利、德国在这一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都只是略低于75%，意大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约为70%。如果把1870年帝国主义阵营的标准“放宽”到“帝国标准”的70%以上，那么这一年全部帝国主义国家的总人口约为世界总人口的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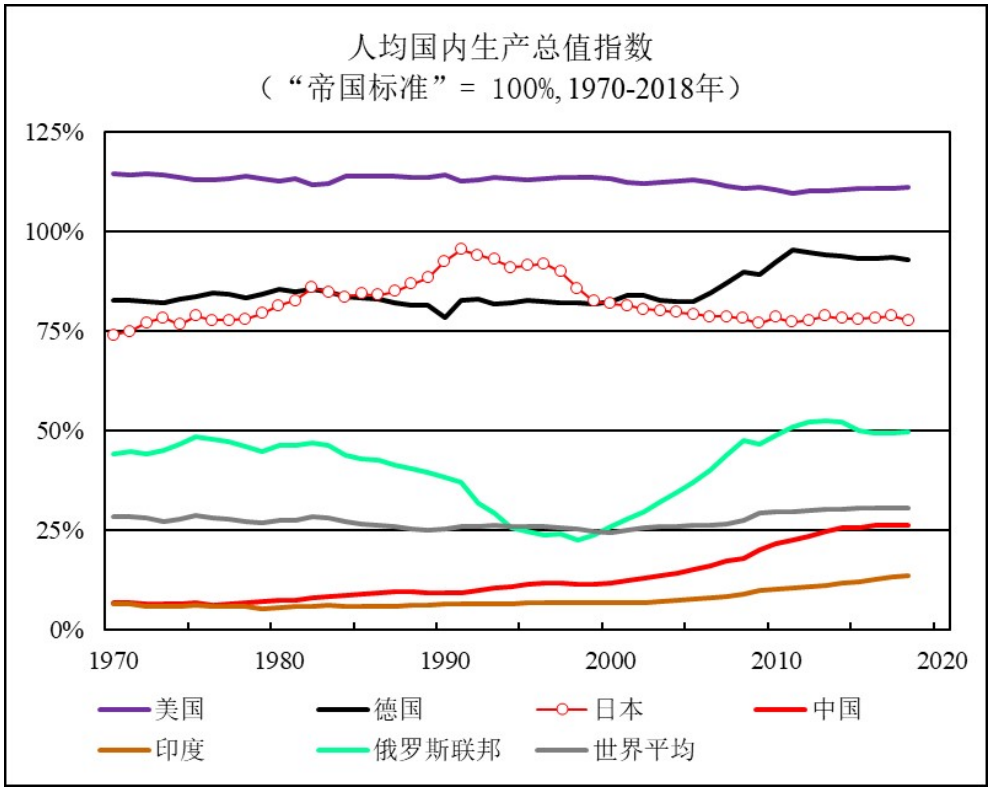
1970年，在“帝国标准”75%以上的国家的总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13%；不过，奥地利、意大利、日本在这一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只是略低于75%。如果把1970年帝国主义阵营的标准“放宽”到“帝国标准”的74%以上，那么这一年全部帝国主义国家的总人口约为世界总人口的17%。

2018年，在“帝国标准”75%以上的国家的总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13%。此外，在“帝国标准”70%以上但不到“帝国标准”75%的国家有：阿曼、新西兰和波多黎各。阿曼和波多黎各显然都不属于帝国主义国家。新西兰属于“富而不强”；即使将新西兰包括在帝国主义国家阵营中，对于帝国主义国家阵营总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综上所述，从统计资料上看，历史上帝国主义国家总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大致在七分之一至六分之一之间，这恰好符合列宁所估计的帝国主义阵营的人口规模 ——“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1/10，即使按最‘慷慨’和最夸大的计算，也不到1/5）”。

这里要说明的是，以“帝国标准”的75%（左右）以上作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标准只是一个粗略的统计标准。有些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帝国标准”75%以上的国家是中东地区的高收入石油出口国，还有一些是卢森堡、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或城市国家。这些国家都不能说是帝国主义国家。如果把这些“水分”挤掉，那么严格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总人口会更接近列宁所做出的大约占世界人口十分之一的估计。

下面的图比较了若干主要国家在1970年至2018年期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变化的情况，同时与世界平均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作比较。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世界平均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保持在略高于“帝国标准”25%的水平；就是说，美、英、法、德四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加权平均值，大约相当于世界平均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倍。

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国家，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直稳定在“帝国标准”的1.1倍左右。日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91年达到“帝国标准”的95%以后，就一直处于相对衰落的状态；近年来，日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勉强维持在“帝国标准”的75%以上。在苏联解体以前，德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致保持在“帝国标准”的80%以上。近年来，通过所谓“欧洲经济一体化”并加强对南欧、东欧国家的剥削，德帝国主义的相对地位有所加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维持在“帝国标准”的90%以上。

在社会主义苏联的鼎盛时期，俄罗斯联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帝国标准”的50%。资本主义复辟后，俄罗斯联邦经济崩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度下跌到世界平均水平以下。在普京统治时期，俄罗斯联邦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有所恢复，在新冠疫情危机之前，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处于“帝国标准”的50%，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半外围的上层。

在新冠疫情危机之前，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帝国标准”的25%，勉强超过了半外围的下限，但是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大约相当于俄罗

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至于印度，虽然其资本主义经济在近年来发展较快，但在新冠疫情危机之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达到“帝国标准”的14%，大约相当于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仍然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外围。

俄罗斯联邦、中国、印度都不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

## 五、学院派左翼的失败主义

### 1. 不许劳动人民革命的学院派

分析了“中华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后，两条清晰的阶级斗争道路摆在我们面前。

一条道路是从唯心史观出发，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必然是由于资产阶级强大和无产阶级弱小，所以经济危机必然是无产阶级工资被压制导致的“消费不足”。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就只能依靠被逼到墙角的“绝地反击”。为了克服在“消费不足”剧本里实际无法克服的组织性和战斗力的困难，就不得不将组织固定下来，结成工会；为了保护组织的存在，就必须进一步动员组织性和战斗力，争取工会的合法地位。然而，这条道路却在政权问题面前徘徊彷徨起来，既不愿从地方胜利做起，又不知道如何直接取得全国政权。最终，只能表达一下对“左转派”和民族主义的义愤。

如果学院派真的要谈到全国政权问题的话，他的论点可能也超不出再进一步动员组织性和战斗力。至于革命形势如何与革命前景联系起来，似乎是个不能讨论的问题。这就造成了此种道路的三个不可逾越的断层，每遇到一个断层，学院派就拿出动员组织性和战斗力来试图跳跃，结果就是从“闹一闹”一路跳到了自己也没有说明白的（甚至于恐怕自己也不相信的）“工人阶级崛起”。

在唯心史观看来，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归根结底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能动性可以创造可能，能动性可以保持组织，能动性可以从无比强大的“中华帝国”一跃进入合法工会乃至全国胜利的天堂。这条道路的基调是，敌人强大强大太强大，我们动员动员再动员。至于弱小的我们如何打败强大的敌人，他们是不考虑的。他们把历史上一切的失败都归纳为动员不足、组织不力，思想上没有克服资产阶级影响等等。

学院派反复的口头强调要克服个人英雄主义。但是，只要革命力量的增强不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结果，而只是无产阶级动员的成就，那么，依靠个人魅力动员工农的“领袖人物”就不得不扮演无产阶级的“救世主”；无产阶级的胜利

就只能被理解为领袖动员有方的结果，个人英雄主义和小“张国焘”们也会一天天地再生产出来。

正是因为学院派对主观能动性作用的高估，一部分左翼人士才会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过分重视，而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又无非是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所想象的种种所谓“阶级正义”。所以，才会有人说“利润挤压”是把经济危机的责任推向了无产阶级；所以，才会有人觉得策略性地支持资产阶级中特定的改良集团是投降；所以，才会有人比资产阶级还害怕“天下大乱”。

这种唯心主义的道德观，使得他们不得不放弃对经济危机的正确理解，不得不放弃暴露和激化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斗争策略；不得不放弃认识并自觉掌握造成“大乱”的客观历史规律。闭目塞听，自缚手脚，自认清高。按照这样一条唯心主义的道路，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的进步积极分子，都是不可能找到前途的。

另一条道路是从唯物史观出发。在唯物史观看来，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弱小、资产阶级的强大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也必然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弱的可以变强，小的可以变大，原来弱小的可以打败原来强大的。

这种转化的条件来自于半外围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的具体和特殊的矛盾。半外围条件下的中国资本主义，一方面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一个日益发展壮大、组织力不断增强、觉悟不断提高的中国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又缺乏足够的剩余价值来缓解社会矛盾和谋求内部的妥协；后者又决定了资产阶级国家的“腐败化、诸侯化和非正式化”，从而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外强中干的本质。

中国资本主义无法阻止无产阶级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因为正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积累造成了无产阶级发展壮大的条件；另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无法阻止自己的统治机关日益腐败化、诸侯化、非正式化，因为它无力也无心摆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半外围条件下的种种困境。这两种趋势发展下去，两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必然要发生根本的变化，原来弱小的就可以变为强大，原来貌似强大的其腐朽虚弱的本质将暴露无遗，各中间阶级的立场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条件变化的过程超越一定的点以后，量变就会转化为质变，历史的可能性就会转化为历史的必然性。

唯物主义者从不否认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但与唯心主义者不同的是，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主观能动性的历史作用不是“创造可能”，而是“实现必然”。中国革命的到来不是一片漆黑乌云压境之时的祥瑞天降，而是历史浪潮滚滚向前中的百川入海。

## 2. 眼里没有无产阶级的学院派

学院派不懂得或者不相信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那么就只有把希望寄托于“尖锐的外部矛盾”了。在学院派看来，“中帝”必然要“挑战美帝的霸主地位，力争取美帝而代之，或至少从其领导的统治体系中分割出一大块，从而建立中帝稳固的势力范围，获得充足稳定的超额利润来源，以缓和内部矛盾，保证垄断资本的统治和继续发展。”为此，“老牌帝国主义列强一定会竭尽所能地运用自己的军事和经济优势来遏制中帝（这就是贸易战的背景）。要打破这种遏制，改变力量对比，不经过一场全面的、毁灭性的战争，或者长期、残酷的冷战，是不可能的。”

这里且不论从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中国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以及中国资产阶级上层的胆识来说，中国资本主义有没有可能真地向美帝国主义争霸并且发展到与美帝“殊死”斗争的地步。就从纯军事观点来说吧，中国资产阶级虽然腐朽，但是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秩序一向是“很负责”的，不掌握绝对的军事优势（特别是海空军的优势），恐怕是不敢贸然发动一场“全面的、毁灭性的战争”的。学院派自己也说，“中帝的军事实力尚与美帝有较大差距，经济实力与老牌帝国主义列强整体相比也仍处于劣势。”即使是美帝维持其现有的军事实力不变（显然是不可能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军事实力要赶上美帝现在的水平恐怕也要几十年的时间（且不论在高技术武器方面的差距不是光凭扔钱就可以弥补的），要想再确立对美帝的绝对优势，还要再加上几十年。如此说来，要等待学院派所谓的“全面的、毁灭性的战争”，没有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恐怕是等不到的。

那么美帝国主义会不会主动针对中国发动一场“全面的、毁灭性的战争”呢？这里且不说美国人民必然要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美国资产阶级也是讲现实的。以美国近年的战争经验来说，美国在本世纪初，动用了其全部陆军一半以上的兵力、花了上万亿美元，出动了所有最先进的常规武器，居然消灭不了伊拉克、阿富汗两个贫弱国家中的游击武装，乃至建立不起稳定的亲美政权。有了这样的经验，美国资产阶级还会贸然对某个大国发动“全面的、毁灭性的战争”吗？反过来说，如果美国资产阶级真的有把握对中国发动“全面的、毁灭性的战争”，这难道不会同时“全面”“毁灭”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吗？

与以往的“中帝论”相比，这次学院派有了一定的“进步”，或者说变通，那就是不再坚持中美争霸必然导致帝国主义大战，而是多留了一手，“热战”行不通了，就转进为“长期、残酷的冷战”。据说，“冷战”也是中帝和美帝“殊死”斗争的一种方式。什么样的“冷战”可以算“长期、残酷的冷战”呢？过去美帝和苏联之间的“冷战”，可以算“长期”，但是能算“残酷”吗？苏联在“冷战”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

顺利地发展了它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苏联垮台，是官僚特权集团窃取了领导权以后苏联社会主义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外因只是次要因素。

美国现在对中国进行的所谓“贸易战”可以算“残酷”吗？有意思的是，学院派口口声声反对民族主义，但是对于“贸易战”的看法与民族主义分子如出一辙，都认为是因为中国“强大”了、美帝国主义要蓄意围堵中国的结果。

所谓“贸易战”，涉及的不过几千亿美元商品，其关税额不过几百亿美元，相对于中国约15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不过百分之零点几；再加上对中兴、华为等个别资本家的敲打。这样一点点威胁，不要说与美帝对毛主席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长期进行的贸易和技术威胁不可同日而语，就是与1989年后美帝实行的“制裁”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这算得上“残酷”吗？算得上“殊死”吗？对于这样一点点威胁，就如临大敌，不过是充分说明了作为半外围地位的中国资产阶级的买办性和依附性。

不要说社会主义中国，哪怕现在的中国还有一定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调节能力，面对美国对中兴、华为的威胁，完全可以以此为契机，独立自主地发展半导体产业方面的核心技术，就此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而何必去许诺买上万亿美元的美国货，外加“每天”五百万吨大豆，乃至于欢迎联邦调查局派员到中国公司现场监督对于美国“制裁”的执行，来讨美帝国主义的欢心？现在吓得连“中国制造2025”都不敢说，这哪里有一点与美帝国主义“殊死”争霸的样子。

不过，与反对“中帝论”的同志相比，学院派对于中帝在经过“殊死”斗争以后成为世界霸主的前景，似乎还是很有信心的（我看比中国资产阶级都有信心），以至于在那里很认真地探讨“中帝能为全世界人民提供一个超越现有帝国主义统治体系的更好的世界吗？”

按照学院派的“革命”幻想，所谓中国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无非是中帝“如果夺取了世界霸权，就必然更加加重对全世界人民的剥削压迫，造成更深重的灾难、更严重的危机。”“即便夺得了世界霸权，也绝不可能‘千秋万代’，反而会大大加速全球资本主义的崩溃。”

且不说学院派所许诺的这些空话有没有任何实际的内容。如果咱们把学院派心目中的“革命”时间表推算一下，要等待中帝和美帝进行一场“全面的、毁灭性的战争”，这恐怕要等上一百年。然后，如果美帝获胜，全球资本主义还不一定崩溃，因为剥削压迫全世界人民的人口还不够多，全世界人民的灾难还不够“深重”。只有中帝获胜了，才能带来“更深重的灾难”，“加速全球资本主义的崩溃”。这个过程，恐怕又要等上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

### 3. 中帝论错误思潮的物质基础

从严格的列宁定义出发，中国不具备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所需的垄断水平、资本输出水平和军事殖民的意愿和能力；同时，国有控股企业集团远不是中国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龙头；中国资本没有能力通过瓜分世界攫取垄断利润；金融寡头的形成和与工业资本的融合在当今时代也不是衡量帝国主义国家的标准。从全局看，中国不符合列宁帝国主义五大特征的四个，而最后一个帝国主义特征已经成为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征，中国不是一个列宁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国家。

关于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的问题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它取决于对当今世界主要矛盾，即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强弱对比及其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那么，现今时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简单地说，这个时代是一个资产阶级进攻到了顶点并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无产阶级经历了新自由主义打击并开始站稳脚跟反攻的时代；这个时代不是各个帝国无限强大可以指哪打哪不必付出任何成本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忧不断、人民群众逐渐觉醒、世界霸权退缩的时代；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当今时代是无产阶级从被动挨打转入战略相持并开始局部反击的时代。

“大棋党”推崇“中华帝国主义”，是因为他们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工业化中得到相对稳定待遇的小资产阶级。他们中的多数，要么是学生、要么是在国有控股或私营制造业部门就业的技术管理人员、要么是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这些部门近些年来由于出口带动的快速发展和薪金的上升构成了这些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情结的物质基础。但只要中国资产阶级无法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这需要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上升），无法满足他们的民族主义胃口（这需要对周围国家大打出手），他们对“中华帝国”的忠诚很快会烟消云散。

左翼中相信“中帝论”者的情况就复杂一些。一部分同志真诚地希望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他们同时又读到了列宁同志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一个阶段的论述。因此在情感上，认为只要承认中国是帝国主义，那么中国资产阶级的灭亡也当在不远。这些同志的出发点是好的，只要他们认清中国资本主义的灭亡并不需要、也必然不会经历帝国主义这个阶段时，他们就会回到唯物主义的正确路线上来。

另一部分同志尚未从民族主义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他们往往抱着这样想法，即“就算革命不能胜利，中华帝国主义只要胜利也是不错的结局”。他们看不到中国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看不到中国资本主义必然

在不久的将来无法满足他们“小确幸”的生活。但他们在推销“中帝论”上表现并不积极，在政治上的危害并不明显。

最后一部分同志并不相信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在国内阶级斗争问题上，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是无所不能的、为了达到自己目的不惜成本的、纪律严明手段高效的钢铁政权。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有枪能打死人、有钱能收买人、还掌握着仿佛可以消解一切革命斗志的消费主义文化，而劳动人民则在日复一日的劳动中反复被异化、被统治、被愚弄。这些失败主义的表现有很多，一些人钻进了后现代的话语迷雾中，试图通过构建革命的“合法性”来回避革命胜利的必然性；一些人则鼓吹中国法西斯粉墨登场，资产阶级统治铁腕将碾碎一切进步力量；一些人则只能做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易水悲歌之态，去为他们也不认为能胜利的事业牺牲成仁（万幸这些同志并不能吸引专政机关的火力，因而还没有机会真正牺牲）。他们不知道无产阶级如何由弱变强，不知道批判的武器怎样变成武器的批判，不知道革命的理论怎么变成实实在在的民心、武器、财政和政权，不知道革命理想如何成为革命道路。对于他们来讲，胜利只是个遥远的梦幻，因此“运动是目的，结果则无关紧要”，因此革命是飞蛾扑火，不是愚公移山。在他们看来，革命是热血、是艺术、是激情的迸发，但现实世界的革命却是计算、是战术、是物质的对抗。古人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指的就是这种没有前途的“革命”观。

在国际斗争问题上，他们相信资产阶级可以随意“人为地制造一场新的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相信资产阶级可以通过打世界大战来消灭生产力，保障资本主义长治久安。他们不认为资产阶级的行动是有成本的，他们不认为资产阶级错误的决策在人民群众普遍觉醒的今天会加速自己的灭亡。他们相信帝国就是扩张，美国会扩张，中国也会扩张，不扩张就会死，却不懂得帝国扩张的极限。他们是中国左派队伍里的凯南、布热津斯基、米尔斯海默，只知进，不知退；他们在初等经济学的考试里也拿不到60分，因为他们只知道“效用最大化”却不知道“预算约束线”；他们是自助餐厅里饿得扶墙进、撑得扶墙出的食客，只知道吃却不知道为何吃。在过去，这种唯心主义表现为“单纯的军事观点”，在今天，它表现为“中帝论”者的“谈兵色变”：他们一方面认为无产者联合起来就能瓦解反动军队，一方面又认为战争可以随意塑造阶级格局。

胜利吧或许可能，失败呢也说不准，反正结果是不确定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啦。这种观点无法将革命向前推进哪怕一步。今天的革命所需要的，不是能幻想“美好的明天是可能的”哲学，而是可以回答“革命的胜利是必然的”哲学。

纵观这些年左翼队伍里“中帝论”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条有趣的轨迹。在 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中国通过强有力的公共投资保持了高速增长，在此

时，“中帝论”者认为中国是20世纪六十年代的苏联和日本的合体，即在军事和经济上都能有效撼动当前世界体系的挑战者；当中国经济开始减速后，“中帝论”多数把中国比作是一战以前的德国，即就算无法摧毁当前世界体系，也能在自己一带一路的势力范围独步天下；而现在，当看到各地风起云涌的阶级斗争，中国资产阶级内残外忍的投降路线以及一带一路的逐渐破产时，他们则开始申辩“当年沙俄也是帝国主义，中国为何不算？”。

从天下无敌，到一方豪强，到甘当沙俄，最后甚至用美国打我是看得起我，别国还不配被打来论证中华帝国主义。“中帝论”者类比野心的逐渐萎缩，反映着中国半外围资本主义发展和阶级斗争的事实正在以他们不能抗拒的必然性，压倒他们对中国现状的错误认知。而经历了新自由主义洗礼，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迷惘、走向强大并必然会走向胜利的中国劳动人民，正在用自己的力量和局部的胜利去证明“死亡不属于无产阶级”。

# 就帝国主义、战争、阶级斗争等问题给部分青年同志的答复

远 航 一 号

**红色中国网编注**：近日，一些左派青年同志给红色中国网来信，询问有关世界体系理论、帝国主义、战争与阶级斗争等方面的问题。长期以来，由于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的歪曲和污蔑，在一部分青年同志中对红色中国网存在着相当的误解。有的青年同志认为，红色中国网的指导思想就是世界体系理论。这是不正确的。这里要说明的是，红色中国网坚持马列毛主义，但是愿意借鉴包括世界体系理论在内的国内外一切进步思想成果，独立自主地回答和解决中国无产阶级在当前实际斗争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无产阶级胜利和解放的道路。下面是红色中国网主编对一部分青年同志问题的答复。

1. 您提到现代国家战争是为了攫取“超额利润”，难道不是因为“转嫁成本，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吗？

答：这里面恐怕有一些误解。无论是远航一号还是红色中国网编辑部的其他同志，应该都没有说过“现代国家战争是为了攫取‘超额利润’”这样的论断。

我们关于现代战争及其特点的看法，比较早的一篇文章在这里：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29919

（发表于2016年）

其中，关于用战争来“转嫁成本、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是这样说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还没有实行系统的、自觉的宏观干预政策，经济危机往往表现为由于广大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或绝对不足而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机。当发生有效需求不足危机的时候，如果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为了对外扩张的目的而实行军备竞赛乃至发动侵略战争，由此而导致财政上的赤字开支，是有可能起到暂时缓解危机作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自觉地加强了国家干预，单纯由于有效需求大幅度下降而导致萧条的危险已经大大缩小了。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不再需要采用‘战争’那种不自觉的国家干预方式来缓解经济危机了。”

可以这样讲，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用战争来解决“生产过剩”问题，作为影响各国资产阶级是否会发动战争的一种因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2. 多大程度上中国未来会加入帝国主义战争中，尤其是热战？

答：中国未来加入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性=零

2015年初，红色中国网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可参考：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24777

其中，关于中国在未来与帝国主义国家、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这样分析的：

“在各大国中，俄罗斯在资本主义复辟以后，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一个主要的能源出口国和武器装备出口国。能源和军事工业是俄罗斯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了维护这些根本利益，俄罗斯资产阶级必须保有它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以及中东地区若干国家的势力范围。这就与美帝试图控制这些地区以图减缓其霸权衰落的图谋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甚至有可能发展为不可调和的矛盾。与俄罗斯不同，中国资本主义的核心部门是出口制造业。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很庞大，房地产业、金融业等非生产性部门也占相当的比例，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也很大。但是这些部门或者是为出口制造业服务，或者是依附于出口制造业。如果中国的出口制造业衰落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其它部门很快就会衰落。中国的出口制造业不仅依赖美国和欧洲的市场，而且还依赖在国外进口的能源和原材料。这些能源和原材料虽然不来自美国，但是中国资本主义客观上依赖美帝国主义的海空力量来保障中东、非洲等地的政治稳定以及印度洋、太平洋的海上交通安全。中国资本主义出口制造业对于美帝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巨大依赖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甘

愿在'G2'体制下充当所谓'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资产阶级既无力，也无心，更无胆，去挑战美帝霸权。当然，在中国资本家争夺非洲等地原材料的过程中，会与具体的欧美资本家发生冲突。但是，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中国所获取的海外原材料，是维持中国资本主义制造业所必需的，而中国资本主义制造业又是当前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中心；通过对中国广大廉价劳动力的剥削，中国资本主义向美、欧、日等核心国家输出巨大数量的剩余价值，保证了后者的超额利润，进而保证了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正常运转。在这个意义上，中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不仅没有冲突，而且高度一致。这就决定了，不仅在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战争，即使是在中国和美帝的仆从国（如日本）之间，也不会爆发战争，甚至连武装冲突都不会爆发。"

远航一号同志在7年前提出的上述分析，至今仍然经受了事实的考验。其中，关于俄罗斯与美帝之间有可能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的论断已经为事实所验证。

下面的文章及其相关文章是去年发表的：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9338

这篇文章与相关文章不仅从纯军事角度说明中国资产阶级对外战争（尤其是与美帝及其仆从国为对象的战争）不可能取胜，而且进一步说明对外战争不符合中国资产阶级的战略利益：

"中国资产阶级面对着一个十分尴尬的困境。如果中国资产阶级不首先确立在东亚、西太平洋地区的霸权，不首先控制马六甲海峡，自然是没有机会将霸权扩大到中东、波斯湾地区，更不必说西半球。然而，如果中国首先在东亚、西太平洋地区挑战美帝霸权，不仅军事上没有胜算，而且还会直接破坏东亚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于中国资产阶级没有任何好处；即使中国在东亚、西太平洋地区挑战美帝霸权侥幸成功了，还是解决不了对中国资产阶级利害相关最大的中东地区稳定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美帝只要对中国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贸易封锁，切断来自中东地区的石油、天然气供应，再切断来自巴西、澳大利亚的铁矿石供应，就不愁打不断中国资产阶级的脊梁骨。"

3. 我了解过左翼学者常用世界体系理论批判现代化理论，请问能否解释这两者对发展的含义？

答：现代化理论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在资产阶级学者中流行的一种理论。简单地说，就是认为“欠发达国家”只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得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以后，就可以实现“经济起飞”，最终普遍实现现代化。

严格来说，与现代化理论相对立的不是世界体系理论，而是依附学派。人们常常将依附学派与世界体系理论混为一谈；二者虽然有联系，但也有很大区别。世界体系理论是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产生、发展到将来的一般规律的理论学说（代表人物有沃勒斯坦、阿瑞吉等），而依附学派则主要关注的是如何解决“欠发达国家”发展的问题（代表人物有弗兰克、阿明等）。依附学派认为由于“欠发达国家”（外围）被核心剥削，导致绝大多数外围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发展。

4. 有学者批评世界体系理论只解释了中心国家为什么富有强大，外围国家为什么贫穷，却没有回答帝国怎样由盛转衰。您怎么理解？

答：如上，这种看法多半是混淆了世界体系学派和依附学派。世界体系学派中的阿瑞吉的主要理论贡献就是关于“霸权周期”（阿瑞吉叫“体系的积累周期”）。他关于“体系的积累周期”（Systemic Cycles of Accumulation，国内也有的翻译为“资本积累的系统周期”）的代表作是《漫长的20世纪》。

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和霸权周期，大家可以先参考这篇文章：

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41594

这里要着重说明一下，在世界体系理论中，“霸权”完全不等于“帝国”。

在世界体系理论看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要正常运转，政治上必须建立在多国竞争的基础上（也就是要有多个民族国家相互竞争）：

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41119

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41187

如果“霸权”过度发展，霸权国家的力量相对于其它各国有了压倒优势，以至于成为“世界帝国”，就不再有多国竞争了，因而也就不再有资本积累的政治条件了。所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要正常运转，需要维持霸权与多国竞争之间的某种平衡。没有霸权，过度的多国竞争会破坏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稳定；霸权过度强大，又会抑制多国竞争，破坏资本积累所需要的政治条件。当这种平衡无法再维持的时候，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就无法再存在下去了。

具体论述请大家参考上面的文章。

5. 世界体系理论是否有解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秩序如何瓦解崩溃？

答：可以这样讲，在目前可以进入资产阶级大学讲坛的各个学术流派中，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是明确提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崩溃问题并试图加以论证的唯一一个学术流派。现在西方资产阶级大学中的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通常都不讨论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问题。

此外，阿瑞吉的“体系的积累周期”理论对于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必然灭亡的问题也有帮助。阿瑞吉在早年与沃勒斯坦一样，认为当前的世界历史时代是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向“社会主义世界政府”过渡的时代。但是，在晚年，阿瑞吉放弃了这种想法，而把希望寄托于所谓中国领导的“世界市场经济”（受法国年鉴史学派理论家布罗代尔的影响，按照阿瑞吉的理解，资本主义不等于“市场经济”）。

需要说明的是，在沃勒斯坦、阿瑞吉之后，在资产阶级大学中（主要是在社会学系中）在名义上师承世界体系学派的教授、讲师与通常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一样，已经将世界体系理论庸俗化，不再关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灭亡的问题。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在目前中国的各个左派小组中，红色中国网是唯一一个明确地提出中国资本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并且在理论上努力严肃认真回答这些问题的小组（而不仅仅是空洞地号召、表态）。

关于红色中国网在这方面的贡献，可以参考：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1641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1646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1671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1700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9360

6. 您提到中国是半外围国家，还有哪些国家属于半外围？他们有什么共同之处，例如矛盾？

答：目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其内部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绝对统治地位，基本消灭了前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残余。在外部，半外围国家在与外围、核心国家的交换中，一般对前者处于剥削的地位而对后者处于被剥削的地位。但是总的来说，半外围国家对外输出的剩余价值要超过从外部输入的剩余价值；两相抵消后，无法获得大量的超额剩余价值或者无法稳定地获得大量超额剩余价值。

目前的半外围国家主要有两类，一是像中国这样的中低端制造业出口国，二是像俄罗斯、拉丁美洲大国、中东石油出口国那样的高价值自然资源出口国。后一类半外围国家在世界能源、原材料价格周期的上升期，可以有比较多的经济资源以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维持某种程度的社会妥协；当遇到下降期的时候，其经济形势往往在短时期内急剧恶化，导致大量劳动群众失业、贫困化。

从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拉丁美洲在本世纪初"左转"又失败的经验）来看，由于世界能源、原材料市场价格的周期性剧烈波动，后一类半外围国家往往不具备无产阶级稳定发展的条件，从而不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稳定基础。即使在能源、原材料价格周期的上升期，出现某种形式的"进步政府"，这些"进步政府"（如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政权）往往高度依赖来自于一两种商品的出口收入，既不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彻底决裂，也不能在国内建立巩固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一旦世界市场形势发生变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尝试往往就发生夭折。

与第二类半外围国家不同，中国是专门从事出口制造业的资本主义工业国，这就使得中国的无产阶级队伍可以随着资本主义积累的发展而发展。在中国资本主义未来发展的一定阶段，中国无产阶级（并且联合半无产阶级、进步小资产阶级）必然有能力提出广泛的经济和政治要求。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半外围地位以及无法上升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无法从世界市场上攫取足够的超额剩余价值。这样，中国资产阶级就无力一方面满足中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广泛要求，另一方面又维持资本积累的基本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的这一基本矛盾决定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在未来阶级斗争中的最低要求必然要超出中国资本主义所能够容纳的最大范围，从而这一矛盾只能以打破、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方式来解决。中国资本主义矛盾的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而不是世界上的其它地区，最有可能成为未来世界革命高潮的发源地。

7. 您强调能源危机使得半外围国家无法进入中心，但是现在出现的可持续发展和新能源科技是否正在解决这个问题？会不会反而推动创新，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为资本主义"续命"？

答：资产阶级的政客、商人以及学术界所吹嘘的"可持续发展"、"新能源"等存在着大量局限性，无法做到一方面避免全球生态危机，另一方面又保证越来越大规模的世界资本积累。具体可参考如下文章：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1649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1656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1661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1668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1671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9360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现在许多青年左派同志往往一提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想到“生产过剩”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虽然往往都表现为“生产过剩”危机，但是“生产过剩”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消费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为特点的经济危机通常也不再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典型形态。“生产过剩”问题本身过去不是，今后也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致命矛盾；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通常也不需要专门依赖“新能源”或其它某种新技术来缓和“生产过剩”问题。

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和特点，可以参考：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1484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1506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1571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1588

8. 按照“帝国标准”的“量变方法”计算，像卢森堡这样的国家岂不是也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是否有失偏颇？

答：众所周知，“量变引起质变”的规律是唯物辩证法三大定律之一。恩格斯认为，“辩证的发展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12]。

所以，任何理论概念，在现实世界中，必然都对应着一定的、可观察的数量指标。比如，水在摄氏零度以下是固态，在零度至一百度之间是液态，在一百度以上是气态。

类似的，对于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各个资本主义国家所包含的特殊矛盾、所具有的特殊形态，也必然对应着一定的、可观察的数量指标。不过，无论是远航一号同志还是红色中国网编辑部的其他同志在关于“中帝论”问题的辩论中应当都没有使用过“量变方法”这一术语。“量变”是大千世界、万事万物始终存在的，无所谓“方法”。至于用数量的、统计的方法分析“量变”，进而分析由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这是将唯物辩证法应用于认识和分析现实世界的基本方法，不是红色中国网的发明。

12.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5月第一版，第119页。

关于用“帝国标准”及其百分比来分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几个不同的结构性层次（外围、半外围、核心），我们以前撰写过多篇文章，其中包括如下两篇：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1187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1610

如列宁所说：**“所有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一切方面的联系”**（《帝国主义论》第七章）。类似的，所有统计指标、统计概念当然也“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一切方面的联系”。比如，现在大家都打新冠疫苗，绝大多数人打了新冠疫苗以后副作用是比较小的，不影响健康。但是由于个体差异，个别人的副作用会很严重，有的还会致死。绝大多数人打疫苗后副作用较小与个别的人打疫苗后致死都是复杂的客观世界现实存在的一部分。不能因为有个别人打疫苗后死了，就说绝大多数人打疫苗后副作用较小的统计是没有意义的。

列宁自己就既注意定性的方法，又注意用量的分析来进一步说明、丰富质的分析。比如，在1920年的《帝国主义论》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列宁就给出了帝国主义国家在“量”的方面的大致范围：**“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1/10，即使按最‘慷慨’和最夸大的计算，也不到1/5），它们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 列宁虽然在这里说的是**“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但是列宁是在为《帝国主义论》写序言时提及的，结合上下文、列宁在整个《帝国主义论》中的一贯思想，以及列宁并没有在任何其它地方说还有一些“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或者（至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还有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不是“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那么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列宁在这里所说的“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就是指的“帝国主义国家”。所以，按照列宁的分析，属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总人口一般不应该超过世界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无论如何不应该超过五分之一。如果一个国家不属于世界上“特别富强”的五分之一人口的一部分，那么，无论如何这个国家不能算帝国主义国家。

那么，卢森堡算不算帝国主义国家呢？卢森堡当然属于“富”而不算“强”。不过，比卢森堡稍大一些并且又与卢森堡同属于西欧“低地国家”的比利时、荷兰在历史上都是毫无争议的帝国主义国家。

在红色中国网编辑创作的文章中，一般将人均收入在“帝国标准”75%以上的国家归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之列。我们并没有说，凡是核心国家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我们的基本看法是，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如果一个国家不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国家，那么这个国家肯定不是帝国主义国家。

如列宁所说：**“所有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一切方面的联系”**。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理论概念或定义。所有理论概念、定义、统计指标肯定都有局限性，都有不可避免的例外，但它必须要能够说明它试图说明的那一部分现实世界现象中的绝大多数情况，否则这种概念、定义或指标就是没有现实意义的。

类似的，无论是列宁所说的“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还是红色中国网编辑部所使用的“帝国标准”也都有局限性，也都有不可避免的例外。在我们最近谈论二十一世纪条件下的帝国主义问题的文章中，对于这些例外，也有进一步的说明：

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50211

9. 您否认中国帝国主义论，那为什么人们会有中国“对内压迫，对外扩张”的感觉？如大量海外资产？大量垄断机构和金融机构？以及一些带有扩张意味的政策？

答：首先，“感觉”当然不能代替科学分析，不能代替在努力占有大量材料和证据基础上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和分析过程。

毛主席教导我们：**“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 … 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至于中国资本主义对内压迫、对外扩张，拥有大量海外资产、垄断机构、金融机构等，这些都是一般资本主义国家都具备的特点，不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或帝国主义国家特有的特点（如上，帝国主义国家包括大部分但并非

全部的核心国家）。如列宁所说，只有“极少数特别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才算是帝国主义国家。

10. 中国年轻人是不是应该立志让中国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区?

答：当然不应该。但这里的主要问题不是中国资本主义“应该不应该”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地区，而是“能不能”、做得到还是做不到。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还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这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在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上的一个基本区别。

中国的马列毛主义青年应该立志于掌握唯物辩证法，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和运用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并据此建立起对中国无产阶级事业必然胜利的信心；而不是依据于某些个人或者团体的主观愿望或者幻想来决定自己的希望或者沮丧。后面这样一种态度，是小资产阶级进步青年在走向革命的道路过程中常常遇到的障碍，并且往往在这种障碍面前被绊倒，垂头丧气，逃遁到歧路上，与理想告别，或者藏进封闭的小圈子中。

11. 左派青年在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内，应该采取怎样的斗争策略?

答：请参考下面这篇文章：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38010

12. 二战之前德国或日本并没有殖民地攫取超额利润，但仍然是军国帝国，那么超额利润是否代表帝国已经完成了外部市场的扩张?

答：日本在二战前通过掠夺朝鲜、台湾、中国已经有大量超额利润。德国在一战前肯定有大量殖民地和超额利润；一战后虽然殖民地丢掉了，但应该还保留一部分海外投资。

https://www.sohu.com/a/362788626_120349010

这篇文章中说德国二战前仅在中国就有上亿美元投资。一亿美元按当时汇率折合约三亿银元，相当于国民党政府三十年代初的财政收入。

另外如我们在这篇文章中所说：

http://www.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50211

在现代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核心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所获得的利益远远大于超额利润。二战前，德帝国主义在这方面应当得到了相当规模的利益。关心抗战史的同志应该都听说过国粉们经常吹嘘的所谓“德械师”吧?

13. 究竟是超额利润的产生代表国家走进了帝国主义这个普遍阶段，还是只有掌握了超额利润的国家才能称之为帝国主义?

答：在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条件下，如果仍然要有意义地使用“帝国主义”这个概念，使其对现实阶级斗争确实有指导意义，就应该从列宁给帝国主义下的“另外一个定义”出发。

# 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讨论

远 航 一 号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马克思致力于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也就是《资本论》的草稿。马克思将其中论述商品和货币的部分整理编辑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于1859年6月在柏林出版。这部分内容后来成为《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的基础。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介绍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写作计划：**“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马克思生前所完成的《资本论》第一卷以及后来经过恩格斯编辑整理完成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大致对应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前三册“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的内容。但是马克思终其一生，没有机会对“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等做系统和全面的论述。

在《序言》的第二段，马克思介绍说他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任《莱茵报》编辑时期开始参加关于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辩论：“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在马克思之前，在法国已经产生了早期社会主义学说(就是恩格斯后来所说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一方面认为“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肤浅”的，另一方面也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

为了解决这些思想疑问所带来的“苦恼”，马克思先着手对1820年出版的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做批判性的分析。在对黑格尔的批判中，马克思认识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

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马克思在这里所引用的黑格尔所说的“市民社会”，在英文中所对应的词是Civil Society，在现代的中国自由主义的政治文献中一般翻译为“公民社会”。黑格尔、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指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人们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现代中国自由派的想象中，“公民社会”是由市场经济中的独立个体结合而成的自治空间，这个自治空间独立于政府、法律等所谓“公权力”之外、规定着“公权力”的界限。在自由派的理想中，一个“公民社会”主要由个体农民、小业主、小商人等小私有者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律师、医生、记者等“专业人士”组成，他们人人勤劳致富、奉公守法，用竞争创造财富，用法律保护各自的私有财产和规范相互之间的关系，又组成“非政府组织”等独立的公民团体来监督政府；只要没有邪恶的、妄图不劳而获的社会主义者的鼓噪，就不会有阶级冲突和斗争。

接下来，马克思写下了一长段话，这一长段话用简洁的语言，全面、系统地概括了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见解，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马克思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唯物史观：**“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就关于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来说，马克思在这里所论述的唯物史观，不仅使得马克思主义区别于一切资产阶级的历史学说和政治学说，而且也区别于一切小资产阶级假仁假义的改良主义思想和政治派别。了解和掌握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进步青年真正进入马克思主义殿堂的一块敲门砖。遗憾地是，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许多向往社会改造的进步青年，往往都是在遇到这块敲门砖时便止步不前了。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追求进步的积极分子，只要我们的追求是认真的而不是轻浮的，是严肃的而不是投机的，那么就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这样的实际问题。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或者任何一个处于“正常”状态的压迫社会中，统治阶级以及附庸于他们的势力，一般来说，都是强大的。他们掌握着社会上绝大部分的财富，可以随时动用军队、警察、法庭、监狱镇压一切可能发生的反抗，又用他们所控制的学校、媒体、书籍、网络操纵着人们的精神世界。面对着在各方面似乎都占着压倒优势的统治者和压迫者，社会变革或者革命，为什么是可能的？并且这种可能，不是指的那种纯粹抽象的、虚无缥缈的、自欺欺人的可能，而是现实的、确定的、在大量的偶然中寻找到必然的可能？

这些，正是唯物史观要回答并且可以回答的问题。

马克思说："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马克思所说的"总的结果"，可以大致分成如下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在这一部分中，马克思提出了"物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式"等概念，简要地说明了这几组概念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怎样发生着**"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式(后三者共同构成一定的"社会形态")。或者说，这一段是讲，一定的社会形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会存在。

第二部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在这一部分中，马克思概括了他关于"社会革命"(即从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外一种社会形态)必然会发生的基本观点。社会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及物质生产力**"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所以，社会革命发生的前提是，第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第二，发展了的物质生产力与"现存"的或原有的生产关系发生了矛盾。

第三部分："**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

**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马克思指出，在考察社会的变革时，要注意区分那些物质的、生产条件方面的变革(比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经济指标、资本主义经济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可以观察和测量到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所有制结构的变化、阶级结构的变化等)，以及那些“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意识形态的形式”(比如资产阶级学校的课本、资产阶级的御用理论家、资产阶级媒体或资产阶级政党的官方文件对现实存在的社会冲突所做的各种辩解和美化，以及“善良”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人士所抱有的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还包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真正代表社会进步的那个阶级及其代言人由于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对于自己所承担的历史使命的错误认识)。马克思特别强调，对于任何一个历史时代中的人们的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现实存在的而不是想象的冲突中去解释。

第四部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在这一部分中，马克思进一步说明了社会变革或革命的条件，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细心的读者这里马上就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什么叫做一个社会“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马克思又说：**“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对于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者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新的、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关系，它所需要的“物质存在条件”已经成熟了吗?

马克思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生活在二十一世纪世界上的人类，能够提出什么样的任务，能够解决什么样的任务？生活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土地上的人类，又应该提出什么样的任务，又能够解决什么样的任务?

第五部分：“**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

**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在这一部分中，马克思按照当时人们所了解的世界历史知识，概括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几个阶段。关于这几个发展阶段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后来在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曾经引起很大的争论。

然后，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无论是在这部著作还是在其它许多著作中，马克思都没有或者很少用“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而是说“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社会”将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或者说，将是有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最后一个社会形态，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已经创造了“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

马克思总结说，“**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就是说，整个的阶级社会历史都是**“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在整个的阶级社会中，人们都处于绝大多数人被极少数人统治、所有的人被自然界所统治的状态，所以是不自由的，是与动物界没有根本区别的，因而是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只有在人类社会摆脱了一些人被另外一些人统治、所有人被自然界统治的状态以后，所有的人类才能共同建立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实现所有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人类的真正历史才开始了。

这是马克思的论断，也是马克思为进步人类展现的伟大理想。但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解决阶级对抗的物质条件？哪些历史任务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进步人类“能够解决的任务”，哪些是我们不得不留给下一代或者下几代人去为之奋斗的任务？这些问题，恰恰是今天中国的进步积极分子必须在理论上认真探索、在实践中努力回答的问题。

1859年时，马克思41岁。在序言中，马克思说，**“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就是说，马克思在这里概括的是他自1843年创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来十六年期间研究和思索的总的成果。在这十六年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共产党宣言》，又经历了1848年欧洲革命，见证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球体系(1858年10月8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

**完成了”)**。马克思将这一期间他所研究和思索的总的成果用最精炼的语言概括出来，写在序言中。

所以，我们在学习和讨论马克思的1859年序言时，不要停留于字面，而要努力结合自己所学习过的全部历史、经济、社会、政治知识来体会马克思的见解(将来还要努力大大地拓展这些知识)。除此以外，在学习和讨论的过程中，要努力从我们的头脑中鉴别和清洗被中国资产阶级当局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歪曲化以后产生的种种垃圾，还要打扫那些经过各种二手三手四手的道听途说以后形成的种种谬误。

让我们先来认真体会一下马克思的这一句话：“**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这句话讲到了“物质生产力”，又讲到了“生产关系”，这些关系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又是“**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

什么是“物质生产力”？一切人类社会要存在和发展，要“生活”，首先就必须生产一定数量、一定规模、能够满足当时社会各种需要的物质产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

人们生产物质产品(或者说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的方法是通过劳动来改造自然。在劳动的过程中，劳动者是改造自然的主体(就是说，作为劳动过程中有意识、有目的的一方)。劳动者将自然界中的土地、森林、河流、湖泊、海洋、矿物质等作为自己要加以改造的对象，努力从中创造出人们所需要的物质产品。这些自然资源以及经过初步改造以后可以用于进一步加工的原材料就是政治经济学所说的“劳动对象”。为了更好地、更有效率地改造劳动对象，在长期的生产劳动过程中，人们又制造出工具、机器、设备以及为了容纳或者使用这些工具、机器、设备所需要的厂房、办公楼、道路、桥梁等，以便制造出更多、更好的物质产品。人们为了提高劳动过程的效率而制造出来又在劳动过程中使用的工具、机器、设备等就是政治经济学所说的“劳动工具”。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又合称生产资料。

无论是劳动者、劳动对象还是劳动工具，都是人们为了改造自然而与自然界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的物质关系的不同方面。人们为了获取自己所需要的物质产

品，使得自然界的某些部分发生物理的或化学的变化，并与自然界之间不断地发生着能量与物质元素的交换。

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既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元素和能量交换，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即社会活动。这样，“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就必然要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社会关系。简单说，所谓“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在物质生产活动中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交换和分配活动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

在这段话中，马克思讲了两种“生产”：**“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即人们所需要的物质产品的生产)和**“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即人口的生产)。两种生产一方面都是“自然关系”(即由生理的或自然的需要所决定的关系)，另一方面又都是“社会关系”(即作为有思想、有意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说，社会关系就是**“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除了孤岛上的鲁滨逊之外，总是要通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来完成的。只要存在着“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那么就会存在着如何组织许多个人共同参加的劳动过程、什么人来负责具体劳动、什么人负责指挥和监督、从哪里获得生产资料、劳动产品如何分配，等等问题。不同的社会形态下，生产关系不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是不同的。

在人类演化为智人以后的最初几十万年，由于物质生产力水平低下，几乎没有剩余产品，人类生活在原始的无阶级社会中，没有系统的剥削和压迫，也没有专门的暴力机关。

早期的阶级社会产生于大约一万年前。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开始出现了比较大量的剩余产品，原始部落公有制开始被私有制取代，社会开始分裂为阶级，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也随之发展起来。为什么自从有了剩余产品，社会就分裂为阶级？未来阶级社会消亡、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条件是什么？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要努力的回答的主要问题之一，也是我们这一代左派同志在理论学习中要努力(初步)掌握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先提出来，以后随着学习的深入，再逐步探讨。

在阶级社会中，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主要包括这个社会的阶级关系(但是一个社会的阶级关系并不是这个社会的全部生产关系，下面再解释)。

在著名的“伟大的创举”一文中，列宁给阶级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所以，阶级关系就是这些**“大的集团”**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包括：他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有的集团占有生产资料，有的集团不占有生产资料，有的集团占有一大部分生产资料，有的集团只占有很少的生产资料；他们**“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有的集团不参加生产劳动，却在社会劳动组织中居于支配和压迫的地位，有的集团终年从事生产劳动，却在社会劳动组织中处于被支配和被奴役的地位；他们**“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然后，列宁又补充说，由于各个阶级在一定社会阶级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这就是说，有的社会集团不从事生产劳动，却占有社会的剩余产品，另外一些集团终年从事生产劳动，却不占有社会的剩余产品，从而前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后一个集团的劳动。

所以，在一个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主要表现在哪些集团(阶级)占有或不占有生产资料(如果这种占有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那么，这种占有也就同时表现为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但是，这样的占有也可能并没有在法律上明文规定，或者实际的占有与法律上规定的“所有”并不相符)，哪些集团(阶级)在社会劳动组织中处于支配或者从属的地位，以及哪些集团(阶级)占有或不占有社会的剩余产品。一般来说，在阶级社会中，占有最大数量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是支配大多数社会劳动过程并占有大多数社会剩余产品的阶级；劳动群众则一般不占有或只占有很少的生产资料，在劳动过程中被支配和奴役，不占有社会剩余产品。

以上这几个方面，包括了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的主要方面，但并不是生产关系的全部。这是因为，随着剩余产品的产生，或者说，随着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分工和交换的范围扩大了，于是就产生了另外一种与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相关的关系，即在分工与交换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

在所有的稍微复杂一些的人类社会中，都必须要设法解决怎样把社会现有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到不同的生产任务上以满足社会不同需要的问题。既然存

在着分工，就必然存在着怎样在分别从事不同生产任务、生产不同的物质产品的劳动者或者他们的劳动产品的占有者之间相互交换劳动产品的问题。

这些问题，在原始社会中，大致是依据部落的生存需要以及长期的约定俗成来解决的。随着私有制的产生，私有者之间的产品交换就发展为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的场所就发展为市场。在阶级社会中，有很大一部分产品交换不是通过市场而是通过国家等暴力机关集中征收后再分配的方式完成的；当然还有一部分产品交换是通过国家以外的集团或个人的暴力掠夺或偷盗完成的。此外，社会习俗(所谓“礼尚往来”、“乡规民约”或毛主席所说的“夫权”、“神权”、“族权”)在阶级社会的产品交换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则希望在民主的、合理的统一计划的基础上来协调并完成全社会的产品交换。

这些由劳动分工和劳动产品的交换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社会习俗、商品交换、国家再分配，还是未来的社会主义计划，在笔者看来，也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因而也是生产关系的一部分。

过去，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市场或计划不是生产关系的一部分。这种认识在资本主义复辟初期曾经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为热衷于复辟的官僚资产阶级提供了某种意识形态上的方便。邓小平集团就曾经鼓吹：“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套歪理邪说，为官僚资产阶级打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名义、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理论依据”。历史已经证明，所谓“市场经济”不是什么天真无邪的“经济手段”，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再回到马克思的这句话：**“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显然，**“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势必要在相互之间发生某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生产关系。但是，为什么说，由此发生的生产关系是“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呢?

PalmFujimori网友在讲到怎样理解“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时说，唯物史观不是“机械决定论”。

唯物史观固然不是“机械决定论”，但它肯定是某种意义上的“决定论”。如果唯物史观不是某种意义上的“决定论”，也就是说，如果它不能在某种意义上告诉我们例如——因为有了A，所以有了B(A是B的充分条件)；或者，如果没有A，也

就不会有B(A是B的必要条件——这样的陈述或结论，它也就无法去正确地回答一个社会在历史上为什么会存在，当然也就无法回答这个社会为什么会灭亡，当然也就不再是有意义的历史观。

那么，在什么意义上在“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人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是“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呢?

咱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个问题。首先，有些社会关系能否存在是受物质生产力的绝对发展水平制约或者“决定”的。这里说的物质生产力的绝对发展水平既是指的物质生产的总量也是指的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但是主要是指一个社会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可以长期维持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

比如，在原始社会，由于物质生产力水平低下，几乎没有剩余产品，社会分裂为阶级便是绝对不可能的，不以当时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自从有了剩余产品以后，阶级社会当然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可能，但是，阶级社会的产生是不是历史的必然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时代，社会分裂为阶级同样是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为什么是这样？这是我们以后要继续探讨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认为，正是因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使得人类历史将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到那时，新的无阶级社会(共产主义)将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这样认为？实现这样的必然性，又需要什么样的历史条件，这也是我们以后要继续探讨的。

说人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是“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还有另外一种意义，这就是马克思那句话后半段所说的，生产关系要与**“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

什么叫“相适合”？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等几个方面。物质生产活动要良好进行，就要把这几个方面比较好地结合起来，以便在已有的条件下生产尽可能多的物质产品。为了生产某种物质产品而把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一套办法就是生产这种物质产品的生产技术。如果这种生产技术包括了**“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那么，在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在一个时期内不发生显著变化的前提下，“许多个人”怎样“共同活动”，或者说，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结成怎样的相互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已有的生产技术。如果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不“适合”已有的生产技术，已有的生产技术就发挥不出来，社会就无法充分发挥其物质生产的潜力，就会影响到物质产品的扩大再生产，甚至破坏简单再生产。

比如，在原始社会时期，特别是在原始社会早期，由于人们的生产工具简单落后，如果要捕捉较大的猎物，往往需要一个部落的许多成年男性共同合作，因

此就形成了共同劳动、共同分配劳动产品的制度。到了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特别是青铜器、铁器等金属工具的出现，使得靠一个家庭的劳动力开垦土地成为可能，这是私有制出现、原始公社开始瓦解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在一些古代社会中，农业生产的平稳发展有赖于大规模的灌溉和水利工程，另外为了抵御自然灾害又需要存储粮食、调剂丰歉，为此就需要一些专门的公共部门来承担大规模水利工程并负责建造和保管公共仓库。这是导致在亚洲和北非一些地方形成中央集权国家以及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资本主义时代，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出现了巨大的需要几千人、几万人在一起工作的近代工厂，于是就需要发展出能够管理成千上万人的工厂组织。另一方面，本世纪初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通过网络平台将数以百万计互不相识的消费者和生产工人、外卖员或快递员联络起来成为可能；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这又为互联网资本家残酷剥削在资产阶级法律上属于“独立承包人”的外卖员和快递员提供了技术条件。

将来，我们要对资本主义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技术进行改造，为创造共产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服务。

如果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生产关系是**“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又怎么理解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呢？性急的革命者未免会想(很多中国的进步青年恐怕经常在想)，难道不能主动创造出“先进的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什么非要让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为什么不可以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先创造“先进”的生产关系，再让“落后”的生产力来适应“先进”的生产关系？

与此相关的问题还有，生产关系与上层建住、意识形态的关系又是怎样的？性急的革命者恐怕又想，为什么不能先创造出“先进”的意识形态，然后改造上层建筑，改造生产关系，最后再让“落后”的生产力赶上、适应“先进”的社会形态？

现在，先从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抄一段话，供大家思考：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在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中所形成的生产关系，一方面受到物质生产力绝对发展水平的制约或“决定”，另一方面必须在技术

上与当时的物质生产力“相适合”(就是说要能保证当时物质生产力的扩大再生产或至少是简单再生产)。在这两个方面的意义上，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中所发生的生产关系都是**“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在开宗明义介绍了“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以后，马克思接下来说：**“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请读者注意，马克思在这一段话中没有直接用“经济基础”的提法，而是说“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现实基础。”关于“经济基础”的提法出现在关于社会革命那一段话以后：**“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过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曾经有过争论，那就是经济基础到底是仅包括生产关系，还是既包括生产关系又包括生产力。这里，我们按照马克思在上面那段话中所表达的意思，**“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将经济基础理解为就是生产关系的总和。

关于经济基础(经济结构)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表述是，**“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在**“生产关系的总和”**或经济基础之上。

这里，“政治的上层建筑”指的就是用强制和暴力的手段来管理社会的公共事务；“法律的上层建筑”则是用文字的形式将用强制和暴力的手段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若干规则记录下来。或者说，“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就是恩格斯和列宁后来所说的作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的国家。

我们知道，在原始无阶级社会中以及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是没有国家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原始的和未来的无阶级社会中，有没有“上层建筑”？我们暂时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集中讨论阶级社会条件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说，上层建筑竖立于经济基础之上，但是要竖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当然也是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否则，如果上层建筑影响到经济基础的正常运行，甚至把经济基础破坏了，自然也就无法“竖立其上”了。

在阶级社会中，什么样的上层建筑是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呢？凡是阶级社会，一定是占全社会极少数的剥削阶级不参加生产劳动却占有社会的剩余产品，而占全社会绝大多数的被剥削劳动群众终年从事生产劳动却不占有剩余产品。所以，剥削阶级经常要面临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反抗斗争。这些斗争，可能是个体的反抗(怠工、逃亡、盗窃、抢劫、绿林好汉等)，也可能是大规模的、集体的反抗(农民起义、工人罢工、革命政党领导的政治斗争等)。为了镇压劳动群众的反抗，剥削阶级就不得不建立专门的暴力机关，如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也就是马

克思所说的“国家机器”，来维护现有的生产关系(或者作为其“法律用语”的财产关系)。

但是，用国家机器来镇压劳动群众的反抗，对剥削阶级来说，是一种成本比较高昂的手段。为了维持国家机器，剥削阶级需要将剩余产品中的相当大一部分拿出来用于豢养脱离生产的庞大军队和其他武装人员，还要为他们提供武器装备；如果遇到劳动群众大规模的反抗，镇压开支还要大大增加。维持国家机器的开支，会大大减少剥削阶级可以用于自身奢侈消费的资源，或者挤占其它的必要的公共管理开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还会减少可用于资本积累的剩余价值。

为了将用于国家机器的开支减少到可以承受的、“可持续”的水平，剥削阶级还必须依靠一整套意识形态(思想体系或者马克思在上面所说的“社会意识形式”)来说服、麻痹劳动群众，以说明现存的生产关系以及与之配套的整个社会制度是合理的、无法改变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意识形态往往采取宗教的形式(如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儒教等)，以说明现存社会制度是神或者上帝创造的，或者是“合乎天命”的，因而是无法改变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学校教育和新闻媒体共同构成了一套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辩护的体系，这些辩护体系从人们在幼年刚刚开始懂事的时候起，就努力向人们灌输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行为准则都是“天经地义”的、“合乎人性”的，并且努力让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都相信现存社会制度是地球上一切可能的社会制度中最好的或者“最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也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有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虽然不能够完全停止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反抗，但至少能够在绝大多数时间使得绝大多数人默默地接受现行的社会制度，从而减少劳动群众反抗的频率和强度。**

前面说，上层建筑是竖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基础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在其它地方说过的“**国家机器**”。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知道，现代资本主义的国家除了承担镇压劳动群众反抗、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职能外，还实行宏观经济管理并广泛地调节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有的资本主义国家还直接经营国有制企业。

即使是在古代，在中国以及其它一些亚洲国家，国家除了镇压劳动群众反抗外，往往还承担兴建和维护大型水利工程、保管公共仓库等公共管理职能。那么，古代的和现代的国家所从事的这些经济管理或公共管理的职能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还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呢?

这些现象说明，对于“国家”这一机构，需要进一步分析。自从阶级社会产生以来，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人口的增长以及分工范围的扩大，客观上产生了

对专门从事公共管理的机关的需要。国家，作为在形式上负责全社会公共事务的官僚机构，既是剥削阶级镇压劳动群众反抗的暴力机关，但又不可避免地要承担一部分经济管理或公共管理的职能。严格意义上的“上层建筑”应该特指国家作为暴力的镇压机器的职能，而国家作为经济管理或公共管理的职能应该作为经济基础的一部分。

在我们讨论的时候，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性急的革命者恐怕又想，为什么不能先创造出‘先进’的意识形态，然后改造上层建筑，改造生产关系，最后再让‘落后’的生产力赶上、适应‘先进’的社会形态？”

与此相关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历史上，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劳动群众，都曾经多次进行大规模的反抗斗争，有的还打倒了皇帝、国王，“闯王”进京坐了天下，使得“大地像陶轮一样翻转过来”(古埃及历史记载)，或者“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却吃齑”(黄巢起义军打进长安城后有人写下的诗句，“笏”即笏板，古代大臣上朝时用来记事的板子，用玉、象牙或竹制成；“齑”即腌菜、咸菜)。但是，这些古代劳动群众反抗斗争中产生的政权，后来不是失败了，就是很快蜕化变质为新的剥削阶级政权。

类似的，在现代，虽然曾经发生了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也纷纷被官僚特权集团窃取了胜利果实，并最终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不归路。

关于现代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教训，我们在其它地方再总结。这里先来讨论古代的问题。如果我们同意，资本主义以前的古代的中国的和外国的生产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与当时的物质生产力相适应的，那么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只有当时的生产关系正常运转，当时的物质生产力才能正常发展。

占全社会人口极少数的剥削阶级剥削和压迫占全社会人口绝大部分的被剥削劳动群众，是当时的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以及必然结果。但是，这些关系只有有了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式”才能正常运转。否则，如果，劳动群众的反抗得不到镇压，或者因为原有的意识形态无法再欺骗和麻痹人民群众导致镇压的成本过于高昂，都会导致原有的生产关系无法正常运行。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原有的生产关系无法正常运行，就意味着物质生产力不仅无法发展，还可能严重倒退。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曾经经历几百年的中世纪“黑暗年代”。中国历史上每次王朝更迭时，也都伴随着人口的大幅度减少。

这些历史事实说明，在古代的物质生产力条件下，劳动群众的反抗即使暂时推翻了剥削阶级的统治甚至建立了新的奴隶或农民政权，或者无法长久地存在，或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往往要改头换面为新的剥削阶级政权才能维持下去。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一旦不再满足于当绿林好汉，而是开始志在天下，往往

要招募一些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充当“军师”，与地主阶级的一部分结成统一战线，直至蜕化变质为地主阶级某一集团服务的军阀武装。

那么，这些历史上被剥削劳动群众无法打破的魔咒是否也折磨着现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运动呢？现代资本主义到底有没有创造出能够解决人与人的对抗、阶级与阶级的对抗的物质条件呢？

在物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人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发生的关系即生产关系要与物质生产力相适合，政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式又要与由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经济基础相适合。

在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占有社会的生产资料和剩余产品，剥削阶级又是统治阶级，用专门的暴力机关来维护现存的生产关系，而“统治阶级的思想又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为现存的一整套社会制度提供辩护，鼓吹现存的社会制度是合乎“天理”、“人性”、不可变更的。既然是这样，旧的社会制度怎么会灭亡呢？新的社会制度又怎样产生呢？

在序言中，马克思是这样回答上述问题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马克思认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是必然要“发展”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与“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这一矛盾只能以“社会革命”的方式来解决。让我们逐一来探讨马克思的这几个观点。

首先，物质生产力为什么必然“发展”？在第二次讨论中，曾经说明过，所谓“物质生产力”就是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而与自然界之间相互作用而发生的关系。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人改造自然，从自然界攫取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改变周围的环境，向自然界排放出固态、液态、气态的物质副产品。

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人又不可避免地改造自己。人在改造自然中，锻炼自己的体魄；人通过改造自然，增进对自然的认识，又把这种增进的认识用来提高自己的技能和发明新的工具；人通过改造自然，增加了食物的供应，就使得人口的扩大成为可能。所以，通过改造自然，人自身，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发生了变化，人的体力和智力都得到发展，“人性”得以改变。

既然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既改造自然界又改造自己，那么就不可避免地要改造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发展出新的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劳动者，从而改造物质生产力。所以，物质生产力必然不断地发生量的和质的变化，因而必然是“发展”的。

但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否必然意味着“进步”？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如果说，物质生产力是必然要“发展”的，发展了的物质生产力为什么会与“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呢？让我们先来考察一种传统的理解。这种传统的理解主要是反映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经验。按照这种传统理解，在旧的生产关系还占统治地位的同时，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在旧的社会形态内部，会首先产生适应新物质生产力的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随着物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些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会一步步发展壮大，同时出现与新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新的阶级；这个新的阶级会进而要求有符合自己利益的新上层建筑和新意识形态。这时，建立在旧生产关系上的旧统治阶级必然要企图利用原有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来压制、阻挠新的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新的阶级，双方发生尖锐、不可调和的冲突，展开长期的斗争，直至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新的阶级取得胜利，完成“社会革命”。

但是，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只是人类历史上从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的特殊例子。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还曾经提及阶级斗争的另外一种结局：**“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在人类历史上，“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灭亡时的结局，至少并不罕见，甚至可能是历史上的大多数情况。

为什么“斗争的各阶级”会最终同归于尽？前面讲，由于物质生产力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关系，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必然导致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同样的，生产关系内部也包含着矛盾，有矛盾就必然要引起发展变化。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主要是阶级关系，而阶级关系主要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劳动群众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必然要引起两者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的原动力。

在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或者在与一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一定的历史时代，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的主要的、本质的方面是大致不变、贯穿始终的，但是生产关系的具体内容还是会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而发展。从中国和外国的历史经验来说，这种阶级斗争的发展可能走向两种方向。

一种方向是，在经过初期的相对“均衡”后，原来就占优势地位的剥削阶级得以不断地扩大自己的优势地位，使得劳动群众受到的剥削和压迫越来越深重；而现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又都无法有效遏制剥削阶级个人成员不断扩大自身剥削优势的尝试。最终，越来越多的被剥削劳动群众无法维持基本生存，不得不揭竿而起，导致旧社会土崩瓦解。

比如，在中国历史上，在王朝初期，土地分配相对平均，有大量自耕农。到了王朝中期以后，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自耕农破产，沦为佃农、农奴或逃亡。大批自耕农破产以后，导致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国家失去税收来源，也失去征兵基础，却又无法向地主阶级征税，从而日益衰落，最终被农民起义或外族入侵所推翻。

还有一种方向是，在经过初期的阶级斗争以后，占主导地位的剥削阶级不得不做出一定妥协，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这时，为了攫取新的剩余产品来源，同时进行了阶级妥协的社会对于周围其它社会又有军事优势的话，这一社会便会尝试不断地进行对外扩张来缓和内部矛盾。但是，在对外扩张过程中，社会妥协的过程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成本越来越高，直到对外扩张达到极限，无法再获得新的剩余，在经过一个短暂的相对均衡时期以后，这一社会再也无法承受妥协的成本，最终坍塌。

比如，在历史上的罗马共和国初期，贵族和平民的斗争最终迫使贵族让步，平民获得公民权。罗马共和国通过不断对外扩张，获得奴隶，来满足所有“公民”的利益。随着罗马共和国发展为罗马帝国，“公民”得到的福利也越来越多，而且在帝国扩张过程中，一些“蛮族”也逐渐获得公民权，为了满足越来越多“公民”所需要的越来越多福利的成本越来越大。到一定程度以后，帝国无力进一步扩张，获得的奴隶和剩余产品都无法再增加，于是开始陷入危机，最终被蛮族入侵推翻。

前面讲到物质生产力时，曾经留了一个疑问，那就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不是一定意味着“进步”?

我们知道，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必然要改造自然。但是，人对自然的改造并非总是有利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或进步的。人所使用的不可再生资源可能导致资源枯竭，人所使用的可再生资源可能超出生态环境在一个时期内的可持续再生能力，人向周围环境排放的固态、液态、气态物质副产品可能损害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并反过来威胁人自身的生存。古代的一些文明，就是在人口和物质生产达到并且越过了生态环境所能容纳的极限以后，陷入了资源枯竭、环境崩溃，最终走向灭亡。这是走向“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的又一条路径。

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当时大多数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大体上是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资本家的剥削越来越残酷、无产阶级越来越贫困；最终，当无产者在连“奴隶般的生存条件”都无法再维持时，以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今天中国许多初步觉悟的进步青年对资本主义压迫的理解，恐怕还是这样的。然而，这样一种理解，显然是不符合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实际的发展进程的。

在经过了几个世纪的疯狂资本积累以后，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使得全球生态环境的许多方面都处于崩溃的边缘。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如果得不到逆转，也许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全球就将面临空前的生态灾难；若干个世纪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可能就不再适合人类生存。这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一种途径，也是人类给资本主义陪葬的一种途径。

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的军事技术得到了巨大发展，生产出了数量足够多、足以毁灭整个地球多次的核武器。虽然在各国统治者尚能保持“理性”的前提下，核战争不会马上爆发。但是，只要时间足够长，空间范围足够大，小概率事件就会在足够长的时间范围、足够大的空间范围中变为大概率事件，直至成为现实发生的事件。这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另一种途径，也是人类给资本主义陪葬的另一种途径。

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广大外围和半外围地区的剥削，核心国家可以攫取大量的超额剩余价值，用以维持内部的社会妥协。但是，假以时日，核心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所要求的福利和权利越来越多，与核心国家邻近的外围、半外围国家的劳动力也千方百计向核心国家移民，合法移民要求变为“公民”，非法移民要求变为合法，从而使得核心国家可以用于有效资本积累的剩余价值越来越少。核心国家试图将资本转移到外围、半外围以降低成本。但是，假以时日，外围、半外围的无产阶级也日益壮大，也要求更多的福利和权利。最终，当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无法再扩张，也无法再找到廉价的资本转移场所时，整个体系就无可避免地走向坍塌。这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第三条途径。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资本主义将创造出足够高的劳动生产率，足以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并为他们的体力和智力充分发展创造条件。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们终日被迫出卖劳动力为生，没有自由时间发展自己的体力和智力潜能。资本主义还通过学校教育、广告、媒体和影视作品灌输资本主义消费文化，人为地创造各种并不必要、对人的健康发展有害的过度消费，以迫使劳动者为了追求这些过度消费没日没夜地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

但是，资本主义为了培养自身所需要的劳动者，又不得不普及国民教育，使得广大劳动者都能或多或少的得到一些现代科学知识和政治知识，或多或少地了解一些以往劳动人民反抗斗争的历史甚至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样，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会觉悟起来，选择“躺平”，不再追求过度消费，主动减少劳动时间、降低劳动强度，引起资本主义劳动纪律全面崩溃。

在资本主义崩溃以后，劳动者会利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物质生产力，按照民主基础上产生的计划对全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合理安排，将全社会的物质消费水

平限制在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基本需要同时又能满足生态可持续性的水平上(如果这两个要求可以兼容的话)。因为取消了资本积累、取消了资本主义的奢侈消费和过度消费，新社会就可以马上大幅度缩短全社会劳动者的平均劳动时间；以后，再逐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进一步缩短劳动时间，直至最终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从而消灭社会分裂为阶级的物质基础。这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第四种路径，也是阶级社会走向消亡、人类走向解放的唯一路径。

# 《共产党宣言》讨论

井 冈 山 卫 士

《共产党宣言》写于1848年欧洲革命前夕。我们从中学历史书上都学过，《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深入思考和批判了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与费尔巴哈的朴素唯物主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是斯密和李嘉图的学说）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主要是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改良理论与实践）之后形成的，同时也是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阶级斗争的产物。

这一时期欧洲的阶级格局是十分特殊的。首先，从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角度讲，由于欧洲革命正好赶上了经济周期的危机阶段和长波周期的下降阶段，统治阶级的力量曾经一度十分虚弱。在欧洲大陆的几个主要国家，原本的统治阶级曾经暂时失去政权。但是统治阶级仍然掌握着足以镇压和安抚其他阶级的经济剩余。第二，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成长壮大的现代无产阶级才刚刚登上历史舞台，距离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并且采取明确的革命行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三，在世界市场的扩张和震荡中时而获益、时而受损但总体处在衰落过程中的传统小资产阶级（即自身拥有生产资料并参加劳动的小商品生产者阶级；这一传统小资产阶级现在已经演变为半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注意不要将这一传统小资产阶级与主要由专业技术人员组成、在经济与社会地位上都高于无产阶级的现代小资产阶级相混淆）开始走向分化。除极少数成为资产阶级以外，他们中的多数面临着最终失去生产资料并成为了无产阶级的危险。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写作的纲领。共产主义者同盟原名“正义者同盟”，其主要成员大多不是工业无产阶级，而是处在没落中

的传统小资产阶级（尤其是被机器逐渐取代的裁缝—— 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是从纺织业开始的，而纺织业的产品是当时除了粮食以外最主要的大众消费品）和流亡知识分子。他们当时面对的三条道路也反映了传统小资产阶级的分化。第一，他们可以缅怀旧时代传统小资产阶级的殷实生活，试图阻止历史浪潮淹没他们。第二，他们可以服从资产阶级主导的新秩序，试图在劳动力市场中卖出高价，或者实现“阶级跃升”。第三，他们还可以选择和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站在一起，在解放全人类的过程中解放自己。马克思和恩格斯选择了第三条道路。

既然选择了这一条道路，首先就必须在思想上解决这条道路能不能走通的问题。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系统性地使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马恩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演进的最根本动力。阶级斗争是剥削阶级及其联盟与被剥削阶级及其联盟之间就生产资料的占有、劳动过程的掌控、社会产品的分配、国家机器的职能以及意识形态的主导等等方面展开的争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同阶级掌握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资源也出现此消彼长的态势，从而影响阶级斗争的力量对比。在马恩看来，当统治阶级没有能力维持其在阶级斗争中的优势但又不想放弃统治地位的时候，阶级斗争就会白热化，出现革命形势，从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以往，社会形态的改变并不意味着阶级的消失。在马恩看来，替代奴隶制社会的封建社会是阶级社会，替代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是阶级社会。但是人类的历史，除了是从阶级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螺旋之外还是一个上升的过程。这个上升的过程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于以往的阶级社会。马恩指出，**“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马恩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逐渐从以往各个阶级的合纵连横演变为两大阶级的直接对立，所有的“中间阶级”，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小资产阶级，最终都逃不过无产阶级化的命运。从而一切“中产稳定论”或“纺锤形社会”的物质基础都不复存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竞争优势不仅仅从物质上摧毁了各色“中间阶级”，其对利润的无止境的追求还把原本象征社会妥协的宗教、家庭、学校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一并扯去了，把赤裸裸的矛盾和阶级冲突毫无保留地暴露给了无产阶级。这一切是以往的阶级社会所没有的。

**远航一号注**：从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国家还是在像中国这样的半外围国家，资本主义的发

展都没有简单地导致“整个社会… 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还有着一个人数众多并且占据着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关键岗位的现代小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之下，往往还有着一个数量庞大的半无产阶级或次无产阶级；此外，流氓无产阶级也时不时在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中甚至在政治舞台上发挥无法忽视的作用。从中国革命的经验看，革命的前提未必是整个社会阶级结果的简单化，而是在适当的历史条件下，革命的领导阶级能够审时度势，正确地解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问题，有效地动员起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再将社会的各个“中间阶级”中的大多数尽可能地团结到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作为革命对象的反动统治阶级。未来革命胜利的秘诀，可能仍然来自这里。

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经济危机中，不仅资本家会破产，无产阶级会受苦受难，就连象征资本主义“先进性”的大量消费品和资本品也要被毁灭掉。资本主义不仅不能避免经济危机，而且每一次危机的克服都会为下一次更大的，更具毁灭性的危机创造条件。马恩指出“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即社会化大生产已经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不能相容了。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会加剧阶级矛盾，削弱资产阶级，为新的社会形态取代资本主义提供突破口。

**远航一号问**：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否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表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是否又一定在经济危机中才得到最突出的表现？比如，1968？如果按照资产阶级统计，今天世界经济的总产值与1848年相比可能已经超过了100倍。在今天的条件下，如何理解“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

完成突破的任务就落在了无产阶级肩上。在马恩看来，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而要成为掘墓人，就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无产阶级受苦受难，有足够的动机推翻资本主义；第二个条件是无产阶级要强大起来，

有足够的力量推翻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社会日益分化成两大对立的阶级，逐渐满足了这两个条件。

一方面，**“由于机器的推广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机器越推广，分工越细致，劳动量也就越增加”**。同时，工人**“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种专制制度越是公开地把营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恶”**。总之，**“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

另一方面，**“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和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单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只要工人能够联合起来，**“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

在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意愿和能力都与日俱增的背景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这个令一切剥削者和压迫着都胆战心惊的论断：**“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以下是两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一、马恩认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从过去200年的历史经验看，无产阶级有没有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呢？如果没有，原因是什么？

二、马恩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的趋势，中间阶级将会不可避免地被消灭。这是否符合历史经验？当今中国社会的几大阶级是什么？

**远航一号注**：我们今天学习《共产党宣言》，尤其要注意不要将其作为死记硬背的教条，或者借以“励志”、保持神经亢奋的红色心灵鸡汤。我们要将其作为一部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献来学习，要用过去一又四分之三个世纪中国和外国阶级斗争的实践来检验。马克思提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一伟大设

想，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完成对这一伟大设想的证明。我们学习《共产党宣言》，是要从中寻找到马克思为我们准备的充满智慧的线索，并从这些线索出发，争取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将马克思的伟大预言变为活生生的现实。

# 妇女解放应该在反抗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两个战场”作战

蒸 馏 水

## 一、对井冈山卫士文章的回复[13]

### 1. 女性受到的压迫既来自资本主义，又来自父权制，还是只来自资本主义?

井冈山卫士说“今天中国女性受到的压迫，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造成的，而不是任何超越或者独立于资本主义的‘父权’造成的。”

这涉及到一个问题，女性受到的压迫既来自资本主义，又来自父权制；还是只来自资本主义?

我们可以继续追问，父权制是否“先于”资本主义？如果父权制先于资本主义的话，那么它就不是资本主义的附属品这么简单，因而今天中国女性受到的压迫就不只是资本主义造成的。

首先，父权制的历史远比资本主义的历史更长。人类从父系氏族公社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其实就是父权历史。父权制度下，男子要求长久保持自己的社会权力等级和财产权利，要求有确实可靠的亲子继承财富，要求一种外在的社会标志联系后代。这些要求促成了形式化家庭的诞生。这种家庭对“这一个”两性关系的肯定，否定了其他两性关系的任意结合。它以承认男子的人格和权利为前

13. 此文是针对井冈山卫士一贴的回复，原贴地址：http://redchinacn.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805

提，以封闭妇女为手段，达到嫡子继承财产的目的。父权社会中，两性分工因社会立法在人类生活中两极化了：男子参加经济生产劳动，为家庭增殖财富；女子专事生育，为某一男子传宗接代。自此以后，大部分妇女陷落在家庭生活中，为“打天下”的男人们生儿育女。她们因为缺少和男性一样介入社会事务的机会，始终没有获得应有的社会尊重和地位，不能享有和男人一样的权力。

早在1919年，毛主席便在《女子自立问题》中就谈过：

**女子用其体力工作，本不下于男子，然不能在生育期内工作，男子便乘他这个弱点，蹈瑕抵隙，以“服从”为交换条件，而以“食物”噢咻之。这便是女子被压制不能翻身的总原因。**

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也提到：

**中国妇女所受的压迫形象地概括为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夫权压迫是妇女较男子更多承受的一重束缚，“男子支配”是妇女所受压迫的特殊性之所在。**

**经济上贫农妇女不得不较富有阶级的女子更多参加劳动，所以她们取得的对于家事的发言权以至决定权就比较多一些。**

其次，如果认为女性受到的压迫只来自资本主义，那么就相当于否认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某种程度的连续性，也否认了当代社会中不存在资本主义尚未渗透而残留下的非资本主义的领域。

我们应该认识到，前资本主义的历史比资本主义的历史要长远得多，前资本主义的种种社会关系不可能因为资本主义的到来就即刻全部烟消云散。如果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有与资本主义不相适应的部分，那么也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最后要么被资本主义同化，要么与之产生矛盾不可共存，继而瓦解。虽然资本主义作为社会的主要生产关系，但是这并非意味着社会现存的所有事物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

因此，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女性受到的压迫既来自资本主义，又来自父权制。但二者并不是独立存在的，相反，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相互影响、相互补充。

### 2. 生产与再生产上的解放

这里的生产指物质的生产，再生产指人口的再生产。

我同意“女性解放是劳动人民解放的一部分，劳动人民解放必然与女性解放兼容”，但是劳动人民的解放就必然等同于女性的解放吗？女性解放当然不独立于生产关系，但是也并不只由生产关系的解放构成。

劳动人民的解放意味着消灭了阶级压迫。阶级关系属于生产领域，女性作为劳动人民的一员，和男性一样在生产领域受到资本家的压迫。如果不存在阶级压迫，那么无疑女性在生产领域将会获得解放。

在目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家庭内部的再生产领域中，女性家庭成员普遍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有情感付出的照顾劳动（比如育儿的责任往往由母亲、祖母承担）。这部分再生产劳动中，有些可以货币化、商品化，比如在家做饭改为出外就餐；有些因为包含情感投入不能简单货币化、商品化，比如教育孩子、照顾老人；还有一些因为男女天然生理差异，不可被男性替代，比如生孩子、哺育。因此女性在家庭再生产领域的额外贡献难以与男性带回家庭、与女性共享的货币价值进行衡量。女性在家庭中的再生产劳动无疑影响着其生产劳动，只要与生产劳动存在矛盾的这部分再生产劳动没有得到合理和必要的补偿，那么女性就没有完全获得解放。没有得到合理、必要的补偿的这部分再生产劳动，也是父权制的经济基础。

同时，基于父权制经济基础之上的是落后的父权思想。比如，一种普遍的观念认为女性“天然”应该怀孕、生育和抚养孩子，还包括照顾男性。女性因承担这些“看不见”的额外负担而付出的代价，被看作是应该的。这种落后的父权思想，也是使得女性处于权力结构中劣势地位的因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资本主义占有优势地位的结构。马克思自身也承认，资本主义之中存在小商品生产者及非资本主义的劳动。而父权制的经济基础就是女性在再生产中进行的、非资本主义的、没有得到合理和必要补偿的劳动。

如果消灭了阶级，但家庭依然存在，且家庭内部女性成员付出的再生产劳动没有得到合理、必要的补偿，那么女性在无阶级社会中依然没有获得完全的解放。

如果说，无阶级社会中家庭瓦解，那么就可以论证女性被剥削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但是，这是否意味着父权思想就完全消失了呢？由于文化惯性，父权思想是否仍可能在无阶级社会中延续存在呢？毕竟，在资本主义下，落后小农仍然会参与拐卖妇女这样伤害女性的行为。如果无阶级社会中人口中男女性别比例和当下一样差异悬殊，那么人们是否会在父权思想的影响下从事限制妇女人身自由，乃至伤害妇女的行为？

### 3. 岗位歧视

井冈山卫士对我在讨论跟帖中提出的一些例子做出解释，说明这些例子的根源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父权制。而现实生活中，不论男女都面对父权制的压迫，具体表现形式也是各种各样的，无法穷举。我只针对他的解释做出回应，而一些没有被列出的例子不代表其不存在。

岗位歧视问题不只存在于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这是一个全社会跨阶级跨行业的现象，网上资料和新闻比比皆是，比如《“仅招男性”，女性的就业门槛为何降不下来》http://www.xinhuanet.com/legal/2021-02/19/c_1127112407.htm。

井冈山卫士说“对于一般小资女性和工人阶级女性的就业歧视，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拒绝承担女性必须担负的代际再生产成本。”

这句话中“女性必须担负的代际再生产成本”，就带有父权色彩。为什么代际再生产成本的担负者必须是女性？代际再生产的角色，就这样被井冈山卫士自然而然地被安排在了女性的头上，同时还是在他看来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设想，如果男性成为单亲爸爸，背负及承担了他人生命生产、再生产劳动的话，他们也会沦为“二流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遭到歧视。

如此一来，这里的问题就是有关劳动的性别分配问题，即为何“他人生命生产、再生产”的劳动单单分配给了女性呢？

把女性的生理性别与家庭内照顾角色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自然”的关系，不质疑和不挑战家庭内的性别化分工的这种想法十分普遍，全国政协委员就曾提出“鼓励部分女性回家”的提案。

在毛时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动员妇女从家庭中走出来参加社会性生产劳动，但同时国家还无法全部承担家务劳动社会化的职能，这就造成了职业妇女的双重负担。进入市场化改革以后，生理性别与家庭内性别角色之间的“自然”特性，连累妇女成了一种影响企业效益的“劣”等劳动力，并以“自然”的名义正当化了这种“劣”势，而对于男性化的铁姑娘式的男女平等模式的批评进一步强化了女性的生理性别。

### 4. 资本主义复辟以后的农村家庭对男女后代的资源分配不均

农村女性处于劣势的情况只是在资本主义复辟以后才出现吗？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侧重从经济角度关注与工作相关的妇女问题，并把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指认为资本制度，因此，解放妇女的实践方案就是鼓励妇女进入公共

劳动领域。类似的妇女解放观念同样被实践于中国的革命运动中。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把建立和建设独立的民族国家政权作为目标，并且动员“半数的女同胞积极参加”，但这种动员是以“男女都一样”的方式提出的，而女性的特殊问题和性别要求没有受到特别重视。

从中国共产党在乡村展开的社会动员和经济发展来说，相当程度地借重了传统的家庭结构，也就是说，至少在乡村家庭中，男权中心的性别模式依然存在，女性介入公共领域及其社会地位的提高，往往是在不改变家庭内部的性别秩序的前提下进行的。这种做法虽然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和自主性，但也导致女性的双重负担问题，即在承担社会工作的同时，承担家庭劳动。

由此可见，农村女性处于劣势的情况并不只是在资本主义复辟以后才出现的。

#### 5. 女性被黑社会欺压

每个人都浸润在社会的大染缸之中，受父权制和落后父权思想的影响，部分男性将女性当做玩物、商品，乃至权力的象征。女性的身体随之被物化。

诚然，“黑社会的欺压对象往往是占有一些土地和其他资源的农村家庭，或者城市个体户”，但欺压女性对于成员结构多为男性的黑社会组织而言，无疑还多了一重性权力上的好处，也就是将女性当做玩物、商品来标榜权力。同时因为社会上落后父权思想的影响，女性遭受性侵、性暴力之后，报警往往不是最优选择。即使报警，警察的处理也往往不能切实维护性侵受害者的尊严和利益，因而很容易对性侵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这种社会性的对性侵、性暴力的姑息，也降低了黑社会欺压女性的犯罪成本。

所以我不同意井冈山卫士所说“黑社会掌握的武力并不在乎对方是男性或者女性”。

### 二、对其他相关问题的补充

#### 1. 对“压迫”一词的使用

远航一号提出，“压迫”是用来形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对抗性冲突，而女性受到的不公平、不公正，并不是以消灭男性为目标，所以不是你死我活的对抗性冲突。

我认为远航的这一看法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下是成立的。

“压迫”在词典中被解释为“用权力或势力强制别人服从”。现实中人们对“压迫”的使用，已经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语境，所以“压迫”的词义已经扩大化，被广泛使用于一方受到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的表述当中。

鉴于对“压迫”超出马克思语境的普遍的使用习惯，我在文中还是以“压迫”来表示女性受到的不公平、不公正、压抑性的不平等的现象，但这并不代表女性对父权制度的反抗是敌我矛盾，也绝不代表反抗的结果要以消灭男性为目标。相反，只有团结广大男性，并对具有落后思想的群众进行教育，才能在反父权制的道路上取得进展。

### 2. 反抗父权制对男性的好处

之前讨论中有网友认为支持妇女解放对自己没有直接好处，该网友似乎忽视了男性在父权制社会中所受到的压迫。

从个人层面来说，一些男性成长过程中，周遭的声音告诉他男生不能做这个，男人应该怎样怎样，或者当他感到不能做真正的自己的时候， 他就在一定程度上承受来自父权制中主流“男子气概”的压迫。此外，父权制的压迫还体现在世代之间。家族中年幼男性和年长男性之间可能存在规范、权威、权力分配不均等的情况，比如父亲和儿子之间，父亲以其威严和对家庭经济资料的垄断来胁迫儿子，这也是父权制的体现。如果男性了解女性主义，意识到父权制的问题，那么就会反观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也许问题不是出在自己，而是出在社会性的父权制度。

同时，从社会层面来看，为了争取劳动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进步男性必须支持妇女解放、反抗父权制的斗争，因为没有妇女的参与，劳动人民解放斗争是难以胜利的！同样，妇女为了谋求自身的解放和反抗父权制的斗争的胜利，获得男性的参与、支持和理解也是必不可少的。妇女解放、反抗父权制和人民解放斗争是同一条战线，并不冲突和矛盾。而宣扬和渲染“性别对立”的话语和行为，只会促使劳动人民内部的分裂、分化，对斗争的胜利毫无益处可言，所以我们在舆论场上要打击“性别对立”的言论，强调妇女解放、反抗父权制和人民解放斗争的统一性。

### 3. 作为身份政治的“女权”和作为知识的女性主义（又译女权主义）

在传播过程中，“女权/女权主义/女权主义者”也可能成为一种符号，成为像左派中的“网左”那样的角色。我们应该把符号化的“女权”和作为知识的“女性主义”

做以区分。也许有人会用“女权”标签来进行身份认同，或者通过贴标签的方式来进行攻击，但是其背后的意思很可能与女性主义知识或世界观毫无关系。有人也可能说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来获得金钱、名望、 优越感等个人利益，或者用这个身份进行投机（也就是成为“女利”）。

同时，因为网络骂战和“女拳”引起的性别对立，不少人对女性主义有误解，并不了解女性主义知识，也不愿去了解。左派当中女性较少的现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左派中女性声音较少、女性视角不足的问题。为了克服性别议题的女性视角短板，同志们可以采访自己的母亲或身边的女性，来超越自己的经历所限，帮助自己更加具体地理解女性的遭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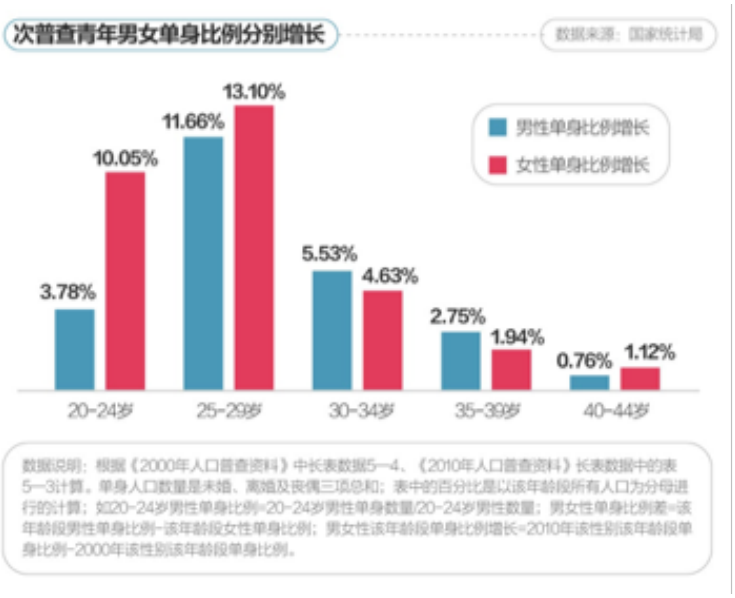
## 三、女性的反抗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不以我们个人喜好和意识为转移的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这一规律也同样适用于女性对抗父权制及其思想的战场上。这主要体现在女性为避免不公平的再生产劳动而不愿意组建家庭和生育，继而引发家庭瓦解的趋势。当然，这种趋势是反资本主义和反父权两者合力的结果。而家庭的瓦解和父权制的瓦解息息相关，因为父权制对妇女的压迫是以家庭为最小单位的，以剥削妇女“无偿”的家务和照顾等人口再生产劳动为经济基础的。

**“劳动阶级不间断的持续和再生产仍然是资本再生产的永久性条件。资本家为了满足这一条件，将此依靠于劳动者的自我保存本能和生育本能”**。如果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家庭有瓦解的趋势，那么马克思所认为的生育是劳动者的本能，就是不贴切的。而丧失了这种“本能”的劳动者，

### 1. 单身比例上升

目前，全球范围内单身人群的比例呈逐步升高的趋势，随之而来的还有持续降低的结婚率和生育率。在欧洲一些国家的主要城市，一人家庭的比例超过50%。这一现象甚至正向中东和南美洲等偏向保守的国家和地区蔓延。中国的单身人群数量也不容小觑。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的单身成年人口达2.4亿人，其中有超过7700万人处于独居状态，预计到2021年，这一数字会升至9200万人。




**2. 结婚人数减少**

《经济学人》曾发表过文章指出“性别化的家庭角色和不平等的家务分工”是亚洲女性排斥婚姻的罪魁祸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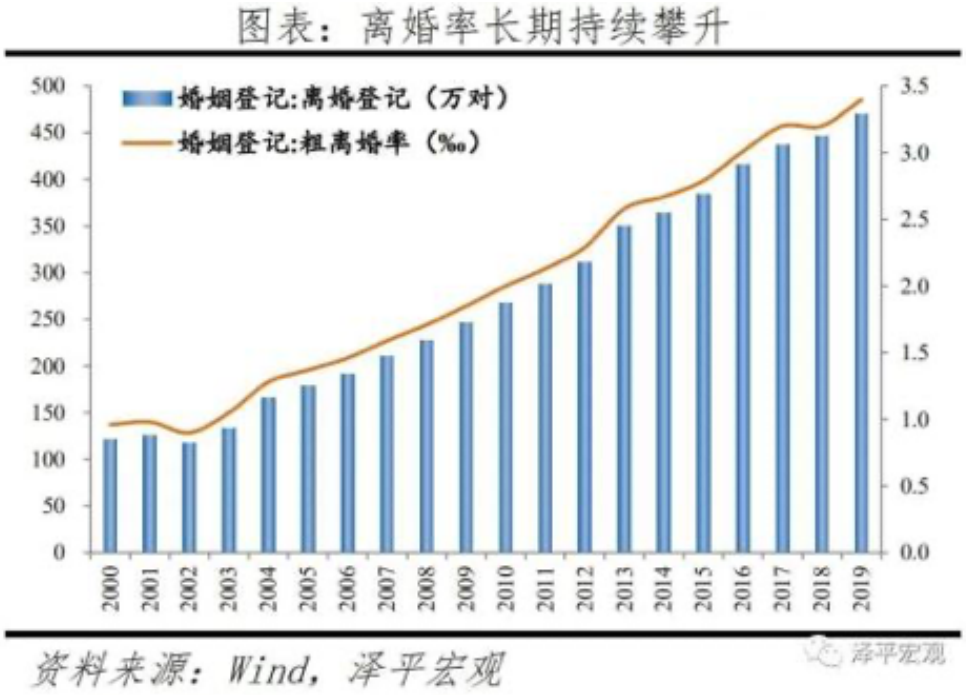
民政局数据显示，2010-2020年我国结婚登记人数总体上呈现减少的趋势。2010年，结婚登记人数为1241万对，2011-2018年均维持在1000万大关，但2019年开始下滑至927.3万，而2020结婚登记人数仅为813万对。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继2019年跌破1000万对大关后，又跌破900万大关。



### 3. 离婚率攀升

离婚对数和离婚率长期持续攀升。1987-2020年，我国离婚登记对数从58万对攀升至373万对。1987-2019年粗离婚率从0.5‰攀升至3.4‰。




### 4. 女性晚婚晚育

1990-2015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平均生育年龄（所有孩次）从24.8岁推迟至28.0岁。1990年主要初育年龄、主要生育年龄均为20-27岁，生育一孩数、生育子女数占比分别为86.6%、74.9%。而到2015年，主要初育年龄推迟至22-29岁，且生育一孩数占比降至66.7%；主要生育年龄推迟至23-30岁，且生育子女数占比降至59.1%。并且，1990-2015年30岁以上高龄产妇的生育一孩数占比从4.2%增至近19.2%，生育子女数占比14.0%增至32.3%。

### 5. 出生率下降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末，全国人口14126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出生率为7.52‰；自然增长率为0.34‰。全国而言，

去年全国的人口出生率为1949年以来最低，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961年以来首次降到1‰以下。




家庭瓦解的趋势——解释：

第一，家务劳动的众多部分逐渐被商品化；

第二，市场越发需要女性的雇佣劳动（可能是建立在父权思想的基础上，比如认为女性更具有关爱者的特质，因此更适合照顾工作；女性工资比男性更低）。根据布雷弗曼（Braverman）的说法，这就是“资本主义使家庭分崩离析的长久以往的不可逆的过程”。当女性不需要依赖男性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时，她们可能会选择晚婚或者不结婚，因为“一旦结婚，她们的主要任务就变成照顾家庭，无论她们是否还从事全职工作。一个日本女性每周需要在办公室工作40个小时，此外还要花费30小时在家务上。而她们的丈夫只做3小时家务。”

家庭瓦解的趋势——争议：

第一，如果兼职家庭主妇一劳动者的存在对资本主义是最为有利的，“双重劳动”下对女性的压迫（作为无偿家务劳动者的女性，其非资本主义式特征决定并加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雇佣劳动者所遭受的歧视）问题，就越是不得不承认在劳动市场中性这一要因所发挥的作用。因此，并非资本主义决定家务劳动，反而是家务劳动决定了资本主义下的女性劳动。

父权制式的资本主义（patriarchal capitalism，即贯彻性统治原理的资本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式的父权制（capitalist patriarchy，即由资本主义统治的父权

制）出现。各种理论百家争鸣，如女性的“劳动力预备军”论说、“职业性隔离"（job segregation）论说、"双重劳动市场"（dual labour market）理论等等，这反倒越发印证了在资本主义之下，作为集团的男性（不论阶级）对作为集团的女性进行剥削的这一性统治机制。

第二，资本主义究竟是想要维系私人家庭，还是最终想要使其解体呢?

资本家并不希望出现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但资本主义的发展，雇佣劳动的深入，不可避免地塑造了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至于庞大的工人阶级何时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则取决于诸多客观因素。

类似的，即使资本主义希望将再生产的责任外包给家庭，从而减少其成本，但随着妇女越来越多进入劳动力市场，在精力和时间被生产活动“榨干”的情况下，家庭内部再生产无疑会出现商品化的情况。这就会导致劳动人民生活成本的增加，进而引发上涨工资的要求；或者劳动人民以不婚不育来躺平斗争，那么人口的再生产就会受阻，进而导致剩余劳动力减少、无产阶级话语权增加、对资本家资本积累不利的后果。

因此，这也再次说明劳动人民解放斗争和妇女解放斗争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客观上给了女性反抗父权制、不婚不育（躺平斗争的一种形式）并从“无偿”的再生产劳动中逃脱出来的经济支持。劳动妇女的加入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壮大，躺平斗争有助于增强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而这些都削弱和打击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 四、对未来情况的预测：拐卖、买卖婚姻的增加

### 1. 单身男女城乡分布不均

因为不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所以在单身比例方面也存在不同。

从普查数据来看，20-29岁城镇男性单身比例最高，在30岁及以上男性单身比例中，农村地区是最高的。20—29岁城市单身男青年比例最多、镇次之、乡村最少，30—44岁乡村单身男青年比例最多、城市次之、镇最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单身未婚：“剩女”和“剩男”问题分析报告》显示，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农村女性大量流入城市，在某些第三产业非常发达的市，甚至于女性农民工人口数量还超过了男性农民工人口的数量。

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女性会选择和城市或镇里的男性结婚，而偏远山区或经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没有对象的男性将会成为“结婚难”的群体，单身比例也就更高一些。

与男性不同的是，在20~49岁，城市女性的单身比例要明显高于镇和乡村。据婚恋网站发布的《单身人群现状系列报告》显示，随着物质经济发展，女性对男方的经济要求也水涨船高。大城市的单身女性比例比较高，大部分为白领人群，有很好的工作，在生活上可以完全独立，这就直接导致了她们对另一半的要求也更高，从而“脱单”更难。

这一点和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情况类似，未婚男性多集中在农村地区，且分布在各个年龄组；而未婚女性更多集中在城镇地区。

### 2. 男女性别比例失衡

2019年全国总人口性别比为104.64，每100个女性中对应的男性多了4.6个人。由于我国人口总数大，多出来的男性达到3164万人，相当于马来西亚的总人口。

那么造成中国男女比例失调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有以下4个原因，女婴漏报瞒报，重男轻女的思想，养儿防老的观念，计划生育。不难看出，这些原因都和根植在社会层面的父权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乡村男性单身比例较高、男女性别比例失衡这一事实出发，具有落后思想的男性可能会选择通过拐卖、买卖婚姻来“脱单”。拐卖和买卖婚姻会极大地威胁女性的人身安全和自由，到时不排除女性群体自发形成自我保护组织的可能。

## 五、结语

“女权主义的问题不是‘女人和孩子’的片面性问题，而是重新回顾整个人类历史的全局性问题”。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即便父权制的经济基础有随着家庭的瓦解而瓦解的趋势，这也不代表反抗父权制和父权思想的斗争是不必要的。鉴于权利是争取得来的，反抗父权制的斗争依然具有进步意义。

因而妇女解放斗争应该在反抗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两个战场”作战。妇女反抗的是带有父权社会关系和父权思想的整个社会，是在经济领域、文化领域、政治领域的全面反抗。它向几千年的传统意识、道德和法律挑战，在本质上，这是对人类存在方式的又一次伟大变革。

对左派而言，要承认女性受到压迫后的自觉式运动；对女性主义而言，女性主义者的革命不仅仅是心理和文化的斗争，还必须是颠覆“父权制物质基础”的实体性革命，也必须是与无产阶级同舟共济反抗资本主义的解放斗争。

# 对女性受压迫讨论的补充和回复

井冈山卫士

首先谈一谈一元论和二元论的问题，一元论和二元论的讨论归根结底是关于女性受压迫根源的讨论。

自由女性主义是一元论，他们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女性没有获得资产阶级法律意义上的人权。因此女性解放就是女性从臣民解放为公民，从二等公民解放为与男性在法律意义上平等的公民。

激进女性主义也是一元论，他们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父权制。激进女性主义流派繁多，他们认为的这个父权制既可以是生理结构的不同，也可以是社会“规训”的不同。如果是社会规训的不同，那么女性解放就是打破父权制的社会规训。如果是生理结构的不同，那么男性和女性归根结底就是不同物种。但无论如何，激进女性主义打破父权制的手段是女性形成跨阶级的联盟（sisterhood）来对男性进行不分阶级的讨伐。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就我个人的认识来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恩格斯、倍倍尔、蔡特金等对女性解放的认识并没有明显超过自由女性主义的范围。他们描绘的女性解放道路基本围绕着女性参加（由化石燃料驱动的）机器大工业，获得与男子对等的经济地位。如果资本主义也被推翻了，女性也可以在工人运动的保护下巩固已经取得对等地位。当然，女性政治参与也包含在内。

在十月革命胜利的背景下，苏俄的女性主义在斯大林时代以前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典型代表是柯伦泰。柯伦泰第一次系统地分析了再生产劳动，并且认

为只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才能同时实现再生产劳动的集体化和自动化，从而将女性解放的内涵从市场推进到家庭。

然而，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在西方核心国家取得成功。尽管部分地实现了自动化，但是集体化显然实现不了。针对这个问题，核心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上世纪50到60年代展开了“家务劳动大辩论”。其辩论的重点在于家务劳动的性质及其与女性受压迫的关系。其中一种观点就是蒸馏水提到过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产劳动是资本主义大生产，再生产劳动是前资本主义小生产；生产劳动服务于资本积累，再生产劳动服务本质上是原始积累；生产劳动是卖，再生产劳动是抢。再生产劳动是资本主义未能充分渗透的领域。所以，生产劳动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剥削，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再生产劳动是前资本主义性质的剥削，由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不过，就算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进行了这种区分，他们仍然是一元论者，即生产劳动（直接表现为工人被资本家剥削）是生产关系的一部分，再生产劳动（在一些人看来可能表现为女性被男性“剥削”）也是生产关系的一部分。唯一的不同是两者服从不同的生产关系，但这显然不构成独立于生产关系的“父权制”这第二个“元”。

对比五六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激进女性主义称之为独立于生产关系的“父权制”，大体对应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女权所讲的在家庭领域的“前”资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两者的不同在于，激进女性主义的“父权制”被他们理解为超越生产关系，超越阶级结构，从而也不可能服从阶级分析的事物。而且“父权制”不仅最直接的社会权力来源，还能决定生产关系。而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眼中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毕竟还算是生产关系的一种。

面对这样的尴尬局面，以哈特曼为首的一些进步学者就创造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这一学派，既承认生产关系对女性的压迫，又承认独立于生产关系的“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仿佛这样就能吸取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激进女性主义的“父权制”分析两家之长。这也是女性主义辩论中一切“二元论”的来源。蒸馏水引用的上野千鹤子也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

就我个人的观点（如有错误，请大家指正）看来，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二元论”与其说是女性主义研究的突破，不如说反映了女性主义研究在最根本问题，即女性受压迫根源问题上的停滞。这种停滞集中体现在生产关系这一个“元”和父权制这另一个“元”的关系上。由于对父权制、家庭和女性受压迫的历史缺乏全面的认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最终只能得出既是A又是B，这也可以那也可以的结论。在学术上自然可以自成一派，但是在现实斗争上这种“二元论”就带来的相当大的破坏作用。承认这种二元论，就意味着承认男性和女性劳动者在阶级关系上是同

盟，因为他们都受到资本主义压迫；在性别关系上是敌人，因为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是跨阶级的。但我们都知道，斗资本主义困难，斗劳动男性容易，尤其当劳动男性和劳动女性之间实际并不存在普遍的性别压迫和等级尊卑，从而劳动男性实际上缺乏反制手段的时候，斗劳动男性就更加容易。最终这种二元论在逃避强敌，选择弱“敌”的时候最终会不由自主地退缩为一元论。但是保留下来的这一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而是激进女性主义的一元。

那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绝大多数一般劳动男性不仅在主观上，而且在客观上都没有压迫剥削女性的行为，忽然之间就成了斗争对象。这对于本来生活优越的核心国家小资男性来讲自然没什么，反正是多搞些自我忏悔的行为艺术罢了。但是对于本来已经背负沉重负担的中国劳动男性而言，这针对他们的“第二元”的斗争显然只会把他们推离女性解放的方向。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中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部分也逐渐被不讲阶级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取代。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最终走向一个令人遗憾的结局：到头来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发现，父权制的第二“元”归根结底是性别形象“符号”，资本主义的第一“元”归根结底也是阶级形象的“符号”。而这一切已经和接受后现代思想“改造”的激进女性主义没有区别了。用形象的话讲，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成了从激进女性主义到激进女性主义的最漫长、最痛苦和最没必要的道路。

那么一元论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就到此为止了吗？当然不是。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年鉴学派、依附学派和最终世界体系理论的成熟，马克思主义对何为“资本主义”的理解也极大地扩展了。以此为基础，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也充分理解了再生产劳动的本质。

资本主义并不需要自由市场、雇佣劳动、商品生产和大工业四个因素（有些人恐怕还要加上代议政府）在同一个地理空间内凑齐才能存在。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以资本积累为唯一目的的生产方式，而且资本积累是通过不平等交换等机制在整个世界体系层面上存在的。因此，只要能够促进资本积累，只要条件合适，无论上述几个条件是否凑齐，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比如，南欧向包买商供货的农村家庭没什么自由市场；北美奴隶种植园不是雇佣劳动；东欧农奴村社中的绝大多数劳动不直接是商品生产；全世界从未被消灭的小业主也不从事大工业，但这些都是特定环境下，特定阶级力量对比条件下对资本积累最有利的劳动组织形式。

那么，什么是适合资本积累的再生产关系呢？我们知道，资本积累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是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剩余产品的生产和积累过程。因此，要想加速资本积累，就必须要一方面增加剩余的总量，另一方面增加生产资料在社会

总产品中的比例。这就需要资产阶级掌握劳动过程，将不符合劳动过程的思想、民俗、生活习惯乃至家庭结构消灭。家庭内部劳动的小生产并非是前资本主义的特征，而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并被资本主义充分塑造的分工方式。今天的原子家庭就算在核心国家中也只有一百年出头的历史，这是与资本积累的需要相适应的。家族太大，内部就能形成相当程度的分工，因此不会特别依赖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资本家难以从中剥削剩余价值。家庭太小，以至于人人独居，就会造成再生产劳动的高度商品化，从而增加工资成本。对于资产阶级来讲，既想要迫使劳动人民为其工作，又不想支付太高的再生产成本，就必须把家庭规模限制在一个不大不小的水平，今天的原子家庭就是保证“可持续剥削”的最佳水平。关于资本主义摧毁西欧中世纪的女性地位，剥夺女性的知识和技能，建立适应资本积累的再生产关系，可以看看费德里奇的《Caliban and the Witch: Women, the Body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举个例子，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无产阶级无论男女都是没有家庭的。他们的每日再生产基本上是在酒馆，代际再生产要么没有，要么相当随意。很多时候，工人阶级母亲给孩子喂的是鸦片而不是食品，因为喂鸦片孩子就睡了，不影响工作，喂食品孩子就会有能量哭闹。这样，资产阶级付给工人的工资中就包含了支付给酒馆店主的利润，而且英国工人阶级的数量折损飞快，以至于引入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工人都不能满足需要。这些在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都有论述。英国资产阶级为了可持续性剥削本国无产阶级，同时防止他们在酒馆中道德败坏削弱劳动纪律，开始主动拿出一部分剩余建立早期的福利国家。随着英国无产阶级逐渐获得了工人贵族的地位，他们也在资产阶级的引导下建立了“原子家庭”。而原本由酒馆店员和市政工人提供的再生产劳动这才转移到了工人阶级妇女的头上。

“家庭”和“市场”、父权制和生产关系、女性受到的特殊剥削和压迫以及劳动人民受到的一般剥削和压迫从来不是相互独立的。后者服从前者，一切时代的再生产关系和再生产秩序，在劳动人民反抗能力的界限之外，归根结底是生产关系决定的。在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只关心他们塑造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计划是否成功，是否有效提高了利润率。至于是谁来从事生产劳动，谁来从事再生产劳动，资产阶级不关心。蒸馏水说：“如果男性成为单亲爸爸，背负及承担了他人生命生产、再生产劳动的话，他们也会沦为‘二流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遭到歧视”。没错，如果“单亲爸爸”成为普遍现象，那么男性均衡工资肯定会下降。

在资本主义时代，中国的一切性别之间的大范围存在的不平等，无论是家庭内部还是外部，归根结底都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物。在现实中，形式上看起来是“父权制”或者“前资本主义”的对女性的压迫，其实质内容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首先，在就业市场上的歧视是因为女性需要担负再生产成本。这是个既定事实，并不是我们“物化”女性的结果。女性承担的代际再生产会频繁地打断雇佣劳动，中国资产阶级又想要绕过资产阶级法律规定的女性产假补偿，因此就必须先把女性劳动被打断造成的成本以低工资的方式让女性工人预先垫付。而白领就业市场上对女性婚恋状况进行审问的目的，也是资产阶级不想“突然”承担产假成本或者“突然”需要替孕妇寻找替补的成本。就像黑人只是黑人，只有到了殖民者手里才称为奴隶一样，女人只是女人，只有在对抗性和剥削性的生产关系中才会成为“二等劳动力”。女性的生理结构，尤其是生育和抚养人口的生理结构，在没有剩余产品也不以剩余产品为目的部分母系氏族社会里是受人尊敬乃至崇拜的对象。只有到了阶级社会，尤其到了个别资本家总想多吃独占别人的再生产劳动而资产阶级国家无力或不愿妥协的资本主义社会，女性才彻底成为不完美的“物”，成为“二等劳动力”。

蒸馏水说“代际再生产的角色，就这样被井冈山卫士自然而然地被安排在了女性的头上，同时还是在他看来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在无性生殖技术得到广泛运用之前，女性确实是负担了多数代际再生产的劳动。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代际再生产劳动才会一方面具有直接的压迫性，另一方面又间接成了资本家压制女性工资的手段。

第二，资产阶级的部分代表提出了让女性回家的言论。这表面上看起来是中国的“前资本主义”的特征。在部分小资眼里，这显然政治不正确，在一些左翼人士看来，这也是中国存在非资本主义“父权制”的“证据”。其实，让不让“女性回家”本质上是中国资产阶级长短期利益的抉择。让女性回家，意味着减少现在可用的劳动力数量来增加未来的劳动力数量，倾向于资产阶级长期利益。不让女性回家，意味着保留现有的可用劳动力水平，但是放任低生育率继续发展，倾向于资产阶级短期利益。从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表现来看，他们是既想要短期利益也想要长期利益的，所以这个“让不让女性回家”的争论最终回在反复拉扯中被淡忘。理由很简单，今天的中国资产阶级在面对重大决策的时候，通常都会什么都想要，然后选择不决策。

第三，女性被黑社会欺压的问题。中国是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国家机器是孱弱的。黑社会是部分资产阶级成员在国家机器的中自己组织的实质上的政权机关。在许多地方，黑社会政权机关的性质是得到资产阶级正规政权部分承认的。在镇压“群体性”事件的时候，黑社会就经常穿着协警的服装去干正规政权机关不好经常干的脏事。中国的黑社会体现的是劳动人民于基层非正式政权机关的矛盾，这是阶级矛盾的一部分。黑社会能够欺男霸女和警察的纵容姑息，并不是因为他们有独立于中国资本主义的“父权”目标，或者“落后父权的影响”，更不

是因为他们是男人，而是因为这本来就是半外围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一部分。我们不会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中都是日本人就憎恨普通日本劳动人民，同样我们也不能黑社会中多是男性而把黑社会欺压人民群众的阶级矛盾算在男性头上。在网上的讨论中，激活说：“看见这些评论，感觉仿佛是我打的人”，蒸馏水回复到：“看见这些视频，仿佛是我被打了”。两者都是真情实感。但是就算是真被打了，也不是激活打的，更不是绝大多数正直善良而且同样憎恨黑社会的劳动男性打的。

当然，劳动人民中也有歧视女性的落后分子，但是他们歧视女性乃至不公正对待女性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男性，而是因为他们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盲目服从。但这无论如何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与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欺男霸女的敌我矛盾不是一回事。就应当以团结为目的做有技巧的斗争。而这种斗争中最有力的技巧就是联合绝大多数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尊重劳动妇女的普通劳动男性，一起对落后分子进行批评说服。如果我们上了资产阶级的圈套，认为唐山黑社会打人事件反映了跨阶级的男性对女性的压迫，那么就算我们争取到了劳动男性的支持，这种支持也不会长久。任何由负罪者的道德自责维系的同盟，最终都会走向负罪者的自我牺牲，走向负罪着利益的对立面，因而必然是不长久的。

#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学习笔记

远 航 一 号

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发表。《资本论》篇幅浩大，许多内容抽象而艰深，不适合工人和一般读者阅读。1868年9月，在一封通信中，恩格斯向马克思提出，迫切需要一部通俗大众版的《资本论》以便向工人阶级读者传播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否则，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学说就会趁虚而入。马克思赞同恩格斯的看法并且建议恩格斯自己撰写一部阐述《资本论》主要观点的小册子。

1876年，为了与德国“社会主义”理论家欧根·杜林论战，恩格斯撰写了《反杜林论》。1880年的3月至5月，保尔·拉法格将《反杜林论》中的三章翻译成法文后分期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上；同年，发表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法文版单行本。1883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发表；后来许多其它文字的版本都是根据德文版翻译的。1925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首次翻译为中文。

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撰写了前言。在前言中，马克思高度赞扬了恩格斯为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时，欧洲正处于革命的前夜，无产阶级即将登上欧洲各国的政治舞台。与年青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待的相反，在1848年欧洲革命以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快速发展的时期。

一直到1870年的普法战争与1873年铁路投机泡沫破裂后所形成的世界经济危机，十九世纪下半叶世界资本主义长波的扩张期才告一段落。在世界经济长波下降期的初期，各国工人运动一度陷入低潮。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在工人阶级中迅速传播，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成立并且进行着反对俾斯麦当局的斗争，其它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也在酝酿。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发表于世界资本主义进入新的经济与政治动荡、国际工人运动的高潮即将来临但尚未来临的历史时代。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三部分的开头部分，恩格斯用一整段来概括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的日益觉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兆，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恩格斯说，**“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在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讨论中，我们曾经提出过“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或者说生产关系到底包括哪些组成部分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除了谁占有生产资料、谁控制劳动过程、谁占有和支配社会的剩余产品以外，社会劳动的分工与劳动产品的交换是怎样进行的，到底是不是生产关系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与此有

关的问题就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或者说，商品货币关系占统治地位还是不占统治地位，到底是不是影响乃至决定一个社会生产关系性质的一个重要方面。显然，按照恩格斯的观点，作为“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的，不仅包括“生产什么、怎样生产”而且包括“怎样交换产品”。也就是说，“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不仅是所谓资源配置的手段，而且是一个社会生产关系的一部分，从而影响着乃至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其它部分，影响着乃至决定着“产品分配”以及社会如何划分为阶级或等级。

接下来，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曾经说过：**“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但是，要将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应用到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还要跨越许多大大小小的障碍。对资本主义不满的小资产阶级激进知识分子从自身的狭隘眼界出发，无法理解克服这些障碍所需要的条件，主观上又向往着克服这些障碍，于是就形成了种种夸大主观能动作用的幻想。这些幻想，是妨碍今日中国左翼青年进步运动取得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般情况下，资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机器，掌握着影响人们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媒体和教育机关。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所掌握的思想传播的资源，无论在人力还是物力方面都处于极大的劣势。不仅如此，还必须指出，没有证据表明，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或愿意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进步积极分子与常人相比在智力或道德方面有什么特殊的优势。如果是这样，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如何能得到广大劳动群众的衷心拥护并最终取得胜利呢?

在近年的中国左翼进步青年运动中，有相当一部分同志，由于受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团体的错影响，对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的论述以及布尔什维克党的胜利经验产生了错误的、片面的理解，从而认为：只要有一群高度理想主义的、意志特别坚定的、道德品质超出常人的知识青年下决心“融工”，抛弃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正常生活即正常的劳动再生产，一心一意做职业革命家，就可以复制当年布尔什维克党的胜利，创造新时代中国革命的奇迹。

对于这些同志的错误，过去我们已经讨论过，今后还会继续讨论。这里仅仅指出，过去数年的实践证明，没有经过生产和阶级斗争实践的锻炼、仅仅读了几

本书实际上也不掌握多少书本知识的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在阶级斗争的大学堂中并不比表面上没有远大理想、天天面对资本家剥削和压榨的一般劳动群众更加高明。如果某些同志继续幻想走职业革命“融工”的道路，恐怕还要遭到更多的失败，蒙受更多的打击，损失更多的青年。

那么，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道路要怎样才能走通呢？如恩格斯所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中国资本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是一定要灭亡的。但是，这种灭亡的终极原因，不是因为有什么天才知识分子突然发现了“永恒的真理”或者启发愚昧的人民认识到了他们从自己的实践中认识不到的不合理、不公平；而是因为，资本主义自身在客观上存在着的矛盾的发展（所谓“客观上存在着的矛盾”就是不以任何人或任何人群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矛盾）。

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其他的广大劳动群众总有一天是要觉醒并且团结为改天换地的伟大力量的。但是，这种觉醒的终极原因，也不是因为什么天才知识分子、“左青”跑到工人中间，告诉他们资本家的剥削是如何不公平、如何不合理，给他们“灌输”应该搞“政治斗争”而不是经济斗争；而是因为，随着资本主义客观矛盾的发展，这些矛盾终将有一天在绝大多数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头脑中得到越来越充分、越来越正确的反映，使得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从自己的切身经验而不是来自外部的“灌输”中认识到，现存社会秩序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自己而不是资本家是更加有力量的，自己而不是资本家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体。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自从人类社会开始产生分工（也就是一部分人专门从事某一种劳动、专门生产某一种劳动产品）以来，就存在着怎样安排分工以及分别从事不同行业的人们所生产的劳动产品如何交换、如何分配的问题。

在原始社会中，这大致是由简单明了的社会需要以及社会习惯所决定的，比如男性专门从事狩猎，女性专门从事采集野菜和果实并抚养儿童，然后劳动产品由一个部落的人们按照社会习俗共同分享。

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产生，劳动产品不再由社会成员共同分享。但是在家庭内部，劳动分工通常还是根据生产和生活中比较明确、显而易见的需要所决定的，而所生产的劳动产品则或者是通过家庭成员的协商、或者是依照某个主要的成年男性的意见在家庭成员中分享。劳动者家庭所生产的产品，一部分用于劳动者家庭自身的使用，另一部分则以地租、税收、劳役等形式转让给剥削阶级及其国家，并供后者使用。

在整个的前资本主义时代，只有少数生产条件较好、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劳动者才能在满足自身需要并向剥削阶级及其国家缴纳一定的剩余之余，还有一些多余的劳动产品可以拿到市场上作为商品出售。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三部分中解释说：

**在中世纪的社会里，特别是在最初几世纪，生产基本上是为了供自己消费。它主要只是满足生产者及其家属的需要。在那些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地方，例如在农村中，生产还满足封建主的需要。因此，在这里没有交换，产品也不具有商品的性质。农民家庭差不多生产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食物、用具和衣服。只有当他们在满足自己的需要并向封建主交纳实物租税以后还能生产更多的东西时，他们才开始生产商品；这种投入社会交换即拿去出卖的多余产品就成了商品。**

所以，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仅占整个社会生产的一小部分，商品货币关系不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但是，即使在早期的商品经济中，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矛盾就已经存在了。这种矛盾，是由商品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所带来的。所谓“无政府状态”，就是说，在商品社会中没有一个代表社会的统一机关来自觉地、有意识地安排全社会的劳动分工及劳动产品的交换：

**每个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都有一个特点：这里的生产者丧失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控制。每个人都用自己偶然拥有的生产资料并为自己的个人的交换需要而各自进行生产。谁也不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在市场上会出现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他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成本，到底是否能卖出去。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统治地位。**

因为每个商品生产者都是各自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他们所生产的商品加在一起以后，很难碰巧与社会对那种商品的需要相一致。如果总的产量超过了社会需要，那么一部分社会资源（劳动力、原材料、厂房设备等）就被浪费了；如果总的产量少于社会需要，那么对于那种商品的一部分社会需要就得不到满足。

应当说，自从国家以及商品生产和交换分别产生以后，围绕着怎样安排和组织全社会的劳动分工以及劳动产品交换的辩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到底是由某种代表社会的统一机关（在阶级社会中这一般意味着国家）来安排社会分工好，还是由商品生产者通过“市场调节”、通过“竞争的强制规律”在自发的、无计划的

过程中形成事实上的社会分工好？在中国古代，就曾经有过关于盐、铁等重要商品是否应当由国家专营的辩论。

从亚当·斯密以来，所有的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认为，只要政府对经济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任由所有的个人追求自己的私利，在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商品生产者以及消费者追求私利的行动加在一起，就会达到最大程度增加社会财富的效果。

但是，在恩格斯以及十九世纪的其他社会主义者们看来，所谓“看不见的手”不过是社会生产的客观规律还没有被人们认识并加以自觉利用的情况下不得已的产物——**“这些规律是在不经过生产者并且同生产者对立的情况下，作为他们的生产形式的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而为自己开辟道路。产品支配着生产者。”**比如，生产过剩了，商品价格要下跌，一部分商品生产者因而破产，迫使这个行业的商品生产者减少产量或者改行。再比如，生产不足了，商品价格会上涨，从而鼓励这个行业的商品生产者增加生产或者吸引其它行业的商品生产者将他们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转用于生产不足的行业。这样的“市场调节”，在恩格斯和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们看来，不仅是盲目的和自发的，而且是浪费巨大的。比如，原来生产过剩行业的商品生产者纷纷减产以后，又会出现生产不足；或者原来生产不足行业的商品生产者纷纷增产以后，又会出现生产过剩。真正合理的经济制度，不是听任社会生产的规律像人们还没有加以认识的自然规律那样强加在商品生产者头上——只有在经过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经过反复的和剧烈的波动以后才在某种长期的和平均的意义上勉强适合社会对各种商品的需要——而是应该由全社会对已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做出全面合理的统一计划，将这些资源合理地安排到各个行业、恰当地满足社会对各种劳动产品的需要。

如果说，在资本主义时代以前，由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规模还比较小，由此带来的无政府状态的破坏作用也还比较小。但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化”的机器大工业逐步代替了个体的手工业，商品生产的规模迅速扩大，原来劳动者家庭内部为使用而进行的生产纷纷被商品所代替，整个的社会生产商品化了，从而商品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也就成了整个社会生产的状态——**“以前潜伏着的商品生产规律也就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有力地发挥作用了”**。

在资本主义的大工厂中，实行的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分工”，但是调节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相互之间关系的，仍然是自发起作用的市场的“无政府状态”。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

在恩格斯看来，这种“对立”就是反复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危机中，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剧烈地爆发出来。商品流通**

**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工厂内部的生产的社会组织，已经发展到同存在于它之旁并凌驾于它之上的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不能相容的地步。”**

如果没有生产关系的调整，这种资本主义工厂内部有组织有计划的分工与整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冲突必然愈演愈烈，从而导致越来越猛烈的经济危机，直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无法再容忍新的生产力而被炸毁。

但是，即使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恩格斯已经认识到，自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有所调整了。

## 有计划的资本主义?

恩格斯说：**“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抗，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

随着生产资料和交通手段规模的扩大，资本家们不得不越来越多地采取“像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仅仅是股份公司的形式也不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的要求了。几个股份公司在一起建立起垄断整个行业的资本家同盟：**“国内同一工业部门的大生产者联合为一个‘托拉斯’，即一个以调节生产为目的的联盟；他们规定应该生产的总产量，在彼此间分配产量，并且强制实行预先规定的出售价格。”**恩格斯指出：**“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

恩格斯进一步设想：**“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有或者没有托拉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

所以，在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度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又表现为资本主义私人企业内部“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分工”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不可能根本解决这种对立。但是，**“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抗”**（也就是越来越猛烈的经济危机）**“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

而要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就需要逐步地扩大“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分工”的范围，逐步地缩小“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范围”：先是若干个资本家将自己各自占有的生产资料合并到一起，将本来分别由个别资本家各自占有的私人财产合并为公司“法人”的共同财产；再是整个行业的资本家用类似于管理一个企业的、有计划的办法来管理整个行业；然后是作为整个社会正式代表的国家直接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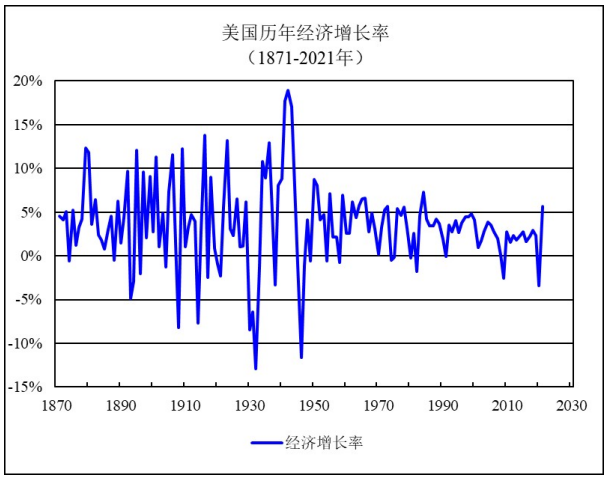
细心的读者读到这里，难免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这样的趋势一直发展下去，最终发展到资本主义的国家对整个社会实行有计划的调节，而资本家阶级仍然占有着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还会发生吗？或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难道不会大大减轻吗？

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并没有正面回答，而仅仅是说：**“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

恩格斯的这一段论述可以帮助说明，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所有制企业仍然是“总资本家”、国家所有制企业中的工人仍然被剥削、资本关系仍然没有消灭。但是，实事求是地说，这一段论述却无法帮助我们理解，既然按照恩格斯自己的逻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那么，为什么随着国家所有制范围的扩大，随着托拉斯那样“有计划”的生产逐步代替“无计划”的生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会逐步消失或者至少减轻呢？

当然，在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出现由国家占有大部分生产资料并实行计划调节那种极端情况。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确实普遍地、大幅度地加强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干预。

下面的图说明了自1871年至2021年美国历年经济增长率波动的情况：



上图说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波动剧烈。在经济繁荣的年份，经济增长率有时会超过10%；遇到经济危机时，则发生猛烈的收缩：1893年，美国经济下降5%；1908年，美国经济下降8%；1914年，美国经济下降接近8%。在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中，美国经济从1929年至1933年累计下降了约四分之一，其中1932年下降了13%。

相比之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大多数年份中，美国经济的增长率一般在0%和5%之间波动；即使发生经济衰退，往往也相对温和。1982年的经济危机是一次比较严重的危机，那一年美国经济下降了不到2%。近年来，美国的经济危机出现了一定的更加严重化的趋势。尽管如此，在2009年，美国经济下降了不到3%；2020年，尽管受到新冠疫情的打击，美国经济的下降幅度也仅比3%多一点。

总的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通过国家干预的加强，至少在像美国这样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再没有发生像大萧条那样特别严重的经济危机，一般的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相比也大大减轻了。

## 计划、市场和经济增长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结尾部分，恩格斯预言：**“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有形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无法摆脱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挥霍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苏维埃政权在国内革命战争中的胜利，终于使得人类第一次有可能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进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的大规模试验。当时，在西方经济学界曾经发生过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否可行的辩论。在辩论中，奥地利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米塞斯、哈耶克等阐述了这样一种观点——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解决不了“信息问题”。

米塞斯、哈耶克认为，现代经济的合理运行、资源的有效配置需要将大量关于各种商品需求和供给的信息充分且有效地收集起来，并传导给生产者和消费者，以便指导他们做出合理的决策和反应。而在“中央计划经济”中，计划当局既

不可能将散落在经济各个角落的各种有用信息充分收集起来，也没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来有效处理已经收集起来的信息。相比之下，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和消费者所了解的一切信息都会在他们关于供给和需求的决策及行为中得到反映，而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共同决定了市场上各种商品的价格。这样，生产者和消费者所了解、所收集到的一切信息就都可以通过价格体系得到集中、充分的反映，价格又会引导生产者和消费者在追逐私利的过程中做出符合整个社会利益的决定。比如，如果一种商品的价格上涨，生产者就会自动地努力增产，消费者就会自动地努力节约对这种商品的使用，促使商品价格回落；反之亦然。所有这些，都只需要生产者和消费者追求他们各自的私利，而不需要政府或者某个专门的机构给他们下命令。

后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又进一步攻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解决不了所谓“激励问题”。简单地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认为，由于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财产都是社会的或集体的，不允许个人发家致富，而且还有充分就业以及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等社会保障——这样，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者既不用害怕丢掉饭碗饿死，又没有发家致富的巨大诱惑，“干多干少一个样”——结果必然导致劳动者普遍偷懒、磨洋工，也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自由派在攻击社会主义时常常说的“大锅饭、养懒汉”。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历史上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的表现：

| | 人均 GDP 指数（美国 = 100%） | | | | 人均 GDP 年均增长率 |
|---|---|---|---|---|---|
| | 1929 年 | 1950 年 | 1970 年 | 1988 年 | （1951-1988 年） |
| 西欧 | 60% | 48% | 68% | 68% | 3.2% |
| 西方衍生国 | 97% | 97% | 97% | 97% | 2.3% |
| 东欧 | 28% | 22% | 29% | 27% | 2.8% |
| 苏联 | 20% | 30% | 37% | 31% | 2.4% |
| 拉丁美洲 | 30%[1] | 26% | 27% | 23% | 1.9% |
| 中国 | 8% | 5% | 5% | 8% | 3.8% |
| 东北亚三国（地区） | 26% | 17% | 49% | 63% | 5.8% |
| 东南亚四国 | 17% | 9% | 10% | 12% | 2.9% |
| 南亚五国 | 11%[2] | 6% | 6% | 5% | 1.7% |
| 西亚 | 18%[3] | 19% | 27% | 21% | 2.6% |
| 非洲 | [4] | 9% | 9% | 6% | 1.3% |
| 世界平均 | [4] | 22% | 25% | 22% | 2.3% |

资料来源：麦迪逊，《世界经济历史统计》

[1]为中南美洲 8 国数据；[2]为印度数据；[3]为土耳其数据；[4]无数据

在1929年至1970年期间，苏联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在此期间，苏联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3.5%。相比之下，在同一时期，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9%，西欧年平均增长2.2%，拉丁美洲年平均增长1.6%，东南亚年平均增长0.5%，南亚年平均增长0.4%。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1950年至1970年期间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3.6%，超过了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世界平均的经济增长速度。然而，1970年以后，由于国内自然资源枯竭、外债增长过快等原因，苏联和东欧经济增长放缓，并于八十年代遇到比较严重的经济困难。

苏联和东欧经济在1970年以前的快速增长表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计划经济的攻击——认为计划经济完全解决不了所谓"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另一方面，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也没有展现出相对于资本主义无可争辩的"优越性"。

就1950年至1988年的整个时期来说。苏联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2.4%、东欧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2.8%，都高于世界平均的增长速度，但是低于西欧、东北亚（日本、南朝鲜和台湾）和东南亚（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至于中国，虽然在1950年至1988年的整个时期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8%，但是在1970年以前的增长表现并不突出。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历史局限性，没有能够防止官僚特权集团的产生和凌驾于人民之上，而在官僚特权集团领导下的计划经济不可避免地带来大量的资源浪费，并扼杀了劳动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

然而，即使设想，在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后，能够真正建立起以劳动人民的高度民主参与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也不能保证未来的计划经济运行在所有方面都尽善尽美。以"激励问题"来说，即使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大多数劳动者都能够自觉地为社会和集体的利益而劳动，总还是有少数落后分子，平时劳动不出力，一有机会就要占社会或集体的便宜。而社会主义社会又不能像资本主义那样，用大规模的失业来胁迫工人，更不能剥夺劳动者的休息权、逼迫大多数工人将劳动时间延长到生理极限。

以"信息问题"来说，即使未来的计划工作完全计算机化，从而得以大大节约对已有数据的加工处理时间，但仍然会有大量的、只有通过具体实践才能积累起来的知识（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感性认识"）是无法数据化的，却是合理的经济计划应当考虑到的。此外，就收集整理经济信息来说，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必须尊重公民的隐私权，因而不能像资产阶级独裁国家那样滥用大数据监控手段。

## “看不见的手”还是“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如上所述，自亚当·斯密以来，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坚持认为，只要政府允许生产者和消费者追求自己的私利，市场经济的价格体系就会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那样引导私人生产者和消费者做出对整个社会有利的决定。

现代的比较“开明”的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虽然认识到现实的市场经济有种种“不完善”并承认政府可以起一定的干预或调节作用，但是仍然迷信所谓“市场经济”是现实世界中最有效率的经济资源配置方式。比如，在反动的十八界三中全会上，中国资产阶级当局就一方面主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又言不由衷地说什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如果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原理出发，所谓市场要成为有“效率”的，价格就必须是“正确”的。通俗些说，一种商品的价格要能够正确地反映这种商品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生产者和消费者在这样的价格引导下做出的决策才能是有利于增进社会福利的。然而，即使按照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自己承认的理论以及经验证据，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格也往往是“错误”的，并且“错误”价格与“正确”价格之间的偏差往往很大，而且往往长时间得不到校正。

这样，就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既然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格往往是“错误”的，并且“错误”的偏差很大，并且得不到纠正，而且马克思主义者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承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追求的是私利并且只追求私利——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这样一大群自私自利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在一大批普遍“错误”的价格引导下所做出的供给和需求决策，不会将经济甚至人类社会引向灾难呢?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确实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避免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样大萧条式的经济危机。然而，资本主义在避免经济大萧条方面的成功，却使得人类社会可能面临更大的灾难。几百年以来在“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驱动下累积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已经将全球生态系统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从而将人类文明的物质基础置于毁灭的危险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仍然被自己所创造出来的生活条件统治着和支配着，仍然没有真正地摆脱动物界，人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反过来作为一种既不受人们支配又无法为人们理解的、异己的力量威胁要毁灭人类自身。

不仅是人们的全面自由发展而且是人类的存续和繁衍，都有赖于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以“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来代替“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只

不过，未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任务，不再是与资本主义比谁的经济增长更快，而是自觉地将社会的物质生产和消费调节到与生态可持续性（即人类文明物质基础的可持续性）相协调的方式与水平，并在此基础上争取实现一切社会成员体力和智力的充分自由发展，开启人们完全自觉地创造自己历史的“自由王国”。

# 野草学社的帝国主义<br>还是列宁同志的帝国主义?

233型酷炫喜羊羊

## 愿与野草学社同志商榷<br>——什么是帝国主义?

野草学社同志对于我的文章提出了深刻、友善的批评，野草学社同志在他的想法中阐述了他对于帝国主义问题的观点，旁征博引，文采飞扬，我深感自己智识匮乏，在下就斗胆针对野草学社同志的观点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希望能够与野草学社同志共同探讨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问题，向野草学社同志多多学习!

### 野草学社的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是一个相对概念，而不是绝对标准。

野草学社同志认为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标准去定义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但「认为帝国主义一定牛逼哄哄」本身就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对无产阶级来说，这个逻辑并不合理。

野草学社同志认为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帝国主义并非“牛逼哄哄”的。

海外资产入不敷出只是证明这个帝国主义很拉，不能证明就不是帝国主义。

野草学社同志有可能认为：1.“海外资产净收入”这一指标不反映帝国主义在海外所攫取的“超额利润”。2.损失巨量的“海外资产净收入”、向外国资本上贡两万亿美元的剩余价值只能够证明这是“很拉”帝国主义，不能证明不是帝国主义。

就像一个帝国主义并不一定非得对外「残」，它也可以对内「残」——只要能保住那帮使得这个国家走向帝国主义的人的位置。

野草学社同志认为帝国主义不一定对外扩张，对内剥削也可以是帝国主义，只要可以确保该国的垄断资产阶级的地位，该国就会走向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不是非得殖民其他国家的。

野草学社同志认为帝国主义可以不一定殖民第三世界。

它能够建立「帝国主义关系」的对象并不局限于国外：它对内表现得就像个帝国主义，它也可以进行通过内殖民来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剥削。

野草学社同志认为依靠国内经济剩余完成的资本积累是“内殖民”，也是帝国主义。

总的来看，野草学社同志定义的帝国主义具备以下特点：

1、“海外资产净收入”可以为负数。

2、可以不一定殖民第三世界。

3、依靠国内经济剩余完成资本积累也算是帝国主义。

## 列宁同志的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资本输出，更加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整个国家打上了寄生性的烙印。**

**在大战前夜，3个主要国家的国外投资已经达到1750~2000亿法郎。按5%的低利率计算，这笔款额的收入一年可达80~100亿法郎。这就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

**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这就是极少数最富国家的资本主义寄生性的坚实基础！**

列宁同志认为帝国主义的寄生性体现在依靠对外资本输出而获得超额利润，由此资产阶级逐渐脱离生产，变成依靠“剪息票”为生的寄生阶层。

**据《英国历史统计》，1913 年时，英国的“海外财产净收入”达到两亿英镑，相当于当时英国国民收入的 9%、英国国内资本家总利润的 60%。**

由此可见，帝国主义确实是获得了大量的超额利润，列宁同志对于帝国主义“寄生性”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已经冒出极少数最富裕的、靠掠夺殖民地和弱小民族发财的、寄生的帝国主义国家，党纲对这一点更强调一些，说得更鲜明一些，也许是恰当的。因为这是帝国主义极重要的一个特点。**

列宁同志认为殖民第三世界是帝国主义极重要的一个特点。

**它们完成这一发展过程，不会是经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平衡“成熟”，而将是经过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进行剥削，经过对帝国主义战争中第一个战败国进行剥削，再加上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

**极少数富国——就独立的和真正庞大的“现代”财富来说，这样的国家只有四个，即英、法、美、德——把垄断扩展到无比广阔的范围，攫取着数亿以至数十亿超额利润，让别国数亿人民“驮着走”。**

列宁同志认为殖民第三世界对于帝国主义为资本积累提供了大量的剩余价值，这是帝国主义的重要特点。

**美国以全球公司为基地的最大的298家公司获得整个国外纯利的40%，而它们从国外得到的利润率比它们在国内的利润率高得多。例如在公司固定资产方面，国外的利润率为26%，而国内仅为9%。那些特殊公司情况更富有戏剧性：1972年联合火炬公司的国外利润率为72%，派克钢笔公司为51%，伊柯恩公司为 53%。**

由此可见，对第三世界的掠夺为帝国主义的资本积累作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

总的来看，列宁同志定义的帝国主义具备以下特点：

1、帝国主义获得了大量的超额利润。

2、殖民第三世界是帝国主义极重要的一个特点。

3、对第三世界的掠夺为帝国主义的资本积累作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

## 埃及帝国主义？

根据野草学社同志的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埃及是帝国主义：

2012-2021年埃及的“海外初级净收入”为-804.003亿美元，是负数。

埃及符合野草学社同志的定义：“海外资产净收入”可以为负数。

倘若埃及与以色列的战争属于埃及的对外扩张，那么埃及无疑符合野草学社同志的定义：可以不一定殖民第三世界。

以非洲的埃及为例，在纳赛尔统治时期，实行所谓“阿拉伯社会主义”，“全面推行国有化政策，实行计划经济……到1963年，从国有部门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国家经济各部门中所占比例看，工业和电力部门达60%，交通部门达75%……国家已经控制82家私有公司将近一半的资产。”

埃及符合野草学社同志的定义：依靠国内经济剩余完成资本积累也算是帝国主义。

因此，根据野草学社同志的定义，埃及是帝国主义国家。

## 印度帝国主义？

根据野草学社同志的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印度是帝国主义：

2012-2021年印度的“海外初级净收入”为-2645.74 亿美元，是负数。

埃及符合野草学社同志的定义：“海外资产净收入”可以为负数。

倘若印度与巴基斯坦、中国的战争属于印度的对外扩张，那么印度无疑符合野草学社同志的定义：可以不一定殖民第三世界。

独立后的印度经济政策倾向保护主义，强调工业化、国家干预劳工和金融市场、庞大的公营机构、监管商业活动、中央规划等。印度独立后初期的经济政策由其第一任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主导，并由其后的英迪拉·甘地继承。不过，1947至1980年期间，相对其他亚洲国家，尤其是 亚洲四小龙，印度经济增长缓慢，更被讽刺为“印度式经济增长率”(Hindu rate of growth)。

印度符合野草学社同志的定义：依靠国内经济剩余完成资本积累也算是帝国主义。

因此，根据野草学社同志的定义，印度是帝国主义国家。

## 多数人压迫少数人？

目前世界人口共有78亿。

中国人口14.11亿，印度人口13.54亿，美国人口3.26亿，俄罗斯1.46亿，日本1.26亿，埃及1.05亿，德国0.84亿，英国0.68亿，法国0.66亿，意大利0.6亿，西班牙0.46亿，加拿大0.38亿，北欧五国0.31亿，澳大利亚0.25亿，荷兰0.17亿。

也就是：根据野草学社同志定义的帝国主义国家+公认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北欧润学天堂=39.03亿，这在世界人口中占比为50%。

而列宁同志说过：

**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1/10，即使按最‘慷慨’和最夸大的计算，也不到1/5）。**

那么，是列宁同志错了，还是当代帝国主义已经由“10%压迫剩下的90%”发展为“50%压迫另外的50%”？

仅仅提一些个人的看法，希望能够与野草学社同志共同探讨这一问题，为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事业尽一份微薄之力。

# 附录：有关对中帝论的批判的批判

野草学社

有人说，我们「赞同并支持」这种「非中帝论」文章，就代表我们真的「赞同并支持非中帝论」。我不会指责这么想的朋友，这很正常，所以我才要专门解释一下我对帝国主义的理解——这正好也是辩证「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这个问题的好机会首先我们要知道，帝国主义是一个相对概念，而不是绝对标准，像文中那样把「帝国主义」理解成「牛逼哄哄」——但「认为帝国主义一定牛逼哄哄」本身就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这是因为这个「牛逼哄哄」就是帝国主义最大的「合理之处」——这也是很多帝国主义者的根本逻辑。当然，对无产阶级来说，这个逻辑并不合理。海外资产入不敷出只是证明这个帝国主义很拉，不能证明就不是帝国主义，就像一个帝国主义并不一定非得对外「残」，它也可以对内「残」——只要能保住那帮使得这个国家走向帝国主义的人的位置。也就是说，帝国主义不是非得殖民其他国家的，它能够建立「帝国主义关系」的对象并不局限于国外：它对内表现得就像个帝国主义，它也可以进行通过内殖民来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剥削——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我想除了个别朋友，不用我来告诉你们吧。我再打个比方，「帝国主义」这个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帝国这个词在英文语境里有对外侵略扩张的意思，在汉语中没有（或者说，汉语语境下，如果不懂帝国主义是什么意思，就根本不知道帝国的侵略扩张的含义是怎么回事）。但是在欧洲，帝国主义这个词是从帝国衍生出来的——因为大家都知道imperial意味着一个民族统治其他民族，那你说imperialism别人都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汉语的帝国字面意思是国家元首，是皇帝的国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经常有人迷惑，美国明明没有皇帝，为啥要叫美帝）——这其实也是此「帝国」非彼「帝国」的一个例子。那么，「帝国主义」不能用「帝国」来理解的话，那怎么理解呢？在这里，辩证法给我们整了一个花活：「帝国主义是什么」不重要，「哪些国家是帝国主义哪些国家不是帝国主义」很重要。发现没？论证什么是「帝国主义」其实就跟伪史论者的陷阱一样，因为这里预设了一种「真正的、纯粹的帝国主义」——但是，看看历史，帝国一定是帝国主义吗？帝国主义一定得是帝国吗？答案

是否定的。让我们再说回历史。帝国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但是在列宁的论述中，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形态，其实在人类历史中还很年轻，也就最近几百年的事情。其中英法成为“帝国”“殖民帝国”就是因为其殖民地体系，征服了诸多国家民族，所以19世纪末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才都符合这个范畴，一直到列宁那个时候，能成为帝国主义的国家都是empire——英语empire侧重于将诸多其他的民族部落国家等纳入势力范围，使其依附，那么列宁所谓帝国主义和英语“帝国主义”的意思是可以相通的，所以后来连意大利都夺取了利比亚，有了自己的「帝国主义」。意大利的帝国主义是冠着「罗马」的名号来的，其实也正是意大利的老祖宗，罗马的屋大维首创了imperator这个词，后来都是各种变形，其概念要么是很强的Superpower，要么是有皇帝的很强的Superpower。所以很清楚，「帝国」和「帝国主义里的帝国」，完全是两码事，用后者对照前者就是一种谬误，因为「帝国主义」之所以是帝国主义，并不是跟「帝国」本身如何，而是它表现出了帝国主义的关系——一旦纠结于「符不符合帝国这个概念」反而不利于理解「帝国主义」本身（这就是辩证法的有趣之处，不是吗？）。说回中国和帝国主义的关系。我的立场是，就算你不认同中帝一说，也改变不了修正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实质，其反动程度不分高下——所以其实我并不在乎老保拼命论证不是帝，而是那些拼命论证不是帝国主义的人其实目的在于否认某些他们不想面对的现实罢了，这些东西他们只能承认其中叫做修正主义的部分，却接受不了叫帝国主义的部分：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两回事——但是其实是一回事。就像现在中国对外宣传都不用「美帝国主义」这个词，只说「砸自己的脚」了，怎么会是呢？（樂）

# 列宁主义的叛徒、当代考茨基
## ——兔梓的冰烙饼

飞机会不会飞

### 对《赛里斯与全球化经济》的批判

兔梓先生的这篇《赛里斯与全球化经济》是一篇很长的文章，文绉绉的，大家看起来恐怕会感到晕头转向，不知所云，我就来为他这篇爽文写一个导读。

开篇，他认为中国“似乎重新走上了凯恩斯主义的老路”，他极为“精准”的概括了他以为的凯恩斯主义——“用大量的货币资本的放出而达到对私企输血的作用”。

接着，他给他认为的帝国主义国家规定了两个特征：“将不再发动狭义的领土战争”、“不断扩大的对外贸易规模和对外投资”，也即：帝国主义进行着和平的实业扩张，实业扩张的结果便是：”整个资产阶级高度合作“的”跨国的产业网络“。

在此，我把《帝国主义论》中引用的关于“考茨基胡诌出来的那个臭名昭著的‘超帝国主义’论”的论述搬过来，供大家与兔梓先生比较：

考茨基说：“……现在的帝国主义的政策会不会被一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所取代，这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将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不管怎样，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新阶段是可以设想的。至于它能否实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前提对此作出判断。”

为了不使兔梓先生说我断章取义，我把他这一段的论述完整的摘出来：

为了达到更高的收益，帝国主义国家将不再发动狭义的领土战争，转而在实业上进行扩张。其主要形式就是不断扩大的对外贸易规模和对外投资。于此，全世界的资本家便经由一些国际组织（例如世界银行，WTO 等等）建立起了一个跨国的产业网络，进而在全世界生产和销售产品。这个网络便是整个资产阶级高度合作的体现。作为一个网络，其规模受制于节点之间的流通能力。而在这个系统中流淌的血液便是信息和被加工物。所以这个网络的存在先决条件有二：信息高速交换能力和跨国物流能力。

有什么区别呢？一眼丁真——鉴定为当代考茨基。

这一“跨国的产业网络”的“整个世界的工业中心”就在中国，接着他就列举了一大堆中国的“超级小镇”并认为这是“国家级甚至世界级垄断的供货商”，这些小镇垄断了啥呢？垄断了：墙壁上挂的油画、被网红塞嘴里咬的打火机、小学生背的书包、过年给小屁孩发的红包、山上挖下来的石头等“尖端工业品”，在他举例的部分，他甚至特别强调了中国对牙刷的垄断：“单牙刷一项，该镇产量 55 亿多支，占全球近 40%、国内85%的市场份额……”他还特地使用了省略号让读者自行想象中帝垄断势力的强大，写作的细节，拿捏了。

讲完中帝对于牙刷的垄断，他就开始论述中帝的垄断资本为什么这么强大。他说，因为“赛里斯依靠密集型廉价劳动力享受到规模经济红利”，而当“赛里斯的劳动力价格已然飙升”之后呢，由于“配套产业链都在赛里斯发展起来了”，中帝就像黑洞一样把外资通通吸进去并且让资本留在国内。

兔梓先生总结道：

这种边扩张边固化产业链本身的举措使得赛里斯成为了一个极其可怕的产业吞噬者，其他国家的实业资本一旦进入赛里斯便再无抽身的可能性（以及必要性）。

随着中帝的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对于西方国家而言“这种恐慌感来的便更加猛烈”，因为中帝“的研究机构已然开始冲击西方国家垄断的壁垒”。同时，“赛里斯的外资企业越来越多”，使得中帝“能够掌握的生产链遍布几乎整个行业”。

那么，外资在华投资建厂是不是西方资本输出性质的殖民剥削呢？

兔梓先生说：不是！

生产外包其实并不需要生产链上游国家对外包方进行实际上的行政控制。这是完全不同于任何一种殖民地经济体制的。

接着，兔梓先生开始介绍他的国际垄断分工理论。由于中帝“对于原材料订单的大量需求”，“让赛国成为了对第三世界第一行业无产阶级的压迫者的一份子”；由于从中帝跑到第三世界“寻找着更加低贱的劳动力价格的投机实业资本家”、“现代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业……作为一个整体盘踞在各个国家之间”。兔梓先生认为这就是“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这种垄断分工的结果是什么呢？西方国家：“从外包生产链上获得最多的利润”，中帝：“通过经营供应链网络赚得盆满钵满”，第三世界的某些资本家：“通过售出原材料成为了暴发户”。西方工人：“面临严峻的实业危机”、“生活却仍然没有起色”；中国工人：“被框进了最大化的压榨之中”；第三世界工人：“艰难寻找活路”。

导致这一切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兔梓先生说：

整个实业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系统性剥削。而帝国主义所做的，便是先前提到过的政治背书（最出名的便是‘一带一路’），通过对大型资本的撑腰而在从中为官僚榨取利润。

在兔梓先生开始尬吹“一带一路”之前，他突然记起自己还没有批判《对“中帝论”的批判》。于是，他开始了一步步暴露自己背叛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想。

兔梓先生认为资本输出对于帝国主义而言是不必要的：

赛里斯作为实业上的全球网络枢纽的地位使得其并非是那个直接达到一定量的资本输出的“帝国”（很多同志便列举出了一串数据——“你看这对外投资比例这么低，垄断程度这么低，算什么帝国主义？！”）

那什么才是必要的？“作为一种姿态而非体量的事实”才是中国帝国主义必要的，什么样的姿态呢？“接过欧美等国的资金与第三世界的原材料成为代工厂，然后反过来输出给相关各国的那个枢纽。”他认为中帝这种“姿态”的扩大“正是对于国外无产阶级的剥削的扩大”，尤其是“低端劳动在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外包的规模的扩大。”

但是，兔梓先生在下一段针对半外围论的批判中，却说“对于赛里斯来说，倚仗全球化的商品和资本的输出都是十分重要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兔梓先生意识到了中国的资本输出完全无法证明“中国是帝国主义”的论断：

许多同志所用的这种统计方法的确能够反映赛里斯这个地缘政治概念在资本输出等相关指标上的确能够部分的反映出赛里斯对外资本输出的疲乏无力。

但资本输出是列宁同志亲自认证的帝国主义五大特征之一，兔梓先生还不敢明目张胆的修正列宁主义，他就只好搬出列宁：

而我们回看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第四章中关于资本输出的论述时，我们其实根本无法找到列宁对通过资本输出瓜分之占比高低来界定帝国主义标准的任何论述，而仅仅是“资本输出对于帝国主义国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不知道兔梓先生是不是患有阅读障碍，无法完整的阅读一本仅有125页的小册子，果真如此，那笔者也不怪罪兔梓先生。

列宁同志在《帝国主义论》中多次强调了**“资本输出对于帝国主义国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惜字如金的列宁同志专门把小册子第四章一整章拿来讨论资本输出，甚至在第九章“对帝国主义的批评”中再次讨论了资本输出，引用了大量材料。而这在兔梓先生看来完全是微不足道的，仅仅是“仅仅”而已。

兔梓先生的转进之术是高超的，比国民党军要厉害。在他发现资本输出无法证明“中国是帝国主义”后，他就说资本输出对于帝国主义而言仅仅是“仅仅”。同样的，当他发现中国非但没有获得超额利润反而向外国资本输送超额利润，他就如同乌克兰资产阶级白军那样“向乌克兰西部，发起冲锋！”

但是，此类文章当中“只有资本输出能够达到超额利润之后才能称之为帝国主义”的论点仍然是一种规模性的论断。这种轻视在《概论》中已经抨击过了，此处便不再赘述。

在发现“资本输出——超额利润”无法证明“中国是帝国主义”后，兔梓先生就如稻上飞一般“益粗不益细”，试图利用中国在海外的“外包生产线”证明中国背着所有人偷偷地获得了超额利润：

而现在，赛里斯的超额利润来源甚至根本不再需要遵循列宁指出的“资本输出”才能达到了——赛里斯的庞大外包生产线能够让既得利益者通过极其细化的产业链顺着薅羊毛。

于是，兔梓先生就开始论述中帝是如何“通过极其细化的产业链顺着薅羊毛”的。他认为中帝薅羊毛有两种层面：“官方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扩张，以及民间在泛东南亚地区的生产链溢出效应。”

兔梓先生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的资、盖的厂、分的包证伪了世界体系论：

而赛里斯的枢纽效应让中心—外围体系发生了一种看似离奇的裂解——赛国作为最大的外包生产承接者将欧美等沃勒斯坦式的中心国家等带动的生产力全数吞下，让中心国家们无法在所有方面如同沃勒斯坦所构想的全面领导外围国家。赛里斯的“半外围”效应带来的便是传统的世界体系理论所无法想象的现状：大宗产品的外包生产实际上造就的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环境中国际间的生产链分工，而这种分工给赛里斯资产阶级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可能。

这简直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判断毫无区别！

在兔梓先生的认知里，中帝是强大的，强大到“让中心国家们无法在所有方面如同沃勒斯坦所构想的全面领导外围国家”。那么，中帝在东亚有仆从国吗？有哪个国家接受了中帝的“全面领导”？恐怕没有吧。出兵哈萨克斯坦的是强大的中帝吗？也不是，反而是学院派认为明天就要崩溃的俄罗斯。佩洛西窜台的时候，中帝又做了什么呢？“谴责！强烈谴责！制裁水果！把导弹丢到海水里！”

既然按照列宁主义根本无法证明兔梓先生的观点，所以，兔梓先生果断把列宁主义丢掉，拿起了他发明的兔梓主义——“我不演了！”

从这样定性的分析来看，赛里斯并非是一个列宁意义上的典型帝国主义国家，而是一个“正在扩张中”的帝国主义国家。

兔梓先生认为，拥有“强大的化工产业”、能够“支撑起绝大部分零件的制造”的中帝通过将“某些低端，简单劳动环节转移向劳动力价格较低的东南亚国家”，建立起了“以赛国为核心的东南亚国家群”。他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东南亚分工体系，并且已经通过这一分工体系从第三世界攫取得到了超额利润：

赛里斯正是通过庞大的外包供应链网络的长尾效应来达成超大规模的制成品输出，进而获得超额利润的。

兔梓先生的国际分工理论由“两个循环、一个枢纽”组成：

赛里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构成一个循环（第一循环），赛里斯向西方国家出口制成品，从西方进口技术、资金以及各种高端服务业贸易；

赛里斯与其他非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构成另一个循环（第二循环），赛里斯向发展中的亚非拉国家出口制成品，从后者进口原材料等。

两个循环通过赛里斯而联系起来。

接着，兔梓先生对“第一循环”展开分析。

根据一些同志总结的《赛里斯国际收支平衡表》等相关数据，赛国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剪息票”帝国主义国家，反而似乎还是被剪息票的买办国。然而，赛国在收支平衡上的负收益说明的正是第一循环当中赛国对于欧美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当中的资本的承接，也就是说，这些资本投资是给赛里斯庞大生产网络下订单的客户之一。

什么意思呢？兔梓先生认为《对“中帝论”的批判》的作者们使用“超额利润”这一概念是错误的，他认为中国向外国资本上贡了数万亿美元的剩余价值并不代表中国是被剥削、被攫取超额利润的，反而是“一种奇特的共生关系”：

这种循环使得赛里斯与欧美国家互相依赖，以至于互相寄生——对欧美巨大的贸易顺差与外国对赛里斯直接投资的剪息票行为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共生关系，以至于在可预见的未来，双方的民间资本的经贸互动仍将秉持这一规律进行。这可以称之为帝国主义之间的合作行为（但不代表帝国主义之间就一定是合作的）。

奇妙吧，某个国家将自己本国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上贡给欧美，欧美获得某个国家的朝贡，这叫做某个国家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合作”。尽管兔梓先生在前面就已经公然抛弃了列宁主义，但是作为马列主义者的我们还是要引用一下列宁同志的论述：

于是，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参与任何企业经营、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确切些说，食利者阶层，就大大地增长起来。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资本输出，更加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整个国家打上了寄生性的烙印。

列宁同志认为，“剪息票”是帝国主义国家剥削第三世界的手段，那些被帝国主义“剪息票”的是受到帝国主义掠夺、受到帝国主义巨头瓜分和扼杀的威胁的国家，二者的关系是对抗性的、尖锐的阶级矛盾。

然而兔梓先生却认为，“剪息票行为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共生关系……这可以称之为帝国主义之间的合作行为。”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兔梓先生认为“剪息票”不是掠夺，“剪息票”不是帝国主义对于第三世界的剥削，而是合作。

这是兔梓先生再一次背叛列宁主义。

中帝是如何剥削第三世界的呢？兔梓先生讲完他的“第一循环”后，开始讲“第二循环”。兔梓先生认为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中帝把产品倾销到第三世界，用中帝生产的“物美价廉的制成品”交换“第三世界的劳动人民在艰苦的开采，种植等重复劳动”。另一种是收“过路费”。中帝在第三世界投资建设的大量基础设施将会为中帝“汲取超额利润”提供方便：

亚投行（AIIB）的设立便是国内资本对于1d1l 供销网络的基础设施（道路，电力，网络等）的建设投资使得未来的赛里斯官僚资本能够通过渠道商与运营商的方式对第三世界的商业活动抽取“平台费”与“过路费”，从而汲取超额利润（而在拉美地区，则倡导“资源-贷款-基础设施”的“合作”方针）。

最后，兔梓先生对于这一国际分工理论下的中国无产阶级做了分析：

笔者认为，赛国的无产阶级在整个全球化当中的位置稍显复杂，既有通过全球化的帝国主义扩张所获取的超额利润对工人阶级的收买与经济增长的收益，也有“买不到物美价廉的产品”的需求困境。

兔梓先生认为，中国无产阶级被超额利润收买了，是“买不到好产品”的工人贵族。

这般强大的中国资本主义是否会灭亡呢？兔梓先生强行给出的解释是：消费不足。为此，兔梓先生特地把“D.罗德里克在《全球化的悖论》中所拓展的基于B.克鲁格曼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上提出的‘不可能三角’模型”搬了出来，确实挺吓唬人的。

他说：“赛里斯作出了十分具有其特色的选择：其放弃了西式民主政治，转而拥抱强政府与开放性的资本合作。”由于中国缺乏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所以中帝的劳动者没有办法表达、实现自己的再分配意愿，“这种诉求上的缺失”（消费需求不足）导致“赛里斯政府对于处理国内的供需断层是无力的”，这就是兔梓先生对于危机根源的解释——缺乏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而导致的消费需求不足。

而本文旨在说明的，便是这次经济危机可能导致的悲观未来——赛里斯高层对于打通供需断层的无力很有可能会使得对于消费的刺激泛善可陈，最终导致某种萧条。而反观赛里斯曾经扛下的金融危机，每一次都似乎有那么一个小小的树枝阻止着赛里斯滑向衰败：农村潜在消费市场，“人口红利”，互联网泡沫。

兔梓先生说，中国资本主义会因为消费不足而灭亡，但又跟大家说，好像只要吃了这样那样的、大大小小的血包就可以克服经济危机，灭亡吗？也许吧，不灭亡吧？好像也有可能。那么，究竟会不会灭亡呢？

兔梓先生在全文最后，如同一位忧国忧民、苦苦思考的阳光伟岸之人那样说道：

然而这次，那个深渊开口的小小树枝，究竟在哪里呢？

兔梓先生的万字长文，看起来像是高深的马列主义，但实际上是貌似神离。据江湖上关于兔梓先生的笑话，兔梓先生曾将毛主席打成“毛修”，选择背叛了毛主义，这次他又紧接着背叛了列宁主义，转向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兔梓先生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皮，实则兜售反动的修正主义学说，看似激进的中国帝国主义论，实际上是鼓吹阶级妥协的反动的考茨基主义，彻头彻尾的学院派反动思想在他的兔脑里已然根深蒂固！

兔梓先生的熊文有一万两千字，可在这一万两千字里，有哪一个字不是在替中国资本主义唱赞歌、费尽心思的要论证中国资产阶级的强大呢？在这一万两千字里，我们只能看到兔梓先生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无比恐惧，看到兔梓先生是如何的渲染中国无产阶级的弱小。

斗争吧？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无法实现再分配的诉求。革命吧？资产阶级还有凯恩斯主义，还有“农村潜在消费市场”，还有“互联网泡沫”，还有一个在观察者网评论区才能看到的“以赛国为核心的东南亚国家群”。

“究竟在哪里呢？”兔梓先生匮乏的兔脑无法支持他进行任何严肃的阶级斗争问题的思考，他看不到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行动正在中国的大江南北发生，他看不到中国劳动人民的阶级觉悟正随着他们自发、自觉进行的勇敢斗争而提高，他看不到中国资本主义的利润率的下降已经不可避免，中国资本主义的灭亡不是可能，而是一定！中国无产阶级必将完成属于她的历史任务！

而我们的兔梓先生，还搁着跟个小粉红一样幻想中国资本主义的永恒盛世，实在是蚌埠。

# 附录：赛里斯与全球化经济

兔梓的冰烙饼

**原作者注**：本文为《兔梓的当代帝国主义概论》一文内容的部分节选，为照顾行文，会对内容有一定增删改以及扩写，具体改动细节参见原文

赛里斯对于经济动荡的应对似乎重新走上了凯恩斯主义的老路——用大量的货币资本的放出而达到对私企输血的作用。要想相对更加深刻地理解最近 30w 人会议的具体含义，我们需要对赛里斯帝国主义在全球经济上的位点做出相关分析。

为了达到更高的收益，帝国主义国家将不再发动狭义的领土战争，转而在实业上进行扩张。其主要形式就是不断扩大的对外贸易规模和对外投资。于此，全世界的资本家便经由一些国际组织（例如世界银行，WTO等等）建立起了一个跨国的产业网络，进而在全世界生产和销售产品。这个网络便是整个资产阶级高度合作的体现。作为一个网络，其规模受制于节点之间的流通能力。而在这个系统中流淌的血液便是信息和被加工物。所以这个网络的存在先决条件有二：信息高速交换能力和跨国物流能力。

在这个大规模协作的网络中，要想成功地生产一件产品，首先要做到的便是告诉所有参与生产的人员究竟要生产什么。而大多数产品作为一个可被拆解的物品，每一个零件的每一个步骤都被尽可能的细化了（笔者了解到，某一个智能音箱的产业链中的其中几环是这样的：外壳塑料原料提炼——外壳生产塑形——外壳电源插口打孔——……）统筹这种极其细化的分工需要甲方（最初的那个）借用强大的信息组织能力才能将所需信息传达至真正的生产者手上。不过，对于一个网络来说，如果各个节点之间的通路距离变短，那么信息传递的速度便会有效地提升（一个冷知识是，投行们通常会把自己的交易服务器选在尽可能离交易所近的位置。这样，计算机便可以在几毫秒的误差中取得投资优势）。所以，在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全球生产链网络最终会将大部分环节整合到尽可能靠近的地

方。即，作为生产环节的工厂将会尽可能的向某一个地理位置聚集。在数十年的工业演化过程中，这个位置最终固定在了现在的赛里斯。

赛里斯官方曾在2020年宣布自己成为了唯一一个国内制造业涵盖联合国全部31个生产大类及其全部细分的国家。在全球超过500多种的工业品里有约220中占据产量第一。虽然笔者对于其真实性和（在真实的情况下）每个产业的质量和全球市场份额存有疑虑，不过的确有那么一些不起眼的城镇成为了国家级甚至世界级垄断的供货商：

深圳大芬村，装饰性油画曾经一度占全球市场上的份额70%以上；湖南省邵东县；注塑打火机占全球市场份额70%，行销美国、俄罗斯、日本等78个国家。不仅如此，中小学生书包销售量占全国份额的70%，红包销售量占了全国份额的70%；福建省南安市水头镇，石材产量占全国市场份额60%；浙江省诸暨市，淡水珍珠年产量占全国80%，全世界的73%；江苏省丹阳市：眼睛、镜片年产量3 亿多，占到了全球的40%，国内市场的70%；同省扬州市杭集镇，酒店用品国内占比超过60%，销售额超百亿元。单牙刷一项，该镇产量55亿多支，占全球近40%、国内85%的市场份额……

以上仅仅是所有所谓“超级小镇”长长名单中的一小部分。关于这些小镇的网络资料零碎而难以寻找，给这些小镇的真实面目蒙上一层薄纱。作为全国乃至全球的主要供应商，这些小镇集中在长三角以及珠三角地带，使南方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轻工业核心。而与此同时，重工业，特别是黑色金属产业，赛里斯从上世纪90 年代开始就在全球的粗钢，焦煤等主要工业品产量上独占鳌头。这种对于全球生产力的荟萃甚至惠及了周边的东南亚国家——一些处在生产链边缘的企业通常将工厂迁往老挝，泰国，印尼等国家以继续享受廉价劳动力带来的红利——也即一种“溢出”现象。在整个地缘政治结构上来看，东亚-东南亚地区早在 5年，甚至 10 年前就已经成为了整个世界的工业中心。

然而，结论不应到此就停下。这种工业在某一个地方的聚集反而是一个国家工业扩张的表现。起初，越来越多的产业在赛里斯依靠密集型廉价劳动力享受到规模经济红利，从而能把成本一压再压。而在之后的发展中，即便赛里斯的劳动力价格已然飙升，绝大多数产业仍然不会选择迁出赛里斯。其原因便是在将近十几年的发展中，所有的配套产业链都在赛里斯发展起来了。企业若是想要迁出，势必会负担高昂的成本：廉价劳动力的训练费、材料从各处运入交通并不发达的东南亚国家内部的运输费用、与当地工会打交道的相关成本，等等。这使得赛里斯的生产集群在吸引了大量资本投入后，依靠对于无产阶级的长期剥削，以及科学技术的自然发展，将这些资本，连同几乎整个工业本身，固化在了国内。恰逢

西方国家的去工业化如火如荼，赛里斯便兴高采烈地收下了除某些尖端技术外的几乎所有第二产业链。

而这种边扩张边固化产业链本身的举措使得赛里斯成为了一个极其可怕的产业吞噬者，其他国家的实业资本一旦进入赛里斯便再无抽身的可能性（以及必要性）。毕竟，任何资本都喜欢一个信息和物质传播成本小，设施配套的“产业园”。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于赛里斯的各种经济封杀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西方国家再怎么去工业化，也不可能把所有事业乖乖拱手让人。特别是赛里斯在扩张的驱动下，让自己的研究机构已然开始冲击西方国家垄断的壁垒时，这种恐慌感来的便更加猛烈。

不过，这种固化扩张的机制能够有效的原因，其实是各地的乡镇资本对于整个乡镇劳动力的集中化剥削，在每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单元”内，“同乡同业”现象使得某一个工业品的细分市场内的合作能力变得极其高效，其给利润带来的增长是资本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寻找到的。而西方国家正在为了解决越来越高昂的国内劳动里成本而寻找下家。所以，赛里斯的外资企业越来越多，西方的工业最终以一种外包的形式转让给了赛里斯。这使得赛里斯把自己的资本能够掌握的生产链遍布几乎整个行业，其规模和门类都在不断增加，而因为“同乡同业”现象，乡镇内可以将生产成本压到新低，于是，各类超级小镇便出现了。这种细分产业上的垄断与一般意义上的殖民其实并不一样——生产外包其实并不需要生产链上游国家对外包方进行实际上的行政控制。这是完全不同于任何一种殖民地经济体制的，只有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才可能做到的全球化的一大特征。

与此同时，第三世界（除开中东石油国家）作为原材料的供给国也发现，赛里斯作为第二产业枢纽的庞大吞吐量能够保证对于原材料订单的大量需求，从而成为一种稳定的财富来源。这种稳定的需求让赛国成为了对第三世界第一行业无产阶级的压迫者的一份子。而在赛国附近的东南亚国家则更加特殊——他们开始逐步接收从赛国的庞大供应链网络中溢出的低端产业链，接收着从赛国向国内涌入的寻找着更加低贱的劳动力价格的投机实业资本家以及其附带的赛国共产管理阶级们。而这种接收正在东南亚国家催生着一种与众不同的扩张形式。

于是，我们便看到了，现代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业已经摆脱了母国的地缘束缚，而更多的作为一个整体盘踞在各个国家之间。这是资产阶级去母国化的一个具体体现，也正是列宁所提到的“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毕竟，整个产业链并不能说被某一个或某几个国家“所有”。但每一个国家，不论是否是帝国主义，在这个网络中的深度参与是毋庸置疑的。对于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来说，他们能够从外包生产链上获得最多的利润，赛里斯的资产阶级通过经营供应链网络赚得盆满钵满，而第三世界国家的某些资本家（多半是矿业等第一产业的所有

者）也通过售出原材料成为了暴发户。然而，各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却饱受不同的苦难：西方国家的实业工人们面临严峻的实业危机，尽管拥有低保，生活却仍然没有起色，挣扎在还贷款和没有储蓄的泥潭中；赛里斯的无产阶级被框进了最大化的压榨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喂饱各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消费者；而第三世界国家的无产阶级仍然在温饱线，瘟疫，和战争中艰难寻找活路。这样的情形，便是隐藏在赛里斯成为了全球工业的枢纽背后，整个实业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系统性剥削。而帝国主义所做的，便是先前提到过的政治背书（最出名的便是“一带一路”），通过对大型资本的撑腰而在从中为官僚榨取利润。

而赛里斯作为一个历史上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种资本共同体内部地位的急速攀升让我们不得不去更加细致的讨论赛里斯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一部分的位置与作用。首先，赛里斯作为实业上的全球网络枢纽的地位使得其并非是那个直接达到一定量的资本输出的“帝国”（很多同志便列举出了一串数据——“你看这对外投资比例这么低，垄断程度这么低，算什么帝国主义？！”）。但正如上文所澄清的帝国主义作为一种姿态而非体量的事实来说，赛里斯的姿态正是接过欧美等国的资金与第三世界的原材料成为代工厂，然后反过来输出给相各国的那个枢纽。从物质意义上，这样的姿态不正是一个囊括各个生产门类的正在扩张的“产业园”吗？更不用说产业链在国外的溢出了——低端劳动在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外包的规模的扩大——也不正是对于国外无产阶级的剥削的扩大吗？

而在简中网络左派当中新近出现的一个关于赛里斯“并非帝国主义国家”的其中一个论点则化用了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提出的“中心—外围”结构——也即赛里斯是一个“半外围国家”。对于这个论点的支撑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赛里斯的资本输出“占比不如美利坚大”。而我们回看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第四章中关于资本输出的论述时，我们其实根本无法找到列宁对通过资本输出瓜分之占比高低来界定帝国主义标准的任何论述，而仅仅是“资本输出对于帝国主义国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而对于赛里斯来说，倚仗全球化的商品和资本的输出都是十分重要的——这将在后文进行论述。许多同志所用的这种统计方法的确能够反映赛里斯这个地缘政治概念在资本输出等相关指标上的确能够部分的反映出赛里斯对外资本输出的疲乏无力。但是，此类文章当中“只有资本输出能够达到超额利润之后才能称之为帝国主义”的论点仍然是一种规模性的论断。这种轻视在《概论》中已经抨击过了，此处便不再赘述。而现在，赛里斯的超额利润来源甚至根本不再需要遵循列宁指出的“资本输出”才能达到了——赛里斯的庞大外包生产线能够让既得利益者通过极其细化的产业链顺着薅羊毛。

而在前文的论述当中，赛里斯枢纽论这个概念被引入，而笔者尝试通过这个视角提供赛里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当中的位置的另一种解释——根据工业革命不

同代际分野的，从地缘政治空间向外发散的非封装式中介。在下文，读者可以看到的是，赛里斯的扩张被分割为两个层面：官方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扩张，以及民间在泛东南亚地区的生产链溢出效应。这两者带来的效应是完全不同的——从盈利上来看，赛里斯的官方扩张并没有能够体现出立时的收益，而民间在越南，泰国等地的产业则正在悄无声息地，以一种全新的生态滋生着。而赛里斯的枢纽效应让中心-外围体系发生了一种看似离奇的裂解——赛国作为最大的外包生产承接者将欧美等沃勒斯坦式的中心国家等带动的生产力全数吞下，让中心国家们无法在所有方面如同沃勒斯坦所构想的全面领导外围国家。赛里斯的“半外围”效应带来的便是传统的世界体系理论所无法想象的现状：大宗产品的外包生产实际上造就的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环境中国际间的生产链分工，而这种分工给赛里斯资产阶级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可能。

从这样定性的分析来看，赛里斯并非是一个列宁意义上的典型帝国主义国家，而是一个“正在扩张中”的帝国主义国家。列宁本人可能会将其定义为“前帝国主义的”发展阶段，但是笔者认为，在对母国剥削-对他国剥削-对母国再剥削的循环当中，国家机器的高强度干涉使得民资的短见性得到了部分的克服，以至于官资与民资能够在扩张过程当中以“用短期换长期”的视角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压迫进行筹划，铺着通往未来的超额利润的路线。而在这个铺设过程中，赛里斯的意识形态输出则正在为铺路工作进行这前期的筹备与宣传，包括孔子学院等意识形态工具先一步于经济发展网络安插在国外，为赛里斯官资话语权在国外的扩张做好了铺垫。不仅如此，民间资本家其实已经开始逐步将扩张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在东南亚缓慢铺开。

首先，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作为全球产业网络的枢纽的赛里斯，作为链接了西方国家和亚非拉国家，成为第二产业大规模外包的枢纽的国家，其枢纽性是如何具体体现的呢？赛国的第二产业枢纽性按照行业来分有着不同的性质，其大体可以按照轻重工业的划分以及工业革命代际的区别来窥视其逻辑：赛国的重化工业在cat 时期的发展下可以说是十分雄厚。这种重化工处理能力带来的便是坚实的轻工业基础。而赛国的重化工业其实相对依赖政府政策以及规模效应，对于后续世代的工业革命的大规模生产打下了基础——大量而便宜的前期粗加工能够很好地处理大规模的多方面生产需求：化工预处理，原材料提纯，零件塑形等等。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打头阵的电器工业来说，这种强大的化工产业能够支撑起绝大部分零件的制造，仅有部分尖端技术仍然以专利保护的形式掌握在欧美等第一世界企业内，以及某些低端，简单劳动环节转移向劳动力价格较低的东南亚国家。在这个分类行业下，占据生产主导的其实是以赛国为核心的东南亚国家群。而来到现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就是信息技术革命时，赛国则是呈现为一种副

引擎的角色——作为信息技术创新主导的美国将高精尖技术研发出来，经过一定时间后在赛国的资本主义需求市场当中不断地迭代，成为能够对目标消费者做出精准定位的各色互联网软硬件产品（这被自由派学者称之为“创新能力”）。这种本土化，市场化的技术转化逻辑在赛国的运用之纯熟，使得赛国在输出这些互联网产品的时候也会习惯性的对国外市场做出调研，进而改变细分产品。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传音（techno）手机公司，这家生产商主打南非（“黑非洲”）市场，能够根据当地文化习惯快速得调整出拥有高抗摔能力，大音量音响，色彩鲜艳的智能手机。传音作为赛国公司一样拥有大量的外包订单，而能够做到这种细分能力与灵活程度的只有赛国基于互联网和强大物流能力的庞大而灵活的产业网络。

# 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
## ——兼谈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问题

远 航 一 号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学说。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为什么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要回答这个问题，仅仅从理论方面来说，无非是要解决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现存社会制度及资本主义为什么必然灭亡；（二）怎样用一个崭新的、无阶级社会（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代替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用一种剥削社会来代替另一种剥削社会、用一种压迫社会来代替另一种压迫社会。

在这篇讨论文章中，我们着重来谈谈第二个方面的问题。自从阶级社会产生以来，各国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就展开了无数的、规模大小不等的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以往这些斗争，为什么在最后都归于失败了呢？自二十世纪初以来，苏联、中国、东欧各国、古巴以及世界上其它一些地方的劳动人民不仅推翻了旧的剥削阶级政权，而且开展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但是后来，这些地方劳动人民的斗争也失败了，社会主义政权被推翻，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个别的，比如古巴，资本主义复辟程度轻一些，但也处于复辟过程中）。

在二十一世纪，我们要开展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要建立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并开辟通往无阶级社会的崭新大道，首先就要努力总结以往被压迫劳动人民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尤其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初步胜利后又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经验教训。

## 社会为什么会分裂为阶级?

在过去几千年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社会为什么会分裂为阶级，特别是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在一切剥削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辩护士和其他庸人们看来，社会分裂为阶级是天经地义的。在资本主义时代以前，剥削阶级往往利用宗教以及所谓“神的意志”来为他们的剥削和压迫辩护。在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小资产阶级则利用种种伪科学理论，比如主张“人性都是自私的”，“富人富有是因为勤奋智慧、穷人贫困是因为懒惰愚昧”，“绝对公平是不可能的”，“贫富差别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等，来欺骗和蒙蔽广大人民群众。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阶级社会只是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阶级，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世上万事万物，都是有始有终的，只要曾经产生，将来就必然消亡，阶级社会也不例外。这种产生与消亡的根源，要到人们的物质生产与生活的条件及其发展变化中去寻找。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三部分的开头部分，恩格斯便说：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在概括地说明了国家在阶级社会中的作用（“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以及未来国家消亡的可能性（“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以后，恩格斯用了一长段文字集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在历史上阶级社会为什么会产生、又为什么会长期存在的基本观点：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派别的头脑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

**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欺诈和蒙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

恩格斯说：**“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按照我们现在对人类起源史的了解，自哺乳动物中的灵长类发展起来以后，由早期古猿到人的进化过程经历了上千万年。智人或现代人类产生于大约二十万年前。在智人早期发展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人类为了生存与自然界展开长期不懈的斗争，物质生产仅能勉强维持当时人们的生存，人口增长缓慢，几乎没有剩余产品。大约一万年前，随着早期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开始出现了比较大量的剩余产品，这就为少数人独占社会的剩余产品也就是为人类社会分裂为阶级提供了物质上的可能性。但是，为什么说，从那时起到现在，社会分裂为阶级是“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呢?

当社会开始拥有了比较大量的剩余产品然而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仍然比较低下的时候，生产各种必需品以及其它物质产品的劳动（这些劳动一般要求劳动者运用自己的体力与自然界的一部分或者经过对自然界的加工改造所生产出来的物质产品发生直接的、物理的相互作用，所以也是“体力劳动”）必然要“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样，只有少数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则往往是极少数人）才能从直接的物质生产劳动中脱离出来，以专门从事为了一个文明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所必不可缺的各种职能: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这些职能往往要求劳动者运用自己的“脑力”，即理性的分析能力，对于人类以往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经过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形成大量的理性材料（往往表现为书本知识）并将这些理性知识用来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所以，从事这些职能的劳动也可以称之为“脑力劳动”。

恩格斯指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就是说，只要存在着上述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从而只有少数人或极少数人可以

专门“**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这些专门掌管社会共同事务的少数人（同时也是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少数人）便不可避免地要在掌握政权以后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暴力和掠夺、欺诈和蒙骗”）“**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

这样的专门从事脑力劳动以及“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的少数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一般不超过整个社会人口的5%，甚至只有整个社会人口的1-2%。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少数人大致对应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一般占整个社会人口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

如果我们用上述的恩格斯关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是阶级划分基础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根据这些国家在革命胜利以后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这些国家所在的社会必然要分裂为阶级。

比如，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并在残酷的国内革命战争中取得胜利以后，当时苏联仍然有大约五分之四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大多数人口是文盲。中国革命胜利后的情况也类似，甚至更加严峻。即使在进行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以后，绝大多数劳动者仍然必须将自己全部或几乎全部的可支配时间（去掉吃饭睡觉以及必要休息以后的剩余时间）用于物质生产劳动。这样，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才能有时间、有必要的教育与训练（教育与训练本身也要占用大量时间）来从事工业管理、国民经济计划、内政外交、司法刑狱、科学研究、文化艺术等“社会的共同事务”。

这些从事社会共同事务的人，一部分是原来布尔什维克党、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但是还有一大部分是在革命胜利后从“知识分子”中提拔上来的，因为往往只有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才掌握开展工业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专业技能。虽然部分原来的老布尔什维克、老共产党员在革命胜利后仍能保持与劳动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革命本色，但假以时日，一部分干部腐化变质，另外一些干部即使没有腐化变质，革命意志也势必日益衰退，而坚持革命理想的干部渐渐老去死去。

以中国为例，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就取消了革命战争年代的“供给制”，代之以等级分明、差距悬殊的“工资制”；军队则实行军衔制。这些变化，将党的领导干部以及知识分子所要求的各种物质特权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这说明，这个时期负责政治与经济管理的领导干部以及负责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以及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已经与广大的工农劳动群众脱离开来；其中，领导干部集团成为一个过渡形态的新的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官僚特权集团），而知识分子集团则逐步发展为现代中国的新的小资产阶级。

## 为什么是资本主义复辟?

只要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就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还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只要少数人专门从事社会共同事务的局面不改变，社会就必然分裂为阶级。所以，按照我们所了解的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物质生产与生活的实际条件，这些国家所在的社会必然要分裂为阶级，必然要产生新的剥削阶级和压迫阶级。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无论革命的领导者怎样坚持理想、发动“继续革命“，只要当时基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不改变，真正通往劳动人民解放的无阶级社会的大门是打不开的。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但是，如果我们同意这一分析，这并没有解决如下的问题，那就是：在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后，这些国家为什么没有出现一种既非社会主义也非资本主义的新的阶级社会，而是几乎无例外地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朝鲜、古巴的特殊情况另外讨论）？

这里说，“资本主义复辟”，就是说，回到了这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以前曾经存在过的社会经济制度。在革命胜利前，俄国、东欧各国、古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虽然都还有着大量封建残余），讲“复辟”问题不大。就中国来说，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一个外围国家。虽然按照传统的看法，革命以前的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注意：这一词组的正确用法是“半殖民地”在前、“半封建”在后），但是在革命前国民经济的现代部门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中国的和外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失败后所发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转变是“资本主义复辟”。

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内部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与计划经济，区别于一般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是在外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着大量的贸易，向资本主义国家购买某些必不可少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特殊原材料，向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出口商品并与资本主义国家竞争。斯大林曾经设想过的独立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外的“社会主义世界市场”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除此以外，社会主义国家还必须防止帝国主义侵略，支援各国人民革命，并与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展开军备竞赛。

所以，在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它们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无法摆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

一些基本运动规律，包括核心剥削外围和半外围的规律，也包括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竞争规律。

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胜利时，大多数（如中国、古巴、部分东欧国家）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外围国家，一部分（如苏联、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在技术与工业发展水平上与核心国家有着巨大的差距。虽然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发挥计划经济的优势可以在局部技术领域争取对核心国家实现赶超，但改变不了整体技术相对落后的局面。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无法在最尖端的技术领域与核心国家全面竞争；相反，在与核心国家的贸易中还不得不忍受不平等交换的剥削。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后期，还不得不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量借债，并支付昂贵的利息。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是工农劳动群众革命的产物，革命后的国家，即使在产生了官僚特权集团以后，仍然要对劳动群众做出相当大的让步与妥协，要向劳动群众提供“铁饭碗”以及廉价住房、免费医疗、免费教育、退休金等广泛的保障与福利。这又使得社会主义国家无法凭借“廉价劳动力”、延长劳动时间等残酷剥削办法与一般的外围和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展开竞争。

除了苏联以外，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然资源都不是特别丰富。这样，社会主义国家也无法像高收入产油国那样靠攫取自然资源的租金来获得充沛的外汇收入。

不仅如此，为了防止帝国主义侵略和支援世界革命，社会主义国家还不得不维持相对于自身的经济规模十分庞大的国防支出，这就进一步加重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负担，也增加了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成本。相比之下，日本、南朝鲜、台湾等美帝仆从国可以在美帝羽翼的庇护下节约大量的军费开支，将更多的经济剩余用于资本积累和开拓世界市场，从而实现了所谓“经济奇迹”。

上述困难积累到一定程度，势必导致社会主义国家无法既满足城市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改善物质生活水平的要求，又满足通过加速资本积累以提高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扩大出口的要求，从而使得官僚特权集团的统治面临危机。

当面临这样的危机的时候，官僚特权集团的“理性”选择当然不是主动取消自己的物质特权、与劳动群众同甘共苦，以挽救社会主义制度（古巴的领导集团部分地做了这样的同甘共苦的尝试，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古巴社会主义为何尚未完全失败），而是在努力打垮工人阶级以后，恢复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或建立一个在世界市场上有竞争力的新的经济部门。

要打垮工人阶级，就必须迫使工人阶级放弃社会主义时代的“社会契约”，砸掉“铁饭碗”，实行医疗和教育私有化，用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险”制度来代替社会主义的退休制度，从而使得劳动力可以“自由”买卖，再用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

来压迫城市工人接受低工资。由于国营企业的工人阶级抵抗斗争最为有力，就要鼓励私人资本、外国资本靠剥削农村廉价劳动力迅速建立起一个新的在世界市场上有竞争力的部门。

为了打败工人阶级，官僚特权集团还需要拉拢城市小资产阶级作为自己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同盟军。在社会主义时期，为了防止优秀的科学和文化人才流落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往往限制知识分子的跨国境流动；通过这种限制，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将给予知识分子的工资保持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显著高于一般工人的工资但是往往大大低于这些知识分子在核心国家同行的工资水平）。

在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官僚特权集团逐渐允许知识分子可以相对自由地在国际间流动或者为外资企业工作，这就使得前社会主义国家小资产阶级的收入水平得以迅速向核心国家小资产阶级的收入水平靠拢。在原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复辟初期，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往往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狂热拥护者。

随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完成，原来的官僚特权集团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新上台的是在攫取原社会主义全民和集体财富基础上暴发起来的新兴资产阶级。这里要特别强调，新兴的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是资产阶级而不是“官僚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这一称呼，在许多左派同志的讨论中经常被滥用，已经妨碍了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复辟后所产生社会的性质以及正确了解未来社会主义革命所面临的任务。

在历史上，“官僚资产阶级”主要是指掌握国家权力的某个官僚或军阀集团以暴力或欺诈的手段，用资本主义剥削以外的方式，来攫取大量财富，并且由此攫取的大量财富一般不再用于生产性资本积累。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官僚资产阶级积累的方式是“原始积累”而不是资本主义积累。这样的暴力和掠夺、欺诈和蒙骗在资本主义复辟、摧毁旧的社会主义全民和集体财产的过程中，确实曾经发挥过相当的作用。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完成，在绝大多数原社会主义国家中（个别目前陷入严重危机的国家，如乌克兰，除外），正常的资本主义积累（通过剥削雇佣劳动来获取剩余价值并将剩余价值中的相当一部分再用于资本积累）就已经代替了主要靠暴力、欺诈掠夺的原始积累，成为这些国家资本家阶级积累财富的最主要的方式。从事一般资本主义积累的阶级是一般资产阶级，而不是“官僚资产阶级”。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失败?

在总结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失败及资本主义复辟的经验教训时，中国革命史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兴起与失败有着重要的和典型的意义。

自资本主义复辟以来，中国的和外国的许多资产阶级学者从反革命的立场出发对文化大革命做了大量“研究”，妄图以此达到污蔑社会主义、美化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所谓“访谈”、回忆录等作品。这些作品，即使不是公开诋毁文化大革命的，往往纠缠于各种无关大局的细节，将重要的历史脉络埋藏在恩恩怨怨的琐碎之中。这些作品读多了，不但无助于我们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反而坠入五里雾中，以为“文革”不过是一笔糊涂烂账，甚至得出“全民族皆有原罪”的谬论。

自中国当代的马列毛左派兴起以来，也有一些同志，试图从马列毛主义立场出发，重新评价文革。但由于这些同志不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不能正确分析毛主席及其战友的某些历史局限性，不能够客观如实地分析当时中国的各个阶级及其力量对比，他们所创作的“文革史”等作品，虽然堆积了很多资料，最后往往超不出“好人”与“坏人”斗争、“坏人”得逞、“好人”蒙冤一类的套路。这样的“分析”，既不能帮助我们真正了解“好人”和“坏人”各自所代表的真实的阶级力量，也不能帮助我们搞明白为什么“坏人”得逞、“好人”失败，更加无助于未来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如前面两小节所论述的，任何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必须从如下的前提出发：（一）按照二十世纪中期中国实际存在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社会必然分裂为阶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后又产生新的剥削阶级和压迫阶级是不可避免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二）社会主义中国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从而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基本运动规律的限制和制约。

如上所述，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个新的剥削阶级（官僚特权集团）就已经形成并且在实际上掌握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政权、支配着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这里，将这样一个新的剥削阶级称为“官僚特权集团”而不是“官僚特权阶级”，是因为这样一个新的剥削阶级带有历史上过渡的性质，处于从社会主义革命到资本主义复辟之间的过渡阶段，不是在一个长期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始终存在的剥削阶级。

另外要注意的是，这个“官僚特权集团”在当时还不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因为这个集团的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而只能按照这个集团的规则（“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共同支配在法律上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与一般劳动群众相比，这个集团的成员享有大量的物质特权（包括小汽车、仆人、特供商品、别墅、定期度假等），但是这些特权仍然受到“党的政策”和群众监督的限制，（至少在法律上）也不能直接传给子女。

最主要的，那个时候，社会主义中国在内部的生产关系还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商品货币关系受到极大的限制，劳动群众

通过革命争得了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无法想象的广泛权利。所以，任何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简单定性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看法都是错误的。

1956年，鉴于苏共二十大以及波兰、匈牙利事件的教训，毛主席试图通过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动，以发动人民群众广泛提意见的方式来帮助各级党员干部纠正“官僚主义”错误。到了1957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动发展为请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顿作风的“整风”运动。一些右派知识分子错误估计形势，以为攫取一部分权力的机会已经到来，提出了一系列不合时宜的政治要求。以刘、邓为首的党内官僚集团趁机扭转斗争大方向，以“反右”为名对很多真诚希望社会主义民主的普通群众实行打击报复，导致“整风”运动失败，并离间了毛主席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

应当说，那个时候，毛主席并未充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考虑到“一五”计划期间已经暴露出来的传统计划经济官僚主义严重、压制群众积极性的问题，毛主席在主观上希望通过放手发动群众、调动地方积极性的办法，来克服官僚主义，加快国家工业化。但是，“大跃进”一发动，省级和地方的官僚集团就利用计划和统计制度放宽标准的机会，伪造统计指标，以便个人向上级邀功请赏。先例一开，各省、各地方的官员争相弄假，导致全国形势失控，计划制度完全崩溃。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农业在技术上仍然处于前现代水平，农业生产和粮食供应形势十分脆弱；即使有良好的计划，也仅能勉强保障全体人口的基本温饱。由于“大跃进”引起大批人口进城，城市人口的平均粮食消费水平超过农村人口、粮食由农村转运到城市再配送的过程中本身会有大量损耗，势必导致农村粮食严重紧张。“大跃进”初期一些地方大办“公共食堂”浪费了一部分库存的粮食。这样，在关键的1960年初的冬春时节，河南、四川等省农村地区在青黄不接之际粮食储备耗尽，导致饥荒爆发。这又进一步导致当年播种面积下降，再加上严重自然灾害，使得1960年和1961年的粮食产量减少到全国人民必需的最低数量以下。

由于计划和统计制度崩溃，中央在拖延了相当一个时期以后才了解到真实情况，1961年才开始进口粮食，全国范围粮食紧张状况到1962年才初步缓解。

过去一些年，许多左派同志在研究这一段历史时主要关注于驳斥“饿死三千万”的谎言并且用大量精力来澄清“大跃进”失败的责任主要归于刘、邓而不是毛主席。这些当然都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大跃进”失败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证明整个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在革命胜利仅仅十年之后，就已经基本腐化变质。这是因为，在“大跃进”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都热衷于弄虚作假，对上欺骗领导，对下愚弄人民，明知后果严重，却不顾人民死活，为了个人升官享受，一意孤行；并且，参与到这种恶劣行径的，不是一两个，也不是党员干部中的少数，而是其中的绝大部分。“大跃进”的悲剧说明，到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是那个愿意为了劳苦大众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锋队，而是基本脱离了与工农劳动群众的血肉联系，蜕化为官僚特权集团的执政工具。

“大跃进”失败后，毛主席痛定思痛，开始意识到整个党的上层、相当一部分干部队伍已经蜕化变质。尽管如此，一直到1965年，毛主席主要还是希望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党内批评教育的办法来扭转“党变修、国变色”的趋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失败后，毛主席才下定决心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等中国共产党内的继续革命派，在官僚特权集团的统治已经基本巩固以后，为了挽救社会主义革命而展开的一次伟大尝试。毛主席及其战友的设想是通过全面发动工人和学生等群众积极分子，挑战党政各级官僚的权力，帮助党和国家政权恢复革命活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理论上、政治上的准备都极其不充分的条件下开始的，整体的阶级力量对比自始至终对继续革命派相当不利。1968年“世界革命”退潮后，整个的国际形势也渐渐有利于反革命而不是革命。在这样的国内和国际阶级斗争形势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是必然的。

下面分阶段分析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失败。由于笔者时间和精力有限，这些分析还只是初步的、提纲式的。笔者先将一些主要的思路列举出来，暂不提供详尽的资料出处或引用来源；等以后有条件时，再逐步补充。

按照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和进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发动到完全失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66年5月到1967年7月。文化大革命首先从大学和中学开始，继续革命派试图发动学生向学校官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造反，改变“封资修”统治学校教育的状况。官僚特权集团则通过他们在学校中的子女也打着“造反”的旗号，组织起与真正造反的革命学生相对抗的“红卫兵”组织，并怂恿自己的子女大搞打砸抢等破坏活动，在此期间制造了大量暴行和血案。

毛主席在忍无可忍以后，公开发表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著名的“十六条”），刘少奇失势。此后，文化大革命从学校发展到工厂，主张激进斗争的临时工、非熟练工人组织了各种各样的“工人造反司令部”，各地当权派、工厂官僚则怂恿政治立场保守的正式工、熟练工人也组织自己的“司令部”与激进工人对抗。

1967年1月，上海市工人阶级在打倒了市委、市政府后夺取了政权。上海“一月革命”后，全国各地的夺权斗争风起云涌。各省市官僚在当地军队的配合下开始以暴力镇压造反的群众组织，在青海、广西等地发生了流血事件。各地当权派暗中给保守派群众组织发枪，造反派群众组织则设法抢枪（包括一度抢夺抗美援越的武器弹药），群众组织之间的互斗发展为武斗。

总的来说，在1967年夏天之前，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继续革命派与党政官僚当权派各自都在动员自己的政治力量。党政官僚派的一部分头面代表人物暂时失势，但是其在全国大部分地方的政治根基并没有动摇。继续革命派在群众中仅能够动员激进学生（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所谓“黑五类”的“地富反坏右”子女）和非熟练工人。工人阶级处于分裂的状态。军队暂时在表面上处于“中立”，但实际上已经暗中倒向党政官僚集团。

第二个阶段，是从1967年7月到1971年9月。1967年7月，毛主席亲自到武汉，试图支持当地的激进工人造反派组织夺权。武汉当地的党政官僚、军队官僚煽动不明真相群众冲击毛主席所在宾馆，威胁到了毛主席的生命，毛主席被迫撤离。

武汉“七二〇事件”是整个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转折点，带有继续革命派与党政官僚当权派决战的性质。“七二〇事件”之前，文化大革命一直克服重重阻力向前发展。“七二〇事件”之后，毛主席不得不重新评估全盘力量对比，放弃了对“七二〇事件”兵变的定性、不追究当事人责任，文化大革命进入总退却。到了当年年底，王力、关锋、戚本禹被开除出“中央文革小组”并“隔离审查”。

此后一个时期，毛主席实际上不得不将权力转让给以林彪为首的军队官僚集团，希望以此换取军队官僚集团对继续革命派做出某些让步，保全一部分文化大革命成果。1970年，毛主席与林彪几次事实上的谈判没有达成协议，使得毛主席开始考虑重新启用党政官僚系统以平衡军队官僚系统的影响。这时，叶群、林立果一伙儿在绝望中试图发动政变夺取最高权力。政变失败后，林彪被迫出逃，因飞机失事丧生。

第三个阶段，是从1971年9月到1976年9月。这是文化大革命走向完全失败的阶段。林彪出逃并失事后，原来的党政官僚系统与军队官僚系统之间、军队内部的相对平衡被打破，毛主席被迫全面重新启用党政官僚集团。1973年，邓小平在表面上做了检讨以后“复出”。此后，邓分别任负责党中央日常事务的第一副主席、负责国务院日常事务的副总理和负责军队日常事务的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实际上掌握了党、政、军全权。

在国际上，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全面调整对外方针，实际上放弃了支援世界革命的路线，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全面缓和关系，扩大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实际上重新加入了国际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为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后充当世界资本主义的制造业出口基地埋下了伏笔。

1976年初，毛主席做了最后一次重大努力，将邓小平又一次打倒（但保留党籍，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面对实在无人可用的尴尬局面，毛主席不得不将庸碌无能的华国锋抬上接班人的宝座。毛主席尸骨未寒，华国锋就在叶剑英等人的怂恿下发动反革命政变。两年后，华在完成了其可耻的叛徒使命后已经毫无用处，便被邓小平、陈云等一脚踢开。

以上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阶级斗争进程的一个梗概。我们今天回顾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不要仅仅满足于了解事件发展的过程以及参与事件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更主要地，要把各个重大事件以及各个人物的表现与他们各自代表的阶级相联系，再与当时中国所处的历史条件（特别是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相联系，与当时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相联系。

正是由于革命后的中国还没有条件解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的问题，这就决定了只能由一些少数人组成的一两个集团专门负责内政外交、经济管理等“社会的共同事务”，从而掌握着政权，并支配着名义上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这种基本的分工格局及其深远影响，不是靠“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那样局部的、仅有象征意义的努力就可以改变的。

只有深刻了解这种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所带来的不可逾越的历史条件方面的限制，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在广大劳动群众中，即使是有了“毛主席指示”（相当于“奉旨造反”），也仍然只有少数人在政治上积极活跃，并且这少数人中还有着大量的不纯洁的投机分子。

只有深刻了解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所带来的历史条件方面的限制，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在整个的文化大革命历史时期，继续革命派在力量对比方面都处于绝对劣势。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包括了党政官僚和军队官僚的绝大部分，并且他们还可以利用工人阶级的分裂。相比之下，继续革命派仅能得到激进学生和非熟练工人阶级的支持，农民则没有发动起来。

只有深刻了解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所带来的历史条件方面的限制，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在文革总退却以后，毛主席不得不请党政官僚系统的“老干部”全面“出山”。因为当时除了这些人，要维持一个国家的正常运转，便无人可用。靠着“奉旨造反”上来的造反派领袖们，很少真正在群众中深孚众望又具备远大理想的优秀分子。毛主席亲自挑选的接班人，没有一个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对王洪文也是先培养后放弃。

不仅如此，由于中国还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一个外围国家，如果世界革命不成功，就无法长久地隔绝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之外。在世界革命退却后，毛主席不得不在重返苏联阵营与改善同美国及西方关系之间做出抉择。毛主席所做出的抉择客观上导致中国重返国际资本主义分工体系，并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复辟准备了便利的条件。

## 关于“小生产”和“资产阶级法权”在资本主义复辟中的作用

如上所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准备极其不充分的条件下仓促发动的。关于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的种种不利条件，上一节已经做了探讨。这一节着重探讨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的一些局限性。

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发动任何一场成功的革命运动的前提，是要搞清楚当时社会的基本性质，有哪些剥削阶级，有哪些被剥削和被压迫阶级，谁是革命的领导者和同盟军，谁是革命的对象。**

文化大革命首先面临着革命对象不清的问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官僚特权集团作为一个新剥削阶级的统治实际上已经巩固，“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也已经基本蜕变为官僚特权集团统治的工具。但是，由于理论认识的不足，但恐怕更主要的，是出于现实政治斗争的考虑，继续革命派不可能把整个的党政官僚集团都作为革命的对象。虽然毛主席曾经在文化大革命前在一次批示中提到过“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但也仅仅是一笔带过，没有进一步分析“官僚主义者阶级”到底是谁、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为了避免树敌过多，继续革命派在公开场合反复强调“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而在不公开场合，毛主席却说，“我们的基层单位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实际情况是，继续革命派真正掌握的权力恐怕连三分之一都不到）。

既然不能以整个的官僚特权集团为革命对象，那么只能将公开的革命对象努力缩小到一个政治上相对可操作的范围，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因为这个概念既包括了“党内…的当权派”又包括了“走资本主义道路”。既然是“党内…的当权派”，那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既可以是敌我矛盾、对抗性矛盾（如对刘少奇的处理），也完全可能是人民内部矛盾、非对抗性矛盾（如毛主席对邓小平的处理意见）。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同样有可能今天被打倒，明天又被结合进革命委员会。当然，当时对于这种现象公开的解释是，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也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给其改正错误的机会。这种以批评求团结、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如果是用于革命队伍内部犯错误的同志，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革命先锋队，而是基本完成了蜕化变质，尤其是领导干部，大多数已经蜕变为特权官僚。他们与工农劳动群众的关系，就是毛主席

在私下所承认的“尖锐对立的关系”，是“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毛主席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大贡献，是指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然而，既然存在着阶级斗争，那么是在哪个阶级与另外一些什么阶级之间的斗争呢?

从马克思主义角度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本身不是一个阶级的概念。既然不能提“官僚特权集团”，也不能公开提“官僚主义者阶级”，这就迫使继续革命派的理论家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寻找其它的阶级基础。

九大政治报告在为刘少奇在政治上定性时认为：“刘少奇…充当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总代表。他有一条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殖民地的政治路线。…多年来，刘少奇招降纳叛，搜罗了一帮子叛徒、特务、走资派，他们隐瞒了自己的反革命的政治历史，互相包庇，狼狈为奸，窃取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单位的领导权，组成了一个地下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着，起了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不能起的破坏作用。”这些，显然不是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倒像是一部改开时代谍战神剧的剧情概括。

毛主席在晚年讲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时，一是强调小生产的自发倾向会导致新生资产阶级产生，二是强调不受限制的“资产阶级法权”会导致新生资产阶级产生甚至泛滥。

九大政治报告曾经引用列宁的话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1975年末、1976年初，毛主席曾经说：“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

如果是在自由泛滥的商品货币关系条件下，小农经济以及其它形式的小商品生产确实会导致两极分化，一部分农民或其他小生产者破产，另一部分农民或其他小生产者上升为富农或新资本家。但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已经受到极大的限制，从而小生产中自发的两极分化趋势是不难限制的，事实上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中国也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苏联和中国后来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也不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一伙或者邓小平、陈云集团急切地想要代表当时还并不存在的富农阶级的利益，而是他们正确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复辟最符合官僚特权集团自身的长远利益。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在晚年有这样几段论述：**“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果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时提到的。许多左派同志在谈到“资产阶级法权”这一概念时望文生义，认为“资产阶级法权”就是指的资产阶级的法律和权力。实际上，这里有一个语言上的误会。“资产阶级法权”在英文中对应的词汇是Bourgeois Right。Bourgeois在现代语境下一般指资产者或资本家，但是这个词来源于Burgher，意为自治市镇的居民或“中产阶级”（也就是从中世纪晚期到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在欧洲各城镇中的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所以，Bourgeois Right实际上指的是“市民权利”或小商品生产者的权利，而小商品生产者要求的是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收入的权利（干一样的活，就该得一样的钱）。在马克思看来，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消费品的分配原则将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与小商品生产者要求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收入一样，所以是 Bourgeois Right。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残存的商品货币关系以及与按劳分配相联系的不平等的工资制度，确实会给资本主义死灰复燃提供某种有利条件。但是，我们知道，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后来走上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主要社会推动力来自于官僚特权集团，而官僚特权集团并不是因为实行了按劳分配的工资制度才产生的。恰恰相反，只要还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只要少数人专门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的情形不改变，产生像官僚特权集团这样的新剥削阶级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一旦新剥削阶级产生，就无法阻止他们“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

不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哪怕是花再大的力气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最后还是挡不住窃取了国家权力的官僚特权集团“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毛主席晚年指示），并最终不顾一切地拥抱资本主义复辟。

## 通往无阶级社会的道路

在以上的讨论中，我们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证这样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只要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还比较低下，从而生产各种必需品以及其它物质产品还要占用绝大多数人全部或几乎全部的可支配时间，从而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从直接的生产劳动中脱离出来、专门从事各种“社会的公共事务”，社会划分为阶级，就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前面也说过，阶级社会既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就不会永远存在。社会分裂为阶级的物质基础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也只有随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的消亡，阶级社会才会走向消亡。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指出：**“如果说阶级的划分根据上面所说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对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是这样。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的确，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从而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都将成为时代的错误，成为过时的现象。”**

那么，“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如何才能消灭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物质基础呢？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将把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到这样的高度，以至于无产阶级一旦夺取政权后，便可以一方面继续发展物质生产力，另一方面大幅度地缩短全体社会成员用于直接生产劳动的劳动时间。这样，接受高等教育并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就不再是一少部分人的特权。相反，到那时，全体社会成员都可以有充足的机会享受各方面的教育，参与各种创造性的活动，并轮流参加管理公共事务的活动。由于“社会的公共事务”不再是少数人或某一个集团专门从事的特权，也就不再有少数人或某一个集团能够利用他们所掌管的“公共事务”来“牺牲劳动阶级”或“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因为这样的人很容易被同样熟知“公共事务”的群众监督所发现，并且可以很容易地被经常参加“公共事务”管理的群众中优秀分子所替换。

后来世界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要复杂。在经过了几个世纪无所忌惮的全球资本主义积累以后，全球生态环境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不仅要努力向无阶级社会过渡，还要挽救全球的生态系统，将人类的物质生产和消费限制在生态环境可持续性能够允许的范围内。

另一方面，与二十世纪中期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不同，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期，整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在进入其最后的结构性危机

（关于这一问题，红色中国网另外有许多文章探讨，这里不再赘述）。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旦在一国（尤其是一个大国）首先胜利，很可能不会再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长期包围，而是成为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世界革命的第一枪，真正开辟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被推翻后，社会主义国家将不再受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运动规律的约束，也就不再需要将大量的社会剩余产品投入资本积累以便与资本主义国家展开经济竞争和军备竞赛，更不需要维持血汗工厂式的剥削制度以维持“廉价劳动力”。

另一方面，为了恢复世界范围的生态可持续性，社会主义国家应当首先将全社会总的物质生产和消费规模稳定下来。然后，通过减少不必要的资本积累、消灭以往统治阶级穷奢极欲所带来的浪费，再逐步消灭那些资本主义时代为了扩大利润所鼓励的各种过度消费，还可以逐步减少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和消费规模。

在社会主义时代，全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还将继续提高。只要社会整体的物质生产和消费水平不再增加并且逐步下降，而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继续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用于直接生产劳动的时间就可以稳步减少，就可以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用于创造性活动和公共管理活动，直至最终实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提出的理想：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 “只要有人民就行”
## ——兼谈老田同志的学风问题

远 航 一 号

自中国现代的马列毛左派兴起以来，老田同志在思想和文化战线始终是一名先锋战士，在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中、在与左派内部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中都曾经做出过突出的贡献。能与老田同志交流，是一件愉快的事。

在关于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以及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怎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上，我与老田同志的意见不一致。在“有关生产力发展打破分工的想象力：主观力量发展和充分条件评估问题”一文中，老田同志提出，拙作虽然分析了革命和制度变迁的“必要条件”，但是却忽略了革命的“主观力量”或“充分条件”，有着不小的“盲点”和“片面性”，在逻辑上有“重大缺陷”，甚至是“彻底弄颠倒了”。

那么，我们就不妨从老田同志喜欢探讨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说起。

### “社会制度演进”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

老田同志的文章主要是批评拙作的。但是，我与老田同志也还是有一些共识的。老田同志说：“在前现代社会的演进过程中间，诸如阶级形成和国家出现，生产力也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大体而言，过去的历史中间，生产力发展

是社会制度演进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可见，我和老田同志都同意，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是阶级社会得以产生并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那么，按照我与老田同志都同意的逻辑，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同样是未来的无阶级社会得以产生并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呢？对于这一问题，老田同志既没有提出，也没有正面回答。老田同志的整篇文章都是在花力气论证生产力发展不是“社会制度演进”的“充分条件”。关于生产力发展是否以及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成为“社会制度演进”的充分条件，我们放到后面再来探讨。假如老田同志也同意，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确实是未来的无阶级社会得以产生并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什么样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是未来的无阶级社会得以产生并存在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呢？

对于这个问题，老田同志在文章中既然没有提出，当然也就无所谓回答。

然而，如果我和老田同志都同意，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确实是未来的无阶级社会得以产生并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那么，就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无论是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还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本来都不具备向无阶级社会过渡所必需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也就不具备向无阶级社会过渡所需要的“必要条件”。至少，老田同志在自己的文章中并没有明确地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也没有尝试为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提供论证。

老田同志一方面试图论证，生产力发展不是“社会演进”的充分条件，另一方面又主张“充分条件需要在劳动者的组织和觉悟状况中间去寻找，需要在自觉的领导权建设 … 中间去寻找”。老田同志开篇便说，拙作“没有展开对于政治领导权问题 —— 革命主观力量或者充分条件的分析”。仅从字面上来看，老田同志应当是认为“政治领导权”、“主观力量”、“劳动者的组织和觉悟状况”，等等，就是革命的“充分条件”。

老田同志抨击笔者在逻辑上有“重大缺陷”。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充分条件”给自己在逻辑上挖了一个巨大的陷阱。

所谓“充分条件”，顾名思义，就是说，如果有A，必然有B，则A为B的充分条件。所以，如果我们按照老田同志在字面上所论述的意思，那么老田同志所表达的意思就是，无论其它条件是怎样的（无论生产力发展水平如何），只要有了某种“政治领导权”、某种“主观力量”、某种“组织和觉悟状况”，那么，就会有某种革命、某种社会。

请问老田同志，这是你所想要表达的真实意图吗？

但是，老田同志又承认，“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制度演进的必要条件”。既然是必要条件，那就是说，如果没有C，就没有B，则C为B的必要条件；所以只要没

有C，即使有了A，B还是不会发生。换言之，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发展，一定的“社会制度演进”是不会发生的，即使有充分的“政治领导权”、充分的“主观力量”、充分的“组织和觉悟状况”，也不会发生。

既然如此，A又怎么会是B的“充分条件”，或者说，某种“政治领导权”、某种“主观力量”、某种“组织和觉悟状况”又怎么会是某种“社会制度演进”的充分条件呢？

## 群众为什么总是“向后看”？

对于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复辟，老田同志将问题归结于群众“向后看”。至于什么是“向后看”，与老田文中喜欢使用的其它许多概念一样，只提出，不解释，或者是堆砌一摞现象，让你去“意会”。

不过，老田同志引用了文革“十六条”：“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那么，笔者是否可以把老田同志所说的群众“向后看”的现象理解为群众以及群众的领袖在革命过程中以及革命短暂胜利后仍然摆脱不了“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按照老田同志对历史的理解，以往革命的失败，都是因为“主观条件”不足。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半途而废”是因为“主观力量滞后”；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半途上就忘记初心”，还是因为“主观力量发展不充分”。

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反对“继续革命”，是因为他们“向后看”；劳动者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改善了，也会“向后看”，成为“保守派”；造反派则只能在“远低于领导权自觉”的低水平上展开。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无论古今中外，在以往的革命过程中，群众普遍地、大量地、几乎无例外地总喜欢“向后看”？这里面，难道没有些历史必然性吗？难道没有些规律性的东西吗？这些规律性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在客观的规律性背后，难道没有一些“必要条件”在起作用吗？

然而，我们知道，老田同志关心的是“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从老田同志的“充分条件”的观点出发，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解决群众“向后看”的问题呢？老田同志给我们指了两条路，一条是列宁的，一条是“毛教员”的：“从列宁到毛教员有关无产阶级专政和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的思考中间，才能够看清楚未来”。

老田说，远航一号是在“前列宁“的眼界里看问题。那么，“后列宁”的眼界是怎样的呢？据老田说，“列宁相对于马恩的巨大前进，就是他提出了‘灌输论’和‘先锋队’，这两者都是说劳动者的觉悟和组织能力提升，需要一个外在的中介环节”。然而，历史的事实难道不是，正是这个按照“灌输论”和“先锋队”培养出来的

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之后很快就蜕变为凌驾于无产阶级之上的官僚特权集团，从“向前看”变成了“向后看”？如果“先锋队”自己都在“向后看”，群众怎么可能长期坚持“向前看”？

老田说：“革命路线老是处于‘革命者自己背弃’的危险之中。这个部分，恰好是毛教员晚年处理的困难和问题”。问题是，毛主席解决了革命被“革命者自己背叛”的问题了吗？老田列举了文革时期“教育革命”、“领导权自觉建设”的种种尝试。然而，这些尝试真正得到推广了吗？落实了吗？解决了革命被“革命者自己背叛”的问题了吗？

## 为什么说“只要有人民就行”？

老田在他的文章将要结尾的地方，引用毛主席1968年接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时说的话：“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后来历史的实际发展是，“林彪以及在座”确实都被“消灭”了。林彪是灰飞烟灭了，“五大领袖”在政治上也早就死了。我们现在只剩下“全国人民”了。然而，如果按照老田说的，人民群众也是常常要“向后看”的，毛主席为什么又这样有信心——“只要有人民就行”？

马克思告诉我们：**“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主席的教导与马克思在认识论上的看法是一致的。

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同样，人的错误思想、落后思想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等社会实践的产物，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在头脑中的反映。

在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以及不同的社会集团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是不同的，属于这些不同阶级以及不同的社会集团的人们的思想因而也是不同的。另一方面，在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不仅掌握着生产资料、国家政权，而且控制着宗教、学校、媒体等意识形态机关；他们利用这些意识形态机关经常地、大量地毒害劳动人民。所以马克思才说，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也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阶级社会的正常发展时期，只有劳动群众中的少数优秀分子，才会在长期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中，产生推翻现存社会制度，实现“均贫富”、“等贵贱”

的理想；也只有剥削阶级中的极少数优秀人物，在认识到现存社会制度中的种种矛盾以后，才会下定背叛本阶级、与劳动群众共同奋斗的决心。

另一方面，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带来人们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的变化，人们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的变化又必然带来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等社会实践的变化，从而必然带来人们思想的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充分条件，因为前者必然带来后者。

当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尖锐而不可调和冲突的时候，反映在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方面，就是出现了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局面。只有到了这样的社会革命的"前夜"（在历史的意义上而不是日历时间的意义上），人们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急剧变化才会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头脑中得到激烈的反映，不仅相当一部分劳动群众而且剥削阶级中一些有远见的分子才会产生强烈的变革社会的愿望，其中一部分人才会组成"先锋队"，并且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影响到更加广大的群众，带领全体人民"向前看"。

那么，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劳动群众反抗压迫、反抗剥削的斗争即使是在一度取得胜利以后仍然不免于"向后看"呢？如恩格斯所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同样的，一切反革命的社会变迁和政治复辟的终极原因，也不应该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的"主观条件"中去寻找，因为这些"主观条件"不过是一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等社会实践的产物，不过是一定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

"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之所以能够继续"腐蚀群众，征服人心"，不是因为已经被推翻的旧的剥削阶级借尸还魂，而是因为在革命后又产生了新的剥削阶级。问题不在于所谓经济基础的改造已经完成，只需要完成"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革命（老田同志的这一表述让人联想起托洛茨基关于在"退化的工人国家"中应当进行"政治革命"的设想）；而在于经济基础虽然确实经过改造了，但是改造后的经济基础并不是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而是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激进民族解放运动"的经济基础。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不仅必然产生新的剥削阶级，而且新的剥削阶级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包围下还必然一步步地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关于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必然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笔者在"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兼谈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问题"原文中

已有论述，老田同志在他的文章中对于笔者关于历史上资本主义复辟必然性所论述的各点（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必然产生官僚特权集团、文革前官僚特权集团的统治已经巩固而官僚特权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又必然选择资本主义复辟）也并未具体反驳，此处不再赘述。关于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质是“激进民族解放运动”，笔者另有论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关于二十世纪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历史性质的争论”；“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

“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之所以挥之不去，不是因为当年的革命者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更不是因为列宁、毛主席不够伟大，而是因为新产生的阶级社会以及在文革前已经产生并发展的官僚特权集团的统治不可避免地要在人们的头脑中得到反映，新形成的官僚特权集团又不可避免地要动员他们所掌握的学校、报纸、电台等为他们新建立的阶级统治做出辩护。由于新形成的阶级社会是客观存在的，官僚特权集团的辩护往往符合人们的直接生活经验，甚至符合劳动群众的短期利益。

相比之下，毛主席及其“继续革命”派在文革初期的夺权斗争失败后，虽然暂时掌握“两报一刊”，其所宣传的内容，既不符合群众的直接生活经验，也不符合群众的短期利益，除了不断地要求人们“斗私批修”，也不能真正指出从短期到长期的清晰可行的路径。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不是老田所说的什么“宏观的方法论语言”的问题，也不可能靠什么“理论的具体化”求得真正的解决，因为群众所面对的“社会生活现实”就是新的阶级社会，就是新的官僚特权集团的统治，就是造反派不争气、烂泥扶不上墙，就是毛主席不得已要请邓小平复出，就是尼克松被待为上宾、中国重返国际资本主义市场。面对这些无可辩驳的客观现实，什么样的“教育革命”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呢？

既然如此，毛主席为什么又说“只要有人民就行”？这是因为，从长远的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生产力确实是不断发展的，这样的发展确实是会不断地改造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只有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发生了某些特定的变化，建立并巩固新的无阶级社会在物质上才能成为可能。也只有在新的无阶级社会的物质基础具备了以后，人们在思想上的革命才不仅会发生而且才能得到巩固，实行并保卫无阶级社会才不仅符合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而且符合他们的眼前利益，从而与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现实”结合起来，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发自内心拥护的东西，而不是群众中的某些投机分子借“造反”为名向上爬的捷径。

关于新的无阶级社会的物质基础怎样才能具备，笔者在“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兼谈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问题”原文中本来已有论述。但是老田同志好像都没有看到，还认为这些都是“笑话”。

## 老田同志的学风问题

在马列毛左派同志中对于一些理论问题的看法不一致，这本来是正常的。许多分歧，也不一定急于解决，而可以留待现实阶级斗争的实践来检验，在实践中逐步消除分歧，达成团结和一致。

但是，无论是否有分歧以及怎样解决分歧，无论是作为马列毛左派同志还是作为科学研究的工作者，都应当诚实地对待有分歧的观点，尽可能准确地了解对方真实的论点、论据和逻辑，如实地复述对方的论点、论据和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老田同志可能是因为工作、生活繁忙，或者因为急于批判，疏于阅读，在他的评论文章中出现了多处错误理解笔者观点或者将笔者本来没有的观点强加给笔者的情况。下面仅举一例：

老田指责笔者："指望生产力发展自动带来脑体分工消失或者缓和，还在未加指明的情况下期待人均的'非劳动时间'增加，会自动带来对于管理分工的超越，这不过是一个笑话。不说西方国家生产力水平如何，中特的状况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难道'996'和农民工经年累月的超时加班，是生产力水平倒退的结果吗？"

在上面这段话中，老田同志先把笔者本来并没有的观点强加给笔者——"指望生产力发展自动带来脑体分工消失或者缓和"，然后煞有介事地质问："难道'996'和农民工经年累月的超时加班，是生产力水平倒退的结果吗？"

老田同志不是最喜欢区分"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吗？那么请问，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与"生产力发展自动带来脑体分工消失"，是一个意思、是一种条件吗？

在笔者原文"通往无阶级社会的道路"一节中，笔者在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设想时是这样写的："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将把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到这样的高度，以至于无产阶级一旦夺取政权后，便可以一方面继续发展物质生产力，另一方面大幅度地缩短全体社会成员用于直接生产劳动的劳动时间。"

显然，上面这段话的意思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发展可以将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一定的高度，在这样的"高度"下，如果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就可以开始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而决不是说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会"自动"带来脑体分工消失。这里的逻辑关系，对于老田同志来说很难理解吗？顺便说一下，我不认为1949年以后在中国出现的革命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政

权。我认为，1949年以后的革命政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激进民族解放运动政权，其实质是与劳动群众达成一定的历史性妥协条件下的官僚特权集团专政。

老田同志说，笔者“在未加指明的情况下期待人均的‘非劳动时间’增加，会自动带来对于管理分工的超越”。笔者在谈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以后，马上就说：“为了恢复世界范围的生态可持续性，社会主义国家应当首先将全社会总的物质生产和消费规模稳定下来。然后，通过减少不必要的资本积累、消灭以往统治阶级穷奢极欲所带来的浪费，再逐步消灭那些资本主义时代为了扩大利润所鼓励的各种过度消费，还可以逐步减少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和消费规模。在社会主义时代，全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还将继续提高。只要社会整体的物质生产和消费水平不再增加并且逐步下降，而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继续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用于直接生产劳动的时间就可以稳步减少，就可以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用于创造性活动和公共管理活动，直至最终实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提出的理想”。

如果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生态可持续性的目的，将物质生产和消费的总量限定在一定水平，同时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仍然不断提高，那么，每名劳动者平均的劳动时间必然不断下降；而随着劳动者用于直接生产劳动时间的减少，劳动者“就可以”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用于创造性活动和公共管理。这样简单的数学关系，对于老田同志又是很难理解、又是“未加指明”吗？笔者在原文中明明说的是劳动者用于直接生产劳动的时间减少以后，“就可以”逐步地实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消灭分工的理想，到了老田那里，又变成了“自动带来”对于管理分工的超越。老田同志，你到底是阅读过于马虎呢，还是确实搞不清“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之间的差别呢？

在老田同志的文章中，类似这样的误解或曲解笔者观点的情形，还有若干，这里不再一一列出。

希望老田同志在以后的讨论中能够改进学风，使我们之间的讨论更加富有成效。

# 西方的改良，东方的血泪

233型酷炫喜羊羊

先说结论，西方资本家从亚非拉人民身上榨取得到了超额剩余价值，而西方工人在经过自己的长期斗争后，迫使西方资本家把这些亚非拉人民的血汗拿出部分用于收买西方工人。

正如恩格斯在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中说的那样：

**当英国还保持工业垄断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某种程度上也分享了这种垄断的利益。这些利益在工人中间分配得极不平均：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拿了绝大部分，但广大的群众也偶尔得到一些。这就是从欧文主义绝迹以后英国不再有过社会主义的原因。随着英国工业垄断的破产，英国工人阶级也将丧失自己的特权地位。总有一天，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连享有特权并居于领导地位的少数也不例外，会降到其它国家工人所处的水平。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

## 1. 发达国家的工人没有获得亚非拉人民的剩余价值?

发达的改良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通过几十上百年的工会和罢工，用自己的斗争换来的缩短工时、涨工资、社会保障，也仅仅是压低了资产阶级对他们的剥削，而他们非剥削了其他国家的工人。资产阶级绝不会反过来用别国获取的剩余价值喂养本国工人阶级。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好日子都是发达国家的工人自己斗争得到的，绝不是建立在对落后国家人民的剥削之上的。

但是，亚非拉人民不也进行了几十上百年的可歌可泣的斗争，凭什么我们亚非拉人民没有过上好日子?

“我的名字是Shima，今年23岁，是孟加拉国的一名制衣工人。我曾在我的工厂建立并领导了一个工会组织。我们把一些诉求列成清单提交给工厂的经理，但是他们在收到之后与我们发生了争执。争执过后，管理人员锁上了房门，带着30~40个其他员工，开始殴打我们。他们用椅子、棒子、秤，以及剪刀之类的东西作为武器，对我们的胸部和腹部拳打脚踢，还把我们的头往墙上撞。”

他妈的，广大亚非拉人民就不斗争吗？斗争的英勇智慧悲壮程度难道不超过美国工人几个数量级？难道美国工人真是上帝的选民，上帝只奖赏美国工人的斗争，就是不眷顾亚非拉人民的斗争?

### 2. 发达国家的高福利是因为他们工人的脑袋很聪明?

发达国家为什么赚钱？是因为他们科技领先，使用科技在赚钱。同样工作八小时，他们生产的是最新的芯片，而我们生产的是手纸，哪个技术含量高？哪个产出价值大？一目了然。所以发达国家百姓生活好。

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的福利与跨国剥削以及廉价工业品无关，而是西方工人劳动应得的，脑力劳动也是劳动。

同样的道理，中国小资的劳动力劳动也是复杂劳动，应该获取在中国的人上人地位。如果中国无产阶级阻止他们获取人上人地位，反对他们去欺负劳动者，那这些小资就要用“弱智小粉红”、“极右翼民粹暴徒”之类的词来咒骂我们的工人阶级。

改良主义要实现，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1.工人足够有力量去保卫斗争成果。不然资本家压根没必要拿出真金白银去破财消灾，也就是列宁说的被收买后变成工人贵族。

2.资本家必须真的有真金白银去收买。画大饼是收买不了人的。

3.拿出真金白银必须不能破坏资本积累。如果一家公司是依靠压低工人工资来牟利的，那这家公司的老板敢把工资提高1000，那它绝对要破产，富士康就不

敢把工人的工资提高到跟硅谷的码农一样高，因为前者的资本积累完全是依赖廉价劳动力，而后者的资本积累条件是维持它们对尖端产业的国际垄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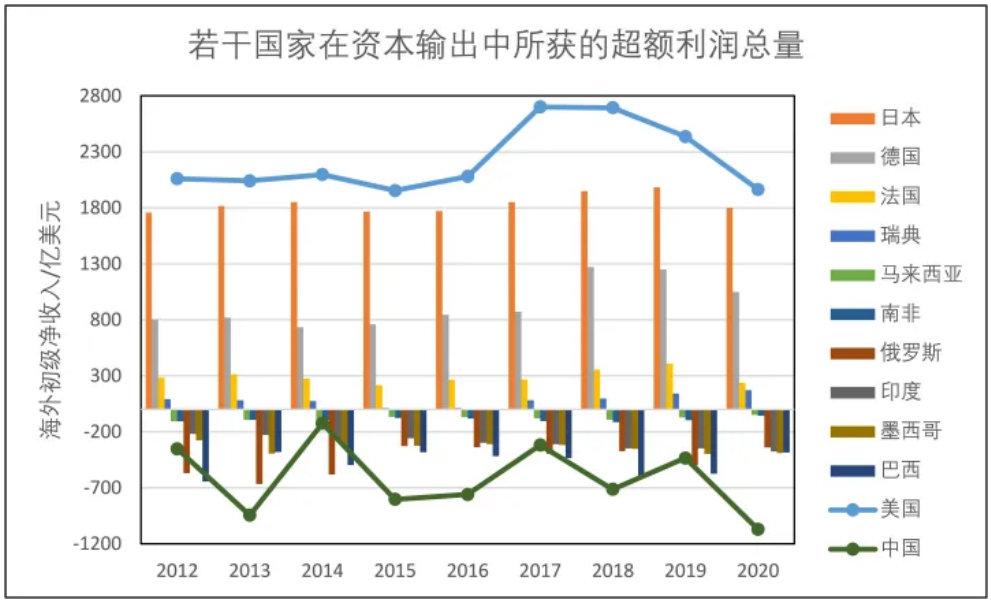
谁符合这三个条件？

西方帝国主义国家。

西方的劳动力队伍已经高度无产阶级化，工人力量不弱。虽说现在没啥大起色，但毕竟过去还是敢跟资本家碰一碰的，力量至少不弱，这一点很多回答都提到了，不多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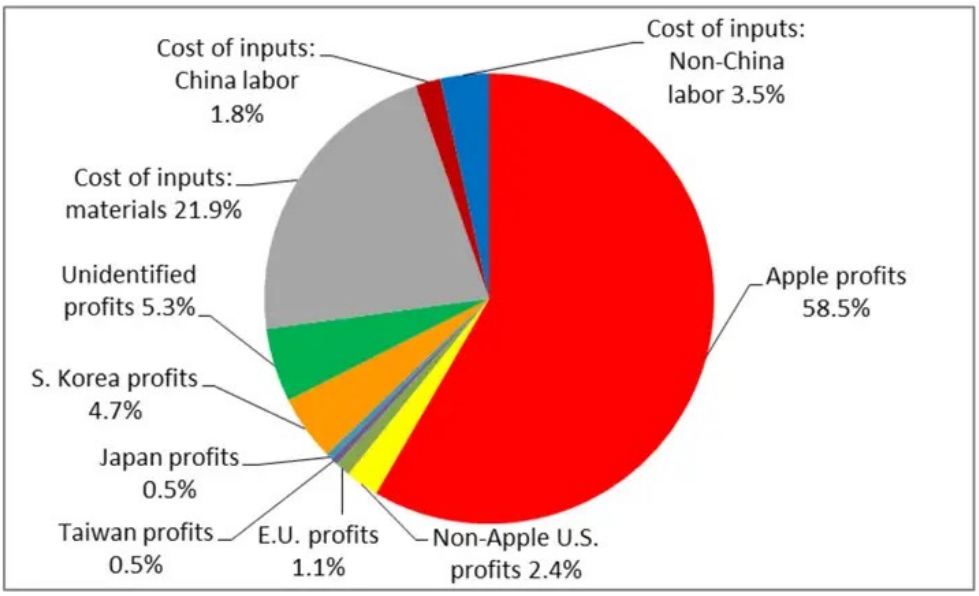
西方已经对东方人民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残酷掠夺。西方靠着剥削亚非拉人民，拿到了巨量的超额利润与超额剩余价值，这就是可供收买西方工人的真金白银。

这是近年来若干主要国家所获的超额利润情况，很明显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都是被西方核心国家所掠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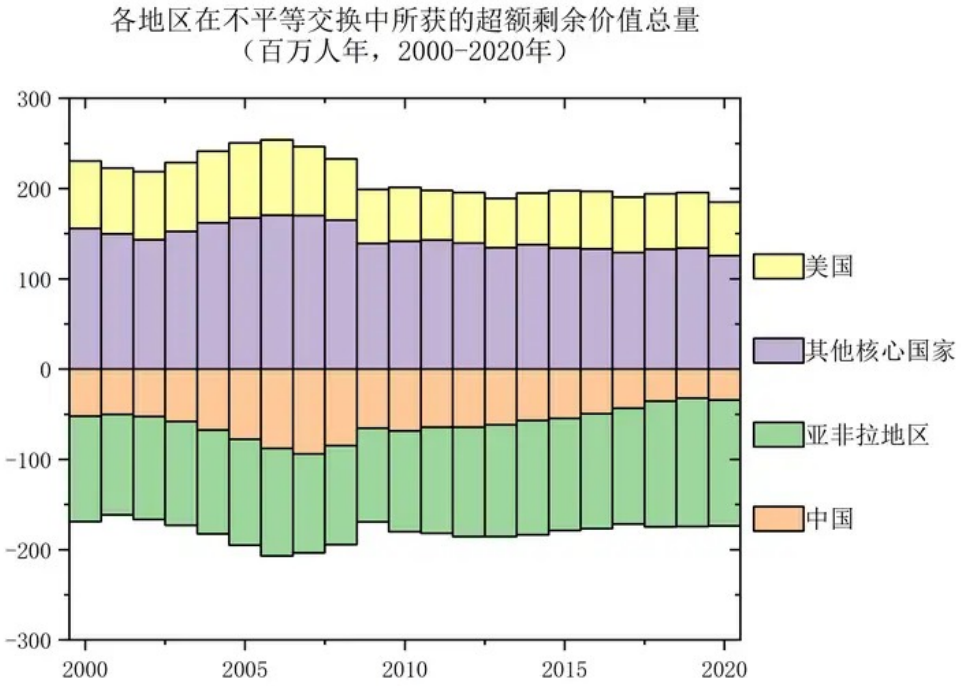



西方依靠对尖端产业的国际垄断获取垄断利润，通过产业转移从亚非拉人民身上榨取巨量剩余价值以维持西方的资本积累优势。西方通过产业转移将劳动密集型的厂子丢到亚非拉去，西方不再主要依赖所谓的低工资优势，而是通过他们对各个行业的国际垄断来攫取超额剩余价值，同时通过资本输出获得超额利润，给工人发点钱也不会破坏西方资本家发大财，因为西方都是靠着剥削亚非拉来发大财的。

就比如下面这张苹果手机的价值分布图，接近60%（58.5%）都是美国苹果公司的利润；物料成本占21.9%；而中国得到的部分，是仅占售价1.8%的劳动成本。




而这种超额剩余价值的攫取方式主要是以不平等交换来实现的：




2019年，其他核心国家从全世界掠夺了高达1.258亿人年的超额剩余价值，这相当于它们工业部门就业总人数的100.25%、整个美国全部就业人数的22.83%。美国从全世界掠夺了高达6132.4万人年的超额剩余价值，这相当于美国工业部门就业总人数的192.21%、整个美国全部就业人数的38.27%。如果没有来自这般庞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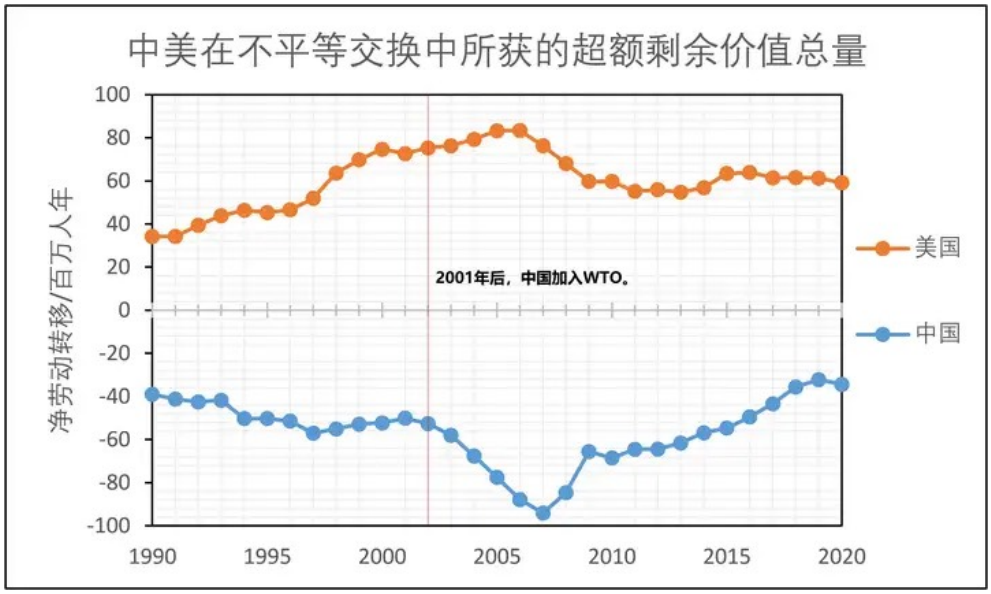
超额剩余价值，美帝国主义要维持他们原有的物质消费水平，就需要将相当于美国全部就业劳动力的39%从服务业转移到物质生产部门。

所以，改良主义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得以推行，并且被东方的小资用各种肉麻的话语去包装成“进步”、“自由”、“民主”的象征，而东方的劳动人民却结结实实的被西方的“文明人”压迫了数百年。

## 答评论区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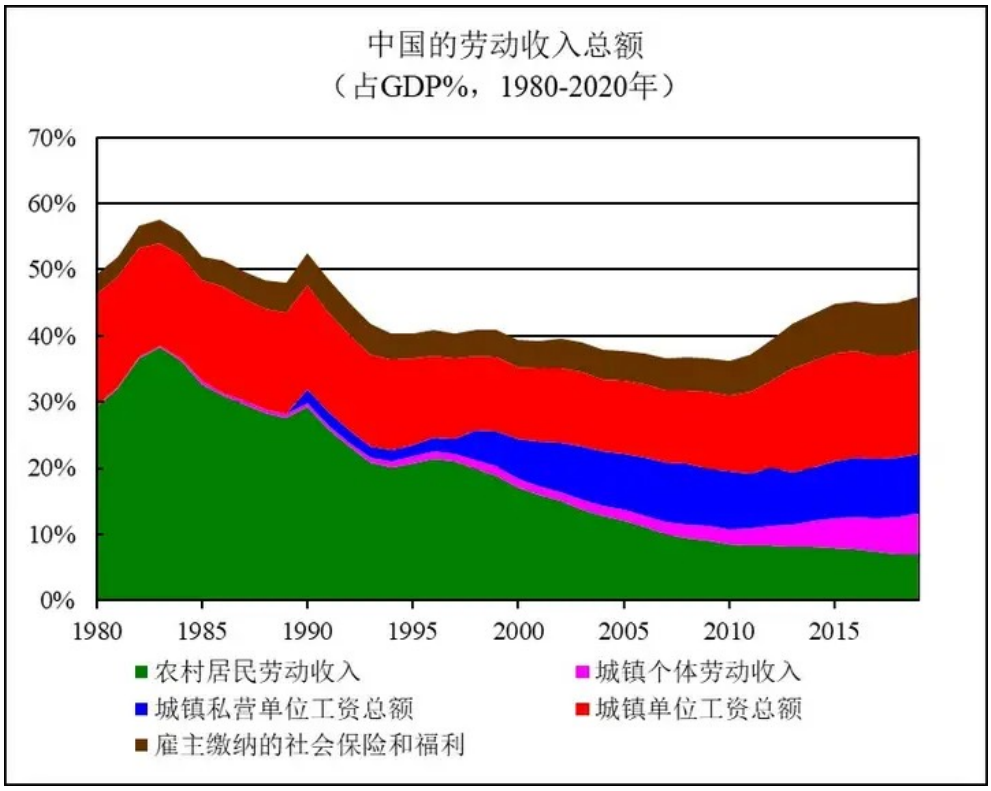
Q：进入世贸的几条规定是5天8小时工作制，允许独立工会 ，以本国的产业意愿为主（指各国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接下国际任务），别人按照发达国家的工人工作时长以及工会体制，这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人是巨大的好处了，你知不知道某大国在进入世贸之前没有8小时工作制和双休的条文，现在是某国自己不按世贸的规定来办事，搞什么996，这事能怪全球化吗？进入世贸之前过的是什么穷苦日子，难道心里没数？

A：在某国加入WTO之后，某国工人非但没有过上好日子，反而被西方帝国主义夺走了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




在1990年，中国损失的超额剩余价值为3893.9万人年，在中国加入WTO的2001年，这个数字是5007.8万人年，到了2007，这个数字直接暴增到9407.4万人年，直到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受经济危机波及，中国损失的超额剩余价值才逐渐下降。

在加入WTO后，我们的劳动收入总额占GDP的比重也下降了：




在加入WTO后，全部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00年的39.32%下降到2010年的36.15%，而农村居民劳动收入（包括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从2000年的17.17%下降到2010年的8.57%，连9%都没有。

在这短短十年间，是什么让中国工人损失了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是什么让我们的农村劳动者收入越来越少？

绝对不会是全球化！西方的本意是好的，都怪某国执行错了！

为什么？

因为这是Siri说的。

Q：你是妄图蛊惑亚非拉人民“不把枪口对准资产阶级，反而把枪口对准另一部分无产阶级，企图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争霸战争动员本国无产阶级当炮灰”的”御用反对派、社会帝国主义者“！

A：帽子终究是逃不掉的，那就让帽子先飞一会。

不知道我的回答里有哪一个字是鼓吹让亚非拉工人拿枪去打西方工人呢？

如果指出”西方工人分享了帝国主义的垄断利润“的客观事实，那也算什么迫真社会帝国主义者，我看你先去把恩格斯前辈和列宁同志批倒批臭吧！

恩格斯在1858年10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

**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

过了24年后，恩格斯在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中又说：

**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和资产者对它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有的只是保守党和自由激进党，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

共享垄断权的结果之一就是，超额利润中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分配给了西方工人。

又过了10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二版（1892）的序言里，又双强调了英国工人阶级分享了这种垄断的利益：

**当英国还保持工业垄断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某种程度上也分享了这种垄断的利益。这些利益在工人中间分配得极不平均：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拿了绝大部分，但广大的群众也偶尔得到一些。这就是从欧文主义绝迹以后英国不再有过社会主义的原因。随着英国工业垄断的破产，英国工人阶级也将丧失自己的特权地位。总有一天，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连享有特权并居于领导地位的少数也不例外，会降到其它国家工人所处的水平。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

你可能觉得恩格斯前辈太古老了，那我们再看列宁同志是怎么说的。

1920年《帝国主义论》出版法文版和德文版，在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里，列宁写道：

**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1/10，即使按最‘慷慨’和最夸大的计算，也不到1/5），它们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很明显，这种大量的超额利润（因为它是在资本家从‘自己’国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之外得来的）可以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那些‘先**

**进’国家的资本家也确实在收买他们，用直接的和间接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办法千方百计地收买他们。**

那么，这种超额利润能干什么呢?

可以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那些“先进”国家的资本家也确实在收买他们，用直接的和间接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办法千方百计地收买他们。

恰恰因为帝国主义能够剥削全世界，从而带来超额利润。那么，超额利润就能够被用来收买工人贵族，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贵族又成为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又由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对资产阶级统治的稳定作用，实际上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内部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

**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小市民化的工人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

你大可以把恩格斯和列宁的话放到现在的西方国家，看看是不是这样。

过去有个那谁把列宁、斯大林打成”沙俄孝子“，今天又来个把恩格斯、列宁打成”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操作，下一步是不是打算把脏水泼到毛主席身上？跟韩德强之流一样来一个”扬弃马克思“?

# 革命何以——纪念十月革命105周年

春秋镜

1917年11月7日（儒略历10月25日），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的领导下发动了十月革命，成功夺取政权，随后革命形势席卷全国。再之后短短数月中，由工农组成的革命军就动摇了俄国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根基，彻底瓦解了沙皇政权国家机器的独裁统治。

**那么，革命何以……？**

早期的学者站在统治阶级的视角，借“社会心理学”多认为革命与斗争是病态的，批评革命者不过是被谣言鼓动的“发疯的群众”，又归纳革命的特征是“贫穷、偏激和暴力”。

他们用“社会愤恨”和“相对剥夺—挫折感”等模型描述群众的不断上涨的欲望未能得到满足，声称这是暴露了“暴徒的邪恶本能”和“祖传的仇恨”，所谓革命不过是愤怒又胆怯的下层群众在期望破灭后，妄图不劳而获，而破坏社会既得秩序。

在这个语境下，就意味着十月革命的爆发取决于一战战败后的社会愤恨和报复行为。帝国昨日的光辉和今日的战败之间所形成的剥夺感和不平之意在人群中不断塑造着的恐惧、不满和愤怒，这些情绪聚集在一起导致了革命。

显然，这一论述忽视了更多更重要的历史事实。

将“振臂一呼”转换为“揭竿而起”的不是愤恨或是如此这般的情绪属性。在很多情况下，不满和愤恨实际上是社会常量，不能解释涨跌起落的革命形势。愤恨也远不能鼓励俄国人民投身革命，投身革命的人也不一定具有巨大的压迫感，而可以是旁观的“良心支持者”。社会怨恨等情绪也无法解释在权威压制强烈或国际关系稳定的情况下所形成的运动和斗争（Doug McAdam 甚至在《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一书中做了实证研究，彻底推翻了社会心理学有关革命者“心理异常”的假说）。

其背后所支持的理论更是错得离谱：革命不是病态的，而是“人们对严酷现实与压制性政治体制的一种挑战”，反之被革命的对象才多半是“病态”的。同时必须强调“偏激”往往是所有运动的一种被夸大的话语框架，而“贫困”是革命目标的一个源头而不是特征，“暴力”就更不是革命者的意图，而是与统治阶级互动过程或用来自卫的产物。

这些偏颇的保守理论和他们的变形在21世纪的今天仍具有市场，甚至成为了某种统治地位。常听人提到“奴性”，“老百姓还是听话”，又或是什么想像出来的“温良、软弱的民族性”，其本质就是震惊于“为什么在某种苦大仇深的情绪环境下革命还没有爆发？”于是乎，这就形成了一个民粹的悲观的自我感动的逻辑闭环，苦于不断增长的“愤恨、不满和挫折感”而无法行动，而又不断规训“自己是听话的”，再生产着“同胞是奴性的”等话语的合法性。

**那么，革命何以...?**

列宁给出了一个答案，那就是“先锋队政党理论”，即“专业组织和动员能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列宁认为工人只能自发形成工联主义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为了跳脱“经济利益导向”的改良运动，而转向政治实践，列宁创立了一个职业革命家的组织——先锋队。

在《怎么办》中，列宁批判了关于抗争的自发性的局限性，并强调需要通过“从外部灌输”的方法唤醒革命者。可以说，通过给年轻的“刚刚觉醒”的俄国工人阶级配备一个思想活跃的先锋队，列宁使马克思的理论适用于一个封建帝制的威权国家及其统治下的落后社会，有效加速了抗争精神和阶级意识的发展。

有关“组织性”的这一策略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它具有“人和”和“地利”的双重意义。“人和”是指主动通过“共识和行动”吸纳和组织知识分子、工农阶层和在动荡中被边缘化的社会精英，他展示了“社会合作的力量”，和形成“跨越阶级的‘革命大联合’”。人们团结起来的所共享的知识、契约、纪律、激励和信念也能够

避免搭便车等消极行为，甚至可以做到把旁观者变成拥护者和行动者（这一过程将在后文深入讨论）。

“地利”在这段中不仅是指“地理优势”，还包括联盟发展和易于动员的牢靠的地理结构，组织者有义务去寻找这种地理结构。大量经验性证据证明了地理结构在威权国家革命动员的重要性，例如巴黎公社的贫民社区，五月风暴的巴黎大学等等（后来法国改造了城市，拆散了巴黎大学）。这是因为威权国家可以消灭组织，却很难破坏以工作或居住空间为基础的人际交往，而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往往需要把人们聚集起来管理。革命者们从会议室进入更广泛的斗争空间，工厂和农村，进行“跨地域联盟”的过程往往需要组织，而高密度的工厂环境依靠其稳定性和邻近性的接触又反过来大大降低了扩张联盟和组织的不确定性。布尔什维克和工农们频繁而稳定的接触直接促进了团结和信任（如果缺乏频繁接触，工人们多会对革命者的理想置之不理）。

运用这革命遗产最成功的案例是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超越3000名韩国学生组建“小组运动”阵营和“地区基础劳工运动”阵营，配合进入工厂工作，帮助工人提高阶级意识并帮助他们组建工会（这一策略被简称为“融工”），试图将劳工斗争引向实现社会激进改造等重大的政治目标上。通过数千个地方性组织建立的规范和信任使全国各地的学生能够动员起来与朴正熙全斗焕政权进行高风险的对抗（这一过程在《韩国工人》中有详细描述），并最后推动社会民主主义改革。

然而，当这一策略被不加区分地机械地应用到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运动，而毫不估计其所处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实际造成了很多问题和无谓的牺牲。列宁在《怎么办》中对“自发性”的大力批判，也必须放在其历史背景下理解。正如列宁自己所说：**“对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也许是唯一的危险是夸大的革命主义，忽视了革命方法是适当的和可以成功运用的限度和条件。”**

列宁所处的封建帝制国家，虽然拥有强大的专制权力（despotic power，指国家精英（沙皇）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权力），可其渗透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指吸纳、建构、统治社会的能力）却远远小于现代一党专制的官僚主义国家。封建国家几乎没有能力影响社会生活（例如税收混乱，皇权不下乡？），而现代一党专制的官僚主义国家的吸纳能力，行政效率和渗透权力完全统治了社会，使得任何独立组织都成为了高风险的冒进左倾行为。

在这样一种不平等的被挤压的国家-社会关系下，为了避免被渗透，组织的属性会变得“诡异”起来：或是为了运动而运动，成为机会主义或表演性质；或是因为无法行动，而因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分裂；或是退入密室而无力应对新的变化；或是等级森严，极度排他。上述的特点在德国社民党，王明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意大利红色旅都可以看到，而这些组织属性实际对革命的萌发并无帮助。

**那么，革命何以……？**

如果把十月革命仅仅理解为先锋队组织理论的实践，那就大大低估了列宁革命的政治智慧和阶级/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正如前文所说，列宁早已强调影响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才是重要的，实际上毛泽东的“天下大乱，形势大好”的革命观也是在暗示革命所面临的“政治机遇”才是最重要的，组织架构和动员结构都可以根据所处的机遇和挑战而不断调整。所谓“政治机遇”是一切能激励人们参与革命的有利条件，或是降低统治者镇压运动的意愿或能力的因素。这些机遇不一定是结构性的，随着不同政体的互动而瞬息万变，抓住机遇革命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但随着机遇结构的扩大，革命萌发的可能就增大了。

通过结合政治经济学和地缘政治学，列宁对沙皇俄国国家性质的正确认识，尤其是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社会主义与战争》等著作中对帝国主义和世界体系的批判，使列宁正确评估了十月革命所面临的政治机遇结构的开放与威胁。

列宁敏锐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正在加剧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发达国家正不断从海外殖民地攫取超额利润以在经济上收买其本国的工人阶级，并借官方民族主义鼓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在这些国家，革命的机遇并不明朗。

反之，列宁强调社会主义革命也可以在欠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列宁的名言就此诞生，即革命将在沙皇俄国这一“帝国主义链条上的最薄弱的一环”开始。在这里，“薄弱一环”的特点，是由沙皇俄国国内结构和所处的国际地位的特殊性质和矛盾性质所决定的。

列宁认为尽管俄国金融资本（帝国）主义在沙皇主义对波斯、中国和蒙古的政策中充分显示了自己，但旧式的 "军事和封建帝国主义 "在俄国仍占主导地位。托洛茨基将这一特点概括为“双重帝国主义”，具体是指沙俄一边作为“特权殖民地”被迫与外国投资（如法国）进行着不平等交易，但同时压迫着邻近的弱小国家。这意味着与其他殖民国家相比，俄国资产阶级享有比外国帝国主义大得多的独立利益，而俄国无产阶级则毫无改良的机会，被迫承受超长工作时长的剥削以提供快速工业化的人口红利。

这意味着，沙皇俄国有帝国争霸的意图，却无实际能力。例如，沙俄的对外投资虽然很大，但与外国资本直接投资相比相形见绌，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帝国主义金融家的（法英德）国家贷款。“1914年初，俄国的国债总额为98.883亿卢布

（按当时通行的0.515美元兑换卢布的汇率，约为50.934亿美元）。”“随后，俄国为进行战争而在国外签订了各种债务，这些贷款加上国内发行的债券，使国家债务在1917年9月1日，即布尔什维克革命前达到了323亿卢布（约合166.345亿美元）”。

除此之外，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之所以也走上帝国主义道路，并不是因为它已经达到了垄断性的 "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而是因为它被沙皇的专制统治严重束缚，而不得不转向“邻近”的外国市场。所以，参加战争将有助于巩固他们在附近邻国的统治。那么，投机软弱的资产阶级一旦证明不可能清除国家的封建垃圾以保证资产阶级的主导地位，就只能与君主和贵族结成联盟，就像古契科夫所鼓吹的：沙皇的政府已经消失了，现在你们必须为整个民族的共同利益而流血。

在如此背景下，俄国在帝国主义冲突中的作用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它既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附属的 "环节"，其利益只有在“满足主帝国的利益的程度”上才能实现。他必须参与世界大战，然而他的利益和战争目标又只有地区级别，例如蒙古和土耳其海峡。可以说，正是这种一边依附更强的帝国，一边剥削个别的落后国家的特殊国际位置，使得沙俄半贵族化的资产阶级拥有世界帝国的利益，但又无法摄取足够的超额利润收买或改良或维稳，其国内阶级矛盾不断增长。

接着我们转向沙皇俄国的国内结构，即旧制度的结构的变动。这是重要的，因为历史上大多数的“民变”“反叛”“起义”大多是地方性的，但是列宁（1917）强调，“国家的政权问题才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

民变多是地方性的，主要是因为在旧制度下，地方豪强和封建贵族拥有更强的主权。彼得大帝通过专制改革，允许贫民和城市人口进入新的官僚制度，架空了封建贵族的政治权力，迫使封建贵族主动依附帝国政权以换取官阶等级。然而这一封建官僚制度并无法满足俄国的贯彻全国的行政需求，于是乎新的官僚阶层仍讽刺地需借助地主来“解放”农奴，其结果是，农奴也没有得到解放，还必须负担更重（极致）的国家税负，于是乎大量农民选择永久性进入城市。

通过垄断行政机构，沙俄通过重税不断收走农民的“剩余”，换取外国资本和技术，挥动国家资本主义的大棒刺激工业化。鼓励外资涌入，扶植国内产业，强制出口，一座一座大型工厂建起，沙俄工业化进程一路高歌（1906-1913期间维持每年6%，之前更高）。在这一阶段，外国资本和官僚专制达成了合作，民族和国外资本家都依赖专制制度，通过镇压性的国家机构来维持其毫无限制的剥削。

对于革命来说，这一改革最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快速造就并聚集了一个工业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大量聚集在大规模的工业企业和主要的工业中心，而这些地方又主要集中帝制沙俄的心脏，即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城内。

列宁通过观察发现，同时受到外资和国资所支配的工人阶级，每天都面临着高达10-12小时的超长劳动时间的剥削。这支无产阶级力量的独特之处在，他们既有意愿反抗帝制皇权，又有意愿反抗英法帝国所扶持的工业巨头和资本家!

沙俄工业化的目的不是为了反哺农民，而是为了向周边落后国家的扩张（一个证据是沙俄农业部门的增长状态，另一个是通过从普鲁士转向英法的外交联盟，迫使沙俄西部的边境安全建立在军事而不是政治基础之上）。然而，对于帝制国家（帝制国家不是帝国）来说，军事失败和政治上的混乱是必然结果。战时，国家与社会的边界被彻底打破，政治团体和社会团体互相交融，新的组织不断涌现。随着忠诚又保守的旧部队在战场上耗尽，超过1500万俄国城市人口（主要是工人，以及一些新官僚和知识分子）被动员、武装起来，他们或是接受过现代教育，或是极富阶级意识，不愿为帝国失利的战争陪葬。

正如前文所说，沙皇政权虽然没有现代的渗透能力，却有巨大的专制权力，面对逐渐激烈的矛盾，他仍拒绝改良，彻底掐断了公众参与的渠道（连民族主义的话语都不被允许），把温和改良派也视为政权的敌人。

工人、农民、士兵、妇女、革命者、改良者全部联合了起来（社会网络），在这里“全部解放是任何部分解放的必要条件！”帝国的行政机关很多一个接一个的瘫痪和解体，失去了统治阶级的庇佑，特权阶层和地主贵族更是脆弱不堪。革命的火焰从一个工厂传到另一个工厂（动员结构），从一个兵营传到另一个兵营，由此从彼得格勒传向全国!

**那么，我们可以回答“革命何以……”了吗?**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然而，十月革命并没有如列宁所期望的那样成为欧洲发达国家革命的导火线。首先一个结构性因素是，列宁错误评估了发达国家和世界体系的关系，例如低估了发达工业—金融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的重要性，夸大了对殖民地的依赖。

更进一步，列宁远远低估了（官方）民族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超强魔力。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融合已经超过了任何社会身份和政治思想，笼罩并统治了整个欧洲大陆。（本文并不准备进一步展开，推荐三本书《想象的共同体》《传统的发明》和《Banal Nationalism》，这三本书详细分析了民族主义是如何统治了世界。）

列宁和其他革命者的组织模式，也为发达国家的革命的爆发提供了障碍。他意识到发达国家通过超额利润收买无产阶级的大背景，但又不断批判（甚至嘲

讽）其社会主义同盟为“机会主义者、叛徒、没骨气的、强盗的同伙”。然而，这些被“开除左籍”的“社会主义同盟或社民党员”在西方有大量的工人阶级支持者。当列宁试图跳过这些“国际同盟”直接动员西方无产阶级，“唤醒他们的革命意识”的时候，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原因不是西方工人阶级对列宁的不认同，而是因为缺乏接触，而导致的缺乏信任。

**那么，革命何以……？**

我们强调了很多结构性因素，仿佛在强调“革命是等来的”，但革命实际上是一系列因素的互动的政治过程，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回归意识形态和话语、组织和自发性、动员和联盟的问题上，而读者有必要思考以上话题所处的政治环境。

革命组织的首要任务便是采纳一种世界观，它能有效地向每个被压迫者传达这样的一种看法，那就是现存的社会结构比在某个正常的时期更不合理，而这种不公平绝不是命中注定。

一个优秀的斗争框架（革命思想、话语、呼吁、象征符号等等）可以让人们凝聚起来，并达到“认知解放”的作用。比如“和平、面包和土地”的呼吁不仅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且表达了与资产阶级革命相当的大众情绪，尤其是关于和平的呼吁更甚于资产阶级。

总结来说，革命框架需具有以下特征：使动性，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所以框架必须是行动导向的；第二是斗争性，也就是挑战那些导致社会和阶级矛盾的权威；第三是动态性，也就是框架不能是机械的，而是必须随着所处的斗争过程不断变化的。在这个意义上，“内卷可耻，躺平有理”就是目前一个合适的斗争框架，首先它风险较低，易于实践；其次马克思强调，“对工作日长度的限制是走向革命的第一步”，在这个意义上又富有斗争性；最后它又适用于高渗透但又依托“人口红利”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

建构或者渲染一个成功的革命框架，大约需要五步，首先是对问题和挑战严重性的强调，其次是确认问题的根源，然后是对被革命的对象的批判，接着是要明确变革的可能性和有效性，最后是强调行动的正义性。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框架是可以只在书房里看电脑新闻就能构建出来的，反而是需要不断地社会实践，融入并切身理解社会生产过程。

听起来马列思想很好地反映了这五条？难道不可以直接高举马列主义大旗嘛？

斗争框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来自意识形态、历史文化记忆和对所处政治环境的认知的互动结合体。首先我们来看反例，五月风暴的学生高呼“给思想以力

量”或“继续斗争”，然而这些呼吁虽然听起来斗志昂扬，却不能在排队等汽油或领不到工资的法国工人那里引起共鸣，结果给了法国政府趁虚而入瓦解联盟的机会。在天安门运动中，也能看到北京市民们是对“反对官倒腐败，解决通货膨胀”的口号响应激烈，而对“自由民主”一类的口号比较冷淡。

另一个层面，框架的建构和政治合法性也相关（和保皇的政治宣传无关），政治合法性是指人们对其所共享的国家社会关系的认知。例如传统国家的统治者强调“以德治国”，而其人民也认可“当官不为民，不如回家卖红薯”的价值观，这就把道德表现塑造为一种互动的政治合法性。那么，当一场斗争运动从道德上挑战一个以道德为基础的政权时，任何国家控制手段都被视为非道德的，自然而然地削弱了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当然也有可能释放出可怕的民粹的力量）。

一个挑战是，革命者既要发展出有活力的象征符号，打破固有的社会认同，使之产生新的身份认同，从而引起变革；又要扎根于他们自己的历史文化提供熟悉的象征符号。“群众路线”正是一个积极的案例，毛泽东既没有简单回归马克思的工人中心论，也没有彻底否认列宁的先锋队理论，而是根据民国独特的国家社会关系结构，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新的发展，这与只会念经，甚至分不清“革命”和“社会运动”的“网左”实在是云泥之别。

正如前文所分析，列宁思想及其先锋队组织在十月革命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但这无法脱离当时俄国独特的国际地位和国内结构，若是脱离了时代背景，就想依靠复制先锋队以复制革命， 那未免是天方夜谭。

组织的运行需要组织成员提供两项重要资源——时间和金钱。这两样资源在“天下大乱，形势大好”的背景下，或是一些中产阶级发达和拥有独立公民社会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欧美的社会中是相对充足的。然而在一些国家-社会边境模糊，大小事务都被列宁式官僚制度领导的现代国家，独立组织是很难生存或发展，更不要说是运动组织了。

当然不是说组织不重要，而是不能不考虑后果，为了组织而组织（正如一些组织喜欢为了运动而运动一样），更要意识要在某些社会 进行组织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到底是什么。通过对两个没有一战背景和沙皇统治的案例，欧美民权运动组织和社会主义组织 的批判性研究， 希望可以引起读者的一些思考。

美国19-20世纪中期之间，大部分运转良好的挑战性组织，都采取了科层制的相对正式的组织模式。但随着更多进步运动（有关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发展，这一组织暴露出一个问题，正式的组织虽然有助于调动资源，但却缺乏动员更多人参与的草根性。于是乎，一个运动组织越是企图运用一个科层制的结构把作为思想和金钱来源的“外部灌输者”和作为主要人力的受益者工农阶级联系在一起，组织内部的矛盾和紧张就越多。

当组织者的利益替代了工农阶级的利益，反而限制了社会合作和民主的力量。进一步，科层制会导致“寡头化”，要么使得运动领袖被直接收买（林冲？），要么使得运动领袖左倾冒进（王明？），那么科层制组织就成了实现变革的阻碍。

最重要的是，组织越是涉及意识形态，矛盾和冲突就越大，注意是组织内部的矛盾，而非阶级斗争意义的矛盾。组织同盟对于社会变革的程度和选择的策略的观念差异越大，敌意性就越大。这就使得很多西方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只是有能力解释“伟大导师的著作”并将它们与今天的事件联系起来，而并没什么实际的阶级斗争的经验。

除此之外，当一个组织（在秩序井然时期）是建立在思想共识之上，而非建立在阶级斗争的经验或物质兴趣的基础，那就如同是“建立在沙子上的组织”，是不可持续的。欧美的列宁主义组织存在一个基本误解是认为只要继续招募新人，就能解决问题，然而这只是一种试图通过“集体努力”“合理化”“警告”的行为。其结果，最后不过是建立一个和一般中产阶级社会运动组织一样的组织，既和革命无关，也和阶级力量关系不大。

对于抗争者来说，认知偏差：“一种无懈可击的错觉”，“自我任命的思想卫士”，“自认为有历史站在自己一边”尤其危险。再加上学生们丰富的文化资本意味着左翼抗争者对革命等历史拥有更多的或乌托邦或教条的记忆，这样“改天换地”的英雄主义的记忆使得学生在运动中表现出一种“投机性”，具体体现在活跃分子们往往盲目地夸大政治机遇。政治机遇可以分为稳定型（国家中的议题文化、大众话语、阶级合法性等）和变异型（精英分裂，社会秩序混乱，国际动荡等），冒进的活跃分子往往在矛盾尚未爆发的时候便极力鼓吹或试图创造变异型政治机遇，而将稳定型政治机遇视为“妥协或投降”，最终导致失败和牺牲。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批判的对象多是来自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欧美的的组织案例。但是如果背景是一个官僚专制国家，又会是如何？历史上一个常见的答案，是“国中之国”的组织形式，其特点是（民主？）集权制、等级制、结构严密的、意识形态主导的。他可以高效地在专制政治的背景下运作和生存，但同时也可能因个别领导人的失误，而葬送整个组织，例如德国社民党建立的国中之国在面对纳粹的新挑战就毫无招架之力。列宁和毛泽东给出了一个解决方式，即建立一个很强的依附于农村、邻里、工厂的人际网络，只有这种组织形式才能在这种不平等的国家社会关系下建立广泛的和跨地区的联盟。

这是不是唯一的答案？值得读者思考并探索。

列宁曾在《怎么办》中大力批判“自发性”，但随着斗争周期的展开和1905革命的爆发，列宁发现“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在行动中远远地超过了最先进的理论家的最大胆的观点，他写道，“工人阶级本能地、自发地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阶级在国家尚有超额利润收买无产者的时候，他们自发会变成工联主义者，但当阶级矛盾严峻，国家无法从海外摄取超额利润进行改良的时候，那么自发性也可以引发革命!

如果机械地呼吁组织来对抗现代官僚主义一党制国家（CBSPS）的统治阶级，就会发现高压打击，组织控制，政治顺从，激励分化的全方位的维稳力度，使得社会成为附属，使得组织的成本远远大于效益，甚至是“过去三十年培养的马列毛青年被一网打尽”的尴尬境地。例如，工作单位的激励恰恰鼓励个人通过特权和特殊关系而不是集体行动来追求利益，这就使得原本用于斗争动员的社会关系网络，反过来被用于服务特权阶层。

然而，这种制度结构却给了自发性革命机会。首先，CBSPS通过取消各类组织和社会群体的边界， 导致了人们身居不同单位或群体但有类似行为模式和需求的“大数”现象，提高了社会群体间的同质性，从而大大降低了集体行动的困难。一旦发生频繁的全国性质的政策变动，威胁和机遇就会暴露出来，在疫情期间，“大数”现象实际上愈演愈烈，甚至形成了地方性的斗争周期。

除了同质性之外，统治阶级的投机性动员，也容易激发运动的自发性，这包括投机性的帝国战争，也包括投机性的房地产运动，这些不可持续的动员一旦失败，就会重创国家合法性和依靠财政的维稳能力，这也是为何沙俄快速从日俄战争中抽身出来尚能稳住政权，但一旦深陷一战就招致革命。

其次“政自中央出”使得地方政府成为中央代言人，地方政府虽然在形式和观念上需要落实中央政策，但地方和基层政府又被允许灵活执行中央政策，于是导致了一系列如层层加码，共谋瞒上，敷衍了事的 高级黑行为或官僚主义戏码，不断刺激着民众。那么政治放大就不可避免了，例如政策具体执行问题被放大到 政府总体问题。信访制度的存在又鼓励矛盾向上转移，使得地方性矛盾自发可能成为 全国性矛盾。

除了自发性抗争之外，另一种形式被称为“集体无作为”，或是“大躺平运动”。前文简单探讨了“躺平有理”的使动性、斗争性和动态性，他的政治意义也觉不能小觑。这是因为缺乏程序正义的CBSPS将他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不断实现各种如经济增长的绩效奇迹之上，这使得行政管理问题纷纷政治化，甚至政治扩大化，那么原本只是和个人选择或者社会经济有关的“躺平”，就变成了一种不能直接镇压的政治挑战。更重要的，躺平拥有完全的道德-法治合法性，其定义实际上是与

内卷相对应的，也就是只是将10-12小时工作时间降为法律要求的8小时而已，不过这与“人口红利”的摄取相冲突。

最后两个推动自发性的重要条件是情感因素的激发和地理结构。正如前文所说，国家道德表现是人们审视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标志，“毛泽东主义道德经济”的斗争框架被普遍使用在国企工人的斗争大潮当中，亦也被使用在了“河南710储户维权运动中”，这一框架所富含了强大的情感能量。

当一个不平等的社会现实长期存在或不断恶化，预先存在的情绪使得抗争者更有可能对谣言做出积极回应，并自发加入到斗争中去。这并非是抗争者缺乏智慧，而是他们处于信息不对等的位置，正如“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是信息的公开透明。就好像通钢事件中的工人们早已受够了建龙集团的投机和腐败行为，所以稍有风吹草动，工人们就立刻行动起来，掀翻警车，又乱拳打死了资本家。在稍稍不太民主的政权中，由于缺少日常的竞争，在任何政治不稳定的迹象都会成为斗争的信号和源泉。

地理结构的重要性质，在上文关于先锋队的部分简单讨论过了。在巴黎公社中，“将不同职业的工人联系起来的是他们作为邻居所经历的有形纽带，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共同结构地位的抽象纽带。”也就是说，真正促使人民献身革命的不完全是无产阶级的身份认同，而是邻里关系。农民工相对国企工人有更大流动性，这意味着他们更难被凝聚，但显然高密度的工厂环境已经弥补了这一缺陷，例如浙江湖州民工抗税运动中表现的那样。以“宿舍”（8-10人一间）和“劳动车间”为基础的强结构，和以“阶级斗争工人领袖”为核心的关系网络，互相重叠，形成了一张富有强力的大网，大大提高了斗争的参与率和凝聚力。如果工厂所处工业园区，还可以在厂内动员成功之后，进行跨工厂联盟（详见《韩国工人》或相关的东北国企工人运动记述）。

地理环境作为动员结构在1989年的天安门学生运动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威权政权有意将学生集中起来管理，这使得北京海淀区聚集了约67所高校大学和16万学生（现在只有20几所），反而为斗争提供了温床。研究发现大量学生每日生活存在三点一线，即教室-食堂和宿舍。食堂门口贴满了大字报，并有大量活跃分子主动演讲，使运动信息和异见性思想得以进入更广泛的社会网络。以高密度的宿舍为基础的学生网络结构构成了学生之间互相影响，游说甚至强制参与的基础（本科上的比研究生比例高，外地上的比北京比例高）。

60所大学的集中分布也促进了不同大学学生之间的模仿、竞争和团结，并形成了特定的基于地理环境的斗争策略。观察发现运动期间虽然冲突不断，但警察基本不会进入校园。各大校园的高墙首先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低风险的动员环境。因为缺乏足够的响应和追随，学生们并不会直接冲出校园，而是在校园内来回游

行以营造出一种群情激昂的氛围，每转悠一圈便会增加数十人。其次，各个大学之间距离很近，许多学生骑着自行车，来回传递其他学校的动态，以鼓励竞争和模仿。

在4月27日的反对《人民日报》社论的示威游行中，当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到达第一条警戒线时，他们没有直接与警方发生冲突，而是选择了“迂回”路线撤退到北京邮电大学内进行动员，然后以“游击”的形式进入中央财经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医科大学等等。最后，几条学生队伍完成了“会师”，上万名来自四面八方的学生反过来包围了警戒线。这些策略完全是自发性质的，因为大量学生在参与时都只穿着拖鞋。

洋洋洒洒一万字，在最后篇章里，本文将简单介绍一场拉丁美洲的左翼革命，结合十月革命的讨论，试图提出一条一般性的革命理论。

1979年索摩查政权被推翻，宣告了其长达五十年的残酷统治的结束。实际上，早在1970年，尼加拉瓜的民族解放阵线就已经动员了足够的人民，包括学生，劳工联合会和农民，但革命并没有爆发。在1970年到1979年期间，南美洲众多游击队都遭受了失败，而尼加拉瓜的革命却取得了成功。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探究。

1972年12月末，一场大地震席卷了尼加拉瓜，将其首都马纳几瓜夷为了平地。索摩查贪婪地利用了这次灾害：他和他的家族亲信垄断了因重建首都而造就的各种市场，垄断性把持了旧房拆除，房地产投机，道路施工和商业大楼的建设，并把新建的住房超额卖出。

统治阶级联盟出现了第一个裂缝：这一过程改变了索摩查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

随后三年，索摩查政权倒行逆施，于1974年强制施行极其野蛮的三十三个月的戒严法，戒严法本是用以对付革命军，但索摩查却借此法垄断政治权力，把体制内的精英逼得不断左倾，最后居然和民族解放阵线的革命者站到了一起。加入革命阵线的资产阶级包括有实业家、律师、超市巨头和国际银行家，并与游击队组建了革命政府和跨阶级联盟。

索摩查政权的戒严法和维稳力量确实不容小觑，其背后是美国的大力支持。但是当美国看到索摩查人心丧尽之后，在1974到1978年间，削减了其75%的经济和武器援助。这彻底取消了索摩查政权的威权合法性，更是大大鼓舞了革命阵线的决心和勇气。

1978年，一位反对派高官查莫罗遭到暗杀，彻底激怒了城市人口，三万人上街游行，资产阶级趁机发动了总罢工，革命阵线发动了多次军事行动。索摩查政权很快溃不成军，大厦倾倒。

这里，我们得以总结出革命四个最重要的政治机遇结构—— 制度化政治系统的开放与封闭，精英的分裂或一致性，社会政治联盟的合作，政权的镇压能力或意愿——是由一系列偶然事件、不确定性、新的威胁与机遇和结构性因素的组合。

**那么，我们最后一次问：革命何以……?**

基于马克思的理论，深入列宁的帝国主义批评，世界体系理论以“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和世界性商品交易”将世界各国分为“中心国家”、“外围国家”和“半外围国家”，体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体性和不平等。英美等发达国家居于中心位置，掌握尖端技术和垄断性资本积累，通过不平等交换和金融输出，得以攫取大量海外超额利润，维持其帝国统治。俄罗斯、中东国家、非洲国家等国家居于外围位置，为世界体系秩序提供大量如能源、矿石等原材料商品。外围国家依附于中心国家，而不得发展。

一个特例就是“半外围国家”，正如前文介绍的沙皇俄国。半外围国家得以通过对外引资和对内“人口红利”的超长劳动时长、超强劳动强度，获取了原始积累，快速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使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全面发展，成为世界体系重要的工业生产大国。然而，与“中心国家”相比，半外围国家又不具备垄断性产业技术，更无法从广泛的外围国家攫取足够的超额利润，其统治/资产阶级对中心国家又带有依附性，但其社会又拥有世界最大的工业无产阶级群体。另一方面与外围国家相比，半外围国家并无大量原材料可以使用，而不得不和社会建立较深的（剥削/压迫/治理/改良）关系，故其阶级矛盾最为严峻。

半外围国家的统治阶级要想维系其建立在绩效表现上的威权，有那么几条路：利用“空间修复”，使剩余资本进入新的建筑建设市场（元宇宙？），以此赚取超额地租，但这没有解决矛盾，而只是延缓了矛盾的爆发；建立“资产阶级命运共同体”，通过攫取外围国家的超额利润，以改良国内的矛盾，但历史和详细的经济数据已经证明，1-3%的利润率远不能“改善”半外围国家“承上启下”的国际关系，加之外围国家动荡的地缘政治风险，使这一方法逐渐消失在统治阶级的宣传中；最后一种方法即加大榨取“人口红利”的剩余的同时，而全面参与产业升级的竞争，这意味着半外围国家的统治阶级将直面中心国家的统治阶级.....

一旦半外围国家丧失了剩余劳动力的优势而转入老龄社会，又在产业升级的竞赛中败退下来，就使得其政权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其国内的工业垄断只会成为靶子，而完全不能攫取海外超额利润以收买或维稳无产阶级，改良路线将难以为继。正如沙皇俄国一般，半外围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已经“半贵族化”，这意味

着他们会对一般的工人运动进行毫不留情地镇压。但历史已经证明，如此行径只会帮助消除跨阶级联盟之间的隔阂，促进全民性的工人（无产）阶级意识和阶级政治的形成。另一边，丧失改良的资本，意味着其政体的吸纳包容性，渗透维稳性和科层执行力将大大萎缩，官僚结构被架空，法律被悬置，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级将无法维持自己的“特权生活”，而被逼转入“革命大联合”。

总结来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薄弱一环”正是“半外围国家”。

当然，“革命”不是阶级/经济决定论的，正如我们之前批评列宁缺乏对民族主义的认识一样，但一系列结构性的挑战中，必然开启新的政治机遇结构，伴随着偶然性，不确定性，旧秩序在历史大潮中开始转变，形势会怎么样?

# 阳和平先生的群众观<br>还是毛主席的群众观？

远 航 一 号

**远航一号注**：在近日的网上论战中，阳和平先生胡说什么“无产阶级不会组织社会大生产，那么就只好由资产阶级来组织”，在广大进步网友面前充分暴露了其口头马列毛、骨子里自由派的本质。实际上，阳和平先生这种思想上的退步和堕落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长久以来一直如此。只不过，过去，他披着“革命后代”的光环，迷惑了很多人的眼睛。他身边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分子、亲帝国主义“左派”拼命地维护他、吹捧他。熟悉他的一些马列毛主义者，由于受到小资产阶级虚伪道德的束缚，碍于个人情面，对于他的真实面目或者没有揭露或者揭露得不彻底。然而，说到底，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一个人的阶级本性在长时间的现实斗争中总是要表现出来、暴露出来的。

即使在此次大暴露之前，阳和平先生仇视社会主义、崇拜资产阶级民主的本性实际上已经有所表现了。那个时候，一般马列毛群众往往都还对他抱以最良好的愿望，没有注意到他在这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由于阳先生“革命后代”的身份是他不得不依赖的政治资本，他一般不公然诋毁毛主席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却实际上仇视中国以外的一切社会主义，从而将其真实立场掩盖起来。

2019年12月，在激流网组织的一次活动中，阳和平借宣传“毛泽东的群众观”为名，遮遮掩掩地暗示，香港的运动“主流”是好的，是“革命”的。他污蔑1989年以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垄断官僚资本主义专制”，认为1989年以后的资本主义复辟是一种“进步”，认为“非官僚资产阶级”比“国家垄断官僚资产阶级”更进步，甚至公然为1956年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翻案。由于阳和平先生在讲话中不是光明正大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而是欲言又止、指桑骂槐，只有熟悉他本人以及左派内部相关问题论战的人，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想说未说的又有哪些。下面，重新发表远航一号于2019年12月27日发表的揭露阳和平“群众观”的文章，以帮助各位网友了解阳和平反动立场的来龙去脉。

近日，很多进步团体都举办了纪念毛主席诞辰126周年的活动。激流网也于12月21日召开了主题为“毛泽东的群众观”的研讨会。在会上，他们邀请阳和平先生做了题为“简论毛泽东的群众观”的发言。这篇发言的全文发表在激流网上。

阳和平先生的发言分四个部分。第一、第二部分是铺垫。在这两部分里，阳和平先生讲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阳先生一方面讲，看群众运动，要“从社会的主要矛盾出发”，要“看大方向”，要“看主流”，另一方面又讲，“群众运动中出头露面的和带头人物的主张不一定代表这个运动的实质”。如果不去看哪种社会力量掌握了群众运动的领导权，不去看掌握了群众运动领导权的人物他们的主张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了解一场群众运动的“主要矛盾”、“大方向”、“主流”呢?

阳先生发言的第三、第四部分是重点。阳先生发言的第三部分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阳先生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群众运动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阳先生在这段发言中，将原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通劳动群众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右派利用一部分劳动群众发动的一些反对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混为一谈。

下面这段话可以集中反映阳和平先生的这一错误:

在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自从修正主义上台以后，那里的无产阶级就丧失了自己的政党，那里的无产阶级专政就让位于国家垄断官僚资本主义的专制。在那里，工人阶级的反抗是本能的……表现在匈牙利的工人群众趁着右派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对专制政权不满的匈牙利事件在全国各地迅速地组建了工人代表会议的权力机构上。

阳和平在这里讲的“工人阶级的反抗是本能的”，指的是1956年的波兰、匈牙利事件。阳和平先生认为，在那个时候，修正主义就已经在苏联和东欧上台了，苏联和东欧各国就已经是“国家垄断官僚资本主义的专制”。在阳先生看来，这种“国家垄断官僚资本主义的专制”贯穿着从斯大林去世到1989年的整个时期。1989年以后，“非国家垄断的资产阶级利用工人阶级对国家垄断官僚资产阶级专制的不满”夺取了政权，“为了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前者对工人阶级起码要做一些哪怕是暂时的让步。”换言之，在阳先生看来，在前苏联和东欧资本主义复辟以后出现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政权与以往的“国家垄断官僚资产阶级专制”相比，对工人阶级做了“暂时的让步”，得到了“工人阶级的支持”，对工人阶级更加有利，也可以说更加进步一些。

阳先生这种对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在1989年以前社会性质的看法（其实质，是否认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且认为“国家垄断官僚资本主义的专制”比资本主义复辟以后的社会更加反动）是否符合世界历史的实际，笔者在这里姑且不论。

下面集中讨论一下毛主席和当时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对于匈牙利事件的看法。

## 毛主席是怎样看待匈牙利事件中的“群众运动”的?

在阳和平先生看来，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是匈牙利的工人阶级“趁着右派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对专制政权的不满”对“国家垄断官僚资本主义专制”的反抗，还建立了“工人代表会议的权力机构”。阳先生虽然没有直接宣布这些“工人代表会议的权力机构”的政治性质，但是参照后面阳先生认为“波兰的工人阶级在70-80年代用工联主义反抗国家垄断官僚资本主义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进步”，匈牙利工人用“工人代表会议的权力机构”来反抗“国家垄断官僚资本主义”显然就更有资格被认为是“革命性的进步”了。

那个时候，毛主席和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的中共中央是怎样看待匈牙利事件以及事件中的所谓“群众运动”呢？有史料表明，在匈牙利反革命事变恶化以后，当时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一度动摇犹豫。在紧要关头，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透过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判断匈牙利事件已经发展为反革命叛乱，敦促苏共中央采取果断行动。正是在中共中央的帮助下，当时的苏共中央才下定决心，出动苏联红军，帮助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镇压了反革命叛乱，从而巩固了匈牙利社会主义政权和当时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也大大提高了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运中的声望。

可见，毛主席对于群众运动的态度，绝不是像阳和平先生想象的那样，似乎认为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只要某种社会力量打出“群众运动”的旗号，就是天然进步天然合理的。群众运动是有阶级性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些群众运动也可以是反动的、反革命的。

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再论》）。这篇文章在发表时注明，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据吴冷西等同志回忆，写作这篇文章，是由毛主席亲自提议的，其主要思想是毛主席的，又在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了反复修改，最后由毛主席定稿。所以，《再论》一文实际上体现的是毛主席的思想，是毛主席对于到那时为止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一次总结。

《再论》明确指出，匈牙利事件“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再论》肯定了当时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的决议，认为匈牙利事件的实质是“反革命复辟阴谋”，国际帝国主义在其中“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再论》肯定了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和伟大成就，认为当时的苏联劳动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翁”，总结了五点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

《再论》指出了斯大林对于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伟大功绩，也指出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再论》特别指出，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由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造成的。《再论》认为，“苏联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的。”为了纠正斯大林的错误，不需要去“纠正”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

《再论》批评了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当时对于匈牙利事件的一些看法。《再论》明确批评了当时南斯拉夫主要领导人之一卡德尔认为匈牙利“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的错误看法，批评了南斯拉夫领导人关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即重建后的匈牙利共产党）应当“把全部政权交给布达佩斯和其它区域性的工人委员会”的错误主张，批评了卡德尔所谓可以“不管工人委员会成了什么样子”、“这样的党是官僚专制的化身”的错误论调。《再论》明确支持当时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解散“被反革命分子所操纵的布达佩斯和其它区域性的工人委员会”，认为，“匈牙利的同志们是作得完全正确的。否则匈牙利的将来就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反革命。”

可见，与阳和平先生认为，“凡是千千万万个人民群众参与的抗争都具有天然的革命因素”、不必担心群众运动中“谁利用了谁”的观点相反，毛主席和当时中国

共产党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有反革命的群众运动的，甚至名为“工人委员会”的群众组织也可以被反革命分子操纵。与阳和平先生所认为的当时的匈牙利工人反抗的是“国家垄断官僚资本主义专制”相反，毛主席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明确批评了当时南斯拉夫领导人所谓匈牙利社会主义已经是“官僚专制的化身”的错误观点，坚定支持了在苏联红军帮助下镇压了反革命叛乱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

以阳和平先生的个人经历，对于毛主席对匈牙利事件的看法以及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可能不了解。了解了，却仍然认为当时的苏联和东欧各国就已经是“国家垄断官僚资本主义专制”，仍然认为匈牙利事件不是反革命叛乱而是本能的“工人阶级的反抗”。这样做，是因为阳先生对于马列毛主义有自己的独到创新和发展吗？如果有，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独到创新和发展拿出来，让我们都看看，阳和平先生比毛主席高明在哪里？如果没有，为什么明知毛主席在有关问题上的教导，却要掩盖这些教导，违背这些教导，来兜售自己的而不是毛主席的“群众观”呢？

## 阳和平先生的“甚至有一种说法”

阳和平先生“简论”一文的第四部分提出了一个没头没脑的问题，“什么才是法西斯主义的‘群众运动’？”阳先生说：“历史上一些群众运动经常会出现打砸抢烧的行为……甚至有一种说法，叫‘法西斯主义的群众运动’。”

为什么说阳先生没头没脑呢？阳先生发言的总标题是“简论毛泽东的群众观”。笔者浅薄，不知道毛主席终其一生在什么场合专门讨论了“法西斯主义的群众运动”。阳先生说，“甚至有一种说法”。那么，是谁的说法？关于什么问题的说法？阳先生不讲。

查主流媒体，在最近一个时期没有这方面的文章。在过去一年中，阳先生本人似乎也没有这方面的专论。激流网倒是在本月17日发表了一篇译文，叫做“右翼的兴起”，翻译自美国的《每月评论》杂志，是加尔各答一份著名的社会主义杂志对《每月评论》主编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采访。但这份采访并没有提及发生在中国领土范围内的“法西斯主义的群众运动”。

于是，我们红色中国网的同志只得反躬自省。原来，在今年8月15日，红色中国网的水边编辑曾经撰写一篇文章，题为“香港运动已成为法西斯运动，左派不要自欺欺人”。似乎符合阳和平先生的“有一种说法”的定义。

在那篇文章中，水边同志指出：“香港的法西斯运动，物质基础是香港乃至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整个经济社会体制的衰落，而文化基础则是香港本土主义在近

十年的兴起。……这些新的法西斯主义普遍的特点是把资本主义带来的巨大问题怪罪到某一些特定的群体身上。……香港的政治有其与世界资本主义发达地区一致的情况，那就是在资本主义矛盾尖锐的情况下，产生了排外，尤其是歧视排斥大陆群众的思潮。对大陆人的歧视是长期的现象，把歧视提升到了排斥大陆人，乃至要清除大陆人和大陆的影响（各色光复运动），这是近十年才发展起来的。… 在近十年来的香港政治运动当中，右翼势力，以及其中的法西斯部分，得到了长足的、几乎没有阻碍的发展。这里面被提升到理论层次的，就是一批所谓港独理论。”

阳和平先生，你看，这是不是你要批判的“有一种说法”呢？在上面这种“说法”中，水边同志指出了香港法西斯群众运动的根源是香港和世界范围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矛盾，在矛盾尖锐又无法解决的条件下，香港的相当一部分群众将资本主义带来的巨大问题怪罪到中国内地人民头上，并产生了普遍的歧视排斥内地群众的思潮而且付诸于行动。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为什么说当前香港的群众运动是反动的？为什么这次运动是必然要失败的？”），远航一号同志又指出，这次香港的群众运动是由香港的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这次运动事实上是一次右翼民粹主义运动（或者是在右翼民粹主义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运动）。远航一号同志还指出，除了将中国内地群众作为资本主义矛盾的替罪羊以外，右翼民粹主义的一个客观物质基础是香港的小资产阶级幻想通过排斥驱除内地人民的办法来维持对香港高工资劳动力市场的垄断。

我们注意到，在激流网上发表的《每月评论》文章中，福斯特对于法西斯主义的阶级基础是这样说明的：“按照阶级定义的法西斯主义是以动摇的中下层阶级、阶层或小资产阶级为群众基础，以及反工人阶级、反移民、种族主义和仇外的运动。”可见，水边、远航一号关于法西斯主义或右翼民粹主义概念的运用与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于新法西斯主义概念的运用是一致的。

阳先生，请明示，你所谓的“有一种说法”，到底是不是针对水边和远航一号的上述观点呢？到底是不是针对红色中国网呢？阳和平先生，你赞成不赞成水边同志和远航一号同志对过去半年中香港群众运动的分析和判断呢？

阳先生不说，而是提出了一个他自己的关于什么是或者不是法西斯主义群众运动的标准：

没有国家暴力，即资产阶级做后盾和默许的所谓“群众运动”是不可能成为法西斯主义的运动。因此，群众性的打砸抢烧和排外的暴动行为是具有法西斯主义

性质的反动行为还是具有革命性的群众运动取决于国家暴力，即资产阶级的态度是默许和支持还是打压。

香港的群众运动到底有没有香港资产阶级做后盾，在有更多的事实材料证明之前，我们暂且不论。阳和平先生在上面倒是给出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判断“群众性的打砸抢烧和排外的暴动行为”是“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反动行为”还是“具有革命性的群众运动”的标准。只需要看“国家暴力”对于运动是“支持还是打压”。二者必居其一，没有什么含混的余地。

按照这个阳氏法西斯主义定义，显然，香港的群众运动一直被香港的“国家暴力”打压着，只能是“具有革命性的群众运动”。

考虑到阳和平先生致力于对马列毛主义的发展和创新，未必有时间详细考察香港的群众运动，我们给阳和平先生提供一点材料，供阳先生研究、思考。

8月16日，在香港学生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在万人集会中提出了“英美港盟”的口号，要求英国确认中国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作为其合作伙伴的连登“我要揽炒”团队，在致各国公开信中说：“最后，在此温馨提示香港政府 —— 假如中英联合声明失效，根据1841年穿鼻草条约、1842年南京条约及1860年北京条约，英国有权强行回收香港岛及九龙半岛。”10月1日前，香港科技大学学生会的“科大行动”发起所谓与中国“断交日”活动，主张：“强制遣返在港中国人；吊销中资企业在港营运执照；建立实体边境、限制两国交流”。

当然，按照阳和平先生的群众观，“带头人物的主张不一定代表这个运动的实质”，上述这些都不是运动的“大方向”、不是“主流”。

关于运动的“主流”，我们也有一些情报，叫做“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不谴责”，“不割席”。

香港的港独分子可能确实不懂。但是，阳和平先生，您可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难道也不懂得1842年南京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吗？要将历史上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再强加于今天的中国，不要说这是一个运动的主流，即便是支流，在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眼中、在历史上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广大亚非拉人民眼中，也绝不可能是什么“具有革命性的群众运动”，也绝不可能被容忍！更不必说香港的“主流”还要“不谴责”、“不割席”。

阳和平先生，毛主席的在天之灵看着我们，如果主席在世，他老人家是会坚决依靠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来解决香港问题呢？还是依靠那些一心要恢复1842年南京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的香港“革命群众”强制遣返在港中国人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相信，你有一份答案，我们也有一份答案，全中国人民还有一份答案。

正确的答案，只能在全中国人民这个最大的群众那里。这，才是毛主席的群众观。

# 与蒸馏水编辑和其他网友讨论女性受压迫问题

井冈山卫士

蒸馏水同志在阳和平文章的帖子[14]下面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思考，也列举了很多证据。蒸馏水和其他网友们的讨论无论从水平还是政治意义上都已经远远超过了原贴中阳和平的文章。因此我在这里另开一帖与蒸馏水和其他同志讨论一下中国女性受压迫的问题。

我的看法仍然是：今天中国女性受到的压迫，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造成的，而不是任何超越或者独立于资本主义的“父权”造成的。在没有阶级社会的时代，没有什么父权，在未来的无阶级社会，也不存在什么父权。因此女性解放是劳动人民解放的一部分，劳动人民解放必然与女性解放兼容。反之，女性解放如果被理解为独立于生产关系的事物，那么不仅与劳动人民的解放不相容，而且最终也不能达到女性解放的目的。

从理论史的角度讲，认为父权制度和生产关系之间虽然相互依存但从根本上是两种“独立”关系的，在西方主要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思潮。其中海蒂·哈特曼的“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是该领域的开山之作。今天美国一些进步色彩强烈的女性主义学者（不包括支持AOC的人）赞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多。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他们认为自己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阶级分析和激进女性主义的身份政治分析的集大成者。他们认为在阶级斗争的总问题上，男女劳动者

14. http://redchinacn.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788

是同盟；但是在性别关系上，男性（无论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是残酷压迫女性的罪人。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有如下几个有意思的推论：

第一，男性对女性的（独立于阶级的）压迫不会因为生产关系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用的例子是苏联和中国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例子。他们认为苏联和中国已经消灭了阶级，但是这两个国家的“女性解放”仅仅是国家为了有效占有女性的劳动力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我们都知道，苏联和中国都没有消灭阶级，它们都是阶级社会的具体形态，其生产关系的变化都没有达到消灭阶级的地步。因此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论点是建立在错误论据之上的。因此并不能论证没有了阶级社会之后还会有性别压迫。

第二，既然性别压迫和阶级压迫是相互独立的，那么有时性别压迫就是最迫切的问题。用更明白的话说，只要一天看不到资本主义的灭亡，因而无法解决阶级压迫，那么斗男性就是主要问题。

这也能解释在此次黑社会打人事件中，有人叫嚣着要让中国劳动人民男性赎罪。

事实上，今天中国存在的对女性的压迫，并不是什么独立于资本主义的“男性罪孽”，而是中国半外围资本主义的产物。

关于蒸馏水提到的岗位歧视的问题。“高层管理人员”属于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他们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寄生阶级。他们内部之间的男女不平等只具备腐朽无聊的肥皂剧的意义，不具备阶级斗争或性别斗争的意义。对于一般小资女性和工人阶级女性的就业歧视，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拒绝承担女性必须担负的代际再生产成本。在他们看来，我只管剥削，要新鲜劳动力，有别的女性生孩子就行了。这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是可以通过消灭资本主义来解决的。

关于蒸馏水提到的贫困女性失学的问题，这是资本主义复辟以后农村人民公社解体，因而农村家庭必须依赖男性后代提供劳动力和打手的需要。因此男性后代接受的资源更多。同时，由于上面提到的岗位歧视，男性后代更有可能在外出打工时被雇佣，因此农村家庭进一步将资源集中在男性后代身上。

关于女性被黑社会欺压的问题。首先，即使是女性受欺压的概率比男性大，也不能说明是独立于（资本主义）黑社会的“男性”欺压了女性。第二，黑社会的欺压对象往往是占有一些土地和其他资源的农村家庭，或者城市个体户。黑社会掌握的武力并不在乎对方是男性或者女性。

关于家庭劳动时间对比的问题。日本和南朝鲜男性下班之后还要被迫喝酒应酬。这其实是工作时间，是向上级表示忠心和服从的培训。这种培训极大地挤占了男性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也让工人阶级男性苦不堪言。这是日本和南朝鲜资

本主义规训劳动力，试图维持劳动纪律的方式。在进入世界体系之前，这种特殊的“父权制”也不存在。

# 美国堕胎权之争中的法律问题和阶级斗争问题——几点感想

远 航 一 号

随便搜了搜，关于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裁决的中文报道几乎全部给人的印象都是堕胎在美国已经非法了。

实际上，此次最高法院裁决后，堕胎在美国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合法或基本合法的。这次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推翻罗诉韦德案，其实质效果是允许各州自行决定是否禁止堕胎或对堕胎实行限制。目前在27个州中堕胎是合法的，13个州可能在经过一定法律程序后禁止堕胎（但即使禁止堕胎的州也会允许因强奸怀孕后要求堕胎等例外），另有约10个州法律含义还不明朗。

关于美国堕胎问题，有几个层次。表面上当然是个法律问题。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搞清楚：哪些阶级赞成，哪些阶级反对；哪些阶级在什么时期什么条件下赞成，在什么时期什么条件下又反对。否则遇到这种事情，永远是人云亦云，一头雾水。

表面上的法律问题是：堕胎权是否属于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制度下的所谓“基本人权”或普世价值的一部分？

大家请注意，在资产阶级宪政范围内，自由是对民主的限制。或者说，民主权力不得用来剥夺基本人权。如果堕胎权是基本人权，恰恰意味着它不再受民主政治程序约束。而绝大多数关于此次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的报道所蓄意忽略的恰恰是，最高法院多数派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堕胎应该是一个由公民通过民主程序决定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凌驾于民主之上的问题。

即使承认堕胎权是基本人权，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权利是否由怀孕妇女完全独自享有，还是必须由怀孕妇女与孩子生父共有？这方面，美国的“左派”100%都认为是由怀孕妇女独自占有，甚至认为生父不仅没有同意权而且不必有知情权。

与之相关的法律问题是，未出生胎儿是否有生命权？有生命权的未出生胎儿的定义是什么？是从卵子受精那一刻算起？还是怀孕后若干星期？若干个月？还是直到分娩那一刻？甚至于，直到分娩后某个时间？

这些还都是纯法律问题。可见，并没有什么简单明了、天然正确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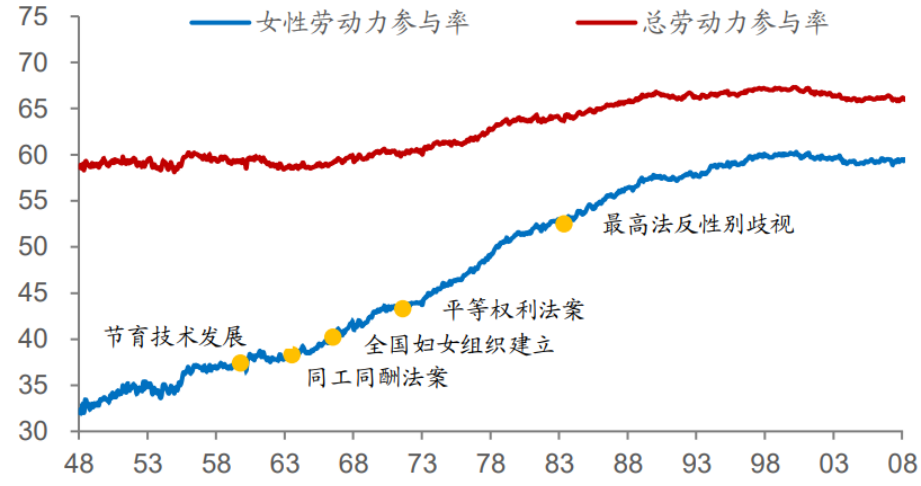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从来不承认有什么超越历史时代、超越社会形态的基本人权或普世价值，而只承认由特定历史时代、特定社会所确立的、服从于阶级划分的“权利”。堕胎权也是如此，既非天然进步，也不是注定邪恶，一切以具体历史条件为转移。

历史上，堕胎自由曾经对妇女解放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部分原因是，堕胎自由通过与避孕、计划生育相结合，可以减少某些不必要的生育和养育负担，有助于将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进而使得更多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从而改善相对于男性的社会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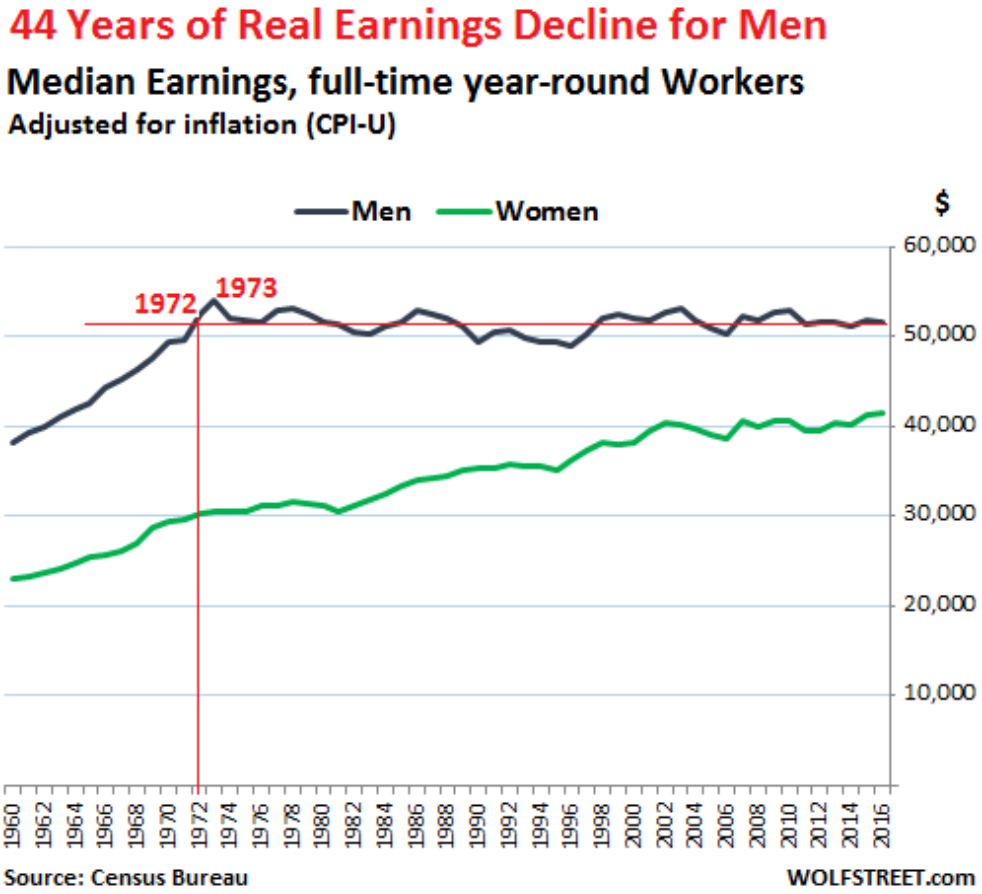
但是，堕胎权在美国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取得重大突破，除了妇女解放运动以外，也还有阶级方面的因素。从小资产阶级的角度来说，堕胎权能够进一步确保性爱与生育行为相分离，从而使得两性交往和性行为成为更加纯粹的追求个人快感的消费主义行为，而不必带来心理和社会的负担。

但是仅仅是小资产阶级对“性解放”的追求，还远不足以使得堕胎权一度成为“宪法权利”。堕胎权在七十年代兴起，应当是得到美国资产阶级主流支持的。从资产阶级角度看，实现堕胎自由后，有利于大多数妇女减少家务劳动时间，从而进入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美国妇女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大幅度增长，而在同一时期，美国男性工人的平均实际工资停滞或下降。（见下一面两个图）

图：女性解放运动与劳动参与率（%）




来源：CEIC，中泰证券研究所




但是，在经过半个世纪之后，美国各阶级与堕胎问题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这次反堕胎派的胜利反映了美国各阶级在堕胎问题上力量对比的变化。

这一问题还有待研究。但先说几点初步印象：

首先，目前坚定主张堕胎自由的主要是美国的小资产阶级，政治上表现为“白左”（身份政治“文化左派”），并在一定程度上利用流氓无产者的力量。

其次，美国大多数劳动人民（无论男女）赞成对堕胎实行某种程度的限制。其具体原因待分析。可能原因之一是，劳动人民希望有相对稳定的家庭以保护自己的子女免受毒品、滥交、变性和一般犯罪活动的危害。

第三，美国资产阶级一方面继续利用堕胎问题在劳动人民中制造分裂，另一方面并没有倾其全力维护堕胎权。可能原因之一是，美国妇女加入劳动力市场的程度已经接近饱和。进一步扩大堕胎自由，对资产阶级的好处已经不明显。

可以得出的初步结论是，此次美国最高法院对堕胎问题的裁决，既不是美国大多数妇女的失败，也不是劳动人民的失败，更不是劳动妇女的失败；但确实是作为美国新自由主义反动秩序主要社会支柱之一的全球化小资产阶级的一次重大失败。

# 与Rick Sanchez先生商榷

233型酷炫喜羊羊

## 超额利润在哪里?

这位@Rick Sanchez先生的文章很精彩，堪称当代左派中的最高水平，可惜的是我被他拉黑了，无法与他直接互动，非常遗憾。

说两个他的槽点。

### 1. 半外围论者支持民族资本?

小册子中没有任何一句话是在替对外投资辩护的。恰恰相反，在小册子第三章的第三节中旗帜鲜明的表示了对海外投资的反对，详见下图:

勇敢的第三世界人民经过自己坚持不懈的斗争，MMG 最终不得不宣布停止运营这座花了 70 亿美元买来的矿山，可谓是 70 亿美元打水漂，豪买一场寂寞，这是秘鲁人民的伟大胜利之一，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体现，也是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间接帮助。

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尽管中国对这些落后地区的资本输出所获的超额利润是很少的，**我们也应坚决的反对诸如 RECP 等试图剥削第三世界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的行为，否定中帝论，不代表支持资本输出，不代表支持对第三世界劳动人民的剥削，这是我们必须要坚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这位先生想利用大家没看过小册子，给小册子泼脏水，这种行为是不严谨的。“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阴谋诡计”，希望这位先生可以诚实的引用小册子的观点。

### 2. 超额利润在哪里?

@Rick Sanchez先生说:

我实在是无法理解，一个拥有世界第一大的工业能力的国家，一个拥有世界第二强的军事实力的国家，一个经历过社会主义改造从而消灭了封建残余的国家居然是一个给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上贡的半外围大国！！！居然是和印度、巴西、墨西哥一类的国家！！！这属实是奇异搞笑了。

这是他此篇千字长文中唯一表述清晰的有效文段。

为什么不理解呢？因为@Rick Sanchez先生观察者网刷多了，当他心目中的“帝国”与现实产生较大冲突时，他无法接受现实，他就只好用数个感叹号来表示他的反对意见，至于他为什么不说明并未“给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上贡”的原因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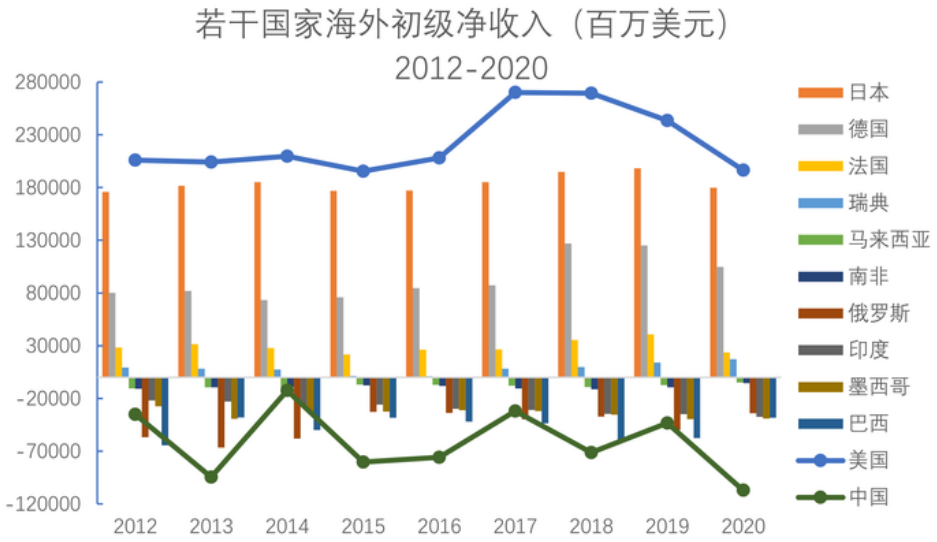
因为他找不出证据，除非他要昧着良心去伪造事实。

超额利润问题，@Rick Sanchez 先生不回答，我来替他回答。

列宁同志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输出特别重要，并且认为帝国主义必然意味着掠夺全世界和攫取超额利润。

超额利润并没有消灭，它仍然存在。一个享有特权的财力雄厚的国家对其他所有国家的剥削仍然存在，并且更加厉害了。极少数富国——就独立的和真正庞大的“现代”财富来说，这样的国家只有四个，即英、法、美、德——把垄断扩展到无比广阔的范围，攫取着数亿以至数十亿超额利润，让别国数亿人民“驮着走”。

那么，中国有没有靠着“对其他所有国家的剥削”获得超额利润呢?




2012至2020年间，美帝国主义获得的超额利润高达20029.18亿美元，而中国每年的海外初级净收入都是负值，近年来负值还有扩大的趋势，在2012至2020年内中国总共向外国资本支付了-24640.98亿美元的投资收益，这大致相当于1.2个美国、1.5个日本、2.9个德国、9.4个法国所获得的超额利润。

中国所获的超额利润，是负数。

列宁同志指出，剥削落后国家的、低工资的工人的劳动、攫取他们的超额剩余价值是帝国主义的特别典型的现象。

剥削从落后国家来的、低工资的工人的劳动，正好是帝国主义的特别典型的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富裕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寄生性就建立在这一点上面，这些国家在无耻地大肆剥削“廉价的”外国工人劳动的同时还以较高的工资收买一部分本国工人，“低工资的”这几个字应当加上，同时还应当加上“而且往往是无权的”字样，因为“文明”国家的剥削者总是利用输入的外国工人毫无权利这一点的。

有没有靠着“剥削从落后国家来的、低工资的工人的劳动”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呢?

根据2020年的国际劳动转移平衡表（单位为：百万人年）：

| | 出口商品包含劳动 | 进口商品包含劳动 | 净劳动转移 | 净劳动获得 |
|---|---|---|---|---|
| 中国 | 87 | 53 | 34 | |
| 东亚太平洋（不含中国） | 51 | 24 | 27 | |
| 中低收入欧州和中亚 | 35 | 23 | 13 | |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 40 | 22 | 18 | |
| 中低收入中东和北非 | 15 | 10 | 5 | |
| 南亚 | 87 | 21 | 66 | |
| 撒哈拉以南非洲 | 26 | 16 | 10 | |
| 高收入国家（不含美国） | 115 | 241 | | 126 |
| 美国 | 15 | 74 | | 59 |
| 统计误差 | | −11 | | −11 |
| 世界 | 471 | 471 | 174 | 174 |

美国在一年中通过不平等交换从世界其他国家获得高达5900万人年的劳动净转移，相当于美国劳动力人口的37%。如果没有不平等交换，那么美国为了维持其现有的物质消费水平，就必须将5900多万劳动力从服务业转到物质生产部门，这意味着美国的服务业产值要减少大约60%。

相比之下，中国一年对外的劳动净转移有3400万劳动人年，大约相当于中国工业部门劳动力总数的16%。如果将因为不平等交换损失的劳动力节省下来，改为生产满足国内需要的工业品，那么，中国人民得到的工业品就可以比原来增加大约四分之一，将节省的劳动力全部用于缩短工人的工作时间，中国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可以减少六分之一。

中国的超额利润和超额剩余价值在哪呢？我想诚实的@Rick Sanchez 先生一定不会逃避这一问题。

可惜他什么也没说。

### 3. 前途是什么？

为什么英国的垄断使机会主义在英国（暂时）获得了胜利呢？因为垄断提供超额利润，即超过全世界一般的、正常的资本主义利润的额外利润。从这种超额利润中，资本家可以拿出一部分（甚至是不小的一部分！）来收买本国工人，建立某种同盟（请回忆一下维伯夫妇所描写的英国工联同它们的雇主的有名“同盟”吧），即一国的工人同本国资本家共同反对其他国家的同盟。

如果这位先生与我们一样，认同社会主义中国的胜利是必然的，那请这位先生指出，工人阶级如何由弱小转变为强大？如何使得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中国是如何胜利的？

看完@Rick Sanchez先生的恢宏巨制，我只感觉他已经丧失了对于严肃问题的思考能力，只剩下“除你左籍”、“钦定你是劳保”这种仅能发泄他在生活中的不满情绪的无聊之举。

真理越辩越明，还是很期待与@Rick Sanchez先生交流的。

## 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人民的最大敌人

拜读完@Rick Sanchez先生的新作《论美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我情不自禁的赞美起他这位当代水平最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为什么呢？

因为@Rick Sanchez先生很聪明，他混淆了“对外直接投资”与超额利润、超额剩余价值之间的区别，他试图通过大量在美“对外直接投资”来说明“超额利润”（或者叫做“海外初级净收入”）这一指标的错误，从而否定“攫取超额利润与超额剩余价值”对于帝国主义国家的重要意义。

### 1. 他混淆了海外资产与超额利润的区别

按照@Rick Sanchez先生提供的材料，我们可以认为美国国内有着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事实如此，坦荡，@Rick Sanchez先生的材料是对的，但他的论证逻辑却是一种诡辩。

根据我们老保“同志”的绝对逻辑，即“某国海外净资产（收益）总额=该国海外总资产（收益）- 外国在该国总资产（收益）”的神圣公式，我们可以说美国实际上正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

他再一次错误的引用了小册子的公式。

> 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是美国苹果公司的大股东，这等于是挪威在剥削美国吗？不，请看看苹果的产品在哪里代工生产的？雇佣了哪些地方的工人，这就不用多说了吧？所以苹果公司里有挪威的股份不代表挪威在剥削苹果，而是代表挪威享受到了苹果公司雇佣东亚东南亚劳动力生产产品的投资分红。
>
> 以美国为例，我们先来看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交叉投资能够为美国带来什么样的利
>
> [137] 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电子图书馆数据库的“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数据”中查询。
> [138] 指一个国家的海外初级收入减去一个国家支付给外国人的初级收入，其中绝大部分是海外投资净收入，所以，一个国家的海外初级净收入可以大致反映一个国家所获得的超额利润的情况。
> [139] 阳和平，《漫谈关于帝国主义的几个问题》，2022 年 4 月 28 日，19：00，在 QQ 群 716261246、787086464、937333756 的演讲录音。
>
> 51

海外初级净收入（也就是超额利润）的指标计算公式是：

$$\text{海外初级净收入}=(\text{该国海外初级收入})-(\text{该国支付给外国人的初级收入})$$

而在@Rick Sanchez先生的文中却变成了资产总额相减的式子，原文说的是“超额利润为负数”，@Rick Sanchez先生却将其曲解为“海外净资产为负数”，这是他企图用海外资产去混淆超额利润的做法，他提供的”美国国内有着大量外国直接投资“的材料，正是他这一企图的表现。

接下来，我将说明@Rick Sanchez先生是如何试图通过“海外净资产为负数”来论证美国是半殖民地的。

### 2. 美帝获得了大量的超额利润

我们不妨先按照@Rick Sanchez先生的诡辩思路，来看看他为什么会说美国是半殖民地。

根据IMF数据库，2020年，美国的海外资产共有32256336.34百万美元，而外国在美资产则有46267578.06百万美元，净资产为-14011241.72百万美元，美国的海外净资产为负数。

这就是@Rick Sanchez先生说根据海外资产而认为美国是半殖民地的原因。

@Rick Sanchez先生混淆了直接投资与超额利润，那么现在我们来计算一下美国的超额利润。

根据IMF数据库，2020年，美国的海外投资收益为951361百万美元，而外国在美投资收益则有754966百万美元，美国的海外初级净收入为196395百万美元，这意味着，美国一年仅仅通过对外资本输出就获得了1963.95亿美元的高额垄断利润，而美国在2012-2020年间攫取了20029.18亿美元超额利润，这整整相当于美国GDP的10%！

在@Rick Sanchez先生提供的材料中，还有一张关于各国发展速度与利润率的图表，在下才学疏浅，不大明白他打算说明什么，但既然他提了一嘴各国的盈利能力，那我也就跟跟风，算一算美帝海外资本输出的盈利能力。

根据公式：

$$资产收益率=（投资收益/资产总额）\times 100\%$$

我们可以计算出：

美国的海外投资收益率为：951361/32256336.34=2.95%

外国在美投资收益率为：754966/46267578.06=1.63%

收益率差额为：2.95%-1.63%=1.32%

很显然，2.95%＞1.63%，美帝对外资本输出的利润率高于外国在美投资利润率。

我们再拿一个国家来对比一下，拿谁好呢？

我们就拿印度吧。

根据IMF数据库，2020年，印度的海外资产共有852707.2081百万美元，而外国在印资产则有1200278.909百万美元，净资产为-347571.7009百万美元，印度的海外净资产跟美国一样也是为负数。

海外净资产可以一样是负数，但超额利润就截然不同了。

2020年，印度的海外投资收益为13402.40767百万美元，而外国在印投资收益则有50871.94941百万美元，印度的海外初级净收入为-37469.54174百万美元，印度非但没有得到超额利润，印度反而在2012-2020年间给人上贡了264574百万美元，这相当于印度GDP的10.2%。

同样，我们可以计算出印度的投资收益率：

印度的海外投资收益率为：13402.40767/852707.2081=1.57%

外国在印投资收益率为：50871.94941/1200278.909=4.24%

收益率差额为：1.57%-4.24%=-2.67%

很显然，1.57%＜4.24%，印度对外资本输出的利润率远远低于外国在印投资利润率。

看吧，@Rick Sanchez先生，倘若按照您的诡辩，美国和印度都是同样的国家。而如果我们按照列宁同志的定义，那么美帝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剥削者，印度不过是个大号的第三世界罢了。

我们要学习的究竟是@Rick Sanchez先生的《论美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还是列宁同志的《帝国主义论》呢?

### 3. 美帝获得了巨量的超额剩余价值

用老保们喜欢的话讲，美国实际上是一个给日本、荷兰和加拿大等核心国家上贡的半外围大国。

既然@Rick Sanchez先生还提到了“给日本、荷兰和加拿大等核心国家上贡”，那好吧，我们就来算算美国和这些核心国家之间的剩余价值流动。

根据2020年的美国的劳动贸易条件表。

| | 劳动贸易条件<br>（一单位美国出口商品所包含的劳动可以交换到的其他国家出口商品所包含的劳动） |
|---|---|
| 中国 | 4.58 |
| 中低收入东亚太平洋（不含中国） | 6.61 |
| 中低收入欧州和中亚 | 5.26 |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 5.86 |
| 中低收入中东和北非 | 8.06 |
| 南亚 | 21.49 |
| 撒哈拉以南非洲 | 10.97 |
| 高收入国家（不含美国） | 1.24 |
| 平均 | 3.82 |

小学生都知道，如果你交换出去的小于你得到的，那么你就亏了。在2020年，一单位美国劳动平均可以交换到大约4.6单位中国劳动、1.2单位的其他高收入国家的劳动，这意味着美国在于中国的国际贸易中是获益的，哪怕是在与其他核心国家的贸易，美国也是相对获益的。

2020年，一单位美国劳动可以交换的其他国家劳动为3.8单位，美国目前仍然是世界范围不平等交换的最大受益者，是骑在世界人民头上的最大剥削者。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指出：

美国在一年中通过不平等交换从世界其他国家获得高达5900万人年的劳动净转移，相当于美国劳动力人口的37%。如果没有不平等交换，那么美国为了维持其现有的物质消费水平，就必须将5900多万劳动力从服务业转到物质生产部门，这意味着美国的服务业产值要减少大约60%。

这5900万人年的剩余价值是什么概念呢？这相当于美国GDP的12%，美帝利润总额的50%。

美国在2012～2020年这9年间获得了相当于其GDP的10%的超额利润，而美国在2020年这单独一年内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就相当于其GDP的12%。

很显然，美国不仅获得了大量的超额利润，还获得了巨量的超额剩余价值，美帝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敌人。

### 4. 他的动机是什么？

为什么@Rick Sanchez先生会采用诡辩、而不是正面回答《超额利润在哪里？》呢？

因为他是个诚实的人。他作为马列毛主义者的诚实之心让他无法违背自己的基本道德，他无法公开否认事实——中国未能获得超额利润、超额剩余价值，他便只好采用诡辩的办法，将“有无超额利润”的问题悄悄转换成“海外资产多寡”的问题，从而逃避“有无超额利润”的问题。

诚实的@Rick Sanchez先生，请让我问您一次吧，您认同列宁同志对于超额利润的论断吗？

在20世纪初，帝国主义完成了极少数国家对世界的瓜分，其中每个国家现在都剥削着（指榨取超额利润）“全世界”的一部分。

对于诚实的人，我是尊重的，即使我与他的观点不一致。

期待@Rick Sanchez先生的新作品，期待与您的进一步交流，向您学习！

# 我们正处在“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时代!

如果大家看过我所撰写的有关帝国主义问题的文章，那么一定会发现“超额利润”这个词在我的文章中出现的频率是相当高的，以至于@Rick Sanchez同志认为:

事实上我不知道老保们为什么从一开始就选择性的回避列宁对帝国主义的五大经典特征说做出的分析，而偏偏去泛泛的谈论什么腐朽性和寄生性。

在我的第二篇文章完成后，他奉劝我这个“半外围老保先生”莫要诡计，老实交代为什么反对他的观点:

我奉劝老保先生少耍点阴谋诡计，对着我一则鼓动性的想法搞个大新闻，四处宣传搞得我好像真的以为美国是一个双半国家似的，并不能掩盖你们在核心问题上的社会沙文主义倾向。事实上我现在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来一一反击你们的反动观点和断章取义的行为。我只能够仓促的提出几个小问，惟愿“同志”们能够尽可能准确的回复下，毕竟共义者可是不会隐瞒自己的观点吧。

所以，这里我小写一篇文章，回应一下他的善意的批评，与他探讨一下我们正处于怎样的时代。

## 超额利润的重要意义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超额利润呢?

因为超额利润极大的影响了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工人阶级。在1920年给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复信草稿中，列宁写道:

**13. 独立党和龙格派不理解，也不向群众说明：先进国家的帝国主义超额利润曾经使（而且现在正在使）这些国家得以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分子，把超额利润（从殖民地得来的和对弱国进行金融剥削得来的超额利润）的零头扔给他们，培植熟练工人的特权阶层，等等。**

帝国主义国家所能得到的超额利润和新的繁荣，使该国的工人阶级（至少是享有特权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来自第三世界的剩余价值，这可以解释核心国家为什么有能力维持工人贵族的长期存在。所谓工人贵族，这样一批工人，他们比世界上其它部分的无产阶级处于更优越的地位，他们是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宫内奴隶”，与第三世界的“种植园的奴隶”对此起来，这些工人贵族对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感到有部分的利益一致，因而不愿破坏现状；这个事实明显地反映在这些国家的劳工运动的整个时期（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党的时期）。

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一道，正是朝着靠剥削亚非两洲以建立帝国主义欧洲的方向而共同努力的；机会主义者在客观上是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某些阶层的一部分，他们被帝国主义的超额利润所收买，已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看门狗和工人运动的败坏者。

列宁强调了，帝国主义国家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剥削来的“大量的超额利润”可以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物质基础。列宁是如此重视这一问题，以至于他特别指出：

**如果不懂得这个现象的经济根源，如果不充分认识这个现象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那么，在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实践任务方面，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

更早些的时候，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二版（1892）的序言里，曾经对英国劳工运动作过以下的名言：

**当英国还保持工业垄断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某种程度上也分享了这种垄断的利益。这些利益在工人中间分配得极不平均：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拿了绝大部分，但广大的群众也偶尔得到一些。这就是从欧文主义绝迹以后英国不再有过社会主义的原因。随着英国工业垄断的破产，英国工人阶级也将丧失自己的特权地位。总有一天，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连享有特权并居于领导地位的少数也不例外，会降到其它国家工人所处的水平。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

面对着1914年的事件，列宁尖锐地批评**“帝国主义（在英国）分裂工人，在他们中间加强机会主义，在工人运动中造成一时腐化为那种倾向”**，正如同**“它在十九世纪结束以前所表现的那种情况”**，而且他还把社会民主党在当时的领袖，

也就是宗主国那些比较放肆的“宫内奴隶”的领袖，称作“劳工队伍中代表资本家的班长”。同时，在这些帝国主义国家里，又渐渐养成一个巨大而又过分繁殖的所谓“中间阶级”，他们的生计直接间接依靠着帝国的关系，这包括从城市机关的职员以至殖民地的行政人员，另外还养成一班到处充斥的食利者分子，他们靠着国外投资的所得而发财致富。

二战结束后的近百年历史已经证明了，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工人运动已经深深陷入了以超额利润为基础的“改良主义泥潭”之中。

## 如何战胜改良主义？

我这里顺带提一下，之前@Rick Sanchez同志阐述了他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看法：

**虽然帝国主义国家中的统治阶级十分强大，但是在这类国家中，一旦无产阶级能够重塑自己的阶级意识，能够锻造出战斗的群众组织，那么工人的力量就将会是不可战胜的，而一旦时机成熟（也就是列宁所说的“无法照旧”）这样的自为阶级就很有可能取得整个国家的权力。要实现这点，我想除了向布党一样，对工人进行长期的组织、教育、启发工作外别无他法。**

我对他这一堪称“左翼政治正确の废话文学”的论调提出了批评：

@Rick Sanchez先生对核心国家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做出了重要指示：”虽然帝国主义国家中的统治阶级十分强大，但是，一旦无产阶级能够重塑自己的阶级意识、锻造出战斗的群众组织，一旦时机成熟，就很有可能取得整个国家的权力。“无产阶级如何由弱变强呢？Rick Sanchez先生也不说，反正只要靠”重塑阶级意识、锻造群众组织“就行了。这就好比跟一个被陷在泥潭里的人说：”只要你从泥潭中挣脱出来，你就能从泥潭中挣脱出来。“

他也回应道：

我不需要复读列宁时代就已经基本解决过的问题，而具体的办法我又绝不可能在这种平台上给您说出来。喜羊羊先生要是实在无法理解这些基本的逻辑问题，大可以回过头去重读《怎么办》而不是继续谈论神圣的“强弱辩证法”。

那么，列宁同志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呢?

为什么英国的垄断使机会主义在英国（暂时）获得了胜利呢？因为垄断提供超额利润，即超过全世界一般的、正常的资本主义利润的额外利润。从这种超额利润中，资本家可以拿出一部分（甚至是不小的一部分！）来收买本国工人，建立某种同盟（请回忆一下维伯夫妇所描写的英国工联同它们的雇主的有名“同盟”吧），即一国的工人同本国资本家共同反对其他国家的同盟。

早在一百年前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就意识到了，帝国主义国家难以发生深刻变革的原因在于“垄断提供的超额利润”，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陷入了改良主义泥潭”。

如何破局?

请看共产国际的文件：

2．欧洲资本主义汲取主要力量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殖民地和附属国。欧洲资本主义大国不控制广大的殖民地市场和广阔的殖民地剥削场所，就无法继续生存。英国这个帝国主义堡垒，100多年来就一直遭受生产过剩的痛苦。没有为销售商品和供给本国不断发展的工业所需原料而必不可少的广大殖民地，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早就自行垮台了。只是因为英国帝国主义仍在奴役亚洲和非洲千百万居民，才迫使英国无产阶级不得不暂时服从资产阶级的统治。

3．从殖民地取得的超额利润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资金来源。不截断这种资金来源，欧洲工人阶级是难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目前，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通过扩大和加紧对殖民地劳动力与天然资源的剥削和掠夺，才得以避免破产。欧洲帝国主义靠剥削殖民地居民，贿赂宗主国的工人贵族。欧洲帝国主义一方面凭借附属国廉价劳动力所提供的产品，力图降低宗主国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只要能继续从殖民地取得超额利润，就甘愿牺牲它在宗主国的超额利润。

如何破局?

列宁同志已经告诉我们了，答案不在《怎么办》，而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在列宁逝世前一年所撰写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列宁事实上已经明确指出，未来世界革命的主要希望不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而在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的东方：

**现在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不过，这些国家完成这一发展过程，不会像我们从前所期待的那样。它们完成这一发展过程，不会是经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平衡“成熟”，而将是经过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进行剥削，经过对帝国主义战争中第一个战败国进行剥削，再加上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

在列宁看来，“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也包括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将**“不会像我们从前所期待的那样”**通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自身里的“成熟”来实现，而是通过**“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就是说，只有全世界最广大的东方人民起来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剥削，那样，东方的革命才能为西方的革命展开道路。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

二十世纪至今的历史业已证明，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取得了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东方取得了胜利。

如何破局?

唯有旗帜鲜明的反对以美帝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砸烂西方帝国主义对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统治锁链，彻底地打倒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秩序，用人民群众的镰刀与锤子战胜西方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得帝国主义无法获得超额利润，使得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无法维持其资本积累，使得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改良主义从根本上被瓦解，从而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工人运动创造历史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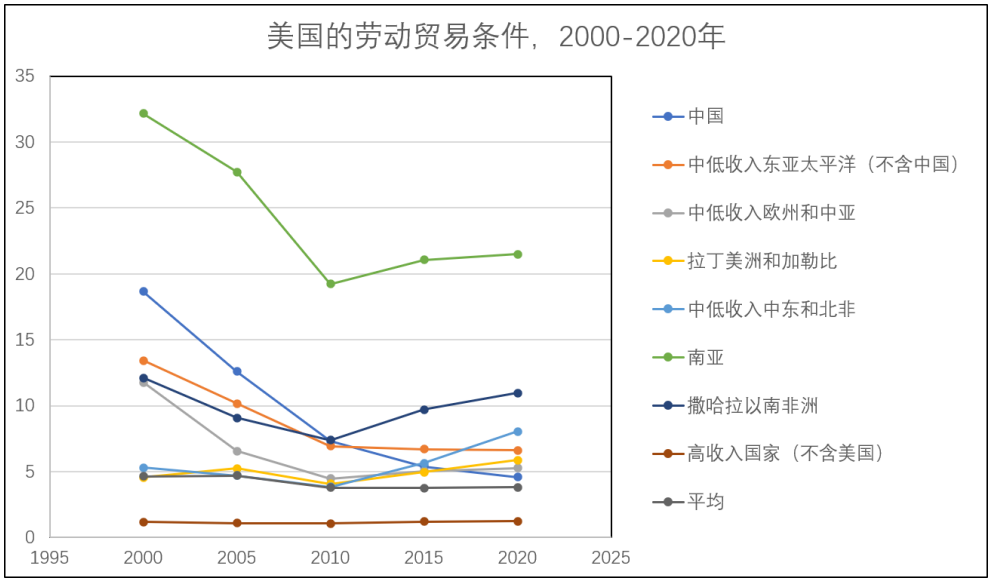
那么，我们将有幸看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吗?

## 美帝的剩余攫取能力开始下降

帝国主义国家因为获得大量转移的劳动，得以占有与其人口不成比例的巨大的物质财富，这满足了其内部工人阶级对较高物质生活水平的要求，增加了改良主义的发展空间，消除了社会革命的隐患；同时，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阶级得以长期保持较高的利润率，能够支配更多剩余，进而提高其投资水平。

由于攫取了巨量的超额剩余价值，其自身用于物质生产的劳动力就被节约下来。这部分劳动力可以用于教育、医疗、研究和开发，从而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核心国家对少数高附加价值经济活动的垄断；可以充当政府官员、军官和士兵，从而维持“强大”的资产阶级国家和军队；可以转化为金融市场的经理、经纪人、职员，在为核心国家的资本家服务的同时又进一步以金融资本的方式掠夺外围国家的财富；还可以从事销售、餐饮、娱乐、法律咨询等非生产性活动，为资本家阶级及其附庸（上层小资产阶级）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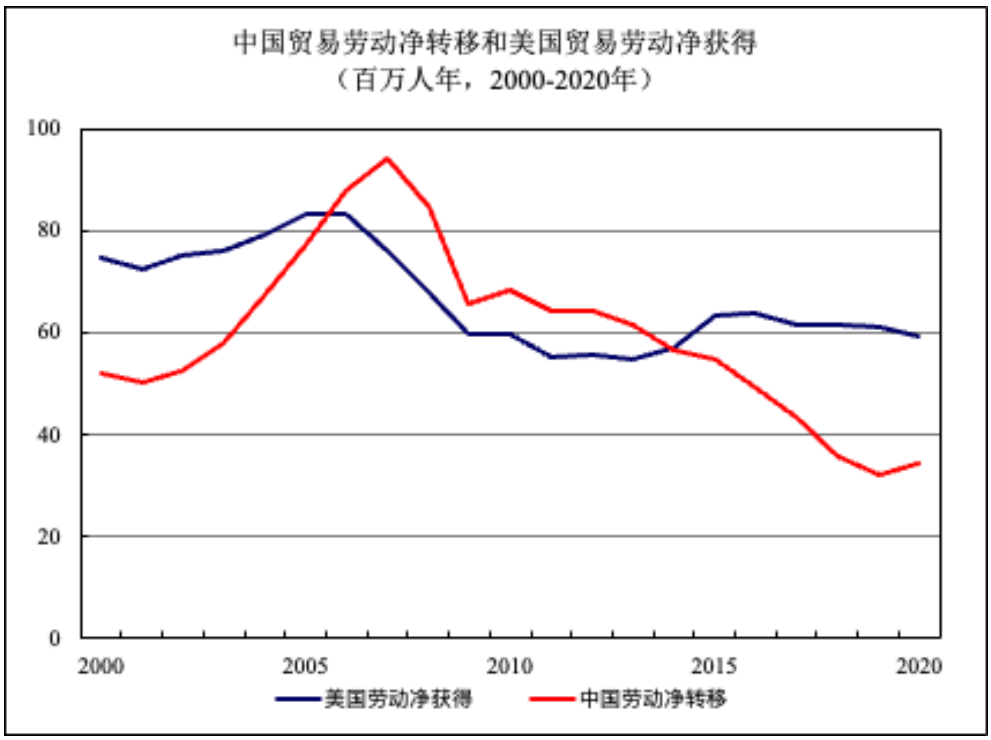
因此，我们分析美帝国主义能否维持其国内改良主义、维持其军事霸权，可以从美帝对于超额剩余价值的攫取能力变化入手。




根据美国的劳动贸易条件图，我们看到美帝国主义的超额剩余价值攫取能力正在下降。

平均来说，2000年，一单位美国劳动可以交换4.63单位的其他国家劳动；2005年，当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上一轮扩张接近顶点时，一单位美国劳动可以交换4.70单位的其他国家劳动。2020年，一单位美国劳动可以交换的其他国家劳动下降到了3.8单位。

这反映了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




2005至2015年间，中国劳动净转移与美国劳动净获得相近，中国净转移的劳动几乎全部被美帝国主义所攫取。而2015年后，中国劳动净转移与美国劳动净获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中国劳动净转移变少，逐渐不能满足美国的胃口。

这意味着，随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随着中国劳动人民伟大阶级斗争的进行，美帝国主义能够从从中国劳动人民身上攫取的超额剩余价值正在下降。

## 美帝的崩溃已是进行时

帝国主义的全面崩溃、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

要回答美帝为何必然崩溃的问题，必须先介绍美帝国主义的历史。

## 帝国幻梦的破灭

在二十世纪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运动取得胜利后，美帝国主义已经意识到如果放任社会主义苏联、社会主义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与取得民族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进一步发展，帝国主义对于世界人民的剥削将会无法维持，“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帝国主义体系将会在社会主义力量增长、资本主义日益腐朽之下而土崩瓦解。

为此，帝国主义大力扶持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小资产阶级自由派，煽动了大量反对社会主义政权、民族解放政权的颜色革命，美帝国主义还使用美元霸权破坏许多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制造金融危机以迫使第三世界国家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意志，放弃本国劳动人民含辛茹苦积累起来的工业化成果。

到2000年，美帝国主义霸权的“复兴”达到了顶点。2000年，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到了30%；那一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还不到4%。在1990-2000年的十年间，美国经济增长贡献了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的39%。美国的军费开支达到2800亿美元，占世界军费总开支的三分之一，超过美国以下第二至第六军事强国（中国、日本、法国、英国、俄罗斯联邦）军费开支之和。

新自由主义秩序已经在全球占了统治地位。社会主义阵营全面瓦解，第三世界国家纷纷推行私有化和贸易、金融自由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仅有中国等少数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极其严峻的“拒腐防变”等残酷的斗争得以生存下来。

美帝国统治集团狂妄自大，幻想通过大规模军事冒险彻底确立美帝国主义的永久霸权，建立其对世界人民的永久统治。美帝国主义计划动用其占压倒优势地位的军事力量，控制住对于世界能源供应至关重要并且处于欧亚大陆战略中心地位的中东和中亚地区，将这两个地区变为自己永久的军事基地，一方面掐住其它各大国的能源生命线，另一方面可以随时从这两个地区出发对欧亚大陆的各个方面展开军事侵略。

美国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以“911”事件为借口发动了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侵略战争。但是，像历史上所有的反动派一样，美帝国主义总是过高地估计它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世界各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力量。仅仅为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个贫弱国家进行侵略战争，美帝国主义就不得不投入其陆军力量的一半。

结果，在阿富汗，塔利班民兵组织在退出首都喀布尔以后始终控制着阿富汗的广大农村地区。在伊拉克，尽管抵抗力量在政治上野蛮落后，也没有统一的领导，内部还相互倾轧，美帝国主义也仅仅能控制住伊拉克南部的几座大城市。迄今为止，随着阿富汗塔利班民兵组织解放阿富汗全境，伊朗伊斯兰政权控制了伊拉克的什叶派政权，美帝国主义在中东的侵略战争就在战略上完全失败。

### 俄乌战争：崩溃的开始！

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的开始，标志着美帝国主义霸权体系正式进入崩溃时期。

在奥巴马时代，美国资产阶级的“世界帝国”计划实际上已经失败，美国霸权已经进入无可挽回的衰落，奥巴马政府的总的战略方针也是全球性的战略收缩。然而，一方面由于美国资产阶级仍没有放弃与俄罗斯争夺对世界能源市场的控制权，另一方面由于美国资产阶级外交官僚系统的惯性，依然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各种严重困境，强行在乌克兰策动政权更迭。

2014年以美帝为首的北约公然策动乌克兰颜色革命，将子弹射向乌克兰劳动群众，扶持起乌克兰亲美派的法西斯买办政权。俄罗斯普京政权迅速做出了有效但又有克制的反应，一方面出兵收复克里米亚，另一方面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顿涅茨克两州人民建立人民共和国以抗击来自乌克兰资产阶级当局的法西斯军队的镇压。基辅的亲美买办法西斯政权建立后，大肆反俄反共，一方面摧毁苏联社会主义遗产，镇压乌克兰工农群众，另一方面纵容并依靠法西斯民兵组织，公开逮捕共产主义者，推行赤裸裸的法西斯统治；由于内外矛盾交困，始终无法建立稳定的资本积累秩序。面对无法解决的困境，乌克兰法西斯政权孤注一掷，幻想用加入欧盟和北约的办法来稳固自己的统治。

而在俄罗斯方面，在经历了普京政权二十多年的统治以后，目前的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能源出口国之一（俄罗斯联邦是世界第一大天然气出口国、第一大或者第二大的石油出口国）。经过2008年的格鲁吉亚战争、2014年收复克里米亚、2015年出兵叙利亚以及今年年初对哈萨克斯坦的干涉，俄罗斯的军事力量与上世纪九十年代相比已经大大加强。俄罗斯资产阶级成功地将中亚、南高加索以及中东地区的叙利亚确立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巩固了对白俄罗斯的控制。此外，通过以“欧佩克+”的方式参加石油输出国组织会议，俄罗斯达到了与沙特阿拉伯一起共同控制世界石油市场的目的。

这样，在美国从阿富汗狼狈溃退、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声望跌到历史低点、拜登集团在执政一年之后民怨鼎沸且内外交困、美国资产阶级内部矛盾十分严重的条件下，普京政权认为俄罗斯资本主义复兴的历史契机已经出现了。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发起了针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

战争至今已经数月了，关于战局的发展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别样的有趣角度来呈现。

以下是自俄乌战争开始以来英国《每日电讯报》评论文章的标题：

2月24日，普京恐怕刚刚犯下了一个将导致其血腥统治结束的错误

4月3日，西方正在俄罗斯最擅长的游戏中打败俄罗斯

4月21日，到目前为止普京的战争是一场惨败，接下来还会更糟

5月5日，颜面扫地的俄罗斯正面临一场划时代的失败

5月12日，要取得对普京的完全胜利是要付出代价的

5月26日，普京也许会很快取得一场意想不到的胜利

俄乌战争打到今天，就算是最虚伪最猖狂的西方主流媒体，如BBC和纽约时报，也不得不承认乌克兰打得“很艰难”，乌克兰的失败“是一种可能性”。这种悲观的看法与俄军从基辅附近撤出时他们的癫狂叫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北约不大规模公开派遣地面部队助战，或者在乌克兰上空设置“禁飞区”，或者对俄罗斯进行核挑衅，那么俄罗斯大概率会在保持“区域拒止”能力的前提下消灭乌军主力，并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

俄罗斯资产阶级成功在东欧挑战了美帝国主义的霸权，这标志着美帝崩溃的大幕已经拉开。

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在美帝霸权崩溃的当下，“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向我们给出了两种道路抉择：是选择服从于美帝国主义霸权体系并随之崩溃而被扫入历史垃圾桶的资本主义道路？还是选择将自己与全世界无产阶级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的社会主义道路？

我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必然的，中国无产阶级正在用她的实际行动去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放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 工资上升、实际工资上升、工资份额上升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远 航 一 号

仗义执言网友在讨论贴第一页[15]最后一个跟帖中声称：

红中网搞个工资上升，必然导致平均利润率下降。

这是该网友故意混淆工资上升、实际工资上升、工资份额（广义工资份额也叫劳动收入份额）三个不同概念。

该网友的这一手法也是许多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分子利用一般网友概念不清污蔑红色中国网的惯用伎俩。类似错误，该网友以及某些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分子已经屡教屡犯，无法用一般疏忽来解释。

所谓工资上升，即名义工资上升，仅指劳动者获得工资面值增加。

所谓实际工资上升，即名义工资的上涨速度超过了通货膨胀率，如果官方通货膨胀率准确，实际工资上升就意味着劳动者对物质消费品的平均购买力增加了。

所谓工资份额，指的是劳动者获得的工资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无论是名义工资上升，还是实际工资上升，都不必然带来工资份额上升。只有当不仅名义工资增长速度超过通货膨胀率，而且实际工资增长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

15. http://redchinacn.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639

时（假设计算实际工资与劳动生产率所用的物价指数一样），工资份额才会上升。

工资份额上升，就意味着整个国民收入中更大的一个比例归劳动者而不是资本家所有。一般情况下（在经济周期的扩张期中），这就意味着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对工人阶级有利的变化，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民收入在工资总额与剩余价值之间的分配只能是劳资双方经过阶级斗争较量以后才得出的结果，而不会是资本家阶级恩赐的结果，也不会是工人阶级谦让或者“无理取闹”的结果。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利润挤压学派，还是红色中国网的相关论述，一向都是说，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会引起工人阶级斗争力量上升，从而导致工资份额上升，从而导致利润份额下降，从而导致利润率下降。在中国过去一个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中，不仅存在着工人阶级斗争力量上升的条件，而且存在着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条件，从而使得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更加突出。

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以及托派污蔑篡改我们的观点，将我们的观点篡改为只要工资上升就代表工人斗争力量上升，又篡改为只要工资上升，利润率就会下降。这是他们故意混淆视听，迷惑不善于深入思考的网友，以达到污蔑红色中国网、维护宗派小团体的不光彩目的。请各位网友提高警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只有深入并正确地了解相关概念并理解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才能推进我们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及其矛盾发展的认识。否则，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必然永远捣糨糊。

# 如果无论革命还是改良，都要杀头坐牢——那还不如搞革命

远航一号、还是公平

“还是公平”网友说：

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最终的收益都是导向工人阶级，但获得这种收益的代价也是向资产阶级进攻所要付出的牺牲。

表面上看，好像革命是工人的，改良是资本家的，但改良实际上也是工人以阶级进攻迫使资本家做的，典型史实就是早期武德充沛的第二国际和各社会党带领工人与资本家的军警宪特黑火拼，有组织的工人武装与有组织的资本家武装一时半会儿谁也灭不了谁、势均力敌，但工人不做工还搞起义，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就要遭受破坏，资本家才觉得“分点就分点吧”，这个是阶级斗争早期的力量均衡迫使双方都走向妥协，即不合法走向合法；二战以后的大政府资本主义则是这种合法妥协的维持和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政府直接承继过去的传统，向工人承诺，随着经济发展工人的劳动收入会增加。

说到底，是改良还是革命，根本没得选，关键在于工人阶级力量是否强到可以攻破资产阶级而已，“如果我能吃得下，我为什么要搞改良，自己拿着政权不好

吗”。改良最开始是西方工人搞革命革不下来的撤退和保住既有成果，后来才逐渐蜕变成了丧失革命性。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早期的西方，工人力量很强，资本家力量更强，是因为当时西方位于核心、向全世界收割着超额剩余价值，充盈了资本收益，不仅可以招雇更多打手还可以收买工贼，最后装出慷慨大方花点钱平息冲突，所谓威逼利诱。但老沙俄、旧中国、当前资本主义中国都没有，无论搞革命还是搞高水平改良都是面临坐牢杀头，那还不如搞革命，搞革命还能让反动政权死得更快。核心区底子厚，工人跟资本家拼不起消耗战，自己会先被拖死；底子薄的非核心区的革命力量才可能这么玩，且越玩越强。

远航一号：

所谓改良，就是统治阶级在不破坏自身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通过有限的让步来换取被压迫阶级放弃颠覆现存社会秩序的革命斗争。

所以有意义的社会改良所需要的历史条件是很苛刻的：

首先，被压迫阶级的斗争力量要足够强，强到足以威胁统治阶级的统治，使得某种程度的让步对于统治阶级维持统治有了一定的必要性。否则，如果被压迫阶级绝对劣势、统治阶级绝对优势，统治阶级绝不需要发善心搞改良。

第二，统治阶级所给出的让步，要大到足以说服被压迫阶级放弃革命斗争的程度。这就要求被压迫阶级从改良策略得到的收益净收益要显著大于革命策略得到的净收益。用公式表示就是：

（改良毛收益 - 为改良而斗争付出代价）> （革命毛收益 - 为革命而斗争付出代价）

或者

为革命而斗争付出代价 - 为改良而斗争付出代价 > 革命毛收益 - 改良毛收益

就像“还是公平”网友说的，如果为改良斗争与为革命斗争付出代价差不多，而革命毛收益又显著超过改良毛收益（比如，社会主义相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那么上面的大于式就不成立，改良对被压迫阶级就没有吸引力。

然而，仅仅有上面两个条件还是不够。还需要第三个条件：

第三，统治阶级为了改良所做出的让步必须不违反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从而统治阶级愿意为了改良做出足以劝说被压迫阶级放弃革命斗争的让步。

这一点“还是公平”网友没有特别强调。但很重要。

如上面的不等式所说明的，统治阶级愿意做出的改良让步越大，革命毛收益与改良毛收益之间的差就越小，说明被压迫阶级放弃革命斗争的可能性就越大。

但是，统治阶级能够做出的让步不是无限的，而是必须在不侵犯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这个根本呢利益，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当然不尽一致。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首先就是要保证能够刺激资本积累的、一定的、足够高的平均利润率。

历史上，只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国家，一方面由于工人斗争力量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从全世界剥削超额剩余价值，才能同时满足上述三个条件。

而像中国资本主义，哪怕为了正常资本积累，也必须实行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剥削强度的剥削体制，因此就绝不能允许自由工会、集体谈判，也不能搞福利国家、资产阶级民主。

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承担不起改良的“负担”，所以就不仅要用暴力镇压的手段制止革命，还必须用暴力镇压的手段制止工人阶级争取“改良”的斗争。这样就导致上述第二点下面不等式中，“为改良而斗争付出代价”一项无限接近“为革命而斗争付出代价”一项，从而不等式左侧的值越来越小，直到不仅不大于、反而小于不等式右侧的值。在长远，这就使得社会革命成为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的唯一合理选择。

# 革命不是假设，而是现实的唯物主义

233型酷炫喜羊羊

@Rick Sanchez先生的新文章非常精彩，老调重弹，堪称左翼废话文学中的一绝，我才学疏浅，不善于跟他一样整天只会讲废话、乱骂人，我就只好再写一个长文来锐评一下他的最新力作：

**“假设辩证法”**

假设俄国无产阶级失败了：

假设列宁失败了的话，那么我相信中国革命和东欧革命一定还要坎坷得多。

假设德国革命成功了：

假如当初德国革命能够成功的话，那么至少德意志民族和整个欧洲都不会受到如此严重的摧残。

要是能够完成革命任务：

“一旦无产阶级能够重塑自己的阶级意识，能够锻造出战斗的群众组织，那么工人的力量就将会是不可战胜的。”并且明确的在其他文章中说过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遵循《怎么办》里提出的派对建立战略。（事实上目前全世界所有帝国主义

国家的MLM都还没有完成这个必须完成的任务，要是真能实现这个任务的话，我怕是做梦都能笑醒。）

至于“假设”、“要是”为什么没有在过去成为“现实”， @Rick Sanchez先生选择用“战胜机会主义”来解释：

……运动一直不能取得胜利的缘故就在于“工人阶级先锋队上层产生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使得革命运动偏离正确路线从而断送无产阶级革命，这是导致无产阶级革命无法胜利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工人阶级先锋队上层会产生机会主义、断送革命呢?

赤眉同志说得好“帝国主义国家革命渺茫论‘认为垄断资产阶级的超额利润收买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使得帝国主义工人阶级被改良主义所控制，所以帝国主义国家革命前途是渺茫的——这表面上符合列宁对帝国主义国家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根源的分析，但实际上却是对列宁观点的歪曲。列宁分析帝国主义国家工人运动机会主义的根源，恰恰是要战胜这种机会主义，而不是得出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丧失革命性、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前途渺茫的结论 。

对于“超额利润导致改良主义的泛滥”的观点，@Rick Sanchez先生说这是“表面上符合”、“实际上却是歪曲”的。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会“产生机会主义”从而“断送无产阶级革命”呢?

## 革命是唯物的，而不是唯心

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

**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列宁同志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

**一切革命，尤其是20世纪俄国三次革命所证实了的一条革命基本规律就是：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

然而@Rick Sanchez先生的说法却是：

这导致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客观条件最充足的地方缺乏进行革命的主观条件。而要避免革命前景被葬送，首先要做的是先锋队内部持续不断的路线斗争以及无数革命者深入到以工人为首的全体群众中进行的长期的灌输（这里灌输绝不是填鸭式学习，而很多值的是启发式的学习教育）与相互教育。

马克思、列宁与@Rick Sanchez先生的区别在于，马克思、列宁认为当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同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成为生产力的桎梏，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这种社会革命的变革将会反映在阶级社会中的各阶级的行动与思想中，具体表现为：下层不愿继续过去的被压迫秩序、上层无法维持过去的压迫秩序，从而使得革命获得成功。

但@Rick Sanchez先生则发表了一番不同于马克思、列宁的独到见解，他认为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未到来的原因是：客观条件最充足的地方缺乏进行革命的主观条件。

各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前途是充满希望的！但为什么你们没有成功呢？还不是因为你们不努力！你们缺乏主观准备！倘若台尔曼看了@Rick Sanchez先生的文章，德国无产阶级早就把德帝国主义的骨灰给扬了！

既然我和@Rick Sanchez先生都说到了台尔曼和德国革命，那我就顺带讲讲为什么是纳粹上台而不是德共上台的原因，发表一些个人的看法。

在@Rick Sanchez先生看来，德共的失败是其缺主观条件的结果。

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德国资产阶级得以橄榄德共的原因是，德国资产阶级通过改良主义收买了德国的工人贵族，将部分超额利润让渡给了德国劳动人民

以满足了后者的短期利益，同时由于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德国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膨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得到了恢复、甚至是增强。在德国资产阶级力量增强，而德国劳动人民却被暂时收买的情况下，德国资产阶级得以避免被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所推翻。

首先是德国资产阶级让渡部分利润以建立改良主义、收买了德国的工人贵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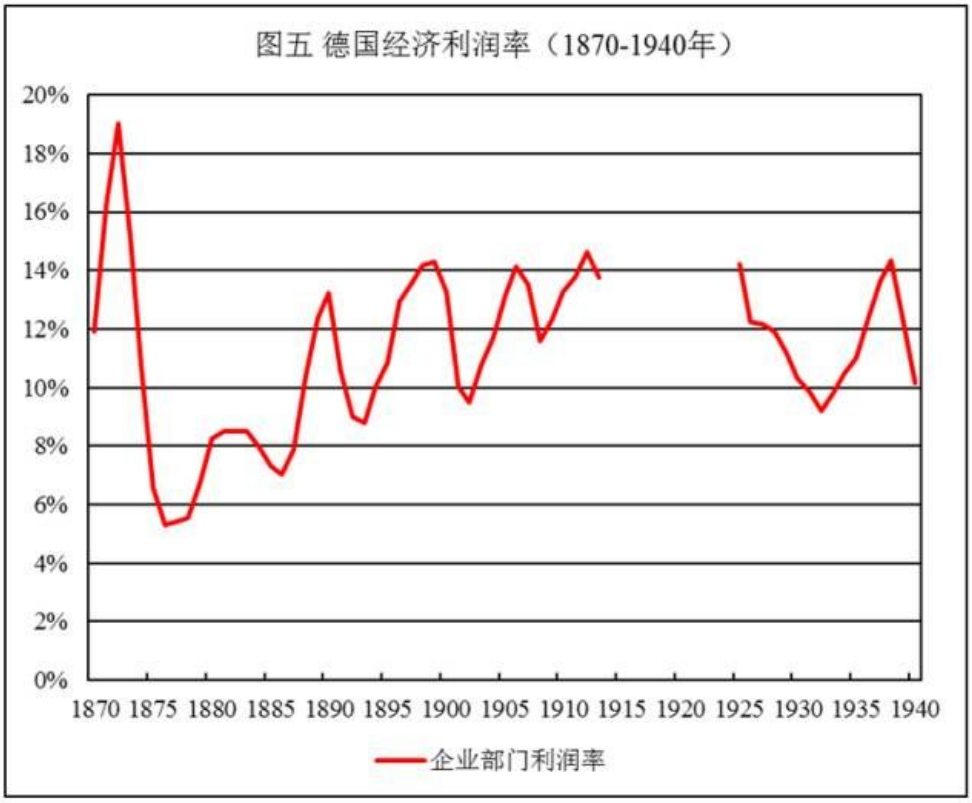
根据《纳粹德国劳动者保护政策研究》，德国工人的工资总额从1933年的113.2亿马克上升到了188.37亿马克，同时失业率从1932年的30.1%下降到1938年的2.1%（《帕尔格雷福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到1939年，德国甚至发生了劳工短缺，以致不得不从工厂里直接征兵。同时德国工业产量指数在1932年到1936年之间翻了一倍。1932年到1938年，德国工业工人名义工资上涨了约27%，同期消费物价指数上涨了约13%，两相加减其实际工资大约上涨了12%。

德国资产阶级通过“充分就业”降低了失业率，德国工人实际工资的提高也反映在德国工人阶级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上：

从1932年到1938年，德国的一岁婴儿死亡率从千分之七十九下降到千分之六十。纳粹政权尽管号称自己“要大炮不要黄油”，但是黄油产量却从1932年的42万吨上升到了1940年的62万7千吨。肉类产量也从1932年的310万吨上升到1938年的接近370万吨，这个增长甚至还快于后来联邦德国同等产量时的增长。啤酒产量从1932年的33.5亿升提升到了1939年的51.3亿升。

由于黄油、肉、啤酒这些东西基本不能用做再投资，它们都是直接的消费品，所以我们基本可以判断，就平均而言，德国无产阶级在纳粹上台到战争爆发前确实是吃得好了，喝得也好了。

在经历了二十年代初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后，德国经济在1925年以后出现了相对繁荣。1932年，德国企业部门的平均利润率暴跌到了9%。经过纳粹党数年统治以后，至1938年，德国企业部门的平均利润率恢复到了以往经济繁荣时期才有的14%以上。




由于帝国主义攫取了巨量的超额利润、超额剩余价值，其自身用于物质生产的劳动力就被节约下来。这部分节约的劳动力可以充当政府官员、军官和士兵，从而维持“强大”的资产阶级国家和军队；也可以转化为金融市场的经理、经纪人、职员，在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的同时又进一步以金融资本的方式掠夺第三世界国家的财富。

随着德国资本主义逐渐走出经济危机，开始进入复苏期，德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开始逐渐恢复，甚至增强，这具体表现于服务于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维持德国资本主义秩序的德国小资产阶级的变化上。

根据普兰查斯引述的数据，白领工人和公务员（这两者是现代小资的绝对主力）在1933年占总人口的18.4%，在1939年占总人口的20.4%。按照这两年的德国人口普查资料，这意味着1933年德国拥有现代小资约1215万人，1939年则为1417万人。

根据《德国的工资》一书第123页引述的《经济与统计》上的资料，现代小资的名义薪金总额从1933年到1939年136亿马克上涨到209亿马克。根据物价指数扣除价格因素（约9%），1933到1939年德国现代小资实际薪金上涨约12%。

德国小资产阶级的规模数量的扩大、实际薪金收入的大幅上涨，这使得德国小资产阶级更加忠诚于德国资产阶级，这就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上层产生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使得革命运动偏离正确路线”的物质基础。

而德国资产阶级力量的恢复、甚至是增强，也体现在德国资产阶级暴力机器的规模扩大、正规化上：

以德国国防军规模为例，1933年，国防军只有凡尔赛条约规定下的10万人，到1936年，德军就组建了包括三个装甲师在内的超过50万军队，而到了开战前的1939年，德国武装力量总数已经超过了450万（德国国防军报告网）。过去被迫在外当打手、当保安的职业军官团和以各种名义存在的法西斯民兵组织被大量吸纳进国防军，成为了吃皇粮的正式雇员。像莫德尔、古德里安、隆美尔等在校官乃至尉官位置上窝了十几年的老油条，在三、四年之内以火箭般的速度被提拔成了将军。

到目前为止，我们就已经能够搞清为什么德国的革命失败了。

德国资产阶级在走出经济危机后，资产阶级的力量得以恢复、甚至是增强，而德国的工人贵族则被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所收买，服务于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更是在这之中得到了实际的物质利益，德国资产阶级的暴力机器更是不断扩大。在资产阶级力量增强、无产阶级反而被收买分化的情况下，自然很难出现“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革命条件。

而@Rick Sanchez先生说的什么“你们不努力，所以没有战胜机会主义”，完全是上述物质基础的产物。

@Rick Sanchez先生是诚实的唯心主义者，他拒绝从“生产力与现存的生产关系的冲突”出发去研究革命的原因，他拒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分析过往的帝国主义国家革命失败的原因，他拒绝承认列宁同志的“革命的希望不在于西方而在于东方”的光辉论断，因为他顽固的躲在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小圈子中，学院派左翼的圈子虽能够给他带来温暖的认同感，但却完全限制了他对于阶级斗争的正确认识。

这不怪他，这只是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必然结果之一。

# 意识形态能长久地迷惑劳动人民吗?

井冈山卫士、张惟为

**远航一号注**：在xin网友发起的帖子下面，许多网友和红色中国网的编辑开展了内容丰富而热烈的讨论，除了涉及对当前俄乌战争的看法以外，还讨论到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尤其是意识形态、“灌输”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等问题。现将张惟为网友与井冈山卫士同志的相关讨论整理出来，以便各位网友进一步研究、探讨。

**张惟为:**

君行早网友指出了一个打仗的理由，那就是为了钱。俄罗斯人民可以为了钱而去打仗，也可以为了活命而逃离资产阶级之间的战争。但唯独不能为了”爱国“而打仗，因为那不是你的国！无产阶级祖国早就亡了！

但是钱这个东西只能招来雇佣兵，谁给钱多，我就替谁办事。并且，“死了怎么赚钱？”，所以用钱收买的只能是投机份子。但是俄罗斯老百姓都是投机分子么？不可能如此，他们大部分还是被民族国家主义所裹挟。你给他们钱，他们也不会轻易叛变。这就是意识形态的作用。所以你还会认为这是老百姓的选择么？老百姓真的能不受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控制么？如果老百姓这么能耐的话，俄罗斯寡头集团早就被赶下台了。

**井冈山卫士:**

现在的情况是俄罗斯的人民群众已经不可能“安安稳稳”地走新自由主义道路了。今天的俄罗斯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继续走新自由主义道路，那就是成为乌克兰，被纳粹和帝国主义肢解。再经历一遍1941年和1991年的双重悲剧。

俄罗斯人民当然不答应。就算普京集团还想和稀泥，俄罗斯人民也不答应。目前出现的状况是，俄罗斯资产阶级由于试图阻碍新自由主义分裂俄罗斯凌虐俄罗斯人民的企图，和俄罗斯人民之间出现了短期（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利益的一致。而这种一致并不需要通过奴役新解放区内的乌克兰人民来实现，相反，新解放区内的乌克兰人民可以享受类似于俄罗斯人民的待遇。这当然与纳粹不一样。

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祖国”，关于中国和苏联的革命性质和革命以后的社会性质，红色中国网已经有很多的讨论。可以查阅。

张惟为网友说的“钱”，就是我们通常讲的阶级利益。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重合的时候，才会出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形势。现在的情况是俄罗斯劳动人民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再次解体，反对乌克兰化的短期核心利益与俄罗斯统治阶级主要集团有了一致性。这是俄罗斯劳动人民作出了符合其利益选择的表现，当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作用

过去存在过比今天的俄罗斯统治阶级腐朽的多的统治阶级，但它们中的很多仍然获得了人民群众在许多问题上的支持。这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控制”，意识形态从来没有那么玄乎。

今天我们乐见俄罗斯人民取得反帝国主义，反新自由主义的胜利，一方面固然是这个胜利满足了俄罗斯人民最直接最迫切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是这一胜利会加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崩溃，从而把中国资产阶级推向一个相当困难的境地。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劳动人民向往胜利的短期利益，与中国和世界劳动人民解放的长远利益趋于一致。

张惟为:

1、【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祖国”】，这一点同意，但我认为毛时代，是有这个“无产阶级祖国”的承诺的，只是未兑现。

2、【你说的“钱”，就是我们通常讲的阶级利益。】钱不是阶级利益，阶级利益还有政治地位的问题，钱就只是经济方面，将阶级利益局限于经济利益，是列宁在《怎么办》中所批评的经济主义。

3、【这是俄罗斯劳动人民作出了符合其利益选择的表现，当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作用。】您要好好考量一下这句话，西方经济学都不承认洞悉市场的理性人主体了，为什么会认为俄罗斯人民啥啥都门清?

4、【过去存在过比今天的俄罗斯统治阶级腐朽的多的统治阶级，但它们中的很多仍然获得了人民群众在许多问题上的支持。这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控制”，意识形态从来没有那么玄乎。】作为一个老左，您应该知道，这话明显不对。“意识形态”并不是洗脑话术这么简单，它在每个人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主体”从词根上讲不是主人，而是奴隶，是谁的奴隶呢？在拉康的理论中是大他者的奴隶，通俗地说就是社会秩序的奴隶。比如女人打扮漂亮是为了勾引男人么？用生物学解释似乎是的，但生物学解释不了人类社会，因为人不是动物。女人打扮漂亮是为了获得社会认同，社会认同对一个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欲望。无法得到社会认同的人，甚至会自杀。

同样，如果人赚钱只是为了讨生活这么简单的话，那么为什么会互相攀比么？为什么会攀比谁赚钱多？因为只有钱多的才会得到社会认同。为什么赚钱多的会得到社会认同？因为市场经济不仅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同样也是资本对所有人的统治，这个统治结构塑造了人们对哪种事物的认同。

那么一个未系统学习过基本马政经教科书的人，能够摆脱这种意识形态么？显然是不能的。这就是列宁所主张的，工人从自发走向自觉，需要先锋队作为中介。而依靠工人自身，只能走到“工联主义”，只能是进行经济上的抗争。无法自觉地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军。

对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也是全方位的、深度塑造一个人的。当一个人说自己不爱国的时候，立马会遭遇群嘲，“爱国”是当前民族国家的一个道德律令。主体本身并不需要知道自己真实内心的想法是爱国还是不爱国，主体只需要知道社会要求他爱不爱国就足够了。社会要求我爱国，我就爱国。这就是“朴素爱国主义”，它并不“朴素”，因为它是社会要求的。我们讲“朴素爱国主义”的时候，是为了给民族国家主义者一个台阶下，是为了照顾对方的情绪，但要做严肃的分析，则没有“朴素”的爱国主义。

为什么主体本身并不知道自己真实内心的想法是爱国还是不爱国？很简单，如果主体知道自己爱国，那么就会有一个自己的“国”的定义，它是指版图呢？还是指文化呢？还是指国民呢？很多人脑子里对这个概念都是很浑浊的，政府则将自己与国家的概念绑定了起来，在政府的语境下，爱国就是爱政府。

如果假设一个俄罗斯士兵想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得出了爱国是爱人民，而不是爱政府，那么他会想到人民是分阶级的么？如果想不到，那如何界定“人民”呢？显然又是政府出来给人民下定义，政府说谁是人民谁就是人民。（国内不是有这个新闻么，一群人去政府闹事，说政府要为人民服务，而当官的反问道：“你知道什么是人民么？你是人民么？”，而按照中特的定义，拥护中特政府的才是人民。）

如果再继续退一步，假设这个士兵想到了人民是分阶级的，他想要为了“无产阶级人民”而打仗，那么俄乌战争开始前干什么了？为什么以前不筹备革命？显然，如果士兵能想到人民是分阶级的，那“无革命准备”这样一个事实也表明，他只能是在俄乌战争之后想到的。那么想到这一点的士兵能有多少？能有多少士兵在打仗的时候还有时间学习马政经？这就根本不可能。以上这一部分是要阐明：“爱国”这个词不能和“朴素”连在一起用，因为它是被社会塑造的，并不朴素。

那么回过头来，【俄罗斯人民根据自身利益，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一方】这种观点正确么？我不是说它不对，我认为它至少需要两个前提：

（1）俄罗斯人民普遍很聪明，知道自身利益所在；

（2）什么是“利益”，这仍然需要下定义，当然，当前语境下，就是“钱”，就是“经济利益”。当一个人将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压倒其他利益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套形而上的意识形态（这里“形而上”、“意识形态”并不是贬义）。所有人都会被这种经济至上的意识形态俘获么？要分情况，家里有余粮的小资一般不会只追求“钱”，这群人追求的东西种类繁多；家里没有余粮的无产阶级会把钱看得重，因为这个钱用于满足生活所需，没有钱，生活就无法继续，也就是服务于劳动力再生产，所以它很重要，但又不会特别重要，它不会超出生活本身，因为无产阶级所能看到的是：赚钱就是为了生活的继续。

可以发现，这两个前提条件不相容。如果“俄罗斯人民”只包括无产阶级，不包括小资。那么为生活所迫必须去赚钱的无产阶级普遍会很聪明么？不会的，列宁认为无产阶级自发地只能形成工联主义，也就是只看到“经济利益”，看不到“政治利益”。那么无产阶级会为了经济利益而去打仗么？前文指出，无产阶级从自身视角所看到的，赚钱就是为了生活，那打仗不长眼，命都没了，赚钱还有什么意义？无产阶级冒着生命危险去打仗的理由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让其他同样是无产阶级的同胞获得经济利益。也就是前文所说的，认识到爱国就是爱人民，而人民是分阶级的，爱人民就是爱阶级同胞。那么这真的只是经济利益么？无产者的主观思维都已经触碰到“阶级”这个范畴了，这难道还没有上升到政治利益么？换句话说，无产者真的这么聪明，能够自觉地认识到“阶级”么？我想这是很困难的。

所以，综上所述，我认为俄罗斯人民的参战意愿并不是基于自身利益诉求所得出的意愿，而是民族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

**井冈山卫士：**

列宁会在具体情况下说一些具体的论断，这无伤大雅，列宁也时常纠正自己过时的或错误的观点。不过你提到了“政治利益”，这究竟指的是什么？如果任由北约再次把俄罗斯变成殖民地，那么无产阶级会有什么“政治利益”？我相信你不会赞同帝国主义者的话：“他们一无所有了，但是他们获得了自由。”

理性经济人是对个人行为的极端假设，阶级追求阶级利益是经过历史检验的唯物主义真理。如果一个阶级的行为归根结底是由自认为的“认同”，“意识形态”等等所决定的，而且这些东西可以全局性的长久的让某个阶级背离其直接的和短期的利益，那么历史就只剩下“洗脑”——“反洗脑”——“以反洗脑的名义洗脑”的循环，因为也就没有任何规律可言。这就是“灌输论”和自封的“先锋队”永远无法胜利的也永远无法解释现实的命门所在。

红色中国网上的许多网友曾经以各种方式揭露过这种逻辑的荒谬，这篇文章可以参考：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32103

至于你说的：“无产阶级冒着生命危险去打仗的理由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让其他同样是无产阶级的同胞获得经济利益”。这是认识到自己的短期利益与无产阶级解放的长期利益一致，认识到自己的局部利益与无产阶级整体利益一致的时候才会有的行为，是自在阶级转化为自为阶级之后才会有的行为。

决定自在阶级行为的从来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给阶级中许多个体的直接的和短期的利益。你能认识到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不一样，这很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在阶级的成员是一群傻瓜，想被什么意识形态掌控就被什么意识形态掌控。而且，如果一个阶级的行为归根结底是由与其短期的和直接的利益无关乃至敌对的意识形态决定的话，区区几个人的“先锋队”又如何能战胜庞大的统治阶级宣传机器呢？

要么认识到革命的胜利归根结底是劳动人民长短期利益的重合而非意识形态的变化，要么就只能设想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宣传战的掰手腕进而放弃唯物主义。没有第三条道路。

**张惟为:**

1、“政治利益”指的是无产阶级要掌握政权、要当家作主、要改变生产关系、要变革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可以参考这个很短的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arch-card.all.click），理查德·沃尔夫明确区分了只要经济利益和经济、政治利益都要的不同。

2、“理性经济人”这个词，我不是想说人理不理性，我是想说，人能洞悉一切，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这是不现实的，有多少人都不知道“阶级”是个啥，他们能像您一样，谈论战争结果对某个阶级的影响么？当然不能。

3、意识形态不是表面上的洗脑与反洗脑，它很深层的。我这么说吧，哲学不是某种学问，它根本上就是一套意识形态。不同阶级立场的哲学家会用自己的哲学理论维护或挑衅社会秩序。哲学家所提出的东西会超过社会现实么？天才的哲学家会有一定的预见性，但不会超过现实太多。所以意识形态并不是像传销一样洗脑这么简单，它要给自己找合理性，这个理由甚至很深刻，让你很难辩驳。或者说它就是社会底层逻辑的铺设或反动。比如市场经济所塑造的人，为什么都爱“钱”？因为有钱会得到社会认同，为什么社会会认同有钱人呢？因为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他们本身自然是有钱人。为什么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呢？因为市场经济的生产关系是为了资本增殖服务，资本增殖需要资产阶级的存在，以及需要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所以“爱钱”这种意识形态是由社会的底层逻辑（资本增殖）所自然推导出的结论。现实与意识形态是分不开的。

4、红中网这篇文章：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32103指出了德国法西斯是收买了工人阶级，而不是洗脑了工人阶级。但是，请问井冈山同志，为什么收买是可能的？您可能会想到这样一种内心活动：作为一个工人，我知道希特勒讲什么“国家”、“元首”之类的屁话不对，但对我有好处，那我就要跟随。

可以看到，工人本身其实是清醒的，他知道法西斯不对，但表面上会装作拥护。也就是说人可以表里不一（这很常见），收买也只能收买工人的表面，而无法收买工人的内心。那么工人的内心装的是啥？是共产主义么？因为没有发生共产主义革命，而且从自在走向自为光靠工人自己的力量是不现实的，所以也不是共产主义。但不管工人内心装的是啥，他的表面就是在拥护法西斯。

如果只有一个工人表面上拥护法西斯，那么大家会认为他是奇葩；但如果只有一个工人表面上都不装做拥护法西斯，那么大家也会认为他是奇葩。所以个人被共同体所挟持了，如果你不表面上装作拥护法西斯，那么你就要被迫害。

这就是二阶意识形态，它不要求你相信它，但它要求你表面上要装作相信它，结果导致所有人都不得不一直带着拥护法西斯的面具。甚至直到法西斯造成了灾难，人们也无法摘除这个面具。

它放在今天也是成立的，如果你不爱国，那么你就违背了道德律令，但所有人都遵守（即使可能是表面遵守），只有你不遵守你觉得合适么？你是何方神圣？竟然斗胆挑战大家都遵守的秩序？

5、被意识形态挟持，并不意味着你是傻瓜，正像前文所讲述的，你可能出于个人利益，而不得不假装自己相信。但别人不知道你真实想法是相信还是不相信，他只能根据你的表面行为来断定你是相信的。这就导致了在他看来，所有人都相信，只有自己不相信。普通人承受不了这种，所以他也会选择表面相信。

6、【想被什么意识形态掌控就被什么意识形态掌控。】其实二阶意识形态（内心不信，表面装信）还算是好的，但更多的人其实是真信。因为意识形态不是洗脑话术，你说由“利益”来决定意识形态，其实你想说的是：由利益来决定政治立场，但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不是一回事，利益决定不了意识形态，因为判定什么是“利益”，这本身就需要一个价值排序的框架，这个框架就是意识形态。

比如一个自在的工人，会认为“赚钱”、“娶老婆”、“生孩子”是他的利益，但自为的工人会认为“我是无产阶级的一员，只有保证无产阶级集体的利益才能保证我个人的利益”，也就是将“无产阶级集体的利益”判定为他的利益。

当然你又会说，这是在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矛盾中，他选择了长期利益。那么黄继光堵枪眼是长期还是短期？当然你又会说，这是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矛盾中，黄继光选择了集体利益。但是你想，【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之间是能够比大小的，或者说这个帐比较好算（其实也没法算，这里是退一步，假设它能算）；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这个帐是怎么算出来的？这没法算，这不是数学题！这不是理性所能把握的，它跟欲望有关，而欲望是无法比较大小的。比如，“躺床上”和“吃美食”之间如何比较大小？鱼和熊掌不可得兼，怎么办？古文讲：舍鱼而取熊掌，因为熊掌影射某种崇高的东西，但判定什么是崇高，难道不是意识形态么？

7、【区区几个人的“先锋队”又如何能战胜庞大的统治阶级宣传机器呢？】意识形态不是洗脑，它往往是很有理有据的，不仔细的人往往看不出来。“西方经济学”、“英美心理学”这种学科就整个是一套大型意识形态。你看有多少学生中了毒？皮凯蒂写21世纪资本论，仍然是在经济主义的层面批评市场经济，他没有超出经济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本身。宣传机器只是机器，捣毁了它，作用没有期望的那么大。

8、【要么认识到革命的胜利归根结底是劳动人民长短期利益的重合而非意识形态的变化，要么就只能设想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宣传战的掰手腕进而放弃唯物主义。没有第三条道路。】

意识形态不是政治立场；意识形态不是洗脑话术；一个人对什么是利益的判定，本身就取决于意识形态；最后，我个人认为，生产关系是意识形态的前置逻辑，但利益绝不是意识形态的前置逻辑。生产关系不等于利益，因为利益包含着价值判断。

**井冈山卫士:**

沃尔夫和他的老哥们莱兹尼克是当代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其基本观点是阶级是个“过程”，而过程决定于观察者的“切入点”，而“切入点”的选择完全是主观的，想啥就是啥。也就是说，你是不是某个阶级的成员，本质上是由你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而这个“意识形态”可以让你，也可以让本阶级的绝大多数成员持久的违背自己的短期和直接利益行事。

照着这一套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的转变归根结底是把另一套“意识形态”从外面“灌输”进去。这也是从葛兰西到今天的中国左派教条主义者一贯的错误，即背离历史唯物主义。这篇文章值得参考：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8518

本质上讲，在谈论意识形态究竟有什么奇妙的反作用之前，应当先去思考意识形态从哪里来，意识形态是否可能长久地迷惑一个阶级，让该阶级的多数成员一致违背自己的直接利益行事。

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绝大多数都发生在人们不知道阶级“是个啥”的时候，正如你在了解你的消化吸收之前就已经知道要吃喝一样。

资本主义的诞生从来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爱钱”，而“爱钱”也不是什么有意塑造的结果。一般人“爱钱”的根本原因是市场经济环境下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可以用来交换别人的劳动产品，获得使用价值，享受高生活标准。资本家”爱钱“是因为货币是资本的一般形态，可以用来直接进行增殖。人不是因为被教育了“爱钱”才去挣钱、赚钱来获取使用价值、价值，而是因为拥有货币可以让人获得使用价值、价值才产生的“爱钱”观念。是阶级利益决定了意识形态，而决不会相反。在交换并不发达的原始部落，你拿着金子也不会被人认为是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因为你无法用它换到什么使用价值。

“面具”也好，“二阶意识形态”也罢，这些花词都不能解释为什么魏玛共和国一出现大规模失业就乱，纳粹党上台暂时消灭失业就不乱的问题。

至于遵守不遵守秩序，历史上这么多农民起义和革命为什么就能爆发？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有人敢于打破这个秩序，任何一个没有失去希望的民族都会有舍生取义的人存在，总会有人用生命为代价打破秩序，这从来不是问题。真正成为问题的是，你这星星之火能否形成燎原之势，这就决定于革命行动能否发人民群众要生存要生活的个别和短期的利益与要自由要解放的长期全局利益统一起来。而这种统一，从来不是“意识形态”能做到的，而只能是特定生产关系下阶级矛盾发展的结果。

你说“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这个帐是怎么算出来的？这没法算，这不是数学题！这不是理性所能把握的，它跟欲望有关，而欲望是无法比较大小的。比如，“躺床上”和“吃美食”之间如何比较大小？鱼和熊掌不可得兼，怎么办？古文讲：舍鱼而取熊掌，因为熊掌影射某种崇高的东西，但判定什么是崇高，难道不是意识形态么？”。

这是错误的，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讲，被统治阶级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重合往往发生在阶级妥协无法维持的经济危机、政治动荡期间。在这个时候无法维持由当时阶级斗争水平决定的体面生活。“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就是典型的证据。相反，当存在广泛的阶级妥协，被统治阶级还能照旧生活下去，统治阶级还能照旧统治下去的时候，往往不存在这些利益的重合。就算有反抗运动，通常仅仅限于个别地方。因此，这是“理性”可以通过学习历史规律，学习唯物辩证法掌握的，不是诉诸什么“崇高”不“崇高”的意识形态就能糊弄过去的。

无论你如何想把现实世界中意识形态所包含的政治和利益内容提纯掉，意识形态永远是现实斗争的利益的反应。你所理解的真善美、“崇高”、“秩序”等等看似中性的“前置”概念，本质上是阶级利益在认知上的反应。

总结起来，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相反。上层建筑的“发作用”也只能在经济基础限定的条件下发挥作用。

# 无产阶级应该怎样对待小资产阶级自由派?

远 航 一 号

**子草臣刁公人-民说:**

斗争方式和联合方式都是要根据对方的敌的状态来确定的。比如蒋介石是不是可恶，但是在抗日战争时，对蒋介石的斗争当然还是要坚持的，但是也有联蒋抗日的要求。

现在和自由派当然要斗争，但是不是主要的，在很多情况下需要联自抗特，但是以我为主。在自由派和特色斗争时，绝对支持自由派的反特斗争，就如当蒋介石抗日时，绝对支持蒋介石的抗日行为。

**远航一号评:**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中国革命史上，这是毛主席首先提出的。

要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正确地回答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及革命性质。比如按照后来发展起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完成民族独立、开辟国家工业化道路。为此，革命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实际上当然不是，另外讨论），“农民”是最广大的同盟军（后来又强调“农民”

主要指贫农和下中农），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代表帝国主义利益的买办资产阶级（后来演变为“官僚资产阶级”）是敌人。

始终有争议的是民族资产阶级。斯大林主张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托洛茨基反对。毛主席的贡献是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有左中右三翼。右派甚至中派在革命危急关头都可能叛变革命，那就不再是团结对象，而成了革命敌人。

今天的中国在生产关系上是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未来不存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只存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这个基本历史特点决定了未来革命的领导力量只能是无产阶级（这回是真的），而广大的城乡半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大致包括人们通常说的农民、第一代农民工、小业主）

革命的对象（即敌人）包括整个的资产阶级，也就是包括跨国、国有、私人等各资本家集团。今日中国没有什么“民族资产阶级”。所有资本家都是革命对象。但具体斗争中可能利用某些资产阶级内部矛盾。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此外，未来还有过渡时期，对资本家不可能一下子消灭，就是消灭，也要分没收和赎买。这些都是策略问题。但就整个历史时代的革命任务来说，整个的资产阶级都是革命对象。

那么，对自由派应该采取什么立场呢？显然，要确定一个政治派别是敌是友，不是看其表面的主张和口号，而是要看其所代表的阶级以及一定阶级中的某个集团。

在上述各阶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阶级没有提到，那就是现代小资产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小资产阶级是垄断了较高专业技能的雇佣劳动者（也有形式上的自由职业者，如医生、律师）。不了解小资产阶级，就不能正确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

中国，作为一个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小资产阶级又有具体的特点。由于半外围小资产阶级与核心国家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一个相对统一的全球化高端劳动力市场，半外围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从资本主义全球化中受益（自由贸易、资本与“劳动”自由流动），赞成为这种自由贸易和流动辩护的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并将维护这种自由流动的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政治干预上。这便是小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上升”，小资产阶级一部分将自身“发达”的希望寄托于本国资产阶级的“发达”之上。这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物质基础。

此外，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大批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化。这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激进化、向无产阶级靠拢、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基础。不过，

在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时期，即使是边缘化的小资，一般也是看不到无产阶级力量的。所以大多数边缘化小资往往还是沦为自由派或民族主义在精神上的附庸。

那么，小资产阶级，具体来说，自由派，在中国的阶级斗争中起怎样的作用呢?

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一般来说，整个的小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附庸，他们虽然也受资产阶级剥削压迫，但更想努力保住他们相对于无产阶级的特权地位。

只有到了革命高潮或革命前夜，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才会倒向无产阶级、加入革命联盟。即使到了那个时候，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也难免是动摇的、机会主义的，可能对革命阵营起扰乱的作用。这并不是说不要团结愿意革命的小资产阶级，而是要客观评价其真实作用。

至于小资产阶级中的自由派，在资本主义复辟初期，他们曾经奉资产阶级之命，充当了资本主义复辟在思想上的急先锋。伤痕文学、非毛化、诋毁社会主义、美化资本主义、鼓吹私有化、污蔑大锅饭养懒汉，都是他们干的（现在还在干）。甚至还要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案!

他们对工人阶级犯下了滔天罪行！几千万工人下岗失业，自由派对资产阶级是有“功”的。不清算他们这笔历史罪行，就已经算工人阶级宽宏大量了。

至于现在，自由派在反毛反社会主义问题上并没有丝毫反省。

至于说自由派与“特色”（实际上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有矛盾，在他们发生矛盾的时候，是不是客观上就对无产阶级、对劳动群众有利呢?

我们知道，自由派并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幻想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为小资产阶级争取一些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如果说，自由派确有力量能够凭借本阶级的力量争取到政治民主，又确有诚意愿意与各劳动阶级共同分享政治民主权利；又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核心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掌握足够的剩余价值，可以在政治民主方面做出一些让步而不危害资本积累秩序，那么，有些左派心心念念的与自由派结成“统一战线”，未尝不可以考虑。

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一个剥削廉价劳动力的出口制造业国家，并不具备这些条件。

如果实行了真正的民主，哪怕是资产阶级民主，中国的资本主义积累秩序就无法维持。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资产阶级绝不会主动做出让步，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因此，在中国争取民主的斗争，不将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充分发动起来，是决不会胜利的；而一旦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充分发动起来，当然决不会在资产阶级民主面前止步不前，而是必然向社会主义革命大踏步前进。

正是因为小资产阶级自由派出于其阶级本能认识到这一点，无论其口头上多么热爱“民主”，而在实践中十分恐惧真正发动广大劳动群众，尤其害怕、反对劳动群众反抗资本家的斗争。正如1989年的教训证明的，一旦到了斗争的紧要关头，小资产阶级宁可不要民主，也不要发动群众的“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如果追随了自由派领导的“民主运动”，除了流血当炮灰，什么也得不到。

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在中国，无产阶级要争得民主，就必须夺取民主运动领导权；中国的民主斗争要胜利，就必须同时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而无产阶级要夺取民主运动的领导权，就必须拒绝参加任何由小资产阶级自由派操纵的假“民主”运动。因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凡是自由派领导的这种运动，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给人民带来民主，而只会假“民主”之名给劳动群众带来种种灾难。这是因为，自由派靠自己的力量争取不到“民主”，而自由派绝不可能为了民主而发动广大劳动群众，尤其不可能发动群众反对资本家，而在资本主义中国，不反对资本家，就不可能发动群众！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争取民主的斗争，离开了自由派，照样可以胜利！

这当然不排除，小资产阶级自由派中有个别真诚追求民主而不是本阶级狭隘利益的人物，在反复失败后能够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民主斗争取得胜利，并且愿意为了民主而背叛本阶级。然而，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这样的人物只能是极个别、极特殊的。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通过长期斗争（现阶段，尤其表现为“躺平”斗争），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必然发生对无产阶级有利的变化。到那时，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将吸引、团结包括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劳动群众。中国的无产阶级有着十分光明的前途，而小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民主”运动却只能将人们从黑暗领向黑暗。

# 马克思主义，还是自由主义?
## ——评阳和平请资本家“帮忙”的反动言论

233型酷炫喜羊羊

阳和平说：

“无产阶级不会组织社会大生产，那么就只好由资产阶级来组织。无产阶级需要的是学会有效地监督那些自己委托的生产管理者，而不是因噎废食地取缔大生产的组织者。 至于如何才能有效地监督那些管理者，我们只能从群众运动的经验中去总结，而不是唯心主义的去搞顶层设计。”

阳和平的这番话真是可笑。

难道没有了地主的鞭子，我们的农田就长不出庄稼？我们的劳动者就无法获得丰收？

正如列宁同志在《国家与革命》中说的那样：

**“在这种经济前提下，完全有可能在推翻了资本家和官吏之后，在一天之内立刻着手由武装的工人、普遍武装的人民代替他们去监督生产和分配，计算劳动和产品。”**

我们这个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远高于1920年代的苏维埃俄国，如果当年俄国人民是迫于形势而不得不让资本家来组织生产，那么今天的中国人民是绝对不需要资本家来“帮忙”组织生产的。

一些同志替阳和平同志辩解啊，他们说阳和平的本意是好的，只是被人想歪了：

【无产阶级如果不会组织社会大生产，就只好由资产阶级组织】这当然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没什么可争议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可能立刻全体参与国家管理，不可能人人管理组织大生产，这是一个事实，也是列宁一百多年前论述过的。那些攻击阳和平的人，为什么不把列宁开除左籍呢？如果人人都能够参与管理，都具有管理组织社会的知识水平和能力，那么不要说阶级差别，脑体差别都基本上消灭了，那么共义的高级阶段不是近在眼前了吗？那些攻击阳和平的人，是否承认无产阶级建立新政权后【共义的高级阶段不是近在眼前】？

就比如， @无弋爱剑同志说，资产阶级组织社会大生产是事实，不争论，同时，他正确的总结了阶级社会的物质基础是脑体分工：

“如果人人都能够参与管理，都具有管理组织社会的知识水平和能力，那么不要说阶级差别，脑体差别都基本上消灭了，”

无弋爱剑同志是知乎左派里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善良同志，但很可惜，阳和平同志的真实想法，并不是无弋爱剑同志所认为、期待、辩护的那样。

关于这个问题，阳和平同志说过：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社会职能分工只会更加细化”。

虽然社会职能分工是阶级产生的基础，也就是阶级的出现必须有分工，分工是阶级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反过来认为只要有分工就有阶级（秋石客的理论）是荒谬的，因为分工不是阶级存在的充分条件。阶级产生的前提条件是生产力水平相对的低下，劳动的异化。但是，即便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社会职能分工只会更加细化，比如不是人人都可以轮流从事心脏外科手术。

我提议，认同这一观点的人，都应该去厂里面感受一下“更加细化”的“分工”，看看这到底是福报，还是对我们劳动者的摧残。

阳和平同志还说过：

“阶级和脑体分工都是一定生产力水平的结果，不是原因”

“虽然“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基础不是原因。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这才是阶级存在的根本原因，而非脑体分工。我认为阶级和脑体分工都是一定生产力水平的结果，不是原因。分工只是给阶级的产生提供了一个“自然”的渠道，就像资产阶级的产生起先就是在手工作坊的师傅身上“自然”地出现一样。”

什么是形成阶级的原因?

无弋爱剑同志说阶级社会的物质基础是脑体分工，这是正确的。

但阳和平认为，阶级社会是一定生产力水平的结果而非什么脑体分工。

阳和平同志引用了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的论断：

**“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

然后，阳和平同志马上就说：

“这才是阶级存在的根本原因，而非脑体分工。”

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看恩格斯完整的原话：

**“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

显然，被阳和平同志省略的这一段话，是与“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密切联系的；离开了被阳和平同志省略的这一段话，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为什么“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

在恩格斯看来，在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同时也是这样一个阶级，它是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同时又掌管着“社会的共同事务”，后者包括“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

什么是“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呢?

也就是组织社会大生产。

在《反杜林论》第二编第四章中，恩格斯指出了从奴隶制到现在为止一切的阶级社会，无不是建立在**“大多数劳动者被高强度、长时间的繁重劳动所束缚，必然产生了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组织社会生产管理”**的基础上:

**“……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都可以从人的劳动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中得到说明。当实际劳动的人口要为自己的必要劳动花费很多时间，以致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例如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的时候，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而且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永远不会错过机会把愈来愈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

“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为什么“都可以从人的劳动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中得到说明”呢?

因为在“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条件下，“实际劳动的人口要为自己的必要劳动花费很多时间，以致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这里，“实际劳动的人口”显然就是上述的“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而与他们相对立的，是从事“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

恩格斯明确地讲，当存在这样的条件时，**“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而且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永远不会错过机会把愈来愈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

并且，恩格斯明确说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同时也是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条件:

**“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和实际的公共事务。因此，只是在现在，任何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才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也只是在现在，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无论它拥有多少‘直接的暴力’，都将被无情地消灭。”**

这也就是我们的无弋爰剑同志所指出的：

“如果人人都能够参与管理，都具有管理组织社会的知识水平和能力，那么不要说阶级差别，脑体差别都基本上消灭了，”

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我们已经具备了大幅度缩短劳动时间，使劳动者高度参与生产决策的物质生产力条件。如果物质生产总量不变，只要平均劳动生产率每年提高2%，社会总劳动时间在35年内就可以减少一半。

以中国的国内总支出中，居民消费约40%（其中资本家消费约10%）、政府消费约15%、总投资约45%（其中净投资或资本积累约30%）。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后，理论上资本家消费、资本积累都可以节约，政府消费可以砍掉一半。

这样立即可以节约接近一半的劳动时间，马上可以实现全社会八小时工作制外加一两个月带薪休假。然后只要把每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按部就班转化为劳动时间减少，用一两代人的时间，即使不能消灭，但大大地缩小脑体差别、显著弱化脑体分工，是有可能的，如果还在大谈什么“不得不”找资本家来帮忙“组织生产”，我想也真是差不多得了。

而阳和平同志强调，“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社会职能分工只会更加细化”，分工仅仅是阶级社会产生的“基础”，而非原因，“阶级和脑体分工都是一定生产力水平的结果，不是原因。”

阳和平同志既不说脑体分工是阶级社会的物质基础，也不只是在单纯揭露阶级社会的黑暗，而是希望大家

——依靠“社会大生产的组织者”“发展生产力”，然后才能消灭阶级和脑体分工，而“不是因噎废食地取缔大生产的组织者”。

至于现在谁是大生产的实际组织者，我想阳和平同志已经说的很明白了——“那么就只好由资产阶级来组织。”

不论是相信未明子的同志，还是相信阳和平的同志，喜羊羊还是希望大家在替XXX辩护的时候，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反对饭圈化的左派偶像网红。

# 如果“消费不足”真是资本主义的“最终陷阱”，社会革命就遥遥无期了

井 冈 山 卫 士

**远航一号注**：近日，某网友给红色中国网编辑部来信，希望我们谈谈对“消费不足—生产过剩”危机学说（即在资本主义剥削下，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或绝对下降，引起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观点）的看法。下面是经过编辑的某网友来信以及井冈山卫士代表编辑部写的回信。

**某网友:**

我们打算将过去一段时间里的辩论经验总结一下，再经过一个时期的理论斗争，把“学院派”的理论支柱一根一根地挖掉，比如中帝论、灌输论、生产过剩-消费不足危机论，以及“官比资反动、资比官进步”或者“国资比私资反动、私资比国资进步”等（例如，私人资本家欠了工资，不是资本家的问题，而是官僚不作为的问题，只要把官僚打倒了就能走向更进步的资本主义）。

现在我们想先重点批判将消费不足-生产过剩危机论照搬到当代中国条件下这种错误倾向。有一批“学院派”左派，实际上是些专门搞证券交易的家伙，经常讲什么2008年以后中国搞“凯恩斯主义”引发滞胀、产能过剩，劳动人民不仅相对贫困化而且绝对贫困化，产能过剩始终越来越严重，然后等“凯恩斯主义”搞不下去了，危机就会爆发。

在我们看来，这部分错误理论对左派的荼毒不亚于中帝论。事实上，自2008年以来，除了新冠疫情引起的短暂衰退以外，中国资本主义尚未爆发重大的危机。听信上述消费不足-生产过剩危机论错误倾向的同志，或者会幻想危机随时可以爆发、很快就会爆发，陷入小资产阶级狂热或盲动；或者久而久之，眼看危机多年来都没有爆发（事实上自2008年以来也没有爆发），而自己岁月蹉跎、青春永逝，又不得不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现实，于是意志消沉、心灰意冷，直至对马列毛主义事业彻底怀疑动摇。

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在革命形势来临以前的相当一个时期，要树立革命胜利的信心，要坚定地确立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信念，而不是凭着一股小资产阶级狂热投机“左派”圈子，必须用科学的方法实实在在地了解中国资本主义的真实的特殊的矛盾（而不是想象的泛泛的矛盾），并且认识这些矛盾怎样为无产阶级革命准备条件。

关于上述问题，请问红色中国网编辑部的同志有什么看法。

**井冈山卫士：**

某同志，你好！祝贺你们最近在与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亲帝“左派”的思想理论斗争中取得的成绩。你们坚持原则，有理有节，斗志旺盛，方法得当，打一仗进一步，打击了宗派主义者，团结了越来越多的左派积极分子，也提高了自身的思想理论水平。

关于你提出的“消费不足—生产过剩”危机学说，简单地说，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在经济危机过程中发生、作为经济危机结果和表现形式的生产过剩，即在危机发生时和萧条时期宏观经济总需求相对于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不足的现象。这是一切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危机发生之后的必然现象，与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没有必然联系。

第二种生产过剩是作为危机原因的生产过剩，即多年的或长期的总需求不足引起持续的剩余价值实现困难，最终导致危机爆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长期的总需求不足通常是由工人阶级消费不足引起的。在国际共运史上，由工人阶级消费不足引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观点早期是在第二国际中流行，后来在斯大林时期成为政治经济学的标准内容，后来又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发展史及政治经济学教材的标准内容。概括来说，这种消费不足-生产过剩危机说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决定了，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必然受到越来越残酷的剥削，劳动人民必然绝对贫困化或相对贫困化，这就导致人

民大众的消费水平必然落后于整个经济的发展甚至绝对下降，而人民大众消费的相对或绝对不足最终必然导致总需求的不足，直至引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国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早已经认识到消费不足-生产过剩危机倾向只不过是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而且对于资本主义来说也不是致命的危机倾向。

今天中国左翼多数的生产过剩论者都会把作为危机结果的生产过剩和作为危机原因的生产过剩搞混。把经济危机本身造成的现象当作是经济危机的原因，甚至把经济危机完全等同于生产过剩。

在极少数能够区分两类生产过剩的人中，多数受过的经济学教育是资产阶级的宏观经济学和粗糙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官方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他们所学习的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也往往是由新凯恩斯主义-新兴古典经济学学者编写的反动教材。这些反动教材一直致力于诋毁作为改良主义经济学说并带有一定阶级妥协内容的原版凯恩斯主义。再加上他们自学的内容往往是微信上的财经写手的文章，因此他们会产生这样的思路：一切危机都是生产过剩危机（这一点反映他们对生产过剩不理解），凯恩斯主义只能推迟危机，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只会导致生产过剩在将来更加猛烈地爆发（这反映了他们不理解凯恩斯主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有效抑制资本主义经济不稳定）。还有的“左派”财经写手，从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庸俗货币数量论出发，认为一切扩张性货币政策都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加速，滥用“滞涨”这一词汇，给人们造成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2008年以后不是在危机中就是在危机边缘挣扎这样的幻觉，从而使得“危机”一词成为耸人听闻、毫无实际意义的夸夸其谈。凡此种种，在左派群众对经济危机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真实状况的认识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对于部分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的狂热盲动以及更多的原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悲观失望、消极迷茫，负有一定的责任。

在极少数中的极少数，他们可能听说过甚至读过“每月评论学派（垄断资本学派）”著名学者保罗·巴兰的《垄断资本》。《垄断资本》的基本观点是垄断资本主义天然存在生产过多经济剩余的趋势，因此资本主义到了垄断阶段始终面临着剩余实现的问题。资产阶级只能通过增加私人投资、增加政府的消费和投资、扩大海外资本输出等方式来暂时吸收这些剩余。然而上述几种剩余吸收的手段又会在未来制造更多的剩余。最终，资产阶级的这些手段将不再够用，从而引发生产过剩的总危机。

这是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资本主义战后黄金时期部分马克思主义者的判断（到了七十年代，已经被证明不符合实际并在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引起很大争议）。放在今天，有些人又将其照搬到中国经济中：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于是

中国资产阶级当局出台“四万亿”刺激措施；“四万亿”刺激措施导致产能过剩；于是资产阶级当局推出更多的刺激措施；更多的刺激措施导致房地产泡沫；于是资产阶级当局再推出“X万亿”……

这种思路至少有如下两个问题。

从逻辑上看，资产阶级国家宏观调控的极限是什么？为什么宏观调控在未来制造了更多的剩余以后，就不能用进一步的宏观调控来治理？为什么过去政府可以提供总需求（投资和消费），而未来就不行？如果说政府不能继续提供总需求是因为受到政府债务规模的限制，那么中国资产阶级以往的宏观调控有没有给中国资本主义经济造成无法承受的债务负担？主张凯恩斯主义扩张政策不可持续的左派写手们有没有做过相应的国际比较？据我们所知，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加起来现在大约是国内生产总之的70%，而美国和日本的政府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分别达到了130%和230%。如果美国、日本都还没有达到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极限，中国资本主义为什么就会很快达到极限？

从经验上讲，如果说“凯恩斯主义”只能推迟危机，而被推迟的危机未来只会更激烈地爆发，那么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爆发像三十年代大萧条那样的经济危机？

从阶级斗争的意义来看，如果消费不足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命门”，那么，资产阶级永远可以通过扩大总需求来掌握自己的“命门”，社会革命是否爆发完全看资产阶级的心情。试想，如果消费不足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唯一困境，那么，只要资产阶级稍稍“聪明”一点，搞一点小恩小惠、社会改良，提高一下工人阶级消费水平，由此引起的一切麻烦不都迎刃而解了吗？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良心自由派”不都是这样主张的吗？历史上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确实这样做过呀。所以，如果“消费不足-生产过剩”真的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唯一困境、“最终的陷阱”，那它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困境或陷阱，因为只要资产阶级稍稍“聪明”一点，就可以以微小的代价绕过这个“陷阱”。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笃信“消费不足-生产过剩”危机说，那么除非我们相信中国资产阶级真地蠢到无以复加，否则，社会革命必然是遥遥无期。

对于中国的无产阶级和马列毛主义者来说，幸运地是，消费不足-生产过剩并不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唯一矛盾。中国资本主义的致命矛盾也是半外围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由于这种特殊矛盾，决定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必然不断增长并最终超出中国资本主义可以容纳的狭隘界限。未来中国的无产阶级必然胜利，但这种胜利，不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更不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打得满地找牙，而是因为中国资本主义自身矛盾得发展必然导致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同盟军的发展壮大。

# 政　　治

# 西安疫情说明未来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是可能的

水果战胜橙留香

西安这地方这么大，好歹也是个大城市，怎么基层管理就这么烂，医疗设施也不会很垃圾啊，但硬是被击穿了，我就很纳闷了怎么会有这一波操作。

地方官僚抱团取暖，中央官僚空降钦差大臣下来肯定是跟地方有冲突的，而且空降一二三把手就是为了整顿地方以达到加强中央官僚集中的目的（所谓俩维护的具体体现）。但也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就清洗地方官僚，要想开刀，得先找一块磨刀石。如果地方官僚想多跟中央大员打几个来回，那就不应该轻轻松松的被抓小辫子，但地方官僚这次……

群众都把他们打得跟过街老鼠一样了，这待遇堪比福报马。中央官僚不希望底下烂事一大堆、破坏国家机器的整体合法性，地方官僚不希望底下烂事一大堆给中央官僚清洗他们的理由，主观上是不存在说官僚非要搞的老百姓民不聊生。那底下为什么还是烂事一大堆?

我是觉得这只能是因为当前这种央地关系下的基层控制力太拉胯了。政令传达下去变样了，“陕西要注意防控”→“西安要加强管控”→“辖区实行全面封控”→“你们几个，给我把住户的门焊上”，问责的时候就变成“你们怎么搞的民怨四起？”→“你们西安怎么不听省委指挥？”→“你们为什么搞一刀切？”→“不是区长你电话里说不能让一只蚊子从小区里出来吗”，到头来真要处分就跑出个“你们陕西省委要加强领导”→“你们西安怎么搞的？给我问责！”→“好吧，我去鞠躬”→“处分我事小，可谁来给英雄之菜打包啊？” 于是闹来闹去就变成清洗几个中层干

部、直接责任人来平息民愤（高新区那医院的总经理给停职了），最后基层还是现在这吊样。

这跟武汉那时候挺相似的，平时看起来各种新闻、海报、宣传片里面看起来多能干多牛逼多为民服务的基层组织，到了大事面前就变成“啊，我扛不住了，我摆烂了”，这就说明现在的基层控制力看起来很强，实际上真碰上事就原形毕露了。

之前论坛里头聊到，大概意思是说半外围的中国的政权能力不如核心的美国。我就感觉啊，如果按照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与七七八八的因素来划分，西安其实很像半外围，上海就跟核心一样，疫情来了，上海官僚应对的就比西安官僚好很多，有个说法叫做上海的官员必能进京，就是说上海官僚的治理水平很高（这里仅就官僚的社会治理能力而言啊）。

我寻思这种差异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有没有钱去稳定失业的老百姓，不然老百姓饿得受不了，没准就零元购了。第二个就是有没有办法维持基层政权的稳定运行，不然就跟西安这次一样，基层人手不够用，英雄之菜得靠人打包嘛，核酸也得让人去做嘛。第三个就是能不能保证地方官僚机构不会自己跟自己搞来搞去，减少内部摩擦。西安这次就是怕出问题，怕送人去医院的途中让人感染了，于是上头“你们社区怎么回事啊，防控不力，信不信我处分你？”基层博弈论了一下，求了一下数学期望，便“你虽为密接，但码仍为绿，给我老实待家里”。当问题大到一定程度时，官僚之间的摩擦就很极大的破坏官僚机构的运行，从而出现西安种种魔幻牛马景观，可谓是青青草原上，牛马成群。

上海这种地方肯定是少数，毕竟中国就只有北上广深这些个巨型城市有这么行的政权能力了。

对于中国更广大的内陆城市来说，一旦碰上大事，估计百分之七八十，保守了，百分之八九十，基层都会被击溃，从而导致基层官僚摆烂，地方官僚脱离，中央官僚失去地方控制权。而大事，可以是执行了清零政策的疫情，也可以是阶级斗争。未来要是工人阶级起来造反了，诶，在长期经济斗争中把经验与组织度刷够了，level提高了，那么工人运动就会在同资产阶级的不断较量中，同时冲击地方官僚机关，从而使得地方官僚机关开始摇晃。工人运动猛了，直接造成地方官僚机关瘫痪，那么基层就没有组织了，陷入无政府状态，那么谁来担任新的基层主导者？就由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地方官僚机器瘫痪了，那么暴力机器私人化，黑社会又跑出来了，这是一种可能。也有一种可能，无产阶级够猛了，战胜了黑社会，搞出自己的纠察队之类的，在团结起大多数群众的情况下，就可以组织成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实现突破。

那么什么地方可以实现呢？我们从疫情就不难看出，很明显，在内地，而不是沿海。沿海的资产阶级力量强大，小资产阶级众多，而且沿海城市地方官僚的政权能力较强，不利于工人阶级在政治斗争阶段实现率先突破。而内陆城市，资产阶级力量相对弱小，地方官僚有时候甚至发不出工资，这就有利于工人阶级在内陆城市积蓄力量，扩大相对优势，从而突破中国资本主义的防线，为更大规模、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拉开序幕。

未来的工农民主政权将能够解决原有地方官僚机关无法解决的群众生活问题。劳动群众吃不起英雄之菜，那就打倒英雄之官僚，打倒英雄之资本家，自己做菜，自己组织生产，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从而获得更多的群众支持。这种群众自己踢开官僚闹革命的事情一旦多起来了，那可就根本压不住了。

# 中国资产阶级的内斗
# ——一场打扮成路线斗争的派系斗争

井 冈 山 卫 士

## 一、这是一场什么斗争

最近几年来，中国资产阶级的行为有点难以捉摸，一是有自导自演的“民营经济退场论”和同样自导自演的“反击”；二是有抓捕房地产巨头任志强，然后又允许其保外就医；三是有金玉其外的“共同富裕”，随即其内容被限定在看资产阶级赏几个铜板的“三次分配”；四是有对互联网、房地产和相关行业的“整顿”，但又畏首畏尾、迟疑不决；五是有鹦鹉学舌、堆砌辞藻、先是诅咒文革，但没“坚持”改革的“伟大决议”。六是要“更好地发挥政府在资源分配中的作用”，但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又被狠狠砍了一刀。

如果说中国资产阶级是个尚能一致行动的统一整体，那么这些奇怪举动以及后来的反转和再反转就是不可理解的。在中国劳动人民反抗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尚未形成明确的政治运动，瘫痪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或者迫使资产阶级做出重大妥协之前，这些状况只能反映一个事实，即中国资产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上层出现了严重的内斗。

关于这场资产阶级的内斗，各路观察家们都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国内的自由派看来，这是一场关乎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大决战。决战的一方是邓小平以来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社会精英。他们要守护改革开放的成果，保卫私有产权，保证资产阶级和依附于他们的自由派小资的政治自由。一

句话，至少要回到胡温黄金时代的垂拱而治。决战的另一方是僵化愚昧的专制政权。该政权驱使和利用未能开智的愚民，收买小粉红和极左战狼，意图颠覆改革开放以来的良好局面，尤其是妄图清算资产阶级“第一桶金”的旧账。一句话，他们要让中国倒退回文革的黑暗时代。

在小资民族主义者和“工业党”看来，这是一场关于自甘堕落的买办道路还是星辰大海的“强国”道路的路线之争。斗争的一方面是依靠“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贸工技”卖国生意发家，依靠金融和房地产投机做大，依靠媒体控制和收买腐败官僚自保的买办团体。一句话，他们要让中国回到旧社会的经济殖民地状态。斗争的另一方面是既掌握先进技术，又有爱国情怀的科技专家。他们要推动协调统一的产业政策，实现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产业升级。一句话，他们要让中国最终取代美国，成为未来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核心。

在部分左翼进步分子看来，这是统治精英内部阶级联盟崩裂的斗争。一方面，以国企领导、中高级军官警官和多数官员构成的“官僚资产阶级”想要掌控和整合更多的资源，方便他们冲出国门，和美国进行帝国争霸。另一方面，以互联网、金融和房地产垄断私企为核心，以中小私营企业为主力的“自由资产阶级”则毫无争霸野心，只盘算着怎么剥削工人，他们要求继续国企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和去管制。由于这些左翼进步人士并不是这场内斗的参与方，所以他们的态度要么是看热闹，要么是“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对于阶级地位更接近于小资产阶级的部分左翼人士而言，象征性地同情一下“自由资产阶级”，并把后者当作阻挡中国“法西斯化”的屏障，在他们看来，也不失为可行策略。

这些观察是上述三个派别出于特定阶级利益，反映特定认知水平，渴望特定斗争结果的产物。然而上述三个派别中没有任何一派对资产阶级内斗的核心问题有过清晰的、全局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他们的分析就难免带有较大的情绪成分。这种情绪成分不仅会干扰他们对资产阶级各个派系的利益、意图和内斗手段的认识，同时也会让他们对各方力量对比产生不切实际的估计。最后，他们的结论往往在乐观和悲观之间反复摇摆，一惊一乍，自觉或不自觉地堕落成诳语谰言。

这篇文章就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和大家探讨一下中国资产阶级内斗的根源、发展和可能结局。

## 二、中国资本主义的剩余分配和使用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起点是《共产党宣言》里的一句话：**“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这个资产阶级委员会的基本

职能就是维持资产阶级的统治。要维持统治，就必须要在本阶级各集团达成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实现阶级镇压和阶级妥协（维持所谓的“社会契约”）。这一切的重中之重是资产阶级国家如何分配和使用剩余。

图1反映了社会产品的生产、初次和二次分配以及支出的结构。图中各个部分的相对大小反映的是2019年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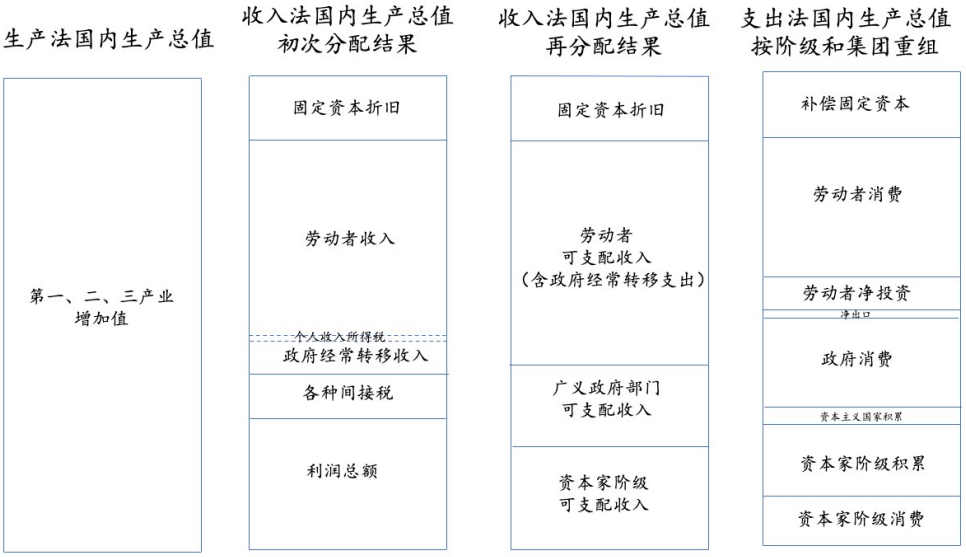



图1：国内生产总值的生产、初次和二次分配结构、和支出结构（以2019年为例）

剩余需要先被生产出来，才能够被分配和使用。今天的资产阶级统计机构并不统计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剩余价值，也没有直接能够拿来用作阶级分析的材料。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资产阶级的统计资料中寻找到资产阶级内斗的可能动态。图1中的第一列反映了生产法国内生产总值，我们可以粗略地将其称为社会总产品。生产出的总产品在经历了市场流通阶段后被分配给了第二列所反映的各个阶级和集团。其中，劳动者收入是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的收入，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6%。各种间接税是资产阶级国家针对商品的流通征收的税款，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利润总额是除去固定资本折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之后的资本家阶级的各种形式收入总额，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9%。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结构是技术水平（决定固定资本折旧）、国家政策和能力（决定间接税）以及阶级斗争力量对比（决定劳动收入和利润的各自份额）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三列反映的是经历过再分配（二次分配）后各阶级和集团的可支配收入状况，其具体情况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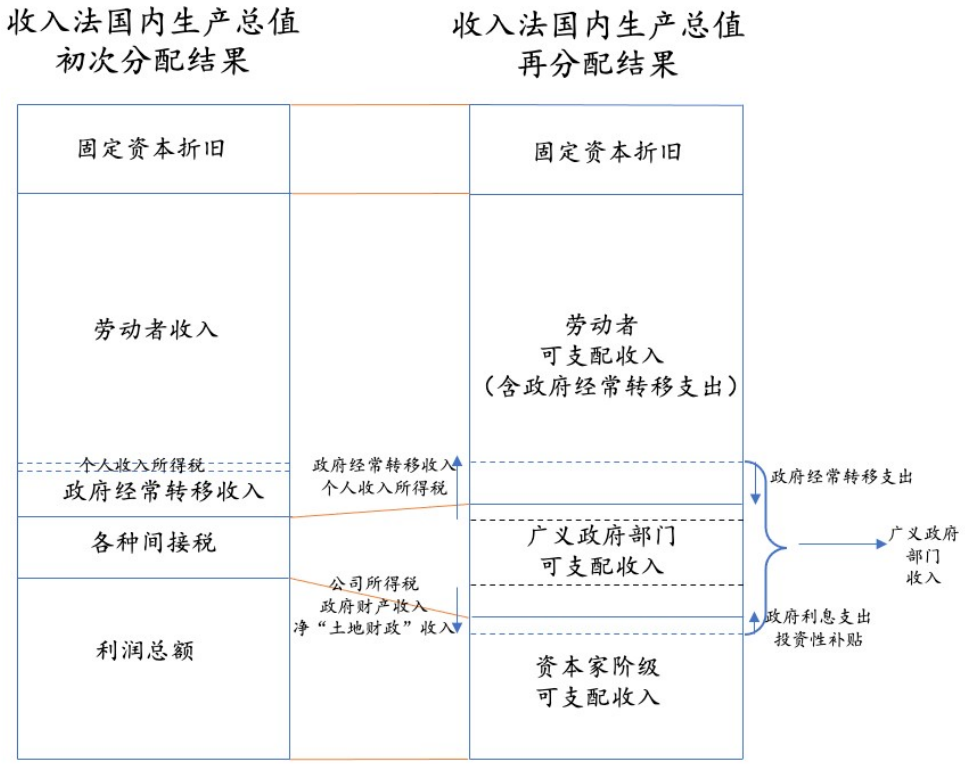



图2：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向再分配的转化

再分配指的是国家通过直接税（对收入和财产征收），转移支付（社保、低保、补贴）和财产收支（利息、租金）等方式调整收入分配的过程。

除政府征收的各种间接税以外，政府还征收了个人收入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等直接税，征收社会保险，获取财产收入。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政府还通过向资产阶级卖地的方式获取净“土地财政”收入。以上各项相加，构成了中国的广义政府部门收入，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7%。在获得了这些再分配收入后，政府向劳动者转移社保和低保，并向资本家支付利息和投资性补贴。在完成整个再分配过程后，广义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8%。劳动者经历过再分配之后的可支配收入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45%，资本家阶级经历过再分配之后的可支配收入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2%。资本家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可支配收入之和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40%。

各个阶级和集团随即开始使用自己的可支配收入，对收入的使用反映在图3的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上。各阶级和集团支出大于收入的部分通过向其他阶级和集团借贷来填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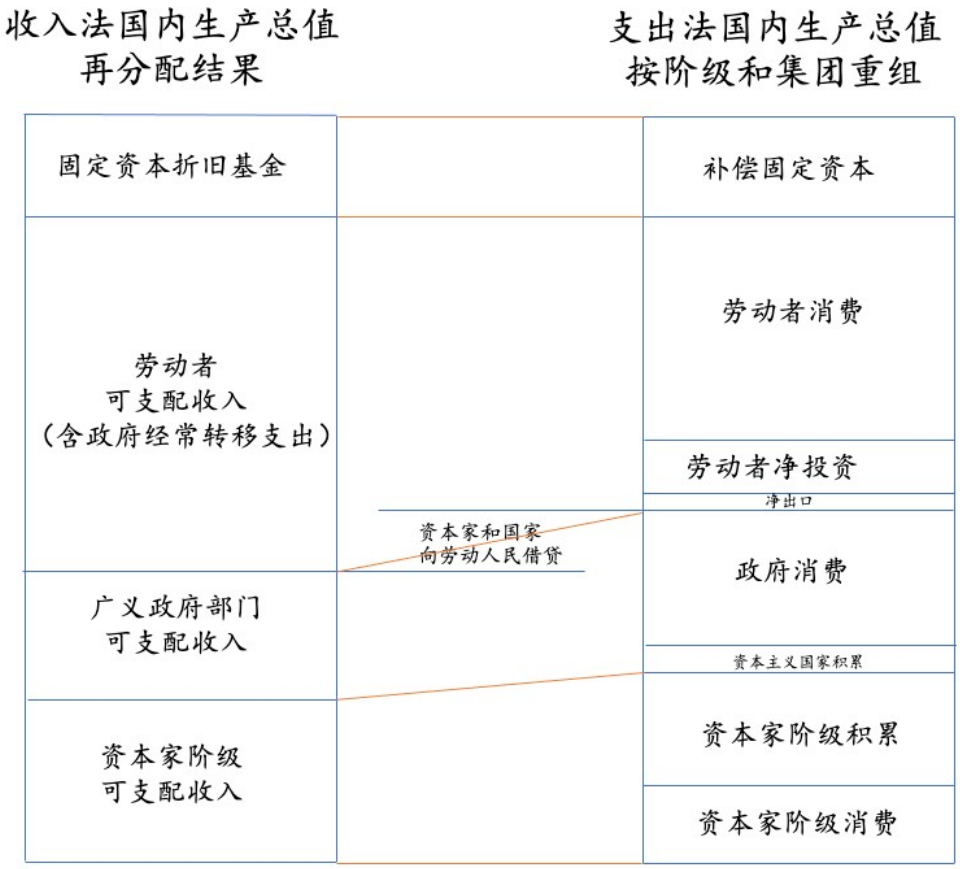



图3：国民经济从收入向支出的转化

资本家阶级的支出包括资本家阶级的消费和资本家积极的积累。2019年，资本家阶级的积累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5%。资本家阶级的消费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政府消费是政府支出中的主要项目，是维持资本主义国家正常职能的花费，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资本主义国家积累就是政府部门的净投资，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资本家阶级和政府的总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

由于资本家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总支出大于其可支配收入之和，因此它们要向劳动人民借债来维持自己的支出水平。

把上面三个图联系起来看，我们就能够清晰地分辨出各阶级收入分配和支出之间的关系。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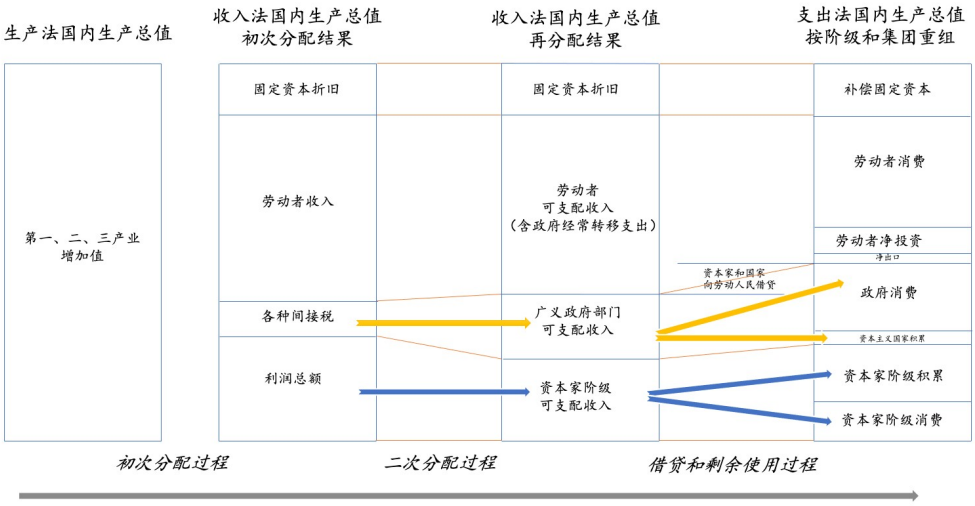



图4：收入和支出汇总图

图中橙色箭头和蓝色箭头分别指示的是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家阶级的初次分配收入经过再分配和使用过程的最终结果。在收入的使用中，最重要的是资本家阶级积累和政府消费两项。其中，资本家阶级积累是资本主义物质资料再生产的目的，是资本主义经济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是一切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命线，也是中国资产阶级两个集团之间内斗的焦点。政府消费则是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所必须的政治上层建筑的成本。决定上述两种支出规模的因素有很多，但是不外乎如下几类。第一，社会产品总量（图4第一列）决定了一切形式支出的上限，任何用于资本积累和维持资产阶级国家正常功能的社会产品需要首先被生产出来。第二，初次分配状况（图4第二列）反映了阶级斗争的状况，反映了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国家能够在市场流通完成之后攫取多少剩余。第三，再分配（图4第三列）决定了资产阶级国家能够通过行政手段调动多少资源用以满足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需要。第四，剩余的使用方式（图4第四列）则一方面反映了国家和资本家向劳动人民借债的能力，另一方面反映了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家之间怎样分割剩余的最终使用。

如果初次分配（流通过程）中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国家处在不利地位，就必须通过有较强行政性质的再分配过程来获取可支配收入。如果经过了再分配过程之后的可支配收入分配仍然对资本家和国家不利，就必须通过向劳动人民借贷这种较难掌控的方式获取剩余。同时，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代理人利益与委托人利益之间的冲突。

如果资本家阶级的积累受到威胁，或者政府消费的规模无法满足维持现有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职能的需要，资本主义社会就会陷入经济和政治危机。如果资产阶级无法有效通过增加产出，调整初次和二次分配，或者调整收入的使用来维持

资本家积累和政府消费规模，经济和政治危机就有可能长期化，进一步削弱资产阶级国家的治理能力，进入经济衰退-政治不稳-民心离散的恶性循环。

## 三、中国资本主义剩余来源和使用的历史趋势

所谓剩余，就是社会总产品中除用于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和补偿固定资本折旧以外的剩余部分。剩余需要首先被获取然后才能被使用。中国资本主义的剩余来源包括资本家的利润总额、各种间接税、个人收入所得税和政府的各项转移支付收入。2000年至2019年的剩余来源情况如图5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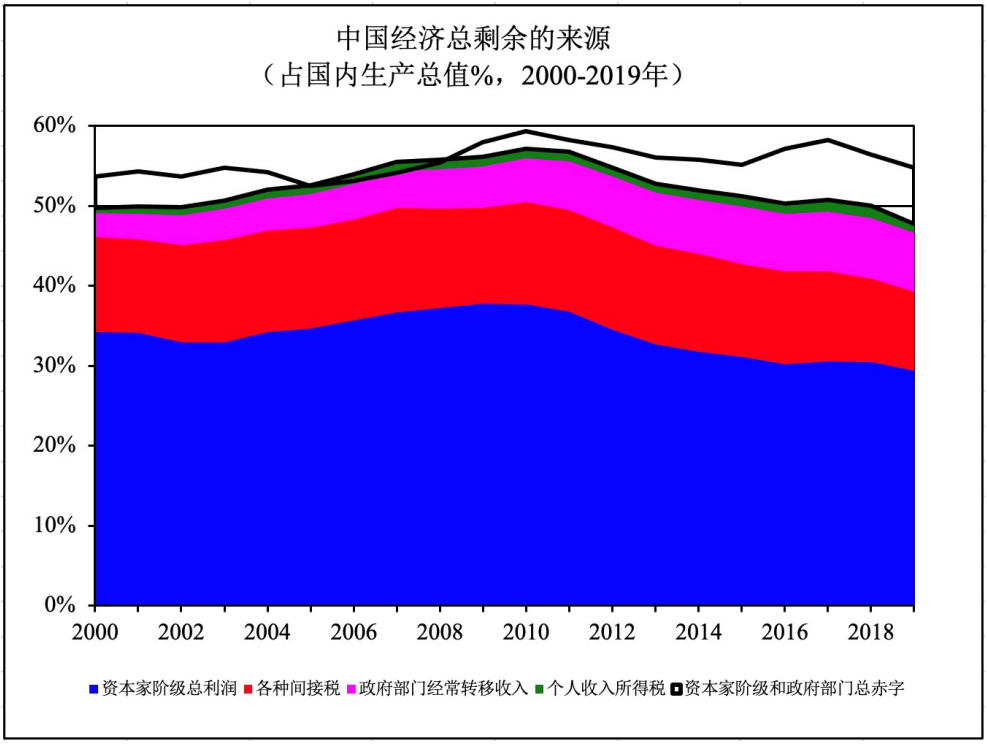



图5：中国经济总剩余的来源

从2000年至2010年，中国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国家获取的剩余从国内生产总值的49%上升到了57%。其中，资本家的总利润从国内生产总值的34%上升为38%，政府的剩余来源三项（间接税、转移收入、个人收入所得税）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5%上升到了19%。这是中国全面加入资本主义世界分工、中国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国家“双赢”的“黄金时代”。

然而，从2011年开始，中国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国家能够攫取的剩余就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不仅抹平了“黄金时代”的所有上涨，而且到了2019年，两者获取的剩余还比2000年低了两个百分点（47%）。剩余攫取能力的下降主要是由利润总额下降所驱动的，后者从2010年到2019年间从国内生产总值的38%下降到

29%。为了遏制这个趋势，资产阶级国家采取了三项主要的反击政策。第一是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进一步将本已所剩不多的国企私有化，压制工人阶级谈判力。第二是打着“大众创新、万种创业”和“灵活就业”的旗号，试图将本已经很不稳定的城市就业进一步非正式化、去福利化。第三是为私人资本家实行所谓“减税降费”，即将本来已经相当非正式化并且管理混乱的间接税进一步削减，减轻“企业家”的“税收负担”。第一个政策彻底无声无息了。第二个政策虽然造成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非正式化，并且将利润份额下降的趋势减缓了两年（2016-2017年利润份额停止下降），但是并没有阻止该下降趋势在2018年以后重启。第三个政策“成功地”将间接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从2010年的13%降低到了2019年的10%，但是也没有缓和资本家阶级获取剩余能力下降的趋势，同时也宣告了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家阶级之间财政“双赢”期的结束。

图5中的黑色实线是资本家阶级和政府部门的总赤字，即其向劳动人民的借贷。尽管资本家和国家剩余获取能力下降，其所使用的剩余并没有下降。这就导致了资本家和国家需要向劳动人民借越来越多的债才能满足其剩余使用的需要。资本家和国家的剩余账户在2008年还略有盈余，但是到2019年就已经有了一个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7%的赤字。图6显示了2000-2019年中国经济总剩余的使用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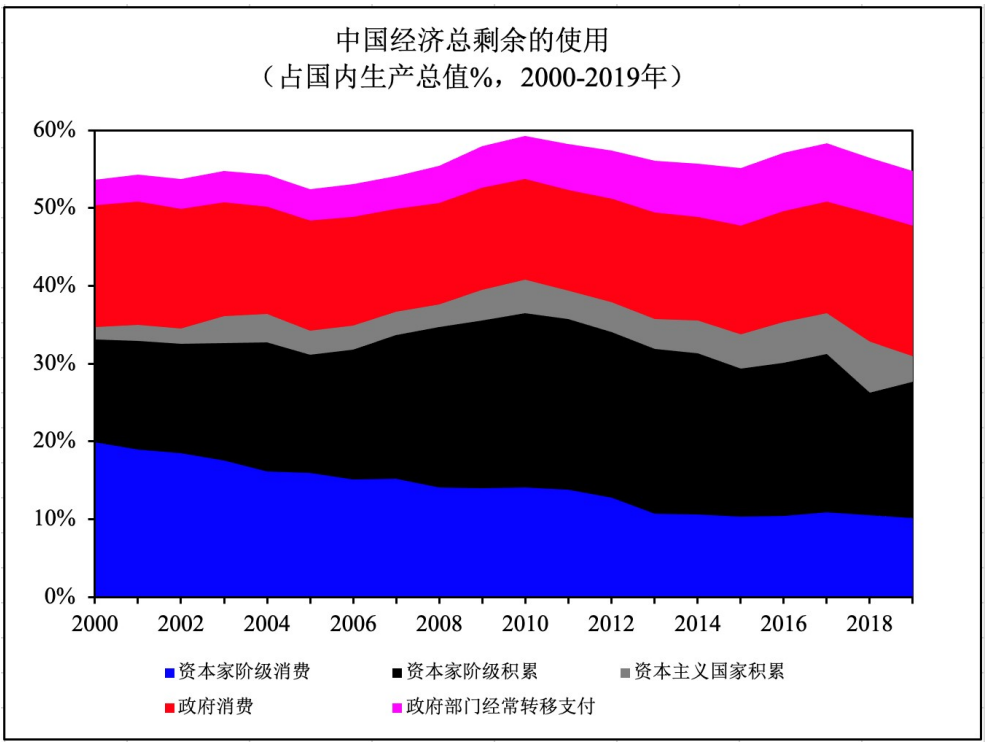



图6：中国经济总剩余的使用

从2000年到2019年间，中国经济总剩余的使用一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5%到60%之间。这反映了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国家始终无法进一步扩大总剩余使用的相对规模。中国经济总剩余的使用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资本家的积累从2000年的13%上升到2011年的22%，然后下降到2019年的17%。政府消费从2000年的15%下降到2010年的13%。再上升到2019年的17%。政府部门经常转移支出从3%上升到了7%。资本家的消费从2000年的20%下降到2013年的10%，然后基本保持稳定，至2019年仍在10%以上。

在总剩余使用比例大体稳定的前提下，资本家投资、政府消费比例的上升主要是通过资本家阶级消费比例的下降来实现的。当资本家阶级消费比例的下降开始减缓乃至停止的时候，能够被用来进行政府消费和资本家阶级积累的剩余比例就会趋于停滞乃至下降。在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时候，这就意味着资产阶级国家难以获得足够的资源去履行正常的职能。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资本家和国家能够用于积累和政府消费的剩余会越来越少。根据社科院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今天中国的养老金收支现状是两名缴费人员供养一名退休人员，到了2050年，就会变成一名缴费人员供养一名退休人员。按此趋势发展，今天的政府转移支付比例为国内生产总值的7%，到了2050年就会增加到14%。在中间点的2035年则为10.5%。老龄化同样会提高消费在劳动人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例，从而压缩劳动人民向资本家和国家的借贷能力。根据日本银行一篇工作论文的估计，2035年中国劳动人民的储蓄会从2019年的15.5%下降到约12%。假设净出口和劳动人民净投资比例不变，劳动人民对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借贷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会减少3.5个百分点。所以，如果要维持现有的资本家积累和政府消费水平不变，那么，要满足多出来的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3.5%的社保支出，还要弥补减少了的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3.5%的借贷，就将导致资本家阶级的消费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下降到3%。这就意味着2035年资本家的人均消费水平只相当于社会平均消费水平的不到三倍，这显然是中国资本家无法接受的。

## 四、中国资产阶级内斗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资本主义复辟后的中国尽管在政治上是资本主义专制制度，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却并非独裁。事实上，中国资产阶级基本上遵循的是各个集团和派系共治的格局。政治权力的交接大体上遵循轮流坐庄的模式。作为当权派系，其在满足本派系代表的各个集团利益的同时，也需要照顾到其他在野派系的利益。在中央人事上，吸纳其他派系进入常委来实现“集体领导”；在一般官员的任免

上，大体尊重各派系的势力范围；对于在局部权力斗争中失败的一方，通常不赶尽杀绝，维持资产阶级的政治“文明”。不同派系尽管代表着不同的资本集团，但是由于政治联姻、人身依附和具体合作，这些资本集团往往与政治派系之间不完全重叠。中国资产阶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彻底打败城市国企工人之后，迎来了一个总体剩余获取能力提高，各个集团和派系都能获利的黄金时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在中国要走新自由主义道路并以世界血汗工厂的身份加入全球资本主义分工方面，存在着广泛的共识。再加上各个集团和派系之间相互交错的关系所提供的缓冲，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格局在近三十年来是相当稳定的。既没有军事政变，也没有“颜色革命”，更没有对失败集团的清算，尤其没有政策上的大幅摇摆。这种政治稳定在一般半外围国家是难以想象的。

然而，由于近年来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国家整体获取剩余能力的下降，又面对着更加严重的国内阶级斗争和更加恶劣的国际市场环境，中国资产阶级当权派系越来越难以同时完成为本派系各集团攫取利益和维护资产阶级整体和长远利益的双重目标。在总剩余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维护资产阶级整体和长远利益的目标越来越需要通过牺牲具体集团和派系的利益来实现。今天中国的当权派系尽管喜欢说“功成不必在我”，但他显然不会舍己为人，为大局牺牲自己。这就意味着当权派系要将维护资产阶级长远和整体利益的成本转嫁到其他派系身上，从而加剧了两者之间的矛盾。其他派系自然不会白白承受这一切，在认识到继续服从当权派系不再能产生共赢的结果时，它们就可能采取从消极怠工（懒政），到积极制衡等一系列措施来增加当权派系的困难，迫使其改变政策。如果上述手段失败，长期拖延代价太大，同时当权派系失去资产阶级多数支持的时候，则不排除采取非常规方式解决问题。

今天中国资产阶级的当权派系占据着政治舞台的中心，其阶级基础分散在各个资本集团中。他原本与东南沿海的出口加工制造业集团联系紧密，在掌握中央政权后，又和国企集团、军官集团建立了联系。资产阶级在野派系其实并不真正在野，该派系是新自由主义条件下所有重要资本集团的代表，尤其与互联网、金融和房地产集团联系密切。所谓的“在野派系”只是不便于直接指挥中央政权。

两大派系的矛盾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如何维护资产阶级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第二，如果要完成前者，优先牺牲谁的利益。在资产阶级当权派系看来，维护中国资本主义的全局利益就意味着要在一定程度上在稳定的中国和不稳定的世界之间建立一道缓冲墙，取得某种相对于美国与核心世界的独立性。因此至少需要使用带有一点国家资本主义色彩的产业政策来争取实现某些方面的“产业升级“。为此，就必须将尽可能多的剩余投入到与产业升级相关的经济活动中。这些额外的剩余如果不能从劳动人民身上直接获取，就必须要敲打一下在野派系麾下的

一些资本集团。对于在野派系而言，所谓中国资本主义的全局利益无非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一切经济和政治都必须服务于继续新自由主义整体路线不动摇，必须保证本派系麾下各集团利益不受损，只要维持现状，自然天下太平（或者”哪管洪水滔天“）。

从总实力对比上讲，在野派系在各个方面要显著强于当权派系。今天的资产阶级中央实际是弱势中央。但是，由于当权派系暂时掌握着中央政权，“在野派系“也不便于直接清洗当权派系，那样势必会造成政治不稳定，还有可能引爆更大的阶级矛盾，威胁整个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在野派系尽管与当权派系在剩余分配和使用问题上有着重大矛盾，但尚未在清洗当权派系问题上达成共识。当权派系自然知道自己是弱势派系的事实，因此也在不断地采取措施以加大在野派系清洗自己的成本。比如，将本集团核心人物的政治形象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前途命运绑定起来；再比如，占领民族主义的舆论高地；又比如，试探性地放出“反资本”话语，做出一副把派系斗争升级为阶级斗争的姿态。这种与“核捆绑”类似的策略在畏首畏尾的在野派系面前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而且也阻止了在剩余紧张时资产阶级的内斗迅速白热化。只不过，在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各派系之间处于互利共赢或至少相安无事的“冷平衡“，而现在的他们则处在相互争斗但又都不敢把事做绝的“热平衡”。

这样，我们就可以全景式地展示中国资产阶级面对的诸多不利趋势和其采取的对应策略，并根据这一全景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内斗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见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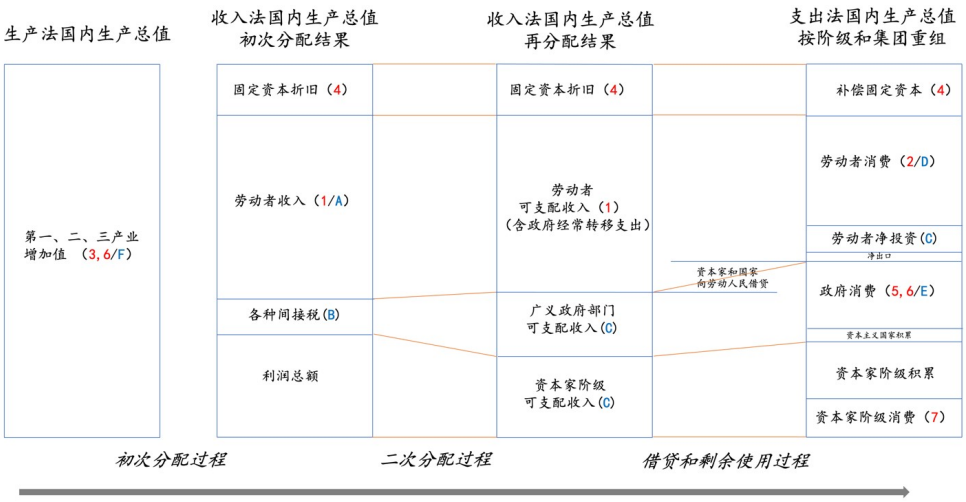



图7：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和资产阶级的对策

图中的红色数字表示的是中国资本主义面临的主要危机趋势在剩余分配和使用上的表现。蓝色英文字母表示的是近几年来资本主义国家针对上述趋势所采取的对策。

趋势1指的是由于劳动人民斗争力量增强所导致的利润挤压。劳动收入份额上涨直接导致利润总额的下降，进而导致资本家阶级可支配收入和剩余使用的紧张。趋势2指的是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人民最终消费比例的上升，其中一部分居民最终消费的上升是由社保支出增加引起的。劳动人民最终消费比例的上升将直接限制其向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借贷，进而限制资本家阶级积累和政府消费的份额。趋势3指的是劳动人民中愈发汹涌的“躺平”斗争。躺平意味着劳动人民减少劳动努力程度、减少劳动时间、减少劳动力参与率的斗争倾向。这将直接打击以血汗工厂为主要特征的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直接威胁未来经济增长和剩余生产的上限。趋势4指的是固定资本折旧的比例上升。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近年来出现了技术追赶停滞、技术进步放缓的趋势，只能以扩大固定资本投资提升资本存量的方式来实现经济增长。但是，随着资本-产出率的上升，总产出中的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将被迫用来补偿现有固定资本的折旧。折旧比例的增加将起到和劳动收入份额增加一样的挤压利润的效果。趋势5指的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功能愈发复杂，面对的阶级斗争形势愈发尖锐，要履行正常的管理职能所需要的政府消费比例越来越大。趋势6指的是新冠病毒在全球的流行和中国资产阶级的“清零”政策。要维持长期的高压清零，中国资产阶级一方面需要直接关停疫区的生产活动，从而压缩剩余生产；同时，对疫区的封锁、检测和维稳将极大地增加地方政府的开支。趋势7指的是资本家阶级消费的比例不可能无限降低，资产阶级国家不可能无限制地要求资本家“勒紧裤腰带”搞积累。上述七个趋势要么直接压制了可以用于资本家积累的剩余，要么对维持资产阶级国家的正常运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应对这些趋势的可能后果，中国资产阶级国家在当权派系的指导下采取了如下几种反制措施。

政策A指的是继续国企和事业单位私有化、就业非正式化的反劳工政策。政策B指的是“减税降费”，将资产阶级国家掌握的剩余直接让渡给资本家，形成后者的可支配收入。上述两个政策是各个派系的统一意见，并不涉及的内斗。但是其他四个政策就并非如此了。

政策C指的是近几个月来对房地产行业的限制。对于一部分当权派系成员来讲，房地产行业是中国经济的沉重包袱。首先，过高的房价会直接打击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合法性，不仅让“中国梦”沦为笑柄，而且还大大地打击了青年劳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其次，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与房地产商的交易一直是中国财政体系中最不正规、最腐败横行的领域，如果能成功地将这一部分地方性非正

规收入“中央化”，就能够增加资产阶级当权派系所掌握的剩余。最后，劳动人民买房的花费（统计上表现为劳动者在房地产方面的投资）长期挤占了劳动人民可支配收入的将近四分之一。这一部分投资最终会凝结在不具备任何生产性的居民住宅上。对于想要进行“产业升级”的部分当权派系成员来讲，这完全是浪费。因此，在“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口号下，资产阶级当权集团对房地产企业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其目标很明确：第一，将土地财政的相关剩余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第二，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压制房价、减少劳动者的房地产投资份额，驱使劳动者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借给资本家和国家。这两个目的既包含着资产阶级当权派系为了资产阶级整体的可持续未来所构想的战略思维，也包含着资产阶级中央对房地产资本集团的惩戒性打击。

政策D指的是近期针对互联网和其他一些非生产性行业（比如私营教育产业）的限制。资产阶级当权集团可能判断，这些行业刺激了大量的非必要消费。如果通过限制这些行业的发展来压制消费份额，就有可能增加劳动人民的储蓄，从而增加可以出借给资本家整体和国家的剩余。

政策E指的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长期以来的“非正式化”方向。中国资产阶级为了遏制政府消费的过快上涨、防止其挤出私人投资，长期以来一直对政府的一些职能进行外包，这样既减少了政府正式雇员的数量和花费，也能够在出了事故的时候把责任甩给这些“临时工”。比如全国的城管实际上主要是通过外包给私营公司来解决，警察队伍中的协警也只不过是非正式的雇员。国家机关非正式化就相当于旧社会里的“卖官鬻爵”，它尽管能在短期内缓解财政压力，但是却大大降低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和规范性。近来，为了进一步压缩政府消费，沿海省份的公务员待遇都被削减了。无论是对资产阶级整体还是对主要资本家集团来说，国家机器的“非正式化”都是饮鸩止渴。

如果政策C和D得以成功执行，资本家阶级和国家整体，尤其是当权派系支配剩余的能力就会扩大。对资产阶级当权派系中尚有国家资本主义“理想”的成员来说，多出的这一部分剩余可以被用来投资于像华为这样的号称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从而减轻对核心国家的技术依赖。如果中国的先进技术能够在世界上占据一定位置，就可以一方面在不追加大量固定资本投资的情况下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剩余总量，另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上占据有利地位，不至于让被“卡脖子”的情况天天出现，引爆国内阶级矛盾。这就是少部分资产阶级当权派成员积极鼓吹的“产业升级”战略，即图6中的政策F。当然，资产阶级在野派系显然不会支持这一路线，对恒大、阿里巴巴和联想而言，政策F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扰乱市场秩序，而政策C和D则是对他们的直接打击。尽管在野派系尚未决定以政治反对派的形式出现，但是他们阻挠这些政策的实行是可以想见的。

## 五、中国资产阶级内斗的可能结果

如果说，资产阶级当权派系最初的国家资本主义“理想”尚且反映了他试图服务于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追求”，但是随着资产阶级内斗的加剧，资产阶级各派系之间利益的交集也越来越小。资产阶级当权派系越是处在重围之中，他的行为就越是倾向于满足本派系的短期利益，而当权派系的国家资本主义姿态也是在其行为越来越短期化的背景下才变得越发明显。

所以，我们在这里提出一个大胆的猜测：在今天，资产阶级当权派系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征与其“宏图大志”已经并无多少关联，而是更多地反映着其急切想要自保的意愿。通过与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捆绑起来，当权派系就能在不过分疏远资产阶级多数的情况下为自己争取到最低限度的合法性，从而加大对方清洗自己的成本。换句话说，他是在派系斗争处在不利的的局面下被逼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今天中国资产阶级的内斗，是一场打扮成路线斗争的派系斗争。

斗争的可能结果有如下几种。

第一种，如果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在2030年之前不集中爆发，那么当权派系和在野派系的内斗会维持在这种“热平衡”的状态。在派系内斗中，官僚集团会在反复摇摆中精疲力竭，资产阶级国家会逐渐失去治理能力，中央逐渐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在社会变革的风暴来临之时，中国资产阶级将会在整体上处于十分疲惫和虚弱的状态。

第二种，如果当权派系在压力下交出政治权力，那么中国将迎来新一轮的新自由主义反动时期。民族主义者会由于失去了经济来源和政治背书而遭到毁灭性打击，从此一蹶不振。自由派会迎来灭亡之前的回光返照，旋即，其高端知识分子集团和低端边缘化小资产阶级集团会因为利益冲突陷入分裂。左翼进步运动会遭遇暂时的挫折，但是其社会基础并不会被消灭。在这一剧本下，资产阶级只能暂时取得自身的相对统一，但是它对阶级斗争的全局演变无能为力。未来社会的变革尽管在起步阶段会面临比上一剧本中更加团结的资产阶级敌人，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的发展仍然决定着中国资产阶级无论怎样团结都无法避免自己的灭亡。

第三种，也是可能性最小的一种。如果资产阶级当权集团居然克服了重重阻碍、成功消除了在野集团的威胁，实现了真正的“定于一尊”，那么他的利益就直接等同于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如果他是独立完成清洗在野派系任务的，那么他大概率会失去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兴趣，并重新回到新自由主义道路上来。这样，未来的社会变革会面临着与第二个剧本类似的情况。如果他是借助劳动人民

的支持而成功压制了在野派系（这几乎不可能），那么，中国有又可能进入一个短暂的社会改良时代。当改良在不远的将来耗尽资产阶级能够且愿意交出的剩余时，历史的车轮就会如在前两个剧本里那样再度转动起来。

# 中特的“清零政策”与“新冠疫情速胜论”

隐秘战线

新冠疫情爆发，到现在也已经有两个年头了。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人类VS病毒的无形之战中，国内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社会论调都开始纷纷亮相——什么“东升西降”、“弯道超车”、“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等。本人在此无意逐一进行批驳，这也不是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的本意。

今天这篇文章的灵感，源于鄙人在近几日重拜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一文，心想：“当下中特，与这文中所提到的‘速胜论者’，莫不有几分相似？”有鉴于此，在下拙作一篇，仅为博君一笑。

自武汉疫情爆发以来，各种关于如何处置全国疫情的方略甚嚣尘上——这其中大多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中特为代表的“清零”，一种为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共存”策略。在与《论持久战》中所提到的两种抗日论调后，我认为——中特有如“速胜论者”，而西方则更类“持久战胜利论者”，然而在双方全体中还有一种普遍存在的论调，我会在下文中提到。

首先是中特，在采取清零政策一开始，从表面上看确有成效——无论是病例还是死亡人数，表现都要好于西方国家。这让国内一些人（包括不知情的民众和“小粉红”群体），乐观地认为新冠也“爱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在处理疫情方面远不如中特出色，中国必能在COVID-19上迅速克敌制胜。

随后其弊端迅速凸显，民众逐步因特色在执行封锁后的配套措施（如配送蔬菜等）方面极不到位而怨声载道，且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贴封条还不算——有的

地方干脆用焊钢条的方式封死房门，是一副要将人关在里面活活困死饿死的架势。殊不知病毒乃看不见摸不着之物，直径以纳米计，岂是中特国家机器动不动“封城”就能拦得住的?

而反观西方，“貌似”是从主席书中获得了灵感，一副“纵深防御”的布置，曰“与病毒共存”。虽非诚心诚意，还要被“小粉红”7x24小时痛骂“漠视生命”，但其效果有目共睹——有数个国家已经实现了“群体免疫”，此外民众也不用担心如中特那般几乎是把人关在监狱里的情况出现。

当然西方也存在其不足之处：反口罩与反疫苗示威游行层出不穷，虽有反对政府利用前两者限制人民自由的原因在，但未能形成相当规模——除了这些反对者还未能成功利用疫苗对新冠的防护效果堪称可疑，以及疫苗的副作用和不良反应这几个重要方面。

而这，即是本文重点，无论是中特还是西方乃至全世界其他国家都广泛存在的“疫苗速胜论”。

“疫苗速胜论”者认为新冠病毒的最有效解决之道，莫过于疫苗。这一点本来是没有错的，相反还是十分正确的医学观点，然而新冠病毒是病毒——这就意味着它的遗传物质不稳定，容易发生变异。而变异，就是“疫苗制胜论”蜕变成“疫苗速胜论”的关键所在。

众所周知，一般的病毒，其疫苗大多只需要一针——而新冠则不同，新冠的一个变种就需要2~3针疫苗，且每出现一个新变种就需要多打“加强针”。此外疫苗非广谱——仅针对一种新冠变异体有效（这是疫苗性质所决定的）。本来再研发一种针对新变异体的疫苗，在现代医学技术的加持下，不是一件难事，但疫苗接种却导致连锁效应——首先是副作用及不良反应，然后是防护效果（特别是针对全新变异体的防护效果）。

我想按照上文这个逻辑推理下去，全世界人民很快就能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只要新冠存在，那么时不时的疫苗接种，就将成为常态。

在文章结尾我想指出：西方资产阶级加持的媒体大多提“与病毒共存”，而绝口不提“持久战”、“拉锯战”、“消耗战”这几个词，尽管后几个词指出的都是事实，但我想是不愿让人联想到毛主席的同名著作吧。

最后用改自毛主席《论持久战》的话做一句总结：

“人类会亡于新冠吗？答复：‘不会，最后胜利在人类一边。’”

“全世界能够速胜新冠吗？答复：‘不能速胜，新冠疫情是持久战。’”

# 入关人对“国家”是既爱又恨的

水果战胜橙留香

**普通人网友问：**

感觉入关学就是抛却意识形态，鼓吹中国和美国争霸，成功以后走上和美国一样的帝国主义霸权之路？另外，入关学理论家已经公开表示文革是错误的，并且暗示左派对文革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11776901/answer/2313681855

关于入关学的介绍，可参考如下文章。

https://zhuanlan.zhihu.com/p/208798746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53803071

此外，我发现激流网发过批判入关学的文章。

https://jiliuwang.net/archives/95149

**水果战胜橙留香网友答:**

入关学就是帝国主义，入入入，入关争霸，让中国帝国主义成为主宰世界的霸权国家。

但中国这个半外围资本主义大国既没有能力发动争霸战争，中国资产阶级主流也没有意愿打破现有的国际秩序，反而经常说要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入关人把自己包装成爱国人士，爱国，所以反对美国的压迫。为什么中国老百姓穷困呢？因为美国，所以要打倒美国成为新霸权。然而中国的国家政权没有这个能力与动机，那怎么办？入关人如果反对“反对进行争霸战争”的现政权，那就要丢掉它们的“爱国基本盘”，就跟皇汉一样变成孤家寡人，因此入关人对于国家机器是又爱又恨的——爱这个国家，不然就忽悠不到群众，恨这个国家，因为中国真的没可能发动争霸战争。

国内外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披着普世价值，这就直接与入关人发生冲突，知乎上的“黑话战争”（什么君子剑啊华山派啊美分炸鸡）就是自由派与入关派之间尖锐冲突的反映。在目前国家政权对于自由派的打压以及群众反资斗争的大环境下，入关人尚可以在某些观点与领域取得对自由派的优势地位，也得到少数体制内“星辰大海”派官僚的支持。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动规律已经将中国资本主义上升为中华帝国主义的恢宏愿景判了死刑，入关人暂时能够借着爱国活跃一时，但阶级矛盾激化后，朴素的民族主义情绪可不能解决无产阶级面临的实际斗争问题，入关人的爱国牌就没用了。

那该怎么办？入关人的爱国牌打着打着就变成“原来你们入关人只是口嗨”，入关人只能祭出为民情愿这一张牌，把自己包装成底层群众的代言人。中国这些年来阶级矛盾激化，劳动群众左了很多。入关人原来说土木人都是土包子，国家忙着复兴呢，你们这些牛马老实打灰别动不动要求涨工资，后来发现这套不管用了，被群众骂死，于是就改了个口径。土木人要讲情怀！力工不吃苦？谁吃苦！而曹大佐去非洲当月入w的总工则是当代最伟大的国际主义！从赤裸裸的反对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变成吃苦耐劳不要造反的“大国工匠”情怀，这是入关人最近发生的转变。入关人试图扯了点左边的东西，想代表群众利益，就又跟左派相冲突了，激流网那篇文章就是反映出这种斗争。

在争取群众这个问题上，入关人主要采用两个策略。第一个是“情怀+改良”，也就是我前面说的跑非洲当总工是新时代国际主义情怀，通过扩大RECP、一带一路等对外资本输出获得的部分超额利润，向群众许诺入关派将会用第三世界人民的血来改善中国无产阶级的生存境遇。入关人经常说的，入了关，就能住

大house，像可爱的小狗马克一样吃上战斧牛排。这迎合了一部分在竞争中失败的中下层小资产阶级。原先作为小资产阶级强国派的他们见证了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发展，但今时不同往日，他们也感受到了阶级掉落、变成人下人的威胁，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与强国派的历史记忆让他们在听闻了入关学后迅速转变为入关派。我们回顾一下历史，疫情爆发，中国官僚当局实行停产禁运封控措施，资产阶级面临困难，无产阶级拿不到工资吃不上饭，小资产阶级也瑟瑟发抖，生怕自己也跟小区物业的保洁大妈一样失去工作。由此各种政治主张开始从小资产阶级的狭隘空间扩大到整个社会，这就是入关学与保皇派在19、20年迅速成为显学的原因。（保皇派则是另一件事，有空就写个文章讲讲）

第二个策略则是直接同左派进行斗争。左派支持文革，那么入关人就反文革。左派支持农民走合作化，入关人就把合作化说成毒气征粮。左派反对分田，入关人支持分田。左派反对农民工进城为新兴资本主义开路，入关人就把农民进城称为农民获得更高收入的伟大自由。左派反对资本家，入关人就说佐壬反资不过是因为佐壬不是资本家罢了。左派反对美帝国，入关人就说好吧，你确实反美，但你仍然是反动的极左。左派反对军国主义，入关人就说佐壬是汉奸。左派支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支持国际主义，入关人就说佐壬要联帝反修，是带汉奸。而当真的有左派支持联帝反修时。。。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学院派问题）。

入关人反对左派的种种谬误之所以还有市场，根本原因在于大部分左派都是学院派，其指导理论与实际行动脱离实际，是教条主义，是宗派主义，是错误的，那么入关人自然可以用学院派的错误来攻击左派。大家看啊，这个左壬居然要屠杀农民工（此处指千叶真名认为农民工是小资产阶级是敌人），所有左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包括像之前在红色中国网发了篇文章的泉州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社，简称泉马。泉马自己就跟个恐怖分子黑社会一样，拿着毛语录跑街上殴打普通路人，在学校里找黑社会堵老师，最后被开除了还很骄傲的说老子这是革命行动。泉马更是发表了一系列堪称中国现代左派迄今为止仅次于中革的周群的大字报，把所有不同意在当前进行武装斗争的左派打成反动派。他们甚至自己从黑市上购置了大量的防弹衣头盔话机仿真水弹枪等东西，管自己叫做革命派，大肆宣传自己的傻逼行为，实在是把左派的脸都丢光了。学院派长期以来的种种可笑行径为入关人输送了源源不断的黑材料，学院派自己瞎捣鼓的烂货最终变成了打向左派的炮弹，因此必须要坚决的反对学院派。（当然了，具体怎么做是另一个问题，有空再说）

在目前来看，入关人采取的这两个策略仍然是有效的，因为左派内部的学院派错误路线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仍然处于以经济斗争为主的战

略相持阶段（战略防御阶段主要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早期的反私有化斗争时期）。在这两大因素作用下，马列毛主义者要想打开工作局面，唯一的办法便是脚踏实地的做好群众工作，并且坚决斗争资产阶级自由派与入关法西斯们；在左派内部要与学院派错误路线展开斗争，借用习近平的一句话，“打铁还需自身硬”。

这是我对于当前网络舆论的部分判断，哪里说的不好也麻烦大家批评。

# 谈谈加拿大卡车司机抗议对全球阶级斗争的意义

远 航 一 号

普通人网友说，加拿大卡车司机的抗议活动只是反对强制打疫苗，是单纯的对政府不满，与阶级斗争无关。

这里就简单谈谈我对此次加拿大卡车司机抗议活动的看法。

首先，我们看到，此次加拿大卡车司机的抗议活动不是孤立的，在加拿大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在国际上，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都有类似的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反对资产阶级当局借防疫为名实行各种强制的抗议活动。那么，我们怎样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理解这些事件？这些事件与中国的阶级斗争又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长话短说，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欧美各国一度出现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相互妥协的改良主义社会秩序（也可以叫“社会契约”）。这种“社会契约”，经济上表现为实际工资上涨、福利国家，政治上表现为资产阶级民主。两者相辅相成。福利国家有利于资产阶级民主的稳定，资产阶级民主则提供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按照资产阶级法律程序、民主规则讨价还价的政治空间。

但是，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述的阶级妥协无法维持了，核心国家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全面进攻，一方面把大量工业转移到中国、剥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企图推翻以往的社会妥协，压低实际工资、削弱福利国家。这就是新自由主义。过去几十年，总的来说，资产阶级占上风，但是资产阶级的胜利

并不彻底。一方面，核心国家的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仍然过于“昂贵”，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还在。只要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还在，工人阶级的潜在斗争力量仍然很强大。

在这种形势下，当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爆发时，国际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以盖茨、扎克伯格等高科技资产阶级为首）设计了一个狂妄的“大重启”计划。[16]

他们的长远目标，是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高科技，建立中国资本主义式的全方位技术监控寡头资本统治，取消或全面阉割资产阶级民主，将历史上核心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口最终变成他们可以任意奴役的奴隶式人群。而在近中期，他们的具体策略是：（1）打着防疫、打击虚假信息以及打击“国内恐怖主义”的旗号，在他们可以直接控制的社交媒体上建立全面的言论审查制度，在推特、脸书上已经大量实行了类似中国微信的删帖封号；（2）打着实现种族平等的旗号，在各大城市鼓励犯罪、鼓励毒品泛滥（没错，就是积极地鼓励犯罪！），纵容流氓无产者对诚实劳动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打砸抢烧，破坏无产阶级的基本正常生活，从精神上、身体上摧毁无产阶级；（3）近乎公开地开放边境，引进数以百万计的非法移民，以便一方面降低各种非生产性行业（比如不需要技术的零售业）的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进一步扩大犯罪、摧毁无产阶级：（4）利用犯罪、非法移民、对社交媒体控制，加上资产阶级传统手段（对国家机器以及传统媒体的控制），实行大规模选举舞弊，此后再将舞弊常态化，最终建立起寡头统治。

过去对我们的分析不了解的网友可能要问，核心国家资产阶级如此摧毁本国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自己有什么好处呢？这是因为，在核心国家的高科技资产阶级看来，在全球化资本主义条件下，他们的主要利润来源已经不是靠剥削核心国家的工人阶级了，而是靠剥削中国等地的廉价劳动力再攫取超额利润。随着美国的物质生产部门越来越少，这些地方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既昂贵又多余，还有着过多的政治权利（资产阶级民主）。所以，如何把这些多余而又昂贵的“公民”逐步消灭掉，就成了国际资产阶级中野心最大的那一部分殚精竭虑的重大问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各国借防疫为名所实行的各种强制措施（包括强制打疫苗）实际上是国际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发起的一次试探性进攻。如果无产阶级忍气吞声毫无抵抗，那么资产阶级很快就会得寸进尺，接下来实行类似中国那样的到哪里都需要“绿码”的全方位监控制度，再把剩余的资产阶级民主一点点拿掉。而欧美各国的无产阶级，虽然缺乏有组织政治力量的领导，但是，由于他们在长

16.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9573

期阶级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政治本能，本能地意识到这是资产阶级向他们基本权利的进攻，因此奋起反抗。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欧美无产阶级在反对“大重启”阴谋的斗争中有胜利的可能。

这里要对欧美诸国特别是北美各阶级、各政治派别的立场和组合说明一下。首先必须说明，由于阶级斗争条件的巨大变化，在欧美诸国，不管是传统左派还是“新”左派（就是说，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传统的各党派、第二国际或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各党派，或者68-后新左派传统的各团体）现在都已经几乎完全脱离工人阶级，不能代表工人阶级，也不被工人阶级所信任。事实上，欧美各国的所谓“进步”小资产阶级（“白左”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在与新自由主义大资产阶级结盟，站在工人阶级对立面。

欧美诸国的工人阶级目前暂时不构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虽然此次加拿大卡车司机抗议完全是工人阶级自发发起的），但是已经在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中逐步动员起来，并且成为一支无法忽视的、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各方面都要努力争取的群众主力军。在欧美诸国，反新自由主义政治联盟（往往被资产阶级主流媒体和“白左”污蔑为是极右派民粹主义）一般以中小资本家为实际领导力量（在美国就是特朗普运动），以工人阶级为主要群众基础。此外，在某些国家，还包括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比如，在加拿大，由于在大资产阶级内部气候变化政策上的矛盾，石油业资产阶级可能就是反新自由主义联盟中的一部分或者至少持中立态度。在美国，大资产阶级也不完全统一。个别大资本家，如马斯克，虽然是“白左”气候变化政策的受益者，但反对自掏腰包（多缴税）来支撑高科技大资产阶级所主张的全盘社会改造计划。

另一方面，坚持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政治联盟则以各国大资产阶级（尤其是高科技大资产阶级）为主，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城市流氓无产者为主要帮凶。

两方面的力量大致势均力敌。但是，在各国无产阶级初步动员起来以后，反新自由主义联盟有占上风的可能。

从全球阶级斗争形势来看，如果反新自由主义政治联盟在核心国家占了上风，虽然不会在这些国家造成社会主义革命，但是通过实行保护国内中小资本的贸易保护主义等政策，客观上有利于打破新自由主义全球分工，从而在外部大大增加中国资产阶级的困难。如果中国资产阶级在内部遇到中国无产阶级越来越有力的斗争，并且随着青壮劳动力枯竭无法找到后备的廉价劳动力，外部又被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科技制裁的间接方式）所包围，中国资产阶级的末日也就不远了。

# 从所谓“半数加拿大人反对司机抗议”看观察者网的立场

隐 秘 战 线

在昨天，“xin”同志转发了一篇来自观察者网的文章，该文章指出“有半数加拿大民众对自由车队反感”，明确表达了其反对正在加拿大全国进行的卡车司机示威之立场。

然而，在我熟读完这篇文章后，发现此文逻辑根本不堪一击——完全是站在西方“自由派”资产阶级媒体的立场上，来抹黑加拿大无产阶级伟大抗争的又一篇反动文章。

以下，是我本人对该文内容观点表达的逐一批驳：

首先是这篇文章的开头。文章的原作者使用了一个中国（包括中特）外交部门以及撰写社论时曾用到过的一个外交术语：“是可忍，熟不可忍。”要知道这个外交术语在中国一般用于战争来临前对敌国政府机构的最后警告，常与“勿谓言之不预也”一同使用。

身处加拿大的广大华裔小布尔乔亚们，对其所在国无产阶级英勇斗争、反抗特鲁多反动政府强制疫苗接种政策的态度，被原作者用这样一句本应用来威胁警告敌国政府机构和武装部队的外交术语来进行描述，请问这是否有立场（屁股）偏颇之嫌？

其次，“强烈希望各级政府加紧合谋解决方案，还我平静的生活”，这更是一句从头到脚都渗透着中特“官方八股”话语体系色彩的套话，连我本人在开头读到这句话的时候——都在想这句话是不是仅更换了主语和对象。

紧接着下面是一段描述还尚可称为客观的描述，然后我们便来到了这篇文章的第二个环节：

这篇文章的作者采访了加拿大《星岛日报》的前副总编木然，在这里我为大家简要介绍一下这个人物。

根据互联网上提供的相关资料，木然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在文艺评论家、电影美学理论家钟惦斐的指导下从事电影评论写作，此外还是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员，和北京青年电影评论协会的创办人之一。1997年木然移民加拿大后，他转型从事小说创作，发表多部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以及近600万字随笔、散文和时评。[17]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一点没有，这位前副总编无论是其在大学期间学习的专业，乃至其毕业后所从事的职业——都和《星岛日报》副总编辑，这个本应在新闻传媒方面有着专业要求的岗位毫无联系。可能有人说他做过电影评论，但电影评论充其量只是个评论员的水平。从这一点上来看，我本人对观察者网文章作者所采访人物的专业水平，持极大的怀疑态度。

再者，《星岛日报》是一个政治立场明显偏向中特政府的加拿大华人报刊媒体，具体一点来说——该报在2001至2021年期间的大股东为何柱国，在何柱国于2001年购得《星岛日报》51.4%的股权后，该报立场转为亲中特政府。

让观察者网的文章作者去采访“自己人”，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

关于华裔李泽锡（Zexi Li）状告卡车司机的内容，我会很快上传加拿大媒体的报道。

接下来便是本文逻辑漏洞最大的两个环节：加拿大华人的“现身说法”和所谓的“调查结果”。

使用加拿大华人“现身说法”，是对白左资产阶级媒体对卡车司机“不接触、不交流、不采访”的“三不”策略的反用：即通过突出示威对非示威者造成的负面影响来达到抹黑加拿大无产阶级的效果。

而这种反用却在这儿变成了一个致命漏洞 —— 在他的文章中，冯先生说道“希望示威领头者早日清醒，与政府有关部门坐下来好好谈判，希望能彻底解决问题”。而在自由车队抵达渥太华后的早几天，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却表示“绝对不会与示威者谈判”，并且还借口新冠阳性躲了起来，这说明什么呢?

17. 上文信息的来源链接：https://www.a1chineseradio.ca/%E6%9C%A8%E7%84%B6/

这说明这篇文章中作者所采访的所谓“冯先生”，好像根本就不怎么关注与自由车队相关的新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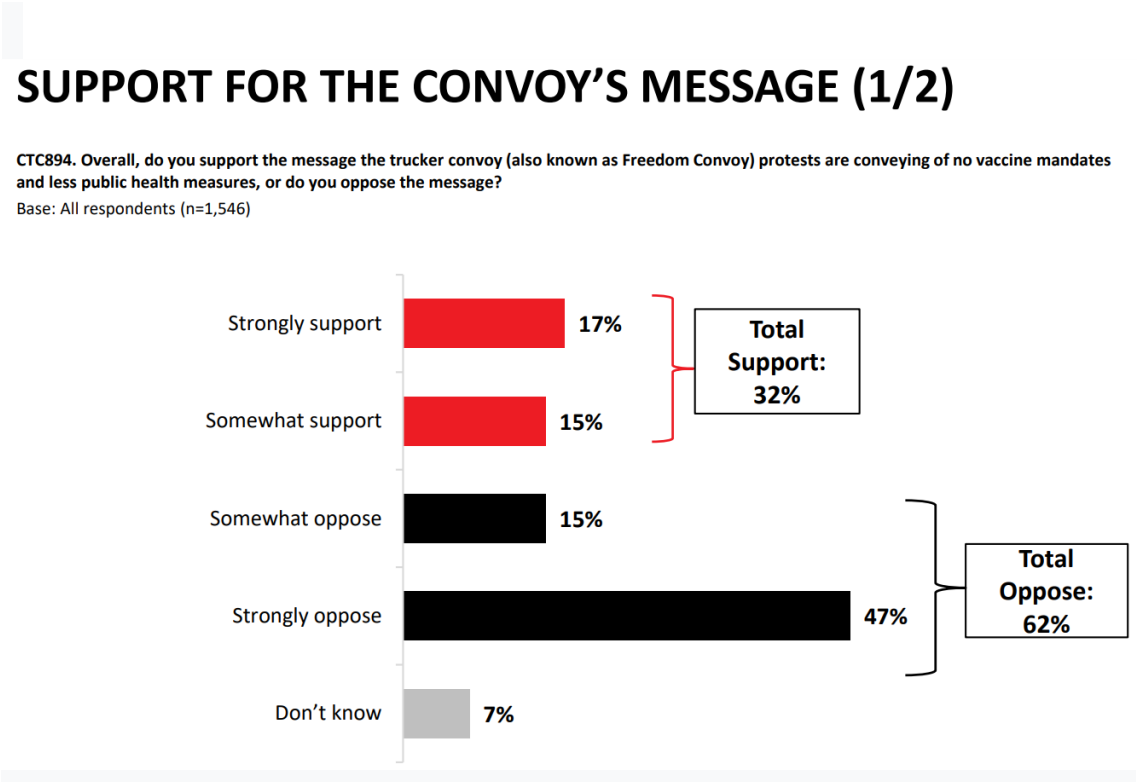
口口声声地说“希望示威领头者早日清醒和政府谈判”，却根本就不知道特鲁多早就通过新闻发布会告诉全加拿大人民：“我特鲁多就是躲，躲外面——从总理官邸跳出去，也不会跟你们示威者谈判。”

采访一个对自由车队毫不知情的人士，对自由车队的看法和观点——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作者有为自由党政府“洗地”的严重嫌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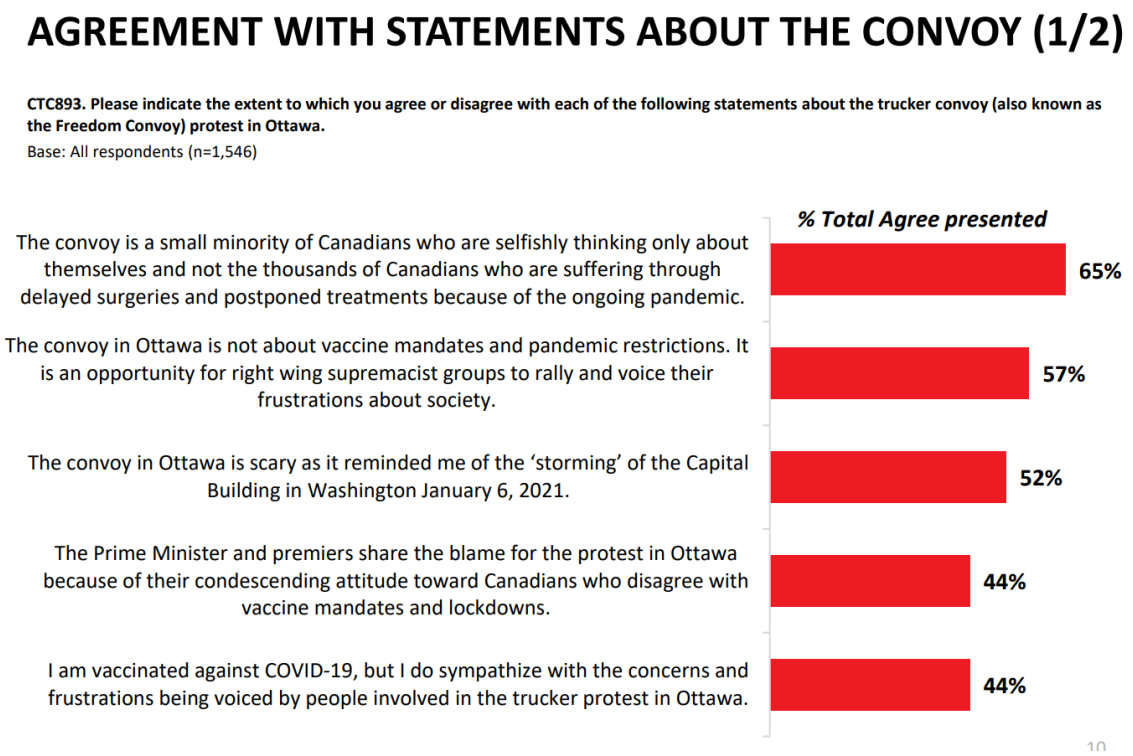
还有，笔者都已经能够亲自采访《星岛日报》的前副总编和当地华人了，为什么就是不看与自由车队相关的新闻报道，愣是把这位“冯先生”采访中说出来的这句，足以推翻整篇文章逻辑的话，放进文章中加以引用呢?

引用的两份所谓“民意调查结果”，我仔细前往其网站查看了详细内容后，同样也发现存在断章取义的行为。

首先是文章下半部分一开始引用勒吉（Leger）公司对“自由车队”的民意调查结果。观察者网的文章表示根据勒吉公司的调查 —— 大多数加拿大人对“自由车队”感到反感，它引用的是这张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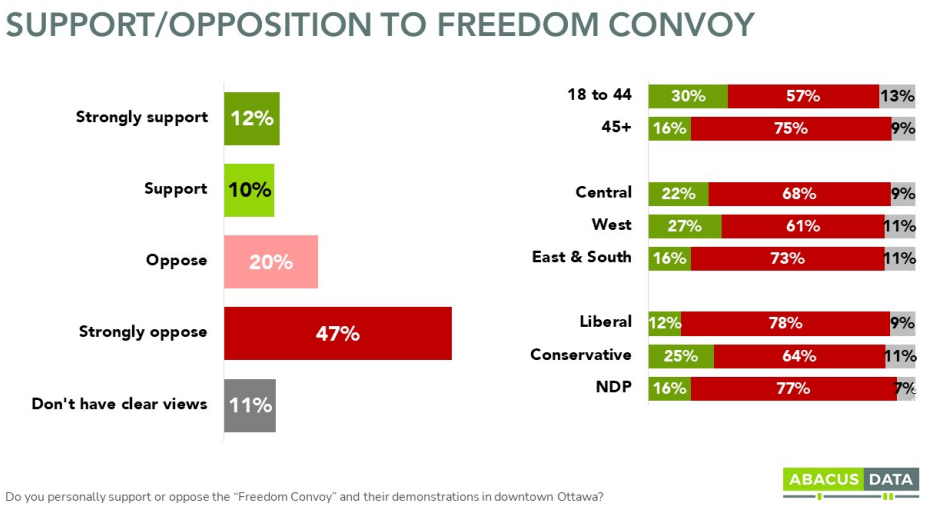


下面这张图，虽然原文也有引用，但仅引用了第一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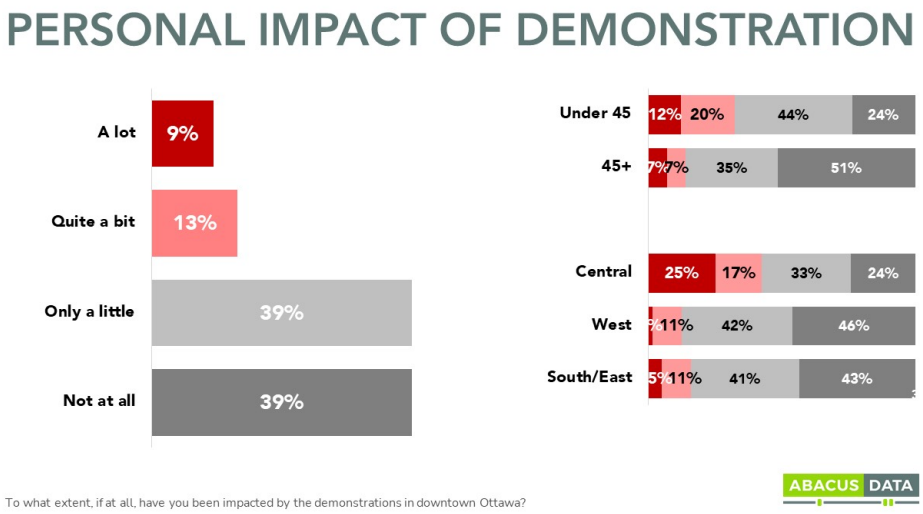



可以看到第二张图中，除第一条以外其他所有——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自由车队的观点，它们的支持率都在半数徘徊，所以我做出了“观察者网是在断章取义”的判断，不过这早就是中特资产阶级媒体用了几十年的老把戏了。

然后是阿巴库斯（Abacus）调查的结果，观察者网所引用这项结果同样存在漏洞 —— 只不过这次的漏洞，对读者的逻辑思维能力有一定要求：



这是观察者网所引用的数据，咋一看还是没错的；下面这个图就可以告诉你问题出在哪儿：




没错，问题就是：为什么在卡车司机示威仅对极少数加拿大人造成影响的情况下，仍然有超过近半数的加拿大人强烈反对“自由车队”？对于这项结果，由北美大资产阶级所掌控的“白左”媒体，应对与受影响人口数量不成比例的反对意见负全部责任。

# 美国才是乌克兰事件的赢家吗?

远 航 一 号

**蒸馏水问:**

美国的情报准确地预测了俄罗斯会开打，其实美国是不是一直都希望发生战争？把乌克兰献祭，利用俄罗斯威胁欧洲安全，这样欧洲资金就回到美国，可以缓解国内通货膨胀。能源大涨，美国自己也可以提高石油天然气产量，出口能源赚一笔。俄罗斯背上了侵略者的骂名，受到多个国家谴责和制裁，而中国则有瓜田李下之嫌，因为站队的问题而在政治外交处于不利地位。这样美国不但同时打击了中俄，还挫伤了欧洲。美国还可以出口一波军火，再赚一笔。感觉美国才是赢家？这是霸权崩溃还是华尔街的阴谋?

**远航一号答:**

分析重大国际问题，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借鉴世界体系理论，综合可以掌握的各种情况，努力把握住有关问题的本质，据此分析出事态发展的基本趋势。而不要像资产阶级媒体或小资社交媒体的所谓评论家那样，将各种孤立的、偶然的联系胡乱堆砌在一起，甚至将重大国际问题娱乐化、儿戏化，愚弄人民，也愚弄自己。

在乌克兰问题上，最主要的本质是什么呢？首先，不是什么美、欧、俄、中谁“赢”了或谁“输”了。最主要的本质问题是，美国霸权的衰落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美国霸权衰落，不是新鲜事，是从1968年以后就开始的，其间经历过

一些反复，从2008年后又进入加速衰落阶段。什么是霸权？什么是霸权衰落？为什么说2008年以后美帝加速衰落？这些问题，红色中国网过去多有论述，这里暂不费笔墨。下面几篇文章，请蒸馏水先学习：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1594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1597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1603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1646

以及下面的系列文章：

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49215

此次乌克兰事件则很可能标志着美帝从霸权衰落的阶段进一步发展到霸权崩溃的阶段，也就是原有霸权（美帝）对世界的局势彻底失去控制，资本主义世界天下大乱的时代到来了，世界革命的时代也为期不远了。

与世界形势如此巨大的变化相比，通过军火赚取几亿美元的利润，完全是蝇头小利，不值得一提。

至于能源价格上涨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美国石油进出口大致平衡、天然气有少量净出口。但总的来说，能源价格上涨会增加所有资本家的成本以及消费者的生活成本，而石油天然气工业的利润只是美国资本家总利润的一小部分。所以对于美国经济，能源价格上涨弊大于利。此外，众所周知，拜登集团与石油天然气工业关系不佳。在能源领域，拜登集团主要代表所谓“新能源”资本家的利益。

至于所谓“利用俄罗斯威胁欧洲安全，这样欧洲资金就回到美国，可以缓解国内通货膨胀”。这属于在中国部分小资中长期流行的所谓“金融战”阴谋论。无论从经济学角度，还是从国际关系角度，都是一种无稽之谈。且不说目前有没有大量欧洲资本流入美国，即使短期内发生恐慌性的大量欧洲资本流入美国，其对整个美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影响也微乎其微。

所谓外部资本流入缓和美国通货膨胀，其渠道是通过增加对美元资产需求，提高美元汇率，降低进口品价格，进而影响平均商品价格。进口占美国GDP约15%。所以如果粗估，即使美元相对于所有其它货币平均升值10%，并且保持一年，通货膨胀率也不过降低1.5个百分点。经过谷歌搜索，在过去一个月，美元对欧元汇率基本稳定。一个月前一美元大约兑换0.88欧元，现在兑换0.89欧元。

总之，军火利润、货币汇率之类的蝇头小利根本不会对美国资产阶级的战略决策有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影响！

至于美国资产阶级在欧洲的战略目标。稍有国际关系常识的人都知道，二战以后，美帝国主义在欧洲的基本战略目标是维持欧洲大陆的稳定、确保欧洲大陆的和平（避免大国之间的战争）。苏联解体以后，美帝国主义一度狂妄自大，将北约东扩并最终迫使俄罗斯屈服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2008年以后，美帝不得不实行全球战略收缩，但在欧洲的上述战略目标并未彻底放弃。拜登上台以后，虽然由于内外矛盾，导致美帝国主义在欧洲的战略方针犹豫不决，但也没有荒唐到主动抛弃乌克兰、制造欧洲不稳定的地步。要知道，搞垮欧洲（特别是西欧），从来不符合美国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此外，在另外的文章中，我已经分析过，种种迹象表明，此次乌克兰事件是俄罗斯资产阶级当局主动出击的战略行为而不是防御行为，也不是防御中的反击，而是俄罗斯战略大反攻的开始。[18]

至于美帝主动透露战争即将开始的情报，是一种企图借此阻止俄罗斯开始战争的雕虫小技，相当于手上一把烂牌、一个“王炸”都没有，还想玩空城计，结果玩砸了。

总之，作为青年人，要努力学习，还要善于学习。遇到事情，不要人云亦云，更不要网云亦云，要动脑筋，想办法，动手动脑做调查研究。这样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少吃亏，少上当，无论国内外形势如何波谲云诡，都能做到心明眼亮。

最后，再把前些天共同学习毛主席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一段话附在这里，请反复琢磨、认真体会，可以受益终生：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粗心大意的军事家，不去这样做，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相情愿的基础之上，这种计划是空想的，不符合于实际的。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之所以不免于受敌人的欺骗，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

18.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9961

无真知灼见的建议的鼓动，因而不免于碰壁，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任何军事计划，是应该建立于必要的侦察和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周密思索的基础之上的缘故。

# 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怎样看待“国家主权”问题?

远 航 一 号

目前，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战争已经进入第四天。随着欧洲东部的政治形势愈加紧张化和复杂化，怎样正确处理构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政治单位的国家“主权”的问题，摆到了各个政治派别面前，同样也摆到了马克思主义者面前。

一些托派团体以及非托派的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的团体，跟在西方帝国主义后面，也嚷嚷着反对俄罗斯“侵略”、反对“战争”。然而，在历史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主要派别，是否在所有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上都认为国家主权绝对不可侵犯呢？不是这样的。

1956年，受苏共二十大后整个东欧“去斯大林化”的影响，匈牙利发生反革命事变。在主要由自由派知识分子组成的裴多菲俱乐部的推动下，当时的匈牙利的纳吉政府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准备实行多党制“民主”选举，全面推行资本主义复辟。匈牙利工人还占领了工厂，建立了“工人委员会”。这是二战后国际政治史中的一次大事件。[19]

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苏联出兵，镇压匈牙利反革命叛乱，支持以卡达尔为首的新成立的工农革命政府。甚至在赫鲁晓夫一度发生动摇，准备放弃匈牙利的时候，中共中央坚决要求苏联继续出兵，帮助赫鲁晓夫下

19. 对于这段历史不了解的左翼青年同志，可以参考：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56%E5%B9%B4%E5%8C%88%E7%89%99%E5%88%A9%E9%9D%A9%E5%91%BD#%E5%85%B1%E4%BA%A7%E5%85%9A%E6%9C%BA%E6%9E%84

定了以武力解决匈牙利问题的决心。事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了有名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与此前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合称“两论”，是当时国际共运中的重要文献）。在“再论”一文中，中共方面明确批评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张匈牙利应当将一切权力交给“工人委员会”的观点。

就当时的形势来说，苏联出兵匈牙利在形式上毫无疑问属于武装干涉、粗暴破坏匈牙利的主权；就匈牙利国内形势来说，绝大多数人民支持纳吉政府而不是卡达尔的工农革命政府。尽管这样，当时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还是要不顾大多数匈牙利人民的意志、违背国家主权以及主权国家相互之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支持苏联出兵匈牙利呢?

在这篇短文中，我们暂且不深究这一问题，而是借此谈谈国家主权的问题。近现代的国家主权概念及其实践绝不是人类社会自古就有的，甚至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级社会中也是不存在的。一般认为，近现代的国家主权及其国际法体系创立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主权”一词来自于Sovereignty，其原意是指君主在一定的疆界内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按照世界体系理论的观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产生和发展在政治上所需要的条件是多个民族国家相互之间的竞争；只有这种多国竞争才能造成资本积累在政治上所需要的有利条件。而近现代国家主权的概念，实际上就是用法律的形式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现实存在的多国竞争局面公开承认并为多国竞争规定一些由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力量对比（“势力均衡”）所保障的规则（即所谓“国际法体系”）。[20]

所以，所谓“国家主权”从来就不“神圣”，在现实中也向来不是“绝对不可侵犯”。就以现在的中国来说，号称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国家统一问题没有解决，与周边国家存在着大量的尚未解决的领土领海争端，内部还面临着多个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势力。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所谓“国家主权”与资本主义时代的其它一切政治现象一样，都是特定历史时代中的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必然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消亡而消亡。

那么，这是不是说，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侵略、干涉以及其它破坏主权的行为就可以一律采取无动于衷的态度呢？那倒也不是。在下列两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要坚决反对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国家破坏另外一个国家的国家主权：

20. 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多国竞争、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可以参考：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1187

一，当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受到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威胁的时候，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人士都要坚决反对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略。

二，在历史上，当通过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建立起来的民族进步政权受到帝国主义国家新的侵略、奴役、压迫威胁的时候，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人士都要坚决反对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国家对新兴民族国家的侵略。

除了以上两种情况以外，在遇到其它的一国“侵略”另一国的情形时，都要根据世界阶级斗争的形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就目前的俄罗斯、乌克兰冲突来说，两方面都是资产阶级政权。在形式上，俄罗斯是“侵略”的一方。但是，所谓被“侵略”的乌克兰并非在反抗帝国主义斗争中形成的民族进步政权，而是前苏联官僚资产阶级勾结帝国主义推翻苏联后在资本主义复辟以及掠夺苏联人民财产基础上形成的反动寡头政权。在2014年政变后，乌克兰的政权基础进一步堕落为一群极端反苏反共、为纳粹暴行招魂和歌功颂德的法西斯流氓。不仅如此，乌克兰法西斯政权通过极力要求加入北约，客观上将自己变成了西方帝国主义进攻俄罗斯并奴役整个欧亚大陆的急先锋。在这样的形势下，俄罗斯发起的以推翻乌克兰法西斯政权为目的的战争，虽然会增加乌克兰人民的痛苦，但只要能够真正制止北约向东扩张，就能够避免从东欧到中亚广大地区人民蒙受更多的痛苦，避免更大的战争，同时沉重打击正在加速衰落的美帝霸权体系，客观上有利于世界人民。

目前，乌克兰战争形势还在发展。在当前条件下，任何从小资产阶级虚伪的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出发，抽象地高谈“反战”、反对俄罗斯“侵略”的言行，客观上都是在帮助西方帝国主义、乌克兰法西斯政权继续奴役乌克兰人民，并为更大更危险的战争创造条件。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坚决反对这种小资产阶级虚伪的人道主义和和平主义，冷静观察和分析当前俄罗斯进攻乌克兰战争的发展，揭露美帝衰落的真相，展现世界革命即将来临的大好形势，并为未来的伟大斗争做好准备。

# 崛起的津巴布韦帝国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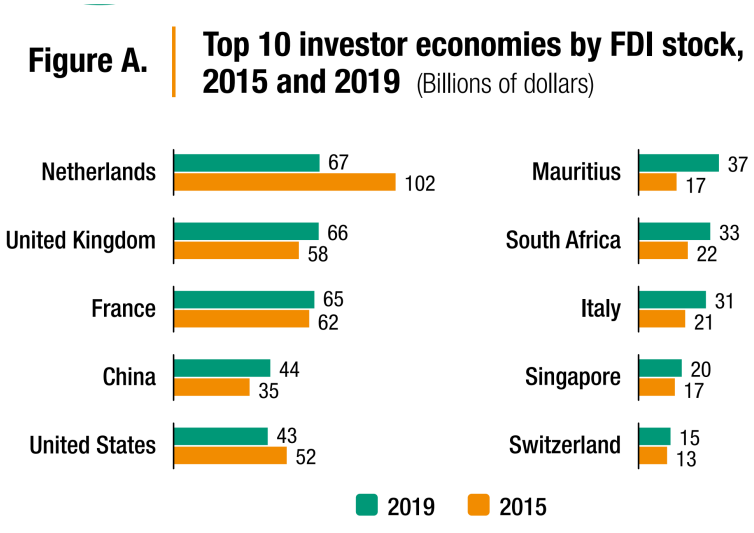
水果战胜橙留香

睡不着，越想越气，头一次辩经成功却没有说服观众，非常emo，遂记录于此。

首先，像个小学生记仇一样，在此记录一段与学院派的嘴炮。

以下是记录：

A：这图说的是在非洲投资最多的十个国家，如果仅凭这个就得出赛里斯是/不是，那么毛里求斯也可以是/不是。所以我说了，你一定要去计算利润率……超额利润是最关键的东西，两个体积一样大的气球和铅球，我们总不能因为体积相同就说他俩是同一种东西吧，所以你要去算一个指标，列宁说的超额利润，也就是现代zcjj统计里的“海外初级收入”。



B：所以投资量能说明什么……以一个量化标准来定义一个概念是吧。二者的区别在于质而非量，你无法用量化标准区别概念，你算再多数字也不能说明是否是帝，利润率仍不是质，它还是个量化的标准。

C：我觉得没什么毛病：质决定了一个物质的特性，而不是量。

A：利润率就是质……

B：你能用一个数字将其框定住，还是质是吧

A：我的一块钱只能买一瓶矿泉水，而马云的一块钱却可以拿去搞投机赚10块钱，量都是一块钱，但利润率完全不一样，这就是质的区别。

B：这是质变引起量变，区别在于背后的质，你是在用量来描述这个现象，利润率是怎么产生的，我问你，它难道是被你算出来的吗？它能被你算出来还叫质吗？

A：你不去计算利润率你怎么知道这到底有没有获得超额利润？

B：这是后果……

A：利润率是可以被计算出来的……我的大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了快一百年，利润率的测算又不是做不到。

B：原文说的是后果，我的意思是，你能算出来就不是质，是量化的，数字就是量，懂吗？你原文里的超额利润，已经标出来是后果了，首先就不是你所说的所谓定义。其次，帝国主义的形式不同，对现实施加的影响肯定也不同，这是那个年代的帝国主义，或者赛里斯还没到榨取超额利润的程度，同样也不能说明它就不是帝。

A：所以，没有超额利润也可以是帝国主义？

B：为什么不能？

A：如果没有获得超额利润也可以算是帝国主义，那请问帝国主义区别于一般zbzy的特殊性在哪里？在于垄断吗？那么津巴布韦、肯尼亚、秘鲁、菲律宾、埃及也是帝国主义了，看这篇文章，津巴布韦、肯尼亚、秘鲁、菲律宾、埃及这五个国家的金融业集中度均在50%以上，肯尼亚的5家最大银行占72%，巴基斯坦的5家最大银行占90%，秘鲁的5家最大银行占76%，菲律宾的5家最大银行占56%，津巴布韦的5家最大银行占97%，如果仅凭垄断就断定为帝国主义，那我是不是可以称呼毛里求斯为帝国主义？津巴布韦帝国主义呢？

在当今世界，已经很难再找到一个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了，几乎都在资本集中度上达到了接近或是超过帝国主义标准的，所以我们要考察的就不只能是垄断，而是对外资本输出。所以我在第三章中对中国的对外投资做分析是顺理成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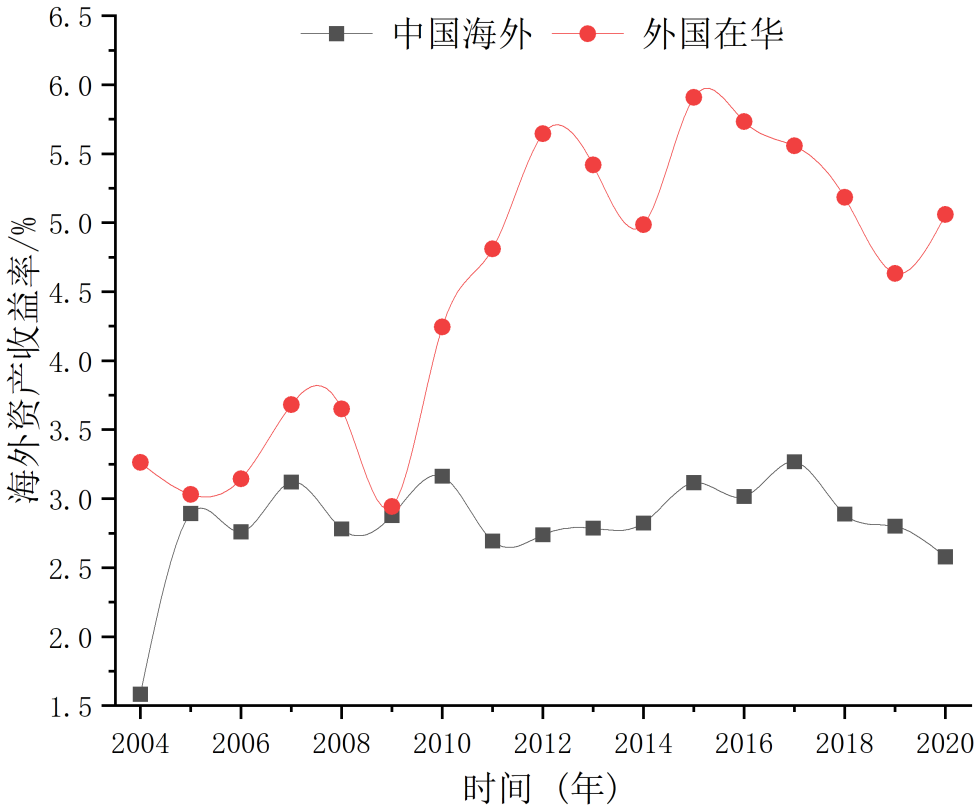
正如列宁同志所说：由此可见，资本输出是在20世纪初期才大大发展起来的。在大战前夜，3个主要国家的国外投资已经达到1750~2000亿法郎。按5%的低利率计算，这笔款额的收入一年可达 80-100 亿法郎。这就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这就是极少数最富国家的资本主义寄生性的坚实基础！

B：这和你所干的没啥联系吧。再说一遍量化标准不能区分概念，你什么时候听得懂？

A：得了吧，列宁都能引用数据，为什么我不行？

B：你尽管把头扎进这些数据里吧……你反驳中帝论的现实意义在哪里？你的目的是什么？列宁是在讲述帝国主义的暴行，而你还在想赛里斯到底是不是帝国主义，你反中帝论有何现实意义？是中帝论反动吗？你能不能回答我的问题，我要跟人对话，不是数据！

A：如果你认为中国是帝国主义，那么你就必然要面临一个问题，中国的无产阶级会不会像过往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那样被改良主义所阻拦？如果你认为中国是帝国主义，那么你就必然要承认中国是获得了超额利润的，那么你就必须思考中国无产阶级何以克服改良主义。再说了，你见哪个帝国主义国家是不断流失本国劳动的？你看这个资产收益率就知道了，外资在华收益率是中国海外资产收益率的整整两倍。




B：这是现象，不是本质。

A：你告诉我这是获得超额利润的现象？我再告诉你一个事实，中国一年的出口商品约包含9000万劳动人年，其中约1800万输出到美国。你告诉我这是帝国主义？

B：帝国主义跟超额利润毫无关系，求你不要再钦点了，我为什么要承认赛里斯有超额利润？

A：没有超额利润就无法称之为帝国主义，不然我完全可以说津巴布韦是帝国主义

B：又来钦点了，后果是什么意思不懂吗？我也说了，量化标准无法区分概念，你自己的例子可以很好的反驳你自己。

A：那我问你，津巴布韦是不是帝国主义？

B：那它为什么是？

A：津巴布韦怎么可能是帝国主义啊我的B哥……他是被剥削的，他的剩余价值是流向帝国主义国家的……

B：那你这算不算是感性判断，仅凭你的直觉就可以否定掉了吗？

结论：“津巴布韦帝国主义在非洲”，简称《津帝》。

无聊的个人感触：学院派为了保障他脑袋里那套理论的自洽性，甚至可以用脑袋里的理论来否认一切现实。（“数据不能反映质”）

以及，未明子的粉丝是真的太教条了！！！气死我啦！真是太睿智了！！！

# 简单答复激流网知凡同志的回复

远 航 一 号

5月13日，激流网发表了知凡同志对红色中国网5月4日文章“乌克兰纳粹分子的手上沾满了乌克兰人民的鲜血！”的回复[21]。知凡同志认为：“我认为红中网的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反映了其思想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所以有必要进行反驳。”下面对知凡同志的意见做几点简单答复。

知凡同志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证战前的乌克兰不是法西斯国家，并说红色中国网的文章“全篇没有对纳粹、法西斯这些概念进行界定”。这里再说明一下，我们在5月4日的文章中，并没有论证乌克兰是像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那样的法西斯国家，而是说，乌克兰是“深度纳粹化”的资产阶级寡头国家。关于战前乌克兰是资产阶级寡头国家，知凡同志也同意。关于“深度纳粹化”，我们在5月4日文章中有明确的说明：“在俄乌战争开始以前，乌克兰的新纳粹组织就已经泛滥，并且掌握了一部分乌克兰的国家机器，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乌克兰国家的内外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纵容法西斯暴行，并且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大力鼓吹法西斯意识形态。正如美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世界’网站所说：乌克兰极端右翼的问题是‘巨大的’，‘如果世界无视这个问题，就是置世界于危险之中’。”知凡同志说，“红中网文章 … 仅仅使用一些乌克兰纳粹组织或者有极右民族主义倾向的人的暴行作为论据”。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我们所反对的，是知凡同志在他于3月7日文章中说的：“乌克兰……纳粹只是其国内少数人的行为，……他们的主张也没有上升为国家政策。乌克兰并不是纳

21. https://jiliuwang.net/archives/97973

粹化了的国家。”我们认为，我们在5月4日文章中提供的论据已经充分说明了知凡同志3月7日文章观点的错误。我们注意到，除了个别地方，知凡同志对我们所提出的大量论据没有做出反驳。

关于乌克兰当局一度授予乌克兰纳粹运动创始人班杰拉“乌克兰英雄”称号，知凡同志说明：“2019年8月，乌克兰议会否决了向班杰拉授奖的提议。”谢谢知凡同志的说明。我们在5月4日的文章中没有提及这一点，这是我们工作的失误。据了解，乌克兰当局于2010年授予班杰拉所谓“乌克兰英雄”称号后，欧美资产阶级为了欺骗世界舆论，不得不对乌克兰当局进行所谓谴责。乌克兰议会后来不再给班杰拉授奖，决不表明乌克兰当局与纳粹运动断绝关系，而无非是为了应付国际舆论而作的表面文章。就在俄乌战争爆发前的今年1月1日，在乌克兰当局纵容下，在基辅举行了规模巨大的纪念班杰拉的火炬游行。据腾讯网报道：“2022年1月1日，基辅、利沃夫等乌克兰城市举行了火炬游行，纪念斯捷潘•班杰拉诞辰113周年，并高呼他为英雄。乌克兰警方跟往年一样，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口口声声反对纳粹复辟的美国跟欧洲，谁都没有为此发声。”[22]

事后，只有以色列当局谴责了乌克兰当局对纳粹运动的纵容：“赞美和支持纳粹的人是在玷污乌克兰犹太人大屠杀受害者的记忆。”以色列当局的谴责从侧面说明，激流网同志极力否认战前乌克兰深度纳粹化的事实是不符合乌克兰实际情况的。

知凡同志还就俄乌战争性质问题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这里要说明，知凡同志所引用的红色中国网上发表的关于俄乌战争的几条意见，无论是否来自管理员，都是个人在某些场合发表的个别看法，不代表红色中国网的正式意见。尽管如此，我们不否认，在俄乌战争性质及其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方面，我们与激流网的同志存在着原则的分歧。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进一步阐述这些原则分歧。

22. 腾讯网，“乌克兰新纳粹狂捧的‘民族英雄’，班杰拉当年如何扮演纳粹刽子手？”https://new.qq.com/rain/a/20220304A08R3H00

# 礼崩乐坏——
# 乌克兰与现存世界体系的总危机

远 航 一 号

红色中国网的特约评论员草庐棋士刚刚就正在迅速发展的乌克兰危机撰写了时评[23]。草庐棋士评论员指出：“随着美国的霸权衰落，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稳定都变得岌岌可危”；“美国霸权将无力负担压制民族国家冲突的职能，而在这些民族国家冲突的边界，资本积累秩序则很可能走向崩溃。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从勉强维持的状态变成失败国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也将从相互联系的“全球化”时代走向山头林立的分裂时代。……对于其他严重依赖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稳定的国家而言，无论美国走向何方，它们要面对的结果都是灾难性的。”

读了草庐棋士的文章以后，还有些意犹未尽，忍不住想对当前乌克兰危机的发展及其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影响乃至对中国资本主义的长远影响，再另外畅想一番，提出一些不成熟看法，与各位网友切磋交流。

去年九月，在“美国霸权的衰落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终结”系列文章中，笔者就曾经设想：“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而中国或者任何其他大国又无法代替美国成为新的霸权国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进入了全面瓦解的总危机。在未来几十年，由于现有霸权秩序的崩溃，中东等地区将面临社会秩序的全面瓦解，进而威胁欧洲的稳定；全球经济将由于失去有效的宏观协调而陷入长期动荡；全球生态系统将迅速走向崩溃；由于越来越多的中小国家掌握了核武器或生产核武器的能力，因为各种偶然原因引起区域乃至全球核战争的风险将不断上升。”

23. 见本文集《从撤退到溃退？乌克兰危机和美国霸权的未来》。

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总危机的角度来看，目前的乌克兰危机很可能被未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即美国霸权从逐步的、相对有序的衰退进入加速衰退的转折点。随着美帝国主义丧失维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稳定的能力，现存世界体系已经进入了“礼崩乐坏”的全面瓦解阶段。

如草庐棋士所说，自从美帝国主义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军事冒险失败，又受到了2008-200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以后，美国资产阶级就已经在事实上放弃了小布什时代狂妄的“世界帝国”计划，其总的战略方向是全球性的战略收缩，力争减缓、迟滞霸权衰落的进程（关于奥巴马时期的战略方针，草庐棋士认为是一度“妄图恢复美帝国主义扩张态势”；笔者的看法稍有不同，笔者认为奥巴马时代虽然有所反复，但其主要战略方针仍然是力图实现有序的战略收缩）。

到了2021年，美国从阿富汗狼狈撤军、阿富汗傀儡政权垮台以后，美国在中东及其周边地区已经几乎没有直接的军事存在。这标志着，美帝国主义已经丧失了维持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主要能源供应基地的中东地区稳定的能力。不仅如此，由于美国霸权的衰落、美国资产阶级内部对于全球战略的争吵以及美国劳动人民的强烈反对，美帝国主义至少已经暂时丧失了大规模对外用兵的能力和意愿。在这种形势下，以往美帝国主义在其回光返照时期过度扩张所形成的一些“战略突出部”就变得十分脆弱了。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以后，美帝国主义表面上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那时，以切尼等为代表的美国资产阶级中的军工复合体集团自以为美帝获得了建立永久“世界帝国”的天赐良机，从而制定了在军事上侵略中东和中亚，同时在欧洲积极推进北约东扩、永久削弱俄罗斯的狂妄计划。

到了奥巴马时代，美国资产阶级的“世界帝国”计划实际上已经失败，美国霸权已经进入无可挽回的衰落，奥巴马政府的总的战略方针也是全球性的战略收缩。然而，一方面由于美国资产阶级仍没有放弃与俄罗斯争夺对世界能源市场的控制权，另一方面由于美国资产阶级外交官僚系统的惯性，依然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各种严重困境，强行在乌克兰策动政权更迭。

2014年乌克兰政权更迭后，俄罗斯普京政权迅速做出了有效但又有克制的反应，一方面出兵收复克里米亚，另一方面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顿涅茨克两州的俄罗斯人民建立分离政权。乌克兰亲西方政权建立后，大肆反俄反共，一方面摧毁苏联社会主义遗产，另一方面纵容并依靠法西斯民兵组织；由于内外矛盾交困，始终无法建立稳定的资本积累秩序。面对无法解决的困境，乌克兰法西斯政权孤注一掷，幻想用加入欧盟和北约的办法来稳固自己的统治。

在俄罗斯方面，在经历了普京政权二十多年的统治以后，目前的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能源出口国之一（俄罗斯联邦是世界第一大天然气出口国、第一大或者第二大的石油出口国）。经过2008年的格鲁吉亚战争、2014年收复克里米亚、2015年出兵叙利亚以及今年年初对哈萨克斯坦的干涉，俄罗斯的军事力量与上世纪九十年代相比已经大大加强。俄罗斯资产阶级成功地将中亚、南高加索以及中东地区的叙利亚确立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巩固了对白俄罗斯的控制。此外，通过以“欧佩克+”的方式参加石油输出国组织会议，俄罗斯达到了与沙特阿拉伯一起共同控制世界石油市场的目的。

这样，在美国从阿富汗狼狈溃退、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声望跌到历史低点、拜登集团在执政一年之后民怨鼎沸且内外交困、美国资产阶级内部矛盾十分严重的条件下，普京政权认为俄罗斯资本主义复兴的历史契机已经出现了。种种迹象表明，这次乌克兰危机是普京政权转守为攻以后为争夺欧亚大陆霸权而迈出的第一步。

不久以前，俄罗斯方面在做好了从军事上包围乌克兰的准备以后，向美国正式提出了“安全保障”的要求，并且提出了带有最后通牒性质的安全保障条约草案。

俄罗斯向美国提出的安全保障条约草案的第四条提出：“美利坚合众国将保证阻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进一步向东扩张并拒绝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员国加入上述同盟。美利坚合众国将不在没有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员国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使用其基础设施从事军事活动或与其开展双边军事合作。”

第五条提出：“双方将避免在另一方看来可能对其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地区部署武装力量和武器装备，这包括在国际组织、军事同盟或联盟框架下所做的部署。”

第六条提出：“双方将保证不在本国领土以外、也不在本国领土内下述武器可以攻击到对方领土内目标的地方部署中程或近程的从陆地发射的导弹。”

第七条提出：“双方将不在本国领土以外部署核武器并在此条约生效时将已经部署在本国领土以外的核武器撤回到本国领土以内。双方将销毁所有现存的、在本国领土以外的部署核武器的基础设施。”

俄罗斯向北约方面提出的安全保障条约草案的第五条提出：“俄罗斯联邦以及至1997年5月27日为止属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缔约各方将不在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部署到1997年5月27日为止已经部署在这些国家领土上的军事力量以外的军事力量和武器。”

第五条提出:“缔约各方将不在可以攻击到其他各方领土的地方部署从陆地发射的中程或近程导弹。”

第六条提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所有成员国都保证不再扩大北约，包括不接纳乌克兰，也不接纳其他国家。”

第七条提出:“缔约各方中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将不在乌克兰领土上，也不在东欧、南高加索和中亚的其他国家领土上，从事任何军事活动。”

这些条件的实质，是要求美帝国主义承认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暂时不包括波罗的海三国）均为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势力范围，并且在形式上承认俄罗斯恢复到苏联那样是与美国对等的军事超级大国（注意：中国资产阶级不在对等之列）。

普京政权当然知道，美欧资产阶级不可能马上同意这些要求。但是，美国霸权的衰落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已经使得普京政权感觉到，在可预见的将来，上述这些要求都将成为俄罗斯资产阶级可以争取到的现实目标。

目前，乌克兰的形势一触即发，普京政权仍然在权衡干预乌克兰的各种选项（草庐棋士文章对此已经有分析）。但是可以预料，普京政权已经制定了以军事的或者政治的手段改变乌克兰政权、变乌克兰为俄罗斯势力范围的目标。乌克兰法西斯政权在内部倒行逆施，得不到广大乌克兰人民的真心拥护；而在外部，美欧资产阶级实际上已经做好了放弃乌克兰法西斯政权的准备。在这种形势下，乌克兰纳入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只是时间问题。

一旦普京政权完成了将乌克兰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计划，俄罗斯资本主义可能在今后的相当一个时期经历某种程度的复兴，并且对整个世界形势产生深远影响。

仅从军事上说，在俄罗斯资产阶级巩固了其在前苏联的势力范围以后，俄罗斯资产阶级将拥有欧亚大陆上最强大的核武库（超过中国资产阶级）以及经过实战考验的、最强大的常规武装力量。中国资产阶级的陆军、海军在纸面上比俄罗斯资产阶级的陆军、海军更庞大，但是已经有将近半个世纪没有经历实战；并且由于地理的原因，中国资产阶级对于欧洲、中东、中亚都处于鞭长莫及的状态，无力向这些地区投放军事力量。这样，在实际上，俄罗斯将成为欧亚大陆上公认的第一军事强权。

本来，欧洲资产阶级在怎样面对俄罗斯的问题上就处于严重分裂的状态。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等资产阶级由于历史原因极度仇视、恐惧俄罗斯。但是，德、法、意等欧洲大国的资产阶级主张对俄罗斯采取“务实”甚至“尊重”的态度。由于欧洲资本主义的能源无法自给，通过与俄罗斯建立稳定的、不受波兰和乌克兰干

扰的能源供应线对欧洲资本主义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这就为俄罗斯资产阶级以能源换取欧洲资产阶级的技术和资本提供了有利条件。

另一方面，如果俄罗斯资产阶级能够成功地恢复对乌克兰的控制，而美帝国主义又无力保护，那么美国在欧洲军事存在的合理性将发生严重动摇。长此以往，随着美国霸权进一步收缩，甚至不排除，欧洲资产阶级将接受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军事保护，同时向后者交租纳贡。

那么，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复兴对于中国资产阶级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我们知道，中国资本主义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专门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国家。目前，中国资本主义虽然表面上拥有庞大的经济体量，但内部矛盾日趋严重。随着广大劳动群众普遍开展躺平斗争，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为了维持其残酷剥削所必需的青壮劳动力正在逐步枯竭，从根本上威胁着未来的中国资本主义积累。

就外部来说，中国资本主义的制造业发展，一方面需要美、欧提供广大的市场以及芯片等高技术产品，另一方面又需要进口大量的能源以及其它原材料以弥补自身自然资源的不足。

一旦俄罗斯资本主义复兴，俄罗斯资产阶级就将通过其对自身能源以及对中亚、中东的控制牢牢地掌握住中国资本主义的能源生命线。这就等于在实际上断绝了中国资产阶级在世界舞台上争霸的一切希望。用中国小资的网络用语来说，还没等到中国资产阶级“入关”，自己已经先被俄罗斯“入关”了。

如果在俄罗斯资本主义复兴的同时，中国资本主义尚能维持正常发展，那么接下来，中国资本主义将不仅需要继续剥削本国廉价劳动力向美、欧资产阶级输出超额剩余价值，而且由于能源生命线以及与欧洲的贸易通路都被俄罗斯控制，搞不好还要以廉价工业制造品来交换俄罗斯控制下的高价能源。

长远来说，俄罗斯资产阶级也可能不甘心于仅仅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能源供应商。在向欧洲资产阶级和中国资产阶级分别收取军事保护费以后，俄罗斯资产阶级完全可以依托历史上的工业基础遗产以及大量专业技术人员，进一步投资高技术产业，从而与中国资产阶级的少量高技术产业形成竞争，进一步堵死中国资产阶级的产业升级之路。

总之，俄罗斯资本主义崛起为欧亚大陆第一军事强权将不仅导致美国霸权加速衰落，而且可能严重加剧中国资本主义的内外矛盾，从而进一步促成现存世界体系的全面瓦解。

# 从索罗斯演讲看当前全球资产阶级的三大集团

远 航 一 号

这个视频很有意思，建议有条件的读者耐心听一下，20多分钟，勾画出了当期全球资产阶级的几个主要集团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

现在的全球资产阶级可以分成三大集团。占主导地位的是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精英，以美国的硅谷和华尔街（高科技、金融垄断资本家）为首，以欧加日韩台澳资产阶级为附庸，与中国资产阶级“改革派”（代表出口制造业资产阶级利益）和俄罗斯资产阶级“反对派”（代表在与普京竞争中失败的原寡头资本家利益）结盟。

该集团在全球妄图永远维持剥削亚洲广大廉价劳动力、巩固美欧垄断利润的新自由主义秩序；在核心国家，妄图实现“大重启”，实现人口更换，抛弃传统工人阶级，建立高科技寡头统治；对中国，企图与中国“改革派”勾结，策划反习软性政变；对俄罗斯，妄图用北约东扩压迫俄罗斯，最终在俄罗斯通过“颜色革命”建立亲西方政权。这个集团的野心大大超过其实际能力，总的来说已经在衰落，但是在衰落中仍然妄图进行疯狂反扑。

第二大集团，是各核心国家本土的中小资本家阶级，其本身政治经济力量远远弱于第一种势力。各国中小资本家阶级相互之间，也没有直接的联合，而仅仅是客观上相互策应。

但是，中小资本家阶级通过与核心国家无产阶级联合，正在形成政治上有力量的同盟。这些资本家的基本要求是，部分退出全球市场，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维护国内市场利润，同时限制移民，维护本地工人对高工资劳动力市场的垄断（而本地工人高工资是国内市场繁荣的基础）。在国际上，这部分资本家主张不打不必要的战争，放弃昂贵的世界警察义务，遵循孤立主义外交路线。

第三大集团，是中、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联盟。之所以说是机会主义联盟，是因为这种联盟是脆弱的和不牢靠的，是为了一时一地的“共同利益”暂时结成的，因而是充满矛盾的。

其中，中国资产阶级“执政派”（以习为首）幻想将出口制造业带来的利润转用于“产业升级”，使中国资本主义上升为核心，乃至称霸。但中国资产阶级军队外强中干，四十多年没打过仗，且由于地理限制，对中东和欧亚大陆西端鞭长莫及。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国资本主义产业升级的梦，要靠出口制造业的利润来实现。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两头在外（依赖海外市场、依靠海外能源和原材料），哪一头都害怕损失，万万不敢开启战端，航母、歼20都是摆设。

俄罗斯资产阶级（普京为首）的战略目标是恢复前苏联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此基础上，依托本国能源工业、军事力量及海外军事基地，使得自己成为世界石油和天然气市场的主宰者以及欧亚大陆西半部政治军事平衡的仲裁者。

按照中、俄资产阶级的理想战略远景：未来，中国资产阶级将专门发展一般工业，俄罗斯资产阶级专门发展能源和军事。中国资产阶级用民用技术和工业制成品换取俄罗斯资产阶级提供能源并为中国的能源供应线提供军事保护。长远来说，再将欧洲置于俄罗斯的军事保护之下，从而实现中、俄资产阶级共治欧亚大陆的美梦。美国则从全球霸权退却为西半球的地区强权。

但是，无论是全球化精英集团还是中、俄资产阶级的迷梦最终都必将失败。如果核心国家中小资本家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同盟能够充分动员，就可以挫败全球化精英大重启的阴谋；再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去全球化，就可以削弱中国出口制造业的利润。

中国出口制造业利润萎缩后，再加上中国资产阶级国家官僚系统的腐朽，中国资本主义的产业升级企图必然失败。

要稳定从中东、中亚到西欧的广大地区，超出了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军事能力。最终，随着中东地区不稳定，中国资本主义的海外能源供应就会被威胁。万一中、俄资产阶级反目成仇，中国资本主义的处境将更加尴尬。

最后，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矛盾加深，劳动力萎缩，劳动人民普遍开展“躺平”斗争，以出口制造业为基础的中国资本主义庞然大物必然轰然坍塌，化为废墟。

对于当前的国际政治形势，井冈山卫士有妙评：

第一集团：野心过大，战线过宽；

第二集团：相互隔绝，难以支援；

第三集团：主暗国疲，各怀鬼胎。

# 大规模人口贩卖是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缩影

## 盛世下的蝼蚁

近日，徐州丰县的“铁链八孩母亲”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随之，越来越多于20世纪末80年代起， 即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改开）和私有化后经济高速腾飞的四十年内，无数儿童、妇女被拐卖和被贩卖的人口事件被曝光和揭露。这涉及的女性、孩童群体之大，人贩子与地方政府、民政司法机关的勾当之深，都足以击碎我们仿佛处在“盛世中华”的幻想。很多人认为贩卖人口和凌虐、囚禁和奴役女性是封建社会残余根深蒂固的表现，甚至是中世纪黑暗、野蛮和落后的重现。然而有意思的是，这一切社会罪恶却发生在仿佛最“文明”，最“与世界接轨”的改开新时代。尤其是改开刚实行的前20年里，惊人的“旧社会”野蛮不但反复重现，而且还延续至今。真可谓一夜回到解放前，革命先烈们的鲜血都白流了！这段买卖人口的高峰期，不禁让很多在改开下长大的幸存者后背发凉，还让整个社会对——早已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被根除的妇女贩卖现象再次重现中国——这一残酷现实的深恶痛绝和愤怒不已。

目前，大量的文章从道德、法治社会等角度分析妇女贩卖问题，呼吁社会正义的文章也遍布互联网。但就“为什么大量人口贩卖会集中发生在中国经济高速腾飞的改开四十多年？”这一问题并没有深入探讨。本文试图从中国资本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和回答这个问题，并探讨人口贩卖，尤其是改开后妇女拐卖和贩卖产生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原因。我们将从四个问题切入来分析。

第一，为什么要买入拐卖来的外地媳妇？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和私有化，即主动加入资本主义全球化，为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开放中国的国内市场。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全面市场化本国劳动力，为中国的出口加工制造业提供商品化的劳动力和市场化的雇佣劳务关系。要顺利完成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就要打破原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解体和私有化国企和人民公社，破坏社会已有的长期稳定的劳务关系。从而利用廉价、高质量、高纪律的劳动力来打造世界制造工厂，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提供物美价廉的中低端中国制造工业品。

出口加工制造业在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的低利润决定了资本家必须进一步压缩工人的生产时间和最终商品对外运输的距离，工厂被统一聚集在沿海口岸。因此，绝大多数工作和就业机会只能集中少数几个沿海城市，而广大内陆地区和农村的经济和就业市场则相对萎缩。面对萎缩的农村就业市场，农村劳动人口不得不大规模向城市和沿海地区迁徙从而进城务工和谋生。改开和私有化的四十年内，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人口（农民工）迫于生计只能临时或永久地迁出农村、迁至沿海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和今天的各大一线城市。这些农民工里，农村女性占了城乡间流动人口很大比重。由于雇佣女性工人不仅比男性工人便宜，而且镇压和规训女工的成本低，自由贸易区和经济特区各行各业雇佣了大量农村妇女，并尤其青睐未婚的年轻女性。大量农村女孩子年纪小小就跟随父母或独自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务工，主要参与出口加工制造业生产和城市的服务行业。事发的徐州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劳动人口流出地。2014年，徐州共有户籍人口1023万人，但是常住人口只有866万。大量的徐州籍劳工流向长三角地区，在长三角形成与东北黑帮齐名的苏北黑帮。

随着农村女性大规模进城务工，并最终主动或被动地留居城市，农村人口性别比例也随之严重失衡。这些留居城市的女性，一方面满足了城市廉价的劳动力供给；另一方面，也为城市的婚姻市场和性市场提供了便宜可得的年轻供给，缓和了城市的光棍问题及其带来的社会安全隐患。最终返乡的农村劳动人口往往更多为年长的单身男性。这使农村的光棍与日俱增，农村娶媳妇的彩礼要价也随之水涨船高，让绝大多数农村普通男性望而却步。在面对生活、生理和心理的多重需求下，向人贩子廉价买入外地妇女就成了买不起本地媳妇的农村光棍们唯一的解决办法。

第二，为什么人口贩卖在改开和私有化后的中国被大规模进行并在地方上被政府合理化?

很多人把改开后中国妇女贩卖问题归根于：1. 计划生育的人口干预政策导致中国农村男女比例失衡，2. 农村重男轻女和子嗣后代的封建传统价值观念，3. “小

农”的贫穷导致野蛮。这些虽说对农村性别比例都有影响，但并不足以构成地方政府直接支持甚至参与妇女贩卖的理由。

妇女在改开后被大规模贩卖，归根结底是中国资本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复辟初期，其稳定有序的国内社会秩序未能完全建立。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还无法正常有序地运转。一方面，中央需要向地方政府让渡地方管理和自治的特权，从而获得地方官员对中央改开政策的政治支持。另一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出口加工制造业的低利润，决定了中国无法提供足够的社会剩余来维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正规运作的昂贵开支。很多地方和基层政府在改开后不但需要非正式化来节省政府开支，还要琢磨如何给地方财政创造收入。在失去国家财政支持，尤其是九十年代“税务改革”后，地方的社会公共管理开支逐渐成为地方政府无法承受的负担。对于非经济特区和自由贸易区的广大地区，缺乏财政资源的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只得自己想办法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这便为地方政府默许和合理化人口买卖来“创收”提供了机会和再生土壤。

同期，国企下岗潮和农村集体合作社的解体，让大量失业人口无法找到正经工作维持生计。在失去了工作和国家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后，这些人迫于生存，被迫成为了流氓无产者以参与黑社会犯罪活动为生。买卖人口、买卖器官、飞车党、地头蛇、偷窃、打劫、勒索等都在改开后的中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应运而生。因此，中国在80、90年代，甚至是21世纪的前十年和今天广大农村地区，社会治安倒车逆行地迅速恶化，地方政权黑社会化就成了常态。

人要想在资本主义社会活着，就得靠钞票。任何能被兑换成现钱、有利可图的行为都会应运而生。在治安恶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偷窃抢劫不但来钱最快，需付出的成本最低，甚至可以是零成本。在廉价媳妇的巨大需求和利润驱动下，人贩子团伙化、集团化、产业链化。他们从全国各地绑架、拐骗妇女和女童，长途跋涉将人口贩卖到广大劳动力流出地。而对于女性劳动力输出地的地方政府，他们面对光棍成村的“社会安全隐患”，为了不承担政治责任，秉承为地方财政“创收”和官员贪污腐败的目的，便给买卖媳妇大开绿灯。地方政府的不作为，甚至是大张旗鼓参与人口贩卖产业链的行为进一步助长了贩卖人口在众多劳动力流出地的猖獗。

第三，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贩卖以女性为主?

在资本主义，人作为劳动力是一种可以明码标价的商品，可以在正规和非正规的劳动力市场进行“自由”买卖。人口贩卖虽然在以往的阶级社会也存在，不过其规模之庞大、群体之特定倒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首创。在前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里，被买的人（奴隶、家仆、伺从、妻妾等）和买家或许还能存在短期的共同利益。而资本主义的人口买卖双方，既无短期共同利益，更无长远共同利益。如

果说，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买卖能把一个人作为一个整体买入卖出，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买卖则要最大化一个人的可被贩卖的部分。资本主义的人口买卖追求最大化买回来的这个人及其劳动力能被攫取的全部剩余价值。被贩卖的人只能是工具，最好是万能工具和永动机，直到不能继续运作了，最好还能在完全报废之前赶紧转手卖出去，或是分成能被再次买卖的部分流入买卖市场。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但能被贩卖多次，卖价还能越卖越高。对于卖不掉的，也要把值钱的部分卖给医院的器官库、血库。资本主义吃人可不吐骨头。

如今，资本主义正式和非正式人口买卖的对象主要包括农村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未成年人、女性、农业和服务业临时劳工等。其中，女性占了被贩卖人口的绝大部分。这包括：跨国和跨地区性工作者、外来媳妇/新娘、代孕母亲、奶妈、保姆、保育员、护工、清洁工、其他各类服务行业的短期务工和临时农工等。女性能被贩卖到的行业和工种领域之广，女性对拐卖的反抗能力之弱，使女性在资本主义作为劳动力商品比男性拥有更“广阔”的市场和买卖空间。女性作为一件劳动力商品可以同时出现在生育、性服务和劳动力三大交易市场并同时满足买家的三个需求。这导致成年和未成年女性成了人贩子的“头等猎物”。无数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和广大农村地区的女性被野蛮、残酷地绑架再贩卖到发达国家和城市地区。

在性、生育和劳动力三者中，女性特殊的生育能力至今都无法被机器所替代的。尽管资本主义号称机器能代替人类和自然，但在追求无限资本积累的驱动下，人只能被作为机器为资本家的经济利益服务。资本主义绞尽脑汁试图通过各种医学、生物和化学等手段模拟并代替女性子宫的整个怀孕过程。但直到今天，无论何种科技、医学手段都无法实现在人体外孕育人类胚胎十个月。资本主义的试管婴儿还需要第三方代孕母亲来完成。所以，生孩子这个任务，终究离不开女性的身体，尤其是具有高受孕率和顺产能力的年轻女性。她们的子宫就在资本主义的广大市场需求下成为了犯罪分子和资本家最大的钱袋子。

第四，为什么徐州丰县“铁链八孩母亲”会引起如此渲染大波?

除了这起人间悲剧野蛮荒唐程度到令人发指外，随之发生的地方政府为维护地方受益集团的利益而采取的一系列荒谬对策更是引起来公众的强烈谴责和愤怒。加之，底层百姓“人如蝼蚁，命如草芥”的地狱生活与巨资光鲜的冬奥会形成了鲜明讽刺的对比。一幅资产阶级国家热衷彰显大国风范、载歌载舞举办全球盛宴而无视百姓死活的王朝末日景象栩栩如生。

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彻底打破了无数人民群众，尤其是小资产阶级，与中国资产阶级之间所剩无几的短期共同利益。作为娶不起媳妇、生不起娃的广大“民不聊生”的中国育龄人群，他们愤怒并痛恨的不是领着社会低保却养了八个孩子的

徐州父亲，而是对当今中国统治阶级，上至中央、下至穷乡僻壤的小县城，纵容并合理化非法买卖婚姻和妇女贩卖在中国各地的猖獗。他们震惊自己忙忙碌碌一辈子，为了高彩礼、高嫁妆，为了所谓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合法婚姻”、“合法生育”需要付出要远高于徐州八孩父亲“犯罪行为”的成本和代价。他们所坚信的“个人奋斗”和与中国资产阶级许诺的“实现共同富裕”和“中华伟大复兴”的幻想被残酷的现实所击垮。

如果在十年前，中国资本主义尚能保证劳动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在十几年内翻一番的时候，这件事恐怕无法引起如此大规模的社会舆论震荡。但当它发生在2022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越来越无法兑现对更多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许诺的时候，问题就严重多了。无论是站在正义、道德、法制的社会角度，还是广大草根群众自身的个人利益角度，这件事都严重挑战了中国资产阶级政权所剩无几的公信力和合法性。人民群众恍然大悟，改开的四十多年来，盛世中国却只是一个巨大的人肉磨坊，资本主义中国根本不存在岁月静好的生活。近几年最直接的生活经验告诉人民群众，他们不但无法享受越来越好的生活，如今连保障基本生活的盼头都成了奢望，还要面对随时随地跌入人生深渊的恶劣生存环境。中国资产阶级许诺的“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望，被改开四十年的残酷而恶劣的现实再次证明它只会是统治阶级的虚假承诺。中国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最后残存的共同经济利益化为了海市蜃楼。

中国老百姓经历了整整四十多年的资本主义磨难，无数人至今仍挣扎在温饱线、甚至朝不保夕。与此同时，人们还被两年的疫情加剧了生活的经济负担和生存煎熬。中国资产阶级还要继续借防疫之名加紧限制人们的人身自由。群众与统治阶级之间的长短期共同利益在世界和中国资本主义的终结危机中越来越少。中国改革开放和私有化许诺的“共同富裕、小康美好生活”的大饼终将化为乌有。在这个资本主义的穷途末路的特殊时代背景下，这件事将成为中国政权合法性的重要转折点，中国广大人民将不再认同资本主义能带来美好生活，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火种将会再次被燃起并成燎原之势吞没中国资本主义。

# 驳陈平“盎格鲁撒克逊匪帮必须被消灭”的狂妄谬论

隐 秘 战 线

陈平老师是中特资产阶级喉舌观网《眉山论剑》节目的老嘉宾了，此人专攻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先后有“打马克思恩格斯的牌”、“2000人民币大于3000美元”、“盎格鲁撒克逊匪帮必须被消灭”等反动言论。今天隐秘战线本人为同志们献上反驳文章一篇，拙作还请见谅！

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和小粉红们，谈美几乎必谈“屠美”，谈日则必谈“屠日”。陈平先生能代表这批名左实右的民族主义蠢货炮灰们喊出“盎格鲁撒克逊匪帮必须被消灭”这一公开叫嚣种族灭绝的言论，实属难能可贵。我等马列毛之真左派，一定誓要将其及类似暴论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诸位视在下手书此言，那必定是认为陈国师此话谬误至极，非批判一番不可了。那好，这就开始。

首先给大家一个引子：二战结束后日本的第一位首相，也是唯一一位皇族出身的首相——东久迩宫稔彦王，在1945年8月28日也就是在内阁组建10天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重建日本之际，首先一亿国民都必须进行忏悔。”

这便是著名的“一亿总忏悔论”，也称“一亿总谢罪”。东久迩此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侵略的诸国引起不满，被认为是战后日本政府有意将战争罪行及其责任——由原先日本资产阶级政府中的军国主义分子、战争发动者及其侵略

政策的狂热追随者，转移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受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戕害毒害的日本人民。

那么陈大国师代表中国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小粉红们，说出“昂撒匪帮必须被消灭”这话，是否有将北美资产阶级灭绝印第安人的滔天罪行转嫁给包括饱受其压迫剥削的全体北美无产阶级人民的嫌疑呢？答案是肯定的。

中特资产阶级从上到下，大到各级头目，中到各级地方政府大小头目，小到在网络上叫嚣“屠美灭日”的各类民族主义小粉红及其精神泛走狗。无一例外不是在串通美国资产阶级，压榨剥削中国无产阶级人民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并将其送之于豢养各类工人贵族与资本主义精神走狗。科学家爱因斯坦就曾说过：“民族主义是全人类的麻风病。”历史上无数自由主义者都曾说过和他意义相近的话，可唯独受到过纳粹迫害的他真正有资格说出这段话（只可惜他后来在看待中国人的时候犯了一样的错误）。

于是忠实追随着中特法西斯专政的小粉红们就这样做出了一件逻辑上堪称神奇的一件事情：将北美资产阶级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之名，强加给全体北美人民——等同于变相在为北美资产阶级日复一日地向中国人民宣传“四亿总忏悔”（美加两国人口合计约为3.5亿，故四舍五入做4亿解）。名为“爱国”，实为“卖国”，转了一大圈发现自己其实是在给自己口口声声叫嚣着要“消灭”的北美大资产阶级卖命，替北美大资产阶级心安理得地甩掉灭绝印第安人的历史责任！

原来如此——宣扬“屠美灭日”，宣扬“昂撒匪帮”就是在为美日两国统治阶级甩脱历史责任：好一个“民族主义”；好一个“中国梦”；好一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原来都是假的，弥天大谎，一派胡言。那既然如此，那为何还要如此煞费苦心地宣传什么“虽远必诛”、“星辰大海”呢？公知遍地走，买办当走狗——老老实实地当美国大资产阶级的奴才不就好了？宣扬民族主义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诸如此类——何必呢？

# 俄乌战争是一面照妖镜
# ——照出了亲帝“左派”的反动本质

隐 秘 战 线

2022年2月24日爆发的俄乌战争是一面照妖镜：它照出了西方帝国主义的脆弱，照出了俄罗斯资产阶级的与时俱进——也同样找出了中国“左派”力量的虚伪乏力，这一次我主要讲最后者。

红中网的同志们，不止一次地，应该说——是无数次地指出了目前中国“左派”的阶级构成、阶级属性，以及其思想倾向。更是明确指出了“让这些‘左派’（包括且不止红皮自由派、左派逆向民族主义者、‘学院派’、小布尔乔亚左派，甚至不乏一些真正的左派等等）在中国革命跟西方在中国发动颜色革命毫无区别”的判断。我完全认同这些同志们的观点，但我还是愿意具体说说这帮“亲帝”左派究竟能在未来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中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以至于我一度要在标题中指出“现在谈革命为时尚早”。

首先教条主义左派需要为目前中文互联网上“左派”几乎一边倒地支持美帝国主义和乌克兰纳粹负责：他们简单地将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视作“高尔察克和彼得留拉的继承者”（请注意是拿2022年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作类比），在立场上采取“谁都不支持”：这种各打五十大板式的伪中立——为后续亲帝左派、自由派和逆向民族主义者将中国互联网上关于俄乌战争的舆论气氛，进一步发酵为无思想和无道德底线地支持乌克兰纳粹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左派和“学院派”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反对中特法西斯压迫无产阶级人民这一问题上采取了相对正确的立场——但其

主要思想问题，如红中网编辑同志们所言：正是“红色瓜伊多”的思想路线问题（中国大陆更多将其成为“联虏平寇”论）。这种错误的思想路线，我本人认为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末毛主席所作出的重返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决定——是这一历史决定所代表的思想路线的极端异化版本。

这种错误思想观点的主要舆论表现有：

1. 仍然相信21世纪20年代的美帝国主义同俄罗斯资产阶级（他们蔑称“俄帝”）相比仍然是具有进步性的；

2. 认为“俄帝”首先“入侵”了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乌克兰——尽管当下绝大多数小布尔乔亚左派反对俄罗斯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大多是基于这一点（事实上该判断存疑），但这丝毫不能掩盖“反对俄帝”的声音自2014年后就已经出现这一事实；

3. 拒绝承认乌克兰“亚速营”是如假包换的纳粹组织——亦或是拿出在俄罗斯早已被取缔的“光头党”（同为新纳粹组织）以试图证明俄乌双方半斤八两，以完全掩盖俄罗斯发动战争的正义性存在为目的；

更有甚者，中特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很遗憾的是这一次小粉红不包括在内），将沙俄侵占中国外东北领土的历史责任扣在了现今的俄罗斯联邦政府身上（然而中特政府早在90年代就与俄联邦政府签订协议，正式划清边界线）——并以此反对俄罗斯向乌克兰纳粹所发动的进攻（叫嚣武力收复外东北领土的，也是这帮人）。

到此为止，是我本人在详细观察了中国国内互联网上关于俄乌战争的舆论风向后，所作出的简要总结。

欢迎同志们讨论！

# 今天的革命青年有今天的问题，但有一点是幸运的

路 石

有一位大学生在某网站转来一个视频链接，[24]接着他写了一段观后感：

视频中的例子多少有夸张的成分，但其实多少也是正确的。我们这一代人被互联网碎片式的娱乐冲击了，大量的无用信息涌进脑子里，根本没有自我思考的能力，甚至是不用去思考，大学前所有生活都是固定的，学习学习休息，休息时间也被互联网碎片化的娱乐占领了。想想我自己也是如此，真的是在接触马列毛之后，强迫自己每天看书，有时候脑子还想想事情，才避免了这种完全“无知”不思考的情况。 但现在问我毕业后要干嘛，我也一样回答不出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习惯了一切道路都被铺好的情况，现在到了自己选择的时候了，有点手足无措。

他的这个帖子引来了不少同龄人的回应。大都是在校大学生，或者刚毕业的大学生，甚至还有留学生和中学生。他们主要分享了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的无可奈何，这些体验我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学生是较少的。

我认为这是一位要求进步的青年，遇到了信仰与现实生存难以调和的矛盾，所以讲了一些自己的老经验。

24. https://b23.tv/FtTVZma

相比于今天的年轻人，二三十年前，我们可算是在黑暗中摸索了。当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革命遗产在分崩离析，资本主义世界在耀武扬威，资本主义中国在高歌猛进；我们更多的是在跟着老同志搞怀旧，而知识精英在打嘴仗，工人阶级在哀嚎。革命没有引路人，事实上也没有一条革命的路径供选择。这一晃就二三十年过去了。

今天的革命青年自然有自己"这一代"面临的问题，但有一点是幸运的，那就是生逢其时——革命事业正在眼前展开了。

我觉得青年在革命道路上有三个因素或者关系要注意处理好，即确立信仰、个人生活以及如何与国家机器打交道。

确立信仰的确是个漫长的过程，不能为了自己一时的精神解脱，像宗教一样功利主义地来对待，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马列理论与社会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简单地说就是逻辑与立场一样都不能少。不掌握马列的科学逻辑，单凭朴素的阶级感情和立场，在我们小资产阶级身上就可能会蜕变为"温情脉脉的伤感"，时不时释放点廉价的同情心，或者满嘴的人民大众，满肚子的自我表现。同样，没有阶级立场只懂点马列逻辑，仅靠救世主情结的神圣发作，通过教化别人而表达自己的存在，一遇到点挫折，便又龟缩进自己的小世界里去了。我建议，无论是解决马列理论逻辑问题，还是解决阶级感情立场问题，都不要用力过猛（过左过右），否则就会左右摇摆，把自己也整得痛苦不堪。当然，也不能时刻算计自己所走的"高尚"道路能不能成功，那是小农意识或小市民意识的算计。其实我的人生经验是这样的：有信仰就已经是幸福的，实现了信仰则是幸运的了！

解决个人生存问题各有千秋，但掌握一项吃饭的技能，我认为对一个人一生还是很重要的。吃饭生存无非就是那么几条，无论是"吃党的饭"（公务员、事业单位或国企等），还是"吃资本家的饭"，自然要在精神上做好"入虎穴"的思想准备，即便是自食其力"自己做老板"，也得有大概率投资创业失败的精神准备。但无论吃哪种饭，还是有一技之长的好，所谓"专"。有了一项能保障自己生存的技能，一便于同亲人处理好关系，二便于进行社会交往。除非你有条件躺平啃老，那就差不多有幸有了职业革命家的待遇了。但是这也不算好，万一革命成功你进了"五七干校"怎么办。所以有了一技之长，你都不怕哪天在政治上被打倒了（敌人钻进内部消灭你也是政治上常有的事）。看看功德林里的国民党高级战犯，你也会明白这个道理。

跟国家机器打交道，今天其实主要就是跟"熊猫"打交道的问题，所谓"喝茶"问题。搞革命是免不了这些的。早有点经验早好，知道警察的厉害，知道警察是专业人士，自己日常就会谨言慎行了，避免将来犯更大的不可挽回的错误。漫画式地理解敌人，其实就是轻敌思想，搞不好自己的革命选择从此会夭折，"jiashi"

领导集团的教训不能不汲取。这么说吧，跟警察打交道，类似于跟医生打交道（都是能够掌控你的专业人士）。在非原则性问题上，你是跟医生斗智斗勇交个朋友好呢，还是直接起冲突有利于自己呢？这方面主要靠经验的积累，今天没法细细说来。

总之，这三个问题，对社会经验欠缺的年轻人来说，哪一个处理砸了，说严重点，都可能使自己选择的道路夭折。

跟帖中有青年表示自己最大的问题是面对网络世界“不能自控”、“管不住自己”，因此脚下一片漆黑，未来茫茫，同时被“孤独”所折磨，需要“前辈指点”。

“前辈”只不过没有如此严重，其实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哪有灵丹妙药给予“指点”呵！痛苦产生思想！只能分享点经验了。

跟青年们分享走向马列道路的体验，太棒了！我们做前辈不敢当，多吃了些盐巴，多一些失败的经验罢了。

资本主义生活对我们每个人，就像幽灵一样，每时每刻都在告诉你，只看眼前，只关注个人，这是个客观事实。

我个人的经验，完全排斥它，就会陷入孤立；时刻抗拒它，会疲惫自己。有点像当今中国抗疫中的“清零政策”。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状况和条件，辩证地处理好它。

有一种方法可以一试，这就是别让生活操控自己，要设法获得主动权（毛泽东《矛盾论》的核心思想）。这其实也是个哲学问题，所谓登高望远。根本一点，就是对过去、现在和未来，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把资本主义看成为一个历史过程，谈不上恨它也谈不上爱它，就是要批判它消灭它罢了；同样，社会主义也是个历史过程，只不过是我们向往的一种美好社会，用自己的一生去争取实现它就是了。

一个（孤立的）人对抗资本主义，争取社会主义，大概率会成为唐吉可德。还是跟对革命有共同兴趣的人，一起探讨交流，既可以避免孤单，还可以增强信心，同时也会乐在其中。

有一位大学毕业已经四年的青年A给大家分享了他亲身经历的一段很生动的材料。说的是，他“出大学工作第三年认识一位工人非常典型是单身汉，2020年用全部积蓄炒股赚了20多万，这些钱连同积蓄全都都打赏给了女主播。你说他好色吧，其实现实中都羞于与女性交谈。人家女主播夸了他几句外加微信私聊甚欢就自以为找到了真爱，结果现在身无分文出来打工。”最后表示“看着一些勇敢xx的前辈陷入xx之灾，我感觉到无力感。”

我意识到他在说某个工人的事的时候，实际上也反映了他对这个工人的矛盾心理。所以我又不忘自己的老经验，跟帖发表了自己感悟“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几十年的一点体会：

我个人的经验。在接触工人的过程中，要时刻注意区别单个工人（特殊）与工人阶级（一般）的不同，不能用单个工人的行为品质套在工人阶级身上，也不能用工人阶级的一般品质要求某个工人。观察研究方法还是要遵循毛主席说的，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规律。

另一位大学生F回应大学生A说：“这种无力感我也有。我们说要对革命前景抱有信心，回到现实总是一地鸡毛。”

我当年在学校时，因为跟其他同学缺乏共同语言，所以就只能“跟死人交往”——读书。读得有些偏，老想找到革命的路径，研究游击队，尤其是切·格瓦拉。理论上主要读托派的东西。读的过程中，切·格瓦拉给我的是头脑中一片革命的风暴，托派的东西给我以狠狠地批判现实社会主义的快感，放下书本回到现实，就是你们说的“无力感”，茫然不知所措。今天想来，这当然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状态啦！

记得有一次去问魏巍，怎么搞革命，怎么去组织。他当然也没有现成的答案。但他说，那你只能去找工人问问了！我真的就去到工人那里寻找答案了。放下书本，把工厂当成我的度假地了。

00后甚至更年轻的青年开始在痛苦中成长了！

# 《要善于想象革命——红色中国网文选》导言

远 航 一 号

**编者注**：有热心网友将红色中国网的部分文章编成了一个集子，并希望远航一号同志撰写导言。下面是远航一号为文集撰写的导言。

感谢热心网友的帮助，将近年来红色中国网上发表的一些文章，编成了一个集子，供进步青年研究和讨论。

近年来，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年不堪忍受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向往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新社会，初步走上了马列毛主义道路。加入了进步工作行列的青年，在开始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确立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以后，很快就会遇到一系列实际问题。

在一个“正常运行”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掌握着生产资料，掌握着国家机器，经常地镇压着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又控制着一切媒体和宣传手段，可以经常操纵舆论，此外还利用高科技手段建立起似乎无所不包的监控网络。作为中国的马列毛主义者，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面对着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占据着全面压倒优势的资产阶级，中国的无产阶级为什么有朝一日会取得胜利呢?

是的，无产阶级当中的优秀分子以及初步接受了马列毛主义并决心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的青年有着革命理想的感召、有大无畏的斗争精神，以及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决心。没有这些感召、精神和决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能够胜利

的。但是，仅仅靠感召、精神和决心，要推翻包罗万象的资产阶级统治的庞然大物，却是远远不够的。如青年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可以摧毁中国资产阶级统治的物质力量在哪里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世界上还没有完全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严格来说，自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一次真正经典意义上的、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往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无论是欧美国家工人阶级的斗争，还是日韩台等国家和地区工人阶级的斗争，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斗争，都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决定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工人阶级以往斗争的历史，虽然足以作为我们的借鉴，但却决不值得我们效仿。

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中国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也不能简单地照搬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曾经走过的道路。具体来说，未来中国无产阶级争取斗争胜利的方式，既不会是通过城市工人武装起义的方式，也不会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持久人民战争的道路，当然更不会是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庇护下“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那么，中国无产阶级斗争通往胜利的道路到底在哪里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既需要理论上的探索，更需要未来实际斗争的检验。这本文集中的大部分文章反映了红色中国网的编辑和网友在过去几年中对上述问题思考与摸索的初步结果；还有一些文章，则反映了我们对当前国内外若干重大问题的看法。

概括来说，红色中国网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个专门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国家。中国资本主义的这一特点，一方面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在中国造成一个数量庞大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而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必然向资产阶级提出广泛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另一方面又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将无法在满足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广泛要求的同时维持中国资本主义正常积累所需要的各项基本条件。由于中国资本主义无法在其自身制度范围内克服这一基本矛盾，中国社会的这一矛盾在不远的将来只能以无产阶级革命、超越现存社会制度的方式来求得解决。

在这一文集中，“要善于想象革命”、“试论无产阶级持久战”等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中国作为半外围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仅决定了中国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而且决定了其必然性这一基本观点。

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怎样认识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或者说特殊性。近年来，在部分左派青年中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垄断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国家”。红色中国网认为，如果中国果然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那么不仅不会为中国无产阶级的

解放创造条件，而且还会在可预见的将来堵死通往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切可能性。这一文集中的“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吗”、“二十一世纪的帝国主义问题”等文章批判了那种认为现在的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的错误观点。

目前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很可能标志着美帝国主义霸权崩溃的开始。红色中国网认为，在美国霸权崩溃后，不会再有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其它一个大国能够代替美国成为新霸权。因此，美国霸权的崩溃很可能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崩溃。在这篇文集中，“俄乌战争三个月的军事总结”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俄乌战争前三个月的军事进程以及国内外各个政治派别在战争初期的表现做了评价。

在经历了过去几个世纪的全球资本积累以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推到了崩溃的边缘。环境矛盾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最重大的矛盾之一，也是未来社会主义不得不面对与解决的问题。在这一文集中，“资本主义和环境”、“资本主义和气候灾难”等文章论证了只有超越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民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才能实现生态可持续性。

与其他许多进步小组类似，红色中国网的编辑部主要由初步接受了马列毛主义的进步小资产阶级成员组成。虽然我们努力学习马列毛主义，努力向无产阶级立场靠拢，但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活生生的个人，我们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小资产阶级的各种缺点和毛病，存在着好高骛远、纸上谈兵、骄傲自满、理论脱离实际等小资产阶级的通病，此外还不可避免地受到个人见识、水平、经验、履历的限制。凡此种种，都决定了这一文集中的各篇文章必然有种种缺点和不足。我们诚挚欢迎各位读者向我们提出意见、建议和批评，为促进中国马列毛队伍认识水平的提高而共同努力。

# 疫情正在大大加强无产阶级的力量

普 通 人

有一个帖子问：疫情时代的社会变化对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造成什么影响？我的看法很明确：目前中国的疫情形势正在大大加强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以下从各个方面谈谈我的观点。

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明确一点：当前中国的疫情形势究竟如何？自从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到现在已经两年半了。这两年半的疫情时期，我们可以将之划分为三个时期：疫情初起期（2019.12-2020.2）、全球扩散期（2020.3-2021.11）、变异新时期（2021.12-2022.7）。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疫情以来中国的整个历程。

## 危机·疫情初起（2019.12–2020.2）

2019年12月底，新闻播报武汉市发现了不明原因的肺炎，看到新闻后，我并没有把它当一回事，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很快就会过去，心里想的都是元旦该怎么过、之后的春节准备怎么过，完全想不到病毒会大规模扩散开来，甚至蔓延到全世界，产生的疫情几年都结束不了，那时大部分人的想法也是一样。随着感染人数的不断上升，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非典又来了”，然而第一批传出讯号的以李文亮医生为首的“吹哨人”却落得一个遭到公安机关训诫的下场。显然，这样的做法丝毫无益于阻止病毒的传播。面对瘟疫的肆虐，政府进退失据，举止失当，卫健委主任一问三不知，“可防可控”的说辞在“破防失控”的事实面前显得不堪一击。政府的所作所为无时无刻不在诠释一句话：“治不了病毒还治不了你？”

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愤怒不断累积，政府的公信力则日渐下降，李文亮的死，成为了引爆这个定时炸弹的最终导火索。在网络的各个角落，人们自发地悼念李文亮这位为全中国拉响警报的先驱，同时冲破舆论监管的阻碍，肆意地抒发对政府的不满，抨击专制的黑暗，表达对自由的向往，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浪潮。毫无疑问，这是政府在借助民族主义统一舆论场之后遇到的第一次真正的危机，病毒以其迅猛的扩散同时在政府的卫生防线和宣传防线之上凿出了一道裂痕。

## 变局·全球扩散（2020.3–2021.11）

面对病毒和舆论的双重冲击，政府被迫祭出了两大法宝，一来转移矛盾，把湖北市委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免了职，制造出一种“中央还是好的，只是下面搞坏了”的假象来迷惑不明真相的群众；并在宣传上塑造钟南山为孤胆英雄、突出援鄂医护奋不顾身、大公无私的精神，凝聚人心力量；二来先松后紧，给群众一个情绪的宣泄口，随后将相关言论尽数抹杀，限制舆论的进一步发酵。同时调动全国力量，用封城这种物理隔离的方式切断病毒的传播路线。这一招确实收到了成效，感染人数被控制在十万以内，自疫情爆发以来，第一次形成了对疫情的初步控制。正当政府寄希望于时间能够抹平一切，让舆论场回归平静之时，一场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变局正悄然展开……

2020年3月，意大利出现新冠疫情，形势迅速如干柴烈火般不可遏制。不久，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印度、巴西……世界各国相继沦陷。这标志着新冠肺炎已完全超出了非典的范畴，由中国国内的疫情上升至全球范围内的疫情，新冠病毒也不是从中国传播至各地，而是早已潜伏于世界各处，其起源至今难以测定，说法不一。但对政府而言，最重要的是病毒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国内的大范围传播，彻底摧毁了“民主是治病良药”的神话，“新冠病毒在美国流行不起来”的论断不攻自破，成了茶余饭后的笑话。形势的巨变，对政府无异于是一根救命稻草，帮助政府在宣传上吹响了反攻的号角。疫情在国内得到良好控制，除了出门要戴口罩，其他和疫情前别无二致，也不影响正常的生活，反观国外则是一片水深火热，感染人数迅速突破了十万大关，直奔百万而去，死亡人数也是一发不可收拾。这样强烈的反差，成为了政府在宣传上最好的武器，成了他们口中“制度优势”的最大体现，可以堂堂正正地宣称自己“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而宣扬西方民主自由的公知则像臭狗屎一般被所有人避之不及，他们之前的言论也沦为笑柄。疫情初起时的混乱与无序迅速被所有人遗忘，化为不合时宜的“不正确的集体记忆”。9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鼓掌声中，所有人都确信，中国在抗疫上已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进入2021年，距离疫情爆发已过去了一整年，类似“病毒会自行消失”、“天热了病毒就会消亡”这样的传言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奢望，指望疫苗来终结病毒传播的想法也被证明是一种高估。在新闻联播中，国外依旧水深火热，中国的经济则因外贸出口的火爆而加速恢复，“风景这边独好”成了新常态。社会热点依旧频发，不断吸引和转移着人们的注意力，而关于疫情的新闻已经乏人问津，毕竟没有人会天天关心美国又病死了几个，只剩下瑞丽这样的边境小城在沉默中苦苦支撑。新冠病毒的变种一个接着一个，阿尔法、德尔塔、拉姆达……人们沉浸在生活恢复正常的憧憬之中，为挑起肩上的重担而奔走劳作，没人知道奥密克戎的到来意味着什么。

## 急转·向何处去（2021.12–2022.7）

### 壹—卷土重来

就在疫情渐渐淡出人们视野之时，新冠病毒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存在感。2021年底，变异后的病毒让疫情在国内重新爆发。12月23日，西安封城，这是继2年前武汉封城以后国内第二个封城的大城市。封城期间，有人为了吃上一口饭，出门买馒头而遭到殴打；有人因为买不到卫生巾而崩溃痛哭；有孕妇因为无法及时就诊而流产，有病人因为无法入院而心梗死亡。一件件血淋淋的事实，唤醒了国人沉睡的记忆。1月24日，西安解封，但人们对动态清零无往不胜的信念已开始动摇。在各路媒体的反复宣传之下，人民选择相信，相信这只是个例，相信这些悲剧的出现只是因为西安政府的无能，相信悲剧不会一幕幕地重演，相信动态清零对病毒仍然有效，相信封城离自己还很遥远……

### 贰—愈演愈烈

德尔塔的威力，让西安停摆一月有余。正当人们喘息稍定，用春节的喜庆冲散了疫情的阴霾，奥密克戎却在不知不觉中接过了德尔塔的接力棒，这次它的目标是上海——这座被树立为防疫标杆的金融中心城。以华亭宾馆为起点，不到半个月，3月中旬，上海被迫开始封闭小区。尽管政府发言人一直强调“上海不会封城，也没必要封城”，但当许多人还在家中翘首以待十四天期满之时，却传来了浦东浦西分批封控的“鸳鸯锅”式安排。在官方通告中，封控的期限被定为3月28日至4月5日，但直到时针指向4月6日零时，人们才发现自己等来的不是解封，而是感染人数的急剧上升和封控期限的无限期延伸。

一声令下，全城静止。曾经车水马龙的街道瞬间变得空无一人，生活的气息消散在刺鼻的消毒水味之中，只有身穿防护服的“大白”忙碌地东奔西走，好像在向外人诉说这座城市还没有陷入死寂。前景晦暗的日子里，人们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何时解封。没人能给出答案，因为谁也不知道。大数据精准防控的利器，在奥密克戎面前显得那么软弱无力，仿佛一把沾满尘埃又浑身锈迹的重剑，已不复往日的辉煌。买不到高价菜，人们靠着居委会发的救济食品勉强度日。有多少人知道，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那些悲剧正在一幕幕的重演……

没有人发声，是人民麻木了吗？不，人民不会麻木！个人的声音是渺小的，集体的声音却是洪亮的，看——每个人自己的声音，汇聚成了共同的话语，它叫做四月之声！它回荡在每一个角落，让每一个抱有良知的人感到振奋，却让反动的统治者感到恐惧。四月之声很快被封杀了，但它所代表的精神却在人们的心中长存。这是无产阶级的反抗精神，这是人民群众的正义之声，永远不会被磨灭。

面对地铁上邀功请赏的记者，阿姨笑言：“坐地铁今天特别高兴，因为封了将近2个月了，自从我出生到现在还没有受过这样的日子，天天关在家里不能出去，真是天大的笑话！”面对强制要求入室消杀的防疫人员“影响三代”的威胁，小伙子怒道：“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寥寥数语，说出了无数人的心声。这是我们中国的人民，既有反抗不公的勇气，又有苦中作乐的毅力，虽然不显山露水，却潜藏在每个人的心中。自由的思想，永不受言论牢笼的禁锢!

## 叁—藕断丝连

五月底，随着新增感染人数的进一步下降，上海政府终于发布了6月1日全面解封的消息。也许是封城对经济的打击过于沉重，政府没有等到社会面清零，就急匆匆地宣布了解封，而这也给解封蒙上了一层阴影。果然，人们没有等来正常生活的恢复，却等来了“凭3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记录出入公共场所”的通知。考虑到检测所需的时间，这实际上是要求所有出门的人必须至少两天做一次核酸，而即便是闭门不出的老人，也受到“7天内无核酸检测记录即赋黄码”的严格限制。由于防疫政策的层层加码，许多人被迫每天做一次核酸，甚至一天做两次核酸（上班做一次，下班回小区在社区大筛中再做一次），才能保证自己的正常出行不受影响。为了转嫁防疫成本，许多单位强迫职工签下了《两点一线承诺书》，保证自己每天行动轨迹两点一线，任何时候不得前往除单位与住处之外的其他无关场所，否则将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就这样，人们正常生活、娱乐的自由被剥夺，手脚被套上了无形的枷锁，陷入无尽的囚笼之中。任何人稍有不从即有可能被扣上妨碍防疫的帽子，被暴力机关课以寻衅滋事的罪名。

在这种肃杀的气氛中，人人都害怕得上新冠，但已无人惧怕病毒本身，而是害怕一切随之而来的附加措施——被强制拉去方舱隔离（如果家里有老人、孩子，该怎么办？）；工作将会丢掉，而且很难找到新工作，因为感染记录将会和你形影不离，用人单位一句“阳过的不要！”就能将人拒之门外，也把求职者“判了死刑”；如果不幸被安排了入室消杀，则要做好所有家具报废的风险。走在路上，随处可见身穿白色防护服、头戴特制防护面罩的防疫工作人员，仿佛“白色恐怖”已然死而复生。可就在这样的紧张形势下，政府竟然恬不知耻地在所谓的“党代会”上宣布已经打赢了“大上海保卫战”，而当天的日增人数也十分配合地定格在了“0”。会场上，任凭高官们如何大言不惭“党中央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是完全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 但大街小巷中，没有一个人感到欣喜，也没有人自发起来庆祝“抗疫的胜利”。面对虚假的盛世、粉饰的太平，人民群众用行动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做“该配合你演出的我视而不见”。

几番隆重之后，一切照常进行。只是这人造的“清零”，拥有的却是转瞬即逝的保质期。宣布胜利的次日，感染者再次出现，而且颇有触底反弹之势。一时间，“流调”、“溯源”、“传播链”又如走马灯一般纷至沓来，让人目不暇接。各类传言亦是不胫而走，盛传上海将在高考中考之后二次封城，不少人甚至已提前做好了准备，抢先一步囤粮、囤菜、囤物资。事实证明，预料之中的二次封城并未出现，而是以封街道的形式化整为零，但这样小小的变化，已无法在陷入麻木中的人们内心中掀起任何波澜。曾几何时，人们竟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不戴口罩似乎成了遥远的历史，做核酸、抗原和吃饭睡觉上厕所一样，成了司空见惯的常事。解封之后，常态化核酸的期限从6月30日延伸至7月31日，又再次延伸至8月31日，没有人怀疑，这样的日子会一直延续下去，而疫情前的生活将一去而不复返。面对政府的朝令夕改和政策的反复无常，人们似乎和网络流行词一样“躺平”，而在表面的平静之下，人民的怨气和社会中的戾气，却正悄悄地累积……

## 回首·成败萧何

顺着疫情的时间线，我们能明显的感受到【失败—胜利—失败】这条清晰的脉络。在新冠病毒带来的猛烈冲击下，政府应之以封城为例的大范围强制性物理隔离措施，命名为“动态清零”，并一度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被视为应对疫情的唯一正确答案。然而，形势从来不是一成不变。在致命性大大减弱、传播性大大增强的变异新毒株取代原始毒株，成为大流行的主力之后，“动态清零”逐步跌下神坛，从牢不可破的盾牌，衰退为千疮百孔、四处漏风的屏障。随之而来的，则是呼吁“共存”的声音甚嚣尘上。究其根本，在于清零与共存的成本高低。为何去年

就听不到有人呼吁共存，不到一年，形势就接近逆转呢？很简单，因为动态清零能够有效地应对第一代病毒，除去少数边境小城之外，全国各地的绝大部分居民只需在出门时戴上口罩即可，无需核酸抗原，也不用封城封小区，这对生活的影响尽可忽略不计。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此时清零的成本远低于共存。

然而，在德尔塔、奥密克戎等新型变异毒株的侵袭下，形势瞬间发生巨变。单靠口罩已无法阻碍病毒的传播，疫苗也被证明难堪大用。如果仍旧以不变应万变，用物理隔离的方法去应对高传染性的新病毒，那么动态清零的成本必将直线上升，不再局限于一城一地，而是多城、多地、长时间的隔离，核酸抗原也从按需检测改为每天必测，这些都将带来人力物力的巨大消耗。相反，无力用强制手段遏制病毒传播的其他国家则从病毒致命性的大幅减弱中受益良多，各种活动都接近恢复正常。此消彼长之下，清零对共存的绝对优势已荡然无存，其成本也不见的比共存要低（我认为目前已高于共存）。但转折毕竟来的太快，对上，政府还完全没有做好政策转向的准备，去年对西方国家共存疾风骤雨般的批判言犹在耳，一旦转入共存，根本无法对内自圆其说；对下，由于去年清零政策对共存占据绝对上风，许多人还不愿意相信动态清零这么快就会不合时宜，还认为目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只要把清零坚持下去就能渡过难关。因此，清零与共存的争议爆发显然是势所必然，而政府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引下，惧怕舆论阵地会陷入混乱，从而产生失守的风险，一定会把清零这条线死守下去。

之前，我曾经支持过清零政策，但在当前形势下，坚持清零已然失去了正义性与合理性。清零的支持者，很喜欢说“你家没有老人小孩吗？”暗示共存将会使得大批老人和孩子死亡。乍一看，似乎是有道理的，但只要经历过这种清零政策就知道这说法根本站不住脚。从逻辑上讲，如果共存将会使得大批老人和孩子死亡，而清零又要优于共存，那么清零政策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就应该能保护老人孩子的生命健康不受威胁才对。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就我个人身边接触到的情况，就有两位老人在封城期间因为药物得不到及时补充、或发病得不到及时救治而去世（我的生活圈并不大）。在官方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中，也提到一个案例：一位罹患癌症的老人夜间发烧，历经各道手续后，终于坐上了救护车，但救护车在城里转了一圈，也找不到一个能够收治的医院，即便驾驶员多方联系也无济于事，最终不得不将老人送回了家中。纪录片至此就戛然而止，这位老人最终结局如何，是否挺过了这一关，我们无从得知。但综合各方面信息（包括泄露的电话录音），可想而知这样的案例不会是个例，遭遇类似情况而没能挺过去的病人也不会是少数。封城时期，家里的老人也遇到了药物短缺的问题，所有自己买药的通道全被堵死，网络求助平台是摆设，居委会志愿者帮忙买药，时间长不

说，也不一定能买到指定的药物。好在慢性病并不致命，把药物减量，也就挺过来了，但有些老人、病人可就没那么好运了。

有些清零支持者还会颠倒黑白，硬说“付出这些代价都是不坚持清零，非要共存的后果”，认为上海要是能早封城几个星期，就能把疫情控制住，就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试问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不再封城一两个月，等病例彻底清零了，再彻底解封，而是要在没有彻底清零的情况下匆忙解封，造成目前疫情反反复复，既不能彻底清零、不能控制住疫情，又不能彻底解封，让人民恢复正常生活的混乱局面呢？如果真像有些人所说的“中央都是好的，只是上海的共存派搞坏了”，那么他们心心念念的中央为什么不把上海的官员撤职查办，而是继续让这些人指挥下去呢？显然，相对于某些清零支持者的“要清零不要经济”，特色政府的想法则是“既要清零又要经济”，而既要又要的后果就是病毒不能清零，经济反倒清零了。

只有亲身体验，才能切身体会到目前的清零政策已经无以为继。如果用两句话来形容，就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任凭官媒再怎么鼓吹“动态清零不影响经济”、“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也只能用空洞的党八股反复强调“动态清零就是好、就是好”，但封控对物流业、餐饮业、旅游业的毁灭性打击是谁都无法视而不见的。不只是这些行业，只要人员出行、物资流通还受到严格的管制，经济活动就不可能不受阻碍。而在经历了连续数月的封控、筛查后，无论是防疫工作者还是广大普通群众都早已身心俱疲，毕竟没有人的神经能够一直紧绷。核酸检测开始敷衍了事，棉签不深入咽喉，而是在舌头上刮两下完事；公交车、饭店的场所码没人扫、也没人管；凭核酸检测领取出门证，但保安并不会查……这样的动态清零，早已成了“假清零”，根本不可能起到决策者所指望的效果。

三年抗疫，政府靠动态清零走上巅峰，又因动态清零而跌下神坛，陷入无尽的深渊。一切恰似一个轮回，正应了那句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而对失去政权的无产阶级来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才是最真实的写照……

## 终章·危机共存

化解了疫情初那场危机，政府恐怕没想到，这么快就会陷入一场新的危机之中。但眼下他们所要面对的，并不仅仅只有疫情而已。人口提前十年进入负增长，房地产行业面临萧条甚至崩盘，土地财政走到尽头，地方政府陷入财政危机……这些苦果无一不是他们自己在多年以前亲手埋下的。又应了列宁的那句话：**“资产阶级会出售绞死自己的绳索”**。种种迹象，无不显示着资本主义正常发

展的时期即将过去，无论政府使用什么金融手段，都无法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总爆发。所谓“软着陆”，只存在于一小部分人的幻想之中。

政府用经济增长来掩盖的一切问题，在经济停滞时都会一并显现出来，因为它们从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疫情只不过起到了临门一脚的作用。自从疫情爆发以来，许多人的生活质量出现了肉眼可见的下滑，反映到经济上就是消费数据的长期萎靡不振。对老百姓来说，好日子不在后头，反而要做好勒紧裤腰带的准备。从革命乐观主义的视角来看，这会大大加强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首先是一大批小资产阶级（即中产阶级）将会在阶级跌落的大潮中降为半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从而使无产阶级的人数大大增加，阶级力量大大增强；剩余勉强维持住自己地位的小资产阶级，他们阶级上升的美梦也会被现实打得粉碎，从而在情感上倾向无产阶级；原来无产阶级中相信努力奋斗能够改变命运的人，大部分也会放弃幻想。这对我们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将十分有利。

其次，毛主席曾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无产阶级中，长期存在着分不清敌我，认敌为友的情况，一部分是因为现实情况的迷惑性，一部分是被特色政府的大力宣传所迷惑。小资产阶级则处于自身地位而显现出很大的摇摆性，时而倾向于无产阶级，声讨资产阶级的剥削，时而又倒向资产阶级，为他们摇旗呐喊。在疫情和经济下行的叠加影响下，这些情况都将发生对无产阶级有利的转变。我之前曾提到过，由于财政状况的恶化，资产阶级将不得不撕下自己温情脉脉的面纱，露出凶恶的獠牙。如河南村镇银行事件，政府先是给储户赋红码，意图把上访扼杀在襁褓之中；储户发起游行示威后，又出动大批便衣警察武力清场。看起来，这是政府强大实力的体现，但实际上，几十年来，政府一直拥有着这样的力量。因此，当政府不需要动用这股力量，就能实现维稳的目的，才是政府强大实力的体现。反观这一次，政府被迫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再动用违法的手段，标志着情况已脱离了他们的掌控。储户虽然受到了暴力的镇压，但他们的牺牲不是无意义的，而是让全国人民都看清了政府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代表资产阶级利益，而对无产阶级人民群众视为寇仇、野蛮镇压的反动立场。某种意义上，这次的河南村镇银行事件与四年前的佳士事件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只是这一次的影响更大，涉及的面更广。不难想象，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总爆发日益临近的大环境下，这样的事件绝不会是最后一次，而每一次类似事件的爆发，都会让更多无产阶级醒悟过来，认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同时有利于马列主义的宣传，无产阶级的大联合将指日可待。

社会主义大厦不是一日建成的，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乃至世界的资本主义势力还不会立即土崩瓦解。但敌人正在一天天烂下去，而我们正在一天天好起来，这绝不是痴人说梦。也许清零与共存的争论还不会在短期内消弭，但资本主义的“危”，蕴藏着的是无产阶级的“机”。我们不怕和资产阶级比耐心，因为资产阶级的力量正在逐步削弱，而无产阶级的力量则在一步步增强，无产阶级的觉悟正在日益提高。也许目前我们的力量还很弱小，但形势有利于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同志加入我们，我们的组织会进一步壮大。资产阶级可以镇压某一个人，也可以镇压一部分人，但绝不可能镇压得了整个无产阶级，正如夏明翰所言“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毛主席说过：**“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无产阶级不会忘记斗争，更不会放弃斗争，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期待中国红旗遍地的那一天！

# 关于佩洛西访台后公开宣传方针的建议

远 航 一 号

据悉，美国众议院议长定于8月2日访问台湾，并拟与台湾当局领导人会面。

此次佩洛西访台，又一次证明，在一切重大国际问题上，中国资产阶级及其领导人都是不折不扣的“纸老虎”；又一次证明，中国资本主义既不会成为帝国主义，更不会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霸权；又一次证明，与俄罗斯资产阶级与美欧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深刻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不同，中国资产阶级与美欧资产阶级之间仅有着局部的、可调和的矛盾。

此次佩洛西访台，也从侧面证明了，过去若干年来，红色中国网编辑部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重大国际问题、中国资产阶级的内外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的分析和判断，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25]

2015年2月，远航一号就说过：“中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不仅没有冲突，而且高度一致。这就决定了，不仅在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战争，即使是在中国和美帝的仆从国（如日本）之间，也不会爆发战争，甚至连武装冲突都不会爆发。”[26]

2016年4月，远航一号又说：“在中国资产阶级方面，除了他们个人之间已经与美国资产阶级发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外，就其阶级本性来说，它的财富和权力的基础，是维持住世界主要制造业出口国的地位。”“相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和根本利益，相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大局……中、美资产阶级或者中、日

25.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24777

26.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29919

资产阶级或者陆、台资产阶级是决不会为了这些枝节问题而闹翻天、撕破脸乃至大打出手的”。

佩洛西访台之前，中国资产阶级曾经开动宣传机器，大造舆论，声称中国武装力量不会“坐视不管”，威胁要用武力手段阻止佩洛西访台。所有这些，现在都已经证明是虚张声势、毫无底气的恫吓。此次中国资产阶级纸老虎真实面目被戳穿后，对中国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将在精神上造成一次大的打击。尽管其中一部分人仍然不可避免地要找出各种理由为自己在精神上求得安慰（比如说中国空军的飞机绕飞台湾，突破了以往的先例，云云），但实际上在内心中对于中国资产阶级到底有多少“大国威望”也不能不发生怀疑。

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除了是中国资产阶级自欺欺人以外，还是中国资产阶级对于作为其主要社会基础的小资产阶级的郑重“承诺”。其实质是，许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只要他们听从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地位不断上升，中国小资产阶级的地位也会跟着水涨船高，早晚像今天的美欧小资产阶级一样，坐到一个阶级之下、万个阶级之上的地位。所以，只要我们有效打击了中国小资产阶级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仰，就是严重动摇了中国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合法性，就是在精神上摧毁了它的一个主要社会基础；而只要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倒向了无产阶级一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把握就大大增加了。

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有一些关于台湾问题在公开宣传时可以采用的办法，作为建议，向各位马列毛网友提出，供各位同志在公开宣传工作中参考（以下第二至第六点，特意采用了利于民族主义分子理解的语言，回避了马列主义语言）：

第一，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朴素爱国感情，适当利用大多数小资产阶级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幻想，坚决不理睬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分子、托派关于所谓反对“中美帝国主义战争”的鼓噪。

第二，在一切公开场合，大力宣传，如果没有祖国统一，就不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就不配成为大国、强国；一个连自己领土都收复不了的国家，无论撒多少钱，在国际上都不可能有真正的威信。

第三，在一切公开场合，大力宣传，无数事实证明，只要中国不敢和美帝决裂（断绝经济贸易往来并准备打仗），美帝和台湾当局必然不断地试探并突破中国的“底线”，从而中国的所有所谓“底线”最终都是笑话，从而台湾必然一步步走上独立；或者即使形式上不独立，事实上获得越来越广阔的国际空间，从而使得“一个中国”成为众所周知的“皇帝的新衣”、全世界的笑柄。而一个作为全世界笑柄的领导人，是不可能成为世界领袖的。

第四，只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特别是坚持“对外开放”以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永远不会有勇气、有胆量与美帝决裂。因为只要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向外国资本敞开大门、只要各级政府一心为“企业家”服务并且靠着“招商引资”过日子的状态不改变，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就必然与美帝以及国际资产阶级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必然害怕打破既得利益、坛坛罐罐，就必然万分害怕打仗！

第五，只要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与美帝以及国际资产阶级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他们万分害怕打仗，中国有再多的航母、先进战斗机，都必然像大清北洋水师的定远号一样，是昂贵的摆设、无用的废物！中国就永远不要指望收复台湾、国家统一！

第六，为了实现祖国统一，为了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全面、深刻地反思改革开放。在过去一个时期，改革开放对于让中国“富起来”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现在，国际形势波谲云诡，世界不再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而是进入了霸权衰落、群雄逐鹿的大争之世。在这样的大争之世，“改革开放”、“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已经不再适合当前形势的需要。在新的形势下，一切都要服从于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经济要服从于政治，市场要服从于计划，私有制要服从于公有制，资本要服从于“党的领导”。没有这样的根本转变，经济体量再大，按货币计算的财富积累得再多，都是毫无意义的！只有把已有的经济体量通过公有制、计划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有效地转变为世界上的影响力、威慑力，中国才能在已经来临的大争之势中不被甩在后面，不被开除“球籍”！在当今世界上的“春秋战国”中，中国要做耕战一体的秦国，而不要做徒有富饶的楚国，要做“虽远必诛”的汉武帝，而不要做GDP天下第一却不能保护自己子民不被外族凌辱的弱宋及大清！

以上是关于公开宣传的建议部分。总之，我们的公开宣传，要有利于动摇中国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合法性，动摇乃至摧毁小资产阶级对于中国资本主义许诺的“伟大复兴”的幻想，迫使小资产阶级在民族主义迷梦与“改革开放”之间做出抉择，促进越来越多的小资产阶级不仅在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中日益感到绝望（蒙受资本家“996”式的剥削和压迫、沦为房奴、丧失“阶级流动”的通道）而且对于“民族复兴”的大饼也日益痛苦地认识到可望不可及甚至既不可望更不可及。要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既得不到“小民尊严”，也看不到“星辰大海”！

只有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彻底绝望的小资产阶级，才会向无产阶级求援，背叛他们与资产阶级的同盟，并下决心接受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

以上不成熟意见，欢迎各位同志讨论、批评。

# 亲新自由主义“左派”是传统自由派的政治继承者

井冈山卫士

最近在和大家的交流中我有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大家可以一起讨论批判。

在上个十年间，中国小资产阶级中政治上活跃的部分逐渐显露出了三种倾向。亲近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派倾向，依靠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爬升的民族主义倾向，以及希望以革命手段推翻中国资本主义的左派倾向。现在在网上流传的“兔左神”大战，实际上远航一号至少在七八年以前就已经系统论述过。

在最近的几年中，公开的自由派因为其利益与一般人民直接敌对，又不能提供任何意义上的政治解决方案，已经逐渐从公开场合退出，逐渐堕落为品葱里面的空想资本主义者，甚至走向低幼化纳粹化。有必要提一句，资产阶级官方从未认真镇压过自由派，正如他们从未认真镇压过田园女拳一样。左派和民族主义派在薄熙来事件之后走向分裂，并逐渐形成逐渐对立的两派，大概在佳士运动时期彻底走向对立。左派批判“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批判“左派带路党”大概都是这个时期的事情。

自由派的政治代表虽然边缘化了，但是自由派的阶级基础并不会随之消灭，反而会在其他派系中以某种形式表达出来。自由派的阶级基础是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联系紧密的资产阶级主流和多数上层小资产阶级，其群众基础是依赖某种自由市场（在劳动力市场反对国企“特权”，在商品市场反对国企和政府“垄断”，在政治市场反对官僚“专制等”）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其预备队，如多数学生（反对”教育制度“）。这些阶级利益的直接指向是在政治上实现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在经

济上反对”国企垄断“（并不包含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内容），在文化上实现完全自由开放，在对外政策上奉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外交（他们自然看不上俄罗斯、朝鲜、伊朗），反对现实主义的”权谋“等等。

自由派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倾向在左派队伍里很早就有反映。早在十几年前，就有出身于文革造反派的左派宣扬”二次革命论“，主张首先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帮助”自由“资产阶级打败”垄断官僚”实现政治民主，然后再在议会中徐图社会主义大计。在当时，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甚至还不是纯血统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某种“特色资本主义”，“封建社会”，“极权官僚社会”等，这些观点在2018年的第一次“中帝论”辩论中还能看到残迹。

后来这些人要么被镇压，要么自己退出历史舞台，自由派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倾向又以其他方式反映了出来。中国资本主义在世界体系中地位从外围国家上升为半外围国家，中国小资产阶级和小资本家与核心国家同类阶级的以汇率计算的收入差距从几十倍缩小为数倍，这就给了许多小资产阶级和小资本家家庭把子女从出国留学，乃至学习西方左翼思想的机会。同时原本出国留学学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左翼学派“真传”的人回国任教。这共同构成了中国左派的“贵族”团体，也是水果和喜羊羊等同志所说的“学院派”的前身。他们表面上的理论以葛兰西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为主，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基本上是套用这些似是而非的“理论”，以及他们的洋人导师一知半解的胡话。而他们的洋人导师，除了自身早已经放弃革命以外，还通常是西方宣传机器的忠实读者，因此他们对中国现实的认识，也不会超过BBC、CNN或者纽约时报的水平。他们眼中的中国，就是一个专制制度渗透到每个人一粥一饭的“完美暴政”机器。他们是看不起马列毛的，因此也看不起中国的劳动群众。他们想象中的“革命主体”，在明面上是套用西方身份政治的“边缘化群体”，如性侵受害者、少数族裔、性少数和移民。但是他们显然找不到足够数量的“完美受害者”，所以继续埋首书斋是最好的选择。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减速和学术界的新自由主义改制也让这些左翼“贵族”预备队出现了就业危机，于是他们就和下面一类左派走到了一起。

这一类左派原本是一流乃至“双一流”高校中的学生积极分子，在佳士运动失败后被打散。但是他们把大量的学习材料和观点传播给了其他学生，然后这些学生又传播给了低年级学生乃至中学生。这些学习材料主要包括清华和北大的学生社团编写的“国史”、“文革史”，列宁的《怎么办》、《帝国主义论》，具海根的《韩国工人》，以及国内某知名教授的关于中帝论的文章。这些材料有的是作者针对具体情况的论述，有些本身就是错误的，有些是根本无足轻重的，而且还经常被误读。这些材料在他们或准确或扭曲的解读下，形成了这样一套论述：任何有某种垄断的国家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因此所有国家都会争

霸，反霸也是争霸。上次革命失败的原因，是革命的“先锋队”在“灌输”过程中没有注意清理“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导致落后的意识形态拖垮了先进的经济基础。这次革命之需要进一步发挥能动性，更大力度地“灌输”，就能在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取得胜利。

从表面上看，这是无限拔高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忽视革命的客观条件。但其从他们对自己未来的利益的设想分析，我们就能看见这是在替革命的“有机知识分子”在革命还没成功之前邀功请赏。如果革命根本上是靠着知识分子发挥主观能动性，靠着“灌输”胜利的，甚至连“帝国主义”这个死条件都能克服，那么今天的革命知识分子就是明天革命胜利的唯一功臣，应当获取与其“先锋”地位相称的物质资料和社会地位。换句话说，如果未来的革命本质上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那么“革命”的知识分子就无法通过这种方式兑换未来的地位，那这革命就白革了，马列就白学了，天下就白大乱了。事实也是如此，当他们看见工人群众争取更好的经济待遇的时候，他们就会指责为什么不搞独立工会。理由很简单，只有在独立工会乃至“先锋党”里，革命知识分子才有领导地位。当俄罗斯主动挑战世界帝国主义秩序，逐渐打碎世界反动政权之间的相互支援的时候，他们又开始支持乌克兰，认为加入北约（仿佛北约不是反动组织）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行为。理由也很简单，如果反抗帝国主义秩序的第一枪是由某个民族国家打响的，那么也没有这些“革命”知识分子什么事了。

从他们现在的现实的阶级利益上讲，他们的“革命”话语半是针对统治阶级的泄愤，半是不把自己的一身“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威胁。革命是有风险的，要有牺牲的，还有可能失败，许多情况下失败还是必然的，无论先锋队有多先锋。在无法认清中国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道路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必然崩溃的前景时，继续利用左翼身份获取现实世界中的更大利益是可以想象的。正如我们前面讲的自由派的阶级基础反映的那样，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的相当一部分，无论其表面的政治倾向如何，都可以在不打乱世界资本体系甚至不打乱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情况下，通过私有化、“自由化”、资产阶级民主来以更高的物质价格兑换自己的特殊劳动力。其中的“意见领袖”甚至可以用自己的个人威望兑换到“民主之后”的政治地位。比起真刀真枪地闹革命然后以先锋队的身份“分红”，这条道路显然更加有吸引力。这也是我们前一阵说的从“中国小列宁”到“红色瓜伊多”转变的现实背景。

当然，“红色瓜伊多”的成功寄希望于颜色革命之后的资产阶级民主。但是第一步就遇到了死结。资产阶级专制制度是最适合中国资本主义在世界体系内分工的政治制度。中国如果想要继续通过当“世界工厂”来维持自身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定，就必须在专制制度下继续压制劳动人民的经济和政治诉求，也包括小

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诉求。这就意味着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定（不搞革命的先决条件）与中国的“民主化”（“红色瓜伊多”的先决条件）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的左右派小资产阶级，无论是否有这种程度的认识，至少是有相关的生活经验的。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左”派，开始追寻“润”的道路，即退出历史舞台的结局。

当自由派的阶级基础没有被消灭的时候，自由派的政治主张会在其他的政治旗号下再生产出来。今天中国的亲帝、亲北约、亲纳粹、亲新自由主义“左派”，实际上填补了传统自由派衰落之后空出的“生态位”，成为了传统自由派在政治上的继承者。

# 弗拉基米尔·普京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终结

远 航 一 号

早在俄乌战争即将爆发之际，红色中国网编辑部就曾经指出，一旦俄罗斯实现了自己的地缘政治意愿，美国主导的“资本积累秩序则很可能走向崩溃”[27]；俄罗斯一旦崛起，“将不仅导致美国霸权加速衰落，而且可能严重加剧中国资本主义的内外矛盾，从而进一步促成现存世界体系的全面瓦解。”[28]在俄军基本解放马里乌波尔之后，远航一号曾经做出这样的判断，即这次战争不仅将以俄罗斯的胜利告终，而且将深刻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五百年来西方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局面就要一去不复返了！”[29]在9月中旬，当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资产阶级媒体都在鼓噪乌克兰傀儡当局的“反攻”、中国小资产阶级中的亲帝国主义“左派”分子也按照国际资产阶级的调子摇旗呐喊时，远航一号不仅论证了俄罗斯必然取得战争的胜利，并且重申了红色中国网编辑部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判断：“随着欧洲帝国主义内部经济和政治危机的不断加深，欧洲政局可能在未来若干年最终发生重大变化，甚至导致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动摇、北约解体，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形势将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我们已经进入了美帝霸权总崩溃的时代。”[30]

27. 见本文集《从撤退到溃退？乌克兰危机和美国霸权的未来》。

28. 见本文集《礼崩乐坏——乌克兰与现存世界体系的总危机》。

29. 见本文集《俄罗斯开辟了打击美欧帝国主义的第二条战线》。

30. 见本文集《俄罗斯资产阶级与西方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现在看来，俄罗斯解放乌克兰的战争，将不仅标志着美帝霸权总崩溃的开始，而且很可能标志着自十六世纪初以来、在五百年中不断扩张又征服了全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进入了其历史生命的最后阶段。未来五十年上下，我们将见证现代世界体系的总崩溃。

##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按照世界体系理论，所谓“世界体系”指的是存在于一个广大地理区域的分工和交换体系，体系内部的各个部分依赖于其它部分提供至少一部分必需品。历史上，这样的“世界体系”可能由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来统治或主导（即所谓“世界帝国”），也可能有许多个国家相互之间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竞争（即所谓“世界经济”）。

与以往的世界体系不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特点是，剩余产品成为“剩余价值”（也就是商品货币关系占统治地位，从而剩余产品可以表现为一定的货币量），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导致“剩余价值”的很大一部分不是用于统治阶级的消费，而是用于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

在世界体系理论看来，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历史时代的最本质的特点，既不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前资本主义也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私有制也不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唯一形式）也不是雇佣劳动制度（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奴隶制、农奴制、佃农制以及小商品生产，都曾经不同程度地服务于资本主义积累），而是对资本积累的无限追求。对资本积累的无限追求，使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全球体系；对资本积累的无限追求也使得世界范围的物质生产和消费扩大到如此规模，以至于全球生态系统到了崩溃的边缘。

那么，为什么，只是到了十六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才得以产生并在此后不断发展壮大呢？这是因为，要将剩余产品不断转化为新的“资本”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地扩大积累的规模，需要一系列的特殊历史条件。这些条件，在十六世纪以前世界上文明比较发达的地方，都还不具备。

首先，资本积累的不断扩大需要得到国家的鼓励和扶持，这需要一种对于资本家来说相对有利的国家与资本家之间的力量对比。这样的对资本家相对有利的力量对比只有在多国竞争的“世界经济”中才有可能。然而，在近代以前，多国竞争的“世界经济”不是被周边的“世界帝国”所征服就是在自相残杀中毁灭。到了十六世纪，早期西欧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由于一系列偶然因素，使得西欧的君主和资本家们得以征服美洲这一块尚未“开发”、自然资源极其丰富的“新大陆”，

从而使得多国竞争不再导致自我毁灭，而是得以不断地攫取来自外部的财富。这才保证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工业革命之前三百年间的扩张和发展。

第二，为了保证世界范围资本积累的不断扩张、物质生产和消费规模的不断扩大，还需要广阔的生态空间、丰富而廉价的自然资源，以及将这些资源开发出来的手段。仅仅是对美洲的征服，不仅不能保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无限扩张，甚至无法保证以西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取得对亚洲古老文明的优势。这个问题，只是在工业革命开启了对化石燃料的大规模使用以后才得以“解决”，并且奠定了资本主义“全球化”以及在过去两个世纪世界经济按几何级数增长的物质基础。

第三，资本积累要不断扩大，还需要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物质财富在资本家、国家以及劳动者之间的分配始终保持对资本家相对有利的格局，从而保证资本家在优厚利润率的驱动下有足够的动机将剩余产品中较大的一部分不断地投入资本积累。为此，就必须有效地遏制劳动者的斗争力量。除了国家镇压劳动者的反抗之外，在历史上，遏制劳动者的斗争力量主要是通过源源不断地获取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才得以实现的。

第四，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展到全球以后，为了防止多国竞争失控，造成整个体系的崩溃，还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霸权国家，能够并且愿意用其自己的力量来维护并促进整个体系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霸权国家来调节并抑制多国竞争所带来的副作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可避免地要像以往的“世界经济”那样，在不受遏制的内斗和相互倾轧中自我毁灭。

然而，在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以后，上述几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条件都正在或者已经走向其自身的反面。

首先，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征服全球并将一切经济领域都尽可能地商品化，资本主义在地理上已经达到扩张的极限。

第二，在经过了几百年的资本积累和掠夺以后，全球生态系统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若干关键的自然资源也已经开始枯竭（其中，世界石油生产即将或已经越过顶峰，以后将趋于下降）。

第三，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积累导致越来越多的地理区域发生并且逐步完成无产阶级化，可供资本积累有效使用的、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正在逐步枯竭。

十九世纪时，世界工业发展主要集中在西欧和北美。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美出现了强大的工业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为了应对无产阶级斗争的挑战，欧美资产阶级一方面通过不平等交换、资本输出等办法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广大外围和半外围地区攫取大量超额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在内部通过自由民

主政治制度、福利国家等方式与本国工人阶级分享一部分从全世界剥削来的超额剩余价值，从而在二十世纪中期一度形成了阶级妥协的局面。

然而，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枯竭，欧美无产阶级的斗争进一步高涨，使得欧美资产阶级失去了一方面维持社会改良、另一方面维持资本积累的妥协空间。大量工业资本从欧美转移到新的可以剥削廉价劳动力的地区，尤其是中国。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的工业无产阶级队伍也在发展壮大起来。中国的无产阶级或迟或早也将提出广泛的经济和政治要求。与欧美资产阶级不同，中国资产阶级无法从世界上其它地区攫取到足够的超额剩余价值以同时满足社会改良和资本积累的要求。不仅如此，由于生态环境和资源的限制，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广大外围地区在政治上和基础设施方面都不具备大规模发展工业化的条件，在中国以外将无法再找到一块足够广大并具备资本积累各种必要条件的地区用于大规模转移并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因此，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化正在接近其历史的极限。

第四，在美国霸权代替英国霸权以后，能够充当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霸权国家的至少需要是大陆级别的大国。不仅如此，要有效充当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霸权，霸权国家不仅要比其他各个大国都更加强大，而且在工业上和军事上都要确立绝对的优势。由于美国本身已经是大陆级的大国，在美国霸权衰落以后，很难再出现另外一个大国，能够形成相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大国的绝对优势，从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将无法再产生一个新的霸权。

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仅是建立在多国竞争的基础上，而且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霸权来防止多国竞争失控并维持体系的共同利益，一旦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无法再产生新的霸权，体系的终结就不可避免了。

## 俄罗斯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从彼得大帝时期起（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俄罗斯统治集团始终梦想的就是成为“欧洲”的一部分。从那时起，一方面，俄罗斯统治集团历经西欧资产阶级的玩弄、利用和鄙视，另一方面，俄国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以及农奴制的残余使得其在与西欧资本主义的竞争中逐步落伍。在日俄战争中战败后，俄国甚至面临着外围化的危险。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对俄罗斯国家与社会进行了根本改造，在充分发动广大劳动群众的基础上一度实现了快速资本积累，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使得苏联成为世界上的一等强国。然而，由于无法克

服半外围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以及特权官僚统治集团的叛卖，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叶利钦统治时期，俄罗斯资产阶级乞求成为美帝主宰的西方资本主义秩序的一部分，甘愿充当这一秩序中的一个二流角色。然而，美帝国主义以及整个西方的国际资产阶级所要求的，不仅仅是推翻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是使俄罗斯永远居于廉价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地的位置。不仅如此，为了建立永久的（而不是在一两个世纪中的）世界霸权乃至新的全球“世界帝国”，美国统治集团制定了通过肢解俄罗斯来永久统治欧亚大陆的计划。这就从根本上威胁到了俄罗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也与俄罗斯统治集团发生了尖锐不可调和的冲突。

这种尖锐冲突，与美欧资产阶级同中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了残酷剥削中国广大的廉价劳动力并为美欧资产阶级源源不断地输送超额剩余价值，美欧资产阶级不仅不希望肢解中国，而且需要中国资产阶级用比较稳定的统治来保障国际资本与中国资本家共同剥削中国劳动人民的基本条件。

普京政权上台后，停止并部分扭转了叶利钦时代的私有化，将国防、石油、天然气、运输、电力、外贸、银行、渔业、钢铁制造业等领域的约1000家大中型企业定为国有战略企业，禁止对这些企业实施私有化。经过普京时期的再国有化后，国有经济占俄罗斯经济的比重恢复到约三分之二（《光明日报》，“国有企业引领俄罗斯经济发展”）。相比之下，中国国有企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目前约为五分之一。

依托强大的国有资本，普京政权得以取得相对于私人寡头资本的独立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凌驾于寡头资产阶级之上。利用国际市场能源价格上涨的有利形势以及俄罗斯作为世界主要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的地位，普京与沙特阿拉伯、伊朗等国建立了结盟的关系，共同支配世界能源市场，从而初步确立了与西方帝国主义一战的能力和决心。

另一方面，美欧资产阶级违背他们对苏联统治集团曾经做出的承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不断地推动作为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北约向东扩张，在将东欧各国和波罗的海三国纳入北约以后，又于2014年打着所谓“广场革命”的旗号推翻了当时乌克兰的合法政府。此后，美欧帝国主义一方面怂恿乌克兰傀儡当局对乌克兰东南部的人民实行民族压迫，另一方面加紧装备和训练乌克兰傀儡军队，在乌克兰建立生化武器基地，事实上将乌克兰傀儡军队纳入北约的军事系统，变乌克兰为侵略俄罗斯的桥头堡。

在美帝侵略势力被迫从伊拉克、阿富汗撤退后，美帝在世界范围的衰落已经昭然若揭。尽管如此，美欧帝国主义仍然没有放弃其依托乌克兰侵略并肢解俄罗

斯的狂妄计划。世界历史已经来到了转折关头。在这样的形势下，普京当局终于下定决心，不惜与美欧帝国主义决裂，不仅以武力解决乌克兰问题，而且以此为契机，推翻现有的资本主义全球秩序。

## 弗拉基米尔·普京与世界历史的“革命性”转变

2022年9月30日，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卢甘斯克、顿涅茨克、扎波罗热、赫尔松四地区加入俄罗斯联邦条约签字仪式上发表历史性讲话。10月27日，普京在第十九次瓦尔代国际论坛上又一次发表长篇讲话。这次论坛的主题是“后霸权时代的世界：所有人的公正与安全”。在这两篇讲话中，普京全面阐述了他对当前国际形势的见解，描绘了俄罗斯统治集团改造全球秩序的战略构想。

在9月30日的讲话中，普京指出，在“西方”统治下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实际上是一种掠夺全世界的“新殖民主义”秩序：“当苏联崩溃的时候，西方就决定全世界、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永远地服从它的号令。……西方为了维持新殖民主义制度是不择手段的。这种新殖民主义制度使得它可以寄生在全世界，靠着美元和技术的统治掠夺全世界，向所有人类收取贡赋，攫取其不劳而获财富的主要来源，即支付给霸权的租赋。这就是为什么，完全的去主权化符合他们的利益。这就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要侵犯独立的国家、传统的价值和纯正的文化，他们为什么要破坏国际合作的进程、破坏他们所无法控制的新的全球货币和技术发展中心。对于他们来说，尤其重要的，是迫使所有的国家都将自己的主权拱手让给美国。”在10月27日的讲话中，普京进一步指出，“金融和技术的垄断”构成“西方的全球化模式”的基础，这种全球化“就其本质来说是新殖民主义的”，其目的是为了“建立西方对全球经济的无条件的统治”。

普京认为，事实上，整个的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西方”掠夺全世界人民的历史：“西方的殖民主义政策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接下来就是世界范围的奴隶贸易，对美洲印第安部落的种族灭绝，对印度和非洲的掠夺，英国和法国对中国的战争，结果中国被迫开放它的港口用于鸦片贸易。他们驱使整个的国家吸毒成瘾，蓄意灭绝整个的民族，就是为了攫取土地和资源，像狩猎动物一样屠杀人民。”

所谓“西方”的财富一直建立在奴役和屠杀世界人民的基础上：“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在说，他们给其它国家带来了自由和民主。没有什么比这个离真相更加遥远了。不仅没有带来民主，他们带来了镇压和剥削，不仅没有带来自由，他们带来了奴役和压迫。”“有必要回顾一下，西方是靠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摆脱了二十世纪初期的危机。美国是靠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暴利才最终走出了

大萧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然后将美元强加给世界，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然后是八十年代的危机——到了八十年代，问题又迫在眉睫了——西方得以全身而退，主要是靠霸占了苏联崩溃解体后留下的遗产和资源。”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世界范围掀起反革命复辟浪潮以来，这还是第一次由一个主要大国的领导人在世界舞台上声讨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罪行。普京的讲话从根本上否定了目前仍然霸占着世界上大多数财富的西方帝国主义经济秩序的历史合法性。

在10月27日的讲话中，普京又控诉了西方跨国公司对广大外围国家民族工业和农业的摧残：“如果西方向其他国家出售药品或农作物种子，它就会告诉这些国家，扼杀那些本国的医药工业以及农作物品种，实际上，无非就是这样：西方所供应的机床和设备会摧毁当地的机械行业。当我还是总理的时候我就搞明白了。一旦你将某类商品的市场开放，那么当地的制造企业马上就会倒闭，几乎不可能再抬起头来。……他们就是这样夺取市场和资源的，各国就是这样失去了他们技术与科学的潜力。这不是进步，而是奴役，使各国的经济沦落到原始的水平。”

然而，在过去几十年中，新的力量中心出现了，“西方”一手遮天统治世界的时代已经无法照旧维持下去了。

在9月30日的讲话中，普京指出：“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根本性的革命转变的时期。新的力量中心正在出现。他们代表着大多数——国际社会的大多数。他们准备好了，不仅要宣示自己的利益，而且要保护这些利益。他们在多极化中看到了加强自己主权的机会，这意味着获得真正的自由、历史性的前景，以及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立的、创造性的、独特的发展方式的权利，达成一个和谐的过程。…在最广泛的国家和社会中，一个从根本上是解放的、反殖民的、反对单极霸权的运动正在形成。它的力量将随着时间而增长。正是这一力量将决定我们未来的地缘政治现实。”

在10月27日的讲话中，普京指出，几个世纪以来，自殖民时代以来，西方的统治者们就以轻蔑和傲慢的态度对待世界其它地方的人民，将他们视为“次等人”。然而，现在，全世界的大多数人民都要求“国际事务的民主化”，要求摈弃“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任何形式的专制”。

普京认为，旧的西方统治下的全球秩序正在土崩瓦解，其最终崩溃是不可避免的。9月30日，普京指出：“目前的新殖民主义模式最终必然是要完蛋的。”10月27日，普京又指出，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已经陷入系统的危机和思想的危机：“他们已经不再能提供进步和积极发展的思想。除了拼命延长他们的统治，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贡献给世界的了。”

“我们可能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危险、最不可预测、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十年中。西方一手遮天统治世界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不想再忍耐下去了。这是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引用一句经典的话说，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革命性的形势，精英们已经不能，而人民则不愿意照旧生活下去了！”（10月27日）

普京预言，一定会出现与西方模式不同的另外的社会模式，这样的新的模式将会“更有效”、“更加光明，更加有吸引力”。这样的新模式一定会出现、必然会出现。

那么，这种新的、“更有效”、“更加光明，更加有吸引力”的模式会是怎样的呢？普京认为：“新的世界秩序必须建立在法律和权利的基础上，必须是自由的、多姿多彩的和公正的。”（10月27日）

普京倡议，建立不依赖于美元及其它储备货币的新的国际金融平台，国际贸易以各国本国的货币来结算。应该进行“自由和公开的科学和技术交流”，“利益应该归于大多数人，而不是个别的超级富豪公司”。普京以俄罗斯（实际上是过去的苏联）对亚非国家的援助为例，说明“技术发展不应当加剧全球的不平等，而应当减少不平等”。

对于普京来说，欧亚大陆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欧亚大陆是“一个拥有巨大的机遇以及各式各样丰富资源的、自给自足的复合体”。欧洲，作为欧亚大陆的最西端，本来是欧亚大陆复合体的自然组成部分；然而，欧洲的领导人至今仍然认为他们比其他人更加“优越”，不能以平等的身份与其他人交往，这妨碍了欧洲成为欧亚大陆的一部分。

“未来的世界格局正在我们眼前形成。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我们必须倾听每个人的声音，考虑每一条意见，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会、每一种文化和世界观、思想和宗教体系，而不是把一种真理强加给所有人。只有在此基础上，了解我们对各国和地球的命运所负有的责任，我们才能创作出人类文明的交响曲。”（10月27日）

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在走向末日危机的时代，我们怎样理解普京的讲话及其所揭示的俄罗斯统治集团对于未来世界改造的设想呢？

## 俄罗斯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终结

自俄乌战争开始以来，红色中国网就反复论证、始终坚信俄罗斯必然取得战争的胜利。现在看来，俄罗斯将于即将来临的冬季发起大规模攻势，最终解放乌克兰全境或大部分地区，推翻基辅傀儡政权。

俄罗斯在解放乌克兰战争中取得胜利后，前苏联国土的绝大部分（除了波罗的海三国以外）将或者是俄罗斯的一部分、或者是俄罗斯所控制的势力范围。俄罗斯的人口将接近两亿。在获得了原乌克兰东南部的工业和农业资源以后，俄罗斯将不仅是世界上主要的能源生产国之一，而且可以成为一个主要的农业和制造业生产国。

俄罗斯军队在俄乌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锻炼，武器装备获得全面的检验。乌克兰傀儡军队是欧洲除俄罗斯以外最大的一支军队。在战胜乌克兰傀儡军队以后，俄罗斯即巩固并加强了其欧亚大陆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中国资产阶级的军队虽然在纸面上庞大，但未经实战检验。最主要的，由于中国资产阶级与国际资本主义分工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其腐朽本质，也由于中国地缘政治环境的严重限制，中国资产阶级军队将长期处于无用武之地（远航一号，“美国霸权的衰落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终结”）。

在俄乌战争中，北约帝国主义倾其全力，实际上动用了其可以动用的全部库存武器弹药来装备乌克兰傀儡军队，仍然无法阻止其失败。这就使得全世界人民看清了北约帝国主义纸老虎的真面目。自1990年海湾战争、1998年北约侵略南斯拉夫战争以来树立起来的帝国主义战争“声望”从此荡然无存！不仅如此，由于在俄乌战争中，北约的武器弹药大量消耗，在美欧去工业化的条件下又无法在短时间内补充这些已经消耗的武器弹药。这事实上意味着北约在今后相当一个时期（也许是永远）失去了发动大规模常规侵略战争的能力。自苏联解体以来，北约帝国主义凌驾于亚非拉人民头上的淫威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在俄乌战争中，傲慢而愚蠢的欧洲资产阶级甘当美帝国主义走狗，拼命发动对俄罗斯人民的所谓“制裁”，彻底破坏了以往俄罗斯与欧洲之间以能源交换工业品的分工关系。这就使得欧洲已经不具备以较有竞争性的价格生产高技术工业品的能力。未来，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发源地、曾经不可一世、在全世界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欧洲将全面衰落。其中，东欧将全面外围化，西欧将逐步丧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核心国家的地位。欧洲原有的社会妥协体系将全面瓦解。未来欧洲将爆发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斗争。这种群众斗争的前途，取决于欧洲的无产阶级、其他劳动群众、中小资本家能否下定决心摆脱新自由主义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摆脱美帝国主义的奴役，并达成与俄罗斯人民的历史性谅解。

俄罗斯本身是世界最主要的能源生产国之一，是世界第一大天然气出口国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之一。近年来，俄罗斯又与中东地区各主要国家（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都发展了友好或结盟的关系。在美帝从中东全面撤出后，俄罗斯将成为在中东地区唯一保持显著军事存在的区域外大国。通过参加“欧佩克+”，俄罗斯已经与沙特阿拉伯共同控制了世界石油市场。未来，凭借其军事力量

以及与中东地区各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俄罗斯还可能使得自己成为中东地区和平的“仲裁者”，从而间接控制世界能源供应的生命线。

那么，俄罗斯的崛起对于整个世界的未来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在战争之初，在相当一批马列毛左派积极分子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这次战争是俄罗斯资产阶级与美帝国主义争夺霸权的帝国主义战争。在10月27日的讲话中，普京明确表示，俄罗斯不打算成为新的霸权。当然，我们不必也不应当按照普京讲话字面的意思来理解俄罗斯统治集团的真实意图。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普京说了什么，而在于普京的讲话所反映的俄罗斯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以及决定这些根本利益的世界历史条件。

当前的世界历史条件与二十世纪前半期已经根本不同了。在二十世纪前半期，英国霸权无可挽回地衰落了，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远远没有走到生命的尽头。美国霸权的崛起为世界资本主义积累新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在我们当前的历史时代，不仅美国霸权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了，而且整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在迅速地走向灭亡。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不可能代替美国成为新的全球霸权。

已故的世界体系理论家沃勒斯坦在生前曾经提出过这样一种观点，即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的时代，虽然世界阶级斗争还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的各个民族国家之间展开，但是斗争的实质已经不再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争夺政权、领导权或霸权，而是力争决定资本主义之后新的社会形态的根本性质——是新的一个或多个“世界体系”、新的阶级社会，还是打开通往无阶级社会的道路？

在某种意义上，普京和俄罗斯统治集团所谋划的，已经不是在原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内的俄罗斯崛起，而是在旧的“西方”居于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土崩瓦解之后，为俄罗斯统治集团找到一个在世界历史上恰当而显著的位置。

按照普京的设想，俄罗斯自己不称霸，也不谋求用“两极的、三极的或其它的统治秩序来代替单极世界，或者用来自东方、北方或南方的统治来取代西方的统治。”在这样的没有“统治”的新世界中，将不会有技术和金融的垄断，而只有自由和开放的交流。也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充当主宰世界的储备货币，美元自然要退位，卢布也不会成为新的储备货币，“人民币”也不会。

这样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一组国家居于统治地位的世界很像另一位已故的世界体系理论家阿瑞吉所设想的“世界市场经济”。按照阿瑞吉的设想，在资本主义之后，新的世界体系将是一种“世界市场经济”。在这种“世界市场经济”中，各国之间或至少各大国之间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是大致平等的，不再有核心、外

围、半外围之分，因而也不再有核心国家的垄断利润。由于没有了垄断利润，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会逐步地将利润率压低到很低的水平，以至于国家和资本家都不再有资本积累的动机，于是世界就逐步过渡到后资本主义时代。阿瑞吉生前曾经抱着很大的希望，期待中国资产阶级可以引领世界走向“世界市场经济”。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资产阶级到目前为止仍然是资本积累的世界标兵；而阿瑞吉并没有看中的俄罗斯统治集团却用自己的行动将“世界市场经济”变成了某种世界历史的可能性。

然而，所谓“世界市场经济”的致命问题是，历史上凡是以多国竞争为基础的“世界经济”（见前面“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节开头部分对“世界经济”的定义）都必然是极度不稳定的。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得以发展扩张并征服全球，一是因为不断地攫取自然资源并掠夺生态空间，二是因为周期性地产生一个霸权国家来抑制过度的多国竞争。现在，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了，一个相对平等的“世界市场经济”又怎么能长久存在下去而不在无休止的多国（或多文明）竞争中走向自我毁灭呢?

要避免这样的多国（或多文明）竞争的自我毁灭，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由几个相互之间仅有有限联系的小“世界体系”来代替资本主义的全球世界体系。

按照普京的设想，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新殖民主义模式”完蛋以后，现在世界上的各个国家，或者至少是各个大国，都将有充分的“主权”，可以发展自己独特的文明。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每一个大国、每一个文明都必须有充分的、属于自己的技术和科学潜力，有自己的一套工业体系。这样，全球会出现若干个“力量中心”，在每一个“力量中心”周围会形成自己的科学、技术、工业和文化的分工体系；而在“力量中心”相互之间，则仅有“自由和开放的交流”，除此以外，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如此这般，代替现在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就不是一个新的全球体系，而是围绕着若干个“力量中心”而形成的若干个文明或若干个“世界体系”，每一个体系内部大致自给自足，相互之间仅进行科学、文化以及少数奢侈品的交流。

## 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终结

在这样一个旧秩序土崩瓦解、新秩序尚未诞生的“革命性的”转变时代，“中国”、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如红色中国网在以往论证过的，中国是一个在当前国际资本主义分工中专门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一个专门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国

家，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的商品出口几乎全部是制造业产品的出口，而且还意味着，几乎中国所有的工业部门，其产量都显著超过国内需要。这些超出国内需要的工业产品产量，只有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出去，才能给资本家带来利润。

在中国的制造业出口市场中，美国和欧盟是两个最为有利可图的市场，合计占中国出口市场的三分之一；如果再加上经过香港的转口贸易以及通过东南亚国家的间接出口，美国和欧盟实际占中国出口市场的份额很可能在一半以上。

俄乌战争给欧洲资本主义以沉重打击，也打碎了中国资产阶级通过所谓“欧亚大陆桥”与欧洲资产阶级建立持久分工合作关系的迷梦。在欧洲经济崩溃以后，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势必大幅度萎缩。

中国出口市场的另外一半，是“西方”以外的亚非拉各国以及俄罗斯。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是用中国相对廉价的工业品交换这些国家的能源和原材料。其中，在与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等外围国家的贸易中，中国资本家可以通过不平等交换赚取超额剩余价值，部分抵偿中国向美欧转移的超额剩余价值。

在俄乌战前，中俄贸易占中国全部对外贸易的比重仅有2-3%。为了与美欧帝国主义的制裁做斗争，普京政权与中国资产阶级达成交易，用俄罗斯相对廉价的石油和天然气交换中国相对廉价的工业品。中俄之间的贸易，在目前大致是平等交换的性质。在未来几年，中俄贸易的迅速扩张，对双方均较为有利。

然而，可以设想，在俄罗斯彻底打败乌克兰傀儡当局并在事实上打败北约帝国主义以后，俄罗斯将不会满足于长期用能源交换中国的工业品。俄罗斯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强大的工业基础，又有强有力的国家干预能力。到那时，俄罗斯必然开展大规模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将中国的工业品从俄罗斯国内市场上逐步挤出去。

不仅如此，普京在10月27日的讲话中还提到前苏联的经验，那就是在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技术援助时，不仅帮助他们建设工厂，而且帮助他们培训技术人员，帮助他们形成一套完整的产业、培养独立自主发展科学技术的能力（这不就是社会主义苏联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模式吗？）。

我们不能排除，俄罗斯统治集团不仅这样说，而且为了颠覆现有西方主导国际秩序的目的，也确实会这样想、这样做。如果俄罗斯为了这样的目的，在自己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同时，还向伊朗、印度、非洲、拉丁美洲等有志于发展民族工业的国家提供各种实用的技术帮助，这就有可能帮助这些国家尽快地实现工业化或再工业化，从而使得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向亚非拉出口的市场也面临大大萎缩。

这倒不是说俄罗斯统治集团与中国资产阶级相比特别善良，而是由于俄罗斯资产阶级与中国资产阶级在国际资本主义分工中的位置不同，根本利益不同，因

而相应的国际战略要求也不同，从而使得俄罗斯统治集团客观上能够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一定的进步作用。

如果在此基础上，美国国内的阶级斗争促使美国资本主义也走上制造业复兴的道路，中国资本主义就将面临灭顶之灾。

##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终结与向无阶级社会过渡

马克思与恩格斯曾经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为未来的无阶级社会准备好一切必要的物质条件，胜利的无产阶级又必然充分利用这些物质条件完成对社会的改造，最终结束有阶级社会的“史前史”，开启人类全面自由发展的新纪元。

我们在以前探讨以往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时，就曾经指出过，实际历史发展的进程，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要复杂[31]。

如果在未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不是整个地过渡到一个新的全球体系，而是先瓦解为若干个较小的文明或“世界体系”，这对于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前景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就欧亚大陆来说，其未来的前景将取决于俄、中两个大国的发展和变革。就俄罗斯统治集团来说，他们目前似乎在摸索建立一种既非社会主义又非资本主义的新的阶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俄罗斯统治集团通过中央集权国家掌握着大部分剩余产品，这些剩余产品除了用于统治集团挥霍浪费外，也为劳动群众提供一些公共服务（如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其余则主要用于维持强大的军事工业和武装力量，以确保未来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欧亚大陆西部“世界体系”的内部和外部安全，当然同时也确保俄罗斯统治集团在其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这样一种体系中，私人资本可以存在，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发财致富，但不占主导地位，有些类似于中国封建王朝时代的“重农抑商”政策。

对于俄罗斯统治集团来说，长远的困境是，如果统治集团不再承担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任务，统治集团又如何解决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呢？受过良好教育，有着高度文化素养、政治觉悟，又曾经有过长达七十年社会主义革命经历的俄罗斯人民为什么要长久忍受不再能为社会发展做出任何积极贡献的俄罗斯统治集团高高在上的主宰呢？现在毕竟不是前资本主义时代。宗教要能够成为人民在精神上的鸦片，前提是人世间不存在通往解放的现实可能性；而一旦压迫与剥削在人世间不再有任何合理性，仅靠东正教是不能长久说服群众甘当统治者奴仆的。

31. 见本文集《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兼谈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问题》。

对于中国资本主义来说，它在正在走向灭亡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唯一优势，既不是像美国那样仍然垄断着若干高技术部门，也不是像俄罗斯那样不仅拥有而且敢于、善于使用强大的武装力量，而在于它在资本积累的竞赛中还处于优胜的地位。换句话说，当资本积累的游戏规则在世界历史上即将过期失效的时候，中国资产阶级终于“学会”了在这项游戏中怎样取得领先。中国民族主义者经常喜欢吹嘘的，所谓中国巨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所谓“基建狂魔”，所说的，无非是中国资产阶级的这项本领。

然而，中国资产阶级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却离不开它对中国广大劳动群众的残酷剥削，离不开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劳动强度的剥削体制。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剥削体制，不管人们主观上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都迫使劳动群众自发地、普遍地开展“躺平”斗争，以不生、少生来减少自己直接的生活成本，而在长远则减少中国资本主义所必需的廉价劳动力供应，最终造成中国廉价劳动力队伍的全面枯竭。

从长远来说，劳动人民的“躺平”斗争将不仅从数量上减少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而且还很可能从质量上创造一代“新人”，那就是加速消耗掉那一代由于历史原因不太愿意“躺平”、还幻想发财致富、甘心为资本家吃苦耐劳、还带有大量私有制小农痕迹的劳动者，而代之以新一代“娇生惯养”、无法忍受超长劳动时间和超高剥削强度、有经济和政治要求、对于发财致富已经完全或几乎绝望、完全无产阶级化的劳动者。当后一代“娇生惯养”的劳动者完全代替前一代“吃苦耐劳”的劳动者的时候，中国资本主义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劳动强度的剥削体制便完全无法维持下去了。到那时，资本主义的劳动纪律势必全面崩溃，中国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也就荡然无存了。

一旦中国经济不再增长，资产阶级也就不再有任何独占社会剩余产品的合法性，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豢养的资产阶级国家从社会攫取剩余的能力也将极大地萎缩。与笼罩在东正教神秘气氛中的俄罗斯统治集团相比，世俗且充满了暴发户铜臭气的中国资产阶级更难将自己转变为某种形式的后资本主义的剥削阶级。中国资本主义所留下的破碎河山将由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来收拾。

在这之后的世界历史进程，将要取决于对如下几个问题的回答：未来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能否进一步战胜资产阶级以及其它反动和落后的势力（尤其是自由派的或民族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右派势力），建立起全国范围的无产阶级政权？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能否得到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呼应，并进而建立起欧亚大陆上强大的社会主义体系？欧亚大陆上社会主义革命

的胜利能否得到西半球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呼应，并最终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全人类的大团结?

# 教条主义者天天空喊革命，天下一乱又怕得要死

激活、草庐棋士

为什么一定要美国永霸，再说了我们也相信俄罗斯无法争霸，这种泛帝国主义论最有害。其实说句不好听的，就算真当俄罗斯是帝国主义，真的就是争霸，那又如何？十月革命不是一战的产物吗，你想要革命但又不想要战争，我是不懂国内学院派的想法，没有战争他们哪里来机会装列宁，现在真有了，个个又怕的要死，个个都说俄罗斯破坏和平，要是一直和平你怎么革命!

他们空喊着要革命，要天下大乱，但是到了天下大乱的关头，他们却完全不敢把握这个机会。他们明知道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上所有反动政权的总台柱，是乌克兰傀儡政权的宗主，但还是要叫嚣着惩戒俄罗斯，为美帝出气。他们对乌克兰纳粹的暴行视而不见，认为“只是少数”，不能决定“国家性质”，但是却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一道反对乌克兰法西斯的朴素正义感嗤之以鼻，认为中国人民需要“对照纳粹主义的特点”反思自己。

这些特点一起指向了一个方向，即这一部分中国的“左”翼分子，对美帝主导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服从已经到了深入骨髓的地步。他们在所有的抽象道理上肯定革命，比如幻想俄罗斯失败后“引发国内革命，推翻寡头政府，重建社会主义”，再做一次当代列宁的美梦。但是他们却在每个具体的环节上否定革命。他们

不去思考俄罗斯失败后社会主义能否在更加强大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中生存下来；他们尤其不思考顿巴斯革命本身已经拥有的进步意义，反而要求顿巴斯人民服从傀儡当局。他们对“纯而又纯”的革命的每一丝向往，都转化为对现实存在的、削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社会运动的卑怯诅咒。他们对革命的想象永远停留在1917年。他们越是走出列宁的篇章字句，越是接近早已不同于列宁时代的世界格局，就越会觉得陌生、迷茫乃至恐惧。现实中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与他们梦想中振臂一呼的革命越是生疏乖离，他们越是会把头埋进书本寻找温暖。而这种温暖给他们提供的，不仅仅是个人跌出“阶层跃升”渠道时的虚幻安慰，更是维持小团体内部等级秩序稳定性的理论权威。这就是今日中国左派中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在俄乌战争中的表现。

# 附录：如何正确认识反霸斗争

**项教授**

支持普京、支持普京发动对乌克兰侵略战争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认为普京是在进行、甚至说是在领导一场反对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反对北约的斗争。

能不能这样认识问题呢？不能。

发生这一认识上的错误，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对于反霸斗争没有正确认识。

这涉及到一系列马列毛主义的重要理论问题、原则问题，让我们一一说来。

## 第一、正确认识反霸斗争的阶级性质、阶级内容

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包括反对曾经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的斗争，曾经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来的一个新问题。

从根本上来说，反对美帝国主义霸权斗主义斗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策略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在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基础上毛主席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论”。“三个世界划分论”，是毛主席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也是对于全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

我们今天学习、理解、运用这些在反对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运动中产生的理论和策略，对今天世界劳动人民的反帝反霸实践是十分有帮助。

## 第二、普京不是反霸而是争霸

弄清了关于反对美国垄断资产阶级霸权主义的这种特定阶级斗争的基本道理，再来讨论普京是不是、能不能参加、甚至领导反对美国垄断资产阶级霸权主义的阶级斗争的问题，就不会是一件十分困难的问题了，答案应该是相当清楚、相当简单、相当明瞭的。

普京作为现在的俄罗斯垄断资产阶级政权的统治者，是不可能参加反对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霸权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因为任何一个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

人物、统治者，都不可能参加反对垄断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更不可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对垄断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这是垄断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决定的。普京作为俄罗斯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者，不可能背离俄罗斯垄断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

已经可以看到的事实告诉我们，把普京误认为是反对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硬汉”、“英雄”，甚至说普京在领导反对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是不符合实际的，是一种错误的荒谬的认识。

这种说法，就是说给普京听，他也不会接受。

我们看事实。

仗打了一百多天了，普京说这说那，找各种借口为他的侵略战争做辩护，但是，一个最强有力的力理由，就是：反对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霸权主义，反对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霸权主义，却从来没有从普京的嘴里说出过，好像美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毫无关系。这说明了什么，不是很清楚吗?

同样，普京没有、当然也不会说，反对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是为了争取一个社会主义的前途。

这个确定无疑的明摆着的事实，不是充分证明，普京绝不是在进行马列毛主义意义上所讲的反对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阶级斗争。

这一点都不奇怪，也不偶然，这是普京的阶级本性决定的。

当然，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普京确实是在和美国对抗、和北约对抗，是在要求国际政治多极化，特别是，普京更把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直接表白为是反对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北约”的“东扩”。

对抗的确是存在的。而且，任何对抗总是基于一定矛盾基础上的对抗。但是，普京和美帝、和北约的对抗，却不是马列毛主义意义上所讲的反对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阶级斗争性质的对抗。

判断这种对抗的性质，是正确认识这种对抗的关键。那么，应该怎样正确认识、怎样科学解释这种“对抗”、这种侵略行为呢?

指导我们科学解释、正确认识这种对抗、这种侵略行为的理论指导，就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只要坚持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非常清楚的。

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不管是美国，还是俄罗斯，包括乌克兰，现在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且都是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明确告诉我们，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或者反过来说，帝国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五大基本特征的论述；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必然要发生争夺、争夺必然

要导致战争，因此，“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论断，等等，这些关于帝国主义的最基本规律的论述，至今都没有过时，而且依然行之有效。

正是在革命导师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的指导下，我们一份声明中这样写道:

1、为了正确认识、正确对待俄乌战争，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必须坚持马列毛主义的立场和观点，特别是，必须坚持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毛主席的三个世界划分论。

2、这次战争的根源一如既往还是帝国主义。

导致这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原因，有三个特别值得注意。

A、一个就是不管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已经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是垄断资产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从列宁主义看问题，这样的国家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也是从列宁主义看问题，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必然会发动战争，俄乌战争就是这样的战争。这场战争，再次验证了列宁所说的真理：帝国主义就是战争。

俄罗斯和乌克兰本来都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在列宁斯大林时代，并没有、也不可能发生这样的问题。自从苏联解体，发生资本主义复辟，俄罗斯和乌克兰才分裂为不同的国家。普京把乌克兰独立的罪责推到列宁的头上，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罪责还是在苏联以及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背叛马列主义，“党变修、国变色”，人民不满意，于是在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这些修正主义头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走资派的带领下，分裂了苏联，并走上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

正是这种复辟倒退和分裂，正是这种新形成的帝国主义加上狭隘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国，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发生帝国主义战争。

B、还有一个，就是美帝国主义的存在，北约的存在，是这场战争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坚持从毛主席的“三个世界划分论”看问题，美帝国主义依然是全世界的唯一的霸权主义国家，是全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北约”不过是美帝国主义在欧洲称霸的一个暴力的军事的工具。毛主席曾经科学地分析过，美帝国主义的战略中心在欧洲，批评了“战略东移”的说法。毛主席的意见没有过时。正是从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战略考虑，美帝国主义依然视已经大大削弱了的当年的一霸俄罗斯为在欧洲的主要对手，自然也是“北约”的主要对手。这就是“北约”不断东扩的主要原因，甚至不惜撕毁已经签订的条约不停止地东扩。

这种明目张胆地东扩，是对俄罗斯的直接威胁。俄罗斯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且有老沙皇、新沙皇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传统，面对威胁，正像普京所

说的，俄罗斯不会屈辱地跪下，而只能战斗，于是，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就是必然的了。

可见，美帝国主义的存在，北约的存在并不断东扩，不断向俄罗斯挑衅，是发生俄乌战争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

C、乌克兰的统治者，作为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一心一意地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靠拢，一再要求加入北约，甘愿充当对抗俄罗斯的桥头堡，而且纵容新纳粹主义，这是乌克兰背叛列宁，背叛保尔柯察金，请回彼得留拉的必然的结果。

乌克兰人民千万不要忘记，正是这种背叛，给你们带来了这场战争的苦难。

正是基于对俄乌战争的基本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是一场基于帝国主义利益争夺而发生的战争。

尽管北约东扩构成了对俄罗斯的威胁，但是乌克兰毕竟没有武力侵犯俄罗斯，而俄罗斯是这场战争的发动者，直接指挥俄军对乌克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进行侵犯，战火燃遍乌克兰全国，直接打到首都基辅。这样的战争，只能定性为侵略战争。受到乌克兰人民的抵抗，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反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们面对的正是这样的事实。

俄罗斯和美国的对抗，是两个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这种对抗，在这种对抗基础上提出的“政治多极化”，只能用帝国主义之间的霸权争夺来解释，而不能用反霸斗争来解释。正如列宁明确指出的：“‘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内容，而这种政策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26~27页）争夺霸权，因为争夺霸权而发生战争，是帝国主义本性带来的必然结果，是伴随帝国主义而必然存在的人类的灾难。这个道理完全适应于俄乌战争。

只要多少认真地分析俄、美之间的对抗，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俄、美之间的对抗，不存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所必须具备的那些历史条件、阶级条件、阶级性质以及反霸斗争最终的历史要求。已经展开的一百多天的俄乌战争的现实情况已经再次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不是反霸斗争，而是争霸斗争。反霸和争霸之间有一条明确的阶级分界线。这是混淆不得的。

普京是在对抗美国、对抗北约。但是，事实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非军事化”、“中立国”，“反纳粹主义”等等都是欺骗视听的冠冕堂皇的借口，普京的真实的目的很清楚，一是领土的要求，就是要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州加上克里米亚；二是和这些领土密切关联的俄罗斯的经济利益。这正是帝国主义争霸、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典型性质和典型表现。

美国是全世界帝国主义的头，也是全世界的霸主，包括也是欧洲的霸主。北约是美国控制欧洲、称霸欧洲的军事工具。毛主席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经明确批评过当时中国外交部提出的“美国现在是战略东移”的论点。毛主席指出：美国现在不是“战略东移”而是“兵力东移”。毛主席为什么这样说呢？毛主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从经济关系、经济利益看政治、看军事。毛主席深刻指出：美国的主要的经济利益在欧洲，所以，美国必然地要把战略中心放在欧洲，它要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毛主席的观点正确、英明。毛主席的观点点出了北约存在的根本原因。毛主席认识帝国主义策略的思想方法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好好学习。

只要坚持列宁、毛主席的教导，俄乌战争的本质就可以一目了然。

虽然俄罗斯和美国各有各的利益所在，各有各的目的要求，但是，说到底，这场战争之所以发生，这场战争发生的根本的经济原因、阶级原因，主要就是俄罗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为维护自己利益而展开的争夺、争霸。这种争夺必然会导致战争，必然会再现列宁反复论述的真理：帝国主义就是战争。

我有这样几点学习体会。

一、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必须正确回答反霸斗争是一场怎样的斗争？反霸斗争的性质是怎样的？

要想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坚持马列毛主义的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

不同历史时代有不同历史内容、不同阶级性质的霸权主义，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说到底，霸权主义实质上是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一种特定的形式。

正是这个实质决定了，任何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不管在形式上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实质只能是阶级斗争。

我们应该按照这个基本规律，去认识当代反对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

当代美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的阶级属性、阶级实质是非常清楚的。大量的经济的、政治的、思想文化的、直至军事侵略的事实告诉我们，美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从来都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霸权主义。套用列宁的话说就是：霸权主义即帝国主义。在当代全球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这更是“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全球战略”（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的必然表现。

正是在这种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特定形式下，当代反对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阶级斗争，只能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以及广大劳动人民反对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是当代反对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特定阶级内容，也是当代反对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特定的阶级斗争性质。

这是我们正确认识当代反对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问题的理论原则和理论基础。任何离开这一理论原则的想法和说法，都是对马列毛主义的偏离，都不可避免地会陷入错误和荒谬。

二、正因为反对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反对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因此，这一阶级斗争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下展开的。没有第二种可能。没有其他任何一个阶级或政党可以担当如此重大、如此艰巨的阶级任务、历史任务。

三、全世界范围里反对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霸权主义的阶级斗争，既然是无产阶级反对垄断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它当然也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它的方向、它的要求、它的前途，只能是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

我们的这些认识，主要来自于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曾经参加的反对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霸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大家都知道，正是基于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特别是基于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创新和发展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理论原则，中国共产党曾经向各国共产党、工人党明确提出了一条正确的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总路线。这就是：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在我们看来，这就是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见《建议》）

“这条总路线是从世界现实的全局出发的，是从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的阶级分析出发的，是针对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全球战略的。”

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建议》说：“这条总路线是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无产阶级为核心，建立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反动力量的路线。”

正如《建议》强调的：“这条总路线，是各国人民坚决进行革命斗争，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进行到底的路线；也是最有效地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路线。”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所发表的包括《建议》、《九评》等在内的许多重要文件，都是在反对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修党提出的关于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的“三和两全”（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基础上，捍卫、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这是毛泽东主义的一个崭新内容，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发展到了毛泽东主义新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些文件，对于正确理解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的斗争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正如大家都知道的，正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制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政党、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全世界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团结一道，掀起了反对美、苏两霸的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大大地推动了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发展，获得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胜利，例如全世界范围内的反对殖民主义压迫、剥削，争取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就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取得了基本胜利。

我们今天依然应该学习毛主席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一系列的教导，进一步深刻领会毛主席的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霸权主义的理论和策略，并把这种学习和正确认识当前普京发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结合起来，和正确认识美帝国主义等一切帝国主义结合起来。

我们上面所讲的三点意见，就是学习毛主席思想的体会。

# 没落小资产阶级“中帝论”的三个阶段
## ——从小列宁、红色瓜伊多到“润”

井冈山卫士

现在我才慢慢想明白，他们的想法，尤其是普遍的想法，必须从其阶级地位和现实利益入手。

最初，中国新生的小资产阶级左翼激进分子，在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前途认识不明的情况下，幻想徇列宁往事，通过自封“先锋队”和对劳动人民“灌输”（包括对其他可能自封“先锋队”的人或团体开除左籍），来在幻想中克服他们在实际斗争中克服不了的组织性问题。把列宁针对特殊情况的只言片语当成是翻转阶级力量对比的灵药。同时，在自己的想象中把东南沿海的新工人当作是自己天然的知音和“中国最革命的阶级”。这一阶段，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虽然绝望，但是至少表面上还没放弃中国革命的目标，甚至其念列宁的经，也是试图用列宁的“指导”来充实自己的力量。这一条道路可以称为”中国小列宁道路“。

佳士学生运动失败以后，敢于下大功夫“融工”的团体不复存在了。而此次运动的实践也表明，除了学生从学校带去的几个工人积极分子以外，佳士工厂的工人几乎没有被“独立工会”等不现实的政治目标动员起来。实际上，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对“先锋队”和“灌输”已经不再相信了。进而，他们对中国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已经完全失去了希望。但生活还要继续，正好香港排华运动给了他们某种“希望”，即可以借助颜色革命“外援”的情况下（香港运动并无以推翻中共为目标的外援），和自由派达成统一战线，首先取得资产阶级民主，争取到左翼组织的

“合法”发展空间。然后视情况转回第一条道路，或者干脆选举上台。这一条道路可以称为“红色瓜伊多”道路。

在香港运动失败，中国资产阶级轻易地扫灭了香港方面的有形政治组织以后，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一度想要和方方等新冠期间冒出来的自由派代表达成妥协，共同投入到”联资反官“的斗争中。然而，尽管这些错估形势的自由派后来也被一定程度上压制，但是中国的抗疫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抗疫政策越来越干扰到一般小资群众（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的主要来源）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条件：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而且，目前高压抗疫政策并没有明显要松动的迹象。这样，不仅是政治活动走不通了，吃饭都成了问题。在看不到中国资产阶级疲于奔命遭到削弱的短期现象和阶级斗争越发不利于资产阶级的长期趋势的时候，他们对列宁道路和瓜伊多道路都绝望了。只能寄希望于移民国外，成为独运轮等的附庸，或者脱离被他们称为“封建”国家的土地。这已经不是什么道路了，这是在革命浪潮中被甩出去，退出政治运动的先兆。

在第一阶段，“中帝论”是列宁“帝国主义最薄弱一环”的某种现成模版。此时的“帝国主义”，仅仅指的是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发展成熟，因此与之配套的“先锋队”和“灌输”也是可采取的策略。同时，“中帝”主动挑起扩张战争也能迎合小列宁的思维模版。

在第二阶段，“中帝论”开始称为某种压迫性国家机器的统称。此时的“帝国主义”，主要指的是中国是各民族人民的监狱，中国自己的革命者不行，因此需要外部力量哪怕是中情局来帮着劫法场。

在第三阶段，“中帝论”开始失去一切政治意义。此时的“帝国主义”已经是一句咒骂“反动性”的脏话了。

# 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文字直播的预告

远 航 一 号

今天（11月8日），美国举行中期选举，改选全部众议员、三分之一的参议员，另有36个州将进行州长选举。在州长选举中，比较关键的有亚利桑那、内华达、威斯康星、密歇根、宾夕法尼亚等州的州长选举。

这次中期选举是在美帝霸权由衰落走向崩溃、美国国内阶级矛盾极其尖锐的背景下发生的。目前，美国国内政治舞台上有三种力量。首先，是代表美国大资产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利益、实行反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及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民主党。民主党除了得到绝大多数大资产阶级支持外，其主要群众基础是沉迷于反动“身份政治”的全球化小资产阶级，并以“黑命贵”等流氓无产阶级犯罪团伙作为自己在底层的打手。美国的大多数所谓“进步”的、“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前“激进”分子已经沦为大资产阶级的政治附庸及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吹鼓手。

目前在美国，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及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主要是以特朗普为政治代表、反映美国中小资本家利益但同时得到美国各种族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拥护的美国人民力量；其政治上的表现形式是以“美国第一”或“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为口号的共和党人。他们反对靠选举舞弊上台的拜登当局劫贫济富的通货膨胀政策，反对破坏工人阶级斗争与团结的非法移民政策，反对危害工人阶级子女和家庭的“身份政治”，反对令劳动人民朝不保夕的城市犯罪，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海外军事干涉，反对美国大资产阶级在乌克兰问题上进行战争冒险。

美国政治舞台上的第三种力量是“犀牛派”共和党人（犀牛一词来自于“名义上的共和党人”的英文缩写：RINO），又名共和党“建制派”。“犀牛派”共和党人代表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及传统能源工业的利益。在特朗普崛起以前，这一派势力控制着共和党。特朗普崛起后，美国大资产阶级失去了对共和党的控制。“犀牛派”共和党人演变为大资产阶级安插在共和党内的内奸，他们一方面在减税、“身份政治”等相对次要问题上假装迎合劳动人民的要求，另一方面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媒体（如福克斯新闻电视台、《华尔街日报》）与其它美国主流资产阶级媒体（比如最反动且最好战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及各主流电视台）一起不遗余力地诋毁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拒绝向特朗普派候选人提供他们所掌握的竞选资金，甚至在国会中与民主党合谋对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展开政治迫害。

随着美帝国主义国内外矛盾的增长，以特朗普派为首的美国人民力量的政治影响不断增长。这次中期选举将影响美国国内各阶级、各政治派别的力量对比，并对全球阶级斗争形势产生一定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有可能重施其2020年的故伎，通过选举舞弊来挽救其颓败的形势。不过，在有了2020年的教训以后，美国人民已经提高了警惕，在若干个州加强了反选举舞弊的斗争。此外，由于美国国内外矛盾的发展，美国大资产阶级在是否要对特朗普派斩尽杀绝还是与特朗普派达成某种妥协方面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此次中期选举的舞弊问题可能不像2020年大选中的舞弊那样明目张胆、肆无忌惮。

# 关于马列毛积极分子在当前群众斗争中态度和立场的初步建议

远 航 一 号

各位同志，过去几天，国内各大城市爆发了反对资产阶级当局反动封控政策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经与编辑部部分同志商量，下面就当前斗争形势提出一些初步建议。因形势发展迅速，来不及与编辑部全体同志及候补编辑同志协商，建议中如有错误和不足，欢迎各位编辑同志和各位网友提出批评和修改意见。

本月25日，在乌鲁木齐市爆发了反对资产阶级当局的反动封控政策、要求恢复正常生活的大规模群众抗议活动。此后两天，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成都、兰州等多个城市爆发了群众示威游行。据初步了解的情况，各地示威游行的规模分别达到数百人至数千人不等，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全国范围的群众斗争高潮。在各地群众斗争中，一部分是由小资产阶级自由派分子领导的，并引起了帝国主义国家媒体的报道和关注。

自2020年新冠疫情开始以来，资产阶级当局在全国各地反复多次实行非法限制人民群众出行自由的所谓“封控”政策，给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困难，在一些地区因各种原因造成了相当数量的不必要的死亡。资产阶级当局借防疫为名，强迫人民使用所谓“健康码”，妄图对政治活跃人士以及一般人民群众实行全方位的监控，随时镇压各种可能的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活动。在忍受了持续数年的艰难困苦并且新冠疫情的致死率事实上已经大幅度下降以后，广大人民群众反抗封控的斗争是完全正当的，应当得到我们的支持。

但是，小资产阶级自由派分子的大量参与以及对部分地区游行示威斗争事实上所起的领导作用使得当前斗争形势有着一定的复杂性。中国目前以及未来数年并不具备革命形势。这次群众斗争高潮，除了在乌鲁木齐等地确有广大劳动群众参加外，在北京、上海、广州等所谓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线”城市，参加示威游行的主要是小资产阶级自由派或受小资产阶级自由派影响的学生（在当前政治条件下，学生运动实际上就是小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由于小资产阶级自由派脱离广大劳动群众，也由于工人斗争高潮尚未来临，目前的群众斗争高潮不具备发展为革命形势的条件。

在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时期，由于资产阶级掌握着全部传统媒体以及绝大部分社交媒体，由于资产阶级一部分势必与小资产阶级自由派勾结并相互利用，由于国际帝国主义为了干扰中国阶级斗争的目的必然要煽风点火并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自由派摇旗呐喊，小资产阶级自由派在群众斗争中发挥一定作用乃至在某个时期、某些地方窃取群众运动领导权，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情况，只有在革命形势来临以后，随着斗争的发展，尤其是随着广大劳动群众在现实斗争中愈加认识到哪怕是他们最起码、最基本的利益在资本主义中都无法满足时，才能发生根本的转变。

作为以出口制造业为主要职能的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造成一个越来越强大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队伍，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也必然提出越来越广泛的经济和政治要求；而中国资产阶级必然无法获得充足的剩余价值来一方面维持相当规模和速度的资本积累，另一方面满足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最起码的要求。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由新冠疫情和资产阶级反动防疫政策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艰难困苦进一步加剧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矛盾，但并不是中国资本主义矛盾必然无法解决与克服的决定性因素。资产阶级内部对于目前的防疫政策以及在监控、镇压人民方面到底采取怎样的措施，意见也不统一。

中国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正在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加速枯竭。这种剩余劳动力枯竭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两大阶级力量对比的根本变化。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最终将使得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剥削的斗争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有力，直至形成全国范围的资本主义劳动纪律总崩溃的局面。过去一个时期河南富士康工人的斗争及其取得初步胜利的经验，便是未来资本主义劳动纪律总崩溃的一次演习。富士康工人的斗争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区别于各地群众单纯反抗封控的斗争，更区别于由自由派积极分子所领导的表演式示威斗争。

中国的资本主义积累离不开对亿万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一旦资本主义劳动纪律总崩溃，资本主义经济将无法再维持下去；一旦资本主义积累秩序总崩溃，资产阶级的统治也就无法再维持下去。到那时，现实斗争的逻辑必将造成亿万劳动群众在政治上的迅速觉醒，从而造成马列毛积极分子与劳动群众全面和普遍结合的条件，劳动群众的短期和直接利益与长远和根本利益将趋于一致，从而劳动群众为了最基本、最起码利益的斗争就将引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

在未来革命形势来临之前，马列毛积极分子的基本任务仍然是进行思想和组织的准备，积蓄力量，大力发展和建设各种非正式的马列毛主义小组，并在群众斗争中锻炼自己。

关于当前正在发展的群众斗争高潮，我们初步提出如下几点建议，请各位同志讨论和批评：

一．冷静思考、密切观察，努力搞清楚参加当前群众斗争的各阶级、各个政治派别及其在斗争中所起的作用。

二．有条件的同志应积极收集关于此次群众斗争的各方面情况，尤其注意了解自己周围亲朋好友对各地斗争的立场和态度。

三．原则上不参加任何确系自由派领导的示威游行活动，但也不急于在公开场合对自由派的领导及其政治口号展开批判。对自由派立场及策略的批判，可以在斗争告一段落、对一般群众的立场和态度更有把握时，酌情进行。

四．如果部分马列毛积极分子本人有条件，并且经过观察后确认有些斗争确实属于群众自发的、反对资产阶级反动封控政策或争取其它群众正当利益的斗争，即使有自由派参加（但只要不是自由派分子领导的），马列毛积极分子可以参加这样的斗争。参加的目的，不是为了引导或“领导”群众，也不宜提出政治性口号，而是为了取得经验、得到锻炼。

五．建议国内公开存在的进步网站，立即开始调整以往关于防疫政策的宣传方针，停止对资产阶级当局清零政策的支持，以国内阶级斗争条件下适当的方式，响应人民群众的要求，配合人民群众反对封控的斗争。

六．兵无常势，水无常形。阶级斗争是复杂尖锐的社会现象，既要服从历史必然性，又不能不带有相当的偶然性。此次群众斗争高潮尚在发展中，虽然不会发展为革命形势，但仍有可能沉重地打击和动摇目前的资产阶级统治，加速中国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所有马列毛积极分子都要抖擞精神、枕戈待旦，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随时调整认识和判断，并准备根据现实斗争发展的需要参加到更加艰苦、更加伟大的战斗中去。

# 阶级斗争是靠力量打赢的，不是靠演戏演赢的

井冈山卫士

这一段时间集中爆发的斗争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以郑州富士康运动为典型的工人运动。第二类是以乌鲁木齐为典型的在全国范围爆发的“反封控”运动。第三类是以上海“游行”为典型的、在帝国主义使领馆密集城市爆发的小资产阶级和学生的政治运动。

三种运动目前出现了此起彼伏的局面，但是其根本性质是不一样的。

第一类斗争代表着中国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具体到郑州富士康而言，工人先是捍卫自己不受感染的基本生存，再是捍卫劳动收入的基本生活。在面对生死存亡和血汗钱的这种紧迫的短期利益时，工人没有退路，因而爆发出了近40年来罕见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战斗力。最终取得了局部胜利。对于中国资产阶级全局而言，他们需要通过维持超长劳动时间、极高劳动强度来维持已经摇摇欲坠的利润率，并且要维护世界资本主义积累秩序的稳定。从宏观上讲，资产阶级也没有退路，这也是生死存亡的斗争。本次资产阶级的让步是局部的，但是势必会对未来的工人斗争产生积极的影响。红色中国网向来认为，中国革命运动的总爆发是建立在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基础上的。因此，任何类似于富士康工人运动的斗争，都在勒紧资产阶级脖颈上的绞索。

第二类斗争代表着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部分小资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一部对资产阶级统治集团某一派系具体政策的斗争。正如远航一号所讲，中国的封控政策有可能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整体的负担。其继续执行有可能是资产阶级内

部某一派系的政治赌博以及与该派系相关的资产阶级集团（实力较弱）维护“封控经济”之下既得利益的结果。此时，反对封控的一方，尤其是受其影响较大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是有着巨大的短期共同利益的。这种短期共同利益通常会在发生与封控相关（甚或无关）重大人道主义灾难时集中爆发。而如果同时多个城市收紧封控，反封控斗争就有可能发生连锁反应。从资产阶级角度讲，除了中央某一派系和当地的某些具体集团外，其对反封控斗争的镇压态度是不积极的。封控对于整个资产阶级来讲，是可有可无的。这场斗争是最有可能在近期取得一定成果的。但是，当反封控斗争取得胜利的时候，反封控多阶级联盟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也就不复存在了，其全国连锁的斗争局面也会迅速走向涣散。如果需要借着反封控斗争胜利的余威推进其他斗争，则需要根据当地具体的阶级矛盾进行判断。

第三类斗争由前两类斗争催生，但是被掌握媒体的自由派利用。中国的小资产阶级自由派自从诞生开始就与中国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直接敌对，因此其所提出的所有政治诉求都和群众的切身利益毫无关联。其排队喊口号的时候还经常被群众嘲笑。他们在高校学生中有一定的支持度并非偶然。今天中国的高校学生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各式各样的封控中度过，其基本的生活娱乐完全无法满足，同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减缓也在剥夺其就业机会。因此，绝大多数高校学生面对的是现实不堪忍受、未来凄惨灰暗的局面。而在人群聚集的高校宿舍，这种社会压抑会被迅速传导放大，任何一个火星投入进去都有可能形成爆炸。这是此类斗争与前两类斗争类似的地方。但是，高校学生本身并非直接是工人，中国资产阶级并不直接依赖他们生产剩余价值，因此资产阶级除了担心政治声望以外，并没有对他们进行妥协的必要。而脱离直接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学生自己也并没有明确的经济目标，只要封控解除，其斗争精神自然也会消散。因此，学生斗争看起来来势汹汹，但是只要资产阶级一方面放开封控，另一方面加强镇压，是不难对付的。

自由派深知单凭自己无力撬动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结构，但是他们幻想帝国主义会推翻这个对世界资本主义高度负责的现政权。因此其一切政治行动全部围绕着媒体。即试图把几百人的学生游行用行为艺术的方式包装成几万人的革命运动，然后将其作为某种“导火索”献给帝国主义邀功请赏。他们自然不会在乎会死多少人。

作为中国革命的一份子，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和自由派比赛谁更激进。阶级斗争是靠力量打赢的，不是靠演戏演赢的。

# 假清零，真共存
# 新冠疫情以来中国阶级斗争形势与防疫路线变化

今天不举白纸、洛洛、爱丁堡上单、爱国群众

## 资产阶级的武器

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做出过这样的论述：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

这表示资产阶级只有保持足够大规模的产业后备军，才能确保雇佣劳动得以存在，才能确保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

运用产业后备军的方法大概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是在现有城市工人阶级队伍内制造失业，第二种是河南那样去村里抓壮丁，将廉价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到城市资本主义部门。在资本主义正常时期，产业后备军是资产阶级用于压低工人工资、向工人阶级进攻的主要武器，资产阶级正在普遍的运用这两种方法来维

持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劳动纪律，维持半外围资本主义对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维持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

在疫情初期，资产阶级普遍采取在局部制造失业、停产停工等清零措施以打击力量逐渐增强的工人阶级，也就是采取了第一种方法，这一具体措施由与资产阶级形成利益交换同盟的地方政府来执行，在资产阶级的设想中，“动态清零”不仅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新冠病毒的大规模流行，在短期内可以维持中国国内资本积累秩序，还可以有效压低劳动力价格以履行中国作为半外围“世界工厂”的职能：

我国外贸进出口从2020年6月份起连续7个月实现正增长，全年进出口、出口总值双双创历史新高，国际市场份额也创历史最好纪录，成为全球唯一实现货物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根据WTO和各国已公布的数据，2020年前10个月，我国进出口、出口、进口国际市场份额分别达12.8%、14.2%、11.5%，均创历史新高。

武汉封城的胜利大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与声望，这使得中央政府将清零的防疫路线同整个国家的兴衰命运捆绑起来，地方政府也在中央的清零路线下为了政绩而开展清零工作（地方官僚的升迁名义上取决于中央官僚），凭借武汉的成功，中央政府铺天盖地的宣传自己的权威性，大大增强了其统治合法性。

在清零过程中初步形成并愈发壮大的防控相关产业的利益集团也开始同地方政府形成利益输送关系，地方政府大规模利用简单粗暴的行政（黑社会、外包抗疫）力量维持疫区稳定，而不必消耗高技能医疗资源，资产阶级及其豢养的黑社会又可以借助地方政府大量的外包业务，以此公开的控制、侵害劳动群众，这样的事情直到今年都还在发生：

针对有网友投诉山东防疫人员拖拽殴打居民一事，临沂市公安局兰山分局于11月8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通报，11月7日16时许，兰山区兰山街道社区防疫工作人员陆某亮、赵某政、赵某洲等人与社区居民发生冲突，并实施拖拽、殴打等行为。案件发生后，公安机关立即受案调查。目前，违法行为人陆某亮、赵某政、赵某洲等7人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因此，资产阶级、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在过去是支持清零路线的。

但随着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上述客观条件逐渐不复存在。

## 不缺工人的用工荒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的第一年。经过20年上半年的强力封控，中国在短短半年内扑灭感染，经济进入复苏期的同时，劳动力短缺逐渐成为限制资产阶级重启生产的难题：

“不缺订单，缺的是人。”这是记者近期在山西大同、江西景德镇等地调研时，不少县域企业和小微企业发出的呼声。眼下，缺乏熟练工人，尤其是缺乏综合素质较强的复合型技能人才，已成为企业发展“拦路虎”。

“有些订单找上门，我们却不敢接，主要是怕产量跟不上。”山西省天镇县腾飞服饰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王佳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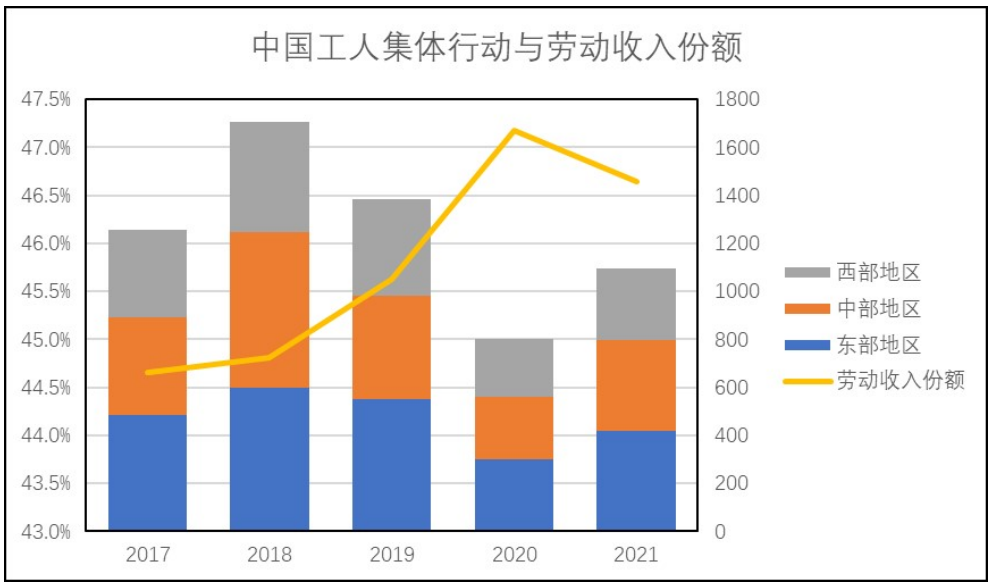
劳动力的短缺让资产阶级不得不做出让步，通过提高工资以招到足够多的工人：

江苏某电子企业人事招聘专员王金超说，在国家标准的三倍工资以外，我们还会额外每人奖励150～200元/天，这种额外的奖励，也算是一种补贴。

因此，2020年，中国经济中的劳动收入份额增加到了47.18%，实际工资增速为5.3%，而当年GDP增速只有2.3%。

进入2021年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逐渐转入正常时期，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得到解决，资产阶级不再需要提高工资来招聘工人。而“动态清零”除了可以短期内扑灭局部疫情外，又有着制造局部失业、加强社会监控以打击工人阶级的好处，这使得“动态清零”成为了资产阶级压低劳动力价格、镇压工人斗争的“技术性武器”。

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还需要时间去适应新的斗争，资产阶级暂时取得了优势。2021年，中国经济中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到了46.65%，与此同时，中国工人集体行动数量上升由2020年的801次上升到了1094次。




随着新冠病毒传播性的演化，随着世界各国经济复苏，随着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剧变，“动态清零”路线对资产阶级的增益Buff效果开始消失。

2021年，中高风险区的数量与影响范围仍在资产阶级的可接受范围内：

截至2021年12月31日9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现有疫情高风险地区2个，中风险地区65个。

但到了2022年8月，中高风险区的数量激增：

截至2022年8月15日20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现有疫情高风险区722个，中风险区609个，低风险区140个。

在封控区域及影响范围急剧扩大的2022年，资产阶级为了确保其对剩余价值的攫取，选择了在工业区内实行闭环管理的同时继续进行生产的措施：

11月23日，市经信委消息称，截至11月21日，全市6600家规上工业企业中，有5096家实施闭环生产，占比77.2%，合计在岗员工104.5万人，在岗率为69%。

在封闭管理的工业园区中，资产阶级“被迫”与无产阶级“静态共存”：

目前，该厂各车间管理干部全部坚守在第一线，有序安排生产。为确保一线作业职工能够吃好，除了食堂外，封闭在厂区内的四家大型食店正常开放，保障

大家多样化饮食需求。同时，除了厂内的公寓，还将办公室、会议室等地改成临时宿舍，并为大家发放生活所需各类物资，保障工人的住宿需求。

资产阶级采用闭环管理保障生产的的结果就是劳动力转移受阻，资产阶级无法在短时间内采取主动制造普遍的局部失业的第一种办法，也无法采取从外地招工的第二种办法。如此一来，资产阶级手中能够打击无产阶级的武器便全部哑火，阶级斗争中的力量天平正随之发生变化。

工人阶级在长期清零中逐渐适应了此种条件下的斗争，摸索出了以维护劳动者身心健康等休息权为表现的斗争方式——“工人感染了要去休息，资方要承担隔离费用。”

由于长期“动态清零”导致产业后备军这一武器的短期失效，无产阶级在封闭的工业区内进行的此种斗争对资产阶级形成了有效打击，资产阶级被迫生产暂时中断、延长生产周期、提高用工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劳动者权益，并且增加了资产阶级的积累成本。

在过去，资产阶级支持清零的动机之一便是制造普遍的局部失业，加剧劳动力市场非正式化，以此打击无产阶级，但长期坚持“动态清零”的结果便是劳动力区域间转移受阻，各个地方政府之间为了防止感染病例跨地区传播，制造了大量限制人口流动的壁垒，资产阶级难以像过去那样从农村拉来大量廉价劳动力去打击罢工工人，闭环管理下的工业区又为工人阶级的集中、团结创造了有利的斗争条件，资产阶级被迫面对着“封控区外有雇不到的产业后备军，封控区内又有无法无天的工人”的情况，雇佣劳动存在的必要条件短暂的被削弱了，这就在整个阶级斗争形势上造成了对资产阶级相对不利、对无产阶级相对有利的局面，这种相对有利的局面集中反映在以2022年富士康事件为代表的各地工人群众斗争。

出于此种原因，资产阶级开始反对“动态清零”。

## 阳奉阴违，走向共存

随着长期“动态清零”的副作用不断显现，资产阶级从它们的利润总额上直观的感受到了威胁：

1～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2648.9亿元，同比增长1.1%；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0877.4亿元，下降2.1%；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6617.2亿元，下降7.6%；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9641.2亿元，下降8.1%。

由于“动态清零”路线在越来越多的地方被越来越长时间的执行，资产阶级开始难以应对工人斗争了，资产阶级要求地方政府必须拿出更多的手段去满足两点目标来维持利润率，既要打击工人降低劳动力成本，又要给企业减税以缓解利润份额下降趋势，加之虚高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地方政府的财政陷入紧张境况：

1～10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52166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2.7%。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62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3%；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4853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4.3%，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4402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5.9%。

在资产阶级反对“动态清零”的情况下，在地方财政陷入紧张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既无心也无力坚持“正常”的“动态清零”路线，这就与中央政府对“动态清零”的政策要求产生了冲突，因此地方政府在相当程度上选择阳奉阴违的执行“清零”路线。

由于地方政府无法维持“正常的”清零措施，自然就会在微观上主动或被动的拒绝执行中央政策（例如新二十条），并且放任基层大搞一刀切、形式主义、外包等等，在物资配给等等一系列环节为资产阶级提供寻租的空间，资产阶级得以借助这般“假清零”压榨民脂民膏：

2022年前五个月，乒乓响在营业收入同比下滑的情况下，净利润却实现了同比50%以上的增长。2019年、2020年、2021年以及截至2022年5月，乒乓响的毛利率分别为28.9%、38.2%、33.8%、53.4%，也就是说，在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近半年时间，乒乓响的毛利率几乎是2019年的两倍。

上海疫情封控期间，大多数超市及食品市场被迫关闭，导致供应短缺。与此同时，由于住宅区被暂时封锁，行动受到限制，农产品上门配送需求激增，农产品市场售价相对较高。而在此期间，仅被列为供给保障重点单位的公司方获允许提供及配送农产品与其他食品。而乒乓响就是其中的一家。

而大批受资产阶级豢养的基层黑社会集团，则打通了资产阶级压榨民脂民膏的“最后一公里”，2022年上半年上海疫情中赚的盆满钵满的“团长”就是最好的证明：

“4月份外卖物流九天净赚908.82万。我租了一些货车，找了一些关系一些人，找了认识货源供应商，然后再联系一些小区负责人。每天联系好各个小区要物资，然后发货到小区门口。算了一下上个月净赚了3006.93万，现在疫情期间我们进价比平时还便宜，卖的是进价十几倍。好多我这样的人这段时间都赚的盆满钵满。荤菜素菜一个礼包500元利润250元以上，每天发5000份的中间商多的是，有的企业一天发1万多份。”

清零过程中形成的防控利益集团同上述问题形成了交叉，在地方无力承担长期清零风控、基层秩序逐渐走向黑社会化与诸侯化的情况下，防控利益集团为谋取更大利益就必须要求疫情扩大化、“清零”长期化，利用掌握的核酸检测机构干预疫情防控工作。

核酸检测机构利用虚报“假阳性”以延长疫情周期，或是虚报“假阳性”以加速疫情扩散：

11月13日上午，接到群众举报，在我市重点区域核酸检测中，内蒙古赛斯基因科技有限公司错报核酸检测结果，将部分群众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反馈为阳性，给群众造成了极大的恐慌。目前，错误数据已更正，卫健系统已经依法停止了该机构的执业活动，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兰州核子华曦实验室收到核酸检测样本，按照实验室检测流程，于11月23日18时许将检测结果异常人员信息推送至七里河区联防办，区联防办第一时间通知社区告知相关人员原地等待转运。11月24日1时许，兰州核子华曦实验室工作人员误将个别核酸检测异常人员名单信息录入阴性人员信息包中上传至工作系统，使个别待转运人员健康码显示核酸检测阴性。此次事件的发生，干扰了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和疫情防控工作，暴露出兰州核子华曦实验室对工作人员管理不严格，审核把关不到位。我们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兰州核子华曦实验室予以严肃处理。

防控利益集团已经在多地、多次造成“越清零、阳越多”的局面，基层群众的生活、工作、学习完全被愈发糟糕的封锁政策打乱。

最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这些核酸检测公司的注册时间不但与所在地每次发生疫情的时间十分接近，而且一部分公司注册时间就是在当地爆发疫情之前，也就是说，先注册，后爆发疫情。

例如太原本轮疫情开始于11月19日，而“太原核子华曦”成立于10月21日。再例如北京本轮疫情自十月份开始陆续增加，十一月初数量激增。而“北京核子华曦”成立于9月29日。还有大连10月19日时全员核酸检测尚无一例，而自从“大连核子华曦”10月14日注册之后，截至11月24日，大连日新增新冠病例67例……

在防控产业利益集团同地方资产阶级、地方官僚之间逐渐合流的情况下，利益集团要求的“共存”是通过以加剧疫情扩散为目的的“清零”来实现的，否则一旦真的取消全员核酸、物资配送等等措施，这些防控产业利益集团就无法谋取暴利了，以“清零”为名的“共存”成为地方政府实际上的政策选择。

“动态清零”，这个曾经让资产阶级短暂摆脱新冠疫情重启生产的“强国骄傲”，这个过去让资产阶级短暂利用新冠疫情打击工人阶级的“技术性武器”，这个现在让资产阶级搬起、却又狠狠砸在资产阶级脚上的“石头”。

在全国各地劳动群众反对“野蛮防控”的斗争中，“动态清零”已经面临重大挑战。

这一挑战既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也来自资产阶级为维持劳动纪律、重新回到资本主义“正常”状态的要求，还来自地方政府日渐紧张、甚至是困难的钱袋子。

这一重大挑战既会造成愈演愈烈的群众运动，也会造成资产阶级同中央当权派的矛盾公开化、尖锐化，还会造成地方政府陷入自由化、诸侯化、黑社会化的局面。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以下矛盾正在发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国家的矛盾、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在野反对派与中央当权派的矛盾，尽管目前出现的政治涟漪并不意味着任何意义上、任何形式上的革命形势，但这些矛盾的发展将会加速“动态清零”路线的破产。

# 红色中国网不是小资的避难所，而是未来革命的铺路石

井 冈 山 卫 士

**远航一号注**：关于未明子、激流网的争论及马列毛左派发展问题，红色中国网编辑部进行了讨论。讨论中，井冈山卫士同志在答复某同志的疑问时概括阐明了红色中国网在今后一个时期应该采取的工作方针。下面是经过编辑后的讨论内容。

**某同志问**:

我所担心的是，如果将来事情发展起了对激流网有利而对未明子不利的变化，比如说，激流网他们的账目没有问题或者问题不大，再比如说，未明子的实践出了问题，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否会产生不利影响呢？毕竟现在国内左翼对于红中网的观点就是污蔑歪曲，污蔑我们是“老保”。在如今的情况下，已经有人歪曲我们站队未明子了。这在网左群体几乎一边倒支持激流网和佐伊的情况下对我们的声誉也有不少影响。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要和激流网本身作斗争还是和以激流网为代表的路线做斗争？亦或者是两者都要做斗争？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把“半外围”说清楚。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其他人会说 —— 红色中国网“支持”俄罗斯、特朗普，而且也会不认可由躺平到总罢工这种打倒资本主义的方式。毕竟《怎么

办》这本小册子对于左翼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其他一些左翼看我们的理论，往往就说我们是“修正主义”。

所以无论怎样，“半外围”这个东西是一定要说清楚的，但是，长期以来半外围论在墙内被学院派歪曲成“保皇”的标志。即使我们说得都对，也会被墙内的左翼歪曲，然后再当成批判的对象。现在已经有人歪曲我们和未明子是老保合流了。

总之，据我观察，现在双方的论点，包括其他左翼所关注的问题，就是未来革命道路到底如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仅和激流网不同，也和未明子不同。所以，如果要参与进去的话，我们一定要站稳立场，不能有半点含糊。

**井冈山卫士：**

某同志说得对，红色中国网的立足之本不是组织强制力，不是官僚机构，也不是所谓“领袖魅力”，而是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所有关乎中国革命和世界资本主义灭亡的重大问题都做出了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判断。当然，我们也有过判断失误，大一点的，有我们2017年对特朗普运动性质的判断，小一点的，有我们对佐伊23性质的判断。但是我们不怕犯错误，也不怕改正错误。我们要挣得的不是一时间成为“网红”，而是要分析总结本次中国革命的客观条件，判断可能的突破口，为革命胜利做准备。

既然我们是立足长远，我们的受众扩张速度就不可能在短期之内赶得上激流网和XXX。再加上我们中没有脱产人员，所有的进步工作都要挤出自己本身很有限的时间，这就更加困难。同时，国内的信息封锁加上大小宗派组织和左皮自由派经年累月的污蔑也给我们造成了一些困难。但是，这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今天中国左翼的阶级结构。我们的编辑和助理编辑基本上都出身于现代小资产阶级。我们走向进步的原因，要么是从上层小资爬向统治阶级失败，要么是我们作为小资产阶级的身份本身随时有可能边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要坚持真理，反对教条主义的中帝论和宗派主义的灌输论，就意味着，我们既要承认自己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没有向上爬的可能，也要在未来的革命中甘作革命群众的铺路石。这是需要一定觉悟的。这个觉悟，就是我们既要背叛自己在今天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属于的那个阶级的阶级利益，也不能把革命当作未来实现“阶级跃升”的手段。因此，在红色中国网这里，我们既不提供现实避难所，也不承诺精神避难所。

当中国左翼的队伍仍然主要由对资本主义不满却还有没有绝望，仍然渴求把参加进步运动当成是升官发财的旁门或者“与自由世界接轨”的左道的边缘化小资

产阶级组成的时候，我们在数量上“发展缓慢”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因此，某些小组的现实+精神避难所肯定要比红色中国网更能吸引一部分边缘化小资群众。

但是我们不怕！我们搞革命不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革命。我们不必担心暂时的误解，因为每次误解都会把观众吸引过来。其中愿意认真思考，愿意坦诚相待的人会留下来。这也是我们虽然没有另外一些小组有数量，但是在质量上却远胜于他们的原因。

就本次的争论来讲，我还是认为双方在理论上和组织上的“争论”都没有触及关乎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但是这次的争论有一个特殊意义，就是X提出的组织问题能够帮助一般群众打破对XXX神像的崇拜。XXX的水平我们就不说了，辩论道德也有很大提升空间，但是他的特殊血统却能够迷惑一般进步群众。这次X通过这种不正规的方法向他们发起挑战，已经让XXX左支右绌。以往XXX被我们打败的时候，宗派主义团体往往会集中对我们“软封杀”，但现在他们没有“软封杀”X的能力。

当然，我们和X有分歧。但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X本人与红色中国网之间会进行超过一般讨论以外的争执。如果这种讨论是健康的，那就让它健康地进行下去。如果不是，我们也不害怕。

我可以自信地说，在我们所经历过的所有左派内部交锋中，每次交锋都会壮大红色中国网的力量，都会为革命事业创造更多的优秀人才。越来越多的进步网友就是通过这样的交锋来认识红色中国网的。

# 看不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对国家机器就只能恐惧

今夜不举白纸、爱国群众、西红柿收割机

**远航一号注**：这是今夜不举白纸、爱国群众、西红柿收割机等同志针对“对‘新冠以来斗争形势与防疫路线’的批判”一文的反驳。今夜不举白纸等同志不仅摆事实讲道理，对“批判”一文做了有力的驳斥，而且深刻揭露了一批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畏惧国家机器、对前途悲观失望，其根本原因是眼里只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看不见、不相信无产阶级的斗争力量，不相信无产阶级的胜利前途。

感谢批评者提出的宝贵批评，我们在此做一下回应。

## 防疫路线

我们通过对大量的材料进行分析，得出未来大多数地方会放开的结论：

在全国各地劳动群众反对“野蛮防控”的斗争中，“动态清零”已经面临重大挑战。这一挑战既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也来自资产阶级为维持劳动纪律、重新回到资本主义“正常”状态的要求，还来自地方政府日渐紧张、甚至是困难的钱袋子。

批评者的反对理由是:

锦州刚开了核酸检测公司，人家刚投过毒，怎么可能就这么放开了，别把用善意揣测任何一个地方政府。

但是，根据辽宁卫健委、锦州发布的12月2日发布的最新通告，明显就可以看出锦州已经决定放松防控政策了:

自12月2日6时起，全市主城区（除各区公布的局部高风险区域外）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

1.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逐步有序恢复正常工作秩序。近期可根据疫情情况，安排“两点一线”上下班，或居家办公、网上办公。

2.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托幼机构、各类校外培训机构分期分批恢复线下教学，具体时间由教育主管部门另行安排。

不仅仅是锦州，新华社最新的时评也表明了防疫政策正在松动: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宣布陆续解封符合条件的高风险区域363个，广州、昆明等地也发布了解除一些地方临时管控区的公告。各地在封控管理中积极落实“快封快解、应解尽解”要求，努力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快封快解、应解尽解”是坚持科学精准防控的应有之义，是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快封”是为了迅速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快解”是为了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带来的不便。

“快封快解”考验的是干部担当和水平。部分地方防控措施中存在的简单化、层层加码、“一刀切”等现象，就与管理水平直接相关。疫情防控形势越是严峻复杂，越要发扬敢于斗争、勇于担当的精神，不断提高治理能力，在确保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把该管住的管住，该放的放开。

短短一天不到的时间，事实就已经证明了这位批评者是错误的。

我们说防控利益集团和地方官僚形成利益捆绑，他就批评我们没有说核酸检测开始的具体时间，并且认为我们没有讨论核酸利益集团和地方官僚的关系：

防控利益集团又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他这里根本没提核酸资本什么时候登场的，跟各级政府又是什么关系，核酸铺开前后各方对防疫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里面根本没提核酸铺开的时间。

批评者指责我们没有提及核酸利益集团形成的具体时间，这就如同农民在白天去田里锄地，一个知识分子跑去骂他："你怎么不说太阳从东边出来的具体时间？"用一位修车师傅的话来说就是：鸡蛋里挑骨头，脑残一样。

而批评者认为的核酸资本跟各级政府的关系是这样的：

核酸铺开之前，清零政策对地方官员本人并没有什么经济利益可言，封锁区涨价算一个办法，但是太容易被看穿，而核酸则提供了一个系统性合法洗钱的渠道，这个渠道只能通过封锁实现。

请大家看好了，我们在文章中明确的指出、并且强烈抨击了防控产业利益集团同地方政府的勾结关系：

在防控产业利益集团同地方资产阶级、地方官僚之间逐渐合流的情况下，利益集团要求的"共存"是通过以加剧疫情扩散为目的的"清零"来实现的，否则一旦真的取消全员核酸、物资配送等等措施，这些防控产业利益集团就无法谋取暴利了，以"清零"为名的"共存"成为地方政府实际上的政策选择。

这说明批评者要么存在阅读障碍，难以阅读字数在5千以上的文章，要么批评者就是犯了"唯我独革"的毛病，同样的一个观点，只有批评者说出来才是对的，别人说的就是错的。

批评者发扬了学院派的传统艺能，只要我们跟他的观点不一致，那么我们的观点就是"上面是好的，只是下面执行坏了"的错误观点：

根本没提常态化核酸是中央红头文件规定的，中央对核酸三年来是什么态度，这篇文章一个字都没提，而且叙事中有种地方在利益集团裹挟下把中央的好政策执行歪了的意思，虽然这篇文章没直说什么本意是好的，但是读了有这种感觉，至于为什么会写成本意是好的，那就不知道了。

根据批评者的逻辑，因为我们没有详细的探讨中央政府在核酸检测上的态度，所以我们就是错误的，又因为我们详细的探讨地方政府在核酸检测上的态度，所以我们是“中央的本意是好的、地方政策执行歪了”的错误观点。

我们为什么要侧重于讨论地方政府对“动态清零”政策的执行呢?

因为人民群众面对的都是直接执行政策的地方政府，我们重点讨论地方官僚如何与资产阶级、防控产业利益集团相互勾结，如何沆瀣一气剥削人民群众，这是符合绝大多数群众的切身经历与直观感受的，这也是有助于我们在对群众进行宣传时，让群众把我们的理论和他们的切身经历联系，更加易于理解。

批评者如果以“你们只讨论地方没有讨论中央，太浅显，太片面了”来批评我们，我们是完全接受且欢迎的，但批评者实际上是以“你们只讨论地方，你们是拥护中央政府的保皇派”来指责我们的，这是我们完全不能够同意的。

## 阶级斗争形势

在对这几年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上，批评者认为:

> 你也可以认为这篇东拉西扯没有实质论据的文章是对的，20年下半年防疫形势如何，好像一个字都没写吧。

我们引用了16份材料+1份工人集体行动数据+1份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测算结果，真的没有实际论据吗?

批评者认为我们没有实际论据，是因为我们没有引用批评者想要的“实际论据”——20年下半年的防疫形势，但是我们在文章中已经将其概括了出来:

>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的第一年。经过20年上半年的强力封控，中国在短短半年内扑灭感染，经济进入复苏期的同时，劳动力短缺逐渐成为限制资产阶级重启生产的难题。

在官方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中的数据也证明了我们的“非实质论据”的真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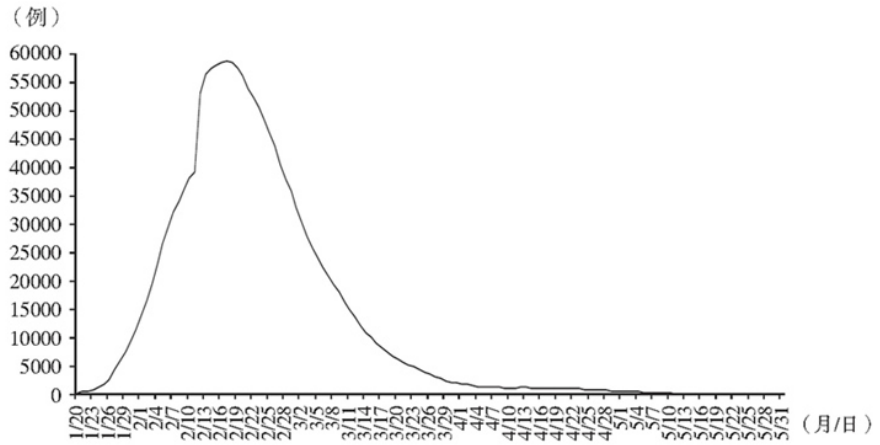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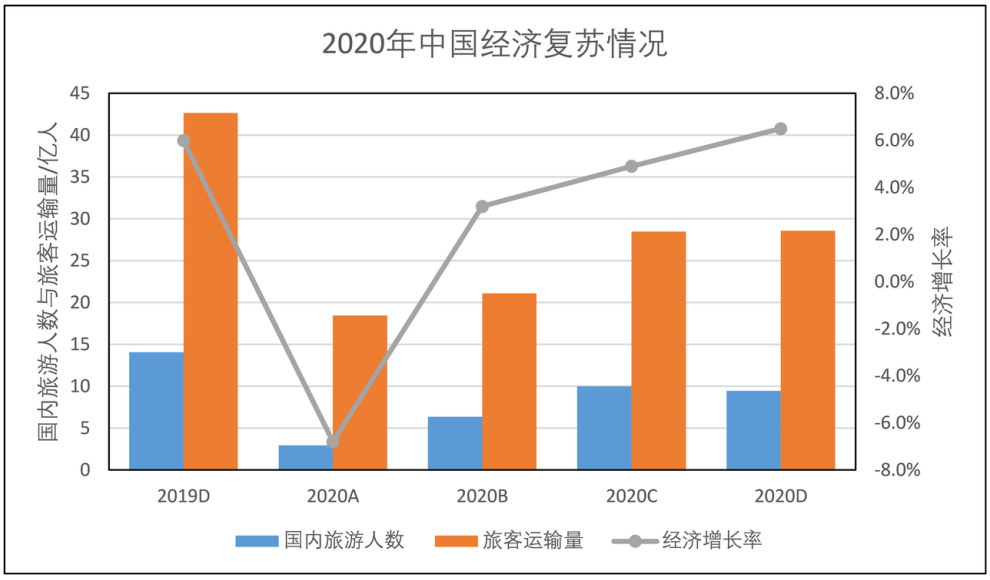



图 3　中国境内新冠肺炎现有确诊病例情况

不知道批评者是不是在2020年下半年被送进与世隔绝的大山里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源中人。2020年下半年相比于上半年，新冠疫情得到明显控制，社会经济生活明显复苏，这一人尽皆知的事实都要搞的非常超级神秘、迫真无穷复杂、亟待反复强调一样。

我们就再以2020年国内旅游业的情况来补充说明我们的观点是符合事实的：




因为我们没有在一个连刚上小学的娃娃都知道的情况上花上大量的笔墨进行阐述、分析，所以批评者无情的将我们的论据打成“一个字都没写”的“非实质论据”。

批评者认为我们使用资产阶级这个词是模糊的：

制造业民营资本家的态度，连服务业都代表不了，又怎么代表资产阶级的态度，服务业不喜欢防疫，但是制造业却没什么看法。

他认为超市不需要从工厂那边进货，商品就可以自动从货架上长出来，所以“服务业不喜欢防疫”，而工厂不需要超市去帮它销售，只要工厂一把货品生产出来就会自动变成一大沓的钞票，所以“制造业却没什么看法”。




如果制造业真没什么看法，那他是怎么解释富士康的？

工厂主和工人对防疫本身没什么看法，他们怕的是厂外疫情控制不住导致厂内疫情爆发，富士康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出事

大家可以细细品味一下，对防疫没有看法，对防疫很关心，这两件事情在批评者那里是划等号的。

不论是服务业资产阶级，还是金融业资产阶级，它们本身的所谓利润、分红、地租之类资产性收入，无不是来自对剩余价值的再分配，服务业的资产阶级要想放开后能够运转得起来，必须得让制造业先把东西制造出来，才能去进行各种“服务”。就“清零”还是“放开”这问题来说，服务业资产阶级与制造业资产阶级的立场目前是一致的，他们目前都是赞成放开的。

这一道理是简单的，也很容易在现实中就观察到，只不过在批评者的“全面的”、“正确的”分析下，这一孩童都知道的情况居然变成了“面包从货架上长出来、稻子成熟了就会立马变成钞票”的神话，刘慈欣看了也得扣一个“6”。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问题上，批评者也是毫不吝啬的展示了他超乎常人的非凡的智力水平：

整篇文章作者都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什么资产阶级要求恢复劳动纪律，首先这里资产阶级的用法就不对，而且政府亲自下场维护劳动纪律不知道作者是不是装瞎看不见。

劳动纪律是怎样维持的?

我们在文章一开头就引用了《共产党宣言》来说明雇佣劳动存在的必要条件——工人的自相竞争，这也是资产阶级得以维持劳动纪律的根本原因，然而批评者却把维持劳动纪律的原因归结为是“政府亲自下场”?

我想批评者可能是有着显著高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智力水平与政治斗争能力的第六大导师，把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的存在归结为政府对无产阶级的镇压，而不是广泛存在的产业后备军。

马克思明确的说了，产业后备军同就业工人的自相竞争，使得就业工人被迫从事超高强度的劳动，也就是服从于资产阶级的劳动纪律：

**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或工人的游离，比生产过程随着积累的增进本身而加速的技术变革，比与此相适应的资本可变部分比不变部分的相对减少，更为迅速。如果说生产资料在扩大自己的规模和作用的同时，在越来越小的程度上成为工人的就业手段，那末，这种情况本身又会由于下述事实而有所变化；劳动生产力越是增长，资本造成的劳动供给比资本对工人的需求越是增加得快。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军的队伍，而后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同时又按照与社会积累的增进相适应的规模加速了产业后备军的生产。**

马克思还说了，“资本的特殊剥削部门的广泛基础”在于“可供支配的”、“取之不竭的”产业后备军：

**第三类相对过剩人口，停滞的过剩人口，形成现役劳动军的一部分，但是就业极不规则。因此，它为资本提供了一个贮存着可供支配的劳动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这种劳动力的生活状况降到了工人阶级的平均正常水平以下，正是这种情况使它成为资本的特殊剥削部门的广泛基础。**

哪怕从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来看，维持劳动纪律的主要因素是失业的威胁——“不能接受加班就滚蛋”，我们现实中也很少会看到车间门口站着几个拿着枪的特警防止我们偷懒。

批评者对暴力机器有着非凡的认知，他认为半外围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是跟《1984》里的老大哥一样无所不能的，是可以轻松左右无产阶级的利维坦，然而我们都知道，现实中的工人阶级从来没有因为国家机器的镇压而就此放弃长期以来的斗争，富士康工人，纵使铁拳来袭，工人们怕过吗？还不是照样团结起来把前来镇压的“大白”打得落花流水！

为什么批评者会对国家机器如此迷信，甚至是恐惧？

因为批评者看不到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

*但我觉得沪的产业工人很失语啊，劳动密集型产业被转移了很多，有一点我确实不是很理解，为啥上海的无产阶级显得这么失语，城市面貌上，上海小资一句顶无产阶级一万句，简直像只有小资似的。*

批评者无视无产阶级的斗争，无视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批评者当然只能得出错误结论，批评者不是要分析阶级斗争形势吗？批评者连近年来上海多次的工人斗争都无视了，还怎么分析！眼里只看到大半夜跑街上举白纸的小丑，却看不到举着锤子同资产阶级、暴力机器战斗的劳动人民。

说到底批评者还是学院派思想作祟，脱离实际，脱离斗争，脱离群众。

# 希望激流网同志以大局为重，劝劝刘海庆同志——放弃对未明子的起诉

远 航 一 号

近日，在激流网与未明子（刘司墨）之间围绕着左派理论与实践策略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本来，在马列毛左派内部，围绕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各种争论（包括原则性的争论）都是正常的；一般情况下，也是有益的，有利于马列毛左派的发展。

然而，据悉，与此次争论有关的刘海庆同志已经发出声明，要求未明子删除与争论有关的一部分视频，否则将运用“法律手段”追究未明子“诽谤罪的刑事责任”。

此事，不知是否属实？如果属实，我们希望激流网方面的同志，以大局为重，劝一劝刘海庆同志。

我们认为，马列毛左派内部无论发生怎样的争论，都应该在左派内部来解决。将左派内部的分歧，交由资产阶级的法庭来“裁决”，无论有理没理，都是极其不妥当的；如果因此被资产阶级利用，进而操纵左派内部的不同派别，那就是极其错误的！

激流网以及与激流网友好的社交媒体都属于在左派内部有影响的宣传媒介。对于未明子的错误或者不符合事实的陈述，只要激流网及其友好媒体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是不难让大多数进步网友了解的；即使暂时不了解的，也应该给他们时间，包括给未明子同志本人时间，来逐步认识自己的错误。

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诉诸资产阶级法庭来强行“解决”某些分歧，不但不能让激流网及其友好人士处于有利的地位，反而会使你们显得虚弱无理（否则为什么要求助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呢？）。试想，你们今天可以求助于资产阶级法庭来处理这一纠纷，将来说不定哪一天，比你们更有资源的某种势力未必不会求助于资产阶级法庭来对你们实行某种压迫。到那时，你们又到哪里说理去呢？

几年前，李北方就曾经以莫须有的罪名威胁要起诉激流网。那个时候，红旗太平洋公众号曾经对激流网表示过支持，红色中国网转载了红旗太平洋公众号的声明。[32]

后来，激流网以大局为重，对李北方采取了礼让的态度，维护了左派的整体利益。

俗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过去李北方威胁要起诉激流网是错误的，今天刘海庆同志要起诉未明子，也是亲痛仇快的。

我们不了解激流网与刘海庆同志的具体关系如何。然而，如果你们与刘海庆同志确实有亲密友好的关系，希望你们能够劝劝刘海庆同志，以马列毛左派的大局为重，放弃“通过法律手段”的做法，坚持用马列毛左派内部正常的途径来解决与未明子同志之间的分歧。

我们相信，如果刘海庆同志这样做，对马列毛左派的大局有利，对激流网和刘海庆同志本人也有利。

32. 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32217

# 是“为了生意而主义”，还是“为了主义而生意”？的编者注

远 航 一 号

**远航一号注：**

……

这次未明子、激流网的争议涉及到马列毛左派工作中的一个实际问题。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马列毛左派积极分子也要生活、要吃饭。怎么解决好生活、吃饭的问题，不影响进步工作，最好还要对进步工作有所促进？这是一个重要和实际的问题。解决不好，不但无助于进步工作，还可能导致个人腐败变质、意志消沉，乃至严重破坏进步队伍内部团结。过去，马列毛左派以及工人积极分子在这方面都有不少教训。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红色中国网向来的看法是：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马列毛左派积极分子的生活问题主要靠在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上出卖劳动力来解决；至于进步工作所需要的时间及少量财务费用，则完全靠积极分子自愿贡献来解决。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公私分明，杜绝了贪污变质的可能性，避免了一切不必要的纠纷，也避免了被某些资本家或其它外部势力操纵的可能性。坏处是，日常工作依赖于积极分子在业余的投入，经费也极其有限，甚至于无所谓经费，只能维持一个比较小的摊子。当然摊子小客观上也有利于安全。

另外一些同志，一直主张左派发展要靠自己搞“经济建设”，也就是不依赖于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而是设法自己创收、办企业，当”红色资本家“，甚至有请求并得到某些资本家资助的情况。这方面的尝试，以往成功的不多，失败的不少。即使“经济建设”有一定成绩的，接踵而来的问题，就是怎样防止控制经济资源的领导者腐败变质（仅仅靠个人的理想和意志，往往不能长久防止），或者怎样防止左派小组沦落为提供资助的资本家的附庸。在这方面能长期经受住考验的，以往成功的经验也不多。

这些问题，是我们对于“经济建设”探索的一些顾虑。

# 阳和平及其追随者们想的还是“打江山坐江山”

井冈山卫士

**远航一号注**：下面是井冈山卫士在喜羊羊文章下面的跟帖，击中了阳和平一伙的要害。单独编成一个帖子供讨论。[33]

阳和平认为脑体分工只会更加细化，因此他设想的未来社会仍然是个分工壁垒森严的社会。其中，这最严格的分工壁垒就是“干部”与“群众”的壁垒。阳和平仅仅提出了任何一个资产阶级辩护士都提出过的“监督”，就想把如何向无阶级社会过渡这种革命的头等目标糊弄过去。其实想一想也很简单，阳和平自己也把干部（向无阶级社会过渡时必须削弱最终消灭的临时组织环节）和官僚（永久性的政治组织结构）并列起来，证明他根本不认为官僚是可以消灭的，阶级是可以消灭的。那么谁会成为未来的官僚？自然是今天谁是“先锋队”谁就是明天的官僚。今天他们的“先锋队”理论多么依靠“灌输”，他们幻想中对未来的“官僚”的监督就多么形式化。

既然限制官僚依靠的是可有可无的监督，那么官僚实质上就已经具备了篡夺生产资料、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一切条件。此时的官僚距离资本主义复辟也就是一步之遥。所以嘛，阳和平认为，如果无产阶级没能力组织生产，那就交给官僚，交给资本家好了。只要今天自我标榜的“先锋队”能作为官僚和资本家的位子就行。

33.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50934

这就是典型的打江山坐江山的想法。下一步也很简单，如果能在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获取上层小资的地位，那么连打江山都不需要了。

# 军　　事

# 乌克兰军事形势快评

草 庐 棋 士

**远航一号注**：鉴于目前乌克兰军事形势的迅速发展，红色中国网特邀军事评论员草庐棋士每日撰写军事快评一篇。该系列将持续至俄罗斯在乌克兰地区的主要军事行动告一段落时为止。

## (二月二十四日快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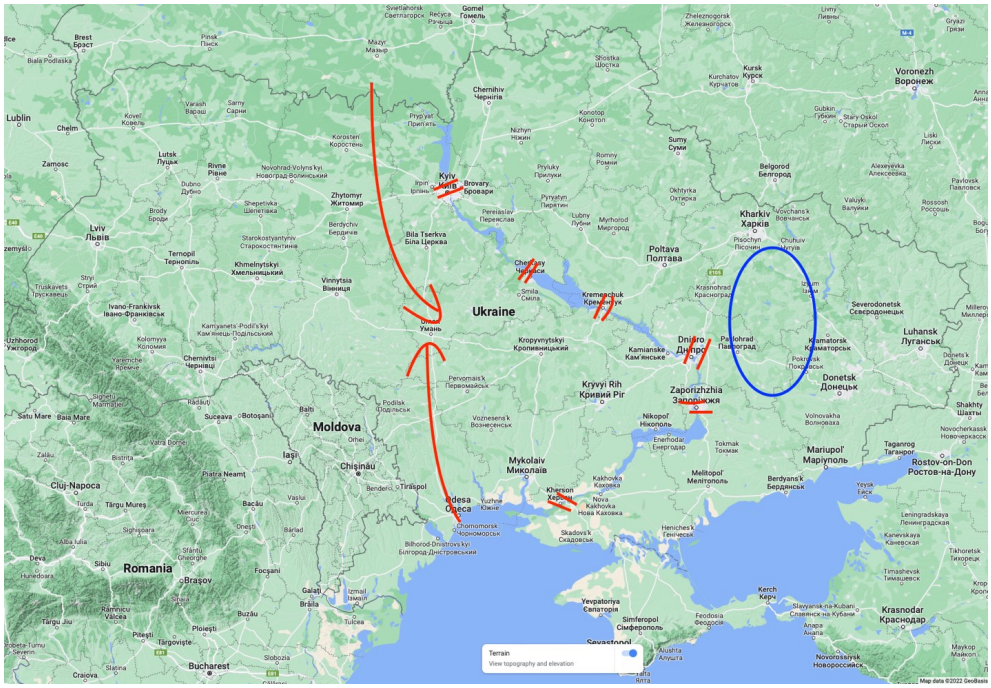
从昨日起，俄罗斯向乌克兰展开了全面军事进攻。在过去的16小时之间，俄罗斯已经成功消灭了乌克兰空军主力，瘫痪了乌克兰的大型远程防空系统，取得了制空权。目前，唯一能够威胁俄罗斯空军的就只有零星的野战防空系统。乌克兰陆军的调动将受到极大的阻碍。

乌克兰在战争爆发前挑衅性地将陆军主力调集到新独立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共和国边界上，试图将俄军挡在国门之外。但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是想要彻底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全面入侵。乌克兰过分突前的部署把陆军主力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在俄罗斯空中和地面力量切断了乌陆军主力与后方的联系之后，乌陆军就处在进不能进、退不能退的被动局面，可能在数日的炮击和空袭过后直接投降。

乌克兰被第聂伯河切割为东西两个部分。苏联时期修建的数座水库让第聂伯河河道明显变宽，这极大地限制了乌克兰陆军跨越第聂伯河调动的能力。如果俄军控制了基辅、切尔卡瑟、克列缅丘格，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几处主要桥梁，乌军就将被彻底困在第聂伯河东岸，成为瓮中之鳖。

目前，俄军正在用空降突击的方式封锁基辅，用两栖登陆威胁敖德萨。在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装甲部队和摩托化步兵只需数天时间就能封锁第聂伯河。

下图红色双线为第聂伯河主要桥梁，红色箭头为俄军在全面入侵中最有利的进攻意图。蓝色圆圈为乌军主力集结地。




## (二月二十五日快评)

俄军在乌克兰的行动目标是实现乌克兰的“去法西斯化”和“去军事化”。要实现前一个目标，就必须颠覆基辅当权傀儡政权，并且尽可能地清扫乌克兰地方和基层政权中的法西斯分子，为日后中立或者亲俄政权建立组织和武力优势。要完成第二个目标，就必须消灭乌克兰武装力量的大部，收缴其装备，以防被残余法西斯分子使用。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对于正规渠道被俘和投降的乌克兰军人，俄方将根据国际法给予战俘待遇。对于法西斯分子，该待遇不适用。

要扫灭法西斯中央和地方政权，就需要俄军配合乌克兰亲俄武装拔除各地的法西斯势力。由于乌克兰政府不得人心，这项工作本身并不难做。不过乌克兰人口众多，俄军兵力有限，不能在战争初期就将有限的兵力消耗在治安战中。因此，从军事角度讲，切断乌克兰与外界的海陆联系，将乌克兰封锁为封闭战区是最佳选择。

在昨天的军事快评中，本评论员设想了俄军控制第聂伯河主要桥梁和敖德萨港口的“最优计划”。在昨日快评发出之后，战局正在沿着预想的轨道发展。

第一，俄空降兵夺取了基辅西北方向的安东诺夫机场，在击退了乌军数次反攻之后等到了机械化部队的增援。现在，俄军正在从西面建立对基辅的包围。

第二，俄军占领了基辅东北方向的切尔尼戈夫，并从东北方向向基辅挺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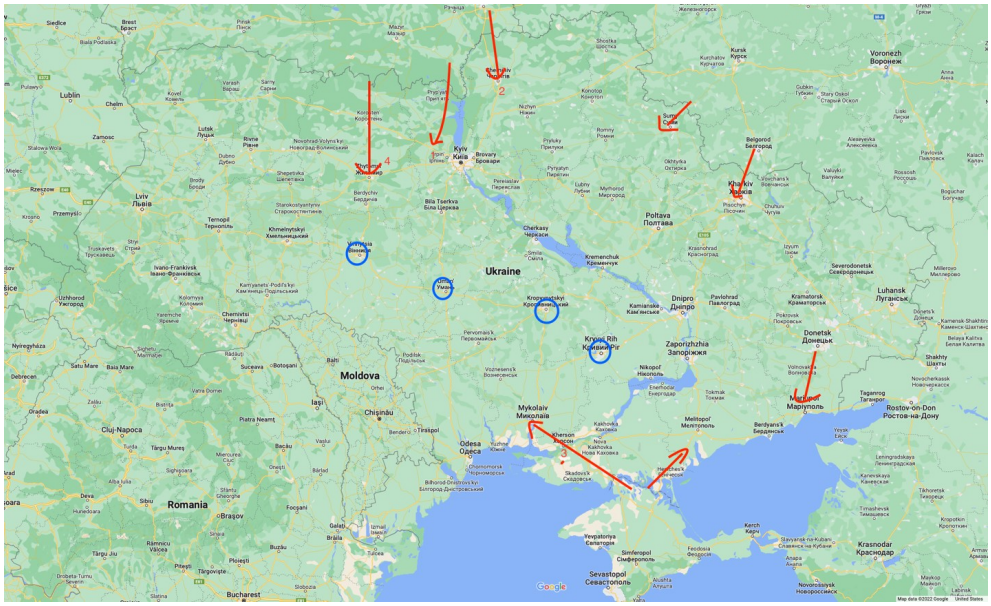
第三，俄军占领了第聂伯河下游的赫尔松大桥，正在向尼古拉耶夫前进。

第四，俄军可能已经占领了基辅与利沃夫之间的交通枢纽日托米尔。

第五，东乌克兰方向尽管是乌军主力集结区，但是并非战局的决定性地区。目前俄军占领了苏米。哈尔科夫、马里乌波尔方向进展缓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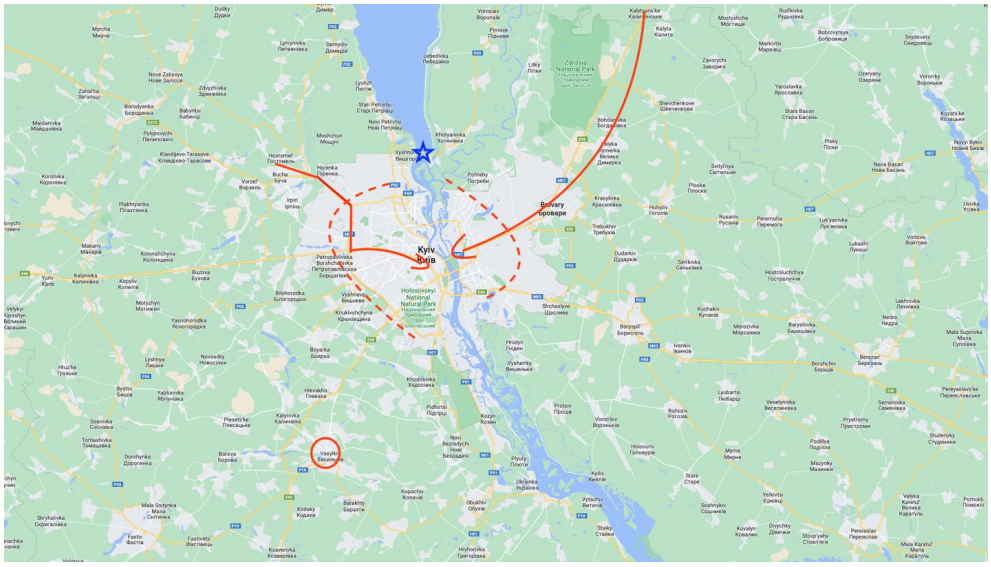
乌克兰军队的部署情况与1939年的波兰军队类似，主力集中在一线。但是俄、白、乌之间的漫长边界线让这种部署很容易被迂回。如果俄军进展顺利，控制第聂伯河并切段东西乌克兰之间的联系，在东乌克兰的乌军主力要么顶着炮火空袭向西溃逃，要么就得投降。

下图是根据现有情报整理的动态（红色箭头）。从图上可以看出，俄军正在完成对乌军主力的战略合围。今后几日，如果乌克兰政府不迅速投降，那么战局的要点将会是西乌克兰的文尼察、乌曼、克里沃洛格等地（蓝色圆圈）。



## （二月二十六日快评）

战争进入第三天，俄军在基辅方向上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在控制了基辅西北面的安东诺夫机场之后，俄军空中的和地面的增援开始大量涌入基辅市区。俄军先锋在渗透小组的指引下可能已经前进至市中心，并有可能对仍盘踞在基辅的乌克兰指挥系统造成混乱。与此同时，从切尔尼戈夫出发的俄军东路先锋也已经抵达基辅城下。基辅西南面的瓦西里科夫机场也处在两军争夺中。预计几个小时之后俄军就能够对基辅实现全面合围。乌军除了给基辅的法西斯民团发枪之外，昨天在基辅方向的唯一积极举动是炸毁了基辅上游水坝上的一座桥梁（下图蓝色五角星），试图阻止东西两路俄军汇合。




昨天最耐人寻味的事件是普京向乌克兰军方呼吁抛开乌克兰政府单独谈判。普京向乌克兰军队指出，比起乌克兰政府的这帮新纳粹和伪君子，乌克兰军人是更有资格的谈判对象。

乌克兰政府和军队并非铁板一块。随着近年来乌克兰法西斯化的的加深，乌克兰政府收编了大量的法西斯分子，并把它们编入了二十多个“乡土守备旅团”中，担任静态防御任务。每一个守备旅团会与一个正规军独立大队配合作战。这个编制组成与意大利法西斯把黑衫军和正规军混编起来极为类似。这些有番号的法西斯民团明面上是配合正规军作战，实际上也会起到监视正规军的作用。乌克

兰正规军知道自己打不赢这场战争，也知道俄罗斯总体上会对投降官兵给予人道主义待遇。因此，战争开打了三天，乌克兰正规军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仅仅是尝试击退自己阵地附近的俄军，如果不行，就干脆撤退，甚至还发生了成建制投降的事件。

根据双方实力对比，我们不妨做个大胆的猜测。乌克兰正规军投降是肯定要投降的，但是投降是要讲时机的。如果投降得太早，很可能无法约束军中的少壮派军官，无法控制部队，从而折损了投降的效果。同时，如果在乌当局尚且对地方有控制力，法西斯民团忠诚度尚未崩溃时投降，那么这些军人的家属势必遭到残酷的报复。如果投降的太晚，尤其是在乌克兰政府已经投降之后再投降，那么乌军的投降对俄罗斯来讲用处就不大了，这就白投降了。因此，乌军的最佳投降时机是在乌克兰政府将投未投之际，法西斯民团初显瓦解征兆之时。如果乌军的投降能够成为压垮乌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并且乌军在投降之前能够解除法西斯民团的武装，逮捕或击毙民团头目，那就足以保证他们在未来亲俄政府中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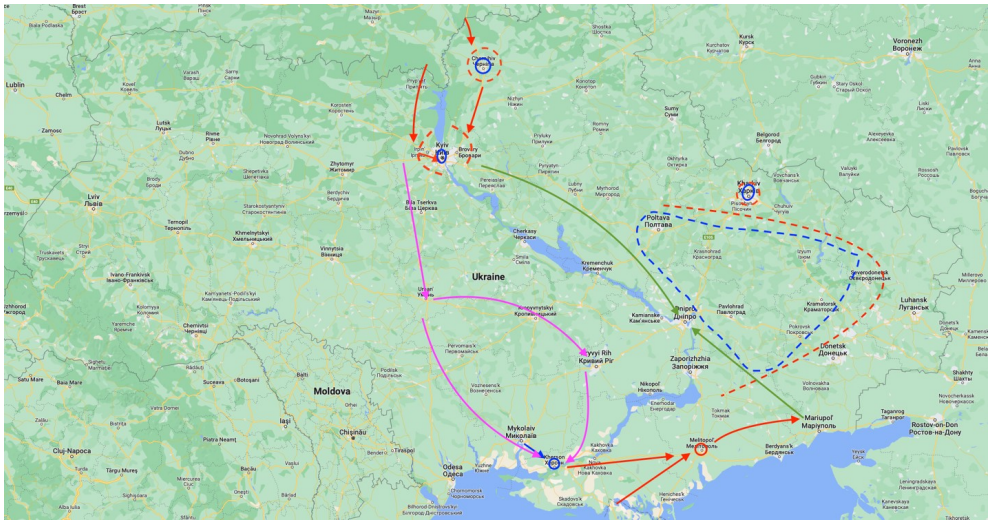
这个最佳时机是存在的，但是也是难以掌握的。因为不仅乌军知道，俄军也知道，乌当局也知道。俄军在非万不得已时，不会大举进攻主要城市进行巷战，而是包围主要城市，尤其是基辅。这个行动表面上的文章是打基辅，实际上的意图是加快集结于东乌克兰的乌军主力的投降进度。如果俄军在行进间迅速拿下基辅，瘫痪乌当局的指挥中枢，那么乌当局对地方的控制力就会明显减弱，乌军投降的代价就会明显减小，此时就是投降的最佳时机。不过，乌当局自己也会投降，如果乌当局的主要成员还在基辅，那么它的筹码就是以它自己的投降带动乌军的投降。这样，乌当局和乌军就有可能进入一场“投降竞赛”中，只要比同僚先投降，那么就下有保卫家园免受兵祸之德，上有从龙入关开创局面之功。而这一切是俄罗斯最愿意看到的。

当然，如果基辅被俄军大规模渗透乃至夺取，乌当局本身也有可能自我解体。就算泽连斯基和主要官员逃到利沃夫，也无法阻止各地军阀，尤其是与前总统波罗申科关系密切的武装团伙待价而沽。乌当局将会实质上降格为地方政权。

## （二月二十七日快评）

昨日俄军进展不如预期。基辅方向，俄军尽管已经从西部攻入城区，但是并未能有效瓦解基辅政权。从切尔尼戈夫方向从东面进入基辅的俄军也未能继续有效推进。在南部，俄军似乎退出了前几日占领的赫尔松，但是赫尔松附近的第聂伯河大桥依然掌握在俄军手中。俄军仍然具备从克里米亚向西南乌克兰进攻的能力。昨日俄军唯一的进展是从克里米亚出发的俄军攻取了东南乌克兰的梅利托波尔，有与两共和国民族自卫武装会师的可能。

下图中红色箭头代表昨日俄军主要运动方向，红色实心圆圈代表昨日被俄军控制的城市，红色虚线代表被俄军包围的城市以及主要对峙线。蓝色虚线区域是乌军主要集结区域。




俄军行动进展不如预期可能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这是自美国侵略伊拉克的“沙漠风暴”行动以来最大的军事行动，俄军的组织协调能力不足。比如在第一天的安东诺夫机场空降突击中，就没有很好地实现空降兵和空中力量的协调。在切尔尼戈夫的战斗中，由于急于想要向基辅突进，没能成功肃清市区，导致基辅以东方向俄军补给线受到威胁，又由于乌军炸毁了基辅以北的跳梁，导致基辅东西两侧的俄军无法相互协调。

其次，俄军的战略目标服务于政治目标，其政治目标则建立在未来亲俄政权的稳定之上。因此，尽管乌克兰法西斯民团把火箭炮部署在居民区，试图绑架居

民来顽抗，但是俄军至今没有在攻城战中使用过重炮和装甲部队。从俄军对基辅的进攻来看，很有可能是寄希望于在战争第一天或者第二天用快速突击的方式迅速抢占基辅。因此第一批次的进攻是以空降兵配合空中精确支援火力为主，其目的是瘫痪乌军指挥中枢，制造恐慌，分裂乌克兰政府、军队和法西斯民团，迫使其投降。一个明显的证据是俄军没有切断被围城市的水、电、燃料和网络，给被围居民提供了出乎意料的人道主义待遇。如果这一迅速夺城的企图失败，那么重装部队有可能在下一阶段投入使用。

第三，俄军可能低估了乌军守城时的战斗力。乌克兰武装力量，无论是正规军还是法西斯民团，都没有任何机动作战的意图和能力。只有龟缩在城市中才能保证指挥系统的完好，保证补给充足，并且可以让忌惮平民伤亡的俄军投鼠忌器。一旦出城，乌军指挥官就有可能无法控制军队，无法阻止逃亡和投降，也无法阻止士兵洗劫乡里。对于法西斯分子而言，只有把正规军摆在城里，才能对其进行有效监视。乌军的消极姿态和以往边境摩擦中的糟糕表现可能让俄军低估了乌军守城时的战斗力。在战争的头三天，俄军是用最不擅长攻城的轻步兵对抗只有在城里才有战斗力的乌克兰重装部队。以己之短，击敌之长。当然，俄军的行动是有政治考虑的，如果一开始就用重装部队攻城，那么善后和维持战后乌克兰稳定的工作就不好做了。

综合各方面原因，现在出现了一个荒诞的局面。俄军坦克、机械化步兵乃至后勤车队都可以在乌克兰乡间畅通无阻，但是一旦到了主要城市，以轻步兵为主的俄军则推进缓慢。不过，从目前局势看，俄军受挫可能是暂时的。

第一，俄军尚未投入部署在俄乌边境总力量的半数，即俄军是以劣势兵力进攻乌军的优势兵力。如果俄军未来在任何方向有进展，仍然可以将预备队投入，用以发展突破。同时，在未来消灭了乌克兰残存不多的防空力量之后，俄军就可以肃清补给线上的残余敌军，从而重建攻击势头。

第二，俄军在基辅的受挫是“意外”，但是俄军仍然掌握其他地区的主动权。拥有制空权和机动优势的俄军仍然有可能在其他地区发动攻势。比如，从克里米亚出发的俄军在与东乌俄军会师之后，可能向北夺取第聂伯河交通线（上图绿色箭头）。俄军也可能南北对进从西乌克兰方向对乌军实施战略大包围。在俄预备队尚未投入且俄装甲部队未受损失的情况下，要完成上述两目标是可能的。

第三，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发挥作用，西方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是远水解不了近火。乌当局的谈判条件和内部的团结会随着俄军的进展而发生动摇。

当然，俄军制定了相当大胆的目标（突击夺取基辅），行动受挫自然会加大俄罗斯的军事和政治成本。随着俄军逐渐失去战役突然性，军事行动的风险也在

增加。综上所述，现在俄军已经到了改变策略的时候，是转而进行传统攻城，还是进行深远的战略大包围，这些都是未知数。但确定的是，俄军试图在数天之内打垮乌克兰的目标已经无法实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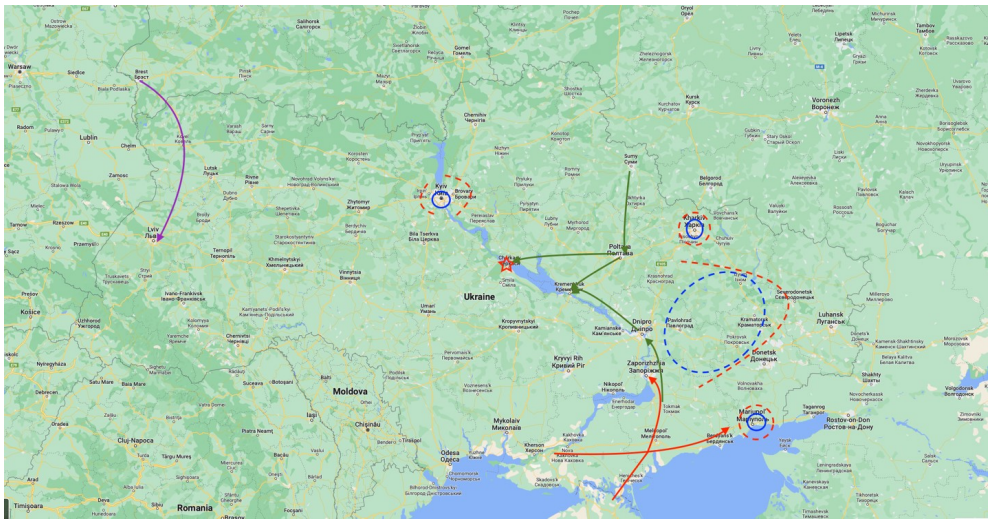
现在有意思的是乌克兰当局的反应。乌当局深知乌克兰已经被西方抛弃，其最“理性”的决策是在进行象征性抵抗之后体面地接受和平。但是，要么是出于投机目的，要么是乌当局已经被欠下乌克兰工人和俄裔人民累累血债的法西斯分子所挟持，要么是因为乌当局本身与西方资产阶级的关系胜过与本国民众的关系，他们仍然愿意牺牲民众进行赌博。现在这些还只是猜测。

## （二月二十八日快评）

俄军在基辅方向并没有发动新的攻势，但有消息显示，俄军在基辅外围的各个方向都开始重新集结。在基辅西北面约80公里的伊万科夫，已经出现了近千辆军车组成的行军纵列，其中包括大量的坦克和自行火炮，这是明显的攻城部署。基辅其他方向的俄军也在完成合围。如果不出意外，俄军将在近两天再次发起对基辅的进攻，在进攻的同时或者在进攻之前，俄军可能会切断基辅的水、燃料、电力和网络供应。

昨日俄军最大的进展是对东乌克兰的的乌军主力形成了半包围。在迅速、无伤亡或低伤亡夺取基辅的计划失败后，俄军开始以包围和消灭乌军主力为目的展开行动。昨日俄军占领了梅利托波尔和别尔江斯克两座沿海城市，对东线乌军重要据点马里乌波尔形成包围。同时俄军机动部队主力向北方的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推进。如果俄军在今明两天占领或切断上述两座城市的第聂伯河大桥，盘踞在顿涅茨克地区的乌军就成了瓮中之鳖。盘踞在哈尔科夫附近的乌军就只剩下经波尔塔瓦和克列缅丘格向西撤退的途径。俄军显然清楚这一点，因而在昨天成功轰炸了切尔卡瑟的弹药库，进一步削弱了乌军撤退途中可能获得的补给。如果俄军合围乌军主力的计划成功，那么乌当局可能依靠的正规军力量就基本被消灭，剩余的法西斯民团就只能依靠城市据守，从而无法扭转被动局面。

下一面图中红蓝双色箭头和圆圈表示俄乌两军的动态。红色五角星代表昨日被爆破的切尔卡瑟弹药库。绿色代表俄军可最有能的计划。紫色代表俄军阻止西方干预和武器流入乌克兰的可能进军路线。留守东乌克兰的乌军主力现在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




当战争已经进行到第四天时，从表面上看起来乌克兰挫败了俄军的攻势，泽连斯基甚至被习惯于自我感动的美国自由派媒体封为当代丘吉尔和当代华盛顿，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格局。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师一级机械化单位的中等强度下持续作战能力大概只有一个星期，旅一级只有三天。俄军突入基辅的先锋部队是营级的空降兵和防暴警察，他们没有重武器，仅靠随身携带（和少数幸存车辆上）的补给，在机场争夺战中已经消耗了部分人员和相当的弹药，他们能突入市中心并坚持24小时已经是奇迹了。然而，在西方主流媒体的蛊惑宣传和严厉审查下，一些小资仿佛觉得乌克兰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是愚蠢的误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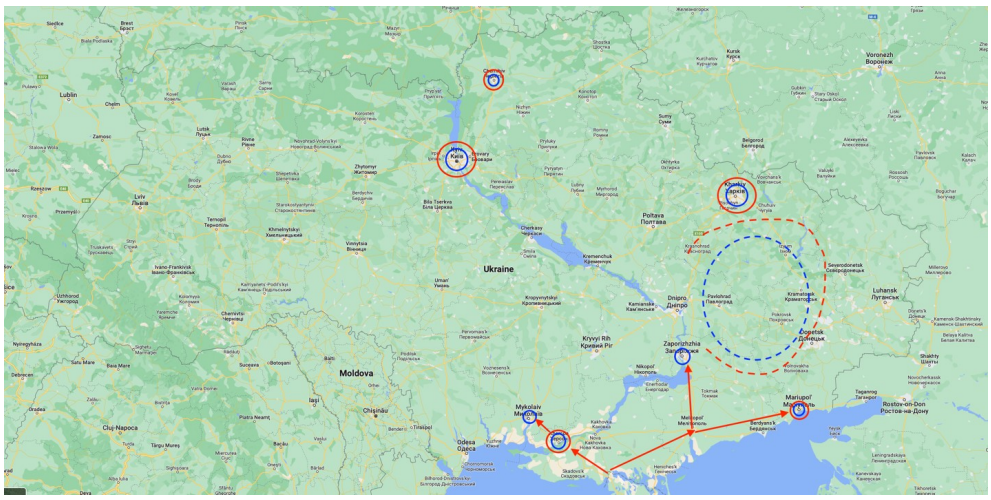
正在进行的俄乌谈判很有可能不会有什么结果。俄罗斯显然没有达到战略意图，乌当局也心存侥幸。如果乌当局不做出重大妥协，那么本次谈判大概会是双方自说自话。部分欧洲国家既缺乏经验、又想要投机的自由派政客试图乘俄罗斯初期进攻受挫的机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但是俄罗斯显然早已有所准备。第一，俄罗斯提高了核武器的战备等级，并准备与白俄罗斯合作将核武器部署在波兰和立陶宛边界。第二，俄罗斯的常规部队也可以迅速从白俄罗斯出发，直接切断西乌克兰与波兰和匈牙利的联系。第三、乌克兰邀请的可能以巴尔干极端分子匪帮为主的"外国志愿者"数量极少、不成编制、缺乏准备、意图不明。他们究竟是对"保卫"乌克兰更感兴趣，还是对乘乱洗劫乌克兰更感兴趣尚且是未知之数。

## （三月一日快评）

在现在的互联网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论调，即乌克兰已经基本取得了防御战争的胜利。在一些脑子不清楚的“左派”看来，仿佛是乌克兰人民的“正义”呼唤感动了天地，才让俄军兵锋顿挫。而且网上还流传着乌克兰当局故意造谣出来的什么“俄军阵亡5400人”的假消息。且不论乌克兰法西斯政权有多少“正义”性可言，如果这些人读过一点军事历史，知道一点战争规律的话，就不会整天把《纽约时报》移花接木的报道和推特上自由派的即兴创作套上“左翼”的话语重复一遍。

乌克兰军队在基辅击退了俄军的轻装部队和防暴警察，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俄军主力才刚刚在基辅郊外完成集结。据报道，从基辅西北方向开来的俄军车队至少有64公里长，而乌克兰方面对此毫无动作。号称挫败了俄罗斯速决企图的乌克兰空军没有任何攻击行军状态下俄军的企图。基辅方面给刑事犯发枪，让这些“义士”们“戴罪立功”的企图似乎只是增加了城里的武装抢劫。不得已，乌当局只好抓捕和枪毙一些自己放出来的“义士”，并谎称他们是俄罗斯渗透过来的特务。俄军在完成集结后，可能会以重武器开路的方式向基辅进攻。俄军何时进攻，在进攻中是否估计平民的死伤，可能会视乌当局的谈判态度决定。

俄军昨日主要进展在南线。从克里米亚出发向东进攻的俄军已经成功与两共和国的武装会师，并且包围了马里乌波尔。南线俄军主力也在向扎波罗热推进，并且可能已经占领了扎波罗热城外不远的核试验场。乌军精锐主力如果不从东乌克兰撤出，那么大概率会在数天之内陷入合围，失去补给。但是乌军主力如果撤出，就无法有效绑架城中平民，因此会在撤退路上遭到俄军毫不留情的毁灭性打击。在昨日对东乌克兰乌军主力的进攻中，俄军已经开始大量使用重炮和火箭炮，对躲藏在工事里的乌军也不再继续怀柔，开始使用对人员杀伤效果极佳的云爆弹。乌军精锐主力的命运可能在近几天就将揭晓。从克里米亚出发的另一路俄军重新包围了赫尔松，并向尼古拉耶夫攻击前进。




从现在战争的发展来看，俄罗斯的战略目标是在东乌克兰扶植亲俄政府，甚至有可能将东乌克兰白俄罗斯化。在西乌克兰，俄罗斯的目标是实现其彻底中立。在战争的前三天，俄军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基辅的乌当局身上，在这一企图失败后，俄军就转而将行动的重点对准了东乌克兰的乌军。俄罗斯试图减少平民伤亡的目标是很明显的，因此其总的方针是迫使乌当局或乌军中的任意一个投降，用以带动另外一个投降，从而和平接管东乌克兰。但是这种操作的风险也是很大的，如果最初的震慑作战不成功，乌克兰政府自己（或在西方压力下）不投降，那么俄军就丧失了战役突然性。但是，丧失了战役突然性并不代表丧失了主动权，俄军仍然牢固地掌握着制空权和制电磁权，同时具备机动作战的能力。现在双方争夺的重点已经不是在数天之内颠覆乌当局（俄）和守住数天等待“援助”（乌），而是在数个星期之内比拼实现战略目标的军事和政治意志。在这个时间区间内，乌方更有可能在城市被封锁的状态下耗尽补给，而乌当局强行阻断市民出城只会加剧城中物资短缺，从而迅速消耗掉它在社交媒体上建立的“亲民”假相。而把此战当作是政权生死之战和民族存亡之战的俄罗斯则更有意志打到底。当然，如果战争拖到数月以上，则可能引起俄罗斯资产阶级整体的不满。那时，他们中的一部分是否愿意交出自己的相对独立地位，接受美国主导的“政权更迭”来避免制裁，情况还未可知。

## （三月二日快评）

昨日，俄军取得了数处有价值的进展。基辅方向的进攻准备已经接近完成，如果乌当局继续抵抗，可能俄军会在本周内正式攻城。本次攻城将不同于开战第二天的渗透式进攻，而有可能是以自行火炮、坦克、战斗工兵为主的传统攻城。俄军预计会吸取车臣战争时格罗兹尼城下的教训，不会让车队直接冲进城区，而是会谨慎地清理守军重点防守的地段。俄军可能会在攻城战中使用云爆弹，这将有效减少己方的伤亡。

俄军昨天将赫尔松的守军压缩至第聂伯河河岸和沼泽之间的狭小区域，今天已经基本占领了全城，正在进行扫灭守军残部的收尾工作。赫尔松幸存的法西斯分子藏起武器后伪装成和平人士在俄军车队面前进行“抗议”表演，试图借此溜出城区躲避搜捕，但这些不会给俄军造成重大阻碍。从赫尔松重新集结出发的俄军将加入向尼古拉耶夫进攻的队伍，攻击可能会在未来几日展开。

俄军和顿涅茨克民族自卫武装已经扫清了马里乌波尔外围多数据点，压缩了包围圈，正在准备向城区发动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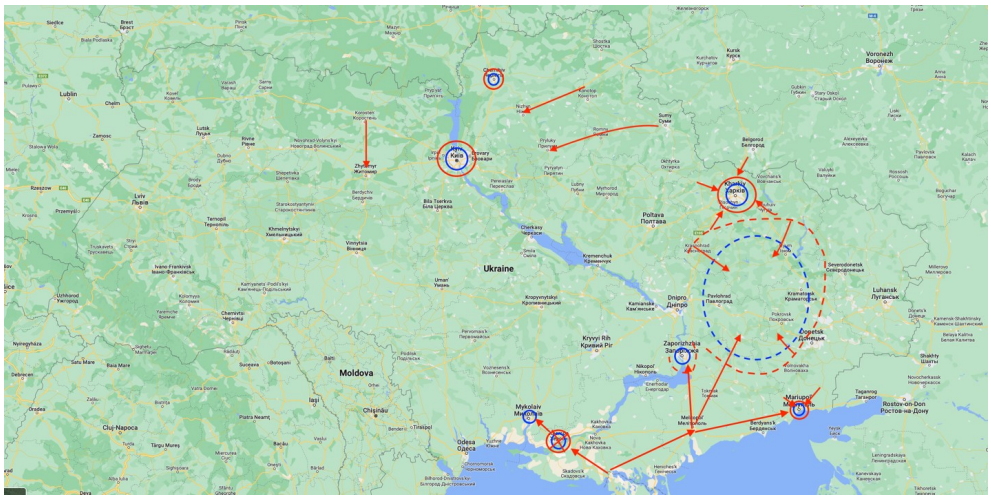
驻守哈尔科夫的乌克兰法西斯民团“亚速营”拒绝投降，俄军开始对其城内据点进行炮击。据报道，俄军的精确打击可能已经破坏了当地法西斯民团和正规军的一处联合指挥部。该行动可能会瘫痪哈尔科夫附近乌克兰武装的行动，效果尚待观察。

在哈尔科夫以北的苏米、罗姆内、克诺托普一线，俄军似乎已经展开穿插行动，隔绝东乌克兰的乌军主力向基辅方向撤退的道路。

俄军继续向扎波罗热推进，攻城准备可能在近几日完成。

俄军正在肃清切尔尼戈夫的乌克兰守军。切尔尼戈夫的守军是乌正规军的一个装甲旅，俄军在开战的的最初几日对其手下留情，进攻基辅的部队基本绕道而行，造成了切尔尼戈夫乌军仿佛很能打的假象。这个假象可能会在未来几日破灭。

从总体态势看，俄军的动向有四个。第一，收紧对东乌克兰乌军主力的合围；第二，完成对基辅的攻城准备；第三，准备从南乌克兰向第聂伯河东岸或者敖德萨前进；第四，准备从白俄罗斯出发拦截可能的外国雇佣军。上述四个方向的态势有如下一面图。




俄军有足够的能力实现上述四个目标。现在的可能看点是俄军的攻城能力。从开战到今天，俄军虽然攻取了若干中小城市和有战略意义的城镇，但是尚未真正展开对任何一座中心城市如基辅、哈尔科夫、敖德萨、利沃夫的总攻。如果俄军能在接下来的十天中以较小的己方伤亡占领上述城市中的任何一座，或者是占领次级中心城市如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尼古拉耶夫、波尔塔瓦中的两座，就可以对龟缩在城市中的法西斯民团产生极大的震撼。从长远来讲，俄罗斯不希望在攻取东乌克兰城市的战斗中造成过多平民伤亡，但是平民伤亡数字本身会在短期内削弱乌当局本来就岌岌可危的支持度。如果短期的平民伤亡可以加速乌当局瓦解的速度，从而避免战事拖延造成更大的平民伤亡，对于俄罗斯来讲也不失为可以接受的代价。因此，俄军可能会在准备充分的攻城战中大量使用重武器，用以迅速瓦解守军的士气。

乌当局的装甲机动力量除了一部被歼灭在赫尔松，一部被压缩进切尔尼戈夫城区，一部龟缩在西乌克兰作为总预备队之外，多数被围困在东乌克兰即将扎紧的包围圈内。

乌克兰当局的“推特战争”确实在美国大资本集团的帮助下赢得了西方国家自由派小资的支持，中国的某些“国际主义者”、“左派”也鹦鹉学舌，把乌克兰法西斯在俄军总体克制背景下的行为艺术式的抵抗当作是人民战争的再现。对于前者，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作为其精神支柱的二十一世纪全球化幻想世界在一夜之间被二十世纪的现实政治打得分崩离析。对于后者，简单地划分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然后套用一下自由派的主权理论，然后表达一下对乌克兰的廉价同情，就可以不必经过任何艰苦的思考而占领幻想中的道德高地。上述两个幼稚的幻想有望在未来数周内彻底破灭。

## （三月三日快评）

随着战局的逐渐清晰，我们可以将本次战争按照形态划分为三个阶段。

从2月23日到2月28日的第一阶段是特种战争阶段，俄方的目的主要是通过斩首行动迅速瘫痪乌方指挥中枢和官僚体系，引发乌当局、乌军和法西斯民团之间的内部纷争，从而以最小的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来瓦解乌克兰法西斯政权。此间一切对乌克兰军事设施的打击都是服务于以空降兵、特种部队、防暴警察和轻装摩托化步兵为核心的迅速突击。乌军和法西斯民团的有生力量并不在打击之列。特种战争的节奏是很快的，是以小时乃至分钟计算的。在习惯了好莱坞特种兵大片的一般观众尤其是一切军事知识都来源于影视作品的人眼里，这种快节奏的战争形态是最“过瘾”的。特种战争阶段结束了，俄军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这就让许多浮躁的人认为电影都演了五天还没打出个所以然，这届俄军不行。对于那些设想革命就是振臂一呼然后过把瘾就赢了的“左派”而言，俄军特种战争的失败就等同于“俄帝”的彻底失败。

3月1日开始，可能持续数周乃至一个多月的的第二阶段是常规机械化战争阶段。比起惊险刺激的特种作战，这一阶段的战争要无聊、缓慢而且残酷地多。要夺占一座关键城市，需要先进行战斗侦查，在战斗侦查中，可以适当占领一些进攻阵地。在大部队到来时，需要制定计划，是突击还是合围，然后协调不同兵种、军种和国别军队的统一行动。然后在扫清外围据点，用炮击和空袭成功打击敌军指挥中枢并削弱敌军士气后，才能谨慎地开展逐条街道的争夺。最后还要扫清隐藏起来或者装成“反战人士”的法西斯分子。对于特别大规模的攻城战，还需要设置相当规模的后勤中心，并且协调民事部门安置居民。攻城作战是复杂程度仅次于两栖登陆作战的战斗形式，任何一个阶段都有可能出现反复。敌人的反击、依托坚固据点的顽抗，敌人在居民区设置爆炸物，在战斗中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等，都有可能拖慢整个进度。机械化战争的攻城战斗是以天乃至周为时间单位的。在一边倒地支持乌克兰法西斯的国外媒体上，俄军主动放弃一个不利于发起攻击的地区，乃至仅仅是路过，都会被宣传成是“乌克兰人民”成功打退了俄军进攻。结果经常导致这样的可笑局面：苏米和赫尔松的“乌克兰人民”打退了俄军无数次进攻，然而俄军还是没遭受什么损失就占领了全城。无论对双方还是观众来讲，机械化战争都是考验耐心、意志、和韧性的阶段。试图哗众取宠地帮助“乌克兰人民”宣布胜利，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俄军能在三个月之内取得机械化战争的胜利，等待他们的是一个或长或短的治安战争阶段。治安战争的进展取决于俄罗斯能否为控制区内的人民群众提供优于乌克兰法西斯政权治下的生命安全和生活水平保障，尤其是要为乌克兰裔人民提供与俄罗斯裔人民平等的政治和经济待遇。治安战的主要对象是残余的法西斯分子和渴望加入美国主导的世界分工体系的自由派小资产阶级（如果他们敢反抗的话）。作为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治安战的最终结果取决于俄罗斯能否为控制区保证资本积累的有效秩序。现在距离此阶段尚远，不便在此评论。

就机械化战争的标准而言，俄军的进展已经是相当迅速。 昨日俄军扫除了马里乌波尔的外围据点，一支部队已经推进到市中心附近。驻守马里乌波尔的有乌军正规军的一个机械化步兵旅（稍有战斗力），一个特种兵旅（在机械化战争中与轻步兵无异），一个海军陆战队旅（同上）。马里乌波尔的守军数量明显高于昨天被俄军夺取的赫尔松，但是装甲力量有限。除此之外，驻守马里乌波尔城北、面对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方向的是法西斯民团“亚速营”的数个独立大队。亚速营不是一个营，而是在乌克兰各地都有分布的法西斯民兵组织。他们在对俄裔人民和工人积极分子的迫害中曾经使用过化学武器，并将俘虏的共青团员虐杀之后分尸，欠下了还不完的血债。与我们前几日的预测一致，亚速营部队的主要作用是监视正规军和绑架民众。他们不仅武力阻止马里乌波尔群众向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方向迁移避难，而且还把妇女儿童绑架到埋设地雷和爆炸物的学校中，妄图迫使俄军投鼠忌器。俄军可能在近期对马里乌波尔发起总攻，扫清合围东乌克兰乌军的南部障碍。

卢甘斯克民族自卫武装在俄军的配合下向伊久姆方向突击，可能已经分割了卢甘斯克和俄罗斯边境的乌军部队与东乌乌军主力之间的联系。

从克诺托普和罗姆内方向向西进攻的俄军已经和从切尔尼戈夫方向出发的俄军在基辅东面会师，完成了对东北乌克兰乌军部队的分割。 哈尔科夫的俄军继续向市中心有序推进，并且大量使用重武器摧毁乌军据点。

从赫尔松出发的俄军已经在尼古拉耶夫城外开始了正式的攻城准备，可能在数天内攻击尼古拉耶夫。在攻下尼古拉耶夫之后，俄军既可以向西占领敖德萨，也可以向东堵截可能西逃的乌军主力，可能向北与从基辅南下的俄军会和，形成对乌克兰正规武装的战略大包围。俄军的动向可能与我们在第一期“快评”中的估计一致。

基辅方向出现了有意思的动向。一方面，俄军可能集结了远超过攻城所需的部队，另一方面，俄军昨日仅仅是不急不忙地拔掉了几个外围据点，并未展开总攻，而是在基辅附近设立后勤中心，积累补给。同时，俄军也在基辅以西的日托

米尔进行攻城准备。有可能基辅附近俄军的目标不仅仅是城市本身，而是准备部分南下与从尼古拉耶夫出发北上的部队会合，从而完成战略大包围。

总体来看，俄军对于东乌乌军主力的分割正在迅速发展，对东乌乌军主力的战略小合围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对乌军正规军的战略大合围有可能会在适当时间开始启动。 下图中红蓝双色代表俄乌两军动向，紫色代表俄军可能动向。




## （三月四日快评）

在战争初期的特种战阶段。即2月底，俄军曾经出现过士气问题。除了有明确攻击任务的空降兵和特种部队以外，后续跟进的第一批机械化部队对战争本身的性质有误解。这是由于俄罗斯想要达成战役突然性而做的过度保密工作导致的。俄军并没有对多数士兵进行充分的战前动员，这给士兵和基层指挥官造成了不少错觉，他们认为自己仅仅是去乌克兰接收城市和村庄。因此在战争早期，曾经出现过俄军士兵迷路找乌克兰警察帮忙而被扣押的情况。这一现象被西方观察家捕捉到，又被商业媒体和自媒体大吹特吹，形成了俄军士气低落，维持不了多久，甚至马上就要兵变的传闻。

随着战争的进行，乌克兰法西斯分子的本质逐渐暴露在普通俄军士兵面前。他们躲在切尔尼戈夫住满平民的民房里向俄军射击，他们把炮兵布置在哈尔科夫居民区来阻止俄军的反炮兵火力。昨天，乌克兰法西斯民团“亚速营”在马里乌波尔城北对试图乘车逃离的难民直接枪决。同样在昨天，法西斯分子还试图在俄军进入扎波罗热核电站时破坏冷却系统，试图制造第二个切尔诺贝利事件。在俄军

已经进入核电站之后，法西斯分子仍然试图用导弹攻击核电站。如果法西斯分子成功了，整个第聂伯河下游和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黑海沿岸都会遭受核污染。同时，乌克兰法西斯分子把虐杀俄军俘虏并侮辱他们尸体的视频放到了社交网站，试图以此恐吓俄军士兵。

在开战前的多数俄军普通士兵看来，过去的乌克兰法西斯只是社交媒体上的疯子和小丑；但是经历了这些现实教育以后，俄军逐渐明白了自己为谁而战。俄军在近几天的进攻中表现出了越来越高的士气和指挥水平，随着俄军补给的到位，俄军将在战斗力和战斗意志两个方面同时压过对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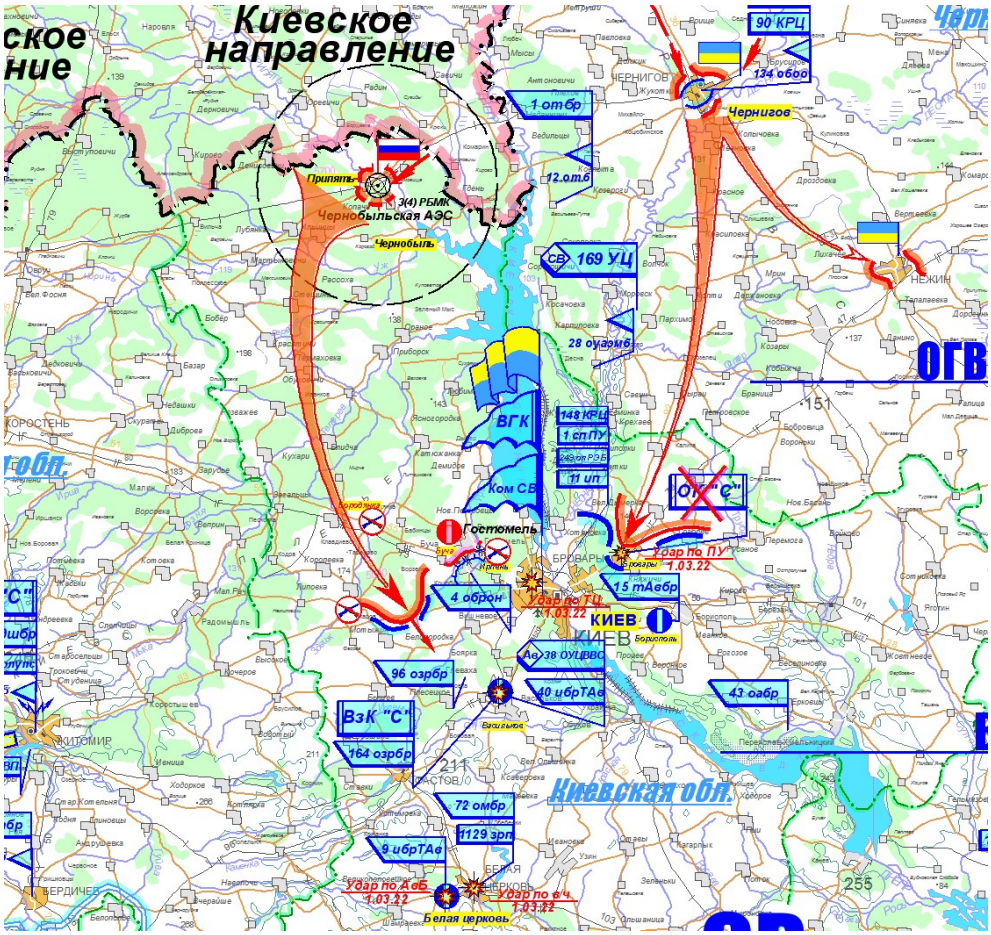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简单设想一下战争的可能结果，就会知道乌克兰或者俄罗斯的胜利意味着什么。

如果乌克兰取得胜利，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族群众（包括克里米亚和两共和国在内），乃至现在俄军控制的城市内的普通群众，都会遭到法西斯的残酷迫害。战争失败之后的普京政权势必倒台，俄罗斯将会再一次经历苏联解体时的人道主义灾难。俄罗斯会变成另一个乌克兰或者干脆巴尔干化。谁会获益呢？乌克兰的法西斯和寡头资产阶级自然非常乐意，俄乌两国依附于新自由主义世界市场的自由派小资也会弹冠相庆。当然，某些空喊“反战”的中国“左派”也会从中获取仿佛是自己打倒了本不存在的“俄帝”的虚幻快感。

如果俄罗斯取得胜利，固然不会出现进步运动的高潮，但是乌克兰法西斯可以被压制。这虽然会让有些人失望至极，但是对于欧亚大陆上的劳动人民来讲，这是可以免除他们在新自由主义垂死之日被踢上新自由主义这艘破船并为之殉葬的大好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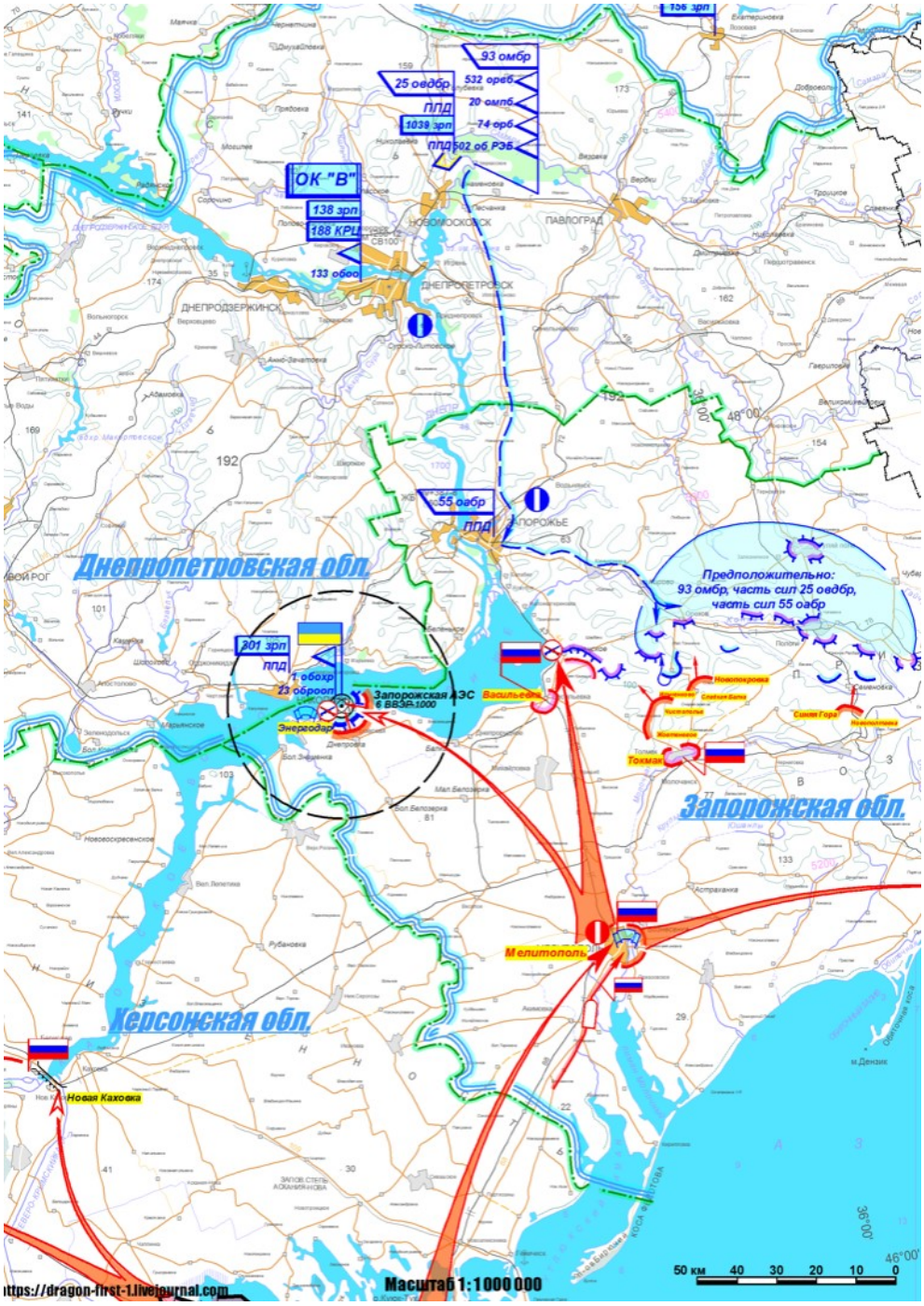
常规机械化战争中能有效杀伤敌人有生力量的形式是歼灭战。要打歼灭战，就需要形成对敌人主要目标“向心突击”的态势。而要进行向心突击，就必须先进行“离心运动”（迂回）来占据有利的攻击阵地。然而，面对迂回途中敌人占据的据点，存在一个打还是不打的问题。如果打，就意味着消耗时间和兵力在非主要方向上，有可能会错失向心突击的机会。如果不打而刻意绕开，敌军就有可能在突击进行中威胁自己的侧后。大的向心突击需要大的离心运动来实现，而大的离心运动的安全也需要对外围据点的敌军进行小的向心突击来保证。如果实在无法扫除外围据点的敌人，则需要及时修改战役目标，降低向心突击的规模。这就是机械化战争中合兵与分兵的辩证关系。在第一期的快评中，我们曾经估计俄军可能采用在第聂伯河西岸大迂回的方式来完成对东乌乌军主力向心突击的准备。但

是，由于俄军最初是以劣势兵力打击乌军优势兵力，大迂回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下图是4天前基辅附近乌军的布防情况：




红、蓝双方分别代表俄军和乌军。倒梯形代表乌军旅级单位，旅级单位既包括正规军中较有战斗力的装甲旅，稍有战斗力的机械化步兵旅，战力平平的特种作战旅和步兵旅，也包括法西斯“乡土守备旅团”，长方形代表正规军的营或者杂色建制的法西斯民团。俄军在2月底突入基辅以后主动撤出并在基辅西北做攻击准备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重整指挥体系、积累补给，准备再次攻城，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备基辅南面乌军大部队可能的反攻。基辅周围，除了被围困于切尔尼戈夫的乌军第一装甲旅（图中正北），只有第72机械化步兵旅（正南）略有战斗力。但是基辅附近的二三流武装数量是不少的。在扫除了他们的威胁之前，俄军恐怕不会贸然攻城。这也是俄军为何在基辅城下准备远多于攻城所需要部队的原因。

下图是昨日扎波罗热附近的情况：




黑圈内是俄军昨日夺取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从图中可以看出，核电站守军都是法西斯民团，没有成建制的正规军。核电站东北是扎波罗热城区，俄军距离城区还有40到50公里距离。俄军在这个地点已经停留了两天而没有继续前进。这是因为东乌乌军主力害怕被合围，紧急抽调了部队威胁北上俄军的右翼（途中青色半圆）。俄军在清除更东面的马里乌波尔（图右方以外）并解除右翼威胁之前，大概不会轻易进攻扎波罗热。如果贸然出击，极有可能被扎波罗热的正规军守军

阻挡，北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乌军也有可能南下。如果东部的威胁不先扫除，那么俄军先锋就面临着三面受敌，一面背河的窘境。

# 俄罗斯在战争初期为何进展缓慢?

远 航 一 号

目前，自2月24日开始的俄乌战争已经进入第四天。俄罗斯方面尚未攻陷乌克兰首都基辅，也没有占领乌克兰的其它大城市，乌克兰政府和军队指挥系统仍然完整，乌军主力尚存。这种情况，不仅没有达到战前国际上许多军事评论家的预期，应当也没有完成俄罗斯当局在战前的战役计划。俄乌战场上的这种形势，使得西方帝国主义分子及其操纵下的资产阶级主流媒体兴奋异常，大谈特谈乌克兰法西斯分子的“英勇”抵抗，吹捧乌克兰当局头目泽连斯基是新的“温斯顿·丘吉尔”；各国的亲帝国主义小资产阶级以及一些伪左派、伪马克思主义者也纷纷摇旗呐喊、弹冠相庆。

怎样评估俄乌战争在目前的形势？俄罗斯军队为什么在战争初期进展缓慢？俄乌战争接下来将如何发展？俄罗斯方面是否还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这里简单地谈一下笔者的浅见，与各位网友一起交流。

从目前的战争形势看，普京以及俄罗斯军事当局在战争初期确实犯了轻敌冒进的错误。俄罗斯的综合武装力量远远超过乌克兰。俄罗斯全军约100万人，其中陆军和空降军约30万人，另有准军事部队约100万人。战前，俄罗斯在乌克兰周围集结兵力约20万人。

相比之下，乌克兰方面全军约25万人，其中陆军17万人，另有准军事部队约5万人。在国土防御作战中，上述共30万人都可以投入战斗，尚不计算数量不详的法西斯民兵。

种种迹象表明，俄罗斯军事当局最初的战役计划，是迅速掌握制空权，然后依托装甲优势，迅速包围乌克兰几个主要大城市，逼迫其投降，然后迫使乌克兰

政府签订城下之盟。但是，由于对乌克兰方面的顽抗估计不足，俄罗斯方面在战争的头几天仅投入了大约10万人的兵力。这样，虽然俄罗斯方面装备占优，但是在战场上的总兵力对比方面，实际上处于一比三的劣势，导致俄军在几个主要城市周围都无法突破乌军防御，形成僵局，导致战役企图失败。

除了俄罗斯军事当局由于轻敌导致兵力部署不当以外，俄罗斯方面在战役初期进展不顺利的其它原因有:

西方帝国主义各国结成了反对俄罗斯的统一战线，中国资产阶级首鼠两端，中国企业参加对俄罗斯的“制裁”。目前俄罗斯在国际上实际上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2014年乌克兰政变以后，乌克兰大力扶植法西斯民兵，进行仇俄教育，导致一部分乌克兰群众盲目追随乌克兰民族主义，甘心充当法西斯当局的炮灰。

俄罗斯方面出于政治的考虑，到目前为止，在攻城中避免使用坦克、重炮等重武器，也没有采取直接威胁人民生活的断水断电断气断网等手段，增加了攻城的战术困难。

俄罗斯内部矛盾严重。俄罗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反对与西方对抗，煽动小资产阶级“自由派”进行反战示威。普京当局由于其资产阶级国家的局限性，在战前未在俄罗斯士兵中进行广泛的解释和动员，导致部分士兵士气低落。

那么，以上这些对俄罗斯不利的因素是否意味着俄罗斯败局已定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综合各种情况，冷静分析。

首先，到目前为止，虽然俄军进展速度慢于预期，但并非没有进展。从目前的战场态势来看（见下图），战争进行四天后，俄军在北线和南线已经分别进到乌克兰境内50公里至150公里。在北线，兵临基辅和哈尔科夫城下。在南线，完全包围了位于黑海和第聂伯河沿岸的重要城市赫尔松，对克里米亚和顿涅茨克之间的马里乌波尔形成半包围，俄控克里米亚即将与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连成一片。

相比之下，在历史上著名的“闪电战”、1939年的波兰战役中，德军在兵力、装备都占优的情况下，从1939年9月1日发起战役，9月15日（即战争开始两星期之后）德军打到华沙城下，9月26日（战争开始三个半星期后）华沙投降。华沙距离战前的德国东普鲁士边界大约200公里。基辅距离现在的俄罗斯边界大约150公里、距离白俄罗斯边界大约70公里。俄军在战争开始后四天已经兵临基辅城下，与历史上的“闪电战”相比，进展并不算太慢。

其次，俄罗斯军事当局在战争初期遇到一些挫折以后，正在调整战役方针，放弃不切实际的在数天内速战速决的计划，准备进行更加严重的战争。在南线，俄军正在向马里乌波尔及其以北地区突进，与顿涅茨克方向的攻势相配合。如果成功，则俄军有望合围仍然盘踞在乌克兰东部的乌军主力，在大量歼灭乌军有生

力量以后，再逐个攻下各大城市；或者，如果乌军被迫撤回第聂伯河以西，则俄军可以迅速占领第聂伯河以东的广大地区。

在北线，俄军开始在基辅和哈尔科夫外围使用重炮，加快摧毁乌克兰方面的防御。有报道说，昨日，俄军已经突入哈尔科夫市区。此外，基辅、哈尔科夫等地的储油罐、天然气管道等民用设施遭到破坏。这些破坏是俄军有意为之，还是被炮火误击，还有待观察。

如果俄军坚持上述的战役方针，则有望在数天内夺回战场主动权，在控制了第聂伯河以东的广大地区以后，完成对基辅的包围，然后再视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发展决定是攻下基辅还是围城谈判。如果届时俄军能攻下哈尔科夫，则形势将更加有利。

就俄罗斯国内和国际上的形势来说，虽然部分俄罗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企图与西方帝国主义勾结，破坏前线的战争，进而推翻普京政权。但是，目前普京政权尚能有效控制军队和主要国家机器。尽管俄罗斯自由派知识分子煽动所谓“反战”，但是包括俄罗斯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俄罗斯人民对乌克兰有着深厚的历史感情，对于普京政权为了制止北约东扩而发动乌克兰战争是可以理解的。

国际上，虽然西方帝国主义纷纷发动所谓“制裁”，但是由于其内部矛盾，“制裁”并未触及普京政权赖以存在的经济命脉—— 俄罗斯的能源工业。中国资产阶级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也仍然在正常进行。

综合上述各种情况，俄罗斯方面应当有能力将在乌克兰的战争支撑数星期乃至更长的时间，直至达成俄罗斯在战争开始前制定的战略目标。

# 从撤退到溃退？
# 乌克兰危机和美国霸权的未来

草 庐 棋 士

最近在国际地缘政治领域发生了一件不得了的事。美欧和俄罗斯在关于乌克兰倒向谁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对峙。表面上看，双方的矛盾是围绕乌克兰是否加入北约问题而展开的。但是，随着美国的霸权衰落，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稳定都变得岌岌可危，此时在乌克兰爆发的这场危机，很有可能反映着主要大国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前途命运的看法和规划。

这场地缘政治危机有三个主要参与方。美国是世界霸权，在经济上具有制裁别国的能力，在军事上也能在正规战场打败任何挑战者。美国的核心利益在其霸权稳定的时期是在维持世界资本主义秩序基本稳定的情况下防止任何地方强权同时具备挑战自己的能力和意愿。在苏联解体、美国霸权回光返照的年代，美国资产阶级曾经对自己的实力有过高的估计。当时的美帝国主义试图控制世界上所有主要能源产地和战略要冲，对任何潜在的对手形成有效威慑。对于服从美帝国主义秩序的国家，美国鼓励其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将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原材料和能源纳入美国支配下的世界市场。对于不服从该秩序而又有重要地缘战略价值的国家，则依据其实力和意图采取军事包围、政治孤立、经济制裁乃至颜色革命的手段将其削弱和最终消化。

然而，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惨败和在叙利亚的僵持证明了美国的实力并不足以将这些国家有效吸纳进世界市场。阿富汗自不必说，伊拉克就算在美国占领下再度成为主要石油输出国也完全无法稳定自身秩序。在面子和里子都输光了

之后，美国资产阶级中出现了战略总撤退的声音。即逐渐放弃在中东和东欧的军事主导地位，将力量收缩进印度洋、太平洋和西欧边缘，然后进一步收缩回两洋之间。然而，战略收缩是最为复杂的地缘政治操作。历史上只有英帝国在付出惨痛代价之后还算体面地离场，而哈布斯堡王朝、荷兰、法国乃至苏联都是在收缩和守成之间摇摆不定，最后既耗尽了力量也堵死了退路，被迫接受崩溃结局。美国也遇到了类似的困境，一方面，与以往霸权治下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相比，美帝国主义治下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面积最广、人口最多、矛盾最为激烈，其稳定运行需要美国的频繁干涉。另一方面，美国资产阶级的主要集团，如华尔街、硅谷与其他国家的反动集团联系紧密。因此，战略撤退如果执行不当，很有可能演变成全球性的地缘政治溃败。所以，在奥巴马妄图恢复美帝国主义扩张态势的图谋破产之后，美国资产阶级的战略撤退基本上是按照“退两步，进一步”的之字形态势发展的。

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以后失去了苏联卫星国和许多前苏联加盟国的势力范围。总体而言，俄罗斯在东北亚和中亚的势力范围损失最小，蒙古和中亚五国基本上没有脱离俄罗斯的影响。但是，俄罗斯在西方的势力范围除了白俄罗斯外，基本退回到500年前伊凡雷帝时期或者1943年第三次哈尔科夫战役之前的水平。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试图通过休克疗法，放弃本国民族工业，将自己作为能源和廉价劳动力的输出国整合进当时尚且蓬勃发展的欧洲经济。然而欧洲并不需要那么多的廉价劳动力，而激烈的休克疗法和去工业化也极大地破坏了俄罗斯的基本稳定。在普京上台之后，俄罗斯采取了独立务实的地缘政治战略。第一，利用世界经济上升长波中的油价上涨周期出售石油和天然气，再使用外汇进口轻工业品的同时也维持了基本的社会福利。第二，在民生改善、清除大股民族分离势力并获得广泛支持的情况下，压制寡头买办势力，整合国内资本集团，实现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有效团结。这种有效团结也是俄罗斯可以在随后二十多年间奉行较为一贯地缘战略的基础。第三，通过能源与欧盟建立经济联系，并且利用能源的卖方市场性质获取欧盟的部分妥协。第四，在国内外大体稳定之后，俄罗斯开始着手恢复其在前苏联加盟国中的地位。主要表现为对亲美前加盟国的惩戒（格鲁吉亚）和对颜色革命的反击（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其中，阻止北约继续向东扩张并对俄罗斯西部边界实现包围是俄罗斯复兴阶段最为明显的战略目标。

欧盟，尤其是其中的北约成员国在形式上是美国的盟友，在实质上也与美国有着一定的共同利益。历史上，北约是为了向苏联和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军事压力而成立的军事侵略集团。在苏联解体后，北约的主要功能不复存在，但是作为地区安全条约组织，它在维持东南欧资本主义秩序和中东北非的新殖民主义统治方面还在发挥作用。美国与欧盟的共同利益随着苏联的解体也在缩减，两

者之间在高端制造业和高科技上的竞争关系则继续存在。一个为欧洲输送能源并且不惹出大乱子的俄罗斯是欧洲资产阶级能够且乐于接受的，而一个以防备俄罗斯为名时刻插手欧洲事务、甚至可能将自己拖入和俄罗斯战争的美国，则日益成为欧洲资产阶级的麻烦。

本次地缘政治危机的发生地乌克兰却算不上一个主要的参与方，它的地位接近于慕尼黑协定时期的捷克斯洛伐克或者日俄战争时期的清朝。乌克兰在脱离苏联后曾长期与俄罗斯维持着紧密的关系。在美欧扶持的季莫申科上台后，俄乌关系开始不稳，直到2014年乌克兰发生颜色革命，俄乌关系彻底破裂。现在的乌克兰政权是寡头垄断资产阶级操纵的傀儡政权，对内迫害俄罗斯族群众，对外向美国摇尾乞怜。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援助，它大概不会比阿富汗的傀儡政权维持更长时间。在民心尽失并且丢掉了克里米亚半岛、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之后，乌克兰傀儡政权的合法性跌倒了历史低点。目前，乌克兰傀儡政权甚至需要通过鼓励正宗的法西斯运动来转移社会矛盾，依靠跟俄罗斯搞摩擦来吸引美欧军事援助，乃至直接参与拜登家族的腐败事业已经成为乌克兰外交政策的一项主要内容。

本次地缘政治危机的起因有两种可能的剧本。第一个剧本是美国首先挑起冲突，俄罗斯处于守势，欧洲和北约其他国家被拖进冲突，乌克兰傀儡政权则在坐收渔利和彻底毁灭之间赌博。在这个剧本中，美国唯一可能的目标是通过进一步推动北约东扩、压制俄罗斯的势力范围，让普京以来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的努力付诸东流，从而削弱普京政权的合法性，进而实现政权更迭。在俄罗斯亲美政权上台后，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同时有能力和决心干扰美国的地缘政治企图。同时，美国如果控制了俄罗斯的能源，就会大大削弱中东石油产出国的议价能力，对严重依赖俄罗斯能源的欧洲和中国保持更大的影响力。

然而，这个剧本显然仅仅考虑了美国单方面的意图。事实上，美帝国主义的衰落的事实人尽皆知，欧盟和俄罗斯不可能全盘接受美国一厢情愿的设计。就俄罗斯而言，其统治集团与美国的主要资本集团联系并不紧密，在世界能源市场和军备市场上有着自己独立的利益和意志。如果放弃复兴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目标乃至交出政权，那么无论是俄罗斯统治集团还是普通民众都要付出重大牺牲。普京政权的合法性事实上就寄托在俄罗斯不想两次输掉冷战。面对北约东扩乃至政权更迭的前途，俄罗斯统治集团既有反抗意愿也能够让北约侵略军和乌克兰傀儡政权付出惨痛代价。

对于欧盟而言，其与俄罗斯的关系已经处于互补且稳定的状态中。俄罗斯并未谋求军事扩张，欧洲也相应地减缓军备更新。如果为了履行北约条约义务而主动挑起和俄罗斯的战争，那么除了军备负担之外还要承担以下后果。第一，普京

政权垮台后的亲美政权必然没有能力维持俄罗斯基本社会稳定，俄罗斯和随后崩溃的白俄罗斯将会成为恐怖主义、暴力犯罪和非法移民的渊薮，直接威胁欧洲社会的稳定。第二，欧盟将不得不长期向俄罗斯派遣维和部队。第三，俄罗斯亲美政权在能源和安全问题上将不会与欧盟直接对话，而是完全服从美国的意图，这就意味着欧盟将在各种事物上更加深刻地依赖美国。因此，为了美国这样一个同床异梦的盟友的边缘利益而赔上自己的重大地缘战略利益，这是欧盟所不愿做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欧洲各主要国家在此次危机中最多也只是口头表达一下对俄罗斯的不满而无任何实质性举措。

对于美国而言，普京政权的存在及其对东欧、中亚和中东的政治影响虽然是让人头疼，但远非心腹之患。颠覆普京政权既无法缓和美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也无法稳定全球资本积累秩序，但是要承担的风险和代价却是极大的。而且，今天美国颠覆俄罗斯与当年拿破仑和希特勒的侵略也不一样。对当时的法国和德国而言，打垮俄国（苏联）是关系自己生死存亡的问题。今天的美国已经“放任”普京的俄罗斯存在了二十多年，就算再继续“放任”下去也不会对美国霸权产生什么致命的威胁。所以，为了并不明显的利益，美国资产阶级各主要集团恐怕不会同意在乌克兰与俄罗斯大打出手。事实也是如此，除了少数军事工业复合体的代表人物（共和党“鹰派”）和“左派”帝国主义者（如克林顿等），美国资产阶级各集团要么是反对直接军事干涉，要么是看戏。已经见证了阿富汗耻辱撤退的美国劳动人民也对此种计划深恶痛绝。

上述的第一种剧本（美国主动出击）既高估了美国的能力，也低估了俄罗斯的意愿，更是假设了欧洲会为美国火中取栗。那么会不会有别的可能呢?

最近，俄罗斯分别向美国和北约公布了其谈判意愿。在公布的条款中，俄罗斯要求美国阻止北约东扩，尤其是不能接纳前苏联加盟国进入北约。同时，美国不应在尚未加入北约的前苏联加盟国部署军事力量。美俄双方都不应在本国领土领海领空以外部署有可能会威胁到对方的兵力兵器、国家联盟和社会组织。俄罗斯要求北约不得接受乌克兰加入的申请，并且要求1997年以前加入北约的国家（主要为西欧和中欧创始国）不能在1997年以后加入北约的国家（主要为包括波兰在内的东欧、东南欧国家和波罗的海三国）领土上部署军事力量。

俄罗斯的意图很明显，即除了波罗的海三国以外，前苏联加盟国要么应当直接成为俄罗斯的势力范围，要么不应对俄罗斯产生任何威胁。前苏联在东欧和东南欧的盟友应当成为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缓冲带。这是俄罗斯试图恢复自身地缘政治地位的清晰目标。这也是本次危机可能的第二种剧本，即俄罗斯的主动出击。

俄罗斯的目标是较为现实可控的。首先，美帝国的衰落势必留下大量的地缘政治真空。无论美国的战略退却速度如何，乌克兰地区永远只是美国地缘政治的包袱而非财富。俄罗斯相当清楚美国面临的国内矛盾，美国资产阶级对是否继续全力支持拜登还是和特朗普代表的社会运动达成妥协摇摆不定。俄罗斯知道美国资产阶级无论什么集团都不想再打一场阿富汗式的战争。那么，俄罗斯的意志越坚决，越是往俄乌边境集结重兵，美国就越不敢轻举妄动。尽管在收复了克里米亚以后，俄罗斯遭遇了美国和欧盟的制裁以及油价下跌的双重打击，但是这并没有对俄罗斯的社会稳定造成重大影响，普京政权的支持率依然很高。乌克兰傀儡政权的法西斯暴行不仅在乌克兰的俄罗斯族人中，也在俄罗斯一般民众那里引发了极大的憎恨。俄罗斯的军备重整也已经初见成效，在俄格战争和保卫东乌克兰民族自治的战争中，俄军已经彻底洗雪车臣战争中的耻辱。在叙利亚战争中，俄军也积累了大量的和美国各式傀儡武装战斗的经验。在这个时候，提出将势力范围恢复到前苏联疆界的要求，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那么，我们就来梳理一下俄罗斯可能采取的策略和各方的可能反应。首先，要求北约老成员不得进入新成员的境内相当于直接分裂北约，这个条款不会被北约轻易答应。但是，北约老成员不再向新成员境内增兵还是做得到的。这是俄罗斯的长期地缘政治期望，但在短期之内俄罗斯可能不会过分纠缠这一条。在此基础上，俄罗斯的最强硬路线就是不准乌克兰和其他前苏联加盟国加入北约，并且要求美国和北约不再给乌克兰傀儡政权提供军事支持。同时，乌克兰傀儡政权下台，亲俄政权取而代之。

面对这个要求，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都不会全盘接受。其中，美国可能采取的最强硬手段就是军事干预乌克兰局势。如果是那样，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入侵乌克兰。但是，美国资产阶级不会同意派遣大量地面部队全面干预乌克兰，最有可能的结果是美军向乌克兰傀儡军和法西斯民团提供防空和反装甲火力，以增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军事代价。但是，这显然挡不住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对于俄罗斯而言，全面入侵乌克兰与局部入侵乌克兰的代价（美欧制裁）相差不大，因此最优策略是迅速消灭乌克兰的主要军事力量，扶持亲俄政府，并对其提供有限的军事支持，对其内部事务不过分干预。

当然，其他北约国家（波兰除外）显然未必会同意乌克兰加入北约，在知晓俄罗斯地缘政治目标的情况下，就算与俄罗斯爆发冲突，也会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态度去“保卫”乌克兰。为此欧盟可能更期望在相互施压的途中与俄罗斯保持对话的通道。比如，商定未来乌克兰的政府形式，维持亚努科维奇-季莫申科式的亲俄-亲欧轮番执政，或者组建双方都满意的联合政府。当然，乌克兰加入北约就别想了。

如果俄罗斯愿意稍微做出一些让步，那么可以采取的方案是，在保证乌克兰不加入北约的情况下不再谋求改变乌克兰政府，但是条件是美欧军事力量撤出乌克兰，且乌克兰承认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和东乌克兰地区的自治状态。如果冲突双方都抱着稳定局势、守住底线，但又不逾越对方底线的想法，这大概是现阶段最为“理性”的解决方案。俄罗斯避免了北约东扩的危机，同时对乌克兰有了更大的威慑力；欧盟扔掉了乌克兰这个包袱，避免了为此和俄罗斯开战；美国大概会骂骂咧咧，但是走还是要走的。只有乌克兰傀儡政权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弃子，但是也从来没有人真正关心过它的命运。

俄罗斯最软弱的反应，就是在无力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情况下只对乌克兰进行报复性的局部渗透破坏，而前面向美国和北约提出的要求纯属虚张声势。但是，无论从俄罗斯的国力还是从其统治集团的手腕来讲，这种情况都不现实。当然，只有习惯于把“独裁者”都包装成色厉内荏的小丑形象的美国主流媒体会这么幻想。

如果现实的发展真是符合我们前面所说的第二种剧本的话，那么该地缘政治危机就显然不是仅仅限于乌克兰或者东欧了。如果俄罗斯向美国和北约都提出了明确的地缘政治意愿，而且有坚定的意图去实现的话，就只能说明美国霸权的衰退速度已经超过了美国资产阶级最大胆的设想。目前作为区域性大国的俄罗斯，已经在公开向美国要求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这个势力范围是拒绝美国军事力量存在的。因此，俄罗斯统治集团或许已经判断，走向战略撤退的美帝国主义无论如何都不敢为了东欧和俄罗斯公开开战，而蚕食美国势力范围的机会已经到来。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总统约翰逊为其向越南大举增兵给出的理由是担心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即越南的革命会引起整个印度支那乃至泰国、印度和东南亚的革命。不过，当时如日中天的美帝国主义并不需要担心这些。但今天的形势迥然不同，美国战略撤退已成定局，但是美国战略撤退的目标还不清楚。在美国资产阶级各个集团中，只有特朗普集团似乎有着明确的最终收缩至“两洋之间”的撤退目标，但是美国资产阶级显然还没有就此达成共识。比起俄罗斯清晰明确的要求，拜登集团只能给出毫无实际内容的维护人权和民主的目标，最近据说还加上了维护乌克兰的主权。但是，美国的盟友和仆从国都不知道美国的底线在哪里，尤其是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处在这个底线之内。北约过去作为军事同盟提供了类似的底线，但是今日的北约则颇为尴尬。如果北约不东扩，那么它就没有对手，自然没有存在的意义。如果北约东扩，它就会惹上一个自己根本不想惹的对手。名为拔剑四顾，实则进退维谷，这也是法国总统说北约已经“脑死亡”的原因。如果美国最终以任何方式接受乌克兰不能成为北约成员的事实，就会给实际

上其他各路地方强国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印度、伊朗、土耳其等国家势必会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无论这些国家与美国的关系如何，这些新扩张的势力范围都逐渐成为美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禁区。

美国霸权将无力负担压制民族国家冲突的职能，而在这些民族国家冲突的边界，资本积累秩序则很可能走向崩溃。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从勉强维持的状态变成失败国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也将从相互联系的“全球化”时代走向山头林立的分裂时代。摆在美帝国主义面前的，是要么在维持帝国“架子”的冲突中耗尽力量并走向内爆，要么务实地放弃世界帝国，主动或半主动地退缩为两洋之间的民族国家。而对于其他严重依赖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稳定的国家而言，无论美国走向何方，它们要面对的结果都是灾难性的。

就在几天前，传闻中国曾请求俄罗斯不要在冬奥会结束之前入侵乌克兰。如果美俄冲突爆发，中国资产阶级将处在十分不利的地位。一方面，它绝不敢公开站在俄罗斯一边，尽管普京政权的崩溃将会让中国资产阶级陷入完全孤立。另一方面，它也不敢公开站到美国一边，从而彻底葬送自己仅剩不多的外交声誉。如果美俄对峙长期下去，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势必要求中国资产阶级在台湾、南海、印度方向有所作为，从而不辜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机遇，而这也是中国资产阶级绝对不会做的事情。所以，如果乌克兰冲突不爆发，那么中国资产阶级就不必做出选择，大可维持现状。而一旦冲突爆发，中国资产阶级就会面对外失盟友、对内负民心的尴尬局面，从而进一步引发阶级矛盾连锁爆炸。

# 安生真懂现代战争吗？
# ——唯武器论，还唯了错误的武器

草 庐 棋 士

昨天，知名财经写手安生出乎意料地发了一篇军事评论文章，题为“乌克兰战争是一次有代差的战争”。在文中，安生对美国援助给乌克兰的“高技术”装备大加赞赏。

文章的开头就说，这场战争是“数字化智能轻步兵对信息化重装集团”。乌克兰的现代化单兵反人员、反装甲和防空装备领先了傻大黑粗，尤其是还执着于“诸兵种合成”的俄军整整一代。这是乌克兰克敌制胜的法宝。

具体而言，乌克兰的单兵反坦克导弹、防空导弹和无人机具有压倒俄军的信息化优势。信息化优势可以使这些单兵或者班组操作的武器实现高精度、远射程、轻量化、大数量和成本低的优势。安生在文中还煞有介事地说，未来具有独立人工智能的武器甚至不惧怕电子干扰。同时，美军在信息化上的研究处在正确的轨道上，而俄军则是继续沿着前苏联已经点错的技能树上继续向着失败前进。

坦率地说，安生既对本场战争的进展毫无认识，也对未来战争的一般趋势一头雾水。

如果乌克兰的单兵“高技术”装备如此出神入化，打得俄军屁滚尿流，那为何是拥有数字化单兵的乌军而不是傻大黑粗的俄军丧师失地，被压制在永备工事和城市里出不来？为什么是乌军的弹药库、补给堆栈、油料中心和指挥部天天被俄军“延续苏联过时传统”的导弹摧毁，而不是相反？为什么是乌军而不是俄军需要绑架平民做肉盾还天天制造假战果（俄军的战报风格一致，向来只是说摧毁了多

少军事目标）？作者的判断和事实的反差只能说明一点，是俄军在物质和技术上占有优势，而乌军（尤其是法西斯民团）不得不采用固守据点的方式来抵消俄军的优势。

当然，俄军确实没能在战争初期迅速夺占主要城市。但是这些能在俄军包围下坚持较久的城市，如切尔尼戈夫、苏梅、哈尔科夫、尼古拉耶夫等都是有旅级建制的乌克兰装甲部队防守的。而最初攻击这些城市的部队则是俄军抽出信息化骨干等“新质作战力量”组成的数字化合成营战斗群。事实证明，就算是这些在叙利亚的攻坚战中证明过自己的高技术战斗群，在面对对方正规装甲部队防守的城区时一样寸步难行。对于这场战争初期阶段正确的看法是，乌克兰传统旅级编制和在技术上稍微落后的机械化部队成功地抵御了俄军轻型数字化部队的进攻。

北约国家有没有给乌克兰输送武器呢？当然有，比如乌克兰获取了大量的标枪反坦克导弹和毒刺防空导弹等。不过这些东西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设计定型的产品，新的型号在射程和破甲能力上有所提升，但显然起不到改变战局的作用。理由很简单，一种军事装备的性能首先是由该装备的平台决定的。同等情况下，平台越大，威力越大、精准度越高、抗干扰能力越强。单兵防空武器再远不过打上几公里，打一发就没了，很容易被干扰；吉普车底盘就能在更远的射程上有持续作战能力，一发被干扰就再来一发；坦克底盘就能搞弹炮合一的防空支援车辆，高炮炮弹反正不怕干扰；重型卡车底盘就能架起半径数百公里，多种制导方式合一的野战防空系统；以大型舰船和地库为平台的武器系统只会更强而不会更弱。大平台带来的能量、威力、探测信号强度和精准度以及持续作战能力都是小平台不能比的。美军在沙漠风暴行动中如砍瓜切菜般的表演，也是美军的大型电子战平台成功压制伊防空系统后才能实现的。与美军的什么单兵装备毫无关系。

安生对待现代战争的态度在现在的小资产阶级青年中非常典型，这也不能全怪他们。自从海湾战争以来，中国的军迷中就弥漫着一股唯武器论的的有毒气氛。当然，关注军事技术的发展本身并无问题，但是他们对军事技术发展的理解方向出现重大偏差。首先，他们把美帝国主义用压倒性空军和机械化兵力优势打赢的海湾战争当成了纯粹是通过高技术取胜的战争。第二，他们把21世纪美国的几场针对极其虚弱的对手而且完全不顾及平民伤亡的战争当成了战争的常态。第三，在好莱坞和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的宣传引导下，他们把这种战争的“常态”理解成了特种部队就能应付的事情。乌克兰“数字化轻步兵”既包含着所谓“高新技术”，又是“轻步兵”，还渗透着美式个人英雄主义。上述三种幻想叠加起来，就构成了他们对本不存在的乌克兰“数字化轻步兵”的幻想。

在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军迷”多数是民族主义者，他们从不关心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就算偶有关心，也仅仅是限于嘲讽潜在对手（海岛伪军）没有战斗意志，或者重复一些阴谋论大棋党的蠢话。而中国最有能力思考政治问题的左翼人士却多数只懂得批判的武器，轻视武器的批判，导致空谈语录却不知兵的可笑局面。这就造成了这种既相信唯武器论，又唯错了武器的现象普遍存在。

随着战争的进行，随着世界格局的激变，会有越来越多的“军迷”走出武器决定论的狭隘界限，开始思考武器为谁服务，如何服务的问题。同时，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左翼人士开始放弃书生成见，积极学习和思考战争艺术。

# 所谓的“基辅反击战”会成为俄乌战争的转折点吗?

远 航 一 号

**网友“xsa234”问:**

网上有人说:

根据ISW（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传来的消息，在22日-23日俄军就从进攻转为了防御并开始铺设地雷，在此期间，乌军进行了程度有限的反击，但仍然有效地牵制了俄军的兵力（注1）。在此地区转入防御的V集群是从近卫第76空中突击师，第11空中突击旅，第31空中突击旅，第45空降兵特种作战旅等部队中抽调的13个营级战斗群以及协同作战的地面火炮，野战防空，队际通讯等等辅助部队。该集群目前唯一的补给路线是从俄军在白俄罗斯的铁路中转点莫济里到基辅的P37-P02硬化双车道公路，全长200公里，其中在乌克兰境内的长度不足60公里。敏锐的读者应该已经发现了，早在本月初，乌军就发出了反击的宣言，当时在简中互联网被称之为“狂妄”，遭受了群嘲，声称乌克兰要逃到波兰去。然而乌克兰确实发起了实质上的反击，反击的地点就选在了基辅西北部，攻势作战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削弱了V集群的战斗力，但由于乌军机动兵力不足，没能取得大的战果。当时外界普遍分析这次反击是为了减轻基辅城防压力，乌军接下来的重点仍将放在顿涅茨克方向。不过仍然有嗅觉敏感的人士能察觉事情真正的走向：知乎用户玉米小贩米基塔就坚持认为乌军要在此方向打运动战和歼灭战，月

初的反攻只不过是试探虚实，在积攒起足够的决战力量后，一定会选择包一个大的饺子。果不其然，在布恰和伊尔平前出“赶鸭子”的同时，乌军已经在P37-P02补给线重要的节点克拉西亚季奇与俄军爆发激烈交火，意图一举切断V集群这条生命线。不过正如前文所述，这条双车道公路非常脆弱，即使乌军无法夺下克拉西亚季奇，而仅仅是以炮火或是空中力量封锁路线数天，V集群也会因为缺油少弹丧失绝大多数的战斗力。玉米小贩米基塔补充说如果乌军能够拿下位于伊万基夫南面，捷捷列夫河上V集群唯一可以使用的渡口，那么俄军就会实质性断补。庞大的V集群只靠一条双车道公路运送补给是十分危险的，俄乌两军心里也十分清楚。

不清楚现在的战况，乌克兰在军事方面有可能达成这样的反击吗?

**远航一号答:**

首先，根本就没有什么“反击战”，不过是乌军占据了一些俄军主动放弃甚至根本从来没有占据的村庄，然后在网上宣称“反击”。其次，基辅根本不是整个战场的重点，真正的转折点不在基辅，而在马里乌波尔。

俄军即将全部解放马里乌波尔，现已攻克市政府大楼。

马里乌波尔战役意义重大。第一个意义是，歼灭乌军三个旅及法西斯亚速团，共15000人，约占战前乌军总数5%、野战部队十分之一。第二个意义是，显示俄军有能力攻下乌军预先坚固设防并裹挟大量平民做人质的大城市；俄军约两个星期前完成包围，前期边打边解救平民，进展缓慢；一旦平民基本疏散完毕，俄军攻势进展神速，总攻后开始一天就打到市中心。第三个意义是，攻克马里乌波尔后，俄军从克里米亚到顿巴斯连成一片，后勤和增援畅通无阻。第四个意义是，俄军攻城部队约三万人，解放马里乌波尔后即可转入东部战场，使东部战场发生决定性有利变化。

现在看来，俄军战略计划完整周密，执行顺利、有条不紊。俄军从一开始就没有想闪电战、速决战，这些都是西方情报机关放出来的烟幕。俄军贯彻的是克劳塞维茨（后来被毛主席活学活用的）军事原则：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不以占领城市和地方为目的。

战前乌军约三十万人（含法西斯民兵），其中野战部队约15万、30个旅；战争开始后强拉壮丁或从流氓中补充的保安部队无战斗力。

2021年，乌克兰法西斯当局在美、英帝国主义怂恿下，妄图用军事手段一举消灭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所以在战前将其全部野战部队大约一半集中在东部的顿巴斯地区。

根据乌军的上述部署，俄军在战争开始后分别从南部克里米亚、东部顿巴斯、北部哈尔科夫、北部基辅四个方向发动攻势。其间也曾派少量侦察部队一度渗透进基辅，骚扰为主，根本不是真面目作战。

从克里米亚出发的部队又分为沿第聂伯河西侧和东侧两支。

俄军如此部署，将仍然部署在第聂伯河以西的乌军大部分吸引、牵制在基辅市周围，使其无法向东增援。

而在第聂伯河以东，俄军得以南北夹击（从哈尔科夫方向和克里米亚方向）、东西夹击（从克里米亚方向和顿巴斯方向），一方面将乌军三个旅在马里乌波尔包围歼灭，另一方面对顿巴斯地区乌军主力约10个旅构成三面包围。

俄军在乌克兰战场总共投入约20万，另有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人民武装数万。全军约40%在第聂伯河以西，主要对基辅地带的乌军起监视、牵制作用。乌军在基辅不动则已，动则在野战中将其歼灭。

俄军总兵力约60%在第聂伯河以东，加上两共和国武装后，约15万。

自战争开始后，俄军战场表现稳定，没有战斗力削弱迹象，说明俄军伤亡有限，且能得到及时补充。据俄罗斯国防部最新消息，战争开始至今，俄罗斯武装力量战死1000多，伤3000多，累计伤亡约5000，平均每天伤亡约150（其中亡30），完全在俄军可承受范围内。

经过少量补充和增援，俄军战场总兵力始终保持在二十多万；而乌军伤亡则得不到补充，或者只能用壮丁、流氓充数。

俄军解放马里乌波尔后，在东部战场南、北、东三个方向可以集中约15万人。乌军顿巴斯主力约10个旅、5万人，其中一部已经被分割在东北部利申斯克、北顿涅茨克地区。俄军在乌克兰东部战场相对于乌军有三比一的绝对优势，并有制空权和炮火优势。乌军唯一的“优势”是可以依托在顿巴斯地区多年修建的坚固工事。但乌军一旦脱离工事，即很容易被歼灭。

目前，从北面伊久姆出发的俄军即将包抄到乌军集团的背后，从南面向北推进的俄军也即将切断乌军后方的主要补给线。顿巴斯地区的乌军主力如果继续困守，必遭全歼；如果仓皇撤退，因燃料不足，将不得不放弃全部重装备，徒步数百公里，沿途冒着飞机轰炸、炮火打击的风险，即使撤退成功，也将基本失去战斗力。

未来数周，俄军很可能控制第聂伯河以东（除少数被围城市以外）全境，从而基本实现其军事目标。接下来，俄军很可能在第聂伯河以西发动攻势，从敖德

萨到基辅连成一线，完成对基辅、敖德萨的包围。到那时，如乌当局投降，俄军可不战而克基辅。否则，俄军可以效法马里乌波尔模式，边围边打边谈，打两天，休战两天、放平民出城，把城内的平民一点点挤出来，最后一举消灭城内负隅顽抗的法西斯分子。

在控制了基辅—敖德萨一线以后，俄军在军事上就可以取得全胜。从目前情况看，在乌克兰东部的广大地区，一旦群众从法西斯恐怖中解放出来，普遍拥护俄军。俄军有能力建立有效秩序。俄占基辅后，可以视情况，或成立全乌克兰新政府，或者仿效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成立若干个共和国。

至于西部，则或者听任其自生自灭，或者默认波兰占领利沃夫一带，然后在波占区和俄占区之间设立某种非军事区。

总之，战争的转折点确实来了，但不是什么子虚乌有的乌军反攻，而是俄军在东部战场的重大突破。未来数周，将验证俄军的胜利。战争很可能以俄罗斯在军事上、经济上都对北约取得胜利告终。到那时，就是美国霸权总崩溃开始，很可能也是五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对亚非拉人民统治的总崩溃的开始。

# 俄罗斯开辟了打击美欧帝国主义的第二条战线

远 航 一 号

综合过去几天军事、外交、国际经济的信息，谈一点感想：

军事方面，俄罗斯解放顿巴斯行动的第一阶段已经顺利结束，解放了卢甘斯克共和国90%的领土、顿涅茨克共和国60%的领土以及赫尔松州的一部分。俄军歼灭了乌军战前总兵力的十分之一，摧毁了其三分之二的装甲力量和一半以上的火炮，基本歼灭其海军、空军和防空力量。

战争第二阶段，预计俄军将集中优势兵力围歼顿巴斯地区的乌军主力。在全歼乌军主力并解放顿涅茨克共和国全境后，可以视情况发展决定是否进入第三阶段。

如果在战争第二阶段结束后，乌克兰当局屈服并全面接受俄罗斯和平条件，则战争可以结束。否则，战争将进入长时期的边打边谈阶段（可能类似于朝鲜战争运动战结束后的阵地战阶段）。

到时，俄军可以选择一条合适的防线（比如第聂伯河），将其堡垒化，阻止乌克兰法西斯分子渗透。防线东面被解放地区的人民可以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平建设。

对西部，俄军则可以长期轰炸、空袭，使得法西斯分子无法恢复军事力量，也无法进行资本积累。随着乌克兰西部沦为经济废墟，平民大量逃亡，即使乌克兰法西斯分子靠帝国主义施舍搞一些恐怖主义武装，也不足为惧。

无论俄乌战争运动战阶段结束后双方的临时军事分界线在哪里，最低限度，俄罗斯将取得以下胜利：

一、彻底挫败了北约东扩的图谋；

二、基本消灭了乌克兰法西斯当局的军事力量。

由于上述两个胜利，俄罗斯已经迫使美帝国主义改变了其全球军事部署。美帝现在已经不得不将其所能调动的几乎全部机动兵力（约10万）集中在东欧一线。这就意味着美帝事实上已经丧失了在全球任何一个区域发动较大规模侵略战争的能力。

这是俄罗斯解放顿巴斯战争对世界人民的巨大贡献。

长远来说，随着美帝衰落，无力在欧洲长期维持大规模驻军，俄罗斯的军事影响力还可以继续向西发展。

俄罗斯解放顿巴斯的军事行动，是俄罗斯反对美欧帝国主义的第一条战线。随着俄罗斯宣布天然气贸易用卢布结算，俄罗斯又开辟了反对美欧帝国主义的第二条战线。

美欧帝国主义错误估计形势，以为用所谓经济制裁、无耻地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等手段，就可以摧毁俄罗斯经济、压垮俄罗斯人民。而实际情况是，目前俄罗斯经济稳定，人民空前团结，同仇敌忾决心与美欧帝国主义及其乌克兰傀儡长期斗争。卢布对美元汇率恢复到战前水平。

俄罗斯宣布天然气贸易用卢布结算后，将进一步增加对卢布的需求，加强卢布地位。同时，俄罗斯中央银行正以5000卢布兑一克黄金的固定价格不断地买进黄金。这就在卢布与黄金之间建立了联系。卢布实际上已经退出了美元体系。发展下去，卢布可能成为自五十一年前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以来，第一个恢复金本位的主要货币。

本来，自新冠危机以来，美欧诸国为了缓和内外矛盾，冒险实行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和货币扩张。世界经济出现复苏后，又由于供应链混乱，以及过去几年能源和原材料部门投资严重不足，世界经济已经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危机。

美欧帝国主义在这种形势下仍然狂妄自大，不知道自己早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悍然发动对俄罗斯的制裁，大大加重了石油、天然气、粮食、化肥、有色金属等市场的短缺。接下来，欧洲经济可能首先转入衰退。同时，由于欧洲中央银行为了支撑南欧各国政府的债券，不敢提高利率，在世界通货膨胀加速和美联储提高利率的背景下，欧元有可能首先崩溃。

美国也在陷入停滞膨胀。美国的年贸易赤字已经达到约一万亿美元、所以每年需要获得大约一万亿美元的净资本流入来维持美元稳定。随着卢布国际化以及越来越多国家减持美元储备，美国在净资本流入方面的缺口将越来越大。

对美元的最大支撑来自于人民币。人民币与美元之间保持准固定汇率，实际上就等于用中国的制造业出口能力为美元做担保。

但是，当世界的通货膨胀传导到中国，中国的消费通货膨胀再也无法遏制时，人民币将被迫与美元脱钩。一旦人民币与美元脱钩，美元就将沦为断线的风筝，彻底崩溃。

五百年来西方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局面就要一去不复返了！

# 俄乌战争长期化以后的发展态势——胜利的天平向哪边倾斜？

远 航 一 号

3月29日，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将大幅度减少在基辅、切尔尼戈夫方向的军事行动。此后数天，俄军基本撤出了乌克兰北部边境地区。随着俄军完成战争第一阶段的任务并重新调整部署，俄乌战争已经形成了长期化、持久化的局面。俄乌战争为什么进入长期化、持久化？战争转入长期化以后，俄、乌双方各自的战争潜力如何？哪一方能够坚持到战争胜利？对未来全球形势的发展又将产生哪些影响？这篇文章就来谈谈笔者对于这些问题的个人看法。

在过去一个半月的战争中，俄罗斯方面在军事上取得了一定胜利，给乌克兰法西斯当局以沉重打击。据俄罗斯国防部4月9日消息，自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布特别军事行动以来，已经击落乌军127架飞机、98架直升机和425架无人机，摧毁乌军2031辆坦克和其它装甲车辆、228台多管火箭炮系统、880门野战火炮和迫击炮以及1932辆军用车辆。这意味着俄军已经摧毁了战前乌军所装备作战飞机的84%、直升机的66%、坦克和装甲车辆的84%、多管火箭炮系统的43%、火炮和迫击炮的58%。此外，据俄罗斯国防部在3月25日发布的第一阶段作战总结，至3月25日，俄军已经毙、伤、俘乌军约3万人，约占战前乌军总数的九分之一，乌军24个旅级作战集群均受到重创，乌海军被全歼，乌空军基本被消灭。

俄罗斯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人民武装解放了乌克兰南部从赫尔松到别尔江斯克的广大地区，解放了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领土的90%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领土的60%，控制了全部亚速海岸，并即将解放战略重镇马里乌波尔。

另一方面，在俄罗斯解除了对基辅、切尔尼戈夫、苏梅等地区的包围态势并主动撤出以后，乌克兰法西斯当局以及国际资产阶级媒体弹冠相庆，叫嚣所谓乌克兰在北部战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东部战场，乌军主力约5万人、10个旅仍然在负隅顽抗，俄军作战艰苦，尚未完成对顿巴斯地区乌军的合围。

值此俄军第一阶段攻势告一段落而第二阶段攻势尚未开始之际，无论是国际资产阶级媒体还是中文媒体中的自由派反动势力，都在大肆鼓噪，认为俄罗斯的战争潜力即将枯竭，俄军精锐部队已经受到重创，乌克兰必将取得战争的胜利。而在中国的左派积极分子中，那些坚持“中帝论“的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一面表示“旗帜鲜明”地支持乌克兰“反侵略”，另一面又跟在西方资产阶级媒体的屁股后面鹦鹉学舌，鼓吹唯武器论，贬低俄罗斯军队与乌克兰相比有“代差”，断定俄罗斯必败。

比如，3月12日，曾经提出臭名昭著的“历史终结论”、堪称新自由主义反动世界秩序精神教父的弗朗西斯·福山就曾经预言：“俄罗斯在乌克兰正走向彻底的失败。俄罗斯的计划是一个低能产品，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即乌克兰人对俄罗斯钟情好感，他们的军队会在俄罗斯入侵后立即崩溃。俄罗斯士兵显然为他们在基辅的胜利游行携带了礼服制服，而不是额外的弹药和口粮。普京此时已将其整个军队的大部分投入到这次行动中——没有庞大的储备部队可以被他调用来增加战斗力。俄罗斯军队被困在乌克兰的各个城市之外，他们面临着巨大的供应问题和乌克兰的不断攻击。俄军阵列的崩溃可能是突然和灾难性的，而不是通过消耗战慢慢发生。野战中的军队将达到一个既不能补给也不能撤退的地步，士气也会蒸发全无。……普京不会在他的军队被击败后幸存下来。他得到支持是因为他被认为是一个强人；一旦他表现出无能并被剥夺了胁迫他人的权力，他还有什么价值呢？”

3月中旬，原美国驻欧洲部队司令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俄军的补给和弹药只够再撑10天。目前俄军士气低落、部队指挥官之间出现分歧，甚至出现叛乱事件。这都表明俄军已出现重大人力问题。”另外一位原白宫高级官员认为，“普京和俄军正变得越来越绝望……我认为俄罗斯，特别是普京，已经陷入真正的麻烦。”

中国的反“俄帝”左派在这方面与西方资产阶级遥相呼应。在社交软件“电报”上，有一个叫“守夜的黑猫”的人，在3月下旬发布评论说：“现在看来俄军恐怕已经没有兵力再进行第二次战役突击了。……战场主动权已经逐渐倒向乌军……俄军受制于兵力枯竭，如果普京为了避免战败、扩大战果，将不得不进行动员，使战争长期化。如若普京决定下此更重的赌注，赌上自己的前途和俄罗斯的国运，实施更大的政治和军事冒险，一旦失败将遭更严重的反噬。当然俄罗斯进行动员

的可能性并不大，一是因为俄罗斯动员体制已不复存在，重新进行动员需要大约半年时间，武器弹药储备恐怕无法支撑半年。即使成功动员，以俄罗斯现有军工产业的生产和组织能力，也无力提供足够武器装备。二是俄国内反战力量越来越强，普京尚且顾忌投入义务兵参战，对战争动员只会更为忌惮。”

总之，在西方资产阶级头面人物以及中国左派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看来，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不能支持长期战争，一旦战争长期化，俄罗斯必败无疑。

那么，俄乌战争为什么会发展为长期化？战争长期化后，胜利的天平将如何倾斜？

## 俄乌战争为什么会长期化？

早在战争开始后第三天的2月27日，笔者在“俄罗斯在战争初期为何进展缓慢？”一文中就曾经尝试回答俄罗斯在战争初期的军事进展为什么与当时媒体和舆论的预期普遍存在差距。首先，俄罗斯在战争初期投入的兵力不足：“乌克兰方面全军约25万人，其中陆军17万人，另有准军事部队约5万人。在国土防御作战中，上述共30万人都可以投入战斗，尚不计算数量不详的法西斯民兵。种种迹象表明，俄罗斯军事当局最初的战役计划，是迅速掌握制空权，然后依托装甲优势，迅速包围乌克兰几个主要大城市，逼迫其投降，然后迫使乌克兰政府签订城下之盟。但是，由于对乌克兰方面的顽抗估计不足，俄罗斯方面在战争的头几天仅投入了大约10万人的兵力。这样，虽然俄罗斯方面装备占优，但是在战场上的总兵力对比方面，实际上处于一比三的劣势，导致俄军在几个主要城市周围都无法突破乌军防御，形成僵局，导致战役企图失败。”

笔者接着说：“俄罗斯方面在战役初期进展不顺利的其它原因有：西方帝国主义各国结成了反对俄罗斯的统一战线 …目前俄罗斯在国际上实际上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2014年乌克兰政变以后，乌克兰大力扶植法西斯民兵，进行仇俄教育，导致一部分乌克兰群众盲目追随乌克兰民族主义，甘心充当法西斯当局的炮灰。俄罗斯方面出于政治的考虑，到目前为止，在攻城中避免使用坦克、重炮等重武器，也没有采取直接威胁人民生活的断水断电断气断网等手段，增加了攻城的战术困难。俄罗斯内部矛盾严重。俄罗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反对与西方对抗，煽动小资产阶级‘自由派’进行反战示威。普京当局由于其资产阶级国家的局限性，在战前未在俄罗斯士兵中进行广泛的解释和动员，导致部分士兵士气低落。”

笔者上述分析中的主要部分，如俄罗斯在战争初期投入兵力不足、西方帝国主义结成反俄统一战线、乌克兰存在着一大批顽固的甘当炮灰的法西斯分子、俄

军为了减少乌克兰人民伤亡而在作战手段上保持了极大的克制从而限制了装备优势的发挥等，已经被后来战争的发展证明是符合实际的，并且继续对战争进程产生着影响。有些部分，比如关于俄罗斯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以及俄罗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已经发生了对俄罗斯国家和人民有利而对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不利的变化。还有一些方面，如俄罗斯军事当局最初的战役企图，是真打还是假打基辅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限于文章篇幅，这里暂不讨论）。

在这篇文章中，笔者还写道："俄罗斯军事当局在战争初期遇到一些挫折以后，正在调整战役方针，放弃不切实际的在数天内速战速决的计划，准备进行更加严重的战争。在南线，俄军正在向马里乌波尔及其以北地区突进，与顿涅茨克方向的攻势相配合。如果成功，则俄军有望合围仍然盘踞在乌克兰东部的乌军主力，在大量歼灭乌军有生力量以后，再逐个攻下各大城市；或者，如果乌军被迫撤回第聂伯河以西，则俄军可以迅速占领第聂伯河以东的广大地区。"[34]

在2月28日的"乌克兰军事形势快评"中，草庐棋士评论说："昨日俄军最大的进展是对东乌克兰的乌军主力形成了半包围。在迅速、无伤亡或低伤亡夺取基辅的计划失败后，俄军开始以包围和消灭乌军主力为目的展开行动。昨日俄军占领了梅利托波尔和别尔江斯克两座沿海城市，对东线乌军重要据点马里乌波尔形成包围。...如果俄军合围乌军主力的计划成功，那么乌当局可能依靠的正规军力量就基本被消灭，剩余的法西斯民团就只能依靠城市据守，从而无法扭转被动局面。"[35]

所以，早在二月底，红色中国网的草庐棋士、远航一号就已经正确判断，俄乌战争的真正主战场在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一带，而不是在北部的基辅一线；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是俄军能否大量消灭乌军有生力量而不是能否占领若干个大城市。并且，不迟于2月28日，俄军真正的主攻方向已经转向了乌克兰东部（而不是资产阶级主流媒体渲染的迟至3月底）。换言之，即使俄军确有在战争初期一举夺取基辅等城市的计划，也是一种试探性的、军事上力争达到的某种最理想的情况，而不是俄军所准备的基本的作战计划，否则无法解释后来俄军在东部战场的巨大进展。事先准备多个可能的方案，力争某种理想情况，同时准备面对各种可能的困难，是一支现代化军队在面对复杂多变的战争形势时必然要做的工作。

从目前俄乌战争的形势来看，远航一号在2月27日文章中所列举的几点因素继续起作用。乌克兰法西斯当局的军队庞大，相对于战场上的俄军有一定的数量优势，决定了俄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灭法西斯当局的大部分武装力量。美、欧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让乌克兰人民充当炮灰，以服务于他们称霸欧亚大陆的狂妄野

34. 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50105

35. 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50108

心，向乌克兰法西斯当局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怂恿后者将战争打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这使得法西斯当局自以为有将战争进行到底的本钱。此外，美、欧帝国主义纠合其仆从国，对俄罗斯国家和人民实行了无耻的、疯狂的经济“制裁”，给俄罗斯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困难。这些，是俄乌战争长期化的基本原因。

从军事上来说，随着3月初俄军以乌克兰东部为主战场，战争就已经进入了“常规机械化战争”阶段。早在3月3日的“乌克兰军事形势快评”中，草庐棋士就预言，“常规机械化战争”将是“缓慢而残酷”的，从网络舆论的观点看，甚至可能是“无聊”的：“比起惊险刺激的特种作战，这一阶段的战争要无聊、缓慢而且残酷地多。要夺占一座关键城市，需要先进行战斗侦查，在战斗侦查中，可以适当占领一些进攻阵地。在大部队到来时，需要制定计划，是突击还是合围，然后协调不同兵种、军种和国别军队的统一行动。然后在扫清外围据点，用炮击和空袭成功打击敌军指挥中枢并削弱敌军士气后，才能谨慎地开展逐条街道的争夺。最后还要扫清隐藏起来或者装成‘反战人士’的法西斯分子。对于特别大规模的攻城战，还需要设置相当规模的后勤中心，并且协调民事部门安置居民。攻城作战是复杂程度仅次于两栖登陆作战的战斗形式，任何一个阶段都有可能出现反复。敌人的反击、依托坚固据点的顽抗，敌人在居民区设置爆炸物，在战斗中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等，都有可能拖慢整个进度。机械化战争的攻城战斗是以天乃至周为时间单位的。在一边倒地支持乌克兰法西斯的国外媒体上，俄军主动放弃一个不利于发起攻击的地区，乃至仅仅是路过，都会被宣传成是‘乌克兰人民’成功打退了俄军进攻。...无论对双方还是观众来讲，机械化战争都是考验耐心、意志、和韧性的阶段。试图哗众取宠地帮助“乌克兰人民”宣布胜利，是毫无意义的。”[36]

## 谁将是长期化战争的胜者？：军事潜力

长期化战争是敌对双方综合国力以及各自可以利用的国际外援的较量。作为战争，首先是双方军事潜力的较量。

乌克兰是除俄罗斯联邦以外的欧洲第一大国，因而有丰富的兵役资源。战前，乌军（包括组织为“国民卫队”的法西斯民兵）有现役官兵25万，是欧洲最庞大的军队之一。此外，乌军有预备役人员约20万。

除了上述现役和预备役人员可以全部加以动员以外，理论上乌克兰拥有适合服役人员约700万。然而，实际上，即使在战争期间，大部分青壮男性仍然要留在后方从事生产或维持秩序。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苏联来说，战前苏联人口不

36. 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50126

到两亿，战争结束时苏军总兵力的最高峰约为1100万，大约相当于战前人口的5%。战前乌克兰法理领土内的总人口约4000万，但是其中克里米亚、顿巴斯地区的人口约1000万。如果乌克兰最终可以动员实际控制总人口的5%，那么乌军最终可以动员大约150万。

然而，这150万人并非一下子可以全部投入战场，而是受到装备和后勤物资能力的严重限制。如本文开始部分所说的，在战争的前一个半月中，俄军已经摧毁了乌军装甲力量的五分之四、多管火箭炮系统的五分之二、火炮和迫击炮的五分之三。此外，俄军摧毁了乌军大量的燃料和弹药库。虽然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大批反坦克武器和轻便式防空导弹，但是没有弹药、火炮和装甲突击力量，乌军就无法进行野战，也无法在城市外长期防御，而孤立在城市中就会被俄军包围，最终像在马里乌波尔那样被消灭掉。

即使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愿意向乌克兰提供重武器和弹药，也很难解决乌军的燃眉之急。首先，新到的武器和弹药集结地会受到俄军导弹或空袭的打击；第二，由于乌军燃料严重不足，新到的武器和弹药很难运到东部前线；第三，北约所使用的弹药与乌军所使用的苏式武器弹药不配套，即使运到了前线，乌军也无法在现有武器上使用这些弹药。

在战争的第一个月，俄军已经消灭了乌军3万人；按照这个速度，如果战争一直打下去，俄军一年可以消灭乌军36万人。虽然乌军最终可以动员大约150万人，但是其中真正有一定战斗力的大概就是战前的现役和预备役官兵大约45万人。这样，当战争打到一年零三个月时，俄军就可以消灭乌军较有战斗力的45万人。即使到那时乌军还可以再陆续补充100万人，但是后面的兵员训练不足，装备和弹药也将极度匮乏，实际有效战斗力必然大幅度下滑。

从乌军可以使用的野战部队来看，在乌军可以调动的24个旅中，有3个旅已经在马里乌波尔战役中几乎被全歼。如果俄军可以每个月消灭乌军大约两个旅，那么，大约一年时间，就可以消灭乌军全部的野战部队。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精锐部队被消灭后，即使按原番号重建，其战斗力也必然大不如前。同样的，乌克兰的成建制野战部队被消灭后，即使重建，由于原来的指挥系统、装备、有经验的老兵都已经不复存在，新建部队的战斗力也必然大不如前。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粗估，只要俄军坚持战争一年以上，就基本可以消灭乌军较有战斗力的有生力量，从而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如果俄军第二阶段在顿巴斯的攻势进展顺利，有可能一次歼灭在那里的乌军10个旅。如果是那样的话，战争进程还可以加快。

那么，俄军是否有能力坚持战争一年以上呢？按照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消息，在战争的前一个月，俄军损失了大约5000人（其中伤3000多、亡1000多）。如果按照这个比例，那么，一年下来，俄军损失总数将达到6万人。

目前，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总兵力大约20万人，如果再加上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人民武装，总数大约25万人。

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兵力大约100万人，另有国家近卫军、边防军、铁道军等100万人和预备役200万人。俄罗斯每年征兵约26万人。所以，即使不进行全面的战争动员，仅靠每年正常的征兵，再加上推迟退伍、鼓励一些义务兵转为合同兵等办法，俄罗斯也有充足的潜力弥补在乌克兰战场的兵员损失，并将战场上的兵力经常保持在20万人左右。

那么，俄军是否有足够的装备将战争进行下去呢？据乌克兰方面声称，至4月初，乌克兰方面已经摧毁了俄军约700辆坦克、1900辆装甲车，并击落了150架作战飞机。战前，俄军约有12000辆坦克、36000辆装甲车和4000架作战飞机。即使按照乌克兰方面所宣传的、严重夸大的俄军在战争前40天装备损失的情况，即使不考虑俄罗斯的军工生产，俄罗斯现有的坦克、装甲车、作战飞机分别足够将战争进行两年到三年。这里设想的当然是一种极端情况。实际上，乌克兰方面所吹嘘的战果很可能大大夸大。在经历了初期的战场损失以后，俄罗斯会努力总结经验，而乌军的有效作战能力也将不断下降。这样，未来俄军装备的实际损失速度很可能比战争初期大幅度下降。

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强大，是世界上的第二大武器生产国，平均每年仅出口坦克就达500辆。如果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充分动员起来，应该可以弥补因战争引起的一大部分装备损失。西方的制裁可能会影响到俄罗斯某些高端军用芯片的供应，从而影响到俄罗斯某些先进导弹的制造能力。然而，俄罗斯有长期的军事工业科研传统和开发经验，应该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开发出符合实际战争需要的替代产品。

## 谁将是长期化战争的胜者？：政治和经济潜力

在战争初期，俄罗斯国内的寡头资产阶级曾经一度对普京政权离心离德。在西方帝国主义和寡头资产阶级的共同怂恿下，俄罗斯的自由派小资产阶级发动所谓“反战”示威，以博取西方媒体的眼球。然而，出乎国际帝国主义意料的是，恰恰是因为西方对俄罗斯的疯狂和无耻的“制裁”，使得广大的俄罗斯人民猛然觉醒，认识到美、欧帝国主义置俄罗斯民族于死地的险恶用心。

随着战争的进行，俄罗斯人民对普京政权的支持度不降反升，达到了80%以上。连大多数俄罗斯小资产阶级也改变了态度，站到了爱国主义立场上来。这就使得普京政权具备了进行长期战争的国内政治基础。

国际上，虽然一批小国挡不住美、欧帝国主义胁迫的淫威，不得不跟随美、欧参加对俄罗斯的"制裁"或者在联合国大会上充当帝国主义操纵下的投票机器。但是，绝大多数亚、非、拉人民是同情俄罗斯国家和人民的。在亚、非、拉地区绝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下，同时也是出于一些国家资产阶级的实际利益，中国、印度、南非、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亚非拉大国以及大多数中东国家都与俄罗斯保持了正常的贸易往来。这就使得俄罗斯有底气与美、欧帝国主义展开长期的经济斗争。

按照美、欧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在蛮横地把俄罗斯从按美元和欧元计价的国际金融支付体系中驱赶出去又非法冻结了俄罗斯的外汇储备以后，俄罗斯经济将会全面崩溃。然而，与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在俄罗斯经济当局采取了一系列必要措施以后，卢布不仅恢复了稳定，而且相对于美元的币值升到了战前水平以上。据惠誉国际估算，由于俄罗斯减少了各种不必要的奢侈消费，俄罗斯今年的贸易顺差将不降反升，可能达到2000多亿美元。

这就是说，只要再过一年多的时间，俄罗斯新获得的贸易顺差就足以弥补因西方帝国主义背信弃义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所造成的损失（俄罗斯被冻结的外汇储备约3000亿美元）。这说明，俄罗斯将有充足的财政资源将战争长期进行下去。

本来，在战争之前，美、欧帝国主义已经开始陷入通货膨胀危机。在新冠疫情危机期间，为了应付尖锐的国内外矛盾，美、欧经济当局冒险采取大幅度增加财政赤字和货币供应量的办法，暂时稳定了经济。然而，随着世界经济复苏，再加上能源供应短缺以及因新冠疫情引起的供应链混乱，美、欧经济出现了通货膨胀失控的苗头。在俄乌战争开始以前，北美和西欧工人阶级的实际生活水平已经在普遍下降。

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帝国主义疯狂制裁，结果反而导致世界市场上能源、粮食和有色金属价格暴涨。随着战争的继续发展，通货膨胀危机还将进一步恶化，承受不了高昂能源成本的欧洲经济有可能率先崩溃。

不仅如此，在俄罗斯要求用卢布支付天然气以及卢布实际上与黄金挂钩以后，卢布已经脱离了美元和欧元的支付体系。以卢布为榜样，越来越多的国家将选择用人民币、卢布或者本国货币来结算国际贸易。这将对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造成越来越强烈的冲击。一旦世界通货膨胀的浪潮传导到中国，中国可能会被迫放弃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准固定汇率，允许人民币自由升值（以抑制国内通

货膨胀）。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美元就将失去最后一根主要支柱，从而无可挽回地崩溃。

随着美、欧经济危机的加深，美、欧社会内部以工人阶级和中小资本家为一方，而以金融、高科技大资产阶级和全球化小资产阶级为另一方的政治斗争也将白热化。越来越多的美、欧工人阶级认识到，他们正在为金融和高科技大资本家的战争冒险以及虚伪的“进步”小资产阶级的道德绑架付出最沉重的代价。未来几年，在美国和若干欧洲国家，代表中小资本家利益并得到工人阶级支持的反全球化“右派”政党可能在选举中获得胜利。

到那时，国际帝国主义的反俄战线就会出现巨大的裂缝，然后土崩瓦解。随着美、欧帝国主义压迫亚非拉人民的邪恶之塔坍塌，乌克兰法西斯分子将不过是其中一件最不起眼的陪葬品。

# 乌克兰纳粹分子的手上沾满了乌克兰人民的鲜血！——评激流网的某些错误观点

红色中国网工作组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已经进行了两个多月。关于这场战争的原因、发展过程及对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影响，红色中国网已经做过初步分析，将来还会根据战争的实际发展进程提供进一步的分析。

在战争之初，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宣布俄罗斯的战争目标时，曾经指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目标之一是要实现在乌克兰的“去纳粹化”。那么，在战争爆发之前，乌克兰是否存在严重的“纳粹化”或法西斯化呢?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马列毛左派内部，对于这场战争的性质、前途、短期和长期的影响有着不同的看法；在各种分析中，一个重要的分歧，就是在战前的乌克兰是否已经发生了严重的纳粹化。比如，3月7日，激流网发表题为“乌克兰已经纳粹化了吗? —— 再论俄乌战争的性质”一文。这篇文章的作者（知凡）认为，“乌克兰现在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纳粹只是其国内少数人的行为，这些纳粹分子并没有掌握政权，他们的主张也没有上升为国家政策。乌克兰并不是纳粹化了的国家。”

在3月7日的文章中，知凡在文章开头就引用了一幅人山人海、声势浩大的照片：



激流网原文中照片下面的说明是：“2019年10月14日，乌克兰首都基辅爆发极右翼分子组织的大规模游行。新纳粹分子聚集在乌克兰最高拉达大厦前，向保卫大厦的内务部卫队和警察进行暴力攻击。”

尽管这幅照片足以显示乌克兰的新纳粹分子有多么猖狂，知凡还是认为：“乌克兰明显不符合法西斯主义的特征，更不是纳粹主义了。”说到公认的乌克兰新纳粹组织亚速营时，知凡说：“新纳粹组织亚速营在乌克兰到底是个什么地位呢？不管从民意基础还是议会影响力来说，亚速营为代表的新纳粹在乌克兰都仍然是一个相当非主流的派系。……他们有一个政党，叫国民部队党，他们也知道自己在民众中的支持率很低，于是联合了另外三个意识形态类似的党派一起参加2019年的最高拉达（议会）选举，四党联手才拿下全国2.15%的选票，由其中的全乌克兰联盟‘自由’（Svoboda）拿下1个议席而已”。

4月17日，激流网又发表了阳和平同志的文章：“俄乌战争、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在这篇文章中，阳和平同志也对乌克兰是否法西斯化的问题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阳和平同志说：“法西斯分子，也不是一个随便可以扣的帽子。……法西斯是资产阶级维持自己统治的特殊方法。你把一些不掌权的一些极端分子称

为法西斯，那就是一种滥用，你就没法儿区分。你说乌克兰里边儿一些少数人的极端分子，和塔利班掌权以前的那些极端分子，有什么差别？”

可见，无论是激流网3月7日文章的作者（知凡）还是阳和平同志实际上都不否认，乌克兰确实存在着新纳粹分子或者说新法西斯分子。当然，在4月17日的文章中，阳和平同志没有直接使用纳粹分子或法西斯分子这样的词汇，而是说乌克兰有“一些不掌权的极端分子”。我们这里姑且假设，阳和平同志所说的“不掌权的极端分子”就是知凡所承认的“纳粹分子”。如果我们的理解有错误，烦请阳和平同志公开指正。

然而，知凡和阳和平同志又认为，尽管在乌克兰存在着“新纳粹组织”或“极端分子”，他们在乌克兰仅仅是一个“相当非主流的派系”，在议会中只有“1个议席”，他们的主张“没有上升为国家政策”，仅仅是一些“不掌权”的少数人—— 所以，“乌克兰并不是纳粹化了的国家”，说他们是法西斯属于“滥用”。

那么，知凡、阳和平等同志的上述看法是否符合乌克兰的实际情况呢？有意思的是，我们在网上搜索相关资料的时候，找到了德国之声电台今年3月10日的一篇文章：“乌克兰有多‘纳粹化’？”[37]

这篇文章说：“乌克兰新纳粹势力有多强？德国之声就此展开了事实核查，包括普京所提出的为了停止所谓的虐待和‘种族灭绝’... 是否有事实依据。德国之声得出的结论是：错。”“普京的这一表述是他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重复的宣传性话语，但是毫无依据。”“虽然乌克兰有极右团体，但与许多欧洲国家相比，他们相对较弱。...在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有一个由所有极右翼政党组成的统一战线，该一战线当时得到了2.15％的支持。……在2013至2014年乌克兰举行的独立广场抗议活动中，有个别极右翼团体参与。但如今他们已无足轻重”。

我们知道，德国之声是德国资产阶级向全世界进行反共宣传、鼓吹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喉舌。有意思的是，西方帝国主义分子的喉舌在乌克兰是否纳粹化这一问题上同意我们马列毛左派一些同志的看法：乌克兰的“极右翼团体”只得到很少的选票，所以在乌克兰政治中“无足轻重”，认为乌克兰有强大新纳粹势力的看法是“毫无依据”的。

那么，乌克兰国家纳粹化的情形到底是怎样的？是“无足轻重”还是严重泛滥，是没有“上升为国家政策”还是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与乌克兰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融合在一起？下面就谈谈我们红色中国网工作组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37. https://www.dw.com/zh/%E4%B9%8C%E5%85%8B%E5%85%B0%E6%9C%89%E5%A4%9A%E7%BA%B3%E7%B2%B9%E5%8C%96/a-61080464

## 现代乌克兰纳粹运动的起源

我们与激流网的同志都同意，现代乌克兰是存在着新纳粹分子或新法西斯分子的。就让我们从我们都同意的这一共同点出发。

现代乌克兰的纳粹运动，就其历史起源来说，可以追溯到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乌克兰白匪。十月革命胜利后，代表乌克兰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利益的“中央拉达”趁机宣布成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由于其反动的阶级本质，所谓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很快走上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道路，其领导人彼得留拉所纠结的白匪军是苏维埃政权最凶恶的敌人之一。著名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练成的》就是以保尔·柯察金所在的苏联红军部队与彼得留拉白匪战斗作为历史背景的。

乌克兰白匪在苏联内战中失败后，其中的一部分流亡到波兰，在那里组成了以在乌克兰复辟资本主义为目标的反革命组织“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堪称现代乌克兰法西斯运动创始人的斯捷潘·班杰拉成为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在波兰流亡期间，“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接受了德意法西斯主义的影响，按照法西斯主义原则改造了自己的组织，形成了一整套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并把共产主义视为“乌克兰民族”的主要敌人。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斯捷潘·班杰拉等人就已经决定，要与德意法西斯合作、反对苏联，以此来“建立独立的乌克兰国家”，“实现欧洲新秩序”[38]。

德国法西斯开始侵略苏联以后，斯捷潘·班杰拉一伙马上组织乌克兰伪军，帮助德国法西斯袭击和骚扰苏联红军。一部分班杰拉分子还直接加入了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序列，编为党卫军第14掷弹兵师。苏联红军撤退之后，班杰拉分子在所到之处疯狂屠杀和掠夺当地人民。仅在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班杰拉分子在一天之内就杀害了1500多人。在1943年的沃伦大屠杀中，班杰拉分子杀害了10万波兰人。在整个二战期间，共有160万生活在乌克兰境内的犹太人以及超过300万的普通乌克兰百姓被包括班杰拉分子在内的纳粹所屠杀。班杰拉分子肆无忌惮的暴行甚至连纳粹德国当局都看不下去，以至于德国军事当局不得不在1943年7月11日专门发布了一份命令，要求乌克兰伪军注意“形象”，不得明目张胆地滥捕滥杀。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后，班杰拉逃到西德躲了起来，直到1959年才被苏联特工人员击毙，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38. 关于乌克兰法西斯运动的早期发展，参见：沈莉华，“历史真相中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年第3期，79~93页。

在苏联社会主义时期，乌克兰的纳粹势力被清除，在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和其他各族人民之间实现了民族团结。然而，得到西方帝国主义庇护的乌克兰纳粹分子并不甘心失败。班杰拉逃到德国后，在英国军情六处的资助下，与斯特茨科等人组织“反布尔什维克国家集团”，妄图纠集流亡欧洲的所有反共反苏势力，推翻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政权。

班杰拉被击毙后，斯特茨科成为“反布尔什维克国家集团”的头目，与美、英情报机构加紧勾结。1983年，为了利用乌克兰纳粹分子颠覆苏联，里根当局将斯特茨科请到了白宫。美帝国主义头子里根吹捧斯特科茨是“怀着对自由的热爱燃烧自己的生命，照亮了被暴政笼罩的黑暗年代”。

资本主义复辟后，在所谓的“独立”的乌克兰中，纳粹势力迅速死灰复燃。斯特茨科的遗孀回到乌克兰后，组织了“乌克兰民族主义大会”。在尤先科担任乌克兰总统的时期，“乌克兰民族主义大会”成员罗曼·兹瓦里奇混上了司法部长的位子。

## 乌克兰纳粹的暴行

资本主义复辟后，新生的乌克兰资产阶级疯狂掠夺社会主义苏联遗留下来的经济财富，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几十个控制乌克兰经济的寡头。

由于经济萧条、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很大一部分乌克兰人口常年处于失业半失业的状态，其中相当一部分沦为流氓无产者。乌克兰的寡头资产阶级为了进一步打击工人阶级，清除社会主义在人民群众当中的影响，便在暗中出钱资助纳粹组织，吸引流氓无产者参加。在这样的形势下，形形色色的纳粹组织迅速在乌克兰蔓延开来。比如，众所周知的新纳粹团体“亚速营”就得到了乌克兰第三大寡头、能源亿万富翁科洛莫伊斯基的资助。

在2014年推翻乌克兰合法政府的“广场政变”中，右区、斯沃博达等新纳粹组织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与美、欧帝国主义直接合作。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一方面极力抵赖新纳粹组织是“广场政变”的中坚力量，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确实，乌克兰存在极右保守组织，这些组织在目前正在进行的革命[编注，指美欧帝国主义策划的政变]中发挥了中心的作用”。

美国《沙龙》杂志指出，以德米特罗·亚罗什为首的“右区”、斯沃博达等新纳粹组织在2014年2月是所谓“广场革命”的实际领导者。在一次广为传播的被泄露的电话通话中，当时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美国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主要策划人之一维多利亚·纽兰就表示，要与斯沃博达领导人奥列赫·提罕尼

勃克合作，并提议美帝国主义在表面上中意的前台人物亚采纽克应当与提罕尼勃克“每个星期交谈四次”。

2014年政变后，哈尔科夫、卢甘斯克、顿涅茨克等地方的人民不愿意接受美欧帝国主义傀儡的统治，发动起义。当时，乌克兰军队的普通官兵不愿意与这些地方的人民作战，新上台的乌克兰傀儡政权便与寡头大资本家相勾结，鼓励新纳粹组织招兵买马，招募大批流氓无产者建立私人武装，“亚速营”等纳粹武装应运而生。

这些纳粹武装成立后，马上开赴各地镇压人民群众。2014年5月2日，在敖德萨，“右区”法西斯分子将四十几名工会积极分子包围在敖德萨工会大楼，然后将整座大楼点燃，将里面的人活活烧死。大楼被点燃后，里面的一些人试图跳楼逃生，毫无人性的法西斯分子又把这些试图逃生的人折磨致死。至今，这些在敖德萨五月二日惨案中犯下反人类罪的法西斯分子，没有任何一个人得到乌克兰当局的惩罚[39]。

在乌克兰正规军不中用的情况下，“亚速营”等纳粹武装在顿巴斯战争中成为乌克兰当局所依靠的中坚力量。在为时八年的顿巴斯战争中，纳粹武装以及乌克兰军队中的纳粹分子杀害了数以千计的顿巴斯人民。2014年9月，在顿涅茨克发现了三个乱葬岗，里面有大量老幼妇孺的尸骨。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调查报告，2014年至2016年，“亚速营”在顿巴斯地区掠夺当地房屋和平民财产，存在对平民实施非法拘禁、电刑、水刑、性侵等暴行[40]。

今年三月初，一位法国女记者发布大量视频，指控乌克兰政府屠杀自己的人民、泽连斯基政府是反人类的纳粹[41]。

可以说，自2014年政变以来，乌克兰纳粹分子在乌克兰犯下了滔天罪行，对乌克兰人民欠下了无数笔的血债，手上沾满了乌克兰人民的鲜血！

俄罗斯开始在乌克兰进行“特别军事行动”以后，乌克兰纳粹武装以及已经纳粹化的乌克兰军队又犯下了大量战争罪行，特别是大量劫持平民，以平民为“肉盾”，阻止平民离开战区乃至杀害试图逃离战区的群众[42]。

---

39. People's World, “Ignor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extreme right in Ukraine is dangerous”,https://www.peoplesworld.org/article/ignoring-the-influence-of-the-extreme-right-in-ukraine-is-dangerous/

40. 王忠新，“乌克兰新纳粹化呈现五大恐怖特征”，http://taihangsummit.com/2133430d34/

41. 闻韬，“乌克兰纳粹是如何屠杀乌东人民的？”https://www.kunlunce.com/ssjj/guojipinglun/2022-03-03/159304.html；这里是该法国记者于2016年拍摄的反映乌克兰纳粹分子在顿巴斯地区暴行的纪录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8j0tJsKltg&t=873s

42.这里有采访从马里乌波尔撤离的平民的视频，反映乌克兰纳粹分子阻挠平民离开战场，并向试图逃离的平民射击，俄语对白、有英文文字翻译：https://mobile.twitter.com/gbazov/status/1504507722951446530

## 深度纳粹化的乌克兰国家

知凡同志、阳和平同志，激流网的编辑同志们，对于上述的骇人听闻的法西斯罪行，你们是了解还是不了解呢？如果了解，你们愤慨不愤慨呢？还是说，虽然了解，虽然愤慨，你们仍然认为，血淋淋的纳粹罪行在乌克兰仅仅是“少数人的行为”，“没有上升为国家政策”，所以乌克兰国家仍然没有“纳粹化”。

如果说，纳粹分子在顿巴斯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情况复杂，证据有待搜集，那么，像2014年5月2日的敖德萨惨案以及后来乌克兰纳粹分子在全国各地袭击、侮辱、杀害吉普赛人等少数民族以及性少数群体的罪行都有大量的视频和照片等证据，为什么至今这些纳粹分子仍然逍遥法外、没有得到乌克兰当局的惩罚呢？

知凡同志认定，乌克兰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阳和平同志强调，乌克兰不是“法西斯国家”。知凡同志告诉我们，新纳粹组织在乌克兰议会选举中只得了很少的票；阳和平同志说，纳粹分子在乌克兰“不掌权”。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是，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外一些阶级的工具，其具体表现形式是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所以，看一个国家的性质，看这个国家被什么人掌握，首先不是看谁当议员、谁当总统，而是要看国家机器掌握在谁的手里。

2014年以后，有一个时期，新纳粹分子直接参加了乌克兰政府。新纳粹组织斯沃博达的成员在政变后第一届政府中担任副总理并另外获得了三个州的州长职位。新纳粹分子安德烈伊·帕鲁比在2016年至2019年担任乌克兰议会的议长。

到了2019年，由于乌克兰傀儡政权的倒行逆施，乌克兰经济凋敝、人民生活困难、社会矛盾尖锐，寡头资产阶级为了继续欺骗人民，捧出了泽连斯基这个小丑。但这并不代表乌克兰国家的性质有了任何重要变化。泽连斯基的竞选经费主要来自寡头科洛莫伊斯基。这个科洛莫伊斯基，也是纳粹组织亚速营的大金主。这充分说明了泽连斯基当局与纳粹分子之间藕断丝连的肮脏关系。

更主要的是，自2014年政变后，亚速营分子就掌握了乌克兰的警察部门。2015年至2016年，亚速营分子瓦迪姆·特洛安担任了全国警察在基辅地区专署的负责人；此前他的职务是亚速营参谋长。2017年至2019年，他担任乌克兰内务部副部长。2019年至2021年11月，他担任乌克兰全国警察第一副总监。

美国《国家》杂志报道说，亚速营分子实际上控制了乌克兰的警察部门。乌克兰警察当局的领导们崇拜法西斯分子斯捷潘·班杰拉，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纳粹分子可以在乌克兰各个城市的大街上无法无天。美国给这个纳粹分子控制的警察部门提供了大量装备，并帮助他们训练。

2018年，一个叫“C14”的新纳粹组织与基辅市政府达成协议，建立一支所谓"市政卫队 "在基辅市街上巡逻；至少有21支“市政卫队”在乌克兰其它城市巡逻。这些获得了巡逻权力的法西斯民兵任意攻击媒体、市议会、外国人、吉普赛人等少数族裔以及性少数群体。路透社评论说：“乌克兰国家正在迅速失去对暴力的垄断”。

2014年政变后，亚速营和其他纳粹武装被编入了乌克兰的准军事部队国民卫队。这就使得乌克兰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将新纳粹武装编入国家武装力量的国家。表面上，亚速营的人数不是很多，但是其在乌克兰军队中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其表面的人数。在2019年的一次采访中，亚速营参谋长吹嘘说，他们在政府和议会中的朋友照顾他们，这就使得亚速营比国民卫队中的其他部队装备更加精良、后勤补给更加充分。

泽连斯基当局在2019年上台后，一度试图与俄罗斯就顿巴斯问题达成和平协议。他很快收到了亚速营将其赶下台甚至杀害的威胁。从此泽连斯基再也不敢与俄罗斯谈判顿巴斯问题了。这起事件说明，亚速营等新纳粹组织实际上控制着乌克兰当局的对外政策。

亚速营等纳粹武装编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后，乌克兰成为世界各国新纳粹分子、新法西斯分子、白人至上主义者向往的天堂。2014年以后，来自世界各国的新纳粹分子纷纷到乌克兰纳粹组织中受训，其中相当一部分后来成为乌克兰纳粹武装中的外国雇佣兵。

据原瑞士战略情报局官员、曾任瑞士总参谋部上校的雅克·包德分析，本来，到了2018年，经过顿巴斯战争的消耗，再加上内部的腐败，乌克兰军队已经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乌军在顿巴斯战争中当时已经损失了大约3000人。在2017年10月和11月的征兵中，70％的被征人员拒绝报到；在某些新兵训练营地，自杀率和逃亡率达到30％。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当局将大批纳粹化的准军事武装结合进了乌克兰军队。按照这位瑞士情报官员的估计，这些狂热而残暴的准军事武装大约有10万人，占2020年乌军常备武装力量的40％；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外国雇佣兵，这些外国雇佣兵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等19个国家。

以上证据表明，在2014年政变后，纳粹组织和纳粹武装已经深度结合进了乌克兰的国家机器，新纳粹分子实际上控制了乌克兰的警察当局和军队的很大一部分，对乌克兰政府的对外政策可以实行否决权，可以任意地威胁总统和政府高官。乌克兰国家不仅不是什么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寡头统治的国家，而是已经深度纳粹化的资产阶级寡头国家。

作为纳粹化的资产阶级寡头国家，宣传纳粹意识形态成为乌克兰当局的一项明确的国家政策。早在2010年，乌克兰当局就授予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苏联人民的死敌斯捷潘·班杰拉所谓“乌克兰英雄”的称号。

2018年，乌克兰议会通过法案，把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乌克兰伪军视为退伍军人，享受国家津贴。

2019年7月，在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一群乌克兰纳粹分子穿着纳粹德军制服，打着二战期间乌克兰伪政权的旗帜，为29名被苏联红军消灭的党卫军士兵的遗体，举行重新安葬仪式。仪式中，乌克兰政府军士兵抬着覆盖乌克兰国旗的棺材，先奏国歌，再奏安魂曲，士兵朝天空鸣枪致敬。出席葬礼的有乌克兰武装部队现役军人、官员和神职人员代表。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乌克兰当局疯狂诋毁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篡改和伪造苏联时期的乌克兰历史，玷污苏联红军，到处毁坏列宁、斯大林以及苏联红军将领的雕像或纪念碑（王忠新，“乌克兰新纳粹化呈现五大恐怖特征”，2022年3月11日）。

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后，泽连斯基当局更加依靠纳粹组织的支持，于3月初任命纳粹组织“艾达尔”营的指挥官为敖德萨州州长，同时取缔反对党、关闭独立报纸和电视台，军警在大街上不经调查和审讯就可以随意拘捕甚至杀害人民，建立起了公开的法西斯独裁统治。

综上所述，现代乌克兰的纳粹运动在精神上和历史上都是乌克兰白匪以及纳粹合作者的继承人。所以，与其它国家的新纳粹运动相比较，乌克兰的新纳粹运动更加疯狂地仇恨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和俄罗斯人民。

就其社会基础来说，乌克兰的新纳粹运动是资本主义复辟时期的怪胎，是乌克兰寡头资产阶级所豢养的专门用来吞噬工人阶级的狂犬，其组成人员主要是在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所产生的大批流氓无产者和社会渣滓，他们在过去八年中杀害了成千上万的乌克兰人民，欠下了累累血债!

在俄乌战争开始以前，乌克兰的新纳粹组织就已经泛滥，并且掌握了一部分乌克兰的国家机器，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乌克兰国家的内外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纵容法西斯暴行，并且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大力鼓吹法西斯意识形态。正如美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世界”网站所说：乌克兰极端右翼的问题是“巨大的”，“如果世界无视这个问题，就是置世界于危险之中”。

令人遗憾的是，马列毛左派中的一部分同志，宁愿轻信美、欧帝国主义的欺骗宣传，无视、淡化乌克兰的新纳粹势力，说他们是“相当非主流”的少数人，“没有上升为国家政策”，极力否认乌克兰国家纳粹化的事实，对纳粹分子的滔天罪行

轻描淡写。这部分同志这样做，正在无意识间，把自己变成了西方帝国主义的传声筒，站到了中国广大劳动群众和世界进步力量的对立面。

# 俄乌战争三个月的军事总结

草 庐 棋 士

“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俄乌战争是美帝霸权从衰落向崩溃的临界点。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右派和进步左派各自内部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的分裂实际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的选择：是服从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为之殉葬？还是走出一条解放自己与解放全世界的新道路？”

从2月24日开始的俄乌战争到现在已经进行了三个多月。最初在政治、战略、战役、战术和技术细节上的“战争迷雾”都已经随着时间基本消散干净。虽然现在谈论结束战争的具体方式为时尚早，但是三个月的历史已经能让我们从军事上总结一些相当宝贵的经验。

本文的重点不是向诸位读者报告具体的战斗进展状况，而是希望能总结出一些一般的，通用的历史经验，帮助大家对俄乌战争和相关问题进行独立的、冷静的思考，从而得出正确结论。本文有如下几个目标：第一，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出发，分析乌俄双方军事思想的演变，重点是乌克兰武装力量放弃机动作战转向堡垒防御的变化，和俄罗斯军事思想从盲从迷茫走向涅槃重生的历史轨迹；第二，本文将带领读者破除西方媒体的宣传，探讨俄罗斯在本次战争中的三个重大战役决策，即“基辅大佯攻”、“北乌大折返”和“东线大围歼”。第三，本文将梳理在此次战争中彻底破灭的二十一世纪“军事神话”，包括“坦克无用”、“未来步兵”以及先是被捧上天再是被摔下地的“混合战争”。最后，本文将对本次俄乌战争未来的可能进程做出预测，并简述俄乌战争对于中国阶级斗争的政治意义。

## 乌克兰军事思想和军事战略的堕落

乌克兰武装力量原本是苏联武装力量的一部分。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武装力量逐渐退化削弱。这一方面是因为乌克兰的经济基础无法支撑起庞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无法承担养护核武库的成本。另一方面，苏联刚解体时的乌克兰左右逢源，是俄罗斯和西方共同拉拢的对象，并不面对严重的军事威胁。乌克兰军事工业中生产战略武器的高端部分虽不复存在，但是生产基本常规重武器（如坦克、装甲车、战术导弹、火炮）的能力仍然通过对外军售市场被保留了下来。乌克兰军事工业的完整程度要超过印度。

在2014年乌克兰政变以前，乌克兰的军事思想和战役法并没有重大变化，基本上还是继承了苏联时代大纵深机动作战的传统。这首先是因为乌克兰并没有明确的国防压力，其主要假想敌俄罗斯和波兰的入侵企图极低，乌克兰也缺乏对外扩张的能力和动力。另一方面，长期武备废弛的状况也不利于军官团的培养，更不要说提出和践行新的军事思想。在政变之后与顿巴斯两共和国民族自卫武装的冲突中，乌军仍然试图用大纵深穿插的方式分割民族自卫武装。比如，在2014年到2015年的杰巴利采沃战役中，乌军装甲部队突入杰巴利采沃这个连接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交通枢纽，试图进一步向东南方向突击，彻底分割两共和国之间的陆上联系。这一战役行动直接继承自苏联时代大纵深战役的传统。即在火力侦察部队打开突破口之后，后续装甲部队迅速达成突破，摧毁敌军后方补给和系统，同时卷击敌军侧背，最后将包围圈中已经失去补给乃至失去组织和指挥的敌人彻底歼灭。

起初乌军的进展相当顺利，在两共和国之间打进了一个长20公里、宽10公里的突出部。然而由于突入的乌军久疏战阵、指挥混乱、不得人心，战役的后续协调十分业余低效，乌统帅部甚至没有准备达成突破之后的预备队。再加上乌军大量官兵逃亡和反正，突入的乌军装甲部队被两共和国武装包围歼灭。而就在杰巴利采沃战役发生的同时，一小股乌军占领的顿涅茨克机场却在民族自卫武装十分生疏的围攻下坚持了较长的时间。总结这两场战役的教训，乌军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群众普遍敌视自己的地区打机动作战的技术和组织门槛太高。相反，凭借坚固的工事却可以给敌人造成有效杀伤。此后乌军在长达七年（2015-2022）的侵略准备时期就彻底放弃了在运动中歼敌的战役法。并开始转向采用以固守堡垒来大量杀伤敌军从而以拖待变的作战方法。而这次战役法的大转变，与乌军本身的人员阶级组成有着极大的关系。

按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一支军队的战术战法基本由军队中官兵的阶级构成决定。随着乌克兰法西斯化的加深，针对俄裔民众和俄语区民众的迫害也逐渐加深。乌军中原本大量来自工业化的俄语区的军官和士兵在长期的对峙中纷纷携装备向两共和国投诚或起义，乌军在损失了许多装备的情况下也损失了有能力指挥旅以上战术单位的军官。剩下的军官虽然在政治上趋于可靠即趋于法西斯化，但是其业务能力是明显退化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乌军军官团已经不具备组织数个旅进行统一战术行动的能力，多数旅长级别的军官实际上仅仅具有指挥一个单一兵种营的能力。同时随着乌克兰小资产阶级大量移民到欧洲，乌军的基层军官素质也出现明显的下降。与当年纳粹德国政府解决失业问题从而在德国工人阶级中争取到了广泛支持不同，基辅政权一直没能和本国工人建立联系，其基层组织和民兵基本上依靠吸收吸收道德败坏的流氓无产者来维持。基辅政权与普通民众之间并不存在纳粹德国中曾经存在过的短期和局部的共同利益，基辅政权对领土的控制有赖于法西斯组织和法西斯化的特务机关对民众的恐怖统治和外部帝国主义的扶持。

但是乌克兰的流氓无产者以及狂热的亲西方法西斯小资的数量是有限的，水平是业余的，因此靠政变夺权的基辅政权就只能把他们集中在少数几个“拳头部队”里。在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的情况下，这些“拳头部队”的给养和装备就需要乌克兰的寡头来多多帮衬。比如，臭名昭著的“亚速营”就是乌克兰寡头克鲁莫伊斯基（此人也是泽连斯基的金主）大力资助的。这种奇特资源流向形成了乌克兰武装力量战斗力的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亚速营”一类的铁杆法西斯军队和乌军地面部队中法西斯化程度较高的部分，如受过北约集训的海军陆战队等。与我们事先判断的不同，亚速营不是什么“民团”，而是正经的“党卫军”，在装备、训练、补充和待遇上都拥有最高的优先级。但由于其半军阀的性质，乌克兰陆军是无法直接调动他们的，基辅政权对他们的命令也需要征得寡头同意之后才能得以执行。所以这些部队在保卫特定地区和寡头产业的时候会特别有战斗力。第二等级是乌克兰陆军中的常备军和第一批次动员起来的后备单位。这些单位由职业军人组成，其战斗意志与法西斯军官和士官占比呈正相关关系。它们通常有一定的机动能力，也是乌军统帅部能够直接指挥得动的部队。但在乌军放弃了机动作战之后，它们基本上都被拆分成了营级单位被当作救火队填补到前线最危险的地方。比如原本在赫尔松与俄军对峙的第17装甲旅，就被拆分成营，先是被送到哈尔科夫，再是被转移到伊久姆，现在正在利西昌斯克以西被分割包围。第三等级是番号在100以后的“乡土守备旅/团”。它们多由预备役人员组成，与乌克兰普通劳动人民关系最近。它们是临时征集的本土防御单位，在本州（面积相当于中国一个地级市）内进行固守防御时能够保持最基本的战斗意志，给俄联军造成一定阻

碍，但是一旦被调出本州，其战斗意志和战斗力就会随着离乡距离的增加等比例下降。乌军的这种三层结构大大限制了其战役选择。在一个地区的作战中，缺少第一等部队，就难以保证忠诚度，这在面对俄军主攻方向时是致命的；缺少第二等部队，就没有足够的专业人员操作重武器（第一等部队数量少，一个重要方向上通常不超过一个旅），从而大大折损防御战的效率；缺少第三等部队，就意味着没有足够的人力去填补战线。然而，只有第二等部队（正规陆军）可以在战斗意志不大打折扣的情况下服从调动。如何协调这三等部队的关系是一直困扰乌克兰军事部署的头疼问题。

因此，乌军的防御战准备面临两个约束条件：第一，军官团素质低劣，机动作战能力虚弱，而且乌军并没有自信在机动作战中独立歼灭敌人（指望北约派出地面部队也是原因之一）。第二，协调成分、组织结构和指挥系统均有所不同的三类部队也大大限制了乌克兰武装力量根据战局发展重新部署的能力（而且乌军直到今天也没有进行重大的重新部署）。为了抵消这两个约束条件，乌军选择了将东乌克兰主要城市堡垒化的消极防御战略。

这一战略有诸多好处。第一，城市作战将大大抵消俄联军在数量、技术、组织和士气上的优势，如果俄军被迫进行围攻作战，则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用火力将乌军驱逐或消灭，如果想要迅速夺取城市，则势必付出大量伤亡。第二，建在交通中心的乌军筑垒地域可以有效控制附近交通线。如果俄军进行大纵深作战，对城市围而不攻，则凑不齐足够的兵力同时完成突击和监视的任务。乌军则可以使用炮火和小股部队突袭来扰乱俄军的补给线。第三，城市作战条件下，一个作战单位需要控制的面积小，对防御方指挥官的要求低，可以很大程度上弥补法西斯化后的乌军军官团残暴有余、专业不足的弱点。第四，城市作战可以缩短前线补给堆栈和前线部队之间的距离，躲在医院、居民楼和幼儿园里的乌军不需要从数公里以外的补给站中获取弹药、食品、以及维持战斗意志所必需的酒精和毒品。这些都可以通过地下交通网络运达。第五，城市作战可以有效绑架东乌克兰地区的人民群众。事实证明，东乌人民极其反感乌军，而乌军也并不把东乌群众当人看。在马里乌波尔战役中，亚速营反复堵塞人道主义通道并屠杀逃离的群众，其罪恶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地将其控制在城内。第六，通过事先划定防区，乌军可以大幅缩短战略调动的距离并减少战略调动的规模，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第一等和第三等部队不宜远距离调动的弱点。

堡垒化的弱点也是很明显的。第一，这意味着乌军彻底将战役主动权交给对手，不过这对于幻想北约地面部队参战的基辅当局来讲似乎还不是大问题。第二，放弃在机动中歼灭对手同时也意味着任由掌握空天信优势的对手控制筑垒地域背后的交通线，这一方面阻断了乌军迅速补充消耗掉的人员和装备，另一方面

也阻断了被围乌军的撤退路线。第三，筑垒地域乌军的士气完全建立在堡垒“坚不可摧”的设想之上，一旦一个或数个“模范”堡垒群被攻陷，就会严重打击其他堡垒内乌军的信心。如果基辅政权不积极组织对被围堡垒的救援，则也会引发其余堡垒乌军“弃子自怜”的心态，甚至会引起对基辅政权的广泛质疑。

综上所述，基辅政权以全球化寡头为核心的阶级基础，以亲西方纳粹小资和流氓无产者为组织中坚，对乌克兰全境尤其是对东乌克兰实行法西斯统治，并与前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职业军人离心离德；基辅政权的这四个基本特点决定了，其对战争胜利的全部信心都建立在指望北约派遣地面部队大举救援的战略幻想之上。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自2014年以来乌克兰军事思想的堕落轨迹。

在整场战争中，乌克兰方面未有数个旅的战略调动，少见整旅规模良好协同指挥的机动防御，少见数个营以上面对有准备之敌的进攻。当被围在堡垒群天天面对俄军优势火力的乌军认识到自己不是在“死守”而是在“守死”时，乌军士气崩溃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 俄罗斯军事思想和国防战略的涅槃重生

与乌克兰一样，俄罗斯武装力量也是原苏联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在苏联解体后的近十年时间内，俄罗斯统治精英幻想以平等身份加入美国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在休克疗法和大规模私有化之后，俄罗斯与西方“接轨”的程度确实提高了，但是这种新自由主义“接轨”却是以俄罗斯几乎成为西方的经济殖民地、人民生活水平乃至预期寿命大幅度下降为代价的。用更精准的话讲，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容不下一个俄罗斯大小的国家成为剥削全世界剩余价值的核心国家，甚至容不下俄罗斯成为一个剩余价值净损失较小的上层半外围国家。俄罗斯要想加入现在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只能当一个不掌握国际市场定价权从而只能廉价出口能源和粮食的外围国家。国民经济外围化意味着要毁灭整个俄罗斯民族在苏联时代以巨大牺牲换来的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成为东欧的拉美国家。俄罗斯爱新自由主义，但是新自由主义却不爱俄罗斯。这一切问题反映在军事上，就是九十年代俄军军费紧缩、武备废弛、倒卖装备、贪腐横行的惨状。新自由主义时期的俄罗斯无力维持国家的基本统一，导致各种分离主义运动借社会崩溃之机遍地开花。俄罗斯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取得了车臣战争的胜利，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俄罗斯军事实力较苏联时期元气大伤的窘况。

这种状况直到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之后才有所改观。本世纪初的俄罗斯面临着继续在新自由主义歧途上沉沦还是走独立自主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选

择。以普京为首的一代有历史使命感和政治手腕的俄罗斯上层精英在思索了苏联解体以来的诸多教训之后，决定走后一条道路。

对于俄罗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而言，国家资本主义是当时条件下最好的历史选择。但是这条道路却是艰辛坎坷的。它不仅仅意味着要压制国内的亲西方寡头以及附庸于全球化的小资产阶级，顶住西方对俄罗斯进行颜色革命的压力，而且还要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探索前人未走过的道路。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总体处于守势。一方面，俄罗斯需要消耗相当一部分资源来扫清国内分离主义武装；另一方面，北约背弃对苏联的承诺，吸纳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加盟国，并把进攻性武器装备部署在俄罗斯边界。不过，由于北约集团仍然忌惮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其对俄罗斯的挑衅主要采取蚕食行为的方式，基本上是通过怂恿俄周边小国的傀儡政权或煽动颜色革命来运作的。为了维护俄罗斯的基本地缘政治环境，俄罗斯在过去二十多年中数次针对这些挑衅图谋进行直接的军事打击。比如1999年，俄罗斯协助南斯拉夫联盟人民抵抗北约侵略；2008年，打击格鲁吉亚傀儡政权，维护高加索民族自治；2014年，（有限度地）支援顿巴斯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并且收复克里米亚；2020-2022年，帮助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翦除颜色革命等。这些行动的规模小，时间短，成效大。这就给了一部分俄罗斯军界人物一个错误的信号，即北约东扩的威胁是现实的，但是北约东扩的目标并不是对俄罗斯实现“政权更迭”。所以，未来俄罗斯的国防主题不是与北约及其傀儡进行大规模常规战争，而是针对极小体量的对手进行介乎特种作战和治安作战之间的低烈度战争。在这种错误认识的指导下，俄军进行了2008～2012年的谢尔久科夫军事改革。

谢尔久科夫是当时的俄罗斯国防部长。此人商人出身，未历战阵，迷信市场，崇拜西方，前四个特点也导致了谢尔久科夫自己和其小圈子必然会贪污腐败。本次军事改革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内容。第一，效仿美军，将基本战役单位由师改编成旅，试图用更佳精炼的组织结构增强针对小规模低烈度冲突的快速反应能力。第二，裁撤大量军官，试图减少“冗员”，并效仿西方军队增加士官的比例，并让士官成为基层组织的核心。第三，执行“造不如买”的军备采购路线，直接购进“先进”的西方装备，试图在短时间内提高战斗力。第四，大搞技术市场化和保障社会化，裁撤大量国防部直属的军事院校，将军事科学研究交给民间机构，裁撤大量的后勤保障单位，并把这些人物分包给（有裙带关系的）私营企业，等等。

这些改革措施给俄军的战斗力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第一，“师改旅”看起来精简了指挥结构，但是原本师下属的支援单位被上交到了军/集团军一级，打仗的时候需要临时配属，这在与只有步枪火箭筒的非正规武装打低烈度治安战的

时候自然没有问题，但是在与相同体量的对手打常规战争的时候，这种临时配属的有效性就会在对手的空军、炮兵、导弹和电磁作战的干扰中急剧下降。同时，一线作战单位的缩减（从师的10～16个营到旅的4～6个营）也大大缩减了陆军装甲和机械化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在常规战争中，缺乏建制内预备力量的旅级单位在遭受损失后会迅速失去战斗力，必须用一个新的旅级单位轮换；原有旅级单位的非一线单位就相当于被“浪费”掉了。而师级大单位则会坚持更长的时间。第二，俄军原本的基层指挥工作主要是由军官负责的，士官的作用并不突出。这纯属俄军的组织传统，在战场上并不会有什么负面影响。谢尔久科夫的改革在裁撤掉大量军官后却没有建立与美军类似的士官培养体系，导致能干活的军官少了，不知道该怎么干活的士官多了，这既造成了军官团的不满，人人自危，也直接加重了基层军官的指挥负担，而且军官阵亡或负伤后就会有一批单位失去领导。第三，“造不如买”的军备采购路线丝毫没有起到鼓励俄罗斯国内军工企业相互竞争的效果，反而抽走了俄罗斯军工企业的研发资金。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好大喜功的谢尔久科夫集团向法国购买两艘“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结果定金交了，法国又在美国的指挥下以2014年乌克兰危机为由拒不交付军舰，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其实西方国家的“先进”武器在销售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大量的吃拿卡要、偷工减料、削弱功能乃至留有程序后门的现象，同时溢价极高，华而不实。相反，俄罗斯本土军工企业的国有化程度高，不追求高利润，往往能以极低的价格追平乃至超过西方国家装备的性能。比如，一辆美军现役主战坦克M1A2艾布拉姆斯的价格是俄罗斯高端现役主战坦克T90-AM的两倍，但两者综合性能不相上下。同时，俄罗斯本国军工产业自成体系，拥有长期的技术积累，西方装备与之混搭自然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更不用说在购买期间被别人“卡脖子”的事情。第四，俄军的“民间”研究机构和“民营”企业根本不具备相应的研究水准和保障能力，又极易被外国情报机关渗透。把军事研究和后期保障“市场化”、“私有化”，往轻了说就是把军队的战斗力导向转变为利润导向，更现实的说法是将军队的一些重要功能“分封”给利益集团和外国间谍。

谢尔久科夫集团的改革是俄罗斯军事史上的一次惨痛的教训。这次改革失败的原因，不仅仅是部分俄罗斯高层人物对俄罗斯国防任务的误判，而且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部分统治精英盲目否定苏联时代军事建设的宝贵经验，盲目崇拜美国军事建设方针的后遗症。自海湾战争以来，美国的军事实力一再被夸大。第一，“沙漠风暴”中对伊拉克的胜利被简单化为西方军队质量的胜利，完全忽略了萨达姆未能抓住联合国军准备时期的脆弱环节进行突击的错误决策，同时也完全忽略了联合国军拥有比伊拉克多得多的各式武器装备。第二，联合国军的胜利被简单等同于美军的胜利，完全忽略了北约仆从国和阿拉伯附庸势力填补绝大多数战线

的事实。第三，美军的胜利被简单等同于科技的领先，而美军相对于伊拉克“猴版”苏联装备的技术领先又被当作是美军武器装备对苏联现役装备的整体领先。第四，美军的技术领先又被完全不懂军事的美国寡头媒体（CNN、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和宣传机关（好莱坞和电子游戏制作商）渲染为美军人均战斗力的领先。而最能满足观众对“人均战斗力领先”直接观感的就是流行于本世纪初的“（美国）特种兵传奇”。美军“战无不胜”的假象在全球（不仅仅是谢尔久科夫集团）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即一群拿着轻武器的特种兵依靠特种作战技能和后方的“高科技”支援就可以轻松打败诸兵种合成的机械化兵团。所以，作战单位越轻越好，旅比师好；指挥结构越扁平化越好，士官主导优于军官主导；武器装备西方优于本土，买比造好；军事研究和后勤保障市场优于政府，外包最好。

通常来讲，一国统治精英越是服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统治秩序，就越是会相信这一套自导自演的宣传。这不仅包括亲近俄罗斯自由派的谢尔久科夫集团，也包括其他一些大国的军事领导。但是，这套美军神话是美国霸权地位和地缘政治环境的产物。美国自从1812年以后就没有任何保卫本国领土的历史经验，除了相对文明的内战以外，美国之后的所有战争都是在国土之外进行的，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侵略战争。因此就算在美国的军官团中，也从未有过将军事视为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要务的严肃传统。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军事实力独步天下，又有北约和非北约系统的仆从武装，而它面对的绝大多数对手甚至不能掌握一个民族国家。所以美军不再重视传统的大规模常规战争，转而专门经营针对弱小对手的特种战争和治安战争。既然是侵略战争，就一定不能再出现越战式的伤亡；既然是针对弱小对手，就不必专精于机械化装备、炮兵和防空装备；既然是远离本土作战，就不必在乎被侵略国家的平民伤亡；既然普通民众与战争无关，那么大可以把军事文化传播和爱国主义教育交给好莱坞，让他们用漫画化的、轻佻的、追求视觉快感的、类似于色情片的方式去描绘战争。

但是上述四个条件俄罗斯都不具备，俄罗斯面临的是直接的、大规模的、包围性质的军事威胁。俄罗斯是不能逃跑的，就算付出重大伤亡也要打赢战争，否则俄罗斯将面临相当于二战失败加上苏联再次解体的双重打击。俄罗斯的对手不是阿富汗的牧羊人，不是索马里的渔夫，不是伊拉克的农民，而是渴望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东欧和高加索的亲西方小资产阶级，是被北约武装到牙齿的流氓无产者，是拥有苏联遗留下来的大量高质量机械化装备的纳粹匪徒。俄罗斯必须要发展适合大规模常规战争的装备体系和组织结构，去有效杀伤这些与自己技术水平相差不大的敌人，并且在遭受伤亡时还能继续保持持久作战的能力。俄罗斯的直接军事威胁不在半个地球之外，它们就在基辅、哈尔科夫、敖德萨、里加、纳尔瓦等这些苏军指战员曾为之流血牺牲但今天又被各式纳粹分子占领的城市。而

就在这些地方，还生活着上千万沦为二等公民并饱受欺凌的俄罗斯人，这些地方也是其他民族热爱和平的人民的家园。俄罗斯不能向北约一样动不动就进行无差别轰炸和屠城式的进攻，必须打打谈谈，就算拖慢进度也要维持人道主义通道的畅通。俄罗斯与主要地缘政治威胁直接接壤，俄罗斯人民直接受到战争威胁；俄罗斯必须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可能的入侵。如果美国在侵略战争中失败，大可一走了之，丢掉了美帝国的包袱，美国还是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但是俄罗斯如果失败，不仅俄罗斯民族国家将被拆解，生活在俄罗斯周边国家的俄罗斯人也会面临种族清洗（正如最近八年在乌克兰发生的那样），今日俄罗斯统治精英中的绝大多数人也会不复存在。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每一个曾经历经苦难又凭借自己的力量战胜苦难的大民族在危急存亡之际总会有英雄人物出现。这个英雄人物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集体，还可以是一个民族仁人志士的总和。在认识到谢尔久科夫改革的失败后，尤其在美国资产阶级主流集团（奥巴马-克林顿集团）想要在俄罗斯搞政权更迭的行动愈发明显以后，以普京为首的俄罗斯高层决定改弦更张，根据现实的军事威胁来决定俄罗斯军事改革的方向。

2012年上任的国防部长绍伊古纠正了谢尔久科夫改革中的诸多错误。比如，停止“师改旅”的改革，并逐步在直面北约的单位中恢复师的编制，充实了编制内的支援单位，加强了持续作战能力。这次在南线突击和马里乌波尔围城中表现出色的第150摩步师就是俄军回归传统编制的重要成果。为了在保留大兵团作战能力的基础上维持一定的快速反应能力，在旅/团以下抽调部分兵力和有经验的军官，在师属支援火力和电子战单位的配合下组建高度合成化的“营战术集群”。营战术集群是一个师的精锐部队，它既可以在中低烈度环境下凭借较高的机动性和强大的支援火力独立承担突击敌军纵深的战术任务，如本次战争初期俄军在乌克兰南北的快速突击；也可以在高烈度环境下作为师的一部分与友邻配合承担战役任务，如在马里乌波尔攻城战中与车臣步兵密切配合，以极低伤亡压缩和围歼守军，又如在顿巴斯战役中引导己方优势炮兵火力压制敌军筑垒地域并夺占之。就算营战术集群遭受了相当的损失，全师也能保留继续进行有限进攻的能力。绍伊古也取消了谢尔久科夫时代的“市场化”改革政策，让军事研究和后勤保障重新归于军方控制。俄军的军备采购重新回到了国产化和自主化的轨道。同时军队中的腐败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在军事装备的发展上，俄军认识到自己不是美军，不能事事都效法美军。面对现实的短板，俄军采取了相当务实的策略。空天军经费不足，战备水平不佳，那就大量使用炮兵和战术导弹来进行支援；制空能力不佳，那就进一步加大防空系统的投入；海军舰艇不足，无法执行远洋打击任务，那就发展高突防能力的反

舰导弹；核武器不能随便动用，那就发展高超音速常规导弹作为使用核武器之前的威慑手段。俄军这些看似弥补短板的装备发展计划全部围绕着精确制导武器这一中心环节，技术之间高度通用，可以以较低的研发成本提升多个方面的技术装备水平。同样，俄军多个方面精确制导武器的发展也集中于一个目的，即强化区域拒止/反介入的能力。简单地说，就是用各种精确制导武器阻止北约的战斗力量进入战区，或者增加北约重大军事资产（如航空母舰、机场、仓库、指挥中心和行军中的地面部队等）在战区外被击毁的概率。这样，在一场如本次俄乌战争的有限战争中，俄军就能通过摧毁乌克兰的武器和油料仓库以及训练中心来有效封闭乌克兰战区，从而极大地削减北约军事援助的效能。在未来与北约之间的可能的大规模冲突中，俄军也可以在不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情况下，用精确制导武器和有力的防空系统为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己方地面部队提供一片敌方重武器难以进入的安全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如果俄军装备了足够数量的高超音速武器并有效提高射程，美军的航母战斗群就很有可能被俄空天军重型轰炸机在俄领空中空射的高超音速导弹突防摧毁。俄罗斯引领的高超音速导弹发展的趋势很有可能会在未来加速航母的淘汰，这也给任何想要通过发展航母战斗群来执行进攻任务但又损失不起航母的国家敲响了警钟。

当然，由于军费开支的限制，俄军的新军事改革不可能做到完美。合成营的编制太小，设计冗余度不足；义务兵服役期太短，无法掌握许多重要的军事技能；合同兵技战术水平高，但是数量少、成本高等缺点至今困扰着俄军。但是俄军建军思想的整体方向是正确的、冷静的，是符合俄罗斯地缘政治状况的。就算是长期沉迷于自己“战无不胜”神话的美军，也在俄军改革的刺激下重新审视自己只能打治安战的组织结构，开始着手重建师级战术单位。

## 俄军的三大主要战役决策

从来没有任何一场战争像本次俄乌战争一样受到西方主流媒体和主流文人的关注。同样，也从来未有任何一场战争像本次战争一样被上述两者恣意歪曲。西方主流媒体对俄军军事决策的评价极尽污蔑之能事，中国的右派和左派中自称“国际主义者”的挺乌派也对西方的蛊惑宣传深信不疑。在纷繁复杂，真真假假的信息中，他们一惊一乍，时醉时醒。看到一个补给车队被袭击了，就高呼普京完蛋了；听说几辆坦克被摧毁了，就说俄军要被围歼了；读到几个俄军士兵被俘虏了，就说俄军士气要崩溃了；传闻几个将军“阵亡”了（后来又“活”过来了），就说俄军指挥中枢已经分崩离析了。结果，三个月下来，在持续的被围、断粮、解体乃至兵变中，没有任何一支俄军连以上单位被成建制消灭。西方文人和他们的

中国左、右两道拥趸们挺乌仇俄，并对战争进程做出错误判断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们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联系远比与世界劳动人民的联系更加紧密。他们的经济利益依赖于全球统一的小资产阶级劳动力市场，如果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打碎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国际秩序，全球化小资产阶级的直接经济利益就会受到损害。但所有这些，仅仅能解释他们为何要扭曲事实，要分析他们如何扭曲事实、编造俄军本来不存在的战争目标并对俄军的战役决策作出荒唐滑稽的误判，就必须从这些人的认知缺陷说起。

西方主流媒体的大多数撰稿人拥有传媒、经济、法律或者国际关系专业的学位，对于军事问题一窍不通也不屑一顾。他们对战争的评论往往基于乌克兰国防部发布的假视频和拼接的图片。这些评论，无论其具体内容如何，往往反映了西方文人对西方以外世界的极度无知。在历史上，东欧（俄罗斯）、中东（奥斯曼）和东亚（中国）是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从未彻底殖民化的地区。在西方文人眼里，这些地方要么是凶蛮无道之地，要么是腐朽糜烂之邦。他们针对上述三个地区分别构建了“共产主义（东欧）”、“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东）”和“黄祸论（东亚）”三种“邪恶力量”的想象。苏联解体了，冷战结束了，西方文人们设想的“历史终结”并未如期到来。他们又只好杜撰了“文明冲突论”来进一步强化上述三种“邪恶力量”在西方民众中的刻板印象。在他们眼里，人类历史要么是人类走向西方化也就是走向（他们认为的）文明的历史，要么是文明（西方世界）与野蛮（非西方世界）的正邪二元对立。这种二元对立最终会反映在这些文人的军事认知上。他们认为俄国军人乃至俄国人民都是一群毫无感情的机器，上层贪腐，中层怯懦，下层麻木；俄军完全不在乎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伤亡；俄军的军事计划就是“能用人命往里填来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直到死的人太多本身成为问题”。中东地区的武装是一群毫无组织的极端暴民，他们只想着死后进天堂，所以毫无战术可言。东亚的黄皮狒狒就只懂渗透和偷袭，在正面战场上一触即溃。随着参加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老兵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西方世界就只剩下少数曾在冷战最前沿与苏军对峙过的军官还对世界军事格局尤其是俄罗斯军事传统有所了解，但这些人早就被边缘化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成年的西方文人对西方以外的军事冲突只有两种态度。第一种，当战争的进展经过数道剪裁和扭曲之后最终符合他们对“邪恶力量”的刻板印象时，他们就会得意洋洋地宣布是敌人的邪恶（专制/封闭/保守/落后）导致了他们的必然灭亡。第二种，当战争的进程即使被极度扭曲之后也无法符合他们的想象时，他们就会愤愤不平地指责敌人的邪恶超乎了他们的想象，因此就算现在不灭亡，也会在以后的某个时间以更惨烈更耻辱的方式灭亡。

由于西方全球化大资产阶级掌握媒体霸权，同时与依附于全球化的小资产阶级利益一致，所以就算他们在战场上被俄军的“反介入”能力“拒止”于战区之外，他们也能在各种媒体平台上宣传俄军已败、速败、至少是终将败的结论。我们对俄军战役决策的判断需要排除这些媒体的蓄意歪曲，从双方现实的力量对比和俄罗斯的真实目标出发，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俄军的第一个战役决策是在开战初期向基辅的进军。这一决策可以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俄军试图用空降突击的方式迅速瓦解基辅政权，试图实现乌克兰大部和平解放。第二，俄军地面部队在基辅东、西、北三个方向迅速摆出合围和进攻基辅的态势。第三，俄军在基辅周边停留了超过一个月。在西方文人和其中国拥趸们看来，俄军是先败于安东诺夫机场，再败于基辅近郊，最后在撤退途中败于“北乌克兰反击战”。不过我们仔细审视一下俄军的兵力部署情况，就能轻易拆穿这些谎言。

首先，俄军在本次特别军事行动中总共集结了约20万地面部队，加上两共和国约4万民兵和车臣方面约1万人的特种部队，总兵力约25万。而乌军战前常备兵力就有25万，经过动员和扩编之后的武装力量约有70万。俄军在不打算进行大规模动员的情况下要有效消灭乌军的有生力量，实现乌克兰去军事化，就必须将乌军的大部分力量用各种方法牵制在主要战场之外。而这些方法中最主要的方法就是佯攻。

佯攻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意图问题，俄军佯攻，乌军也不是傻子，也有可能会正确判断俄军的意图，从而采取对应行动削弱佯攻的牵制效果。第二个是能力问题，要在总体兵力一比三的劣势条件下将主要力量集中在主攻方向上形成局部优势，佯攻方向的劣势就会远超过一比三。因此佯攻要想起到最大的牵制效果，首先要在主观上做出主攻的姿态，即投入一定量的精锐部队，做出志在必得的部署。其次也要攻其所必救。俄军初期的进攻轴线主要有如下几条。第一条，从克里米亚半岛出发，向东北方向进攻梅利托波尔、别尔江斯克、马里乌波尔，打通克里米亚和俄罗斯之间的陆上交通线，与顿涅茨克人民武装会师，并从南面包围顿巴斯地区的乌军主力。这是战争初期唯一的主攻方向。第二条，从克里米亚半岛出发，在西北方向夺取赫尔松，威胁尼古拉耶夫、敖德萨和克里沃洛格。这是一条佯攻路线，其目的是将西南乌克兰的乌军机动力量（主要有第45和第80空中突击旅、第5装甲旅、第35海军陆战队旅、第28和第60机械化步兵旅，还有四到五个乡土守备旅）牵制在尼古拉耶夫附近，同时威慑西乌克兰的第15、第62机械化步兵旅。第三条，从俄罗斯的别尔哥罗德出发，威胁哈尔科夫。这是一条佯攻与主攻兼而有之的进攻路线。其佯攻意义在于拉长顿巴斯地区乌军主力的北翼，其主攻意义在于为伊久姆地区的突破寻求机会。第四条，经由苏梅和克诺托

普，从东面威胁基辅。第五条，经由切尔尼戈夫，从北面威胁基辅。第六条，经由切尔诺贝利从西面和西北面威胁基辅。这第四、五、六三条进攻路线共同构成了战争初期“基辅大佯攻”的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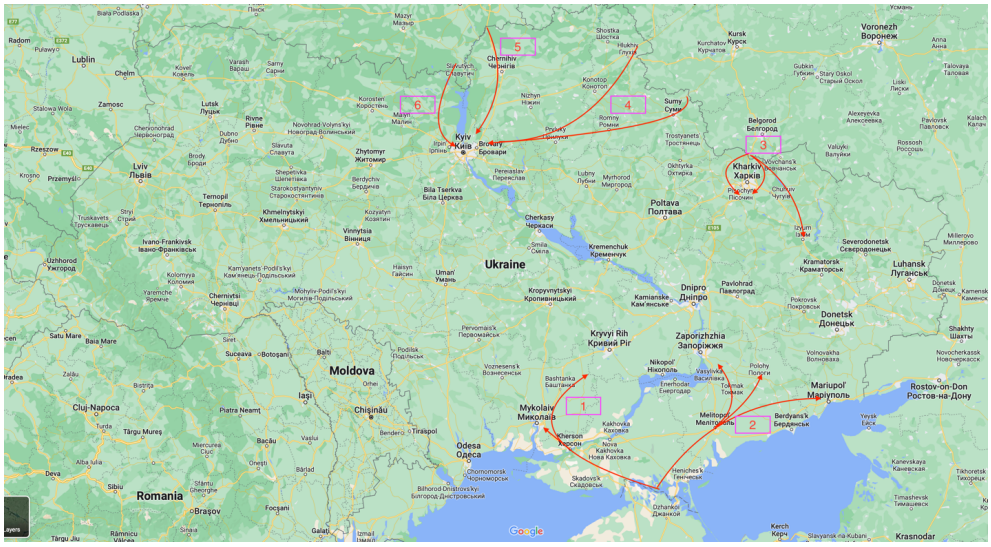



图1:　俄军在战争初期的六条进攻轴线

从军事上讲，这次佯攻的架势摆得很足。首先，四、五、六三路共同构成了一个经典的“向心突击”阵势，这是苏联机动作战传统中最为典型的歼灭战形态。俄军摆出这个架势，就是要向世人宣布其攻击重点就是基辅。第二，为了塑造一个“基辅闪击战”的假象，俄军还不惜血本地对安东诺夫机场（格斯托梅利机场）进行了机降突击。第三，对进攻路线后方的苏梅、克诺托普、切尔尼戈夫仅做监视而不进攻，做出一副在无后方条件下直捣黄龙的架势。上述三个大动作，第一个仿佛是1944年白俄罗斯战役的再现，第二个仿佛是1979年喀布尔空降的再现，第三个仿佛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再现。就算是乌克兰军官团再怎么纳粹化，这些事情还是能记着的，这个架势还是能看明白的。在无法判断俄军向基辅投入的总兵力和预备队状况的时候，基辅政权选择了将机动部队抽调进基辅保卫首都。除了被围困于切尔尼戈夫的第一装甲旅以外，基辅当局在基辅及其附近30公里的近郊集中了至少包括三个摩托化步兵旅、两个机械化步兵旅、三个乡土守备旅以及安全局下属的大量特务单位。就这还嫌不够，还要向基辅市民发枪来“保卫国土”。但就算如此，俄空降兵还是在稳定了机场局势后，与后续到来的机械化部队会合，一度打进了距离基辅市中心只有数公里的地方。同时，俄军还在基辅西南的瓦西里科夫进行小规模空降，并且佯攻日托米尔，做出切断东西乌克兰交通动脉的姿态。俄军在基辅及其附近的行动歼敌效果是有限的，但这并不是主要目

的。俄军的主要目的是给基辅政权尽可能地造成恐慌，迫使其忽视其它方向的军事行动，并把预备队抑留在基辅。

俄军的基辅大佯攻是成功的，因为乌方必须保证基辅万无一失。从民心上讲，如果开战一个星期首都就丢掉，那么对内对外都无法交代。从军事上讲，基辅当局如果被擒获，则全国的正规军就有可能士气崩溃。从乌克兰国内各派系上讲，基辅丢失意味着现政权实质上降格为地方政权，其余寡头实力的独立性会大大增加，并有可能和俄罗斯达成妥协。（我们在开战之初就预料到乌克兰前总统波罗申科及其寡头集团可能在泽连斯基政权遭遇重大打击时擅自行动。在马里乌波尔解放后，波罗申科果然受到泽连斯基当局猜忌，目前有可能在逃往波兰的路上被乌安全局扣押）。因此，俄军大张旗鼓地进攻一个对手一定会保卫的目标，并最终达到了佯攻的目的。

其实，第四、五、六三条进攻轴线上的俄军在留下了监视部队之后，到达基辅近郊的只有第36近卫摩步旅、第37和第64摩步旅、第5近卫坦克旅、第217近卫空降兵团和第228摩步团（俄罗斯的摩托化步兵相当于乌克兰的机械化步兵），总兵力可能只有3万上下，约为基辅守军正规军的一半、守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弱。这点兵力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攻下有三百万人口的基辅的。不过，由于基辅当局的筹码太高，在战略和战术上都缺乏虚置首都向东增援的决心和气量，因此只能选择在基辅周围集结远超过防御所需的部队。俄军见敌人将要上当，就再加一码，故意在基辅西北摆出七十公里的卡车队列，一来欺负乌克兰空军不敢出战，二来继续坚定了乌克兰加速调兵前往基辅的决心。我们在早期的“快评”中，由于不清楚俄军的意图和部署，再加上被目光短浅、水平业余且心怀鬼胎的美国战争研究所（ISW，其头目与主导乌克兰2014年政变和乌克兰生物武器人体实验项目的美国副国务卿纽兰是亲戚和政治同盟）发布的分析所误导，也一度判断俄军真有进攻基辅的意图。事实证明是我们错了，俄军向基辅的进军是本世纪最成功的战役欺诈行动。

不过，俄军有没有真的通过机降突击和少量特种兵在数个小时内擒获基辅当局高层的想法呢？俄军有没有绕开路上的乌军据点在两天之内行进间夺取基辅的的想法呢？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上述两种想法与基辅大佯攻的总体计划并矛盾。如果上述两种可能真的由可能转化为现实，那么在基辅方向上由佯攻转主攻也不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无法成为现实，它们本身也让基辅大佯攻显得更加有声有色。

西方文人在面对与自己的判断大相径庭的战争发展时，通常先是掩饰，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然后就是阴阳怪气地评论俄军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是代价很大。当事实证明俄军以很小的伤亡达成了战役目标时，西方文人就开始主动为俄

罗斯设定目标，比如三天打下基辅，一周打下马里乌波尔，两周围歼乌军主力，胜利日前彻底占领乌克兰等等。如果俄罗斯没有完成这些只有宣传价值而没有实际意义的目标，他们就会兴高采烈地替俄罗斯宣布战败。四月初，俄军从基辅周围和北乌克兰的撤退就曾被西方文人鼓噪成为俄乌战争的转折点和普京的决定性失败。这也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战役决策。

从二月底到四月初，俄军与数倍于己的乌军在基辅附近对峙。为了避免无谓伤亡，俄军向北和向东缓步有序撤退。而乌军方面一直忌惮俄军可能的反击，只敢跟在俄军屁股后边占领被俄军放弃的城镇，在向外界宣布一个个不存在的“大捷”的同时，顺手屠杀与俄军相处融洽的民众。基辅当局自导自演的“布查屠杀”就是此类行动的典型。而就在这关键的一个月中，俄军占领了合围顿巴斯地区乌军主力的有力出发阵地，粉碎了乌克兰空军和防空系统的残余力量，摧毁了乌克兰大量的武器库存，打碎了乌克兰的重装备补给通道，消灭了乌克兰的后方维修能力。一句话，当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基辅周围尺寸之地的得失，因为乌当局制造的各种假消息而震惊、悲愤、错愕、迷茫之时，俄军已经在乌克兰的领土和空中编织了一张铁网。到了四月初的时候，基辅附近俄军佯攻牵制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北乌克兰的俄军尽管有着空中优势和炮火优势，但其人力显然难以对任何一个乌军主要据点展开围攻。同样由于北线的数量劣势，以及乌军为求自保猬集成团，俄军也难以在保证本身不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合围和歼灭乌军任何一个旅级单位。长期在乌军大后方作战，基辅东面和东北面的俄军补给线也暴露在乌军炮火和小股部队的伏击之下。当然，这些损失比起实现佯攻战役目标而言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目标已经完成时，俄军再在基辅附近停留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在二三月份之间，被牵制在基辅附近的乌军由于长期消耗和指挥混乱已经出现了整建制投降的状况。而且这些部队无论如何也已经无法和重装备一起被调动到顿巴斯前线。在这种情况下，俄军决定撤出在北乌克兰的兵力，并在短暂休整之后将其投入真正决定战局的顿巴斯歼灭战中。有意思的是，基辅当局始终对俄军夺取首都心有余悸，在基辅周边仍然部署了精锐的第1装甲旅和第10山地旅。原本基辅附近的其他守军多数尾随俄军，并随后部署在乌克兰东北边境或是后勤线路尚且通达的哈尔科夫地区。

所以，俄军撤出基辅周边是因为佯攻的任务已经完成，而不是打不下基辅、干等一个月最终逃跑。如果俄军北线三路的真正目标只有基辅，那么俄军不可能仅仅在战争开始时向基辅发动一次突击。俄军在一个月间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急躁地想要攻城或者愿意为攻城付出重大代价的孤注一掷的态度。相反，在占领基辅附近的几处战役要点之后，俄军就开始在敌人的领土上以空间换时间，迫使乌军

不断地进攻这些要点。俄军在基辅附近对自己的伤亡和平民的伤亡及其敏感，宁愿让出一些不利的阵地也不愿和占有数量优势的乌军打反复争夺的消耗战。比如，在推特上被“歼灭”至少两次的俄军第228摩步团，在从容撤出基辅以东之后随即被投入到北卢甘斯克的战斗，并在一周前夺取了红利曼。如果这支部队在基辅周围遭受重大损失，那么它无论如何是不会出现在阵地攻坚战的最前沿的。如果我们抛弃西方媒体自我陶醉的神话，用现实的眼光看待俄军在基辅周围的进军和撤退，我们就不会像西方文人一样对俄军仍然能掌握战场主动权并保持不紧不慢的攻势瞠目结舌了。

基辅的“歼灭战”是演戏，顿巴斯的歼灭战是动真格的。顿巴斯的歼灭战部署是俄军的第三个重大战役决策。从扎波罗热到巴拉克列亚（哈尔科夫以南）的顿巴斯前线，乌军集中了第3、4、17装甲旅，第56、57、59摩步旅，第24、30、53、54、93机步旅，第79、81、95空中突击旅，第25伞兵旅，第128山地旅，第23国民卫队旅，以及5个乡土守备旅。这些部队构成了乌克兰正规地面部队的将近一半、准军事部队的将近三分之一，此外还有大量的安全局特务单位。这些部队是乌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分。如果俄罗斯成功消灭了这些单位，那么乌克兰仅凭借西乌克兰的经济基础哪怕再加上北约的援助也无法再拼凑出规模和战斗力相同的武装力量。从分析俄乌战争的第一篇“快评”开始，我们就一直认为，歼灭顿巴斯地区的乌军主力是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核心任务；这一预测也反映在俄军撤出北乌克兰之后的“第二阶段”军事行动上。

本文第一部分曾分析道，顿巴斯乌军遵循的是堡垒化防御作战方针。乌军在顿巴斯地区构建以城市为核心、相互支援的纵深防御体系，试图以此拖慢俄联军的进攻并增加其伤亡。面对这种防御体系，还要顾及平民的伤亡，因此进攻急不得。战争初期，俄军可以日行一百公里，但是在堡垒群中，每天能保证前进五百米并且顶住敌人的反攻就已经是相当出色的战绩了。一些人非常蔑视俄军集中兵力进攻顿巴斯的计划，他们认为放弃基辅、敖德萨、哈尔科夫不打而去打一个偏僻的小地方，是俄军自知无能，打不了大仗只能打小仗的表现。有人甚至将俄军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变类比为蒋介石从“全面进攻”转向“重点进攻”，而且重点进攻还磨磨蹭蹭。这种看法是傲慢且愚蠢的。其愚蠢在于他们完全不知道现代战争条件下的堡垒攻坚意味着什么，其傲慢在于他们认为俄军和他们一样愚蠢。形象地说，在进攻方凑齐了三倍兵力和越多越好的火力之后，对手的筑垒地域会给他们呈现一个低伤亡、短时间与占领三个目标之间的“不可能三角”。进攻方最多只能达成其中两个目标，而不可能同时达成三个目标。要是想要迅速占领筑垒地域（达成短时间和占领两目标），那么伤亡必然小不了；要是想以较小损失占领筑垒地域（达成低伤亡和占领两目标），那么就需要长时间的火力准备，

摧毁敌军的有生力量、士气和物资；要是既要迅速解决问题又不想付出重大伤亡代价（达成短时间和低伤亡两目标），那么就别想着攻占筑垒地域，只能迂回并承担补给线被破袭的后果。俄军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曾经因为想要迅速突入占领敌人重兵把守又有群众基础的格罗兹尼而遭受过重大伤亡。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俄军改弦更张，使用重火力开路和小股步兵在装甲力量引导下进攻，就取得了不错的成果。我们在早先的“快评”中，曾经受到过西方军事评论家的误导，低估了俄军打持久战的能力。现在看来，凭借俄罗斯的经济自持力、军事装备的国产化程度、俄罗斯国内和解放区人民的支持，俄军完全有能力在战争长期化之后占据越来越大的优势。俄罗斯可以完全不在乎西方评论家设置的期限，按照自己的步骤，以极大的火力和极小的伤亡占领顿巴斯的筑垒地域。

从俄军的动向看，他们并不急于把整个顿巴斯地区“包个大饺子”。理由有二。第一，乌军的机动能力已经不复存在，顿巴斯地区的重装备和弹药是撤不出去的，除非乌军都是武装越野马拉松健将，否则人也别想撤出去。乌军一旦脱离了堡垒化的城镇，就会遭到俄军毫无顾忌的炮火打击。因此敌人不会走。第二，俄军在顿巴斯地区集中的兵力，加上车臣和两共和国的兵力可能不会超过当地乌军的两倍。这些兵力维持内层包围圈（防范顿巴斯乌军突围）都显勉强，维持外层包围圈（阻止乌军救援）就更不可能了。俄军可能采取的是将顿巴斯乌军分割包围的策略，将敌军分割成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包围圈。目前，以北顿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为中心的第一个包围圈已经接近完成，预计会包围乌军第17装甲旅、第79空中突击旅、第4、111、118乡土守备旅全部，以及第24机步旅，第95空中突击旅一部。第二个包围圈可能会以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为中心，包围乌军5到6个旅。上述两个包围圈完成之后，如果乌克兰政局不发生激变，乌军势必要去填补一个250公里的战线缺口。接下来，俄军有可能向南包围扎波罗热以东的乌军，也有可能向北包围哈尔科夫附近的乌军。主动权掌握在俄军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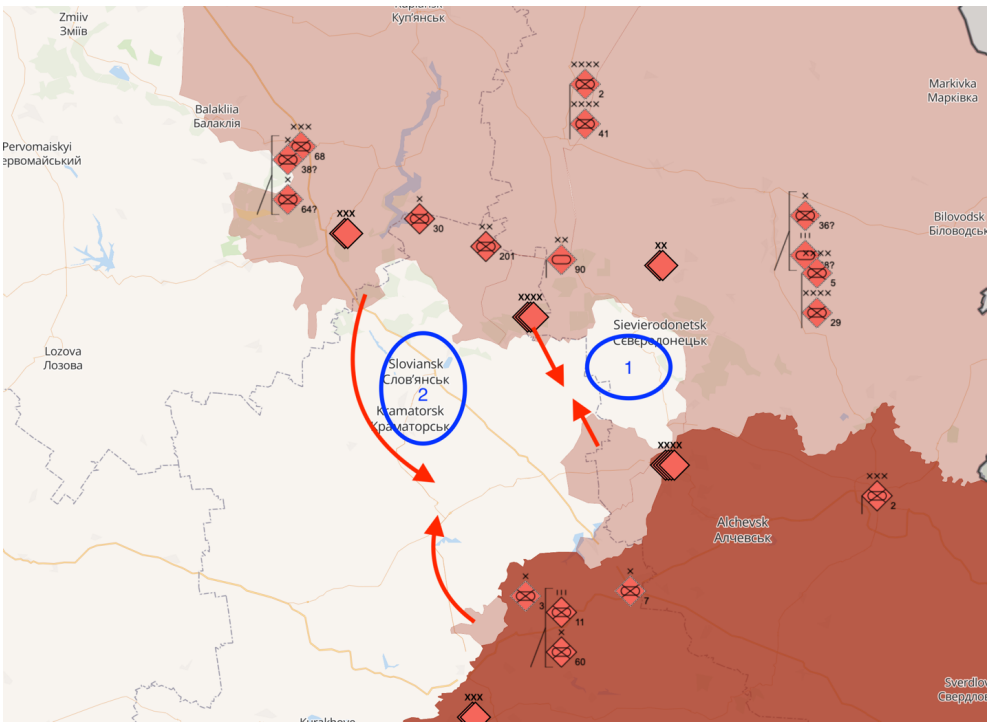



图2:　北顿巴斯局势。

其中一号蓝圈是已经几乎形成的北顿涅茨克-利西昌斯克包围圈。二号蓝圈可能是俄军的下一个目标，即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包围圈。消灭这两个包围圈之后，乌军最有战斗力的部分将不复存在

综上所述，俄军的第一个战役决策——基辅大佯攻——为俄军孤立乌军主力创造了条件，第二个战役决策——北乌大折返——为歼灭乌军主力提供了足够的兵力，第三个战役决策——东线大围歼——正在以可控的节奏和极低的代价进行。俄军没有丢掉自苏联时代以来的以机动作战为主要手段，以消灭敌军有生力量为目的的宝贵传统。俄军的三个主要决策不是随意伸缩的试探，而是服务于歼灭战主要目标的明确行动。

俄军的上述三个战役决策是由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有限性、俄军对敌我优缺点的正确认识以及俄罗斯要与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脱钩这一长远政治目标共同决定的。认识不到第一点，就要么会陷入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如斯特列科夫）对俄战争动员力度的迷惑和不满，要么会陷入对俄军从“全面进攻”退缩为“重点进攻”的荒唐判断。认识不到第二点，就会蔑视乃至嘲笑俄罗斯在进攻东乌克兰城市时的过度谨慎。认识不到第三点，就总会想着俄罗斯要和乌克兰一样，把打仗当成作秀，来向西方讨求条件。西方文人和他们在中国左、右两道的附庸们，要么因为立场问题，要么因为认知缺陷，是无法取得正确认识的。

当然，这次特别军事行动不是完美的，俄军也犯过错误，也因为错误遭受过损失。比如俄军低估了乌克兰军队被法西斯渗透的程度，在战争一开始时放松了

警惕，导致一些俄军官兵被俘并被虐杀；俄海军的战备水平堪忧，导致莫斯科号巡洋舰因为事故沉没；俄军没能在别尔江斯克上空及时展开防空系统，导致缺乏防空能力的坦克登陆舰被击伤；俄军在战争初期沿着主要道路推进时麻痹大意，被乌军炮兵伏击等等。不过这些错误基本是战术上的和技术上的。这种掉链子现象的发生是现代战争复杂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而且这些错误往往发生在战争初期，在战争进入顿巴斯地区的决定性阶段之后就基本没有发生过。这一切说明，俄军不是一只技术落后、战术呆板、战略迷茫、人员麻木的腐朽军队。俄军在本次战争中的三次重大战役决策是二十一世纪有限战争的优秀样板。俄军在战争中表现出的韧性和灵活性是绍伊古军事改革成果的体现。

## 俄乌战争与二十一世纪“军事神话”的破灭

“军事神话”指的是夸大某些武器装备的性能、某些战略战术的效果和某些国家军队的作战能力而全然不顾事实和具体历史背景的行为。在网络时代，由于各类廉价的军事娱乐产品迅速普及，让普通民众可以在不经历战争的情况下“体验”战争，这也导致了军事神话在二十一世纪迅速泛滥。本次战争就是戳破这些军事神话的最好机会。

第一个被戳破军事神话是“坦克无用论”。坦克是一个集火力（坦克炮、导弹、机枪）、防护（各种装甲和主动防护系统）与机动（发动机和履带）于一身的技术平台。上述三要素的发展、坦克部队的成本、国防压力一起决定了特定国家坦克的技术性能、坦克部队的编制和战术以及如何使用坦克。换句话说，坦克从来就不是“无敌”的，坦克也不会因为不“无敌”而变得“无用”。在坦克刚刚诞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坦克就可以被增加装药的步枪子弹击穿。历史上第一次坦克无用论出现在1936年到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当时佛朗哥的反动军队使用德国的反坦克炮在坚固阵地上轻松击毁了许多苏联援助的但没有步兵支援的T-26和BT系列轻型坦克。第二次坦克无用论出现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当时埃及军队在收复西奈半岛的战斗中用苏联的3M6反坦克导弹（北约代号AT-1）在一个小时内消灭了以色列侵略军的一个坦克旅。第三次坦克无用论出现在2003年的第二次海湾战争，拥有空天信全面优势的美军轻易击败了早已残破不堪的伊拉克装甲部队。

不过有意思的是，三次坦克无用论的甚嚣尘上反而刺激了各主要国家对坦克的重视。西班牙内战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坦克发展最快的时期，奠定了现代坦克的基础。第四次中东战争的交战国和主要武器提供国都根据战争经验进一步改进坦克。比如以色列的“梅卡瓦”系列坦克特意将发动机前置以对抗破甲武器，苏

联的T-80系列坦克也没有因为苏联自己的反坦克导弹大放异彩而被削减。第二次海湾战争以后，俄罗斯、中国都相继研发了新的坦克型号，就连美国也在不断改进“艾布拉姆斯”系列坦克。理由很简单，坦克无用论的战例是有特殊条件的；西班牙内战时是因为步坦协同较为原始，第四次中东战争是因为山谷地形和伏击的突然性，第二次海湾战争时是因为伊拉克军队整体落后且不进反退。这些条件的存在压制了坦克三要素中的一个或者多个，大大限制了坦克的作战能力，因此给了反坦克炮、反坦克导弹和武装直升机以击败坦克的机会。这些条件的出现是偶然的，而坦克的战斗力是必然的。坦克可以通过改进自身性能和加入诸兵种合成体系来扬长避短，而这些反坦克武器则往往专器专用。坦克出现弱点时，多数情况下可以通过堆加装甲和主动防护系统来解决。反坦克武器在过时以后，如果还想要克制坦克就需要从根本的杀伤原理上寻找突破，否则就只能越做越大，越做越重。因此，坦克的改进成本低，反坦克武器的改进成本高。这也是坦克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无用”的根本原因。

在本次战争中，一些自鸣得意的“军迷”在西方媒体的蛊惑下，盲目相信乌克兰的单兵反坦克导弹可以大量杀伤俄军的坦克。甚至发展到看见T-72圆圆的炮塔就会从内心自然产生一种蔑视情绪，认为这是在伊拉克已经被证明是废物的玩具。然而被捧上天的西方反坦克导弹却战绩不佳。乌克兰方面承认，标枪导弹准确飞向坦克车体的概率只有不到百分之五；再加上飞向坦克但是被主动防御系统拦截而未命中、命中了未击穿、击穿了未造成人员和内部组件损失，以及坦克开回去修修就能再用等层层条件概率筛选，这些单兵反坦克武器在面对经过现代化改装的俄军坦克时效果介乎可疑与可笑之间。逃跑的乌军常常把这些相当值钱的导弹乱扔一地，被俘的乌军也常常抱怨标枪导弹不好用。一发反坦克导弹打出去，还要重新寻找掩体继续人力装填才能再打一发。对于坦克来讲，发现并摧毁反坦克小组是在先进观瞄设备的辅助下进行的，坦克车组是在装甲的保护下完成索敌、机动、开火和装填的，其体力消耗和精神压力要远小于反坦克小组。在有步兵战车和下车步兵掩护的情况下，乌军反坦克小组攻击俄军坦克的机会窗口被大大压缩。而俄军坦克则既可以在运动战阶段进行机动穿插，也可以在阵地攻坚阶段发扬火力优势并保护下车步兵。总结起来，坦克可以被击毁，但是坦克还不能被替代。在本场战争中叫嚣坦克无用的伪“军迷”应该放下游戏手柄和VR设备，好好学习一下军事史和现代战争。

与坦克无用论相关的另一个“军事神话”是“未来步兵”。关于网络写手安生的“数字化轻步兵”崇拜，我们已经在另一篇文章中批判过了。迷信携带数字化装备的未来步兵一方面是好莱坞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在现实世界中难以得到满足的心理投射，另一方面也是不懂基本物理化学规律的结果。在常规战争中消灭敌方人员和

装备的基本原理是将武器弹药中的能量投放到敌人身上。要完成这一过程需要有三个条件。第一，要能找到敌人；第二，要能打到敌人；第三，要能摧毁敌人。第一个过程是侦搜过程，第二个过程是制导过程，第三个过程是毁伤过程。数字化装备是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成果，它提升的是前两个过程的效率。但是人类的身体结构本身决定了单兵装备体积和负载能量的上限。能量少，平台小，侦搜和制导的范围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毁伤率也会大大下降。相反，机械化装备就能够搭载更多的观瞄设备，使用威力更大也更精确的武器。步兵无论如何数字化，也数字化不过机械化装备。同时单兵装备的进步潜力也受到人类体格的限制。举个简单的例子，二战时期的德国“铁拳”反坦克火箭只有冲锋枪大小，一名士兵可以在他的步枪之外携带多枚火箭。冷战时期的苏联RPG-7反坦克火箭就有机枪大小，一名士兵拿着火箭筒和几发备弹就不能使用其他轻武器。现在的单兵反坦克导弹像个大旅行箱一样，而且还重得多。这是因为随着机械化单位防御性能的发展，反坦克武器不得不“暴力堆料”来提供勉强一用的穿甲能力和反干扰能力，最终逼近和突破人类体能的极限。当被吹得神乎其神的乌克兰“数字化步兵”拿着单兵防空和反坦克导弹蹲在堑壕里无奈地等待自己被俄军“落后”的炮火送进地狱的时候，未来步兵的神话也就谢幕了。未来属于机械化部队，不属于轻步兵。

第三个“军事神话”是关于俄罗斯的“混合战争”。从叙利亚战争开始，西方的军事观察家就发现，俄军的打法和美军不一样。克劳塞维茨曾经正确地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是西方军人对其的解读是狭隘的和形而上学的。他们认为战争不过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政治，当外交手段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就轮到大炮发言了。外交与战争是互斥的，当战争开始的时候，外交就应该退场，直到一方彻底压垮另一方。俄罗斯人对克劳塞维茨的解读要丰富得多，他们认为外交和战争本身并不互斥，以打促谈是必要的，以谈助打也是可取的。而且俄罗斯人擅长与敌人在任何层面上展开谈判。俄罗斯人认识到，尽管在全局上双方是敌对关系，但是具体到每个局部，每支部队，每个据点，双方往往有的可谈。俄军在叙利亚战场上就是采取这种打打谈谈的方法，允许被包围的敌人携带轻武器撤出，并开辟人道主义走廊保证他们和家属的安全。这样，俄军和叙利亚政府军便以较小的损失把这些西方支持的军阀压缩到了北方的伊德利卜省。然后这些互不统属的军阀就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而相互攻伐，白白消耗了大量的西方军事援助。西方军事观察家非常不理解俄罗斯的做法，他们认为打仗就是打仗，谈判就是谈判，一个归军人管，一个归外交官管。在他们看来，俄罗斯这种打法很不纯粹，因此被冠以“混合战争”的名号。其实，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所有的战争都是“混合战争”。只有完全不了解战区国家的阶级矛盾格局，幻想着每次都把敌人打到“无条件投降”的西方军事观察家才会梦想某种“纯粹”的战争。在我国历史上，各种“混

合战争”俯拾即是。比如平津战役中“以天津模式促成北平模式”就是“混合战争”的典范。俄军在马里乌波尔攻城中就反复地将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同时使用，最终成功地击垮了最强硬的“亚速营”纳粹分子的心理防线，让他们乖乖出来投降。究竟“马里乌波尔”模式会不会成为带动“利西昌斯克模式”、“斯拉维扬斯克模式”、“哈尔科夫模式”甚或是“基辅模式”的样板，那就要看俄罗斯的政治艺术了。

## 俄乌战争走向何方?

战争打到今天，就算是最虚伪最猖狂的西方主流媒体，如BBC和纽约时报，也不得不承认乌克兰打得“很艰难”，乌克兰的失败“是一种可能性”。这种悲观的看法与俄军从基辅附近撤出时他们的癫狂叫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北约不大规模公开派遣地面部队助战，或者在乌克兰上空设置“禁飞区”，或者对俄罗斯进行核挑衅，那么俄罗斯大概率会在保持“区域拒止”能力的前提下消灭乌军主力，并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

5月20日落幕的马里乌波尔战役具有深远的军事和政治意义。该战役宣告了俄联军使用相对于守军两倍左右的兵力，在火力充足的情况下，可以以极小的代价歼灭防守永备工事的乌军三个精锐旅/团。换句话说，乌克兰所有的堡垒群除了能消耗一些俄军的弹药和时间以外，如果死守，必定成为乌军的钢筋混凝土坟墓，而正好俄军既不缺炮弹也不缺时间。马里乌波尔的解放给每一个乌军军官和士兵都传递了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信号，即他们的负隅顽抗既不会成功也没有意义。顿巴斯地区乌军士气的崩溃只是个时间问题。现在每天都有被强行拉出州界押送到顿巴斯填补战线的乡土守备旅士兵和军官发视频公开向基辅当局请愿，说上级军官把他们押送过来之后就逃跑了，他们既没有吃的也没有弹药。最近这种请愿活动已经扩大到正规军的连队中。与此同时，每天都有多股以班排为单位的乌军向俄联军投诚。此外，基辅当局已经不再公布己方伤亡数字，试图掩人耳目，直到在逼问之下才承认每天约有100人阵亡。就算不考虑乌方经常性放出的假消息，按照一死三伤一被俘的比例，一天也有一个乌军编制营彻底丧失战斗力。这对于顿巴斯，尤其是战况激烈的北顿巴斯而言，是一个非常高的损失率。

如果基辅当局在其西方宗主的指使下仍然拒绝一个体面的和平，那么它可能会采取如下措施。第一，基辅当局可能会继续进行“表演式”反攻，用以吸引西方社会的注意力，从而拿到更多的装备。当然这些反攻将损兵折将且不会有任何军事意义。据不完全统计，基辅当局的表演式反攻至少包括三月的“第一次哈尔科夫反攻”、四月的“基辅反攻”和“尼古拉耶夫反攻”、五月的“第二次哈尔科夫反攻”和“蛇岛反攻”，以及最近的“赫尔松反攻”。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表演式反攻的规模可

能会越来越大，攻击方向的选择会越来越绝望且具有戏剧性，给乌军带来的损失也会越来越不可接受。第二，基辅当局可能会继续使用战术导弹或西方送来的远程火箭炮系统轰炸两共和国和俄罗斯的平民住宅，挑逗俄罗斯民众和俄军的复仇情绪，刺激俄军基层官兵采取过度报复行为。第三，基辅当局可能会对本国民众使用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或者向两共和国方面释放核废料，然后动员西方媒体嫁祸俄罗斯，为北约干预升级创造条件。第四，基辅当局很可能会假装以和谈的名义提议停火，为重新部署争取时间。此外，当乌军中政治上相对清醒的部分被消灭或者投降，基辅当局傀儡化和纳粹化程度迅速加深的时候，炸毁第聂伯河大坝或者大规模破坏东南乌克兰基础设施的行为也不是不可能发生。

但无论如何，这些单方面的疯狂举动都不会对大局有所影响。

## 结论：站在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

俄乌战争在地理上和我们相隔万里，但在政治意义上又与我们息息相关。从暴露各个派别的认知水平和政治成色的意义上讲，俄乌战争就相当于爆发在我们面前。俄乌战争不仅让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三个主要政治派别：民族主义者、右派、进步左派之间相互争吵不休，同时也让上述三个派别内部都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分裂。

就民族主义者来讲，有正义感的、朴素的爱国群众认为，北约东扩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俄罗斯如果失败，也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因此支持俄罗斯。而崇拜强权的“工业党”和“大棋党”认为，俄罗斯体制僵化、社会保守、装备落后，因而一定会失败，未来是中美共治的天下。

就右派而言，一切指望颜色革命、发大财做大官的投机分子自然希望俄罗斯的崩溃引发连锁崩溃。指望着全球化可以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国际买家的上层小资也希望俄罗斯的失败会让全球化“回到正轨”。但是，长期定居海外的部分华人保守派则希望俄罗斯的胜利可以有效打击腐败透顶的“深层国家”，从而推动民粹主义运动（如特朗普运动、勒庞运动）上台，重整社会秩序。

进步左派的情况最有意思。一些自称左派的人士对西方主流媒体的文字垃圾深信不移。在他们看来，俄罗斯是凌虐乌克兰人民的“俄帝”；俄罗斯过去出现过光头党，所以今天的俄罗斯也是“法西斯国家”；具有深厚革命传统的顿巴斯两共和国是“法西斯政权”；普京是残暴无良的“刽子手”。他们吹捧深度纳粹化、早已凶相毕现的基辅当局是“民主政权”，将亚速营的负隅顽抗美化为“保家卫国”，又将特务机关捕杀反对派和进步人士的倒行逆施辩解为“必要措施”。他们的口号是：左派唯一正确的观点是同时谴责“俄帝”和美帝。但表现在行动上，他们却要

求支持乌克兰（当然包括支持基辅傀儡当局、亚速营和各色法西斯分子）“抵抗侵略”，要求饱受欺凌迫害的两共和国人民“尊重乌克兰主权，尊重国际法”，要求支持亲西方的俄罗斯小资“反战”。扒开他们话语的“左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的逻辑和利益。他们空喊着要革命，要天下大乱，但是到了天下大乱的关头，他们却完全不敢把握这个机会。他们明知道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上所有反动政权的总台柱，是乌克兰傀儡政权的宗主，但还是要叫嚣着惩戒俄罗斯，为美帝出气。他们对乌克兰纳粹的暴行视而不见，认为“只是少数”，不能决定“国家性质”，但是却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一道反对乌克兰法西斯的朴素正义感嗤之以鼻，认为中国人民需要“对照纳粹主义的特点”反思自己。

这些特点一起指向了一个方向，即这一部分中国的“左”翼分子，对美帝主导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服从已经到了深入骨髓的地步。他们在所有的抽象道理上肯定革命，比如幻想俄罗斯失败后“引发国内革命，推翻寡头政府，重建社会主义”，再做一次当代列宁的美梦。但是他们却在每个具体的环节上否定革命。他们不去思考俄罗斯失败后社会主义能否在更加强大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中生存下来；他们尤其不思考顿巴斯革命本身已经拥有的进步意义，反而要求顿巴斯人民服从傀儡当局。他们对“纯而又纯”的革命的每一丝向往，都转化为对现实存在的、削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社会运动的卑怯诅咒。他们对革命的想象永远停留在1917年。他们越是走出列宁的篇章字句，越是接近早已不同于列宁时代的世界格局，就越会觉得陌生、迷茫乃至恐惧。现实中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与他们梦想中振臂一呼的革命越是生疏乖离，他们越是会把头埋进书本寻找温暖。而这种温暖给他们提供的，不仅仅是个人跌出“阶层跃升”渠道时的虚幻安慰，更是维持小团体内部等级秩序稳定性的理论权威。这就是今日中国左派中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在俄乌战争中的表现。

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俄乌战争是美帝霸权从衰落向崩溃的临界点。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右派和进步左派各自内部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的分裂实际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的选择：是服从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为之殉葬？还是走出一条解放自己与解放全世界的新道路？

个人的选择千种万种，历史的方向只有一个。中国劳动人民最终会站在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

# 俄罗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是俄军在战场上暂时受挫的政治原因

远 航 一 号

在查阅下面这个网站时：

https://sonar21.com/is-ukraine-steamrolling-russia/

评论区中最后一条评论所提出的观点值得参考：

It's even worse. Russian financial powers that have a lot of influence on Putin, (directly control Putin), have declared a stop to further war west of the Dnieper. This war is likely to end with the liberation of the two republics in the Donbas. The Kremlin is again talking about negotiating with Zelensky, and Russia's advance is apparently on hold. Far from treating NATO countries as enemies, the Kremlin is still energising Europe to the extent that Europe will allow. Senior Russian officials talk as if proving that Russia is a reliable energy supplier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lives of its soldiers fighting Western-trained and equipped Ukrainian troops whose weapons are supplied by European countries whose arms industries run on Russian energy. It makes me very sad to see that tens of thousands of young Russian boys have given their lives for basically NOTHING.

上面这条评论认为：普京实际上是俄罗斯金融寡头的代理人，后者反对与西方彻底决裂，因而反对将军事行动扩大到第聂伯河以西。即使西方正在输送武器屠杀俄罗斯士兵，他们仍然要尽一切可能向西方表明自己还是西方忠实的能源供应商。

这条分析的内容值得思考。我们知道，俄罗斯解放顿巴斯的战争到目前为止进展不理想。这不是因为俄罗斯缺少勇敢的士兵，也不是因为俄罗斯缺乏先进的武器装备，更不是因为 腐朽残暴的乌克兰法西斯政权（哪怕经过北约武装以后）有什么强大。

战争进行到现在，俄罗斯还远远没有动员自己的战争潜力。战争初期一度投入约20万正规军，仅占其常备武装力量的五分之一，更不要说俄罗斯还有庞大的预备役。自七月份起，更是将在乌克兰的俄罗斯正规军减少到约5万人。

对于这场关系到俄罗斯国运甚至世界命运的大战，俄罗斯资产阶级为什么表现出如此畏首畏尾、犹豫不决，而不是倾全力一决雌雄呢?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与中国资产阶级同西方资产阶级根本利益一致不同，俄罗斯资产阶级与西方帝国主义之间有着深刻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此次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

然而，俄罗斯资产阶级毕竟也是一个半外围国家的资产阶级，其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即使不得不和帝国主义做斗争，仍然有着严重的动摇性和妥协性。

从普京的多次公开讲话中可以看出，俄罗斯统治集团本来是很想请求西方帝国主义接纳自己作为帝国主义体系中的一个伙伴，只是因为一再被西方帝国主义戏弄，直至2014年乌克兰发生法西斯政变，威胁到了俄罗斯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才不得不开始与西方帝国主义斗争。

即使开始斗争了，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软弱性仍然在不同的阶段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一直到战争前的最后一刻，普京政权实际上还是希望与西方达成某种谅解。战争开始后，俄军以大约三万兵力进逼大约有十万乌军驻守的基辅。这在军事上无法解释。但是，如果将其视为一种在武力威慑下以打促谈的手段，那就不难理解了。

事实上，到了三月底，俄乌双方已经十分接近达成协议。只是后来由于泽连斯基当局秉承西方主子的意旨撕毁协议，普京政权才不得不把战争打下去。

在俄军于五月份解放马里乌波尔、七月初又解放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全境以后，本来，形势一片大好。俄军本该趁乌军新败混乱之际，一鼓作气，以主力迅速解放顿巴斯。而偏偏在这个时候，普京政权将俄军主力调回国内，仅由顿巴斯

民兵武装继续攻打乌军的坚固筑垒地带，似乎是有意要留出时间和空间邀请西方达成妥协。同时俄罗斯继续对欧洲、乌克兰正常供油供气。

结果，西方帝国主义不仅没有领普京的情，反而利用这段时间，加紧训练和装备乌军精锐部队，终于造成俄军在哈尔科夫以东受挫的恶果。

目前，俄罗斯虽然在局部战场上受挫，但俄罗斯基本的战争潜力保持完整，国内经济、政治稳定，而乌克兰当局虽然侥幸取得个别战役的胜利，但是其人力资源已经严重消耗，西方帝国主义的武器弹药工业在多年去工业化后已经无法支撑大规模常规战争的消耗，越来越多西方劳动群众正在觉醒、反对帝国主义干涉。

从俄罗斯国内来说，虽然存在着相当的投降势力，但他们的投降条件屡屡被西方帝国主义拒绝。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民饱受西方帝国主义压迫，为了建设独立自主国家的爱国热情十分高涨。普京政权如果在此时冒然投降，不是被西方帝国主义颠覆，就是被俄罗斯人民推翻。哪怕是为了自身的生存，俄罗斯资产阶级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将解放顿巴斯的战争进行下去。

以俄罗斯广大的战争潜力，有俄罗斯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又有强大的军事工业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只要坚持将战争打下去，一定可以拖垮乌克兰法西斯当局，拖垮北约帝国主义，最终使北约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 乌克兰在赫尔松和伊久姆反攻的军事与政治意义

草 庐 棋 士

从八月底到九月中旬，基辅政权的武装力量在战线最西南端的赫尔松地区和战线最东北端的伊久姆地区展开了两场战术性的反攻。其中，公众期待已久的赫尔松反攻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而伊久姆反攻则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篇小文章就为大家分析一下这两场反攻的军事和政治意义。

从俄军解放北顿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以来，基辅方面的战略部署基本可以按照地区划分为三个集团。

最东北边是哈尔科夫集团，该集团除了有担负哈尔科夫城区防御任务的乡土守备联队和旅团以外，还至少拥有五个机动旅级单位用以钳制俄军伊久姆方向的进攻。这个集团的防御任务在俄军正规军逐渐撤退，战线交给“国民卫队”和卢甘斯克人民军以后得以大幅减轻。因此，相对对面的俄军，该集团逐渐具备了发动战术规模反击的能力。

战线中央的是顿巴斯集团，该集团在与拥有优势火力的俄军拉锯期间损失惨重。同时，基辅军事头目也能看出这一集团由于其所处的战略位置、政治意义和与对面俄军的对比，不可能具备发动反攻的能力。因此在过去两个月之间，该集团接受了大量新征兵员和单兵武器的补充，但是其装甲力量和炮兵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恢复（用于轰炸顿涅茨克平民区的炮兵除外）。

战线最南端的是尼古拉耶夫集团，该集团长期与俄军赫尔松集团对峙，又经常发动行为艺术式的反攻，因此其部署状况和基本实力已经被对面俄军熟知。此次赫尔松反攻也已经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其失败是不足为奇的。

然而，乌军在伊久姆地区的反攻却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我们从政治、战略和战役战术三个方面为大家解释这场反击。

从政治上讲，俄罗斯统治阶级核心圈对于要打俄乌战争以及争取打赢俄乌战争都是没有分歧的，但是对如何打赢这场战争则一直存在着争论。以普京为首的当权统治集团一直想要在一定程度上复制俄军在叙利亚的成功，以低动员程度、低参战人数，低伤亡的方式，打一场随时可以重启谈判的“有限战争”。有限战争有如下几点优势。首先，这毕竟是一场战略上和地缘政治上的攻势作战，一下子就做重大动员，人民群众不会理解，与新自由主义联系较深的小资产阶级可能会很不满；第二，有限战争最能够保证低伤亡率，使得伤亡的影响不至于像苏联在阿富汗的战争那样波及国内，同时把战争对俄罗斯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降到最低；第三，总动员可能意味着俄罗斯统治精英内部倾向于国家资本主义乃至一定程度计划经济的集团实力过快增长，甚至影响普京集团“天下共主”的地位；第四，总动员也会提高俄罗斯民众的阶级斗争力量，对俄罗斯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产生影响。

这样，在俄罗斯逐渐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中，俄军在前线的兵力不仅没有继续增加，反而大量部队被拉回国内休整。在九月底，俄军前线兵力可能还不足战争开始之初的一半。而在从六月份以来较为平静的巴拉克列亚—伊久姆地区，俄军的兵力已经从第35、第26、第20三个集团军，十个左右的旅或团下降到八月底的不到三个摩托化步兵团，而其中在巴拉克列亚以北直接面对乌军主要突击方向的，就只有一个防线长度将近30公里的254摩步团。这是冷战期间数个师才能有效控制的防线。而就算是这样，254团也没能“填满”防线。防线的其余部分，基本上由相当于中国武警的、严重缺乏重装备的俄罗斯“国民卫队”，以及卢甘斯克人民军一部来填补。卢甘斯克人民军的主力还在解放本州的战斗中，派往巴拉克列亚-伊久姆地区（哈尔科夫州）的只是民兵中的二线部队。在前线城市巴拉克列亚，甚至根本没有任何俄军正规军单位。这样，在俄联军没有经过战争动员，总兵力只有对手三分之一的情况下，再加上近期的撤军，就导致了巴拉克列亚—伊久姆地区出现了一个宽30公里，长40公里的兵力空虚地带。

俄联军不是不知道这里兵力虚弱，但是在兵力不占优势而机动性占优势的情况下，唯一可取的防御战术不是掘壕固守，而是机动防御。所谓机动防御，就是在远离关键地区（交通枢纽、指挥中心、有政治意义的城市等）较远的次要地区（伊久姆-巴拉克列亚在启动对斯拉维扬斯克-卡拉马托斯克的全面合围以前并不

是重要地区），只留下小股前哨和机动兵力。他们的任务不是御敌于防线之外，而是迫使敌军频繁停顿，频繁展开，频繁侦查，频繁变更战术部署，如果有可能的话，给敌军造成一定的伤亡。其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迟滞和拖延敌军，为己方增援部队到来巩固防线和发起反击争取时间。一次成功的机动防御的防线会逐渐由“软”变“硬”，而进攻一方的力量也会在其占领地区达到顶点的时候开始变得相对虚弱。最终，进攻的突击“动能”全部转化为占领“势能”，主动权回到原本的防御方手中。如果进攻方不能在主动权易手之前达成战役目的，那么此次进攻在战役意义上就是失败的。

从俄乌双方交战的历史来看，乌军如果想要通过战役进攻来实现战役目的，如通过合围有效歼灭俄军数个团级单位或者占领俄军某一战略方向背后的重要交通枢纽，从而达到在某个战略方向上彻底打垮俄军进攻能力，就必须要集中上述三大集团中至少两个集团的大部机动兵力，从至少两个方向，针对俄军一个战略集团实施进攻。这就是典型的钳形攻势。然而，从哈尔科夫到赫尔松的整个战线是一个由基辅占领区组成的巨大突出部，乌军有着内线作战相互增援的优势，但是显然不具备动用两大集团机动兵力合围俄军一个集团的条件。

上述条件决定了乌军可以发动反攻（俄军兵力劣势），但是不能发动战役级别的反攻，只能集中一个集团的力量发起战术反攻（军事地理条件不利）。如果基辅方面只能纠集一个集团的机动兵力而友邻集团最多能够有限策应的话，其反攻就算取得胜利，也只能在一个方向上达成战术突破，而无法完成战役目标，更遑论改变整个被动挨打的战略态势。

在八月底，基辅方面聚集了至少包括第35、36海军陆战旅，第59、60摩托化步兵旅，第28、63机械化步兵旅，第5、17装甲旅，第128山地突击旅，以及大约一个旅的外国雇佣军以及配属部队向二月份被解放的赫尔松方向发起反攻。据称参加反攻的部队经过了北约标准的训练，并且使用了东欧国家赠送的苏制重装备，许多轻装备和其他车辆则由西方直接提供。乌军在架设浮桥渡过了第聂伯河右岸的一处宽约100米的支流以后，向东南突进，形成了一个长约十公里宽约三公里的突出部。然而，俄军在开打第三天就摧毁了渡河设备，并重新沿着该支流切断了乌军的突出部。在接下来几天中，被包围的乌军阵亡超过了2000人，总的损失接近一万人。从喀尔巴阡山调拨过来的第128山地突击旅基本上全军覆没。现在俄军已经基本肃清了包围圈中的残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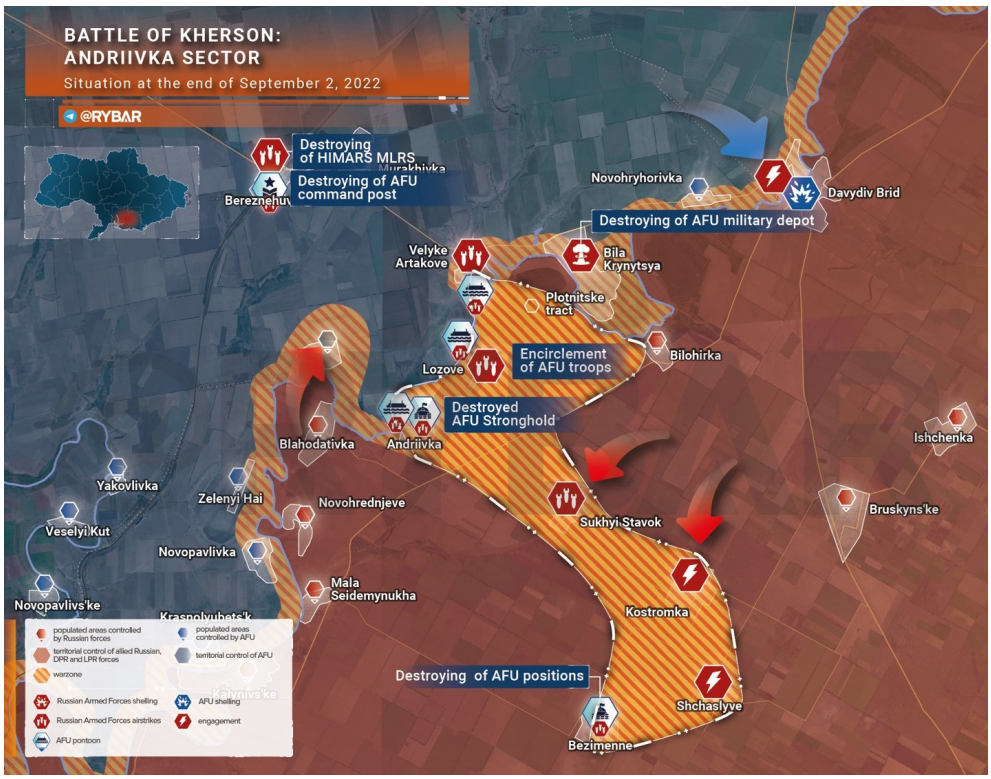



图1：赫尔松反攻战役示意图。蓝色是基辅政权占领区，红色是被联军解放的地区，红黄间隔线是乌军一度控制的地区。

赫尔松反攻是乌军在俄军重点布防地域对有准备之敌的大规模进攻。乌军对面的俄军包括第10特种作战旅，第127侦察旅，第56空降团，第11空降团，第34、205摩步团，第126海军陆战旅。其总兵力约为对面兵力的不到一半，约为对面投入反攻兵力的六成到七成。由于俄军在赫尔松附近长期与乌军对峙，乌军又不断进行小规模袭扰，因此俄军相当熟悉对手的思路。而且此地一马平川，只有几条东北西南走向的河流，而这些河流在夏秋两季的宽度又恰巧无法让载重卡车涉水通过。因此乌军需要在完全暴露的田野上渡过这些河流，才能向俄军纵深挺进。而俄军既可以沿河布防，也可以通过切断渡河点来阻止敌方机动。这是造成乌军赫尔松惨败的直接原因。其实，由于乌军甚至没有在进攻方向上凑齐二比一的优势，他们就算突破了俄军的防线，也不会有足够的预备队进攻赫尔松城区，最多只能在城下干瞪眼。因此，这也是一贯坚决支持乌克兰的美国国防部甚至不愿意承认基辅在赫尔松方向的军事行动算得上是一场“反攻”的原因。

在俄军扎紧赫尔松的口袋消灭包围圈中的敌人的时候，乌军在数百公里以外的巴拉克列亚-伊久姆地区发动了一场不逊于赫尔松方向的反攻，而这次俄军就没那么幸运了。从战争一开始，哈尔科夫方向的俄军就一直在“欺负”乌军的哈尔科夫集团。从一开始的迅速包围，到三月份夺占伊久姆，再到五月份虚晃一枪粉粹基辅方面第一次哈尔科夫反攻的计划，俄军对这一集团的敌人显然已经滋长了一定程度上的情敌情绪。再加上俄军主力投入顿巴斯和大量兵力撤回国内，这一地

区的防御十分空虚。基辅方面为了此次反攻至少做了如下努力：第一，在突破地域集结了第3装甲旅，第30、92机械化步兵旅，第25空降旅和第80空中突击旅。这些部队的总兵力少于赫尔松反攻投入的总兵力，但是他们却集中在了巴拉克列亚以北的一个仅仅10公里的突破地域。在这五个旅的压力下，唯一的俄军正规军第254摩步团只能且战且退，和友邻的非正规部队逐渐撤向奥斯基尔河（北顿涅茨河的一条南北向的支流）。第二，在伊久姆南方，基辅方面的第79、95空中突击旅，第4装甲旅，第93摩托化步兵旅，和第81空降旅尽管在顿巴斯战役中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但是仍然从南方给伊久姆（只有一个俄军团级单位）方向巨大的压力。第三，赫尔松反攻也牵制了俄军相当的注意力，而且将俄军大量的炮兵部队吸引到了第聂伯河下游。这就大大降低了俄军迟滞乌军突破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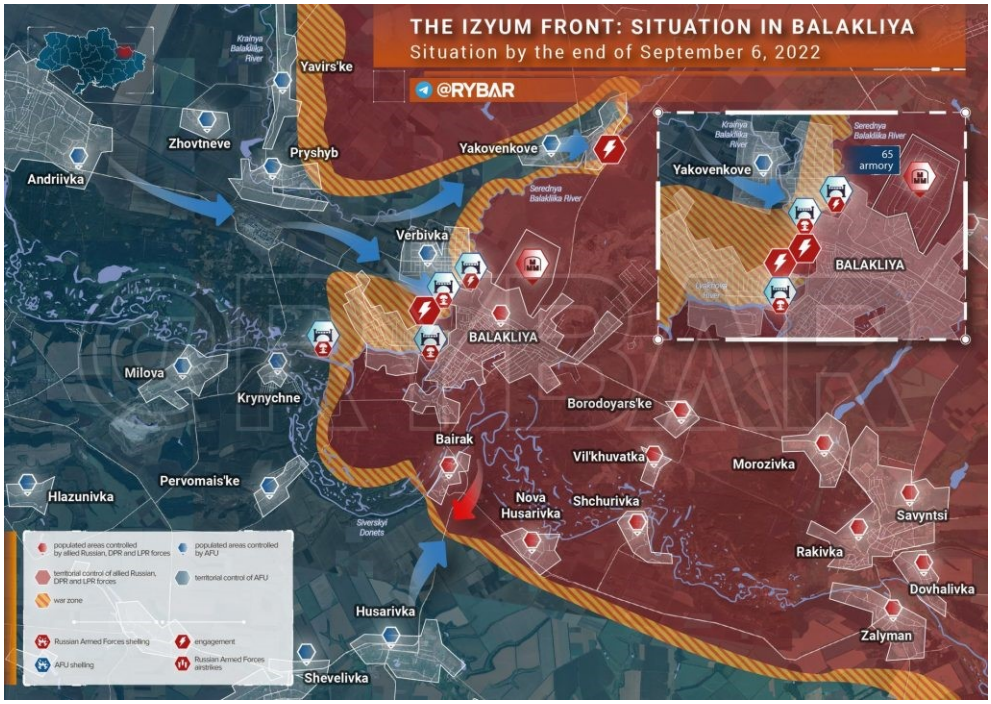



图2：巴拉克列亚-伊久姆反击第二天战线示意图。蓝色楔形区域为乌军突破区域。此地是俄军254摩步团和“国民卫队”的结合部，是俄军防御最薄弱的区域。

在反击的第四天，即九月九日，乌军已经进攻到了奥斯基尔河边。他们试图夺占奥斯基尔河上的几座桥梁，但是桥梁都被俄军摧毁。同时，乌军也在朝着库别扬斯克（下图蓝色突出部东北方向城镇）发起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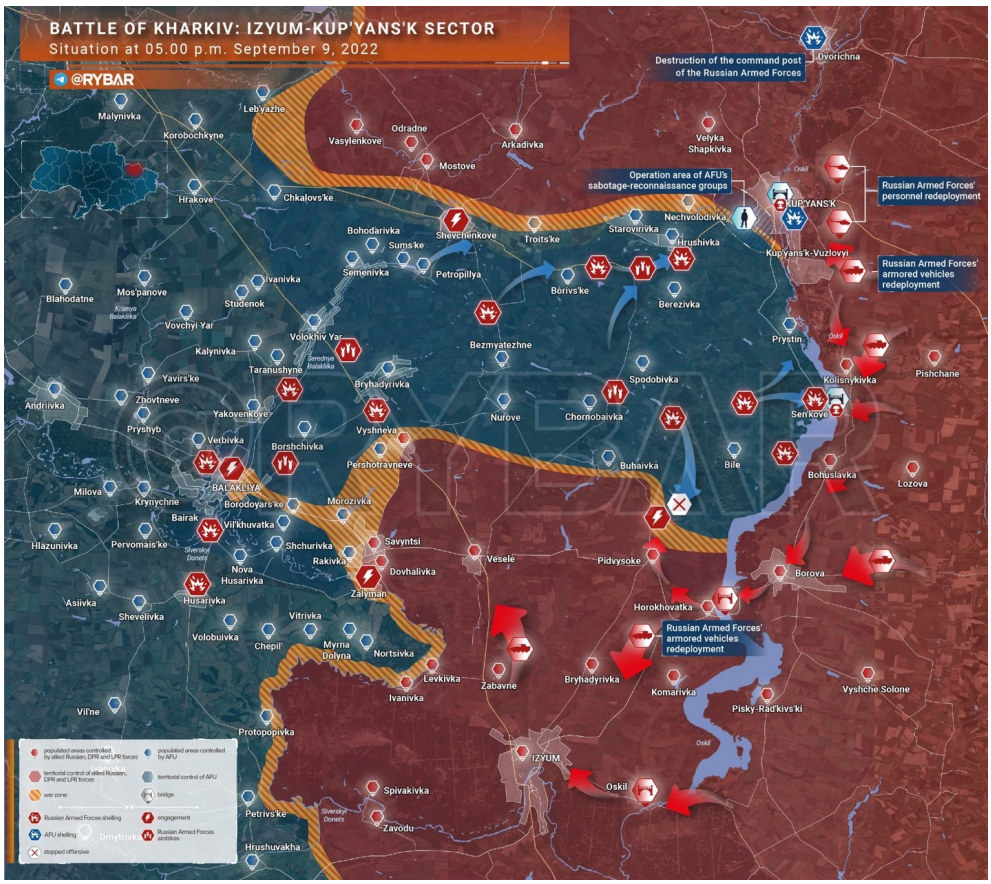



图3：巴拉克列亚–伊久姆反击第四天战线示意图。
乌军控制了奥斯基尔河西岸的库别扬斯克西半城区，但是未能越过河流夺取东半城区。

俄军原本在伊久姆方向的兵力基本依靠奥斯基尔河东岸的铁路和公路进行补给。当乌军已经推进到了河边并切断了陆路运输的时候，伊久姆就会成为前有敌人重兵集团，后有大河，只能依靠两座桥梁提供补给的突出部。而且，向伊久姆输送补给的交通线由于现在必须避开敌人的破袭，需要延长近百公里。如果俄军不想要立即发动反攻，消灭库别扬斯克突出部里的敌人，那么从纯粹的军事意义上讲，俄军在伊久姆停留的能力和意义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反攻第五天，俄军撤出了伊久姆地区，准备沿着奥斯基尔河部署防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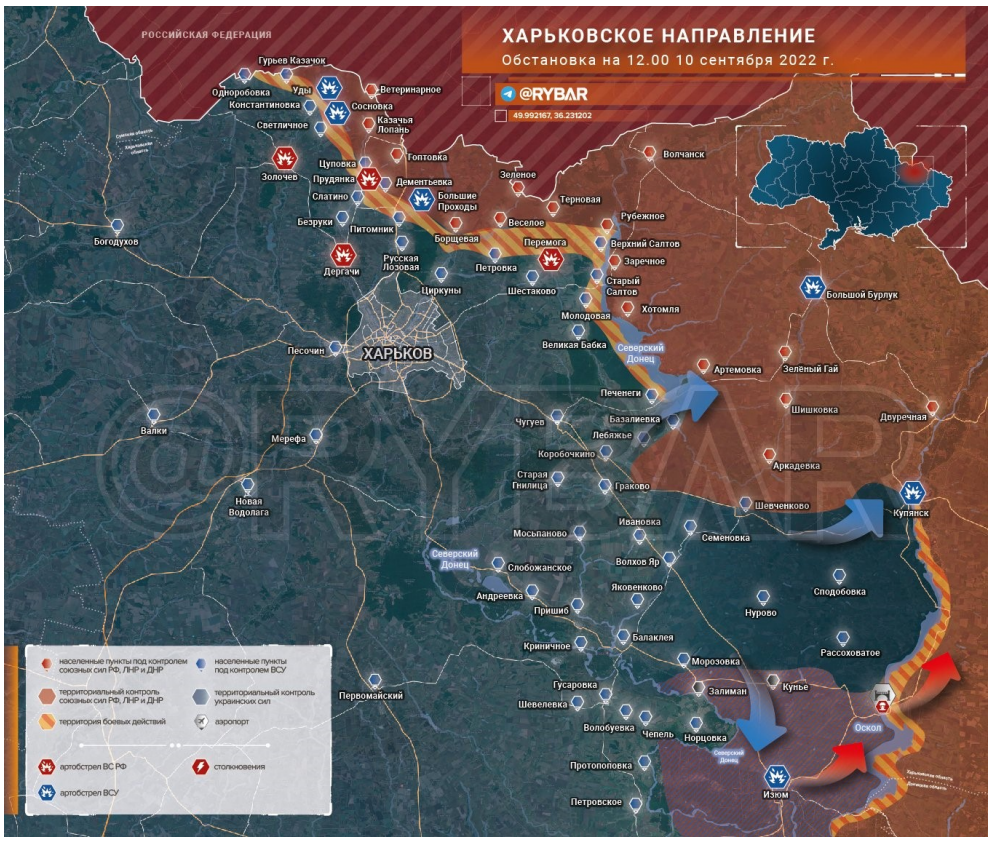



图4: 巴拉克列亚-伊久姆反击第五天战线示意图。紫色部分是俄军撤出的伊久姆地区

至此，乌军取得了巴拉克列亚-伊久姆反击战的战术胜利，这也是开战以来乌军第一次有协同地组织起数个旅对俄军的成功进攻。这说明，作为世界反动政权武力后台的北约，是有能力组织仆从军队进行基本的战役协同的。当然，和南线赫尔松反攻一样，此次反攻没有任何战略意义。俄军丢了巴拉克列亚和伊久姆，只需要撤退到奥斯基尔河东岸，就能够形成乌军攻不破的防线，乌军没能为下一步的进攻创造良好的条件。基辅方面最多增加了一条通往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斯克（顿巴斯核心堡垒）的公路，但是公路仍然在俄军炮火覆盖之下。同时，除了“国民卫队”之类的安全部队，俄军损失很小，没有任何正规军单位被成建制歼灭。出现这一现象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基辅方面只是使用了哈尔科夫集团的机动力量，没有足够的预备队将本次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

乌军在南北两线行动的规模类似，不过其在南线惨败的同时却在北线取得了明显的战果。这说明决定乌军战术反击本身成功与否的，不在其自身，而在俄军方面。俄军在成功拿下了北顿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以后，军事行动方面开始变得“消极”。这自然不是西方文人们所说的“损失巨大”或者“人心思乱”，而是由于俄罗斯在经济和国际政治战场上的进展太过顺利。俄罗斯统治集团一直将军事打击视为完成政治任务的手段，如果能主要通过不流血的方式实现地缘政治目标，又何必舞刀弄枪。在最近几个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所有国家

都出现了通货膨胀、经济衰退、政治分裂、社会动荡，而且如果不与俄罗斯达成妥协，这些灾难是看不到头的。同时，以特朗普运动为代表的，以西方本土无产阶级和小业主为主力的反战运动和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从大战略上讲，俄罗斯成功地把西方帝国主义阵营拖入了他们赢不了的消耗战。只要在军事上大体维持现状，就可以等待西方阵营内部发生重大变化，然后迫使其主动和俄罗斯谈判。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俄罗斯在顿巴斯的进攻开始减缓，甚至整个八月份的工作重心都是在防备乌军在赫尔松的反攻。这就导致了俄军在由于撤军回国而引起整体兵力削弱的背景下，在伊久姆这个次要地区的防御尤其虚弱，给了乌军可乘之机。

从军事上讲，乌军反攻的失地容易夺回。如果俄军组织得当，甚至可以歼灭一部分突入的敌人。但是这次反攻是俄罗斯的一次政治失败。首先，基辅方面向北约宗主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可以换得更慷慨的武器援助，进一步苟延残喘。第二，基辅武装中的纳粹分子和还乡团势必会对重新沦陷地区中的人民群众展开迫害，甚至制造更多如布查屠杀一样的惨案。这会严重伤害顿巴斯人民对俄罗斯的信任，阻碍新解放区乃至老解放区人民与俄罗斯的合作。第三，这会让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但又被新自由主义媒体所包围的群众感到不安乃至无助。第四，为了挽回政治上的失利，俄军可能被迫采取更加激进的策略，进而增加伤亡和风险。

错误已经犯下，这是俄军的战术失败，目前并无发展为战役失败的态势，更不要说改变整个战略态势和国际大战略格局。尽管俄罗斯在军事上没怎么流血，但是在政治上却结结实实地被抹了一脸屎。俄罗斯国内对俄军领导的不满开始抬头，但显然不是西方希望的那种抬头。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民众对俄军“有限战争”的方式开始不满，开始要求进行更大规模的动员甚或是国民经济总动员来彻底打垮敌人。俄罗斯领导层如果不能采取决定性措施收复再次沦陷的地区，那么其权威可能会受到较大的挑战。所有人都需要意识到，当今的西方帝国主义秩序已经不存在“体面退位”的可能性，俄罗斯不可能仅仅通过在一场低烈度的战争中与北约对峙来让对方冷静下来，体面地接受现实。西方帝国主义不会感感佩于任何民族国家为其提供出路，只有通过战场上和国际经济、政治上对其进行坚决打击才能迫使它屈服。如果俄罗斯领导层能够一方面在战场上给基辅方面以较大的打击，另一方面将对乌战争的动员提高到战争初期的水平，他们会在政治上获取较大的机动空间。

当然，基辅方面在伊久姆的反攻是超常发挥。有消息显示基辅当局正在向乌军高层施压，迫使后者将（显然不够用）的预备队投入已经没有什么进展空间的伊久姆战场，来进一步博得西方金主的支持。同时，顿巴斯集团的乌军也可能在

类似的压力下筹备“向亚速海进军”并重新占领马里乌波尔的行动。如果上两则消息属实，那么基辅当局对形势的误判将为俄军提供一雪前耻的机会。

# 俄罗斯资产阶级与西方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远 航 一 号

各位同志，战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尖锐复杂的政治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国家、主要资产阶级以及附庸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上表现为自由派、民族主义、“列宁主义”）又必然动员他们所掌握的一切媒体和宣传机器操纵舆论、欺骗人民、制造烟幕。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政治立场坚定、有经验的观察家也难免在一些问题上做出错误的判断、得出错误的结论。

前几天，我和草庐棋士分别发表了我们对于乌克兰最近在哈尔科夫地区所谓攻势的看法。虽然我们一致认为，乌克兰此次攻势不具备战略意义，俄乌战场的根本战略形势没有改变，俄罗斯可以胜利、美欧帝国主义与乌克兰法西斯当局必然被削弱直至失败的总趋势没有改变，但是，受当时网上一般情绪的影响以及对某些个别评论过于重视，我在我个人的文章中，更多地强调了俄罗斯资产阶级妥协投降的危险。

过去几天，随着更多信息逐渐透露出来，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俄军是在完全主动的条件下撤出伊久姆地区，俄军并没有失去在整个乌克兰战场上的主动权，整个形势依然向着有利于俄罗斯、不利于帝国主义和乌克兰法西斯当局的方向发展。

这样看来，我在9月11日的文章中，可能过多地强调了俄罗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对于其斗争性估计不足或者没有强调（对于其斗争能力和潜力，自战争开始以来，我们始终没有怀疑过）。

下面向各位同志说明一下我的最新感受，其中还有很多不成熟意见，欢迎大家提出批评。

## 俄军放慢进攻步伐：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还是正常的军事调整？

俄罗斯方面在今年四月至六月之间，解放了马里乌波尔、北顿涅茨克、利西昌斯克等重要地区并歼灭了乌军若干个旅的精锐部队后，在七月和八月在乌克兰战场全线放慢了进攻步伐，仅在顿巴斯东线保持战术攻势。与此同时，俄罗斯方面将大批俄军撤回国内休整。

在9月11日的文章中，我猜测，这可能是由于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软弱性发作，普京当局试图故意放慢进攻步伐，以留出同西方之间妥协和谈判的空间。

上述猜测虽然不一定完全错，但是从纯军事角度，对于俄军的上述调整也完全有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在大战之后，俄军主力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整和补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次大战役之后，整个的方面军需要用几个月的时间来休整、补充是很常见的。此外，乌克兰东部夏季茂密的森林也不利于俄军发挥火力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俄军选择在大多数战线转入防御，逐步消耗乌军，待气候条件有利时再发动新的大规模攻势，符合军事常规。

## 乌军哈尔科夫大捷？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况，在过去半年，乌克兰当局将一部分精锐部队送到北约国家（英国、西班牙），在那里装备和训练，并采用北约指挥系统，甚至部分部队由北约军官直接指挥、并招募了大批北约雇佣兵。这些部队，组成了不超过10个旅的机动兵团。

在过去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内，乌克兰当局将这不超过10个旅的机动兵团，兵分两路，又从顿巴斯前线抽调了一部分精锐部队，分别打了赫尔松、哈尔科夫两场进攻性战役。在赫尔松，乌军惨败，一部被俄军包围，目前正在被继续围歼。

在哈尔科夫，西方舆论吹嘘乌军取得大捷，国内亲帝小资“左派”也闻风起舞，跟在洋人屁股后面摇旗呐喊，大做“红色瓜伊多”的黄粱梦。

现在情况已经清楚，俄罗斯方面在几个星期之前甚至更早就已经做出了在哈尔科夫以东、奥斯基尔河以西地区仅做警戒性防御而不做实质性防御的决定。伊久姆地区原有俄军10个营级战术群，在乌军发起哈尔科夫攻势以前，俄军在该地区的兵力已经减少至1个营级战术群。在乌军发起攻势后，在奥斯基尔河以西，几乎没有俄罗斯正规军，仅有准军事武装国民卫队和卢甘斯克人民武装的部队，人数也不多，相对于进攻乌军处于1：5至1：10的劣势。

乌军开始发动攻势后，俄军并没有向奥斯基尔河以西增援，而是将增援部队全部派到奥斯基尔河东岸，在那里建立防线。可见，俄军预定的、进行有效抵抗的防线就在奥斯基尔河。与此同时，在奥斯基尔河以西的俄军做了有组织、有秩序的撤退，没有任何成建制损失。

乌军集中其主力机动兵团，猛扑俄军实际上不设防的地区，没有歼灭俄军任何有意义的有生力量，反而在俄军炮火和航空兵打击下遭受重大损失。有消息说，在哈尔科夫方向，乌军损失了西方援助装备的40%。在赫尔松、哈尔科夫两战中，乌军损失了合计6个旅的兵力。

这些消息如果属实，可能意味着在今后一个时期乌军将没有进行大规模进攻战役的能力（待观察）。

## 俄军兵力不足?

那么，俄军为什么要在奥斯基尔河地区仅做警戒性防御呢？其直接原因，是俄军大部主力回国后，在整个乌克兰战场，仅保有5-10万的正规军，再加上卢甘斯克、顿涅茨克人民武装以及由俄罗斯志愿兵组成的“瓦格纳”兵团，总数可能也就在10万至20万之间。这些兵力，不足以在1000多公里长的战线上处处设防，而只能采取重点设防，同时保持强大预备队、对乌军主攻方向重点反击的办法。

目前争议较大的问题，也是在亲俄罗斯人士内部有激烈争论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俄军不在乌克兰战场投入更多的兵力?

如果按照西方帝国主义、乌克兰法西斯当局、亲帝小资“左派”的欺骗宣传，俄罗斯不能投入更多的兵力，是因为俄罗斯人民厌战反战，导致俄罗斯当局人力资源匮乏，缺少可战之兵。这些，都是无稽之谈。事实是，现在俄罗斯人民爱国热情高涨，许多俄罗斯群众对于战争进程不满，强烈要求实行总动员、消灭乌克兰法西斯。

战前俄罗斯武装力量总数约100万（根据普京总统今年8月分的法令，增加至115万），另有准军事部队100万、预备役200万。俄罗斯的军事资源足以在乌克兰

投入并维持数倍于目前规模的兵力。那么，为什么，俄罗斯方面始终坚持将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限制为“特别军事行动”（未来一个时期是否会升级为“反恐怖主义行动”待观察）并将在乌克兰投入的正规军兵力限制在20万甚至以下呢?

关于这个问题，有几个可能的解释:

1. 普京政府决定，有必要将俄罗斯武装力量的绝大部分保留在国内，引而不发，以准备应对北约帝国主义可能进行的更大规模的冒险，并在与北约全面战争爆发后，给北约帝国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

2. 如果要在乌克兰维持比目前规模要大得多的武装力量，比如一次性增加到50万左右的正规军，如果战争长期化，可能给俄罗斯带来比较大的经济负担，难以持久。

3. 如果大规模增兵后，企图以速决的方式解决在乌克兰的战争，即使能够迅速歼灭乌军主力、占领主要大城市，以俄罗斯现有的力量无法有效管理和占领。还不如坚持现在步步为营的打法，同时将糜烂的乌克兰西部这一大包袱让乌克兰法西斯当局和西方帝国主义继续背着。

4. 普京当局似乎有信心，以现有的兵力规模，以长期消耗的方式，必能拖垮乌克兰法西斯当局和西方帝国主义。

5. 如果俄罗斯统帅部（总参谋部）确有在冬季发动新的大规模攻势的意图，那么，宁可放弃奥斯基尔河以西的次要地区，而不因为乌军的局部攻势（没错，乌军的攻势仅仅是局部的、不具备战略意义的攻势）而动用正在休整、准备投入大规模攻势的主力部队，是符合军事逻辑的。

## 俄罗斯资产阶级有能力、有信心与西方帝国主义斗争

在9月11日的文章中，笔者过多地强调了俄罗斯当局软弱、妥协的危险。现在看来，这样的危险不是那么严重。

这首先是由俄罗斯资产阶级与西方帝国主义根本不可调和的矛盾所决定的。与中国资产阶级充当世界资本主义的制造业出口基地、廉价劳动力供应地因而与美、欧资产阶级利益根本一致不同，俄罗斯是世界主要的能源出口国、军工产品出口国和核武器大国。由于地理原因，俄罗斯资产阶级有能力用它的军事力量直接威胁或干涉对于世界资本主义至关重要的中东地区，而中国资产阶级则完全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

由于这些原因，自苏联解体后，美帝国主义、欧盟帝国主义始终不变的战略方针就是实行北约东扩，在俄罗斯扶植反对派，直至推翻俄罗斯现政权、建立亲

西方傀儡政府，这就与试图发展独立自主国家资本主义的俄罗斯资产阶级发生了尖锐不可调和的矛盾。

其次，俄罗斯资产阶级也有能力、有信心与美、欧帝国主义展开斗争。虽然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力大幅度衰落，但是经过二十多年的普京统治，部分恢复了国力，成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气出口国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在国防工业方面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巩固并加强了自己作为欧亚大陆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

普京，作为俄罗斯资产阶级的领袖，是当今世界舞台上少有的优秀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他审时度势，准确地把握美国霸权尚未崩溃但将要崩溃的历史时机，在关键时刻，敢于倾全国之力，与美、欧帝国主义展开决定世界命运的决战。

另一方面，随着美、欧帝国主义的衰落，其头面人物日益昏庸无能，既无法为了国际资本主义的长远利益协调内部矛盾，也无法对俄罗斯资产阶级做出必要而合理的让步。相反，他们的总统、总理、外交家们无知而狂妄自大，至今还在幻想逼迫俄罗斯无条件投降。这就使得俄罗斯资产阶级内部的投降势力，即使想要向西方投降，也无法说服本阶级的其他伙伴以及普京政权向西方缴械。

死亡属于帝国主义和法西斯！胜利属于俄罗斯和世界人民！

从目前战场上的实际情况来看，俄罗斯方面至少有能力在乌克兰战场经常维持20万左右的兵力（10万正规军+10万非正规军），并在发动大规模攻势作战时将总兵力增加到30万或以上。

在俄军于乌克兰战场的总兵力保持在20万左右的情况下，俄军有能力在大约1000公里长的战线上以机动防御方式防守战线、发动战术甚至战役攻势并大量消耗乌军。即使在乌军所谓的哈尔科夫攻势之后，凡是在俄军决定进行有效防守的地段，俄军都有能力击退乌军并给与打击。此外，目前俄军和顿涅茨克人民武装正在顿巴斯东线多处发动战术进攻（有可能发展为战役进攻）。

俄军的防守和消耗已经给乌军带来重大损失，从战争开始到现在，乌军的伤亡总数可能已经在20万以上，乌军正规军已经损失27个旅。

战前乌克兰法西斯当局实际控制区的人口，可能仅有3000万左右、兵役年龄男性人口约800万。战争开始后，有大量人口逃亡，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子弟以各种方式逃避兵役，还必须有一部分男性工人从事后方生产。乌克兰当局累计动员兵力已经达到120万，目前妄图大量征召女兵，很可能已经接近动员的上限。战争开始以来，乌军每月伤亡约3万；如果持续一年，伤亡总数就会接近40万；如果战争持续两年，乌军就将失去累计动员兵力的三分之二。

以乌军正规军来说，战前乌军连炮兵旅在内成建制部队约50个旅。战争开始以来，乌军平均每个月损失3-4个旅。假设西方平均每个月为乌军装备、训练一个

半旅，则乌军平均每个月净损失两个旅。按照这个速度，只要战争进行两年，乌军的正规军成编制部队就将消耗殆尽。即使到时乌克兰法西斯当局继续搜罗炮灰，也没有军官来充当指挥。

西方帝国主义能够给乌克兰提供的武器弹药也不是无限的。俄乌战争的规模之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概仅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可以与之相比。自苏联解体后，美国经济去工业化、军火工业萎缩。美帝国主义多年来热衷于倚赖绝对优势武力欺负个把极端贫弱的第三世界国家，已经不具备打大规模工业化战争的能力。

有资料说，仅俄乌战争两个星期的炮弹消耗就超过美国一年的炮弹生产能力。在战争初期被吹上天的毒刺式防空导弹，开战大约一个月后，美国的库存就已经严重不足（剩下的库存不足以应付在世界其它地区可能爆发的新的大规模冲突）。事实上，最近几个月，西方平均每个月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弹药已经比开战初期显著减少。战争长期进行下去，不仅乌克兰会被“去军事化”，北约帝国主义也将在事实上丧失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能力。

与之相反，俄罗斯到目前为止仅动用了其全部武装力量和准军事部队的约十分之一。虽然俄军也有伤亡，但伤亡总数不到乌军的五分之一，甚至只有十分之一。俄军没有遭受任何成建制的损失。战争进行到现在，甚至没有乌军歼灭俄军一个连、一个排的报道。这意味着俄军的军官队伍基本完整，而俄军的士兵伤亡可以通过留在国内的正规军、准军事部队、预备役、志愿兵随时得到补充。假如俄军每年伤亡4万，战争进行三年，累计伤亡12万；这样的伤亡，相对于俄罗斯巨大的军事资源、人力资源以及人民群众坚定的战争意志，也完全能够承受。

经济上，俄罗斯已经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目前经济稳定、物价下跌、货币升值，有能力支持长期战争。而西方帝国主义目前已经进入经济衰退的初期，在即将来临的冬季有可能遭到有史以来最严重能源危机的沉重打击，将面临工业崩溃、大规模失业的窘境。美、欧帝国主义企图一意孤行，拼命维持乌克兰法西斯当局，就不得不冒国内阶级矛盾急剧尖锐化、资产阶级统治动摇的危险。

综上所述，综合过去几天各方面的消息，笔者认为：乌军在北约帝国主义策划下、在哈尔科夫以东地区所发动的所谓攻势，在付出重大代价以后，虽然一度达到欺骗世界舆论的效果，并没有任何重要的战略意义。俄军通过在战线的大部分地区实行机动防御结合重点地段战术加战役进攻的方式来长期消耗乌军、消耗北约帝国主义，直至力量对比对己方发生决定性有利变化的策略仍然是奏效的。

俄罗斯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目前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动机向西方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头面人物的昏聩，西方帝国主义也无法开出对俄罗斯资产阶级来说有诱惑力的投降条件。

战争只要打下去，俄罗斯有把握解放全部顿巴斯地区，从而实现战争的最低目标。俄罗斯还将有很大的可能，消灭乌克兰法西斯军队的主力，瓦解乌克兰法西斯当局的统治，并解放第聂伯河以东以及黑海沿岸的广大地区，从而实现战争的更高一级目标。

随着欧洲帝国主义内部经济和政治危机的不断加深，欧洲政局可能在未来若干年最终发生重大变化，甚至导致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动摇、北约解体，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形势将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总之，我们已经进入了美帝霸权总崩溃的时代。让我们冷静观察、拭目以待，准备迎接伟大斗争的考验！

# 为什么俄罗斯必将取得反美帝、解放乌克兰东南部战争的最后胜利?

远 航 一 号

还在俄乌战争之初，红色中国网编辑部的同志就已经指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客观上极大地加深了美帝霸权和欧洲资本主义的危机，标志着美帝霸权崩溃的开始。随着战争的进行，随着美帝和欧洲资产阶级孤注一掷地向乌克兰傀儡当局提供军事、经济和情报援助，随着俄罗斯人民的觉醒以及广大亚非拉人民逐渐地团结在俄罗斯周围，也随着俄罗斯资产阶级在形势逼迫下逐渐下定反美帝及与西方决裂的决心，这场战争日益鲜明地表现出反美帝、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五百年来在世界人民头上压迫和统治的性质，因而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已经带有正义的和解放的性质。[43]

自战争开始以来，俄军及新解放地区的人民武装共同作战，已经歼灭了10万以上的乌克兰傀儡军队，乌军毙伤俘总数在20万以上。乌军有生力量被大量歼灭以后，只有依靠美国和北约帝国主义的扶植才能将战争继续打下去。在过去大约半年时间中，在北约的训练营地中，帮助乌克兰傀儡当局，训练和装备了10个旅以上的“精锐部队”，并补充了一批北约雇佣兵。美欧帝国主义搜刮了其现有的武器弹药库存，向乌克兰傀儡当局提供了大批美式和苏式武器装备。在乌克兰战场上，现在是由北约帝国主义出钱出枪、出雇佣兵，由乌克兰傀儡当局出炮灰，与俄罗斯和新解放地区的人民作战。

43. 上述看法，是我个人目前对战争性质的新认识，尚未与编辑部的其他同志商量过。但我相信，编辑部的其他同志会赞同我的这一估计。——远航一号

自9月初以来，乌克兰傀儡当局分别在赫尔松以北以西以及哈尔科夫以东地区发动大规模攻势。在付出重大伤亡和装备损失以后，乌军在哈尔科夫以东地区占领了伊久姆、红利曼等战略要点，进犯到奥斯基尔河以东，开始威胁卢甘斯克。此外，近日乌军又占领了赫尔松以北的一块地方。

乌军在付出重大损失以后侥幸取得了一些“胜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俄乌战场的战略态势和力量对比。但是，西方资产阶级媒体趁机兴风作浪，大肆宣扬乌克兰节节胜利、俄罗斯即将“总崩溃”。中国的自由派分子以及亲帝“左派”分子忙不迭地跟在帝国主义媒体屁股后面弹冠相庆，自不必说。中国资产阶级出于其自身的利益，幻想恢复到“天下太平”的好时光，趁机煽动小资产阶级反动民族主义分子，鼓吹俄罗斯就要败了、打不赢了，只有靠中国资产阶级出来调解了。

国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反俄大合唱，在出于朴素的阶级和反帝本能而支持俄罗斯的一般群众中也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近日，不断有网友在红色中国网上发表评论或转发文章，提出质疑：俄罗斯到底还能不能打?

正如我们编辑部的井冈山卫士同志在一个跟帖中所说：“目前国际资产阶级在中文媒体和自媒体上发动了前所未有的扭曲、污蔑俄罗斯的动员，力度远超过战争初期。这也是进入九月中旬以来为何很多有正确认识的同志对战争前景感到悲观的原因。历史规律不会被媒体打垮，同志们要有韧性，有定力。”[44]

那么，乌克兰傀儡当局最近进行的“反攻”是否就预示着乌克兰将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俄罗斯必然惨败、普京政权即将垮台呢?

我们首先从乌克兰傀儡当局以及北约帝国主义的角度评估一下当前的战争形势。乌克兰傀儡当局最近的“反攻”是占领了一些地方，但是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按照俄罗斯方面公布的数据，到目前为止，乌军遭到的不可挽回性损失（阵亡和重伤）已经达到10万以上；此外，俄军在马里乌波尔、利西昌斯克等地区俘虏了一万以上的乌军官兵。按照西方独立的军事评论家的分析，乌军平均每天伤亡近1000人、每月伤亡总数两万至三万人。综合俄罗斯方面的战报、西方媒体的报道，西方独立军事评论家认为，目前在战场上俄、乌双方的伤亡交换比大约为一比五甚至更加悬殊。

44. http://www.redchinacn.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992&extra=&page=2

根据上述信息，让我们先来评估一下，乌克兰傀儡当局有没有可能达成其战争的“最高目标”，将新解放地区的俄军全部驱逐出去，收复自战争开始以来的全部失地，甚至占领克里米亚？显然，即使不考虑俄罗斯新动员的军队，如果不将目前已经部署在新解放地区的俄军及人民武装大部消灭，乌克兰傀儡当局的上述目标是不可能得逞的。

综合各方面了解的情况，乌克兰目前全军（包括正规军和后方地方武装）保持在大约60万，其中一线作战部队大约30万；考虑到乌军已经付出了大约20万的伤亡代价，意味着乌克兰傀儡当局自战争开始以来已经累计动员了80万以上。

俄罗斯方面，目前在已解放地区部署了大约10万正规军、10万当地人民武装，共20万兵力。如果要将这20万俄军全部“消灭”，按照上述一比五的交换比，乌军必须准备付出高达100万的伤亡代价。这超出了乌克兰傀儡当局到目前为止动员的总兵力。

当然，如果不考虑俄军增加兵力的情况，乌克兰傀儡当局未必需要全部“消灭”已解放地区的俄军才能达到将俄军驱逐出去的目的。根据一般军事常规，如果乌克兰傀儡当局能够“消灭”已解放地区俄军的大约三分之一，即6～7万人，如果再假设这些俄军得不到补充，那么，已解放地区的俄军可能发生崩溃，从而被迫放弃全部已解放地区。然而，仍然按照一比五的交换比，为了消灭三分之一的已解放地区俄军，乌克兰傀儡当局必须准备付出30-35万的伤亡代价，这相当于乌军全部一线兵力。显然，这也是乌克兰傀儡当局做不到的。所以，所谓乌克兰傀儡当局可以打垮俄军、收复全部失地的叫嚣，完全是痴心妄想。

如果说，乌克兰傀儡当局不可能取得什么“全胜”？在俄军完成了局部动员以后，战争是否会出现某种僵局，在接近现有战线的地方大致稳定下来，最后迫使俄罗斯当局忍气吞声、屈辱求和呢？

前两天，西红柿收割机网友转发了知乎上的一篇文章，大致反映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看法。这篇文章说：“俄军现在这种被动挨打的处境也很好理解，原因就是兵力不足。越南战争时期，面对越南狭长的国土和以游击队为主的越南南部解放阵线，美军最高峰出兵将近60万，还有账面上百万南越仆从军的配合；海湾战争中，美军出兵40万以上，整个多国部队超过70万，而战线仅限于科威特和伊拉克南部地区。苏联面对比乌克兰小得多的捷克斯洛伐克，也出动了50万大军。而面对乌克兰的上千公里战线，俄军居然只投入了十万出头的正规军和十万左右仆从军 … 这二十万人在半年多的战争后，同样状态堪忧，很多力量都只是纸面上的。以至于乌军整体兵力是俄军的三倍以上，关键战线甚至是五倍以上，乌军可以多点全面进攻，每一个点都是实打实的优势兵力，而俄军防线则

处处是缺口，也缺少预备队支援，导致一个点的崩溃，带来整条线的崩溃。这一局面在俄军动员部队到位并且形成战斗力之前是无法改变的。俄军现在的处境是一步迟，步步迟。如果2月份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就动员，俄军完全能以泰山压顶之势全灭乌克兰；如果在4月从基辅撤军时开始动员，也可以逐渐磨掉东南线的乌军，少则吃下顿巴斯，多则拿下整个乌东。现在动员30万部队估计只够勉强填线，至于动员100万大军并形成战斗力，不看好俄罗斯的国家机器能执行好这一任务。”

按照上面这篇文章作者的看法，俄军即使在动员了30万兵力以后，能守住现有的战线、保住已解放地区不失就已经不错了，根本没有达成俄罗斯最初战略目标的任何希望。

俄乌战争要在现有战线附近大致稳定下来、形成僵局，并且不再发生重大变化，其大前提，是战争双方都大致接受目前的军事和政治后果，并决定不再将战争打下去，或者至少将战争的烈度大大降低。

应当说，在战争之初，俄罗斯资产阶级并没有完全放弃与西方妥协的希望。战争一开始，俄军就兵临基辅城下，其真实目的并非为了打下基辅，而是幻想可以以战促和。到了三月底，俄乌双方曾经一度接近达成停战协议。然而，乌克兰傀儡当局在接到了美英帝国主义的指令以后撕毁了已经达成的协议。

最近，美帝国主义又破坏了北溪天然气管道，这就断绝了欧洲资产阶级在近期与俄罗斯资产阶级达成妥协的一切可能性。随着战争的进行，以普京为首的俄罗斯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俄罗斯人民逐渐认识到，美欧帝国主义不仅不想与俄罗斯资产阶级妥协，而且始终没有放弃其肢解俄罗斯、消灭俄罗斯国家和民族同时置普京当局于死地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资产阶级已经失去了与美欧帝国主义妥协的退路，不得不动员一切潜力奋起一战。俄罗斯资产阶级反对美欧帝国主义的斗争，符合广大俄罗斯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在国内有广泛的政治支持；符合广大亚非拉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在国际上也逐渐形成得道多助的有利局面。在军事上，俄罗斯当局已经做出了局部动员的部署，除了正式动员的30万人以外，还得到了7万志愿人员的补充。在经济上，除了已经大大减少了向欧洲的天然气供应以外，俄罗斯又与欧佩克国家合作，准备显著减少石油产量，给美欧帝国主义经济以沉重打击。

那么，如果战争一直进行下去，以俄罗斯已经部署在新解放地区的兵力加上新动员的兵力，是否如上述文章所说，“只够勉强填线”，而没有力量将战争打到彻底胜利呢?

乌克兰傀儡当局虽然在过去一段时间付出惨重代价后占领了一些地方，但是，乌克兰傀儡当局能够动员的人力、北约帝国主义当局能够供给的物力并非无限的。

乌克兰傀儡当局实际控制区的人口约3000万，其中兵役年龄男性约750万。考虑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逃避兵役、人口逃亡、后方生产和维持秩序的限制等，乌克兰最大累计动员极限不会超过500万（二战期间，苏联累计动员3000多万，约为战前男性人口的三分之一）。俄军并不需要将这500万人全部消灭才能取得战争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在东线战场累计投入兵力约1400万，累计阵亡约350万，最终战败。照此计算，当乌军无可挽回的损失达到其累计动员潜力约三分之一时，乌军必然总崩溃。所以，如果战争一直打下去，当俄军消灭乌军总数达到约170万时，即可取得胜利。

俄军现在平均每月给乌军造成大约两万的不可挽回损失（击毙、重伤和俘虏），如果战争进行一年，即给乌军造成约25万不可挽回的损失。照此计算，如果战争一直打下去，乌克兰傀儡当局最多可以支持六至七年，此后必然战败。

那么，俄罗斯方面能够将战争支持六至七年吗？俄罗斯在已解放地区现有兵力约20万，目前正在完成对30万人的动员，另有新增加志愿兵约7万，累计投入兵力很快将接近60万人。按照一比五的交换比，要消灭170万乌军，俄军需要付出的累计伤亡代价为30多万，仅相当于俄军现有和即将投入兵力的一半多。更不必说，如果战争进行六、七年，俄军可以逐步补充战场伤亡。如果在七年的战争中，俄军需要累计补充35万的伤亡，那么平均每年只需要补充5万的伤亡，相对于俄罗斯潜在可以动员的2500万兵役资源，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俄罗斯不仅可以动员本土的兵役资源，而且随着战争的进行，还可以逐步动员已解放地区的人民武装参加战争。克里米亚和新解放地区的人口约1000万（其中克里米亚约300万、顿巴斯地区约600万）、兵役年龄男性约250万。有了俄罗斯本土在经济上的大力支援，克里米亚和新解放地区的兵役年龄男性可以不受后方生产需要的限制全面动员起来，参加解放战争。如果克里米亚和新解放地区的兵役年龄男性全部动员参加战争，那么按照一比五的交换比，可以累计消灭1250万的乌克兰傀儡军队。即使克里米亚和新解放地区累计动员规模达到100万，也足以累计消灭500万乌克兰傀儡军队，从而消灭乌克兰傀儡当局的全部战争潜力。

那么，战争是否真的会打六、七年呢？这取决于北约帝国主义能够给乌克兰傀儡当局提供的物质和军事援助还能维持多久。与很多纸上谈兵的“军迷”以及亲帝“左派”所想象的所谓“源源不断”的西方“先进”武器相反，由于连续多年的去工业化、生产外包，美欧帝国主义已经失去了进行大规模工业化战争的能力；美国一年的炮弹产量大约只够维持乌克兰战场上两个星期的消耗。

在大量消耗现有库存以后，美欧帝国主义能够继续向乌克兰傀儡当局提供武器弹药的能力正在逐步枯竭。以美帝国主义最新许诺要提供给乌克兰傀儡当局的一批武器弹药为例：美国许诺向乌克兰新提供4门海马斯式火箭炮，而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的16门海马斯式火箭炮中超过半数已经被击毁；美国许诺向乌克兰新提供16门155毫米榴弹炮，而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的126门155毫米榴弹炮中大多数已经被击毁；美国许诺向乌克兰提供75000发155毫米榴弹炮弹，这些炮弹还不够乌克兰打两个星期；美国许诺向乌克兰提供20万发轻武器子弹，这些子弹还不够1000人（大约一个加强营）在战斗中打一天。也就是说，美欧帝国主义目前能够向乌克兰傀儡当局提供的武器弹药补充，已经不足以弥补乌军在战场上的损失。

相比之下，俄军弹药充足，每天发射约6万发炮弹，相当于乌军炮弹消耗量的10倍。据亲乌克兰的西方分析家分析，在俄罗斯战前已有的炮弹库存被消耗完以前，俄军现有的炮弹消耗强度至少还可以维持半年。俄罗斯战前平均每年生产炮弹20多万吨，其军火工业经初步动员后可望每年生产炮弹约50万吨，大约相当于炮弹700万发，足以维持大约平均每天两万发的发射量，相对于乌军现有的炮弹消耗量仍有三比一的优势（而如上所述，乌军现有的炮弹消耗量已经难以为继）。如果俄罗斯对工业潜力做进一步的动员，将炮弹生产经费提高到大约每年3万亿卢布（相当于俄罗斯战前国内生产总值的2%），那么几乎可以无限期地维持大约每天6万发的炮弹消耗量。

如上所述，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俄罗斯资产阶级已经逐步确立了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决心。只要战争打下去，无论在人力和物力方面，俄罗斯资产阶级可以动员的战争潜力都远远超过乌克兰傀儡当局可以动员的兵力资源以及北约帝国主义可以提供的战争物力资源。随着乌军无法再维持其现有的武器弹药消耗水平，随着乌军能够拼凑起来的“精锐部队”消耗殆尽，或者最终随着乌军能够有效动员的兵力资源消耗殆尽，战争进行到一定时期，乌军的作战能力必然陷入总崩溃。到那时，俄军和新解放地区的人民武装将不仅能够完全解放卢甘斯克、顿涅茨克、扎巴罗热、赫尔松四个州，而且可望进一步解放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广大地区，直至打倒乌克兰傀儡政权，造成北约帝国主义在欧洲的空前失败。

不仅如此，西方资本主义本来已有的经济和政治矛盾因为俄乌战争而全面激化，一场全球资本主义大危机即将来临，饱受美欧资产阶级压迫和欺骗的欧洲劳动人民正在逐步觉醒。随着乌克兰傀儡当局溃败的真相昭然于天下，越来越多的欧洲劳动群众将从美欧资产阶级的欺骗宣传中摆脱出来，开展大规模的斗争，直

至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到那时，整个西方帝国主义五百年来对亚非拉人民的统治也就土崩瓦解了。

# 简评俄军撤离赫尔松及俄乌战争的胜败

远 航 一 号

俄罗斯时间昨晚，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声明，为了避免军人与平民不必要的牺牲，决定将俄军暂时撤离赫尔松市，在第聂伯河左岸（东岸）重新组织防线。有网友问：你们支持的俄罗斯已经失败了，红色中国网还要打肿脸充胖子吗?

俄乌战争到目前为止进行了八个多月时间；俄军是在有计划有组织地疏散平民并击退乌军进攻后完整地、有秩序地撤离赫尔松的，留给乌克兰匪徒的将是一座空城。当年解放战争进行到九个月的时候，蒋胡匪军侥幸占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占据了一座空城。那个时候，国内外的“有识之士”、“文明人士”中，想必也有不少人对着中国共产党人说，你看，你们的延安都丢了，你们还要打肿脸充胖子吗?

战争，是阶级斗争最尖锐、最复杂的形式。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发展，是分几个阶段的。某一个阶段的“失败”、退却往往是下一个阶段胜利与前进的前奏。熟读战争史的人，对于这些变化与转折的情形，应当是不会陌生的。

关于俄乌战争总的态势及胜负前途，我们红色中国网已经多次做过分析。这里再简单地概述一下。在乌克兰傀儡当局方面，其战争潜力，一是靠强迫乌克兰人民充当炮灰，二是靠美欧帝国主义提供武器弹药支援。由于美欧帝国主义长期去工业化，其所能提供的武器弹药库存正在逐步枯竭，尤其是适合乌克兰战场的

苏式武器弹药已经基本枯竭，每月能够拼凑起来援助乌克兰傀儡当局的武器弹药正在逐步减少。而在兵员方面，我们原来估计，乌克兰傀儡当局可以掌握的兵役年龄男性也许达到750万。现在看来，由于战争后乌克兰当局失去了一部分领土以及人口大量逃亡，其控制区的兵役年龄男性大概不会超过500万。如果乌克兰傀儡当局实际上能动员全部兵役年龄男性的一半，即250万，当其中约三分之一即80万左右被消灭时，乌克兰的军事力量很可能就会发生崩溃。战争进行到现在，乌军伤亡总数可能已经达到30万。如果战争持续下去，即使不考虑俄军发动大规模攻势的情况，乌军是否还能坚持一年至一年半，都很成问题。

在俄罗斯方面，在完成局部动员并将相关兵力部署到战场后，俄军在乌克兰及周边的总兵力将达到约50万。俄军的武器装备几乎完全可以自给，军火工业强大，弹药供应源源不绝。俄军与乌军的伤亡比约为1：5。仅靠俄军即将部署到乌克兰战场的50万兵力，就足以交换乌克兰方面250万的伤亡。俄罗斯还有更加广大的兵力资源作为后备。俄罗斯国内人民爱国热情高涨，经济稳定，充分具备将战争长期打下去的条件。

自九月份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全境发动了长时期的、大规模的空袭，已经严重破坏了乌克兰的能源系统。这样的空袭再进行一至两个月，乌克兰能源系统及其经济就可能完全崩溃。目前俄罗斯、乌克兰地区还处于秋冬之交的雨季，不适宜发动大规模攻势。一旦冬季完全来临，地面形成坚硬的冻土，俄罗斯的机械化部队即可发动新的大规模攻势。

正是因为认识到，一旦俄罗斯发动大规模攻势，乌克兰傀儡当局以及整个北约帝国主义的战败都将无法避免，美帝国主义的最高决策部门急于寻找某种“体面”结束战争的方式。此前几天，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俄罗斯国家安全顾问联络，警告俄罗斯不要发动冬季攻势，否则，由4万美军、3万波兰军队、2万罗马尼亚军队组成的北约联军将直接进入乌克兰。作为交换条件，沙利文建议按照下述条件媾和：俄罗斯让出赫尔松，美国可以同意俄罗斯保留其已经占领的其它地方。

我们目前还无法完全知道俄罗斯资产阶级是否因为畏惧与北约直接对抗而被迫同意沙利文提出的媾和条件，并预先让出赫尔松以示谋和“诚意”。我们知道，俄罗斯资产阶级也是一个半外围国家的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软弱性、动摇性，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其投降的可能性。下个星期，各个主要资产阶级国家的首脑将举行所谓的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如果普京当局决定让步投降，有可能在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上与相关国家达成一个协议。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密切观察、拭目以待。

若干年来，我们红色中国网一向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将我们的分析与认识诚实地与各位网友分享，接受各位网友的批评。毫无疑问，无论是远航一号、井冈山卫士还是草庐棋士，都是凡夫俗子，不可能不犯错误。如果普京当局在未来数周果然妥协投降，那么我们愿意诚恳地反思我们以往的一些分析，向各位网友承认错误。

但是，眼下，综合各方面情况，我们还是要说，普京当局投降的可能性不大。

首先，如果普京当局投降，将遭到俄罗斯广大爱国群众的坚决反对，普京当局自身能否维持下去，也会成为问题。更主要的，即使普京当局现在向西方帝国主义屈膝投降，西方帝国主义也不会放过普京当局。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在1999年抵抗北约侵略失败后被迫接受屈辱的停战条件，后来仍然被西方策划“颜色革命”推翻，还将米洛舍维奇送到海牙审判。这一殷鉴并不遥远。

此外，赫尔松地区经过公民投票以后，已经成为俄罗斯的联邦主体。普京当局如果擅自放弃国土，而不谋收复，不仅政治上极其被动，还会有法律上的困难。

而在美欧帝国主义、乌克兰傀儡当局方面，意见也不统一。俄罗斯方面发表声明准备暂时撤离赫尔松以后，泽连斯基马上声称，不准备与俄罗斯谈判。泽连斯基的这一狂妄立场，既可能是被内部法西斯分子胁迫的结果，也可能是有美帝国主义内部更加狂妄的国务院（相当于美国的外交部）布林肯、纽兰等人撑腰的结果。

反之，如果俄罗斯资产阶级下决心斗争到底，不仅完全有把握打败乌克兰傀儡当局，以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应该也完全有把握打败大约10万北约侵略军。而在北约方面，由于长期去工业化，是否有能力支撑长期的、大规模常规战争，将是个严重的问题。由于战场是在欧洲，欧洲人民将强烈反对北约直接军事干预，欧洲资产阶级也会离心离德。

如果说，俄军撤离赫尔松，不是为了迎合与美帝谈判的需要，那么是什么原因呢？从纯粹军事观点看，俄军在自己一方发动大规模的冬季攻势以前继续坚守赫尔松地区有一定的不利。由于乌克兰傀儡当局集结大量兵力围攻赫尔松，俄军要有效防守赫尔松需要在第聂伯河右岸（西岸）保持大量兵力。据悉，在撤军前，俄军在赫尔松地区的兵力已经达到约3万。而要向3万大军提供充分的弹药和后勤补给，需要通畅的补给通道。但是，第聂伯河上的大桥已经被乌军破坏，依靠浮桥提供补给数量有限且不稳定。最近，乌军又开始破坏第聂伯河上游的大坝。一旦大坝被严重损坏，由此引起的洪水有可能淹没赫尔松市区。在这样的危险形势下，为避免第聂伯河右岸的俄军被困，及时主动撤离，是符合军事逻辑

的。敢于担当政治上的不利影响，而做出军事上必要的决策，也是合格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必须具备的一项素质。

乌克兰傀儡当局即使侥幸占领了赫尔松，决定俄乌双方力量对比及战争胜败的各项基本要素并没有改变，而且随着乌军伤亡增加、能源和经济系统崩溃，还会继续向对俄罗斯有利的方向变化。

目前，我们不改变对战争进程及结果的基本估计。只要俄罗斯资产阶级在俄罗斯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下决心，将反对美帝和乌克兰傀儡当局的战争进行到底，就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

# 经　　济

# 中国经济何时将被美国反超?

远 航 一 号

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前途如何？资本主义中国能不能取得相对于美国的压倒优势，进而确立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霸权？这些问题，对于未来中国的阶级斗争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前途，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看来，目前的世界形势属于“东升西降”，“时与势都在我们一边”。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也跟着摇旗呐喊。比如这篇署名“栩然”的文章：“中国未来会不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45]，肉麻地吹捧中国资本主义的增长“成就”：“中国的高速发展，连我们自己都想不到”，“中国这么大体量，一直保持着高速发展、稳定增长，这是多么可怕的力量”。虽然作者终归是少不了中国特色民族主义者特有的阿Q：据说，美国“重新调查新冠起源，起诉孟晚舟，新疆棉花，台湾合作之类的”，都是为了“把水搅浑，最终，是转移你的注意力，让你进入他的埋伏圈里来”，骗中国“上当”，不再“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但是，放心好了，中国有“成熟的政治家”，通过“三胎政策、双减政策，整顿金融业、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包括整顿饭圈文化/娱乐圈乱象等等”，已经练好了“内功”；“一带一路”的伟大计划更是代表中国的“主力”已经打到“外线”。所以，结论仍然是，“我们这一代人，将何其有幸，亲眼见证伟大复兴的到来，亲眼看到中国在时隔数百年后，重新回到世界巅峰”，“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45. https://youwuqiong.top/537283.html

另一方面，国际上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则从他们的立场观点出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表示悲观。比如，设在伦敦的“资本经济学”咨询公司就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未来将大幅度下降，至2030年下降到2%左右。到那时，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不会超过美国；在最好情况下，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的中国经济规模也许会短暂地超过美国，然后再被美国反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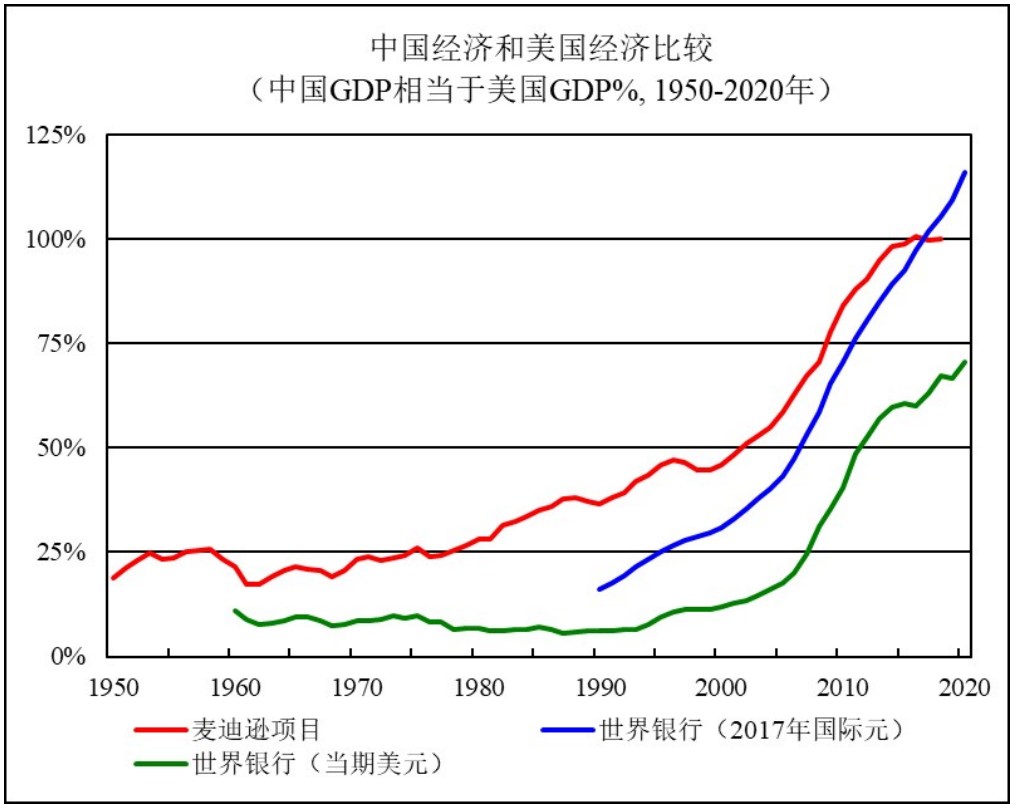
这两种对于中国经济前途的估计，到底哪一种比较接近未来可能发生的实际情况呢？在接下来的几篇文章中，笔者打算从统计分析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在运动规律等角度来探讨这一重要问题，并在这一系列的最后一篇中评估一下中国经济在一度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以后何时又被美国反超的问题。

首先要说明的是，在对不同国家的经济进行比较时，需要将各个国家的货币单位换算为统一的计价单位。目前，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市场汇率。比如，目前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大约是6.4元人民币兑换一美元。只要我们知道中国按照人民币计价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除以6.4，就可以得出中国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出来的以美元计价的国内生产总值，然后就可以与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做比较了。2020年，中国按照人民币计价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02万亿元，按照当年汇率折算是14.7万亿美元。

上述方法简便易行。但是，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也有缺点。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服务业价格常常要比“发达国家”低很多（主要是由于前者的工资水平低下），同样是一美元（或者是一美元可以换到的当地货币），在“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上往往平均要比在“发达国家”的国内市场上有更大的购买力。这样，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往往不能正确反映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实际上所代表的购买力，一般会低估“发展中国家”的真实生产水平。

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目前一单位美元在美国国内市场上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4元人民币在中国国内市场上的购买力。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24.3万亿美元（也叫24.3万亿“国际元”）。

下面的图分别比较了按照几种不同方法计算的中国经济相对于美国经济的规模。




图中，绿线是来自于世界银行按照当期美元（即当年的市场汇率）计算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按照这种算法，1960年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美国的11%；到了1990年，只相当于美国的6%；但是到了2020年，已经增加到了美国的70%。

图中的蓝线是来自于世界银行按照2017年不变国际元计算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所谓“不变国际元”是一种购买力平价法的计价单位。一单位2017年不变国际元在理论上与2017年的一单位美元在美国国内市场上有同等购买力。按照这种算法，1990年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美国的16%；到了2017年，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总量超过了美国；到了20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美国的116%。

图中的红线来自于麦迪逊项目的按照2011年不变国际元计算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麦迪逊项目是国际上权威的对世界各国的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进行长期比较的统计分析机构。按照麦迪逊项目的计算，1950年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美国的19%；到了1990年，中国的国内生

产总值相当于美国的37%；到了2016年，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总量第一次超过美国；2017年和201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与美国几乎完全相当。

这几种不同的算法所得出的结果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差别呢？关于市场汇率计算法与购买力平价计算法之间的差别，上面已经做了简单介绍。麦迪逊项目所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与世界银行按照2017年不变国际元所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都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法，为什么也有很大的差别呢？

目前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法国际比较项目以2017年为基年。就是说，世界银行对2017年世界各国各种商品和劳务的物价水平进行调查以后计算各国货币的购买力平价换算比例，再以此为基础计算各国在2017年的购买力平价国内生产总值。所以，世界银行按照购买力平价法所计算的2017年的各国国内生产总值是相对准确的。无论是按照世界银行的计算还是按照麦迪逊项目的计算，在2017年前后，中国的经济总量与美国的经济总量大致相当。问题主要在于2017年之前和之后的年份。

世界银行所提供的按照2017年不变国际元计算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是以用上述方法得出的201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起点，然后用官方的经济增长率分别推算此前和此后年份的国内生产总值。而麦迪逊项目的按照2011年不变国际元计算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是以中国官方统计中农业、工业、服务业具体行业和产品的产量作为基础材料，然后再另行推算。这两套不同的数据，哪一套相对来说更加合理呢？

如果中国官方的经济增长率高估了真实的经济增长率，那么在采用世界银行所提供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时，就会发生低估2017年以前的经济总量规模而高估2017年以后的经济总量规模的现象。如图所示，1990年时，按照世界银行数据所计算的中国经济相对规模（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仅相当于按照麦迪逊项目数据所计算的中国经济相对规模的44%。

如果按照世界银行所提供的以2017年不变国际元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那么，在1990年有数据的160个国家中，中国排在第145位（也就是倒数第16位）。按照这种算法，中国1990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几内亚、塞拉利昂、马里、坦桑尼亚等大致相当，比赞比亚、老挝、刚果民主共和国、印度、越南、尼泊尔、苏丹、孟加拉国等国都要低，大大低于蒙古、菲律宾、巴基斯坦、不丹等国。虽然中国在1990年时仍属于欠发达国家，但是人民的基础医疗卫生和教育已经普及，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工业基础，显然不属于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列。

如果按照麦迪逊项目所提供的以2011年不变国际元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那么，在1990年有数据的166个国家中，中国排在第114位，属于排在后三分

之一的国家中最靠前的位置。按照这种算法，中国1990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菲律宾、巴基斯坦、朝鲜大致相当，显著高于蒙古、印度、越南、老挝等国。

下面的表比较了若干国家在1990年的几种经济发展指标：

| | 人均GD<br>(麦迪逊项 | 人均GD<br>(世界银 | 人均预期<br>(岁) | 人均电力<br>(度) |
|---|---|---|---|---|
| 中国 | 2982 | 1424 | 69 | 511 |
| 菲律宾 | 3502 | 4209 | 66 | 361 |
| 巴基斯 | 2531 | 2916 | 60 | 277 |
| 蒙古 | 2123 | 4978 | 60 | 1489 |
| 印度 | 2087 | 1813 | 58 | 272 |
| 越南 | 1634 | 1673 | 71 | 95 |
| 老挝 | 1481 | 1965 | 53 | * |
| 尼泊尔 | 1315 | 1617 | 54 | 35 |
| 孟加拉 | 1006 | 1518 | 58 | 50 |
| 刚果民主共 | 813 | 1820 | 49 | 131 |

通过与人均预期寿命、人均电力消费等指标相比较，显然，麦迪逊项目所计算的中国1990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较符合实际，能大致反映中国在当时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之下，世界银行使用中国官方的经济增长率所推算出的中国1990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大低估了中国在1990年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

以上证据有力地说明了，在1990年至2017年期间，中国官方的经济增长率很可能显著高估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并且这种偏差很可能延续到了2017年以后。

按照中国官方的经济统计数据，1991~2000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10.4%；2001~2010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10.6%；2011~2018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7.5%；在1991~2018年的整个28年中，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9.6%。

如果按照麦迪逊项目的数据，1991~2000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5.8%；2001~2010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8.0%；2011~2018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4.4%；在1991~2018年的整个28年中，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6.2%。这些增长率仍然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高或比较高的增长率，但不像官方增长率那样脱离实际。

将麦迪逊项目计算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与官方的中国经济增长率相比较，可以算出：在1991~2018年的整个时期，官方经济增长率平均高估了3.4个百分点；其中，1991~2000年，官方增长率高估了4.6个百分点；2001~2010年，官方增长率高估了2.6个百分点；2011~2018年，官方增长率高估了3.1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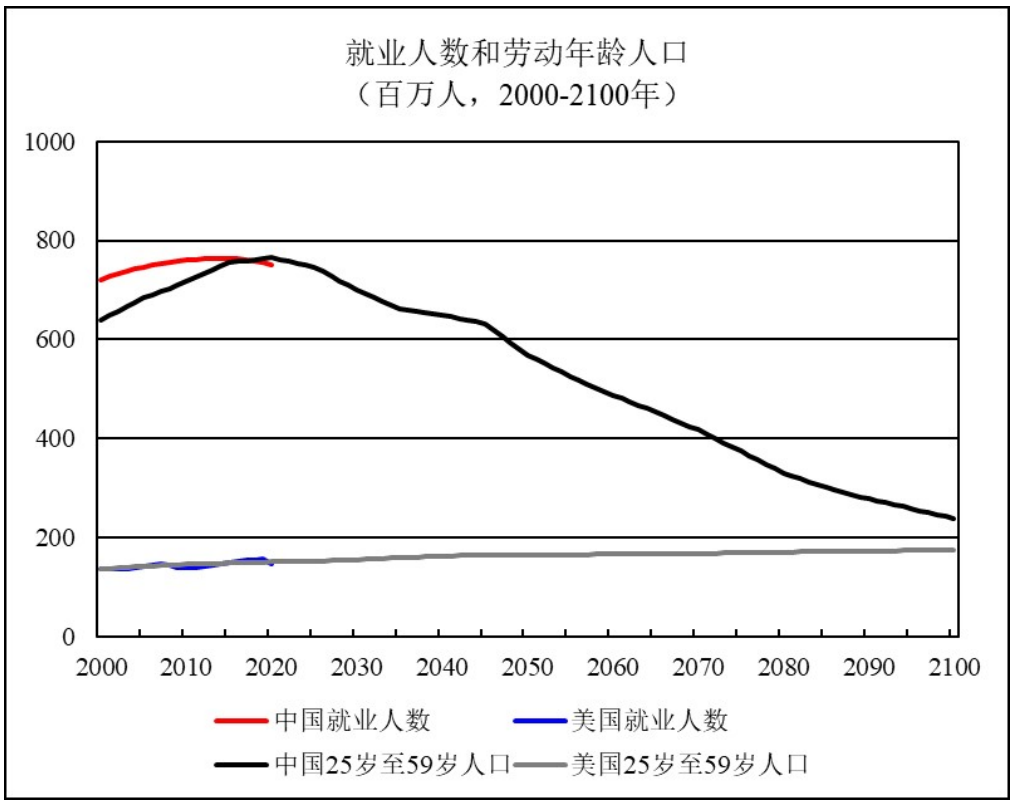
2019年和2020年，按照官方经济统计数据，中国经济分别增长了5.9％和2.3％。如果将这两年的官方经济增长率分别向下调低3个百分点，那么，2019年中国经济真实的经济增长率大约是2.9％，2020年中国经济实际上负增长0.7％。2020年是全球新冠疫情爆发之年。这样，在2020年，实际上中国经济和世界上其他主要经济体一样，也经历了衰退。

按照上述调整后的增长率推算，2020年，按购买力平级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美国的1.04倍。所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在总量上已经超过美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如果按照市场汇率计算，20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美国的70％。所以，中国经济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的相对规模（即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约为中国经济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相对规模的三分之二。这就意味着，如果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实际汇率保持不变，未来只有当中国经济总量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1.5倍时，中国经济总量按照市场汇率计算才会超过美国。

货币汇率受到许多短期因素变化的影响；要计算实际汇率，除了要知道名义汇率，还需要比较中、美两国各自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在接下来的文章中，笔者主要关注中、美两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总量比较。但通过以上的介绍，读者也可以有一个粗略的印象。那就是，如果未来中国经济总量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或超过了美国经济总量的1.5倍，那么，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经济总量也应该会超过美国。反之，如果未来中国经济总量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达不到美国经济总量的1.5倍，那么，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将难以超过美国，或者即使短暂超过了，也会很快被反超。

中国和美国各自未来的经济总量将由哪些因素决定呢？即使没有学过经济学的读者，大概也能够理解，一个国家的经济总产值等于这个国家的就业人员总数乘以这个国家的平均的劳动生产率。下面咱们就先来比较一下中、美两国各自的劳动力队伍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情况。

下一面第一个图比较了中、美两国在2000年至2020年期间的实际就业人数以及2000年至2100年期间实际的以及联合国人口部门所预测的最佳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即25岁至59岁人口）。根据中、美两国目前各自的生育率状况，对中国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预测采用的是联合国人口部门的低生育率情景；对美国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预测，采用的是联合国的中等生育率情景。




如上图所示，一个国家的25岁至59岁人口可以基本决定这个国家的就业人员规模。美国在2000年至2020年期间的就业人员总数几乎与25岁至59岁人口完全一致；中国近年来的就业人员总数也基本相当于25岁至59岁人口。在2015年以前，中国的就业人员总数显著高于25岁至59岁人口，可能是由于中国有大量人口在25岁以前尚未接受高等教育就已经进入了劳动力市场。

目前，中国在就业人员总规模方面仍然保持着对美国的巨大优势。2020年，中国就业人员总数大约相当于美国的5.1倍。中国在就业人员规模方面的优势刚好被美国在平均劳动生产率方面同等倍数的优势所抵消，所以现在中国经济的总量刚刚超过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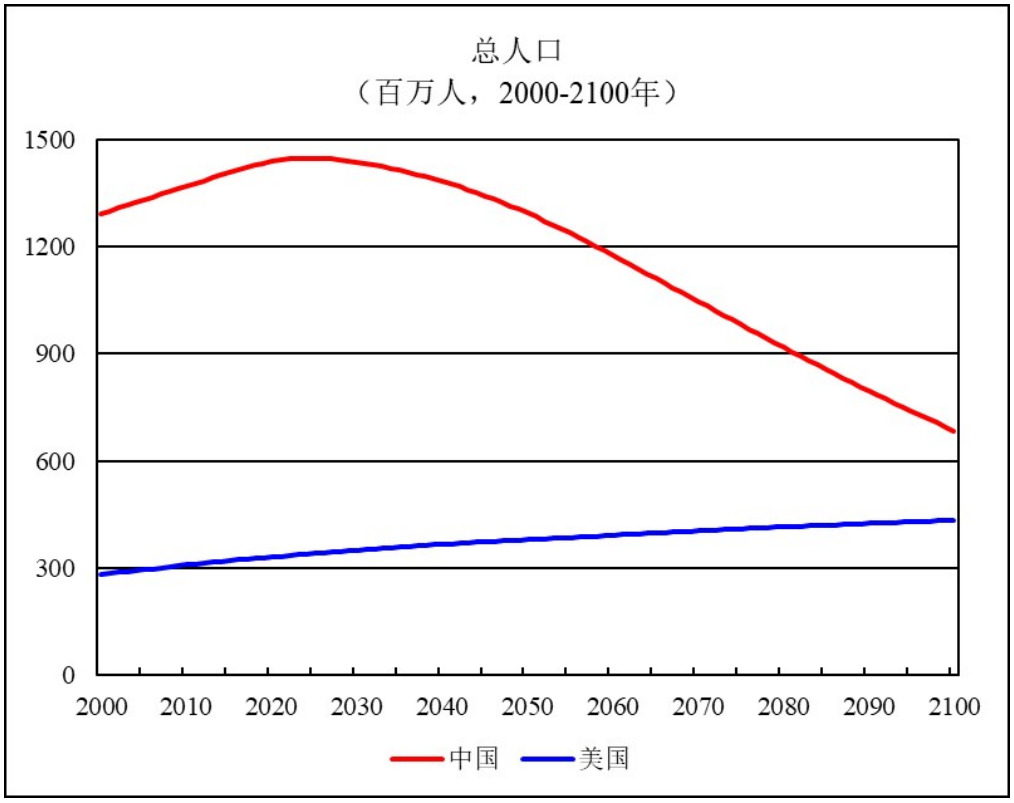
未来两国的就业人员规模将主要由各自的最佳劳动年龄人口决定。从2020年至2045年，中国的25岁至59岁人口将相对缓慢下降，从7.65亿减少到6.32亿，平均每年减少530万。这部分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是由过去已经出生的人口数量所决定的，已经绝对无法改变了。在此期间，美国的25岁至59岁人口将从1.51亿增加到1.65亿。这样，到2045年，中国就业人员总数相对于美国的倍数将下降到3.8倍。就是说，到2045年时，中国的平均劳动生产率需要保持在美国平均劳动生产率的26%以上，才能保证中国经济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大于美国。

如果中国保持目前的低生育率状态，2045年以后，中国25岁至59岁人口将加速下降。从2045年至2100年，中国的25岁至59岁人口将从6.32亿减少到2.38亿，平

均每年减少720万。这部分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是由现在与将来的出生率所决定的，理论上还可以加以改变。但是，在中国资本主义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劳动强度的剥削压迫下，越来越多的劳动人民普遍开展“躺平”斗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即使中国资产阶级愿意拿出一些小恩小惠，劳动群众普遍不生、少生的状况也很难改变，更不必说吝啬刻薄又胸无大志的中国资产阶级连小恩小惠也不愿意拿出来。

在此期间，美国的25岁至59岁人口将从1.65亿进一步增加到1.75亿。这样，到2100年，中国就业人员总数相对于美国的倍数将下降到只有1.4倍。就是说，到那时，中国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必须要达到美国平均劳动生产率的71%以上，才能保证中国经济总量继续大于美国。

再来看一下中、美两国总人口未来变化的情况。下面的第二个图比较了中、美两国在2000年至2100年期间实际的以及联合国人口部门所预测的总人口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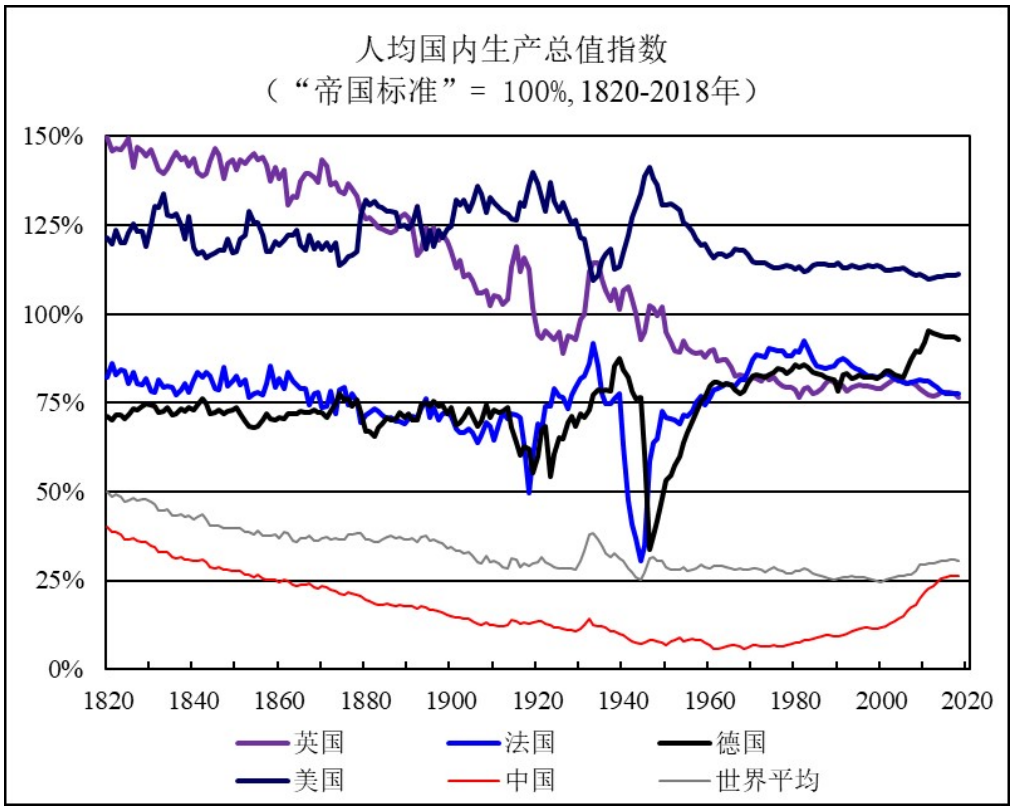

如上图所示，中国的总人口将从现在的14亿减少到2045年的13.4亿，美国的总人口将从2020年的3.3亿增加到2045年的3.7亿。中国总人口相对于美国总人口的倍数将从现在的4.2倍减少到2045年的3.6倍。这就是说，到2045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保持在美国的28%以上，才能保证中国的经济总量大于美国。

2045年以后，中国人口将加速下降。到2100年，中国的总人口将减少到6.8亿，美国的总人口将增加到4.3亿；中国总人口相对于美国总人口的倍数将减少到1.6倍。这就是说，到2100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必须要保持在美国的63%以上，才能保证中国的经济总量继续大于美国。

以上分析表明，除非两国未来的人口变化趋势发生重大的改变，那么，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经济总量要不被美国反超，中国经济平均的劳动生产率必须在2045年以前保持在美国的26%以上、在2100年以前达到美国的71%以上；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必须在2045年以前保持在美国的28%以上、在2100年以前达到美国的63%以上。

那么，在本世纪末以前，中国经济平均的劳动生产率能够达到美国的71%以上、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能够达到美国的63%以上吗？在二十一世纪中，中国能不能长期占据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乃至确立对美国的绝对优势，还是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期之后被美国反超？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自十九世纪以来世界各个主要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命运的沉浮。下面第一个图比较了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中国以及世界平均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



上图中，各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世界平均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计算为“帝国标准”的百分比。所谓“帝国标准”指的是英、法、德、美四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按人口加权平均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以代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若干最富强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收入水平。

如图所示，在十九世纪的前期和中期，英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当之无愧的霸主，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显著高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英国逐步衰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跌到“帝国标准”以下，完全失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霸主地位。

自十九世纪以来，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始终处于“帝国标准”的110%以上（除了大萧条最严重的1933年以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代替英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国家。

根据英、美两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的上述历史变化轨迹以及两个国家分别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霸权国家的历史事实，可以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于“帝国标准”的国家视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一等核心国家。

在1870年以前，法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始终高于德国。1870年普法战争以后，法国相对衰落。此后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德两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处于略低于“帝国标准”75%的水平。

1870年以后，虽然法、德两国都属于公认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实际上法、德在各自的民族国家内部都包含了大量的半外围地区。普法战争前，法国仍有大约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城市化程度相当于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水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仍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德国统一战争完成后，统一的德国包括了大量原来比较落后的邦国，仍有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从这些历史特点来说，法国和德国在十九世纪晚期都还不属于完全成熟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核心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初期，法、德两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度跌到“帝国标准”的50%以下。在战后的绝大多数年份中，英、法、德两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在“帝国标准”的80%上下波动。在这一历史时期，法国和德国确立了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巩固的核心地位；英国虽然衰落，也仍然不失为一个二流核心国家。

根据英、法、德等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的上述历史变化轨迹，可以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帝国标准”但高于“帝国标准”的75%的国家视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二等核心国家；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帝国标准”的75%但高于“帝国标准”的50%的国家视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准核心国家。

上面第一个图还表明，从1870年至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始终处于“帝国标准”的25%以下。1870年时，中国已经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清王朝的统治者开始了所谓“洋务运动”，中国社会已经深度半殖民地化，毫无疑问可以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外围国家。据此，可以将1870年以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帝国标准”的25%的国家视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外围国家；而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于“帝国标准”的25%但低于“帝国标准”的50%的国家视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

上图中的世界平均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也表明，在二十世纪的绝大多数年份，世界平均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恰好处于略高于“帝国标准”的25%的水平。这也说明，将“帝国标准”的25%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半外围和外围的分界线是合理的。

下面的表说明了自1870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18个主要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相对地位的沉浮。这18个主要国家包括了亚洲的中国、日本、印度尼西亚、印度和土耳其，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前苏联（俄罗斯联邦），非洲的埃及、南非，中南美洲的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北美洲的美国和大洋洲的澳大利亚。

| | 1870年 | 1950年 | 1970年 | 1990年 | 2018年 |
|---|---|---|---|---|---|
| 一等核心 | 英国<br>(144%)<br><br>澳大利亚<br>(128%)<br><br>美国<br>(118%) | 美国<br>(131%)<br><br>澳大利亚<br>(101%) | 美国<br>(115%) | 美国<br>(114%) | 美国<br>(111%)<br><br>澳大利亚<br>(100%) |
| 二等核心 | | 英国<br>(95%) | 澳大利亚<br>(92%)<br><br>法国<br>(87%)<br><br>德国<br>(83%)<br><br>英国<br>(82%) | 日本<br>(93%)<br><br>法国<br>(87%)<br><br>澳大利亚<br>(85%)<br><br>英国<br>(81%)<br><br>意大利<br>(80%)<br><br>德国<br>(78%) | 德国<br>(93%)<br><br>日本<br>(78%)<br><br>法国<br>(77%)<br><br>英国<br>(77%) |

| | | | | | |
|---|---|---|---|---|---|
| 准核心 | 法国<br>（74%）<br><br>德国<br>（72%）<br><br>意大利<br>（70%）<br><br>阿根廷<br>（58%） | 法国<br>（71%）<br><br>阿根廷<br>（68%）<br><br>德国<br>（53%） | 意大利<br>（74%）<br><br>日本<br>（74%）<br><br>阿根廷<br>（56%） | 西班牙<br>（59%） | 意大利<br>（69%）<br><br>西班牙<br>（63%） |
| 半外围 | 西班牙<br>（45%）<br><br>日本<br>（39%）<br><br>南非<br>（32%）<br><br>埃及<br>（29%）<br><br>土耳其<br>（29%）<br><br>巴西<br>（27%）<br><br>墨西哥<br>（26%） | 意大利<br>（48%）<br><br>前苏联<br>（39%）<br><br>南非<br>（35%）<br><br>西班牙<br>（30%）<br><br>墨西哥<br>（30%）<br><br>日本<br>（26%） | 西班牙<br>（46%）<br><br>前苏联<br>（43%）<br><br>墨西哥<br>（33%）<br><br>南非<br>（31%） | 前苏联<br>（34%）<br><br>阿根廷<br>（32%）<br><br>墨西哥<br>（30%）<br><br>土耳其<br>（27%） | 俄罗斯联邦（50%）<br><br>土耳其<br>（39%）<br><br>阿根廷<br>（37%）<br><br>墨西哥<br>（33%）<br><br>巴西<br>（28%）<br><br>中国<br>（26%） |
| 外围 | 中国<br>（23%）<br><br>印度<br>（21%）<br><br>印度尼西亚（21%） | 巴西<br>（19%）<br><br>土耳其<br>（18%）<br><br>埃及<br>（12%）<br><br>印度尼西亚（11%）<br><br>印度<br>（8%）<br><br>中国<br>（7%） | 巴西<br>（22%）<br><br>土耳其<br>（21%）<br><br>埃及<br>（10%）<br><br>印度尼西亚（9%）<br><br>中国<br>（7%）<br><br>印度<br>（7%） | 巴西<br>（24%）<br><br>南非<br>（19%）<br><br>埃及<br>（12%）<br><br>印度尼西亚（12%）<br><br>中国<br>（9%）<br><br>印度<br>（6%） | 南非<br>（24%）<br><br>埃及<br>（24%）<br><br>印度尼西亚（24%）<br><br>印度<br>（14%） |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结构性等级，1870～2018年
（“帝国标准”＝100%）

表中各个国家国名旁边括号中的百分比指的是各个国家各自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帝国标准”的百分比。

从1870年至2018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沧桑变化。在1870年有数据的17个国家中，有8个国家到2018年仍然保持在或者回到了它们原来所处于的结构性等级位置。其中，美国一直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一等核心国家，澳大利亚在一度跌落到二等核心国家以后又勉强返回到了一等核心国家的位置，意大利在几经沉浮后又回到了准核心的位置，土耳其和巴西在一度跌落到外围后又返回到半外围的行列，墨西哥始终保持着半外围的地位，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一直都没有摆脱外围地位。此外，虽然没有沙皇俄国在1870年的数据，但沙皇俄国在当时应该也属于半外围国家；这样，俄罗斯联邦及其前身自1870年以来一直也保持着半外围地位。

共有4个国家在2018年的结构性等级位置低于它们各自在1870年所处的位置。其中，英国从一等核心国家降为二等核心国家，阿根廷从准核心降为半外围，南非和埃及从半外围降为外围。

共有5个国家在2018年的结构性等级位置高于它们各自在1870年所处的位置。其中，法国和德国从准核心上升为二等核心国家，西班牙从半外围上升为准核心，日本从半外围上升为二等核心国家，中国从外围上升为半外围。

中国自从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来，在世界体系的外围中沉沦了一个多世纪，近年来才刚刚进入了半外围。那么，在本世纪还剩下的八十个年头中，资本主义中国能不能再创“奇迹”，从半外围的下层再一次跃进到准核心、甚至进入核心呢？

我们之前得出结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经济总量要不被美国反超，中国经济平均的劳动生产率必须在2045年以前保持在美国的26%以上、在2100年以前达到美国的71%以上；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必须在2045年以前保持在美国的28%以上、在2100年以前达到美国的63%以上。

如果把这些百分比换算为相对于“帝国标准”的百分比（美国目前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帝国标准”的1.1倍），那就意味着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在2045年以前保持在“帝国标准”的31%以上、在2100年以前达到“帝国标准”的69%以上。也就是说，到本世纪中期时，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要大致保持在相当于目前墨西哥的水平（半外围中间偏下的位置），到本世纪末，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要争取达到相当于目前意大利的水平（准核心偏上的水平）。应该说，前一个目标不是很难达到，后一个目标也许就好比登天了。

表面上，在1870年至2018年的一个半世纪中，有5个国家改善了自己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在5个国家中，法国的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指数从1870年的74%提高到2018年的77%，在148年中仅提高了3个百分点；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870年的23%提高到了2018年的26%，也仅提高了3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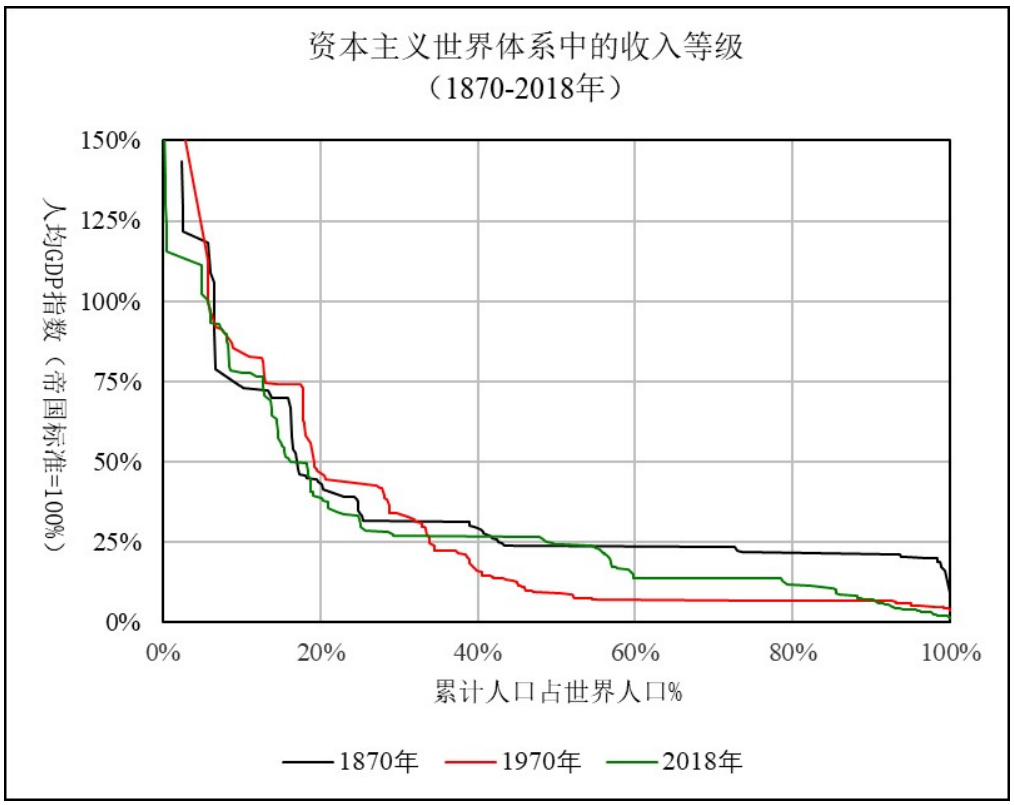
德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从1870年的72%提高到2018年的93%，在148年中提高了21个百分点；西班牙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870年的45%提高到2018年的63%，提高了18个百分点。这两个国家的改善幅度就算是比较大了。

真正可以称之为"奇迹"的只有日本，日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从1870年的39%提高到2018年的78%，在148年中提高了39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现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挑战"是要在大约80年的时间中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从26%提高到69%，也就是要提高43个百分点；并且这是在中国已经经历了大约四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即将大幅度放缓之际。这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史上，可以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先例。

当然，我们也可以单把日本从1950年到1990年的跃进时期拿出来：在四十年的时间中，日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从26%跃进到93%，提高了67个百分点。但是，日本这一时期的跃进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战后恢复的性质。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三十年代，日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已经接近50%，摸到了准核心的边。如果以1920年作为起点，以2000年作为终点，则日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从40%提高到82%，提高了42个百分点，与上述中国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历史挑战"大致相当。然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得到的极其有利的国际条件是中国资本主义完全无法企及的，更何况中国的人口规模是日本的十多倍。

下一面第二图显示的是1870年、1970年、2018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收入等级。




在上图中，分别用三条曲线显示1870年、1970年和2018年世界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分布。在每一条曲线中，世界各国按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高低自高而低、由左向右排列。图的纵轴显示的是各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当年“帝国标准”的百分比。图的横轴显示的是在某一个收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以上的所有国家的累计人口占当年世界总人口的比例。

比如，1870年，有6%的世界总人口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帝国标准”以上；有7%的世界总人口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帝国标准”的75%以上；有17%的世界总人口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帝国标准”的50%以上。

到了1970年，有6%的世界总人口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帝国标准”以上；有13%的世界总人口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帝国标准”的75%以上；有19%的世界总人口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帝国标准”的50%以上。

2018年，有6%的世界总人口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帝国标准”以上；有13%的世界总人口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帝国标准”的75%以上；有16%的世界总人口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帝国标准”的50%以上。

所以，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一等核心、二等核心、准核心国家的总人口从来没有超过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目前只占世界总人口的约六分之一。

中国人口目前约占世界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强；到本世纪末，即使中国人口减少，仍然会占世界总人口的约十分之一。

所以，哪怕中国是要挤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准核心，那么，或者，中国必须将现有的核心和准核心国家全部或大部挤到外围或半外围的位置。只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存在，这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或者，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配规律必须被根本改变。但是，如果是那样，前提是推翻现有的世界体系，到那时，中国资本主义也就不复存在了。

我们已经介绍过，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等于就业人员总数乘以这个国家平均的劳动生产率。在那一篇文章中已经指出，按照现在中、美两国各自的生育率状况，中国劳动力队伍相对于美国的优势将从现在的**5.1**倍减少到**2045**年的**3.8**倍，再减少到**2100**年的**1.4**倍。中国经济要想保持乃至扩大目前（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在经济总量上对美国的优势，必须不断地缩短与美国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距，力争到本世纪末使得自己的平均劳动生产率达到美国的**71%**以上。

那么，中、美两国未来在劳动生产率增长方面会各自出现怎样的趋势呢?

先来看美国。下面第一个表分解了自1991年以来美国经济在各个时期经济增长所依赖的因素（也叫做“增长核算”）：

| | 1991-2000年 | 2001-2010年 | 2011-2018年 |
|---|---|---|---|
| 经济增长率 | 3.4% | 1.7% | 2.3% |
| 就业人数增长率 | 1.4% | 0.2% | 1.4% |
|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 2.0% | 1.6% | 0.8% |
| 其中：资本积累贡献 | 0.6% | 0.7% | 0.2% |
| 自发生产率增长率 | 1.4% | 0.9% | 0.6% |

美国经济增长核算，1991～2018年

1991～2000年，美国经济年平均增长3.4%，其中1.4个百分点来自于就业人数增长，2个百分点来自于劳动生产率增长。2001～2010年，美国经济年平均增长1.7%；受2008～2009年大衰退的影响，美国就业人员总数在这一时期几乎没有增加；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1.6%。2011～2018年，美国经济年平均增长2.3%，就业人员总数年平均增长1.4%，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0.8%。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又可以再分解为来自资本积累的贡献（也就是通过机械化、自动化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纯粹由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在上表中称之为“自发生产率增长率”）。前者等于资本劳动比的增长速度（大致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速度）乘以资本产出弹性（即资本劳动比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能够带来多少劳动生产率增长）。近年来，资本积累贡献大约占美国经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三分之一。

就1991-2018年的整个时期来说，美国经济年平均增长2.5%，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1.5%（其中，自发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约1%）。

如果观察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自发生产率增长率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变化，两种增长率都有下降的趋势。不过，2020年虽然是新冠疫情和衰退之年，美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却出现了复苏的势头，当年美国经济劳动生产率增长3.0%。未来也还可能发生新的技术革命。所以，我们假设，自2023年起，美国经济的自发生产率每年增长1%（与1991-2018年的平均值相当）。如果资本积累贡献占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三分之一，从而自发生产率增长占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三分之二，那么，美国经济长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就是1.5%。

下面再来看中国。下面第二个表分解了自1991年以来中国经济在各个时期经济增长所依赖的因素：

| | 1991-2000年 | 2001-2010年 | 2011-2018年 |
|---|---|---|---|
| 官方经济增长率 | 10.4% | 10.6% | 7.5% |
| 就业人数增长率 | 1.1% | 0.5% | -0.1% |
| 官方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 9.3% | 10.0% | 7.6% |
| 其中：资本积累贡献 | 4.5% | 6.4% | 6.3% |
| 官方自发生产率增长率 | 4.8% | 3.6% | 1.3% |
| | | | |
| 麦迪逊项目估计的真实经济增率 | 5.8% | 8.0% | 4.4% |
| 真实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 4.6% | 7.5% | 4.5% |
| 其中：真实自发生产率增长 | 0.1% | 1.1% | -1.8% |

中国经济增长核算，1991～201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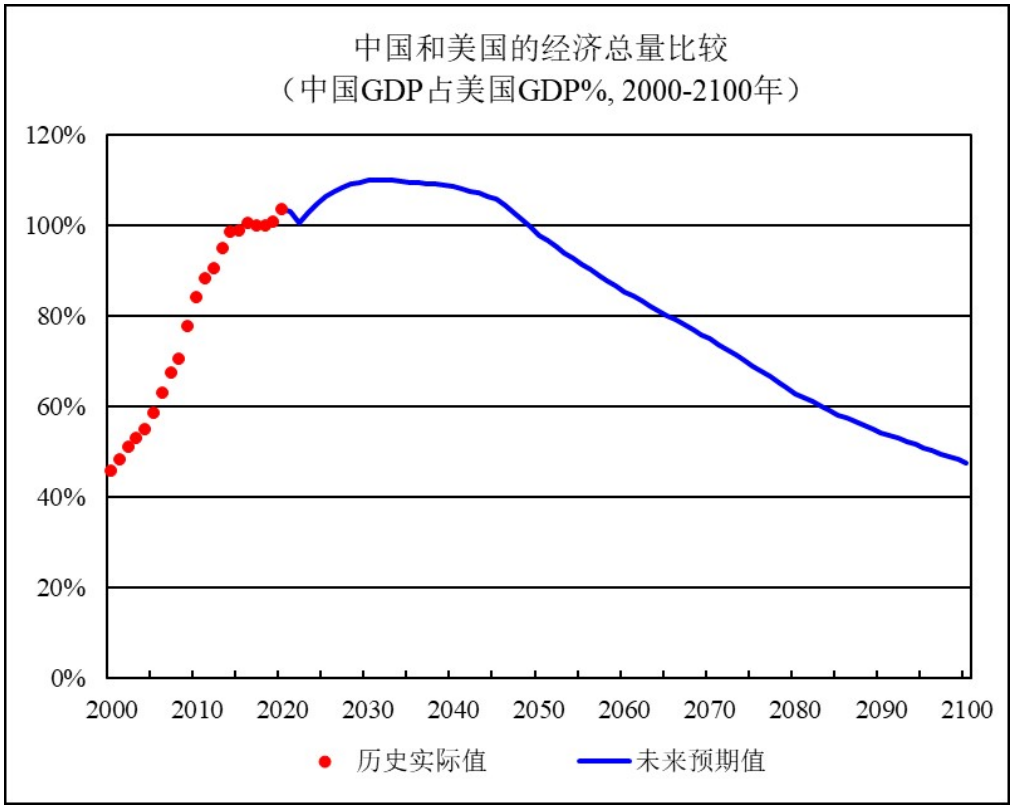
如这一系列的第一篇文章所说，中国官方的经济增长率很可能显著高估了中国经济真实的增长速度。如果按照中国经济真实的增长速度推算，那么，在1991～2018年期间，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5.6%，仍然是世界上最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之一。如果按真实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推算，那么，在1991～2018年期间，中国经济的平均真实自发生产率增长率是-0.2%。就是说，以往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全部依靠资本积累的贡献。

我们假设，自2023年起，中国经济的自发生产率每年增长1%（接近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期间的最好水平）。此外，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以及工人阶级斗争加强、导致资本家利润份额下降，整个经济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势必下降。假设企业部门的固定资本投资从现在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左右减少到2050年的15%左右，此后保持不变；这样，资本积累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也将逐步减少到劳

动生产率增长的一半，而自发生产率增长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到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一半。按照这些假设，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将从现在的大约4%逐步减少到2050年的2%，此后大致维持在每年增长2%的水平。

我们已经介绍了未来中、美两国劳动年龄人口变化的情况。如果假设中、美两国未来的就业人数等于各自的最佳劳动年龄人口（25岁至59岁人口），再采用这篇文章中在前面所介绍的关于两国未来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假设，就可以推算中、美两国未来经济总量的变化了。

下面第一个图介绍了2000年至21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变化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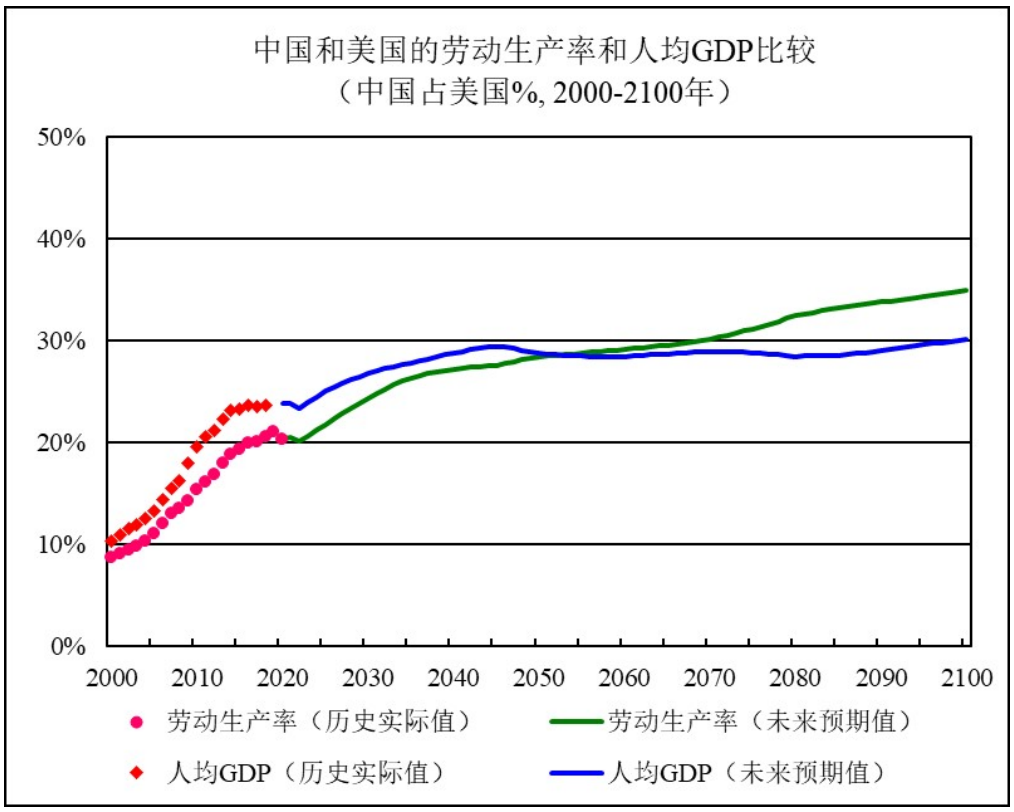



如图所示，按照麦迪逊项目的估计，从2000年至2016年，中国经济总量相对于美国经济总量的比例从46%快速增加到101%。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104%。

2021年和2022年，美国经济估计将分别增长6%和5.2%。如果按照官方统计，中国经济在2021年和2022年估计将分别增长8%和5.6%。将中国的官方经济增长率向下调低3个百分点以后，估计2021年和2022年中国经济的真实增长率将分别为5%和2.6%。这样，到2022年，中国经济的真实规模估计将回落到美国经济总量的101%。

自2023年起，设想中、美两国经济分别按照前面介绍过的各项假设增长。到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1.1倍。此后，中国经济总量与美国经济总量之间的差距将缓慢缩小。2045年以后，中国的人口和劳动力总数都将加速下降。自那时起，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将大致被劳动力人数的减少所抵消，从而中国经济总量将基本上停止增长。到2050年，美国在经济总量方面将反超中国。到2100年，中国经济总量相对于美国经济总量的比例将下降到48%。

下面第二个图比较了2000年至2100年中国和美国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比例的变化：




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比例从2000年的9%快速增加到2019年的21%。按照笔者的假设，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比例未来将继续增加。至2045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将达到美国的28%。此后，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有所放慢，但仍略快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至2100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将达到美国劳动生产率的35%。

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00年的10%快速增加到2018年的24%。按照笔者的假设，至2045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美国的29%。此后，虽然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仍然比美国的增长得快，但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下降，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相对于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再增长，一直保持在30%以下，直到本世纪末才缓慢增加到30%。

以上的分析当然都是假想未来中、美两国资本主义经济能保持正常增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能正常运行。实际上，一旦中国无法在经济总量方面进一步扩大相对于美国的优势，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主要意识形态基础的中国资产阶级统治就将开始陷入严重的合法性危机。等到中国经济陷入长期的零增长，从而中国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即使在官方统计数据中也无法再掩盖时，整个的中国资本主义大厦就将摇摇欲坠、土崩瓦解。

# 怎样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中国经济问题?

远 航 一 号

最近大家关心经济问题，借这个机会和大家聊聊怎样学习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中国经济问题。

由于中国马列毛左派在过去几十年思想上、政治上的发展是相对独立的，很多同志对于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际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发展完全不了解，对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或者没有接触过或者浅尝辄止，从而不了解在当前条件下怎样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方法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

在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上占压倒地位的当然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在网络时代，在各种社交媒体上流行着各种在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基础上进一步庸俗化、娱乐化的所谓经济“分析”。其中有的是满足一些人猎奇、耸人听闻的心理，有的是为了诱惑人们进行股市、房市等投机，即使是所谓“严肃”些的分析也往往将一些枝节的、次要的方面夸大，在少量有用信息背后笼罩着大量信息垃圾。

绝大多数初步觉悟的左派同志，一说到资本主义危机，往往就搬出过去教科书上说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劳动人民购买力不足”的教条，不分具体情况地套用。

凡此种种，都不能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和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既不能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也不能发现真正的主要矛盾。久而久之，恐怕还会从急切盼望危机马上就来的幻想跌落为“危机怎么还不来”的失望，直至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

所以，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很重要。

在这方面，我们每年都发布红色经济观察。希望大家都来阅读红色经济观察，提出意见和建议。此外，关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资本主义积累，我们过去在“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经济学”系列中都有过论述，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建议去看看。

概括地说，决定资本主义积累的是利润率（当然同等利润率下，不同国家的积累情况也有差别，暂时不说）。简单化一点说，如果利润率高、稳定，资本主义经济就比较繁荣；如果利润率在趋于下降，资本主义经济就面临严重的问题，就在走向危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趋于下降已经十多年了，但是下降是从很高的水平开始的，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引起投资崩溃。这个转折点什么时候来到，还要观察。

决定利润率的有两个因素。一是利润份额，这个指标主要反映阶级斗争和阶级力量对比（也受其它一些短期因素影响）；二是产出资本率，这个指标在短期受需求影响比较大，在长期受技术影响。就长期来说，如果资本劳动比的提高速度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简单说，就是需要很高投资来维持一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产出资本率就会下降（这是中国目前的状况）；如果资本劳动比的提高速度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大致相当，产出资本率就会大致保持不变（这是美国目前的状况）。

我们想象一下，大夫给病人看病，这个病人可能有各种症状，什么发烧、头疼、肚子痛、关节酸胀。高明的大夫不会仅仅根据这些表面症状就诊断开药。打个比方，要望闻问切，现代条件下，要用仪器测量病人身体各个器官的指标、运行情况，这些指标有的要紧，有的不大要紧。然后用科学的方法做出诊断，找到病人疾病的病根，抓住主要矛盾。

我们写红色经济观察，就等于给中国资本主义做诊断，衡量它的各个关键指标，然后根据这些关键指标运行的情况，再判断资产阶级当局这个“大脑”会做出怎样的反应，然后再得出无产阶级和进步力量的阶级斗争策略。当然，这里，我们的目的，不是把病人治好，而是为了把资本主义给“治死”。但不管要治活还是治死，都要找准要害。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资本主义的要害就是利润率，其它诸如股市、楼市、地方债、资本流进流出，都是肘腋之疾，要不了命的。

就中国资本主义来说，总的基本矛盾就是由其作为专门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所派生出来的矛盾。因为这个基本矛盾，一是必然导致中国工人阶级发展壮大，从而导致工人阶级斗争力量上升；二是必然导致产出资本率下

降（这是半外围条件下被迫用高投资维持劳动生产率增长带来的）。两者共同作用，就导致利润率必然下降，最终就必然导致中国资本主义失败、灭亡。

关于第一个方面（工人阶级斗争力量上升），2011年至2015年是工人阶级斗争一个高潮，取得了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利润份额下降的成果。2015年以后，资产阶级尝试反扑，但现在看来，资产阶级的反扑取得的“成果”有限，劳动收入份额近几年大致保持不变（甚至还略有上升）。原来根据初步数据，以为2021年劳动收入份额会有比较大的下降，现在根据更新后的数据，下降幅度不大，所以还是处于2015年以来阶级斗争僵持的局面。未来，只要广大劳动群众坚持“躺平”斗争，坚决地、普遍地、大量地减少各种形式的剩余劳动力供给，就一定能为新的工人斗争高潮创造条件。

那么，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怎么应对这些矛盾的积累，挽救自己赖以作威作福的社会制度呢？很多同志受网络“分析”影响，一说起经济，就爱谈股市、房地产、债务，加息减息、央行放不放水等。我给大家泼点冷水，这些都是噪音，都不是主要矛盾。

从宏观经济学来说，上面说的这些因素，最后都要通过需求起作用，不是影响消费，就是影响投资。但是，以中国资本主义来说，至少在目前，任何单纯因为需求减少的危机，都不是致命危机。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单纯”因为需求减少的危机（比如，因为利润率下降导致投资崩溃，不是单纯因为需求减少）。任何单纯因为需求减少的危机，资产阶级当局都可以通过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应对，像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那样的危机是不会爆发的。

中国资本主义的致命问题，不是房地产泡沫，也不是地方债。如果假设资产阶级当局不出昏招，不长期坚持必然失败的清零防疫政策，疫情应当也不是致命问题。我们暂时不把希望寄托在对方出昏招上。

中国资本主义的致命问题，是由半外围资本主义矛盾所带来的利润率下降。那么，从中国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如何才能制止利润率下降、争取利润率回升呢？

理想情况下，首先要阻止产出资本率下降。做到这点，有两条路，一是主动选择大幅度降低投资率，以便使得投资与较低的、可持续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相适应。但这意味着大幅度降低经济增长率，永久放弃“强国梦”。再一条路，那就是维持现有的投资率，同时想办法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中国资产阶级近年来搞所谓“制造业强国2025”、“自主创新”、各种“产业政策”，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但成效十分有限。

从历史上来看，半外围国家要上升为核心是十分惊险的战略大冒险。过去一百年，凡是成功地由半外围上升为核心的（如日韩台），都是霸权国家有意扶持的结果。与霸权国家对抗、又试图上升为核心的，典型的如苏联，无一不失败。

核心国家之所以是核心，就是因为掌握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技术。而垄断技术的形成，需要长期的技术、人才、资金、配套基础设施、上下游市场的培育和积累。如果是小国，集中突破一两个领域，也许还能碰碰运气。大国要上升为核心，必须在许多领域全面开花，没有几百个不搞996的华为根本不可能。

就中国资本主义来说，因为在国际市场上是依靠剥削廉价劳动力的出口制造业，所以绝大多数资本家都极端贪婪吝啬、急功近利，根本不可能花大钱、冒大险搞自主创新。资产阶级国家的产业政策有可能避免私人资本的急功近利和短视。但是，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比如中国资产阶级国家能够成为像日本通产省、韩国企划厅一类的“发展主义国家”、准计划经济，不受各种利益集团牵制，资产阶级国家的产业政策也不一定成功。资产阶级国家集中起来的资源只能投入有限的几个技术发展方向；由于技术进步的不确定性，这样的大规模投资有可能成功，但也有可能冒险失败（比如历史上苏联重点发展电子管而不是晶体管导致电子工业落后）。就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说，它的所谓产业政策，实际上没有什么统一规划，而是各种假大空的堆积，无非是集中一些钱，然后在各个资本家集团间分赃；所以连真正成功的机会都没有。

如果不能制止产出资本率下降，那么中国资产阶级的另一条“出路”就是加紧向工人阶级进攻，提高利润份额。过去几年，他们搞的所谓“混合所有制改革”、“供给侧改革”、事业单位市场化，以及鼓吹“灵活就业”，都是服务于这个战略意图。但是，我们看到，劳动人民通过开展“躺平”斗争，实际上在这个方面也挫败了资产阶级的战略意图；未来，还有可能发起对资产阶级的反攻。

最近很多同志关心李克强的那个所谓12万人大会。与上述资产阶级的战略失败相比，李克强的那些“稳经济”政策，30条也好，300条也罢，都是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狗皮膏药，完全不值得重视。稍微有些实质内容的，就是李继续其减税降费的反动政策，其实质，无非是挖资产阶级财政的肉，来稍稍缓解一下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那么，我们马列毛左派怎样来分析经济问题，又如何对外宣传呢？这里，要区分内部和外部。在内部，比如在红色中国网，我们要把话讲透。在外部，我们的宣传要符合群众的短期利益，要符合加速资本主义灭亡、无产阶级胜利的长远目标。

如何加速资本主义灭亡、无产阶级胜利？如果做一个简单粗暴的回答，那就是一切有利于加速中国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的经济主张，都是好主张，否则，都是坏主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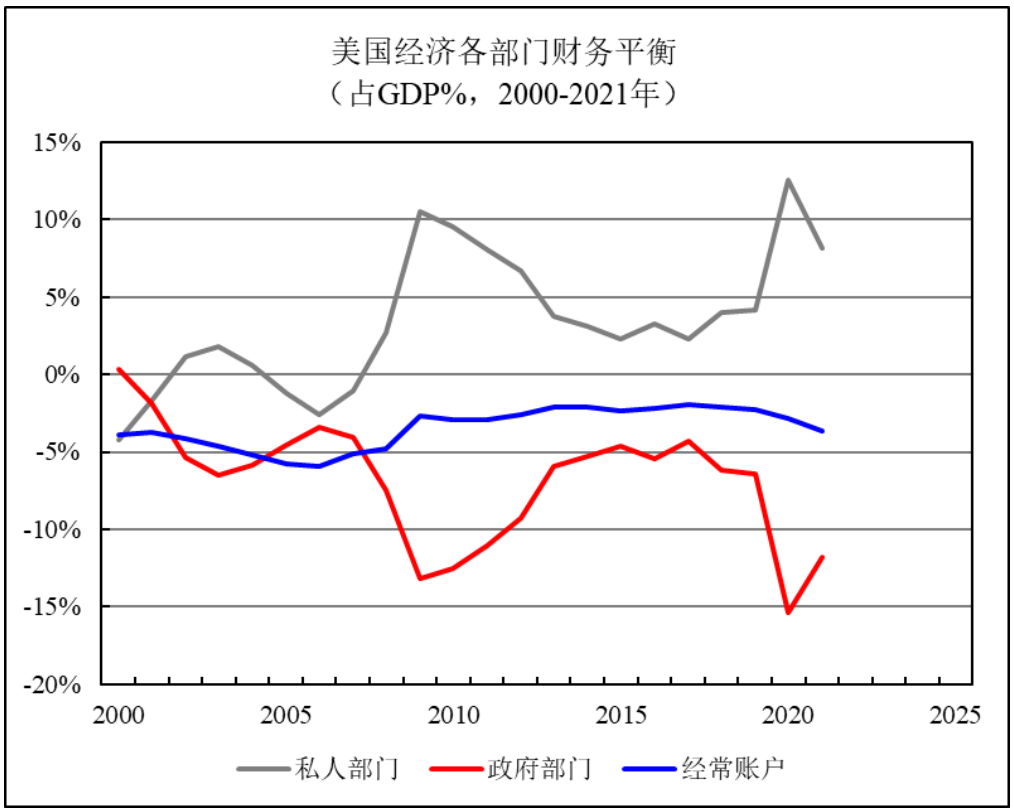
所以，凡是什么给资本家（包括给小资本家）减税、降费、纾困的政策都是反动政策！更不必说那些直接鼓励资本家违反劳动法或者违法犯罪可以不追究的政策。要打破落后群众对于“万众创新”的幻想！要揭露所谓只有企业家盈利才能“创造就业”的胡说！尽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胡说有一定客观真理性。在宣传上（指公开宣传），可以采取主张用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增加就业而不是靠私人资本家“创造就业“的办法。

另一方面，凡是能够增加资产阶级困难的主张，无论来自哪里、无论出于什么政治动机，都有利于群众的短期利益，都有利于加速利润率下降，因而都是好政策。比如，资产阶级提“共同富裕“，我们就要求其在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中落实”共同富裕“（提高工资、增加政府福利支出），而反对其所谓”三次分配“（靠资产阶级施舍）。再比如，有人提出，为了鼓励大家生孩子，政府应该拿出几万亿元给大家发生育补贴，咱们也可以适当附和。总之，要把群众的预期提高，把胃口吊起来，向资产阶级当局提的要求越多越好、越高越好，越”不合理“越好。

在私人资本与国有资本的关系上，一般来说，反对一切私有化，反对一切所谓“国退民进”，重点打击剥削最残酷、利润率最高的私人资本。要坚决反对一部分所谓”左派“跟在自由派屁股后面鼓噪所谓”国有资本垄断“的反动言论！要在群众中逐步培养，宁要国家垄断，不要私人资本垄断、不要外资垄断的观念。对于鼓噪国有资本垄断的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要质问他们：你们不要国家垄断，难道是为了让资本家垄断、让跨国公司垄断吗?

未来，根据资产阶级新的花招，我们还可以依据上述原则，调整我们的宣传策略。比如，假如资产阶级主张用从东南亚大规模移民的方法来解决劳动力短缺（虽然这实际上很困难），那么，我们要与劳动群众的短期利益坚定地站在一起，不受西方“左派”精神包袱的束缚，坚决反对把中国变为“移民国家”。

下面简单说一下美国经济的情况。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所不同。大家从红色经济观察中可以看到，近年来，美国经济的利润率是比较稳定的。目前看来，美国经济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自新冠疫情以来，美国资产阶级为了应对内外矛盾，冒险采取大规模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导致了庞大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




从上面的图可以看到，2021年美国的政府部门赤字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2%，贸易赤字（经常账户赤字）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4%；今年，美国的贸易赤字可能会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5%。美国的财政赤字，一靠私人部门的储蓄来弥补，二靠来自外国的储蓄来弥补（表现为贸易赤字）。未来，如果私人部门储蓄减少，利率会大幅度上升；如果来自外国的储蓄减少，美元会贬值，并有崩溃的危险。

美国资产阶级当局如果选择继续冒险实行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则美元崩溃的风险会加大。

美国资产阶级当局如果选择接受经济衰退，用减少总需求的方法来抑制通货膨胀、增加私人储蓄，那么美元维持稳定的可能性较大。目前看来，美国资产阶级当局采用后一种办法的可能性较大。

如果美国经济持续衰退，中国资产阶级也有两种可能的应对办法。一是不采取大规模的宏观刺激措施，听任国内总需求低迷。这样做，对资产阶级的好处是，可以增加劳动人民失业、削弱工人阶级斗争力量，减缓利润率下降的步伐；坏处是增加资产阶级的政治困难，中小资本家也会哇哇叫。

中国资产阶级可能采取的第二种办法，是模仿温家宝政府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实行新的大规模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如果是这样，可以减少劳动人民失业，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枯竭，有利于提高工人斗争力量，加速利润率下降。在

对外经济方面，由于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总需求的主要推动力量，中国将从贸易顺差国变为贸易逆差国；中国的贸易逆差有赖于外国资本流动来弥补，但由于人民币不是国际主要储备货币，流入中国的外国资本将有很大的投机性。所以，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有提前爆发的可能。

这里再补充几句，过去一些年，许多左派同志受自由派和网络舆论的影响，盲目地反对温家宝的“四万亿”、盲目地反对大基建、盲目地反对央行放水等。实际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般来说，资产阶级当局如果实行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都是有利于劳动人民短期利益的；就中国来说，这些政策还有着加速资本主义经济利润率下降的额外长期“好处”。

总而言之，未来几年，凡是有利于群众短期利益的，我们就拥护，就支持。在目前中国的条件下，有利于群众短期利益的，也就是在长远能够要资本主义命的。因此，“改良”的，也就是革命的。

# 有关当今气候变化与农业的随笔

月 岚

大多数人所熟悉的环境保护或者环境主义的倡议无外乎节能减排、回收再生。而传统环保主义者的论点无非是人类活动会破坏生态多样化、污染环境诸如此类的陈腔滥调，实际上当代人类（几乎是无序的）经济活动最大的问题是对人类自身的威胁。希望在此可以简单地用我的专业知识来帮助大家从新的角度认识气候变化的影响。

全球变暖意味着的并不是简单的夏天更热，适宜居住适宜耕种的地区向南北极移动。当代农业的复杂程度和脆弱程度都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自农业革命以来人类所培育特化的作物在现代育种的品种虽然在产量上更上一层楼，但高度同质化基因高度单一化的种群其对环境的适应性也远低于野生植物。正如曾经的黄叶病大量摧毁了曾经是主流的大麦克香蕉一样，如果任何一种主要粮食作物遭受病害都意味着严重的区域性乃至世界性减产。这和气候变化乍一看毫不相干，但实际上气候的变化很容易让原本不易出现在粮食主产区的病害发生。原本不够潮湿、不够炎热到到让某一病原体成功大面积感染植株的地区可能由于气候的细微变化成为病原体的温床（尤其是真菌类病害）。

相信，今年夏天的升温足以打消任何气候变化阴谋论者的疑虑。全球变暖促使气候极端化已然是不争的事实，而升温对于全球的水循环来说有着极其复杂的影响。通俗来讲，作为比热容相当高的液体，水每升温一度都意味着吸收了大量的热量，远高于金属岩石泥土等等。占据地球70%以上面积的海洋每升高一度都意味着储存了$1.4\cdot10^{18}$ t×$4.2\cdot10^{6}$ kJ/t·℃的能量 也就是$5.9\cdot10^{24}$ kJ（粗略计算 全球液态水总质量*一吨水的比热容）。相比之下我们所熟悉的广岛原子弹一

发约在$6.5 \cdot 10^{10}$ 千焦左右（不严谨地说，两者之间差的不是大约14倍多而是10的十四次方那么多）。如此庞大的热量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全球会有更多的水以水蒸气形式存在，而通俗的来说，水蒸气意味着有更多“原料”来形成风暴、台风、以及其他形式的降水。更多的降水意味着原本不过是一场大雨的夏季降水可能直接暴雨连下几天引发洪涝灾害，而秋收时只需一场大雨春耕时只需一场大雪会造成严重的粮食减产。

如果说前两个问题对于没有农业和气象学专业知识的人来说不容易理解的话，气候变化还有一个很直观的后果。自从被子植物出现以来，陆地上的生物都极其以来被子植物的茎叶果作为能量的来源。我们吃的水果也好，庄稼也罢，牲畜吃的草也在内，都是开花的被子植物。而有花植物对昆虫授粉又极端依赖。至少75%的粮食作物和近90%的野生开花植物依赖以蜜蜂为主的昆虫传粉，换言之没有蜜蜂，人类赖以维生的植物和作物会严重减产乃至灭绝。即便人类能适应气候的变化，但这些传粉昆虫对环境的适应力远不如人类，光是夏季的几天高温，就足以扰乱蜜蜂的正常繁殖。



（图为今夏的一只雄蜂 因高温生殖器脱出体外而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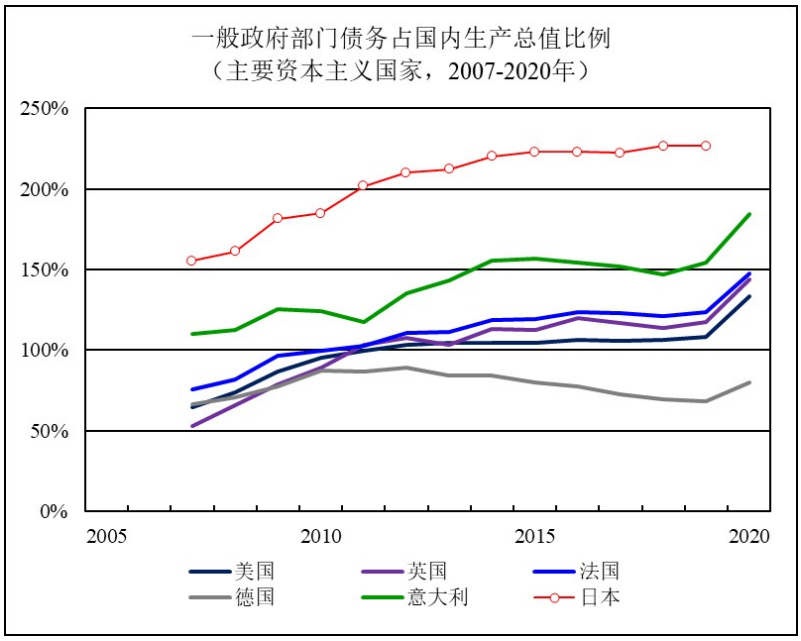
农业是人类社会的一切之本，而今天的农业又是如此脆弱如此依赖自然环境。资本主义下经济的不合理运转模式，不止是以绿水青山为代价，更是直接威胁到人类的口粮乃至人类的存续。石化能源枯竭前，恐怕人类就将因为气候变化而面临前所未有的饥荒。今天我们精巧的社会是复杂分工的结果，而复杂的分工

又是农业生产剩余的结果，当代农业在全球气候变化面前又是如此脆弱，而今天的经济运转模式倘若没有颠覆性的改变继续破坏脆弱的环境的话，建立在农业之上的一切恐怕都要荡然无存。可以预见的是，我们的日常水果会因为产量下跌变成奢侈品，粮食减产造成的饥荒会愈发频繁，由此而衍生出来的问题更将数不胜数。这就是为什么农学出身的我不得不去反对资本主义的原因之一也不得不在此发出这样的呐喊。今日资本主义的运转模式不只是带来极大的不平等和苦难，假以时日更将摧毁几千年来人类社会的基石——农业本身。

# 美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和财政危机

远 航 一 号

自2008～200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来，大多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状况严重恶化，表现为政府赤字大幅度增加、政府债务大幅度上升。2020年的新冠疫情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进一步加重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危机。下面第一个图说明了自2008～2009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债务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趋于上升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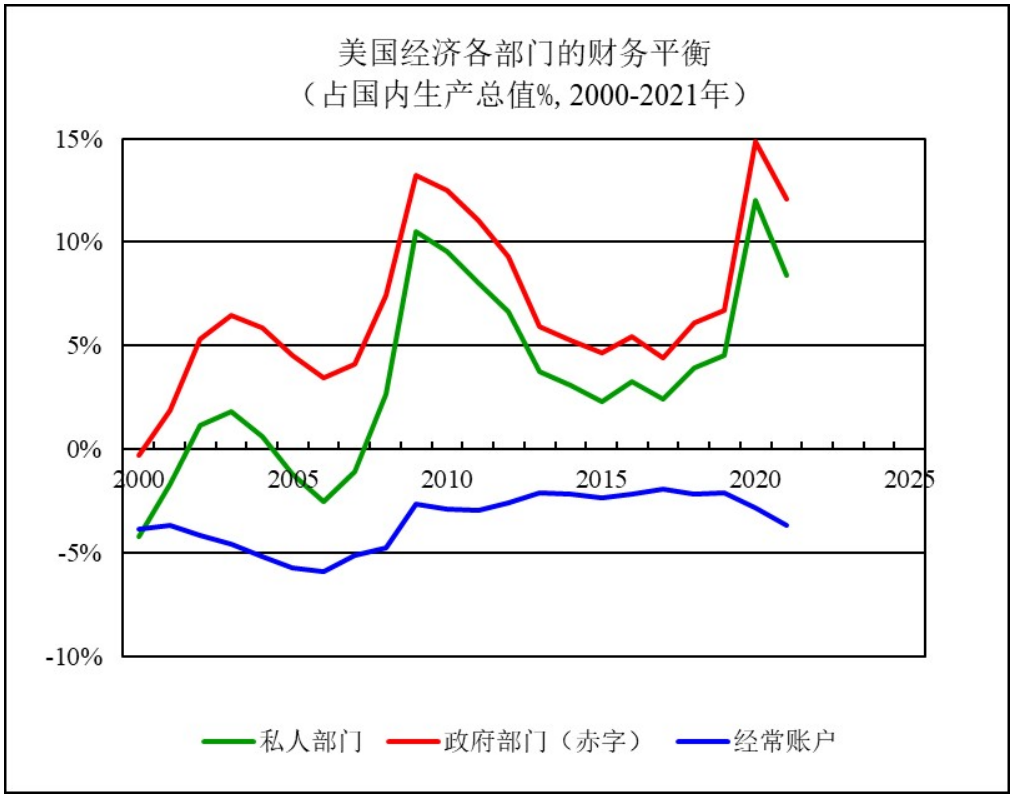


如上图所示，自2007年以来，除了德国以外，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债务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都大幅度增长。其中，美国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07年的65%增加到2020年的134%；英国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07年的53%增加到2020年的144%；法国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07年的76%增加到2020年的147%；意大利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07年的110%增加到2020年的184%。日本政府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债台高筑；2019年，日本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227%。

财政危机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是“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具体表现。历史上，罗马帝国、中国封建时代各王朝在覆亡之前，英国和法国的专制君主国在被推翻之前，都曾经爆发长期而尖锐的财政危机。目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危机，可能是这些国家即将爆发革命或者重大社会动荡的前奏。

美国是现在世界上最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这篇文章着重探讨美国资本主义的矛盾与财政危机，并简单设想一下未来美国财政危机对国际阶级斗争的可能影响。

下面第二个图说明了自2000年以来美国经济中私人部门、政府部门和对外部门（经常账户）财务平衡的状况：



一个国家的对外部门财务平衡（即经常账户平衡）等于私人部门（包括住户部门和企业部门）财务平衡和政府部门（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务平衡之和。上图中，政府部门财务平衡用赤字来表示，所以就有：经常账户财务平衡=私人部门财务平衡（盈余）- 政府部门赤字。自2000年以来，美国的政府部门赤字一般都显著大于私人部门的盈余，所以美国的经常账户经常处于赤字状态，需要从国外获得资本净流入以弥补经常账户的逆差。

2021年，美国政府部门赤字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2.1%，私人部门盈余为国内生产总值的8.4%，经常账户赤字（逆差）为国内生产总值的3.7%。

下面的表概括了美国一般政府部门（包括联邦、州和地方政府）2021年财政收支的情况：

| 收入 | | 支出 | |
|---|---|---|---|
| 个人收入所得税 | 2.7（11.4%） | 政府消费 | 3.4（14.4%） |
| 企业收入所得税 | 0.4 （1.6%） | 政府转移支付 | 4.6（19.9%） |
| 各种间接税 | 1.7 （7.1%） | 利息支付 | 0.9 （3.7%） |
| 社会保险税 | 1.5 （6.6%） | 政府给企业的补贴 | 0.5 （2.1%） |
| 利息收入 | 0.1 （0.5%） | 政府净投资 | 0.2 （0.7%） |
| 其它财产收入 | 0.1 （0.6%） | | |
| 其它转移收入 | 0.2 （0.9%） | | |
| | | | |
| 收入合计 | 6.8（29.0%） | 支出合计 | 9.6（41.1%） |
| | | | |
| 附：赤字 | 2.8（12.1%） | | |
| 其中：初级赤字 | 1.9 (8.4%) | | |

美国一般政府部门财政收支，2021年
（万亿美元，括号中数字为占国内生产总值%）

与一般人印象中所谓美国是“自由市场经济”典范的印象相反，现代美国资产阶级国家的支出规模庞大，对资本主义国民经济深度干预。2021年，美国各级政府支出的总规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1%。其中，“政府消费”是用于维持资产阶级国家正常运行的支出（用于支付包括军队在内的政府部门雇员的工资、维护基础设施、更换军事设施和装备等）；这些支出，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4%。政府转移支付主要是政府支付的社会保险金（包括给失业人员提供的保险金及给退休人员发放的社会保险金），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这是美国资产阶级政府为了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稳定不得不支付的费用。在新冠疫情以前，美国政府给企业部门的补贴很少。新冠疫情后，美国政府给企业部门的补贴增加到约5000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这反映了美国资本主义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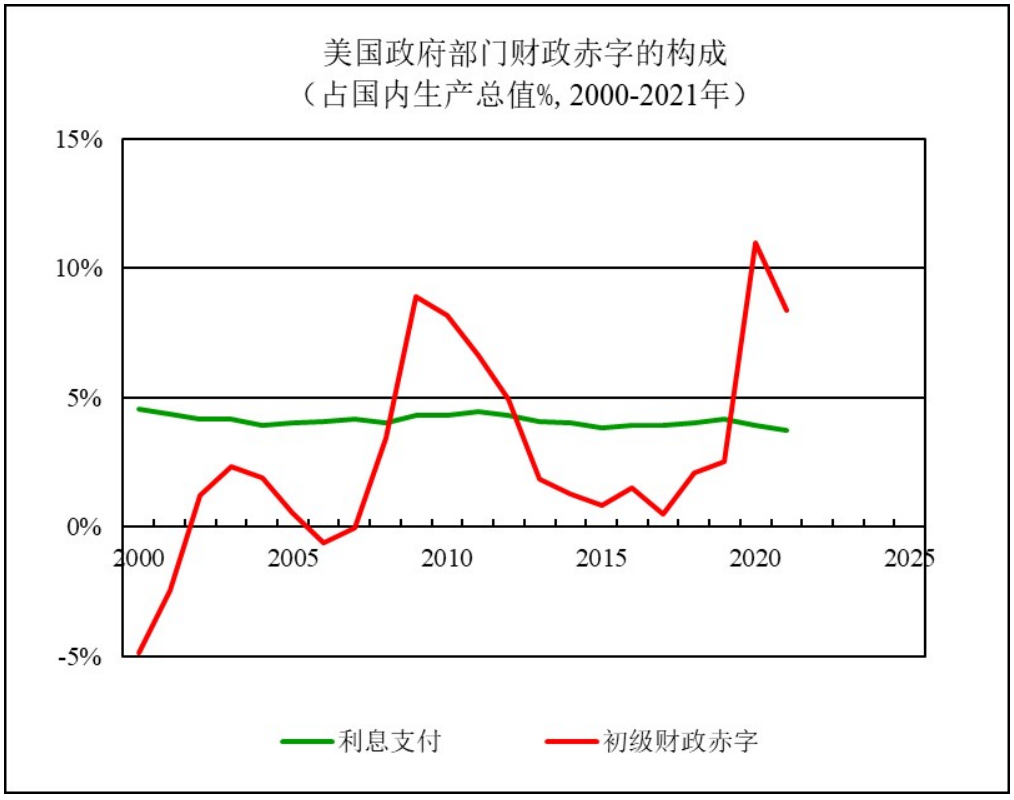
盾的最新发展。美国资产阶级政府在生产性资本积累方面的投入很少，政府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到1%。

在政府收入方面，随着美国资产阶级统治日益腐朽、阶级矛盾加深，政府税收的绝大部分负担都落在了劳动人民（包括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身上。各项政府收入中，各种间接税（如销售税、增值税、关税、房产税）以及社会保险税（又名“工薪税”）差不多完全由劳动人民负担，个人收入所得税也主要由劳动人民负担；以上各项合计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主要由资本家阶级负担的企业收入所得税仅有不到4000亿美元（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

这样，一方面，美国资产阶级政府在内外矛盾的逼迫下不得不维持庞大的支出，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用各种方法逃避税收负担，而劳动人民缴纳税赋的能力已经达到极限；这就导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在2021年达到了2.8万亿美元的惊人规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2%）。

如果用政府部门的财政赤字减去净利息支付（即利息支付减去利息收入），所得到的结果就是政府部门的“初级财政赤字”。简单地说，政府部门的初级财政赤字就是当政府部门债务为零时也会发生的赤字，可以更好地反映资产阶级政府基础性的收支不平衡的状况。

下面第三个图说明了自2000年以来美国政府部门财政赤字的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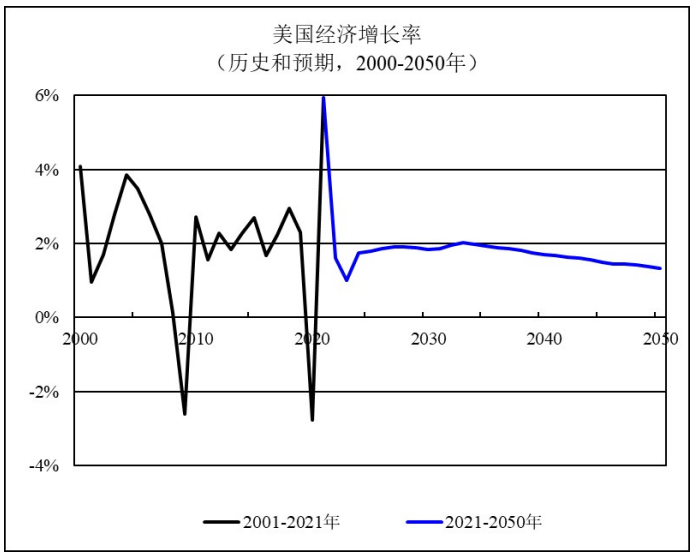


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美国的中央银行（联邦储备委员会）大量增加货币供给（即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使得利率不断下降。这样，虽然美国政府部门债务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上升，但美国政府部门的利息支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始终在4%左右波动。然而，随着美国经济面临着通货膨胀加速的困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被迫提高利率，美国政府利息负担相对稳定的时代很快就要结束了。

在2000年，美国政府部门的初级财政平衡还处于盈余的状态。到了2003年，随着美帝国主义对伊拉克发动侵略战争，美国政府的初级财政平衡已经出现了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2%的赤字。在2009年经济危机期间，美国政府的初级财政平衡逼近国内生产总值的9%。到了奥巴马执政后期和特朗普执政前期，美国政府部门的初级财政赤字一度回落到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左右。2020年，随着新冠危机爆发，初级财政赤字暴涨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1%。在2012-2021年的十年期间，美国政府部门平均的初级财政赤字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3.5%。

美国资产阶级政府目前这种财政收支严重失衡的状况还能维持多久呢？这首先要看美国政府部门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未来变化的趋势。与资产阶级媒体所鼓噪的、被资产阶级驱使的一批所谓技术人士所迷信的相反，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技术进步速度不是在加快，而是在放慢。近年来，美国经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越来越慢。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2.0%；2001-2010年，美国经济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下降到1.6%；2012-2021年，美国经济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进一步下降到1.2%。如果假设美国经济未来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速度可以大致维持在1.5%，随着美国劳动力队伍增长逐渐放慢，美国经济整体的增长率仍然会趋于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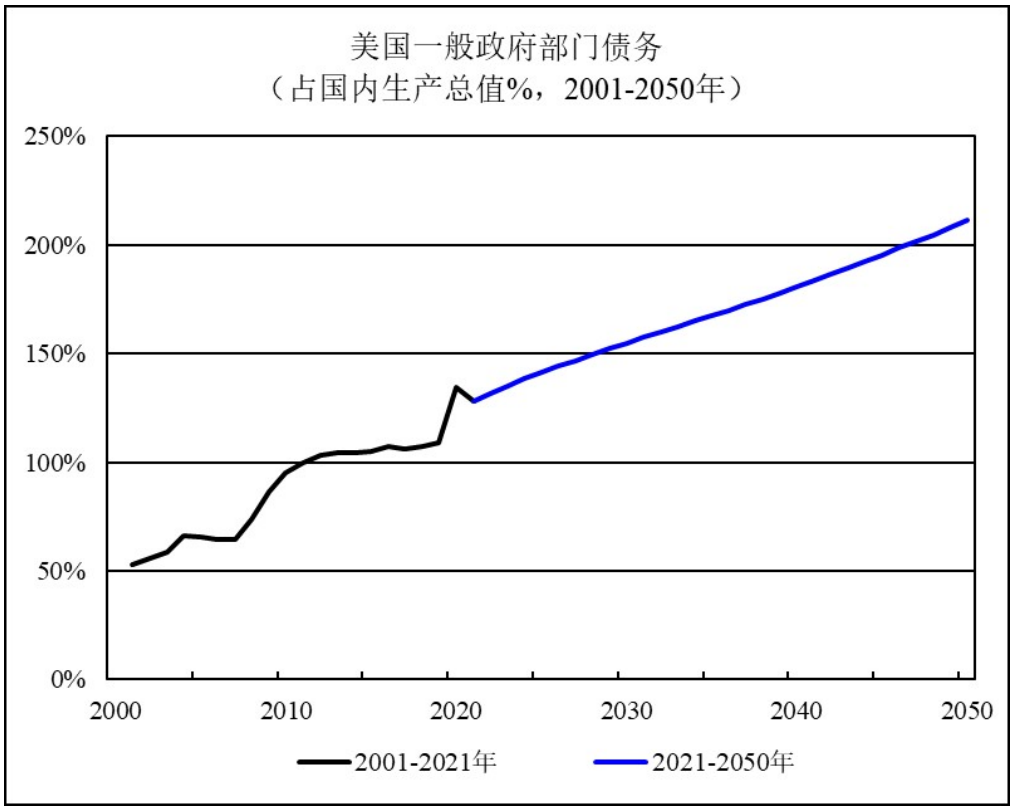
下面第四个图比较了2000-2021年美国经济在历史上实际的增长率及2022-2050年预期的增长率：



预期美国经济的增长率在2025-2035年期间恢复到大约2%，此后即趋于下降，于2050年下降到1.3%。这里说的预期经济增长率，指的是预期的常年平均增长率，不包括遇到经济危机时经济负增长的情况。

有了预期的未来经济增长率，再加上一些假设——假设未来美国政府部门的初级财政赤字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4%，假设美国政府部门在债务上支付的平均利率是3%（大致相当于美国政府部门近年来在债务上所支付利率的平均水平），再假设未来每年的通货膨胀率是2%——据此就可以推算美国政府部门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未来变化的情况。

下面第五个图说明了美国政府部门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历史上以及在未来预期变化的情况：




按照上述假设，美国政府部门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从现在的约130%增加到2050年的约210%。如果上述假设的条件不变，长远来说，美国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会在2050年之后一直趋于上升，直至达到13.3倍的天文数字[46]。

46. 一个国家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长期理论极限可以用如下公式计算：长期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初级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 /（经济增长率－实际利率）。在本文的假设中，美国政府部门未来的初级财政赤字为国内生产总值的4%，未来的经济增长率为1.3%，实际利率（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为1%，所以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理论上限是：4% / 0.3% = 13.3。

当然，这是一种理论上的极端情况。远在达到这样的极端情况之前，如果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矛盾的各项基本条件不发生变化，美国资产阶级政府的财政应当早已发生崩溃了。

以2050年来说，如果美国政府部门的债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1倍，而平均支付的利率仍为3%，美国政府部门每年的利息支付就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以上；再加上每年初级财政赤字为国内生产总值的4%，合起来的财政赤字就会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这还是在正常年景平均的财政赤字情况，在经济危机期间财政赤字将更加暴涨。

上述计算假设通货膨胀率保持在2%的低水平。但是，美国现在已经进入通货膨胀加速的时代，未来的名义利率也势必上升。如果未来美国政府在债务上支付的平均利率达到5%（大致相当于本世纪初美国政府在债务上所支付利率的平均水平），那么，到2050年，美国政府部门每年仅在债务上支付的利息支付就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5%，再加上初级财政赤字，总的财政赤字就将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15%。

美国政府部门的财政赤字或者要靠向私人部门借贷来解决，或者要靠向国外部门借贷来解决。美国私人部门的财务盈余除了在经济危机期间会大幅度上升以外，在一般的正常年景往往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见上面第二个图）。如果政府部门的财政赤字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5%，而私人部门的财政盈余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美国经济的经常账户赤字就会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按照美国经济目前的经济规模，这相当于需要每年从国外吸收2.5万亿美元的资本净流入。历史上，美国经历过的最大规模经常账户赤字是在2006年，当时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超过了800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6%；两年后，美国即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如果美国政府部门的财政赤字既无法通过向私人部门借贷来解决，也无法靠国外资本净流入来解决，美国政府债券将会崩溃，美国资产阶级政府也将陷入无法克服的财政危机。

上述分析是按照现有趋势推算的结果。实际上，一旦美国资本家意识到美国资产阶级政府的财政危机不可避免，他们就会逐步地减少持有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债券，造成债券价格暴跌、利率大幅度上升（利率与债券价格成反比），导致美国财政危机提前爆发。不仅如此，如果国外的资产阶级政府和资本家意识到美国财政危机不可避免，也会主动减少持有美国政府债券和其它美元资产，导致美国可以从国外获得的资本净流入锐减，不足以弥补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从而引起美元崩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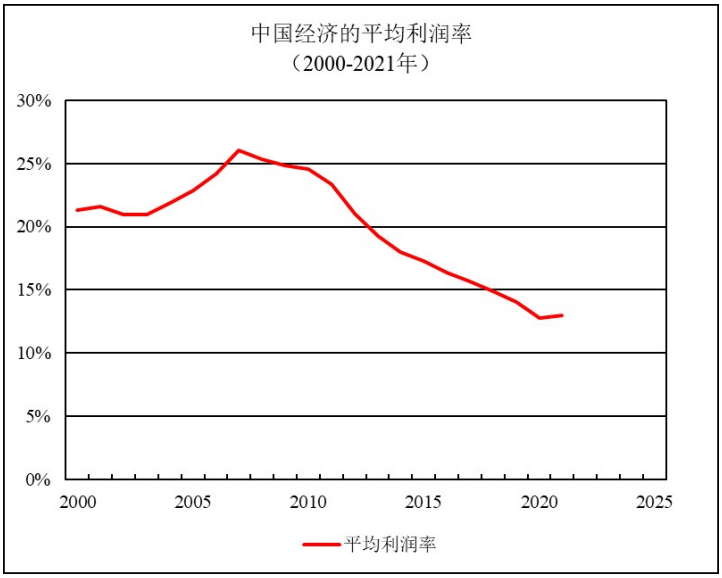
那么，美国资产阶级政府的财政危机对国际阶级斗争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美国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最大的出口市场。由于俄乌战争以及欧洲资本主义面临崩溃，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对欧盟的出口即将受到重创。如果中国再失去美国这个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贸易平衡必然由顺差转为逆差。再结合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其它矛盾（红色中国网另有论述），这使得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在未来有提前爆发的可能。

就中国资产阶级政府的财政来说，目前，财政危机仅限于一部分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暂时稳定。未来，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显著放缓，而国内外矛盾不断加深，可以预期，中国资产阶级政府也将面临难以克服的财政危机，从而为二十一世纪中国革命的到来准备条件。关于这一问题，红色中国网将在适当时候进一步讨论。

# 中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和财政危机

远 航 一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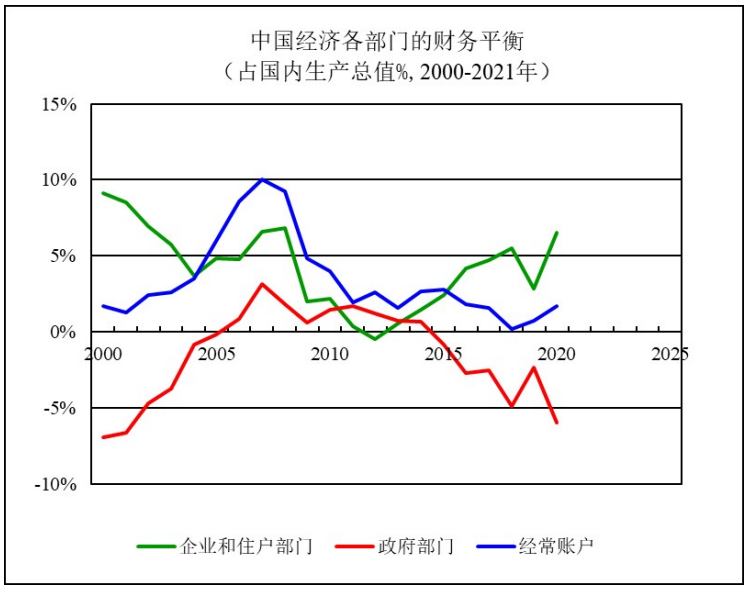
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随着半外围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的阶级结构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城市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队伍不断壮大，斗争力量不断增强，他们对广泛的经济与政治权利的要求与中国资本主义残酷剥削廉价劳动力的体制发生着越来越尖锐的矛盾。另一方面，与历史上的核心国家不同，中国资产阶级无法通过剥削广大的外围和半外围地区、攫取足够的超额利润来缓解内部的阶级矛盾。这些矛盾集中表现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平均利润率持续趋于下降。下面第一个图说明了自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的情况。



2007年时，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曾经高达26%；到2021年，已经下降到了13%，与2007年相比下降了一半。平均利润率的下降，一方面是因为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斗争力量增强，导致资本家阶级的总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与本世纪初相比有所下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资本家阶级无法染指国际资本主义分工中由核心国家垄断的高价值生产环节，从而导致产出资本率趋于下降（即每单位固定资本存量可以带来的经济产值不断下降）。

只要中国资本主义无法扭转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中国资本主义或迟或早必然陷入无法克服的积累危机，进而出现"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政治局面。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来着重探讨一下未来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积累危机而将要发生的中国资产阶级国家的财政危机。

下面第二个图说明了自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中企业和住户部门、政府部门和对外部门（经常账户）财务平衡的状况：




中国住户部门的财务平衡（即住户部门储蓄减住户部门投资）经常处于盈余状态。2012-2021年，住户部门的财务盈余平均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5%。另一方面，中国企业部门严重依赖借贷来维持高投资，常年处于赤字状态，导致住户部门的财务盈余大部分被企业部门的财务赤字所抵消。近年来，企业和住户部门相加后的财务盈余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5%。

经常账户平衡是一个国家对外部门的财务平衡，相当于企业和住户部门的财务平衡与政府部门（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务平衡之和。2007年，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曾经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0%。到2018年，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

几乎消失。然而，随着新冠危机爆发，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得以经历新一轮出口繁荣，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又出现了扩大的势头。

在2006年至2014年期间，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顺利发展，中国的政府部门一度连续多年处于财务盈余的状态。从2015年开始，政府部门的赤字不断扩大，到2020年已经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

下面第一个表概括了中国一般政府部门（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2020年财政收支的情况：

| 收入 | | 支出 | |
|---|---|---|---|
| 企业和个人所 | 4.8 （4.7 | 政府消费 | 17.4（17.1 |
| 各种间接 | 8.9 （8.7 | 政府转移支 | 7.4 （7.3 |
| 社会保险缴 | 5.5 （5.4 | 利息支付 | 1.1 （1.1 |
| 利息收入 | 0.8 （0.8 | 其它财产支 | 0.2 （0.2 |
| 其它财产收 | 1.6 （1.6 | 政府给企业的 | 1.5 （1.5 |
| 其它转移收 | 0.9 （0.9 | 政府净投 | 4.4 （4.3 |
| 国有土地出 | 3.4 （3.3 | | |
| | | | |
| 收入合计 | 25.9（25.5 | 支出合计 | 31.9（31.4 |
| | | | |
| 附：赤字 | 6.1 （6.0 | | |
| 其中：初级 | 5.0 （4.9 | | |

中国一般政府部门财政收支，2020年
（万亿元，括号中数字为占国内生产总值%）

下面第二个表概括了美国一般政府部门（包括联邦、州和地方政府）2020年财政收支的情况：

| 收入 | | 支出 | |
|---|---|---|---|
| 个人收入所得税 | 2.2（10.6%） | 政府消费 | 3.1（14.9%） |
| 企业收入所得税 | 0.3 （1.3%） | 政府转移支付 | 4.3（20.3%） |
| 各种间接税 | 1.5 （7.2%） | 利息支付 | 0.8 （3.9%） |
| 社会保险税 | 1.5 （6.9%） | 政府给企业的补贴 | 0.7 （3.1%） |
| 利息收入 | 0.1 （0.5%） | 政府净投资 | 0.2 （0.9%） |
| 其它财产收入 | 0.1 （0.5%） | | |
| 其它转移收入 | 0.2 （0.9%） | | |
| | | | |
| 收入合计 | 6.0（28.4%） | 支出合计 | 9.1（43.3%） |
| | | | |
| 附：赤字 | 3.1（14.9%） | | |
| 其中：初级赤字 | 2.3 (11.0%) | | |

2020年，中国资产阶级国家的总收入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相比之下，同年，美国资产阶级国家的总收入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2021年约占29%）。2020年，中国资产阶级国家的总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2%；相比之下，同年，美国资产阶级国家的总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3%（2021年约占41%）。在总的国家干预能力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国家与美国资产阶级国家相比，并无优势。

在中国资产阶级国家的各项支出中，最大的一项是“政府消费”，主要是用于维持资产阶级国家正常运转的支出（其中大部分用来支付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也有一些用来维持公立教育和医疗；这些支出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7%。政府转移支付主要是政府支付的社会保险金以及所谓“社会福利”，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相比之下，政府转移支付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为了扶植资本积累，中国的各级政府向资本家提供大量补贴，每年提供的补贴多达约15000亿元。此外，中国的各级政府通过投资和新建基础设施为资本主义积累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政府净投资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

在政府收入方面，由于半外围资产阶级国家腐败严重、审核企业和个人收入的能力有限，再加上在资本主义复辟中暴发起来的中国资本家普遍贪得无厌、偷税漏税，导致中国资产阶级国家高度依赖给劳动人民带来沉重负担的各种间接税（如销售税、增值税、营业税、关税）。此外，社会保险缴款实际上也完全由劳动人民负担。各种间接税与社会保险缴款相加，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4%。另一方面，可以作为收入再分配手段的企业和个人收入所得税仅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个人收入所得税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相比之下，美国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国有土地转让在中国的资产阶级国家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2020年，国有土地转让净收入（即扣除拆迁补偿等土地转让成本以后的转让收入）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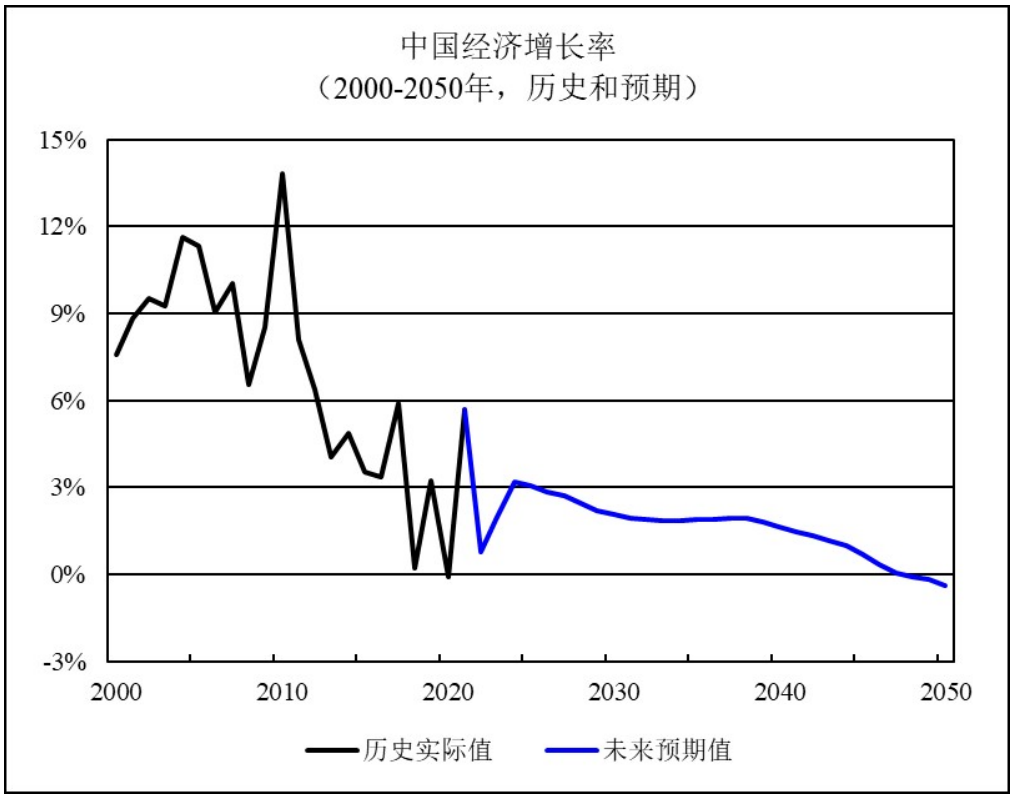
近年来，中国资产阶级国家的财政赤字已经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趋势，许多省市的地方政府财政困难，部分地方政府陷于或濒临破产。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在未来是否会陷入财政危机？这首先要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未来增长的情况。

国内外学者都曾经指出，中国官方的经济增长率很可能显著高估了真实的经济增长率。如果采用国际上学术研究中经常采用的佩恩世界表所估算的中国经济增长率，那么，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按照佩恩世界表的数据并对近两年的官方经济增长率做相应的下调，2001～2010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9.8%（按照官方数据计算年平均增长10.6%）；2012～2021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3.6%（按照官方数据计算年平均增长6.7%）。

未来的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劳动力的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在中国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下，广大劳动群众被迫普遍开展“躺平”斗争，用不生、少生的方法减少眼前生活压力，客观上大大加速了中国资本主义赖以维持其残酷剥削体制必不可少的廉价劳动力队伍的枯竭。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的数据，中国育龄妇女的平均总和生育率已经从1990年的2.5个、本世纪初的1.6个下降到现在的1.2个。即使中国未来的生育率能保持稳定并略有恢复，预计中国的劳动力总数（按2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计算）也将从现在的7.5亿减少到2050年的5.5亿，平均每年减少约1%；至本世纪中期，劳动力队伍每年萎缩的速度将超过2%。

近年来，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趋于下降。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目前约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上世纪四十年代时，美国经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美国经济现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此后的三十年间，美国经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假设中国经济未来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将从现在的约4%逐渐下降到约2%。

下面第三个图比较了2000-2021年中国经济在历史上实际的增长率及2022-2050年预期的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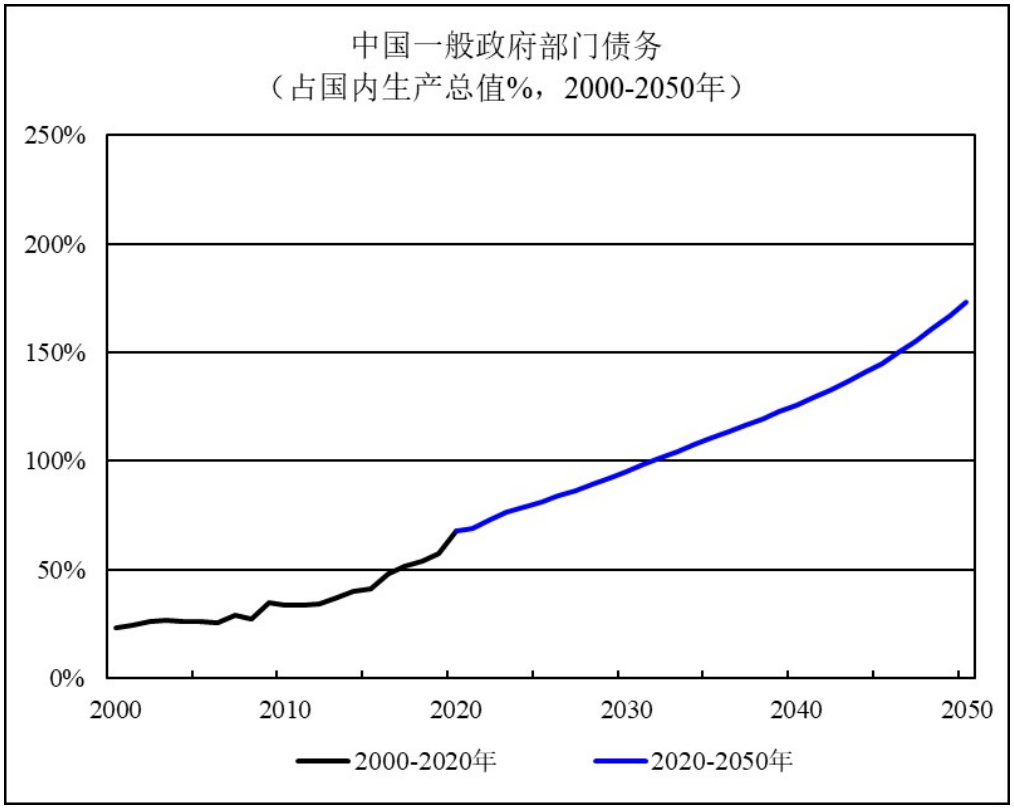



预期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在2025年前后可以恢复到大约3%，此后即趋于下降。到2045年以后，由于劳动力队伍快速萎缩，劳动生产率增长放慢，整个经济将陷

入负增长。这里说的预期经济增长率，指的是预期的常年平均增长率，不包括遇到经济危机时经济萎缩的情况。

有了预期的未来经济增长率，再加上一些假设，就可以推算中国政府部门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未来变化的情况。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假设未来中国政府部门的初级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减去利息支付以后的部分）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4%，假设中国政府部门在债务上平均支付的实际利率（即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为1%。

下面第四个图说明了中国政府部门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历史上以及在未来预期变化的情况：




按照上述假设，中国政府部门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从现在的约70%增加到2050年的约170%。如果上述假设的条件不变，中国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2050年之后还会继续趋于上升，至本世纪末达到4.7倍。

以2050年来说，如果中国政府部门的债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7倍，而平均支付的名义利率为5%，中国政府部门每年的利息支付就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5%；再加上每年初级财政赤字为国内生产总值的4%，合起来的财政赤字就会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3%。这还是在正常年景平均的财政赤字情况，在经济危机期间财政形势将更加恶化。

政府部门的财政赤字或者要靠向私人部门借贷来解决，或者要靠向国外部门借贷来解决。如果住户和企业部门各自的财务平衡相抵后得到的盈余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5%，那么，要支撑高达国内生产总值13%的财政赤字，中国经济的经常账户逆差将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8%。历史上，美国经历过的最大规模经常账户赤字是在2006年，当时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6%；两年后，美国即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以上的分析还没有考虑到未来随着中国经济陷入负增长，政府转让国有土地收入将面临枯竭的情景。如果政府部门的财政赤字既无法通过向私人部门借贷来解决，也无法靠国外资本净流入来解决，政府债券将会崩溃，中国资产阶级政府将陷入无法克服的财政危机。不仅如此，如果资产阶级国家的财政危机伴随着巨额经常账户逆差，而又发生大规模资本外逃的情况，到那时，中国经济还将面临严重的国际支付平衡危机。

历史上，长期而持久的财政危机往往是王朝颠覆的前奏，是“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具体体现。未来中国资产阶级国家的财政危机将为伟大革命形势的到来准备条件。

# 美国工人工资高——是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工人斗争强还是不平等交换?

远 航 一 号

**杨坚网友问:**

远航同志，有人说不同国家同一行业的劳动者待遇不同，主要是由于跨国剥削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导致的?

**远航一号答:**

杨坚网友，你好！你提的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学很多具体问题，也是很多网友关心的，现在单开一个帖子答复你。

首先，你在问题中所说的“待遇”，我理解主要指货币收入或工资率。其它方面的劳动者“待遇”，比如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劳动安全保障条件等，也是重要的。这里为了便于讨论，暂且忽略。

接下来，先来探讨一下不同国家同一行业劳动者的工资率不同，会不会主要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造成的。关于不同国家，虽然你在问题中没有明说，但我理解，你主要是想问，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处于不同结构性层次的国家（比如分别处于核心、半外围、外围的国家）相互之间的工资率差异。因为处于同一结构性层次的不同国家劳动者相互之间工资率的差异相对较小。

为了讨论，首先需要定义一下劳动生产率。原则上，劳动生产率既可以指某一行业的劳动者平均每单位劳动时间创造的净产值（当用货币来计算的时候，即从总产值中扣除全部物质消耗成本以后剩余的部分），也可以指某一行业的劳动者平均每单位劳动时间生产的净产品（当用实物来计算的时候，这里的净产品即与前述净产值相对应的实物产量部分）。按照货币计算的劳动生产率与按照实物计算的劳动生产率既有一定的联系，又有很大的差别，如果不注意区分，在讨论国际比较时，往往会造成很大的混淆。

这里说的净产值也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工资、利润和税收的来源。净产值大致相当于（但不完全等于）增加值（增加值相当于净产值加国定资本折旧），而增加值是资本主义国民经济核算中用来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基础。

在实际的数据分析中，要找到各行各业净产品的数据往往十分困难，所以在许多情况下，不得不用平均每名工人在一定时间内生产的总产品来作为实物劳动生产率的近似指标。

搞清了上述劳动生产率的几种不同概念和定义以后，下面我们就可以来探讨怎样比较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同结构性层次的不同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下面主要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比较为例，但相同逻辑也适用于其它的核心国家与半外围国家之间、其它的半外围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或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的比较。

显然，当我们比较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或半外围国家）同一行业按照货币计算的劳动生产率的时候（经过汇率换算以后），核心国家劳动者按照货币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必然大大高于外围国家（或半外围国家）劳动者按照货币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因为既然我们已知，核心国家按照货币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外围国家（或半外围国家）按照货币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许多倍，那么在统计上，核心国家全部行业或者绝大多数行业按照货币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势必是外围国家（或半外围国家）按照货币计算的劳动生产率的许多倍。问题是，这种按照货币计算的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是怎么形成的，是主要由核心国家、外围国家（或半外围国家）同一行业实物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决定的？还是主要由核心国家、外围国家（或半外围国家）相互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即核心国家以某些行业或某些产品的一单位劳动来交换外围国家或半外围国家另外一些行业或另外一些产品的许多单位劳动）决定的？

在历史上，当核心国家率先实行工业化而外围国家尚未发生工业化、半外围国家工业化刚刚起步的时候，核心国家确实在若干工业部门拥有实物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巨大优势。比如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机器棉纺织工业相对于印度、中国的传统手工棉纺织业就有巨大优势。但是，如果我们扣除掉机器棉纺织工业巨

大的物质消耗，那么，倘若比较的是按照平均每名劳动者所生产的净产品而不是平均每名劳动者所生产的总产品计算的劳动生产率，英国机器工业的优势未必像许多历史资料上所渲染的那么大。

事实上，在工业革命的前五、六十年，英国本地的棉纺织业还是竞争不过印度的棉纺织业，以至于英国要对从印度进口的棉纺织品征收很高的关税；英国殖民者从印度掠夺的棉纺织品也不是主要用于在英国销售，而是用于到非洲去与部落酋长交换奴隶。即使在鸦片战争之后，虽然中国的土法纺纱业在进口洋纱面前很快溃败，但是与中国农村半自给自足经济相结合的手工织布业仍然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在整个的十九世纪，手工织布始终占据着差不多全部的中国棉布市场。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手工织布仍然占据着中国棉布市场的五分之二。由此可见，以往自由派所宣扬的关于资本主义“技术进步”的神话严重夸大了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相对于外围国家传统制造业在生产率方面的优势。

那么，在经过二十世纪晚期、本世纪初最新一轮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以后，许多核心国家已经“去工业化”，大量工业部门或工业部门中的生产性环节已经转移到外围、半外围国家。这种情况下，在外围、半外围国家生产某一种工业产品的工厂很可能与原来在或者仍然在核心国家生产同一种工业产品的工厂使用同样的设备、同样的技术乃至同样或近似的管理方式，从而两者之间在实物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距基本消失或者大大缩小。比如，苹果手机的代工厂，无论是设在中国、越南、印度还是美国，肯定是使用大致相同的设备和技术。台积电的芯片工厂，只要是生产同一类型芯片的，无论是搬到美国，还是搬到中国，肯定还是用同一套光刻机和其它设备、同一批管理人员。

以传统制造业部门钢铁工业为例。2019年，根据一份材料，美国钢铁工业就业人数约83000人，当年美国粗钢产量8800万吨，平均每名就业人员产钢约1060吨。同年，据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规模以上钢铁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企业平均用工人数225万人、粗钢产量9.96亿吨，平均每名用工人员产钢约440吨。所以平均每名美国钢铁工人的钢产量大约是平均每名中国钢铁工人钢产量的2.4倍。这是一个粗略的比较，没有考虑钢铁工业的其它产品（比如生铁、钢材），没有考虑两国钢铁工业物质消耗水平的差别（比如，如果美国钢铁工业的自动化水平更好，单位产品的物质消耗可能也更高），也没有考虑两国劳动者年劳动时间的差别（中国工人的年劳动小时数更高）。但是，根据这个粗略指标，我们可以说，美国钢铁工业的实物劳动生产率大致是中国钢铁工业实物劳动生产率的两至三倍（由于定义的差别，广义的美国钢铁行业就业人数可能多达28万至38万人，如果按美国钢铁行业广义就业人数来计算，中国钢铁工业的实物劳动生产率甚至超过美国）。

那么，两国钢铁工业就业人员的工资水平差距是怎样的呢？2019年，美国钢铁行业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约63300美元，中国钢铁行业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折算为美元后约12400美元（两者均不包括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和其它福利）。所以，美国钢铁工业工人的年平均工资大约是中国钢铁工人年平均工资的5倍；如果考虑到中国钢铁工人的年劳动时间更长，那么，美国钢铁工业工人的小时平均工资大约是中国钢铁工人小时平均工资的7-8倍。可见，两国钢铁工人在工资方面的差距倍数大大超过实物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距倍数。

然而，钢铁工业仅是整个经济中的一个特殊部门。美国大约五分之四的就业人员在各种服务业就业，中国现在也有大约一半的就业人员在服务业就业。在这方面不大容易找到统计上的实物劳动生产率比较。但是，我们仅从生活经验中观察一下。在中、美两国都有生活经验的朋友可以评估一下，比如类似于零售业（比如超市）、快餐业、理发业、修理业、快递服务业等，如果按每名就业人员在单位时间内所服务的顾客人数来计算，中国在这些行业中的“实物劳动生产率”很可能显著高于美国。在另外一些服务业中，比如教育业（如果按每名教师每年“生产”多少学生来计算）、医疗卫生业（如果按每名医生每年“服务”多少患者来算），中国按量计算的“实物劳动生产率”肯定会大大超过美国，但如何对这些行业的“服务质量”做调整，是个问题。概括来说，在占整个国民经济一半至五分之四的服务业中，中国就业人员的实物劳动生产率很可能不低于美国，甚至超过美国。

现在，美国唯一一个平均实物劳动生产率显著大大超过中国的主要经济部门就是农业部门。但是农业部门仅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只有7%（虽然农业就业人数仍然全部就业人数约四分之一）。

如上所述，在现代国民经济的绝大多数行业，中国劳动者的实物劳动生产率很可能并不低于美国劳动者的实物劳动生产率；在一些相对可比的工业部门，中国劳动者的实物劳动生产率即使低于美国劳动者的实物劳动生产率，但其差距也显著小于两国劳动者在工资方面的差距。那么，为什么差不多在所有的行业，两国劳动者相互之间的工资差距都高达几倍甚至十几倍呢？

如果按整个经济来说，2019年，美国平均每名雇员的年平均工资约60200美元（不含雇主缴纳社保及其它福利，后者约占总劳动报酬的五分之一）。同年，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待遇最好、企业行为最“规范”的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约90500元（按当年平均汇率折合约13100美元）；反映中国大多数城镇就业人员收入状况的城镇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约53600元（按当年平均汇率折合约7800美元）；该年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不到4000元，按一年中10个月有收入算，则年收入不到4万元（约合5800美元）。所以，这一年，美国工人的年平均工

资分别是中国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城镇私营单位职工、农民工年平均工资的4.6倍、7.7倍和10.4倍。如果再考虑到中、美劳动者年劳动时间的差距，那么两国劳动者在工资方面的差距就更加悬殊了。

如果说，中、美两国绝大多数行业劳动者相互之间的悬殊工资差距无法用他们在实物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距来解释，那么，这种差距，能不能如某些坚持中帝论的“左派”网友所说，用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福利国家以及工人阶级斗争力量更强来解释呢?

至少在历史上，美国工人阶级确实曾经进行过相当规模的有组织阶级斗争（虽然现在美国的工会已经严重衰落），美国也仍然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资产阶级民主和福利国家制度（虽然两者都在退化中）。但是，常识告诉我们，无论一个国家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怎样强，其最大极限也就是得到这个国家100%的国内生产总值（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一个国家工人阶级斗争力量的强弱，可以影响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总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即劳动收入份额），但显然不能直接影响该国的经济总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国内生产总值规模）主要是由阶级斗争以外的因素（如资源、技术、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来直接决定的，虽然阶级斗争通过影响经济制度、政治稳定性有可能对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发生或者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而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工人阶级斗争力量增强往往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

近年来，美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大约是国内生产总值的60%，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大约是国内生产总值的45%。美国的劳动收入份额确实高于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前者大约是后者的1.3倍。所以，中、美两国工人阶级斗争力量方面的差别至多只能解释中、美两国劳动者工资水平巨大差距的一小部分。

既然这样，什么才是中、美两国之间工资水平悬殊差距的最主要原因呢？在经过了过去几个世纪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之后，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深度地卷入到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中，其结果就是导致几乎所有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不是专门出口某几种产品（中小国家）就是专门出口某些类型的产品（大国）。中国是专门出口中低端制造业产品的半外围国家，美国则是专门出口某些高技术制成品、知识产权以及大宗农产品的核心国家。中、美两国在相互贸易中一般不会相互进口和出口完全同类、性能和品牌相同的产品，虽然不排除个别的例外（这种现象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中国从美国进口一种产品，必然是因为该产品的性价比与中国国内市场上完全同类产品相比更加优越，那么中国所生产的完全同类产品自然不会再出口到美国）。所以，一般来说，中国出口的产品（包括所谓“服务”）与美国出口的产品（也包括所谓“服务”）或者分属不同的行业，或者分属同

一行业中不同的细分类别，或者分属同一细分类别中不同的价值链环节，从而它们的实物劳动生产率根本无法直接比较。

当不同的国家分别从事不同产品的生产，而这些产品又在国际市场上交换时，这些产品的交换比率既不由各自国家国内市场上的价值来决定，也不由并不存在的“国际价值”来决定（因为不存在国际间的劳动力自由流动，从而不存在形成“国际价值”的经济机制），而只能由参加贸易的各国在世界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来决定。具体来说，核心国家通过其以往长期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剥削所形成的“垄断优势”（这种垄断优势既包括技术垄断，也包括政治、军事、金融等方面的帝国主义特权，而所谓“技术优势”本质上也是在过去几百年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形成的），得以用某些产品中所包含的较少劳动来交换外围或半外围国家另外一些产品中所包含的许多单位劳动。

以中美贸易为例，据红色中国网测算，一单位美国劳动在国际贸易中大约可以交换5单位的中国劳动。于是，当我们比较美国和中国可贸易品（大致包括所有的工农业产品）按货币计算的劳动生产率时，美国可贸易品行业按货币计算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就是中国的5倍。但这种按货币计算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很大程度上与按实物计算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无关，而主要是由中、美两国之间不平等交换的规律所决定的。

这时，假设美国在可贸易品行业中的工人通过阶级斗争使得其工资率达到这些行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60%，而中国在可贸易品行业中的工人通过阶级斗争只得到这些行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45%。这样，在可贸易品行业中，美国工人的平均工资大约就是中国工人平均工资的6-7倍。这与我们所观察到的中、美两国工人工资的差距大致相符。

那么，非可贸易品行业（大致相当于服务业和建筑业）中工人的工资又是怎样决定的呢？在资本主义国内市场中，劳动力是在不同行业之间相互流动并竞争的。所以，在长期，在扣除教育、熟练程度等影响后，不同行业工人的平均工资会大致趋同。所以，在扣除教育、熟练程度等影响后，非可贸易品行业工人的平均货币工资会趋近于可贸易品行业工人的平均货币工资。当这种趋同大致完成后，在非可贸易品行业中，中、美两国货币工资的差距也会是6-7倍。

不平等交换的实质是外围、半外围国家劳动人民所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移到核心国家。那么，在像美国这样的核心国家，工人阶级是否以及怎样从不平等交换中受益呢？

假如一个美国工人一年劳动2000小时，这2000小时所生产的价值用劳动时间计量还是2000小时、而用货币计量是10万美元。这位美国工人的年工资是6万美元，那么其年劳动力价值按劳动时间计算就是1200小时。

为简便起见，假设这位美国工人不储蓄。年收入6万美元中大约4万美元用来购买各种“服务”（其中大头是房租或房贷、医疗、子女教育等），2万美元用来购买实物商品。再假设用来购买实物商品的2万美元中有1万美元用来购买美国本地生产的商品，另外1万美元用来购买进口商品。

这样，这位美国工人一年用5万美元用来购买本国生产的商品或服务，如果按劳动时间计算，就相当于购买了1000小时的本国劳动（如上，2000小时所生产的价值按货币计算是10万美元，则1000小时所生产的价值按货币计算相当于5万美元）。

这位美国工人剩下的1万美元将购买进口商品。假设这位美国工人节省过日子，因此将这1万美元用来全部购买比较廉价的来自外围、半外围国家的进口商品，而1万美元在国际市场上平均可以购买包含了1000小时的外围或半外围国家劳动的商品，比如来自中国的手机、来自孟加拉国的衬衫、来自中美洲的水果、来自南美洲的“社会责任”咖啡、来自东南亚的海鲜，等等）。

这样，一年下来，这位美国工人实际付出了2000小时的劳动；作为回报，得到了相当于可以购买1200小时本国劳动的货币凭证。用这些货币凭证，这位美国工人共购买了相当于1000小时本国劳动的本国商品和服务以及相当于1000小时外国劳动的外国商品。

在这个具体的例子中，美国工人得到的本国和外国总劳动显然已经大大超过他本身的劳动力价值，而其得到的本国和外国劳动总量恰巧等于他所付出的年劳动总量。这并不等于说这位美国工人没有被剥削，因为他所付出的劳动时间确实超过了他的劳动力价值，从而确实为美国资本家生产了剩余价值，但是他也确实从国际不平等交换中受益。

当然，在这个例子中，美国工人得到的本国和外国总劳动恰好等于其所付出的年劳动时间，多少是一种巧合（虽然上述的各项数字比例大致符合美国经济有关指标的实际比例）。在现实生活中，不难想象美国工人得到的本国和外国总劳动少于或者多于其所付出的年劳动时间的情形。

# 文　　艺

# 评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
# ——我们需要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

欧洲上空的幽灵

## 民族文化的解构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将民族与国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绑定在一起，但倘若仔细讨论民族与国家概念，恐怕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国家概念经常被描述为一种政治概念，即政治实体。对于国家概念的定义，历史上有不少学派对此进行讨论。在这里，我们还是用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的概念，即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马克思主义毫无疑义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去下定义，这也符合我们的研究思路，至于有关国家概念的讨论，暂时还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主要内容，所以这里不多阐述。

而对于民族问题，我们经常想到在同一地域，所形成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人们所组成的共同体。但这一概念仍然是模糊一下。那就让我们仔细研究民族形成的历史吧。

民族并不是本来就有的，而是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产物。我们知道，人类共同生产一方面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如生产分工)，另一方面共同生产也能为生产提供稳定条件。人类所形成的集体便源于人类生产的需要，由这种生产进而使人类联结起来，形成各种各样的关系，其中在生产中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血缘关系也来自于生产发展，也许这里就有些违背

现代的伦理道德了，但人类在此之前确实没有血缘关系，这一点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是有说明的，那时并没有父亲母亲之称。说这些就有些扯远了。所以民族便是从生产中形成的，那么民族文化也就是从生产中来的。现在当我们说明民族文化的来源时，我们也就能够讨论民族文化的意义了。

现如今的我们经常强调要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或许许多人难以说明起根本原因。既然我们说民族文化从生产中来，那么这种民族文化首先便是服务于生产，因此民族文化首先是适用于本民族的生产方式，尽管两个民族的生产方式同样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两者仍然存在区别，这种区别与地理环境等因素有关，这是其一。其二，我们知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形成阶级，阶级斗争发展成出国家这一阶级统治工具，这时民族文化同时也是阶级统治的一个工具，因为武装暴力在一些时候不能很好解决阶级之间的矛盾，甚至可能引起其他阶级的大规模反抗，从而招致统治阶级自己的灭亡。而文化这种温和的思想统治往往能使被统治阶级安于统治，例如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就是愚昧被统治阶级、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当然我们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仍然是要有所取舍的，关于如何取舍，我们后面在说明。

但倘若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讨论仅仅只是如此，那还是不够的。我们只是讨论了民族文化对于生产与阶级斗争的意义，但这仍然还是以民族为单位，或者说，并没有完全解构民族文化，特别是民族文化发展问题。而在某种意义上，有的时候民族文化发展本身也是阶级斗争。

每个民族都经历过社会形态的更替，民族文化也在这个社会变革中得到自己的发展。尽管社会形态更替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但历史运动主体本身却不是生产力，而是人。在阶级社会，人属于一定的阶级，人与人的关系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从而在社会变革中，阶级斗争起着推动作用。社会形态的更替同时也是文化的更替，文化斗争同时也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这一点在历史上的例子有不少。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就是地主阶级即将登上历史舞台的文化斗争，启蒙运动是资产阶级向封建统治者发动进攻的文化斗争，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文艺是人民大众对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文化的文化斗争。各个阶级之间的文化斗争是民族文化实现自身发展的形式之一。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统治，同时也代表着服务于该阶级的文化取代被推翻阶级文化的统治地位，民族文化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变化，当然这种变化并不是完全排斥过去的文化，而是将其改造。例如孔夫子的思想实际上就受到董仲舒的改造，成为服务于地主阶级的文化。而一个阶级所提倡的文化与过去文化之间是怎样的关系，这与该阶级本身的经济地位和阶级力量决定，例如说，欧洲资产阶级在文艺复兴运动还需要古希腊的文化来委婉宣传自己的思想，而启蒙运动则直

接宣传，这是因为两者在不同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但在历史进程中，有一个时代的民族文化发展却不同于过去时代的发展，这个时代便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尽管我们说民族的形成客观上是从原始社会开始的，但是真正运用民族主义动员民众的，却是资产阶级的功劳。例如法国大革命战争中，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就是运用民族主义动员全国民众参加战争，并且也正是通过法国大革命，欧洲民族主义运动逐步兴起，欧洲各民族纷纷宣告民族独立。这一论断在民族解放运动也是适用的，例如，中华民族的概念最开始由梁启超提出，孙中山先生而后提出五族共和。当然民族观念的日益深入人心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但请不要由此认为民族观念深入人心只是民族问题，这只是表面现象，实质还是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之所以需要民族便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要求打破本国经济分散、封闭，统一的民族、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政权才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同时资产阶级能够动员起民众在于资产阶级提出适当的革命纲领，这种适当的革命纲领得到了各阶级的支持，才有可能动员民众。例如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没有提出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因而不能团结中国广大的农民，而中共在不同时期提出不同的土地纲领，但始终符合农民们的需要，才能够动员农民，形成统一的民族。即便是抗日战争全民族团结的局面，也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改变了国内各阶级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可能形成不分阶级共同抗战的说法。

因此，民族观念本质是资产阶级的范畴，民族主义是能够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同样资产阶级依靠建立统一的民族形成统一的民族文化、统一的民族观念。换句话说，是资产阶级使民族文化成为民族文化(当然中国历史表明这个过程是由无产阶级完成的，我只是针对大多数而言)，这当然不是说先前不存在民族文化，而是说，民族文化没有真正深入民众之中，甚至当时根本没有民族文化的概念，当时依赖于分散的自然经济，没有形成统一民族观念的条件，自然也就没有民族观念之说。因此，当我们讨论文化入侵问题时，实际上我们是讨论后资产阶级时代的文化概念，如果我们把后资产阶级的文化概念安在前资产阶级时代，这种做法是否正确，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资产阶级动员民众形成统一的民族文化，但不能由此改变民族文化的阶级性质，资产阶级只是用更为统一隐蔽的民族文化来掩盖资产阶级文化，资本主义发展到后期，我们便发现，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不过是为了资产阶级的一己私利，不过是为侵略其他民族、为自己发展的借口和谎言，不过是为掩盖本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的遮羞布。

当我们从生产方式和阶级斗争的角度解构完民族文化后，我们就可以讨论我们的主题——文化入侵了。

## 文化入侵的主客体、基本动因以及文化入侵与阶级斗争的关系

从历史和现在的情况来看，进行文化入侵的国家主要是帝国主义国家(或者说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现在一些人说这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但这至多是验证了这句话，却不能从根本上说明文化入侵的原因，至于什么灭亡我民族之类的，也是如此。

西方列强用工业化造出的船坚炮利打开我国的国门，随之而来的就是西方的商品与文化，西方列强就是在这时对中国进行文化入侵的。例如西方列强会派遣传教士宣传所谓的宗教，以此来麻痹中国人民的神经，消解中国人民的斗争意识，还有依靠赔款来建立输出西方意识形态的学校，例如清华大学。

因此，西方的文化入侵是同殖民化相结合的，如果不能认真研究西方殖民化与文化入侵的关系，就不能揭示文化入侵的基本动因。可惜的是，我们今天在网络找不到类似的分析。

西方的殖民化又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关的。我们知道，资本想要实现自身的增殖，需要广大的市场、源源不断的原材料和大量的劳动力。在前期的资本原始积累，殖民地半殖民地成为西方国家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工具，在资本原始积累完成后，资本主义进入全球扩张，同样需要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行资本积累(不是资本原始积累)。

但不论是前期的资本原始积累还是后来的资本积累，殖民化都是充满血腥的过程。

西方生产的产品进入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就意味着那些小商贩和商品生产者要陷入破产。战争带来的沉重赔款，需要由劳动人民赋税，致使大量农民陷入破产。当西方开始资本输出，特别是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国内投资场所饱和后(因为国内垄断)，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工厂，需要大量劳动力，破产的农民则成为工厂工人，在有些地方，地主豪绅同帝国主义一道，将农村劳动力卖到城市去。这样的压迫必然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从三元里抗英到太平天国运动，从义和团运动到四川保路运动，无不展现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面对中国人民的反抗，除了依靠帝国主义和本国政府的暴力镇压外，就是用文化入侵来腐蚀中国人民的斗争精神，文化入侵就是这样由来的。因此，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实质是为了对抗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摧毁本国的民族文化只是手段之一，但不是目的本身。

随着电影行业等文化生产行业的发展，文化本身也成为了资本，文化资本积累也成为资本积累的方式之一，文化也实现资本增殖，那么文化资本输出同时也是资本输出的方式之一。这时，文化入侵又有了实现资本增殖的作用。而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逐步扩张的全世界，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终形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也意味着帝国主义要争夺世界霸权，因为世界霸权能够为资本积累提供稳定的环境，那么经济和政治属于霸权的领域，文化霸权自然不在话下。于是，文化入侵同时也是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必然要求。

但二战后，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的兴起却无法改变本国遭受帝国主义文化入侵的命运。于是，这些又被冠以失去民族自信心的名号，这不可否认是原因之一，但只是讨论表面问题，并没有深入问题的本质。谈到这一点，我们要说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部分特点。

我们把现在世界上的分为三类国家，核心国家、半外围国家和外围国家。核心国家，像日本、美国、韩国、法国、英国等国家，能够依靠强大的科技力量来与外围国家和半外围国家进行不平等交换，从而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半外围国家，像中国、巴西等国，虽然在核心国家目前处在不平等地位(因为科技力量不足)，但仍然在一些科技领域能够占有优势地位，因而能够从外围国家获得超额剩余价值。而外围国家就会悲催了，为前两类国家提供剩余价值。由此，我们就知道世界上三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这种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也就意味着文化竞争上的不平等，那么从这一点上说，帝国主义能够成为文化入侵的主体，而其他国家没有这个能力。除了这个原因，帝国主义拥有发达的教育体系，这种教育体系主导着其他国家的教育，迫使其他国家的教育为帝国主义教育服务。

在现在的人文社会科学中，有多少理论是中国自己的理论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权是在中国自己手里还是西方手里呢？这一社会现象被敏锐的西方左翼学者捕捉到，形成了今天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当然，我认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仍然需要完善，这个需要完善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没有讨论外围国家与半外围国家的文化斗争。而要说明这个斗争，我们需要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进行分析。

谈到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就要大谈历史问题。大家知道，面对民族危亡中国的知识分子曾寻找过各种各样的救国方案，但都失效了，最后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挽救了中国。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又是怎么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呢？让我们先讨论无产阶级是怎么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吧。

最开始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农民阶级起来斗争，但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导致农民的斗争必然失败，而地主阶级试图用西方科技来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

朝，但被日本帝国主义的炮舰撞了个粉碎，后来资产阶级改良派需要依靠清王朝推行资产阶级改革，很快被顽固派镇压下去，结果封建统治者自己搞起了清末新政，促进本国资本主义发展，资产阶级力量壮大后，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了清王朝，但中国却没有因此摆脱被压迫的命运，最后革命果实被窃取，国家分裂，军阀混战不堪。之后新文化运动开始大力批判旧文化，直到五四运动，无产阶级才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广泛传播起来。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为何没能成为领导阶级，这是由于封建生产方式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是落后的，自然不可能成为领导阶级，而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和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能彻底反帝反封建，各个阶级在历史舞台活跃一时，但很快退出历史舞台中央，最后历史把舞台中心让位于无产阶级。如果我们将这段历史和近代文化发展历史相结合来看，我们便会明白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兴起的必然性。当资产阶级成为领导阶级，他们需要资产阶级思想作为指导，于是文化上出现推崇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反对本国封建旧思想的现象，但随着资产阶级不能领导本国革命运动时，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于是属于无产阶级斗争理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兴起。从这里我们便发现中国人民面对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的进行文化斗争，是与各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有关的。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能否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实际上与本国的阶级斗争形势有关。

这一原理被1949-1976年的文化历史所证明。也许对于不少人而言，那段历史几乎没有什么文化上的繁荣，但现实恰恰相反。那段历史中曾经存在现如今都不存在的文化形态--工农兵文化，即便是官方经常诟病的1966-1976年，都出现过不少文化作品，比如讨论中国教育路线的《决裂》，讨论路线问题的《欢快的小凉河》，讨论自主研发还是引进技术《前进四》，中国当时的文化想必不必欧美差，而且当时的欧美也被中国的毛泽东思想所影响，归根到底在于当时的工人农民掌握国家政权，有能力抵抗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而苏联的国家政权却被本国修正主义集团窃取，因而逐步失去了文化斗争的优势。

而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人民公社倒塌、国有企业改革，大量国企工人下岗、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成为巨大的产业后备军，削弱了工人的斗争力量。与此同时，文化上工农兵文化也逐步消失，加上帝国主义文化的入侵，最后在本国改革和帝国主义文化入侵下，中国工农兵文化彻底消失(主流意义上)，只有在那看不见的地方，才有不为人知的、为工人服务的工人乐队。但随着形势不断变化，人们貌似明白了文化入侵的危害，开始反对文化入侵。但我认为许多人没有从阶级立场角度出发，那么我们又为什么要反对文化入侵呢?

## 如何对抗文化入侵?

最近以来的发生的事件反复强调文化入侵，反复强调反对文化入侵，虽然让人们意识到了反对文化入侵的重要性，但到处的文化入侵反倒使人们不知道哪些是文化入侵，哪些不是文化入侵。有些人也许会说，符合民族利益的文化进入我国就不是文化入侵，反之则是文化入侵。可问题来了，民族利益又是什么呢？符合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吗？那么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又是什么？难道周边国家的强大就是威胁民族生存条件吗？那要是一个崇尚和平的民族强大是否就是威胁民族生存的条件呢？估计不少人就陷入这些问题之中。

而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就在于，许多人只是从空洞的民族概念出发研究，他们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民族，他们谈论民族不过是因为我们的官方强调民族观念，于是就失去了对民族概念的解构。所以我们从开始谈论的并不是文化入侵，而是讨论民族概念的解构。大家都知道，射箭需要找到目标是什么，否则就是无的放矢，所以在讨论如何反对文化入侵前，让我们重新讨论文化入侵的问题吧。

依据第一部分对于民族文化的解构，我们把民族文化视为是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而民族文化是适应于生产方式的，同时在阶级社会，民族文化集中表现为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文化。那么我们就可以表明，民族这一空洞概念的背后实质是生产方式和阶级，如果我们不能从生产方式和阶级角度出发去讨论文化入侵，那么我们就会犯先前人们犯的错误，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些帝国主义文化的进入是文化入侵，为什么一部分帝国主义文化进入反而是激起了民族救亡的意识，为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我国反倒不是文化入侵。

我们之前一直强调文化上“为我所用”的原则，这里的“我”在过去指民族，现在我们解构了民族这个观念，那么我们就将这里的“我”代指阶级。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一些帝国主义文化之所以是文化入侵是相对于中国无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而言的，因为这些文化是为了维护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帝国主义与以上阶级的利益是对立的，所以人民大众反对这些文化，认为这些文化进入我国是文化入侵。而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却不仅不拒绝，反而支持这些文化，例如蒋介石就曾推崇过法西斯主义，而当时的国民党当局也日益法西斯化。而帝国主义文化中的另一些文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文化，这些文化对于当时我国那种封建生产方式而言，属于进步文化，所以能够有一些积极作用，特别是在民族资产阶级取得革命领导权时这种作用是比较明显的。但随着革命领导权让位于无产阶级时，资产阶级文化反而不兴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兴起，对于无产阶级而言，这是有利的，所以不属于文化入侵。

于是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入侵只有在讨论阶级概念时才是有效的，一个人支持什么样的文化，取决于他属于哪个阶级，他维护哪个阶级的利益，所以文化入侵这个概念是相对阶级而言的，不能只是用民族泛泛而谈。

我们先前讲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能否能够成功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实际上与本国的阶级斗争形势有关。刚才的例子就很好证明这一点，各个阶级的兴盛同时也是各种文化的兴盛。于是讨论起反对文化入侵，我们就还是要讨论阶级斗争，并进一步说明阶级斗争与帝国主义文化入侵的关系。

首先，我们先说明文化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我们知道，文化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阶级是一个经济学概念，经济斗争是一个阶级最为基础的斗争，所以讨论文化斗争时我们不可能离开经济斗争去讨论文化斗争。文化斗争与经济斗争是相适应的，例如我们第一部分讨论资产阶级分别在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化斗争可以说明这一点。经济斗争以及政治斗争的发展是文化斗争的前提，但绝不是说，文化斗争就是经济与政治斗争的被动决定物，而是说，当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要求文化斗争发展到与阶级斗争相适应的阶段，否则阶级斗争是不可能向前发展的。例如当19世界30-4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继续向前发展时，就必然要求发展出为无产阶级服务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否则工人运动就难以沿着属于无产阶级的方向发展。

帝国主义文化入侵虽然强调了帝国主义这个主体，但这个斗争实际上外围国家和半外围国家人民同帝国主义在文化上的斗争，先前我们说到，外围国家和半外围国家人民是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入侵的主体，那么我们就从外围国家和半外围国家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来认识反对文化入侵的斗争(暂时不考虑帝国主义国家人民的阶级斗争)。最开始人民群众的斗争还不是文化斗争，还只是为了维护自身生存的经济斗争，这个时候人民群众的力量也还是弱小的，还达不到进行文化斗争的水平，此时也是帝国主义文化入侵比较成功的阶段(暂时的)，有的时候人民群众的斗争还是集聚于落后思想或者其他阶级思想的动员下进行的，例如太平天国运动就是在宗教思想影响下进行的，还不属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甚至有的时候，人民群众安于帝国主义的文化统治，例如上个世纪西方帝国主义文化进入我国，在一些媒体的宣传下，我国不少民众有对本国文化失去信心过。但随着阶级力量的不断壮大、阶级斗争不断发展，这时先前的思想文化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斗争需要，人民群众就必须要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入侵，反对帝国主义文化腐朽人民群众的思想，这时人民群众开始有意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入侵，不过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入侵的核心不在于单纯反对文化本身，而在于发展出服务于本阶级的文化，以本阶级的文化对抗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延安文艺就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入侵的光辉典范，大量知识分子同人民群众结合，创

作出服务于劳动人民的文化，对抗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因此，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能否胜利，在于本国阶级斗争的形势，倘若本国反帝的阶级力量还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这个程度是相对于帝国主义自身阶级力量的)时，此时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可以说是成功的，但本国反帝力量逐步强大起来时，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将要受到本国人民的抵制，甚至要同本国人民发展出的文化相对抗时，这时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将不可避免的要失败。

现在，让我们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兴衰沉浮来看文化入侵的发展趋势，上个部分我们说明了外围国家和半外围国家的无产阶级力量最终是会不断增强的，这种力量的增强同时也会逐步发展出属于本阶级的文化，而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力量最终不断减弱。一边是外围国家和半外围国家无产阶级力量的增强，另一边是帝国主义的衰弱。于是，曾经的文化侵略中心开始衰弱，曾经的文化落后地区的文化开始兴盛起来，所以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必然随着本国力量的削弱和外围国家和半外围国家无产阶级力量增强而彻底失败。

当我们说明完文化入侵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以及文化入侵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时，我们可以讨论中国将会这样反对文化入侵以及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 是“民族文化复兴”还是无产阶级文化兴起?

民族文化复兴，这对于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饱受凌辱的民族是多么的令人动容。近年来，我国的民族文化有不断发展起来的趋势，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要给各位泼一个冷水，无产阶级并不能从民族文化复兴中得到过多的好处。

从近几年我国的文化现象看，可以说几乎是违背无产阶级的文化，因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已经没有任何工农兵文化的身影了。例如现在的影视剧中我们已经看不到任何穷人、普通人的生活了，即使有，那些普通人却个个不符合实际，那些影视剧中所住的房子、所用的车子以及奢饰品，哪一个是现在上班族的标配呢?即便是反映革命战争和反侵略战争的军事剧，都基本是违背人民军队的基本特征的。例如现在军事剧中战士之间互称兄弟而不是同志，兄弟一词是国民党军队的称谓，因为国民党军队实现募兵制，是雇佣军，所以维系国民党军队的是所谓的江湖义气，是所谓士兵效忠于自己的长官，加上抓的壮丁都是地痞流氓，所以称谓兄弟也就不奇怪了。但共产党军队实行志愿兵制度(当时是政治动员制)，参加主体是工农群众，并且工农群众参加军队往往要先参加当地民兵，经过必要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才能参加正规军队，所以维系共产党军队的是革命信仰，士兵当然要服从于上级，但士兵是为人民而战，忠于党和人民，故互称同志。而在这其中，政治工作占据重要位置，而负责政治工作的政委却在现在的军事剧中被抹

黑了，现在军事剧把政委描绘成一无是处、形同虚设、妨碍军事工作的形象。而更严重的是，现代军事剧注重战争所带来的激烈，带给观众以刺激感，却从来不反映战争性质问题，不反映我国军队的三大民主，仿佛给人一种感觉：因为我是中国人，所以我要支持中国的战争，完全不谈战争的正义性质，这恰恰是资产阶级军事剧的风格。因为资产阶级明白他们所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性质的战争，他们最害怕士兵思考为谁而战的问题，所以他们要在影视剧中强调战争带来的快感，以此冲淡战争的性质，把士兵们变成无情的杀戮机器。

此外，当代文化的反无产阶级性质广泛存在于社会科学中。倘若我们讨论马克思主义教学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姑且算没有丧失阵地，但在其他社会科学中，马克思主义已经彻底失去了话语权，这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丧失。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停止，阶级分析法也被批判为极左分析方法，在现在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中，再也没有生产关系的概念了，现在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几乎是资产阶级的研究方法，即所谓的经验实证主义之类，历史唯物主义只有靠边站的悲哀。

因此，放眼望去，中国不少文化已经成为实质上的资产阶级文化，中国恐怕还是用资产阶级的文化(所谓的以“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科学”为名义建立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去对抗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甚至有的时候资产阶级文化与帝国主义文化媾和，共同腐蚀中国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当然不否认要发展民族文化，当然不否认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但无产阶级恰不是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民族文化，就像一个想要实现现实幸福的人不能把自己的一切祭献给无用的神仙一样，特别是当这个民族文化已经被资产阶级文化所腐蚀了。无产阶级的真正任务是要将民族文化反过来为无产阶级服务，把民族文化改造为无产阶级文化，就像无产阶级要将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一样，用服务于无产阶级的民族文化动员全国民众，用服务于无产阶级的民族文化对抗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

所幸的是，中国的无产阶级的力量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而增强，随着无产阶级力量的增强，随着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不断向前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将发展起来，而无产阶级文化是否能够成为中国的民族文化、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则要看未来的阶级斗争形势了。

# 老佛爷的大智慧

锤炼旗帜

近日，朝堂市井涌现一股奇谈怪论，说什么我大清又割地，又赔款，英美德法悉数不落，就连昔日番邦小国都敢欺辱我天朝上国。又说什么，啊呀，这洋人的军舰一动，我大清就望风而逃，所谓北洋水师，不过是澡盆玩具，可看不可用。或有人说，我大清二百余年，自改革至今，只怕要亡了。 这些，不过是庸人自扰罢了。

我大清，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故。我大清承老佛爷洪福，不过送了尔蛮夷几笔钱，借出几座城，就得百余新式炮舰，万亿国际援助。想想，老佛爷不过暂借蛮夷几笔钱，暂借蛮夷之手管理城市，就得洋人倾力相助，岂不美哉？所谓赔款之事，不过是我天朝上国对番邦小国之气度，老佛爷恩准，念其国小民艰，不与其计较这一岛一地罢了。

我大清，以骑射为根基，起兵与白山黑水之间，不屑于与西洋蛮夷争个一洋一地。老佛爷圣明，看出番邦所求皆在入洋。以我大清之体量，入洋一事不过平添许多烦恼，不如以我大清之洋为饵，坐看彼等为区区一洋争斗，岂不妙哉？这样，不用出动一兵一卒，一舰一船，就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须知，我大清定远，镇远建造不易，乃是国本，不可轻易出战。何况，以我天朝声威，岂用得着出兵，光是百年威望，就足以令那宵小之辈不敢进犯。

我中华，千年屹立，岂会因为西洋特使一人满朝胆寒。我中华，就是，如那法兰西帝王所言，雄狮尚睡。确信，他日，朝廷定会将这些番邦小国一一降伏。

所谓我大清颜面尽失，国力衰弱，沦为笑柄，不日则亡等一派胡言必是那倭国浪人勾结国内不臣之徒费心捏造所致。此处，奉劝那些不臣之徒，要早日改邪

归正，万不可同那孙文一伙，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不敬朝廷，不敬祖宗，成为青面獠牙之叛匪！须知，你所站立之地，正是我大清！你怎样，大清便怎样！你若强盛，大清就绝不凌弱！

# 电子游戏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危机浅谈

隐 秘 战 线

游戏——被尊称为“第九文化”是现代诸多电子娱乐项目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种类：它被视作一种文化的体现，换言之一个国家所出产的游戏品质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着这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而在近几年，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不断加深，资产阶级凭借电子游戏进行的“奶头乐计划”在近几年开始出现逐步走向失败的倾向——这当中电子游戏质量的下降在我看来是主要因素。

鉴于近几年全球游戏行业所出现的颓象，我提出以下几个主要论点：

1. 一个国家所出产的游戏质量，与这个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是呈正相关的；

2. 在前一个论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游戏质量本身还受到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影响；

3. 游戏行业和足球一样——都是需要依靠大量资本剩余才能养活的行业。

首先第1点，不需要做太多解释：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霸主，其所制作发行的游戏整体数量和质量都要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包括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外围、半外围甚至是一些核心国家制作发行的游戏数量和质量。像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样的核心国家就很少有游戏出现在市面上，连在最近几年上升为核心国家的韩国都勉勉强强（指出版了不少游戏但大多都没有太大知名度）。

第2点，以美国游戏公司及其下属开发组为例：将由美国游戏公司所开发的游戏发布时间线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危机的时间线对比来看，我们就会发现美国游戏的质量在整体上是呈现一个不断下降的趋势的——特别是在2008年资本主义

体系危机后，这一现象得到了加剧。尽管有诸如《使命召唤6：现代战争2》（2009）、《战地3》（2011）、《侠盗猎车手5》（2013）这样的优质游戏在这一时期出现，但也只是回光返照——因为开发这些游戏的公司在后续无一例外地在2020年代陆续出现游戏质量大幅下降的情况：《战地2042》的失败和《使命召唤19：现代战争II》满天飞的游戏BUG（其中后者处在失败边缘）恰好能证明这一点。

对利润负责而不是对游戏品质本身负责，是所有游戏开发商都存在的问题——这一点是由其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决定的。换言之没有任何一家游戏厂商愿意以牺牲利润为代价，来换取能够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其所开发游戏的整体质量，直接导致不论游戏本身质量如何，内置大量内购（骗氪逼氪）的情况极为普遍。

第3点，游戏的开发阶段对资产阶级的盈利而言往往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且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游戏的销量太差而导致公司亏损，那么这些公司往往要靠自身的资本体量硬挺过去。以年为单位盈利足以让资产阶级急不可耐丧失耐心，进而加重游戏内购问题的严重程度。而且若游戏厂商陷入财务危机，资产阶级政府大概率会坐视不管——原因很简单，因为游戏公司的盈利率太低了不值得。

我想，以上这些内容已经能够解答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对“国产游戏为什么不行（或者经常抄袭）”的问题，不过我还愿意再进一步解释：

中国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其半外围的性质就注定了中国的游戏公司没有也不会有足够的剩余资本去养活本国的游戏产业。紧接着剩余资本的不足也进一步加强了中国游戏公司急于通过发行游戏作品的方式来进行盈利的倾向——但依照常识游戏质量与利润是存在一定正相关关系的，大量发行低质量游戏只会降低中国游戏公司通过开发发行所获得的收入，还有可能更进一步将其推向亏损。而不能接受亏损也是中国游戏公司的一大根本问题所在。

那么无数个恶性循环就形成了，中国的游戏公司的商业表现大抵是：

没有足够的剩余资本养活→迫切想要盈利（无法开发高质量游戏）/不能接受亏损（无法接受更长的开发周期）→开发低质量游戏→恶评如潮→游戏发售量减少→公司亏损

对于开发游戏的行为本身而言，恶性循环是这样的：

开发低质量游戏→恶评如潮→游戏发售量减少→公司亏损→急于挽回亏损→再次开发低质量游戏

重复以上循环直到完全失败倒闭破产清算为止。

那么有没有跳出这一死循环的办法呢？有的，那就是抄袭。

抄袭核心国家游戏公司的游戏设计（更何况他们的游戏质量也在逐步下降）能极大地缩短游戏的开发周期，同时提高其质量，有效帮助中国游戏公司避开“开发低质量游戏”这一阶段，同时又满足前一要求（即更短的开发周期和质量更好的游戏），这便是为什么国产游戏抄袭屡见不鲜的根本原因所在。一句话总结那就是：只要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半外围地位一天不变，中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诞生的游戏就将始终保持在文章所描述的状态。

# 心　　理

# 将心理学改造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

临床实习哲学生

个人认为，心理学对于当下左翼运动和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主要在于三点：1. 深入且具体地理解人的需求；2. 了解人在发展过程中所遵循的一些基本规律；3. 基于以上知识和临床实践总结的心理治疗理论和技巧。

当然，以上所有内容都需要在相当程度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需要“取其精华”，是因为今天的心理学，尤其是是临床心理学，已经发展为了一门集合了生物学、神经科学、心理治疗临床实践等多个领域研究成果的综合学科，并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需要“去其糟粕”，是因为该学科内的相关研究无一不是在资产阶级大学中、在资产阶级的资助下进行的。这就导致相当一部分研究成果及其临床应用就如同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那样，是“头足倒置”的。在社会制度的全面压迫下，人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尊严在异化劳动中被剥夺，因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异常认知、情绪和行为。然而在事实上(未必是主观意愿上)发挥维护资本主义生产秩序和意识形态作用的心理学家和心理治疗师，却只能将这些病症和痛苦的解释和解决限制在个体及其家庭的范围内，甚至将治疗变为单纯为自己和资本牟利的工具。

基于这些理解，我认为对心理学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在理论研究方面，我们需要将现有心理学理论和唯物史观有效整合起来，一方面“净化”掉资产阶级心理学的决定论和个人主义色彩，另一方面也重新挖掘出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被“苏式马哲”所掩盖的人本主义内核，再次强调具体的人的需求。在临床实践方面，我们需要不断加深自己对劳动群众所经历的痛苦及其社会根源的理解，并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帮助人们解决生活上的困扰。与主流心理治疗

不同的是，我们所要运用的不再仅仅是心理学的知识，而是结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知识，治疗过程也不再仅仅是咨询室里的事情，而是要尽可能在革命实践中用新的社会关系重塑自我。

在实际操作中，我认为上述两项工作并非无从下手。自二战之后，心理学早已不像早年那样被古典精神分析（生物决定论）和行为主义（环境决定论）所统治，也大多不再秉持一种纯粹形而上学的人性观。今日几乎所有心理治疗流派都强调人的社会需求以及关系对自我的构建（只是这种关系大多停留在个体之间的层面，而没有推进到更为根本的生产关系上），也不乏致力于通过解构社会规训甚至改变社会来解决个体问题的治疗流派。只可惜，在世界革命高潮褪去、新自由主义复辟后，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批判（阶级叙事）被阉割，心理学重新回到了头痛医脚的状态。心理问题的解决被限制在了个人领域，对社会建构的批判也只能在身份政治的泥潭挣扎。因此，我们需要做的是充分发扬现代心理学强调个体经验、反对社会规训的一面，摒弃其追求个人幸福、兜售“资本主义赎罪券”的一面。

一旦我们完成对心理学的改造，它就能成为我们打击资本主义、宣扬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武器。我们要让人民群众认识到，任何心理问题和痛苦的出现，其背后都是一整套压迫剥削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在作祟。甚至在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之后，我们也依然可以运用这个武器来对抗可能出现的新压迫阶层。既然心理问题是社会问题在个体层面的体现，那么我们就可以以此为指标来监测社会中存在的任何范围、任何强度的压迫和剥削。这样一来，通过“逆练”心理学，我们不仅不再把社会责任推卸到个人身上，反而能从每个人的个人体验出发来倒逼社会变革。我想这应该也是未来真正的民主制度所应该表现出的基本特征之一。

# 小资产阶级为什么会有性压抑问题?

井冈山卫士

为什么小资产阶级会有性压抑问题?

不是封建礼教的问题，而是超长的劳动时间，过度开放的“性市场”和就业市场非正式化带来的。

劳动时间长，就意味着中国男性劳动群众（小资和无产阶级）没有时间和精力培养与异性的健康交往技能。这一点可以参见苏霍姆林斯基的《爱情的教育》和弗洛姆的《爱的艺术》。许多时候，只能在肉体和精神双重疲惫的时候发展出某些并不健康的“性癖好”。这些性癖好是性行为异化的结果，其目的不是在性交往中以实现对方为条件的自我实现，而是对被压迫的发泄。这些性癖好往往伴随着对女性的神秘化（崇拜、鄙夷等）。

过度开放的性市场加速了“性资源”向上层小资和资产阶级的流动。而无产阶级和一般小资男性既不掌握足够的经济资源，又不具备资产阶级消费主义吹嘘的健美身形，而且还只会“尬撩”，这样他们在性市场上的谈判力大打折扣。这不仅意味着他们需要高彩礼来“长期购买”性伴侣，也意味着就算结婚了也会被随时“绿”了的可能性。

就业市场非正式化对男性和女性的伤害都很大。首先，工作不稳定不仅影响精神状态，而且会影响居住地，当居住地频繁变动的时候，自然没有时间去经营情感关系和性关系，因此性交往短期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网友很多是大学生/高中生，大家估计都知道毕业=分手这个说法。交往短期化的事实也会影响心态，不仅仅是无法深入了解磨合，更重要的是交往行为更具有逐利性和侵略性。比如男性更执着于尽早发展性关系，女性更执着于从男性那里获取实物和货币形

式的补贴等等。同时，就业市场非正式化也意味着工资被压制在了低于正常代际再生产的水平。如果女性不能依附于上层小资，那么她注定需要用巨量的劳动去满足做职业女性、妻子和母亲的“社会职责”。所以，就算是某位男性品行端庄，如果他的收入无法达到上层小资的标准，就算是没什么坏心眼的女性也会对其保持谨慎态度。

# 如果感情破裂，就要“为爱冲锋”吗？

蒸 馏 水

前几天的新闻引起广泛舆论讨论。事件大致是青岛一位小伙，为了见出轨的妻子讨个说法，脚踩共享单车300公里三天三夜到山东某职业学院，翻墙进入学院，并被保安等人追赶。这则新闻在抖音上一经流传，刹那间感动无数网友。青岛小伙也一夜之间升华为“为爱冲锋的勇士”。有不少网友纷纷共情，视这位青岛小伙的经历为底层男性在感情悬崖边缘无奈与痛苦的集中体现。

读了这则流量新闻，同情之余，也产生了一些疑问。由此联想到青年人（无论是无产阶级青年还是进步知识青年）如何正确处理感情问题，尤其是如何妥善面对感情破裂问题。这里写下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和大家一起探讨。

首先，网络舆论形容这位小伙是“为爱冲锋的勇士”。这个名号中的三个词——“爱”“冲锋”“勇士”——都是褒义词。但是，他的行为果真值得嘉奖鼓励吗？在我看来，他的“勇”是偏激的，他的“冲”是莽撞的，他的“爱”可能是一厢情愿的，所有这些都是不值得提倡的，也不值得作为榜样进行赞扬和表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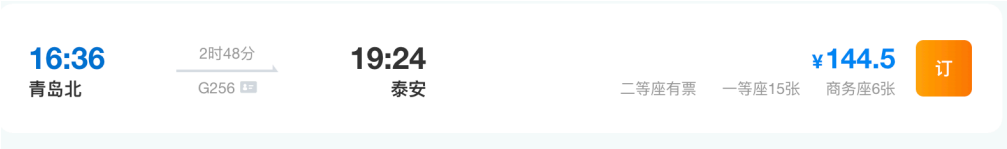
两情相悦，才能称之为爱情。网上流传的版本，有涉及男女主角对婚姻生活的评价吗？是两情相悦还是婚姻破裂？我们不得而知。那怎么能先入为主，认为他是维护“爱情”的勇士呢？

网传这个小伙把工资都用来资助妻子学业——这是真实的吗？网传文案把女方描述成利用男方财物和自己的性资源，借以向上层阶级流动的女性形象，符合所有“老实人”都恨之入骨的势利形象。很难辨别这种省去了细节与复杂性、仅从单一角度刻画的形象是否属于有意而为之，又或者是为了引起共鸣，达到广泛传

播的效果？毕竟如今流量为王的年代，越是标签化、富有戏剧性，越“贴地气”，传播效果越好。同类型的还有原配手撕小三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故事桥段。

网传文案还说，“爱情让人失去理智，他并没有”——这妥妥的煽情风。那么，他真的没有失去理智吗？假设网传他只剩200块钱属实，于是不得不花三天三夜骑共享单车，才能见到妻子。

据了解，山东职业服装学院在山东省泰安市。从青岛到泰安，如果乘高铁只需要三个小时，票价144.5元。如果乘长途汽车，可能更便宜，只要100元，大约六个小时可以到达。







按说这位小伙心急如焚，为什么不选择几个小时就可以到泰安的高铁、长途汽车，而要骑上三天三夜？所以他到底是希望快点见到妻子还是慢点呢？这是一个理智的人会做出的选择吗？

如果说，他是因为经济过于窘迫，想要从仅余的200元中多省下一些，还是有一些问题令人费解。试想，一个人骑上三天三夜，路上难道不需要住宿吗？假如一个晚上住宿费100元，岂不是两个晚上就把200元都花光了？假如他路上没有住旅店，那么三个晚上他是睡在哪里呢？如果他是露宿街头，文案中为什么没有提到这些情节呢？如果把这些情节宣传出来， 不是更能博得人们的同情？

其次，以他这样激动的行为处事态度，即使见到妻子，有可能真正解决两人之间的矛盾吗？最可能的结果，轻则劈头盖脸对妻子一顿臭骂，重则拳打脚踢暴力相加。那如何保证其妻子的个人安全不受到威胁？甚至还有评论扬言“他来，是

对爱情的尊重。他没带刀来，是对法律的尊重。”且不论两人之间到底存不存在“爱情”，这句话似乎在暗示，如果一个人遇到了感情挫折，带刀也是一种解决手段，只是因为违法才没这样做。你会愿意和一个动不动就可能提刀见你的人谈恋爱乃至结婚成家吗?

可以想见，不管在资本主义情况下，还是在社会主义情况下，都一定会存在感情破裂的问题。爱过，然后不爱了，怎么合情合理结束一段感情关系？难道要鼓励人们用冲动、偏激，甚至带刀的方式去处理吗？难道非要伴随着另一方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如果是这样，又如何保证个人选择对象的权利和自由?

人们对爱情有着美好的向往，但这并不代表一厢情愿的自我感动就能成就爱情，也不代表用带有自虐倾向的方式自证爱意至深就能感天动地，就能挽回感情破裂的局面。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不仅给无数劳动男性带来了感情悲剧，也给无数劳动妇女带来了深重的压迫。靠自虐与一厢情愿，靠剥夺一方选择爱情的权利，靠威胁一方的生命安全，既不能挽救感情破裂的局面，也不能得到美好的爱情。无论是为了追求爱情，还是解放，都要从尊重其他劳动者最基本的权利和尊严开始。

# 社　　会

# 只要阶级社会还存在，就不能急于否定专偶制家庭背景下的社会习俗

井冈山卫士

蒸馏水同志的《如果感情破裂，就要“为爱冲锋”吗？》一文在红色中国网上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在这场争论中，蒸馏水同志指出：“可以想见，不管在资本主义情况下，还是在社会主义情况下，都一定会存在感情破裂的问题。爱过，然后不爱了，怎么合情合理结束一段感情关系？难道要鼓励人们用冲动、偏激，甚至带刀的方式去处理吗？难道非要伴随着另一方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如果是这样，又如何保证个人选择对象的权利和自由？……靠自虐与一厢情愿，靠剥夺一方选择爱情的权利，靠威胁一方的生命安全，既不能挽救感情破裂的局面，也不能得到美好的爱情。无论是为了追求爱情，还是解放，都要从尊重其他劳动者最基本的权利和尊严开始。”这段评论深刻地阐述了阶级社会中爱情、性、婚姻的深度捆绑。同时指出了劳动人民在阶级社会的压迫下过分严肃地将上述三者视为不可分割且不容改变的统一整体是对其他劳动人民的伤害。

另一方面，搬砖小能手网友则指出了这些压迫性关系的现实性，因此不可能通过某些个体单方面“脱离”实现解放：“阶级社会下的婚姻，无论对男对女，都是道德和法律的捆绑。无论你承认与否，这是客观存在的对夫妻双方的特殊占有。”西红柿收割机网友则指出了当今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性市场开放的方式攫取/骗取男性劳动人民再生产劳动的肮脏现实：“在半外围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下，底层劳动者的身心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在工作时要被PUA，要被老板当牛马一

样非人的对待，剥削、竞争、压迫，一切可以获得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基本的尊严的机会都消失了，残酷的社会让底层人民只剩下家庭这么最后一个温暖的地方供他们安放自己不堪重负的身心，找到真爱的人，呵护自己真爱的人，为自己的家人去努力工作，为家中调皮捣蛋的孩子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就成为了现实中唯一一个可以获得尊严，获得认同的机会，资本主义是如此的残酷，以至于情感成为唯一的避难所。”

这些讨论是真诚的，高质量的，对我们正确认识性关系，资本主义对男女劳动人民的性压迫，以及如何正确处理未来无阶级社会中性关系的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启发。不过，在进一步的讨论中。我们需要区别对待“现实社会中的性关系”、“理想社会中的性关系”、“历史上存在的性关系”、“革命民主政权应当如何处理性关系”、以及“在个民主政权建立以前的中国革命运动要如何处理性关系”这些不同的内容。

在以狩猎采集为基本生产方式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专偶制”家庭的。《礼记》中讲大同社会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指的是每个社会成员都要平等地以集体的形式参加社会再生产，不存在把再生产劳动全部集中在自己（尚不存在）的小家庭中。而与这种生产/再生产关系互为条件，但是却广遭“文明史观”避讳的，则是“不独夫其夫，不独妻其妻”的性关系。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证据表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不仅不存在单一的“性忠诚”，甚至不存在表达性占有关系的词汇。当然，这种多伴侣关系并非现代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约炮文化”或者“开放婚姻”，它只存在于人数较少的狩猎采集团体中。性关系虽然并不“专一”，但是却通常发生在彼此较为熟悉的团体内，与共同劳动相适应。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不生产剩余产品，劳动时间短，人类拥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在这种情况下，集体的、不以繁殖为目的的性生活本身就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相互交往的通常方式，甚至是化解（非阶级）矛盾的手段。

这种集体性关系从智人产生到现在的200万年间，存在于绝大多数人类历史，直到定居农业和畜牧业出现（约在1万年前）才发生改变。如此长时间的适应，足以在生物学意义上对人的行为进化产生影响。至今仍然保留部分原始生活的原住民部落，其性行为上就没有“文明社会”的排他性。当然在资本主义时代这就成了某种性旅游项目，比如摩梭人或者花腰傣地区的“文化旅游”。同时，今天以消费主义（性开放）的形式扭曲地体现出来的某些“见不得人”的性癖好，如通奸（占有他人配偶）、绿帽癖（邀请他人占有自己配偶）、换妻/夫、乃至一般意义上的“出轨”等，有可能也是原始共产主义集体性生活的在人类进化中的烙印。同时，非繁殖性的集体性行为也可能发生在同性之间。简单的说，在原始共产主

义社会，性（肉体行为）、爱（社会生活）、生产和再生产是统一的，而且是统一在集体的性、集体的爱、集体的生产和再生产之中的。

这种统一在阶级社会中就基本不复存在了。在有了剩余产品，固化了脑体分工，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私有制才逐渐产生。私有制即是对物的占有也是对人的占有。对人的占有则直接表现为对其性的占有（守贞）、对其社会生活的占有（忠诚）、和其生产和再生产劳动的占有。在这一点上，我同意蒸馏水的观点，所谓性与爱成为私有财产的状况，实际上是私有制的结果。当然，这种占有关系在统治阶级中要比被在统治阶级中更加严格。西方核心国家直到十九世纪末，中国直到二十世纪中期以后才实质上建立了形式上的专偶制婚姻制度。在理想情况下，专偶制婚姻的性、爱、生产也应该是统一的，只不过这种统一建立在了原子家庭的物质基础上。在今天中国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对于劳动人民来讲都是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高强度劳动。中国是一个廉价劳动力支撑的、以出口加工制造业为基础的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的主要基础就是超长时间超高强度的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对于广大劳动人民而言，是绝无可能在生产和再生产劳动中获得任何意义上的全面发展或自我实现的。很自然的，性与爱作为仿佛还没有被资本积累侵占（当然早已被侵占）的“圣洁”领域，就成为了劳动男女对反抗异化劳动的最后阵地。对于那些在最需要性生活，但却随时可能被性市场剥夺性生活的普通劳动男性来说，他们中的多数恐怕已经放弃了占有多个伴侣的任何想法，只盼着用自己超长时间的劳动来攒够“媳妇本”，用忠贞来唤醒良知，用未来先衰的“油腻”身躯来守护理想中最后的尊严。这就是广大男性网友面对“为爱冲锋”事件时同情这位丈夫的原因。当献出了自己的劳动，消磨了自己的健康，放弃了其他可能的性伴侣，反复劝说自己为了想象中的“美好”而接受一切，结果却发现一无所有时，就会在绝境中迸发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勇气。夺妻之恨，尽管时阶级社会的时代悲剧，但它确确实实是悲剧，是不可能在反复的欺骗之后，用一句“不爱了”就能抹平的。

蒸馏水讲：“如果没有双方自由的意志来达成契约，那么达成的所谓契约也是不成立的”。事实上“自由意志”仅仅是契约的形式，利益交换才是契约的实质。而利益交换的绝大多数“条款”是不包含在任何法律契约文件中的。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说法，婚姻“契约”本质上是“不完全契约”，其缺失的条款尽管没有什么法律意义，甚至可能也没有特别的道德意义，但它们是确确实实涉及到有生产和再生产劳动构成的利益输送的。我们都知道女性再生产劳动中的“情感劳动”部分虽然不出现在任何婚姻“契约”上，但是我们都应该尊重。同样，中国男性劳动人民往往更加含蓄和深沉的情感劳动同样也不能被随时修改的“自由意志”一笔勾销。

如果说人类的性与爱和生产/再生产一样，本质上都是社会行为的话，那么就算专偶制婚姻制度本身稳定，它也不可能成为性、爱、社会生产的统一点。专偶制家庭也必定会在阶级社会本身解体时随之解体，这当然是理想情况。但是作为中国革命的积极分子，我们面对的现实却不允许我们在阶级社会性市场还广泛存在的情况下全盘否定专偶制家庭背景下的“公序良俗”。因为这些“公序良俗”，尽管具有压迫性，毕竟是劳动人民在特定阶级斗争环境下追求稳定性生活的利益所在。

#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两性关系
## ——“男权”还是“交换”

井冈山卫士、蒸馏水

**远航一号注**：由青岛小伙事件引起的蒸馏水、井冈山卫士和各位网友之间关于中国超高剥削强度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之间两性关系问题的讨论越来越接近问题的本质了。下面将蒸馏水、井冈山卫士之间最新一组讨论编辑为文章：

蒸馏水问井冈山卫士：

“占有”多个伴侣?

“守节”是一种良知?

“理想中最后的尊严”就是没有婚外情?

对性交权利的垄断构成了男性尊严？（换句话说，男性的尊严建立在对女性身体和性交权利的垄断和统治之上？）

我能不能认为上述引用体现了某种对女性身体的统治意识?

另外，井冈山同志还认为，我们不能在“阶级社会性市场还广泛存在的情况下全盘否定专偶制家庭背景下的‘公序良俗’。因为这些‘公序良俗’，尽管具有压迫性，毕竟是劳动人民在特定阶级斗争环境下追求稳定性生活的利益所在。”

对此，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婚姻和性是扭曲的，不正常的。“建立于资产阶级财产关系基础之上的婚姻，或多或少带有强迫性，因而导致了无

数的弊病。”性压抑导致了精神疾病和自杀。没有爱的性也是有害的，因为“人不是动物。仅仅有身体的满足并不够”。“两性的结合是纯粹机械的行为：这样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与基于经济束缚的没有爱的婚姻相对应的是卖淫，它“在资本主义世界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如同警察、常备军、教堂和工资控制”。（奥古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

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女性就“将作为社会实体和性实体而遭受苦难，并且很难说哪一方面的苦难更多”。（莉丝·沃格尔《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趋向统一的理论》）

**“资产阶级婚姻腐朽、堕落、肮脏，婚姻关系很难解除，丈夫有自由而妻子受束缚，还有令人厌恶的虚假的性道德”。**（列宁《女性解放》）

诚然，要彻底解决婚姻和性压抑的问题需要特定的历史条件，我们寄希望于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寄希望于无阶级社会之中不存在依附关系的自由恋爱。然而，在当前，这些问题的实践工作仍是重要的。且不说专偶制家庭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保证“稳定性生活”，所谓“公序良俗”，我们就不对其压迫性提出异议、进行抗争吗？至少，需要对性关系上的男权统治意识，“令人厌恶的虚假的性道德”，以及一些男性对女性身体的私有、占有思想进行反思、批判和斗争。这也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井冈山卫士答：

感谢蒸馏水同志的评论。

蒸馏水同志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现存的对女性身体和性交权力的“占有”。蒸馏水编辑有可能（如果我没有解读错误的话）也认为我的某段评论中也渗透着对女性性交权力的占有观念。

当然，我们都知道不应该“物化”男女劳动者，不应当将女性视为可占有可交换的“性资源”。这是共产主义的道德要求。但是我们在探讨现实中寻在的性关系时，却不能用尚不存在经济基础的共产主义道德来要求不同群众。

首先，女性的性成为某种资源，某种物，并不是男性作为一个整体“物化”了女性。相反，在男女劳动者中广泛存在的“物化”他人，同时也“物化”自己的观念，只不过反应了阶级社会中男女劳动者的劳动力、身体和性都确实是商品，是“物”这个事实。是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

第二，中国现实的劳动男女交往的一般方式是，男性使用自己的身体，付出（净）生产劳动，获取货币收入，女性使用自己的身体，付出（净）再生产劳动（包括性劳动），在专偶制家庭内部实现互惠合作，即搬砖小能手网友讲的“搭伙过日子”。当然，既有提供大量再生产劳动的男性，也有大量参与生产劳动的女性，但是用时间利用数据的结果看，确实存在生产劳动交换再生产劳动的一般趋势。在性市场开放的环境下，这种互惠合作关系就算在婚后也面临着竞争，因此哪怕在一般劳动人民的观念中，“找个好人嫁了”、“攒钱娶老婆”、“你赚钱养家、我貌美如花”这种市场交易的“占有”观念也是非常普遍的。

但是，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的交换并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性”，一天一结算，谁也不欠谁，而是在长期相处过程中实现的平衡。男性劳动提供的货币收入是以流动形式存在，女性再生产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代际再生产劳动，则是一个数十年的工程。尤其是当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以后，这种再生产劳动既要教育“投资”，也会大大推迟。因此，不是我们把男性“讨媳妇”当成是“投资”因而侮辱女性，而是再生产劳动本身的时间节奏导致了男性可能需要先支出数年的生产劳动之后才能获得女性的代际再生产劳动。这种先支出生产劳动，再获取再生产劳动的方式，无非就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一种表现。而只要支付存在时空上的分离，就意味着辛苦数年，“耗费青春”而一无所得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与女性结婚生子但是被“净身出户”一样，都是自己的劳动没能获得对方对等劳动的表现。在中国资本主义环境下，许多情侣或者夫妻被迫分居两地，这就导致生产劳动与再生产劳动的时空分离愈发严重。而性市场越开放，这种分离导致的风险就越大。

蒸馏水同志认为，“男性对女性身体的私有”是“令人厌恶的虚假的性道德”的一部分。我百分之百赞同这种看法，在后来提出的三步走性解放策略中我也提出了一些解决这个问题的初步设想。但是我们不能忘了，男性对女性身体中的占有，本质上是男性对女性再生产劳动的占有，女性的身体仅仅是再生产劳动要素。同样，女性对男性生产劳动获取的货币收入的占有，本质上也是对作为生产要素的男性身体的占有。在阶级社会中，作为再生产要素的女性身体，从来也不比作为生产要素的男性身体更加高贵。

此次“为爱冲锋”事件的重点不是女性的身体应该拥有什么抽象的自由，而是这位女性追求的是长期占有（以及统治）男性（作为生产要素的）身体之后，以“性爱自由”为名甩脱再生产劳动，不去履行对等互惠的自由。这位女性在抽象的“性爱自由”的包装下，追求的是榨取男性生产性劳动的，十分具体的“自由”。这种“自由”尽管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自由观相符，但却是无数男女劳动者的朴素

的正义观相敌对的。而这种在阶级社会重压之下，追求专偶制度内部互惠合作的精神，就是我们所讲的“公序良俗”。

# “青岛小伙为爱冲锋事件”属于无产阶级的内部矛盾——与井冈山卫士再商榷

蒸 馏 水

非常感谢井冈山卫士同志的回复，也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积极讨论。我认为这次讨论是非常有益的，增进了我对各位网友情绪和观点的理解，也使我对自己的一些观点进行了反思。下面我想对井冈山卫士同志在上次回复中的观点提出进一步的看法。

井冈山同志认为，“中国现实的劳动男女交往的一般方式是，男性使用自己的身体，付出（净）生产劳动，获取货币收入，女性使用自己的身体，付出（净）再生产劳动（包括性劳动），在专偶制家庭内部实现互惠合作，即搬砖小能手网友讲的‘搭伙过日子’”。井冈山同志的观点揭示了婚姻中“生产劳动交换再生产劳动的一般趋势”与“互惠合作关系”的本质。

不过，从现实角度出发，劳动交换和互惠合作只是恋爱婚姻关系的一部分，但绝不是全部。劳动交换和互惠虽然是婚姻和家庭的内容，但这种内容并不是像市场上陌生人之间交换商品那样冷冰冰地完成的，而是夹杂着大量的、丰富的社会关系，是灵魂与肉体的纠缠和碰撞，是“低头不见抬头见”，是“斩不断理还乱”，是“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因为资本主义客观存在的种种压迫，劳动男女难以获得理想中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生活，因此退而求其次地选择“搭伙过日子”，但这也仍然无法避免日子过不下去的可能性。事实上，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日子过不下去、家庭破裂的情形远不止是可能性，而是大量的、普遍的现实性。这种破裂的原因可能是两

人性格不合、生活习惯作风不一致、看似日常小事的摩擦和矛盾，等等；更有甚者，在婚姻这一温情脉脉的面纱下，还掩盖着家庭暴力、人口贩卖、身披铁链等人间惨剧。这些矛盾乃至悲剧绝不是靠劳动交换、互惠互利等物质利益就能弥合和化解的。

现实婚恋关系中的挫折是苦涩的，也许并不符合很多劳动者对这一资本主义压迫下唯一“避风港”的朴素想象。对很多身处婚姻或是有过婚姻经历的人来说，婚姻与家庭非但不是世外桃源，反而是负担与痛苦。“搭伙过日子”的将就很大程度上无法给予劳动者渴望的温情，在现实中，甚至演变为无法挣脱、万般无奈却又无法与人诉说的“无期徒刑”。同时，由于离婚的经济和社会成本高昂（巨额离婚费用、声誉的损失，遭到落后道德的压力和误解），以及办理手续上的困难（比如离婚冷静期），对很多深陷不幸婚姻的劳动者来说，既没有精力又没有财力来摆脱这种不幸。

可见，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婚姻家庭并非像“搭伙过日子”这样简单，而往往是搭了伙却过不了日子，或者过不了日子还得勉强搭伙；也未必是充满温情的“避风港”，而可能是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劳动场所之外不得不面对的另外一种折磨和煎熬。

作为既成的社会现实，人们只能用变通的办法来缓解婚姻的痛苦和弥补不可或缺的生理需要。一项在东北农村的调研显示，80%左右的当地家庭都有过离婚、婚外情，甚至还有事实上的一夫多妻现象。据统计，早在1993年，在离婚原因方面，因第三者插足而离婚的人数在全国范围内约占25 %，在沿海发达地区则占70%。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成员的流动愈发广泛和频繁。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积累模式，大量来自内地的农民工在沿海地区受到剥削和压迫，生活与劳动场所不断变换。井冈山卫士也说“在中国资本主义环境下，许多情侣或者夫妻被迫分居两地，这就导致生产劳动与再生产劳动的时空分离愈发严重。”对于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来说，要形成稳定的恋爱和婚姻关系，往往更加困难。在这样的现实历史条件下，过去曾经大量存在的稳定的专偶制家庭客观上已经出现了瓦解和没落的趋势。这种现实存在的趋势，正使得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大多数群众改变对于婚姻以及婚外情的看法。

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对婚外情的态度还是以否定和排斥为主，但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人们对婚外情逐渐变得宽容和理解。由于行文仓促，笔者暂时无法找到最新的调查研究结果。但是，早在九十年代初，曾经有一次覆盖15个省市的“性文明”调查。这次调查发现：认为对婚外恋可以理解或不必加以干涉的，在城市居民中占54%，在农村居民中占44%。

这些事实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严重冲击了专偶制家庭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使得专偶制家庭所依靠的劳动交换、对等互惠以及对性交往的相互垄断等原则不断受到破坏和瓦解。这种现实向中国的马列毛主义积极分子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是要承认和面对这种专偶制家庭不断瓦解和没落的现实，并探讨在这一趋势中，如何维护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并改善劳动群众的两性关系？还是，无视这一已经存在的现实趋势，幻想依靠某些前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井冈山卫士也承认带有“压迫性” 的所谓“公序良俗”来试图阻止或扭转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井冈山卫士同志一定知道，在小资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十分不满，另一方面又对小农等小商品生产抱着浪漫和不切实际的幻想，鼓吹所谓小农生产的可持续“韧性”，是农民工在波涛汹涌的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的“避风港”，幻想依靠各种“乡规民约”来保护小农经济免受资本主义的侵蚀。稍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对小农经济的美化是反动的，而幻想靠“乡规民约”来阻挡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必然是徒劳的。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深有造诣的井冈山卫士同志，为什么却认为靠着“公序良俗”就可以阻挡资本主义发展必然带来的对于确实有着“压迫性”的专偶制家庭的瓦解和破坏呢？

经过与井冈山卫士和各位网友的讨论，笔者已经认识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财富和权力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手中，这大大限制和减少了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发展个人感情生活所需要的物质基础，挤压了他们的择偶空间。不仅如此，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残酷压迫，加上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部分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男性在两性关系中处于特别不利的地位。现实生活中，也往往存在一些女性以交换金钱、权力、地位为目的进行两性交往，玩弄劳动男性感情，攀附资产阶级和小资男性的情况。

但是，这些情况的存在，是否就意味着我们要一概否认男性或者女性在婚后做出感情再选择的自由，甚至对某些做出这样选择的个人大加挞伐，甚至施加网络舆论暴力呢？

在青岛为爱冲锋事件中，很多人认为女方的做法是妥妥的渣女，在婚内一边享受和占有丈夫的生产性劳动的货币收入，一边三心二意出轨他人，没有履行婚姻中劳动再生产的责任和义务，败坏了专偶制家庭互惠互利的原则，站到了劳动人民的对立面。

然而，我们有多少事实根据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呢？在舆论发酵过程中，大家看到的仅仅是部分画面和视频，其他的来龙去脉都是网上文案的一面之词，再加上某些网友的发挥和臆测。比如，这起事件刚刚发生时，网传青岛小伙骑车三

天三夜只为见妻子讨个说法，被广泛炒作并调动了人们的大量情绪。然而，所谓“骑车三天三夜”已经被证实为假消息。我们又怎么知道文案中的其他细节真实可靠呢?

就现在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女方处于专升本的阶段，婚外情对象是她的同学。在今天，即使一本的大学生也已经多如牛毛，绝大多数本科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都逃脱不了无产阶级的命运，更何况是专升本？可见，不论是女方还是婚外情对象都属于无产阶级，而青岛小伙也是无产阶级。整起事件都属于无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具体说，就是两个无产阶级男性共同爱上一个无产阶级女性而引起的矛盾。对于这样的矛盾，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如果我们坚持维护青岛小伙这位无产阶级男性的性交垄断权不容侵犯，那么，另一位无产阶级男性追求感情的权利又由谁来保障呢?

有的网友可能会说，既然女方已经结婚了，就不应该见异思迁，或者她的男同学就不应该追求有夫之妇。然而，作为局外人，我们并不了解很多具体情况，而感情问题往往又是最微妙、最复杂的。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绝大多数网友很难说是“清官”，又怎么能替当事人去判断最微妙、最复杂的感情问题呢？一定要判断，恐怕多半就成了“糊涂官断糊涂案”。

有的网友说，青岛小伙和妻子结婚才三个月，不可能感情不和。这样的网友一定是没有婚姻经历，也许也没有恋爱经历。现实社会中的婚姻既是五彩缤纷的，也是错综复杂的。很多人婚前缺乏相互了解，一结婚就反悔失望，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越是抱着凑活“搭伙过日子”的愿望结婚，越有可能陷入这样的荆棘丛。

如果我们片面强调婚姻中的劳动交换和互惠合作，却忽略了感情不和、婚姻不幸的现实情况，那深陷婚姻痛苦中的劳动男女应该怎么办？现实中也确实有很多人处于难以“搭伙过日子”的尴尬境地。很多时候，婚外情就成了逃避婚姻痛苦的手段。我们对于这样的选择，仅从喜新厌旧的道德层面来指责，是否显得苍白无力？对于千千万万挣扎在婚姻无期徒刑中而又无法自拔的男女，那些紧紧抱着“公序良俗”高谈阔论的卫道士，又有什么救世良方呢?

如上所述，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专偶制家庭的瓦解和没落已经是一种必然趋势。那么，到了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我们又该怎样面对专偶制家庭、婚外情等问题呢？是承认专偶制家庭没落的现实，并顺应专偶制家庭消亡的趋势，还是企图重建和巩固前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专偶制家庭?

如果，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还要维护专偶制家庭，维护专偶制家庭中婚姻双方对性交往的垄断权，这又会带来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在涉及两性交往的决定方面，哪些属于个人的权利，哪些属于社会干预的范围？社会干预

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在实践中又靠什么样的机构或团体来实施？怎样才能防止那些掌握了两性交往“生杀大权”的机构、团体或个人不滥用这些权力？怎样才能保证由于不当社会干预所带来的社会代价（比如，千千万万不幸的婚姻无法得到及时解除、掌握他人交往“生杀大权”的个人挟私报复）不大于这样的社会干预可能带来的并不确定的社会收益？

由于篇幅所限，对于这些重大而棘手的问题无法一一讨论。先提出来供大家思考和探讨。